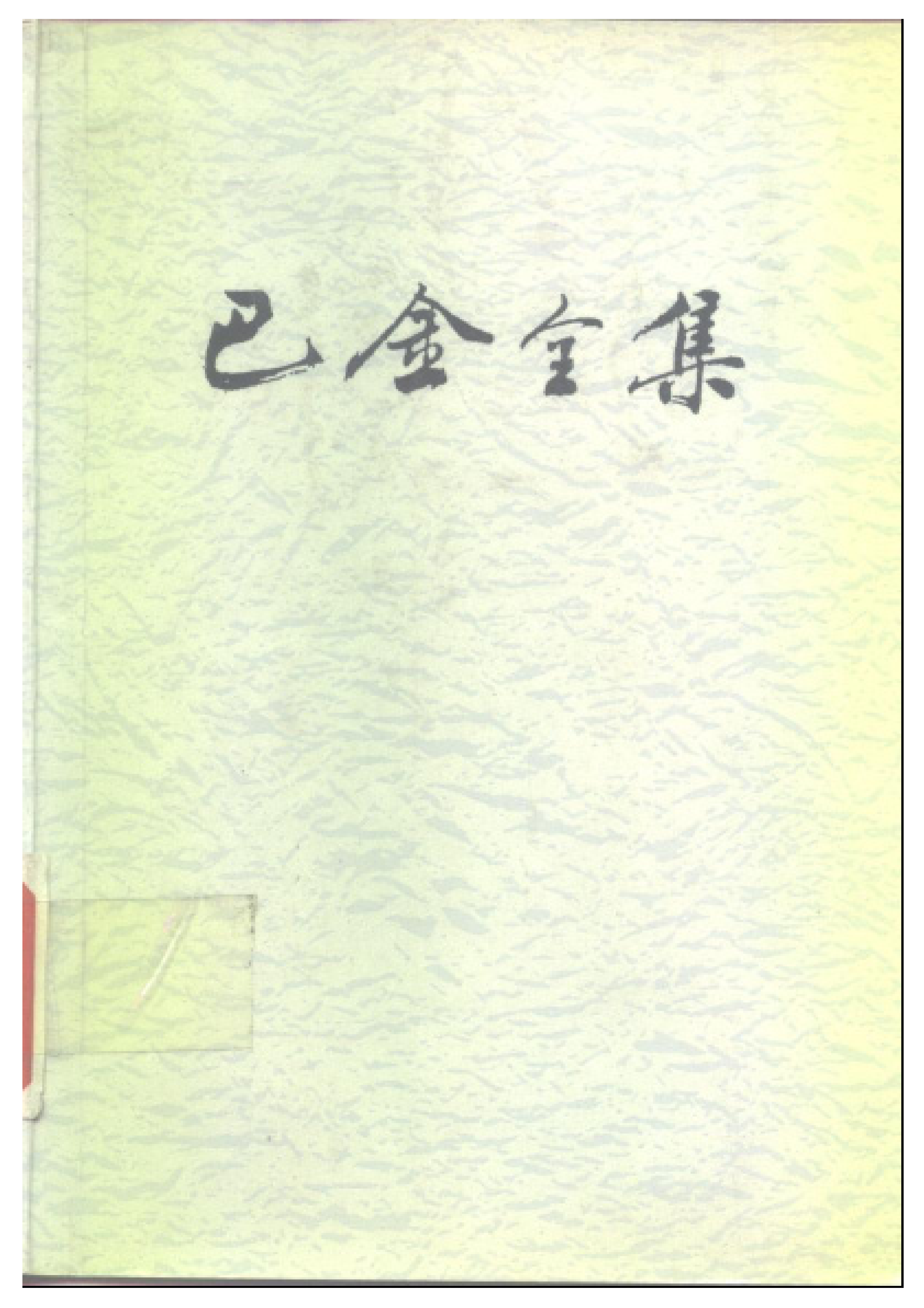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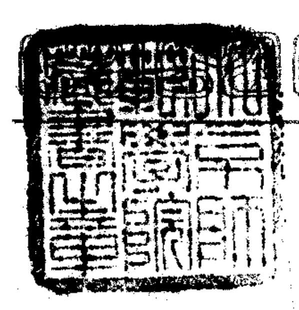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巴金全集

第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巴金全集

（第十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北京第1版
1989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739-2/I·740
定价 7.45 元

目　录

发的故事

序 …… 3

发的故事 …… 5

雨 …… 14

窗下 …… 35

星 …… 52

关于《发的故事》(代跋) …… 109

还魂草

序 …… 115

莫娜·丽莎 …… 117

还魂草 …… 123

某夫妇 …… 189

小人小事

猪与鸡 …… 209

兄与弟 …… 227

夫与妻 …… 242

女孩与猫 …… 248

生与死 …… 258

后记 ………………………………………………………… 265

英雄的故事

寄朝鲜某地(代序)……………………………………………… 269
坚强战士……………………………………………………… 276
一个侦察员的故事 …………………………………………… 305
黄文元同志…………………………………………………… 319
爱的故事……………………………………………………… 364
后记 ………………………………………………………… 372

明珠和玉姬

活命草 ……………………………………………………… 377
明珠和玉姬…………………………………………………… 389
后记 ………………………………………………………… 410

李大海

朝鲜的梦(代序)……………………………………………… 413
副指导员……………………………………………………… 418
回家 ………………………………………………………… 440
军长的心……………………………………………………… 456
李大海 ……………………………………………………… 481
再见 ………………………………………………………… 500
团圆 ………………………………………………………… 521
《飞罢，英雄的小嘎嘶!》 …………………………………… 567
后记 ………………………………………………………… 599

杨林同志

杨林同志……………………………………………………… 603

发的故事

《发的故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七年八月，共印行七版(次)。

序

我去年十二月四日从北平回到上海，住下来，到现在整整一年了。这一年的确是我最忙的时候。白天我要看许多朋友，夜晚我常常写信，写文章，看稿子，看校样，一直到两三点钟。有些爱护我的朋友写信来劝我休息。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没法听从他们的劝告。

现在我不能够再忍受这种令人烦厌的生活了。我要离开上海，我想到南方去。我想多看，多体验，多学习。在这时候印刷局送来了《发的故事》的清样。我自己就想忘记这些，而别人偏偏不让我忘记，甚至在这时候还逼着我把这一年里所写的东西一字一字地重读，使我一点也不遗漏地记起过去的许多事情。

我看完了《发的故事》校样的最后一页。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我仿佛做了一场大梦。

这虽是在百忙中仓卒写成的四个短篇，但是我自己爱它们(这一次我下笔时已经绕了许多圈子，然而它们依旧是热情的产物。有人责备我不能控制感情，我承认这句话。不过我始终没有停止过我的挣扎)。这是一些回忆，我的，他的，他们的，别的许多人的。我们的记忆是不会消灭的。在记忆中常

常有星光闪耀。我常常听见一个声音：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

我相信我终有一天会看见晨星的。所以我也想过拿“晨星”来做这个短篇集的名字。

巴　金 1936年12月8日。

发的故事*

五年前在玛伦河畔一个小城的理发店里，我看见了我的第一根白发，这是那个老年的理发师给我拔下来的。他当时惊讶地对我说："怎么就有了白头发，你还是这么年轻呢！"

我没有话好回答，只是微微一笑。我仿佛记得当时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但是现在却讲不出来了。五年是一个长的时期，我已经忘了许多事情。

昨天我翻开一本旧书，在书里面发见几根白头发，不觉想起了金的事情。一年多不看见他了。前些时候他忽然来看我。这一次看见他，最先映入我眼里的就是他那一头白发。单说是白发，也许不恰当。头发的颜色是灰白的，而且在灰白色中间还露出来几根青丝，不用说，这要经过仔细的注视才看得清楚。这一头白发使我想到一年前留在那个头上的表现青春与活力的颜色。的确一年前我跟他分别的时候，他还有那么浓密的黑发，脸上也充满了血气。想不到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他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倘使我们在街上遇见，我一定不认识他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五日《作家》第一卷第二号。

他坐在我的对面，望着我苦涩地笑了笑，抑制着感情地小声说："一年了。"

"一年了，"我单调地答应着，我看他的头发，看他的脸，看他的眼睛，这一切都不是我一年前看见的那个样子。我很奇怪，这一年来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使他在这样的年纪就有了白头发。

"你还没有什么改变，"他淡漠地说了一句。他在躲避我的眼光，大概是我的眼光使他感到不安了。

"是，"我也淡淡地答应一句，声音的单调连我自己也觉得。我们这次的会见似乎是不愉快的，我们好像在彼此敷衍。其实，并不是。分别了这许久，我知道他跑了好些地方，我很想再看见他，我有许多话要对他说。可是意外地看见他那一头白发，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样一来我早准备好要对他说的那些话都给赶到远处去了，我一时没法找回它们来。

"你似乎不愿意见我，"他依旧冷静地说，丝毫不动感情。

"不，不是，这一年来我常常打听你的消息，我很关心你，"我连忙分辩道。

"那么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笑？"他又说。他不笑，也不动气，脸色不变红，也不变青，面容却是很严肃的。

他以前完全不是这样古怪的人。他那种深透的眼光使我觉得浑身发痒，很不舒服。我不觉糊里糊涂地指着他的头发说了半句：

"你那头发——"

他的眼光马上变温和了，变得这样快，好像受到了魔术手指的一触，立刻发生奇迹一样。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叹了一口气。他的叹声泄露出复杂的感情，这声音毫无隐瞒地告诉我他这一年的生活。但是可惜，我还不能完全了解。

我们两个对望着。我等他说话，他等我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

“铭死了。”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铭是他的妻子，我见过好几次，是一个健康的年轻女人。她病死的消息我早就听见人说过。虽然我想不到她会死得这么早，但在这个年头死掉一个人，也并不是什么希罕的事。所以我也就忘记了。现在经他提说，我才记起来了。

“哦，”我应道，我觉得我完全明白了，他的这个改变一定是铭的死给他带来的。我想找几句话安慰他。

“是我杀死她的，你不知道，是我害死她的！”他的嘴动了几下，好像要说什么，却又害怕说出来，脸上的肌肉在抽动，他忽然忘了自己似地说出这样的话。

“不要提那件事情了。人死犹如灯灭，一切都过去了。你还想她做什么？”我同情地说，我看见他渐渐地激动起来，害怕过去的事情使他过于忧伤，想一下子就关住他的回忆之门。

他微微地笑了。但是从这个笑容里透露出来的似乎是无穷的苦恼。他那张黄瘦的三角脸忽然痛苦地搐动起来。他的表情使我感到一种威胁，他好像要把他那无穷的苦恼传染

给我。

我也渐渐地激动起来。我觉得不安。一些不愉快的思想向我袭来了。我在抵抗，我要保持我自己的平静的心境。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用，我开始失掉控制自己的力量了。

"她住在朋友家，在一个小村子里。她身体很坏，时常生病，我不能够去看她。我只能够偶尔同她通信息。她快生小孩了。我去看她，在半路上碰到了那些矮鬼，我躲到一个白杨林里，跟他们打了半天，到晚上才逃了出来。以后我不敢再去。过几天朋友们就给我带来消息说，她和那个初生的婴儿一起死了。死了，就这样渺小地死了。"他说到这里便仰起头对着天花板发出一声长叹。他似乎要看天，但是天被屋顶遮住了。他的叹声不能够冲破屋顶，又折了回来，怨愤地在房里四处漂荡。他的眼睛是干燥的，眼角有些血丝。

他的这番话是我不曾料到的，但是听起来却又不使我吃惊。我知道他们那种人的生活和我们的不同。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我们的也有差别。说几种语言，带几种武器，跑几国的土地……这在他们都是很平常的事情。他以前虽说像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他究竟是那种人中间的一个，他当然会走上他们的路。我虽然知道这个，可是他的话却把我心海里的波涛激起来了。我默默地望着他，想从他的脸上看见他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一切。

"你还记得罢，六年前在北平同兴公寓里面我们几个人闲谈，我那时正在同铭恋爱，你劝我结婚，朴却表示反对。他说我跟铭是两种人，我们在一起生活不会有好处。你当时还责

备他不应该有国家的观念。① 我后来不顾朴的劝告同铭结了婚。但是现在我才知道朴是对的。"他又发出一声叹息，就站起来，走到窗前，站在那里，眺望下面的街景。

我的心被回忆苦恼着。我记起了六年前的事情，那是在夏天，我到北平还不久，住在一个公寓里。那个地方很静，只住了三五个客人，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白天很热，我除了热以外还感到寂寞。夜里金和朴常常来谈。我是由朴的介绍才认识金的。我们很快地就成了朋友。在八月的夜晚，明月高挂在天空，微风吹动槐树的枝子，我们坐在天井里，朴激动地、滔滔不绝地叙述那些白杨林里和积雪的山顶上的故事。朴是一个亲身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以他的故事里有血有肉，而变成了活的东西。朴是我所敬爱的友人中的一个。我去法国的前一天，他深夜跑到我家里来看我。我们差不多谈了一个整夜。但是我从法国回来，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听说他是在积雪的山上遇害的。他和三个同伴被五十个敌人追赶着，围困在山顶上，过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两支手枪冲下山去。他打死了六七个人，但是后来自己也死在乱枪下面。我料不到身材瘦小的朴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个故事是金亲口对我说的，金并没有亲眼看见那件事，金虽然也是朴的同乡，可是他并不曾参加过朴的活动。然而我们分别了一年以后，金却在我面前说起"朴是对的"这种话了。我的眼睛里晃动着朴的平凡的面貌，我痛苦地想起我们的过去的友情。但

---

① 金是朝鲜的革命者，铭是中国女子。

是金的堆满皱纹的脸马上就给我遮住了一切。我忽然惊恐地发觉他的颧骨是特别地高，脸色是特别地黑了。

金站在我面前，伸起手把他的灰白色的浓发抹了一下，然后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一面用低沉的声音继续说："铭和我同居了几年，她没有一天不替我担心。她没有一天忘记我们是两个国度的人，她的强健的身体就是被这种担心毁了的。虽然我也愿意做一个和铭、和你们一样的人，不去做朴他们做的事，但是没有用。我和铭，和你们的感情是不同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好像跟你们的完全两样。我们从小就被夹在钳子里，夹得那么紧，好像把我们身体的构造都给改变了。甚至同你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身子好像被紧紧捆着一样。"他说到这里，就伸出一只手来，把他的乱发搔了几下，在房里踱了两步，然后走到他先前坐过的那把椅子前面坐下去，又说："我忍受了一切，我胆颤心惊地忍受了一切，我只想同铭过些幸福的日子。但是人家还不放松我，时常来麻烦我。而且在你们这里我也是受到轻蔑和歧视的。……铭从没有对我表示过她后悔嫁给我的意思。我知道她决没有那样的心思。但是她那淡淡的忧愁我却看得出来。我想，尤其使她难堪的是，甚至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两个人还是各有各的心思，对于任何一件事情，我们两人的看法都是两样。她始终爱我，然而她不能了解为什么我不会有和你们的同样的感情，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们那样安静地过日子。……她的身体一天天地变瘦变弱，而且时常生病。这个变化我看得很清楚，我也知道这全是因为我的缘故。……我渐渐地明白我同她结婚是做

错了事情。然而我还极力想法来补救，我还绝望地努力使她和我都过得幸福。于是在故乡里忽然起了骚动。这使得我们在外面的人虽是很安分的，也过不了宁静的日子。骚动自然很快地被压止了。但是人家要把我押送回故乡去，只因为我和朴有过来往。这样我才不得不离开你们，逃到那边去。我本来想把铭留在这里的。但是她一定要跟我走，她说她的身体虽然坏，她愿意跟我去吃苦。"

他停了停，把眼睛掉开，看了一下天花板，又埋下头来。我注意地看他，他的脸颊的肌肉搐动得很厉害。过了一会儿，他依旧埋着头说下去：

"她已经有了孕，到那边不到两个月她就病了。她不能够跟我过漂流的生活，所以我把她留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后来因为那个地方不安全，我又把她搬了一个地方。她就死在那里。"他突然抬起头看我。他的眼睛是干燥的，干燥得好像马上就要冒出火来一样，连他的脸也似乎被那内部的火烧焦了。那张脸上仿佛就从没有粘过一滴眼泪。他这个人果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感情跟我们的并不是一样的。这个思想突然照亮了我的心，使我明白一些新的事情。但是我的心却因此更痛苦了。

他又一次搔他的头发，忽然用力拔下了十几根来。他默默地搓着它们，然后又憎厌地把它们掷在桌子上。他自语似地说："这件事是我料到的。我知道迟早总有这一天。有时候我甚至想她死了也好，对我的行动也许更方便一点。我的头发并不是在她死的时候变白的。这是以后的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农家开会，那个地方被敌人包围了。我们不知道

来的人有多少，我们的人却只有五个。我们跟他们打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子弹也没有了。我翻了墙逃出去。有三四个人跟着追我。我跑了里多路，后来就躲在高粱地里。外面时时有枪声和人声。他们到处搜索我。我听得见他们的呐喊声。我不敢动一下。我不吃一点东西，连一口水也不喝。我也不觉得饥渴了。我整整躺了两天两夜。后来知道他们去远了，我才带爬带走地出来，慢慢地走到一个相熟的农家，在那里住了一天。我的头发就是在那两天里面变白的。我的脸，我的眼睛都是在那两天里改变的。好些人都不认识我了。这意外的改变救了我的性命。倘使没有它，我现在也不会活着到这里来了。"

他站起来，微微一笑，这个笑容使他的干枯的脸庞显得有生气了。他的眼光突然明亮地在我的脸上掠过，就像电光一闪，然后依旧是那一对深沉的黑眼珠，但是它们不像先前那样地干燥了。

"我走了，"他简短地说了这句话，就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他紧紧地握着，他的粗糙的手是那么有力，把我的手捏得发痛了。

"你还会再来罢，"我惋惜地而且带点痛苦地说，我本来有许多话要对他说，现在都说不出来了。

"不，我明天就走了，"他摇着头用决断的声音来回答。

"你为什么不多住些时候，你既然来了？"

"我还有事情。在这里多留一天，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对你说不明白。我们的感情跟你们的不是一样。你们可以安静

地生活下去。我们不能够。……也许我没有机会再来了。今天我来看你，让你知道我这一年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让你知道我这时候心里所想的一切，我想你是能够了解的。以后我不再打扰你了。”他说罢，又微微一笑，就大步走出了房门。等我走下楼到街上去追他时，已经失掉了他的踪迹。一部电车刚刚开走，他也许就在车上。

我在人行道上痴痴地站了片刻，然后沮丧地慢慢地走回家去。我感到了寂寞，无可奈何地在房里踱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他先前拔下来的十几根头发，就在桌子上捡起了它们，把它们看了半晌，然后珍重地夹在一本书里。

金以后果然不曾再来。他一定是回到那边去了。我最近还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今天我在外面理了发回家，无意间在自己的头上发见了好几根白发，就把它们拔了下来。我也把它们捏在手里看了一会儿。我又把昨天翻过的旧书打开，把金的头发取出来，同我的比较。头发完全是一样的，连我自己也看不出两个人的头发的差别。然而我知道人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这种认识使我很苦恼。我气愤地把两个人的头发合在一起，心里想：这样总分不出好歹了罢。但是以后我的心宁静了一点，我又有些后悔。我又想把我的头发，跟金的头发分开，可是任我怎样努力也办不到了。

1936年4月在上海。

雨[*]

一

接连地落了几天雨，天空没有丝毫的晴意。

从早晨到夜晚我都坐在书桌前面。书桌横放在窗前，我抬起头就看见雨水沿着玻璃窗滴下来。我的眼光透过玻璃望出去，只看见模糊的一片雨丝，雨点单调地滴到窗下石板地上，差不多就用这同样的声音一连滴了这几天。这声音起初还只到我的耳边，后来就渐渐地进了我的心里，它折磨着我的心，使我不能够把心放在书上。最后我连书上的字迹也分辨不清楚了。我不能够再忍耐下去。我阖了书站起来。我在房里踱着。我点燃了一支烟。

我喷出一口一口的烟雾。烟雾遮了我的眼睛。但我的耳朵还是很锐敏的。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于是我奇怪地想起来：难道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不能够在房间里留下去。我不再迟疑，便抛掷了烟头，披上大衣，戴起帽子，匆匆地走下楼，开了后门出去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五日《作家》第一卷第一号。

外面依旧落着雨。弄堂里很静。石板地因了雨变得滑脚了。雨点飘在我的脸上，打湿了我的眼镜。我不注意这些，我只知道我心里的火，我正需要雨来浇灭它。我迷惘地走出了窄小的弄堂。

街是比较宽阔的，但躺在我面前的却是一片荒凉的景象。店铺门前抖动着微暗的灯光，街上默默地滚动着几辆黄包车。几个无力的影子晃过我的眼前。一切都是没有生气的。只有雨起劲地落着，不住地落着，那些雨点威胁地打在没有生命的地上。

我在人行道上走着，这些时候我就没有停过脚步。雨水沿着帽檐不停地滴下，眼镜片上积着雨点，我不去揩它，连那插在衣袋里的手也不伸出来。我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而且我也不去看它。好像有一种力量压住我，我拚命在跟它斗争，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走。

我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去想它。我甚至不曾在十字路口停留片刻。好几次我的脚踏在水荡里面，水漫过皮鞋浸湿了袜子，我也不去管它。我只顾大步走着，好像我害怕一停脚我就会落进谁的掌握里面似的。

过一条街，又一条街，在我的眼前晃过的依旧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我不知道我已经走了若干时候。可是我的心仍旧被烈火煎熬。冷而湿的雨点在我的身上并没有一点作用。我不觉得冷，不觉得疲倦。

忽然在一个弄堂门口我停住了脚。不，不是停脚。我转了弯而且走进里面去了。我自己也没有时间去想这是为了什

么缘故。

这个弄堂也是很静的。好些人家已经熄了灯。从那些有灯光的房间里也传不出来一声欢笑。我走到第三号的后门口站定了。我伸手捶门的时候，才惊讶地觉察出来，这是宇住的地方。

开门的正是宇。四五天不看见他，他的没有血色的脸显得更憔悴了。他看见是我便现出吃惊的样子，但是也不说什么，就让我走上楼进了他的房间。

“你为什么来，我不是叫你不要来吗？”宇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了第一句话，但是他友爱地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感激地看了看他，然而这感激马上就被苦恼赶走了。我挣脱了他的手，低声问：“有消息吗？”

他的眼睛痛苦地睁大起来，他点了点头，又绝望地把头摇了两下。

“难道就没有希望了？”我恐怖地叫道。

他轻轻地拍一下我的肩膀，小声警告说：“轻声点！”过了半晌他才告诉我：“听说她还受着优待。不过我们始终打听不出来她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靠得住吗！”我烦躁地问道。

“谁知道，然而我们就只有这一点点消息了。我们拜托许多朋友打听都没有用处，我们没法跟她见一面。”他的调子似乎是平淡的，但是我却听出来隐在这平淡后面的深的苦恼。四五天以前我看见他，他告诉我的话也就只是这一点，显然他最近几天里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消息。

“看，你一身都是雨，”他忽然说。“你不应该到这里来。你也得顾到你自己的安全。”他的责备的口气里含着很多的关心。

我苦笑一下，脱去大衣，揭下湿帽子，放在一个凳子上，就在写字台旁边坐下来，苦恼地答道：“我不能够过那种生活。我不能够活活地闷死在房间里。你不知道，那种生活是多么可怕，甚至比坐牢还可怕。”

“安静点，不要老是诉说你自己的苦恼。”他也坐下来，关切地望着我。“你应该忍耐一点。你看我，你想想我的生活。”他停止了说话，默默地搔着头发，好像在思索什么使他苦恼的事情，或者是什么痛苦的回忆使他不能够说下去。我知道这一定是关于她的事情。我的烦躁渐渐地静下来，但是心却更敏锐地痛了。

“华的母亲来了，”他放下手，把手腕压在写字台上，忽然下了决心似地小声说，“就住在亭子间里。她不知道她女儿的事情。我没有勇气告诉她。你想想看，我要哄骗她，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她是我的姨母，她看见我长大成人的。她跟华约好到这里来，她跟华通信都是由我这里转的。我们当时想不到会有那种事情。你想我怎么能够对她说真话，她是个将近五十岁的人了……”他的声音渐渐地抖得厉害了，到最后就变成了抽泣，但是他不愿意露出悲哀的样子，便住了嘴，呻吟一声，声音仍旧很低。

华告诉过我她很爱母亲，她常常对我们讲起她母亲的好处，她母亲守了二十年的寡才把她抚养成人，送她进学校读

书。这个有知识的好心的老妇人，她的唯一的希望就是：华嫁个如意的好丈夫，过着幸福的日子。她虽然不了解华，她却是以整个心爱着华的，但是现在……我想到这件事情，我想到华从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的心又痛起来，我用了全力来忍住，我也不愿意露出一点悲伤的样子。

“我们总得想个办法救她，”我低声自语道。我努力思索一个有效的办法，然而我的脑子突然变得沉重起来，连思想也变成凝固的了。我绝望地搔我的脸，好像那上面有无数的疮疤。

“还有什么办法呢？我找过许多人设法，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宇苦恼地接口道。我知道他的话并不夸张，他的确为了华的事情奔走过好几天，然而他始终得不到一点结果。

“也许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这样一个念头意外地跑来抓住我，我要甩掉它，却不能够，我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这句话，连我自己也害怕听它。

“不会的，决不会的！”他挣扎似地辩驳道，声音渐渐地高起来，他说话也起劲，好像他要从我的手里把她救出来一样。“她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激烈行动。”

“为什么要有激烈行动？”我猛然站起来，把一只手按住写字台，动气地说，我仿佛在驳斥他的论据似的。“她不愿意跟着别人一道沉落下去，她敢于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不就够了吗？”我说完，看见他茫然地望着我，不说话，我的怒气淡了下去，我重新坐下来。我的眼前隐约地现出一个

麻布口袋，一条河，口袋落在水里，浮着，浮着，于是渐渐地沉下去了。我觉得这个口袋里面装的就是她的身子。我痛苦地闭上眼睛。

“不会的，人不会这样对付她。我相信她还活着，”宇忽然自信地说。这声音使我睁开眼睛。我看见了他的坚定的眼光，但是他的眼光又渐渐地动摇起来，他接着带了疑惑的调子说：“然而在这个年头一切都是料不准的，谁能够有把握呢？……”

亭子间里起了一个老妇人的咳嗽声，多么空虚的声音。不久声音就停止了。宇的话被这声音打断，也不再继续下去。这个房间又落进了沉寂里，但是老妇人的咳嗽却进了我的耳朵，而且在我的心上响了。这是华的母亲的声音，它使我记起了华的一切。痛苦和愤怒又在我的心上堆积起来。

“她还没有睡，她每晚上都要到夜深才睡得着，”宇的脸上又堆起了黑云，他望着我悄悄地说。“她在想念她女儿。我担心她已经猜到一点了。我这个人不会说假话，很容易露出马脚，不然她为什么常常用忧郁而带责备的眼光看我，好像要说什么话又说不出口呢？”

“她不会知道的，”我茫然应道，我说这句话并不是安慰他，我只想说出一句话来，我并不去管这句话有什么意思。我心里闷得难受，我需要吐出一点东西，我不能控制我的手，却让它用力去抓我的脸。

“我害怕我有一天会把一切全告诉她，我不能够瞒她，”他无可奈何地低声说，他好像在自言自语，又像在故意逼着问

我，求我给他一个确定的回答。

我不答话。他忽然惊恐地望着我叫起来："血！血！你脸上……"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伸手在脸上摸了一把，掌心里全是血，我平静地回答道："这一点血算得什么。"

他不作声了。脸上现出惊疑的神情。

我坐在他的斜对面，我怕听他的声音，我怕看他的眼光，我怕忍受房里的沉寂。我站起来，穿上大衣，戴起帽子，不说什么话，就往楼下走。走过亭子间门口，大概是脚步声惊动了房里的华的母亲，她又大声咳嗽起来。这声音像鞭子一样在后面赶我。我急急地走下了楼。

宇赶着下楼来，低声嘱咐我几句话，要我以后行动小心一点。这样的话他已经对我说过好几次。我含糊地应着，就往外面走了。

我带了一肚皮的火到这里来，依旧带了一肚皮的火走出去。雨势很大，地上是一片水，水随着我的脚溅上来。我拉起大衣领，仰头望天。天空是一片深的黑暗。冰冷的雨点打击我的烧脸，脸上的血迹被雨点冲洗掉了，伤痕微微地发痛。我无可如何地嘘了一口气，就埋下头走出这个弄堂。

我的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好像天在下着大雾似的。脸打湿了，帽子沉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沿着帽檐继续地滴下雨水。大衣上是一片湿，裤脚被水泥浸透了，一双皮鞋不时地踏在水荡里。我只顾埋头走着，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不想回家，那个寒冷而寂寞的房间已经把我折磨够了。我只

是胡乱地走，没有目的地走。

过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不曾注意到已经走过几条街了。我穿过一条较热闹的街道，就忽然转进了一个弄堂。我的脚在一家后门口停下来。于是我惊愕地抬起头。红黄色油漆的木门上贴着一方白纸，写着“15”这两个黑字。

我的脑子突然清醒了。我不敲门，却退后两步，留恋地望了望上面的亭子间，那里没有亮光。一切都是静寂的。我的心又痛起来。我想，在前些时候，我只要在这下面唤一声“华”，她就会从亭子间的窗户里伸出头来给我打招呼，然后就走下楼给我开门，让我进去。我们会在她那张小圆桌旁边坐下来，泡茶喝。我们谈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会告诉她我这一两天的工作情形，她也会把她的告诉我。她会高兴地指点这指点那给我看。她会翻出一些书问我一些问题。等到这些事情完结了，她就用她那对漆黑的大眼睛柔情地望着我，对我倾吐她的私人的情感，我也诚恳地把我的一切吐露给她。我们是常常这样地相会的，有时宇也来同我们在一起。甚至前十多天我和宇还同来看过她，在那上面亭子间里坐了两三个钟头。但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而且是这么突然的。

我下了决心不再到这个地方来。朋友们都警告过我。我也知道在这个地方我再也找不到她的痕迹。然而我的一双脚却把我带到这里来了。我的脚似乎比我的脑子更不容易忘记，是它们使我清晰地记起过去的一切。

我不能够马上离开这里。我远远地站着望那个亭子间，两扇窗门紧紧地闭着，里面是漆黑的。我忽然想，她也许是睡

着了。我觉得有一对漆黑的大眼睛在我的眼前晃。我要睁眼细看，但是我的眼镜片上粘着雨点，使我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象。雨点无情地在我的头上、脸上、身上敲打。我好像没有感觉似地站在那里，我甚至不动一下身子，或者做任何保护自己的举动。我痴痴地立着，直到附近人家的后门带着大声猛然打开的时候，我才被另一个念头刺了一下，于是惊觉地拔步走了。

我仍旧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的脚拖着我的身子走出这个弄堂。街上的灯光显得很惨淡。一家烟纸店的伙计在上铺板。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两三个撑伞的行人。这一切好像都和我不相关联似的。我忽然觉得在这个大都市里我似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个思想更使我苦恼而且煽旺了我心里的火。雨势并没有减小，然而我已经感不到雨点的打击了。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让我的脚把我带到任何地方去。

我走在马路旁边。我的脚变得很沉重，皮鞋里积了不少的水泥。我不能够走得十分快。一辆汽车以极大的速度从后面驰来，驰过我身边，发出了尖锐的叫声。我受惊地跳起来。水泥溅到我的身上。我还听见一个清脆的笑声。

"人们并不是互相关联的，"这个念头更锐敏地刺痛我的脑子。我自己立刻觉得脸上起了痉挛。当我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一些思想咬痛我的脑子的时候，人们却快活地在汽车里笑了。我的思想，我的苦恼是没有一个人关心的。我受苦，我挣扎，我也许就会临到最后的结局，但是没有人知道。在一阵难以名状的心的压迫中，激情在我的身体内生长了。我觉得它

不住地在我的胸膛里搅动。仿佛脏腑都掉换了位置似的，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的插在大衣袋里的手捏紧了拳头。我只想毁掉一些东西，或者就让我自己马上被什么东西毁掉。我只希望雨落得更大更大，最后带来一次洪水把我和一切都淹没掉。

然而雨势并没有增加，它反而小起来。一阵燃烧，一阵熬煎使我时时觉得这颗心就要炸裂了。我咬紧牙关，疯狂地往前走。我不再看见冷静的街道了，我也不去管我正朝着什么方向走去。

过一条街，又一条街。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转进了一个弄堂，而且我的脚又在第三号的后门口停住了。我茫然站在门前，我有点惶惑，不知道应不应该再走进宇的房里去。

我自己并不要再到这个地方来。我怕看见宇的憔悴的面容，我怕听那个老妇人的咳嗽，我甚至怕伸手去敲那扇门，但是我的脚偏偏把我带回到这里来了。我的脚太不能够忘记事情，它比我的脑子还更清楚。甚至当我的心想忘记的时候，我的脚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

但是我不能够敲门进去。我就站在门口，我抬头望了望亭子间，窗户紧紧闭着，那里面也没有灯光，这跟我刚才看见的另一个亭子间差不多。老妇人已经睡熟了罢？我很想知道她在梦里会看见些什么景象。在她的梦里华一定很健康地活着。我的思想便停留在老妇人的身上。华给我看过她的照片，是慈祥的面貌。眼睛和嘴都跟华的相像。这时候我忽然想看见她一面，这个想望很强烈，我几乎抑制不住。但是我听

见了她的空虚的咳嗽声，这不是从亭子间里发出来的，这是从我的心底响起来的。于是我明白了：我不能够敲门进去，我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就毅然走了。

一路上像被什么追赶着似的，我走得很快，我并不停留一下，或者掉头去看路旁的景象。雨点无力地飘在我的脸上，我已经感觉不到了。

我踉跄地回到了家。

二

天阴着。空气很冷。我看见灰色的天空，就像连最后的希望也被夺去了一般。但是我不肯绝望地倒在床上，我又不能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我只是烦躁地在房里踱着。我不断地抽烟，把我的脑子也弄得发昏了。

昨天一天没有人来看我。我一直思念着华。我等待朋友来对我说几句话，然而一直到夜间，我的房门上都没有起过一下敲声。后来我就出去了，在十五号的后门口徘徊了片刻，才踉跄地回家睡觉。我做了一整夜的梦。梦中到处都是华的面貌，但也是很模糊的，不能够连接起来，所以我一睁眼睛就不能明确地记起什么了。

我在房里踱了许久，烟抽得太多。脑子似乎凝成了一个铁块，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我终于疲倦地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来。我翻开一本书低声读了几句，几页。我自己却不明白我读过的那些话有什么意义。

门轻轻地响了，我抬起头就看见华的影子飘进来，她和平日一样地对我微笑。

“华！”我惊喜地叫一声。我站起来，我的眼睛花了。

门静静地掩着，并没有人进房里来过。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了。我知道华是不会到这里来的。于是我的心开始绞痛起来。

我翻弄抽屉，我翻弄书橱，我想在那里面找到一点关于华的东西。我到处翻遍了，可是依旧找不到什么。文件和书信都没有了。我的日记里有不少篇幅是描写华的，以前我翻开日记就仿佛看见华站在我的面前，我常常笑着对她说她活在我的日记里面。然而现在这日记也毁掉了。那么我在什么地方去找她的面影呢？

后来在一本旧书里我无意间发见一张照片，已经褪了色，不很清楚了。这上面有华，有我，还有两个朋友。我们这些人平日是不照相的，不知道怎样，那一次在公园里却照了这一张东西。这是两年前的事情，那时华还梳着两根小辫子。

我痴呆地望着照片，我想在那上面看出我们当时的愉快的生活，但是在照片上华的小女孩似的面孔已经模糊了，那一对浓黑的大眼睛也淡了许多。粗粗一看这面庞简直不像是华的脸。我知道连这张仅有的照片也会渐渐地消失的。我痛惜地拿着它，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好容易挨到傍晚，宇来了。不过隔了两天，他的头上就多了好些白发，这改变使我大大地吃惊了。

“有什么消息？”我激动地问道。

“恐怕没有希望了，”他悲痛地答了一句，就疲倦地倒在床上。

我不能够再发出一句问话。他的回答是我料得到的。我害怕再听见他说出那样的话。我痛苦地踱着，拚命地抽烟。

“煌，”宇忽然坐起来唤我。我掉转身子望着他。

“华的事情大概没有希望了，”他重复地说了一句。“现在各种机关都不承认有这样的一个人，都说不知道这个名字。这一定是人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才这样说法。你那晚上说的话倒不错。”他睁大眼睛望着我，我发见他的眼里有一些血丝。他的脸上做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使我觉得他要放声大哭了。然而他并没有哭，却把脸皱起来，使他那张起皱纹的脸上凭空添了无数的纹路。

我的心猛然战抖起来。我极力压住感情的爆发。他证实了我那晚上的话，然而我自己却被这个证据压倒了。我的脸上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至少有五分钟的光景，我是看不见一切，而且听不见一切的。

“那么华的母亲呢？”我忽然问道，这句话是随口说出来的。

“华的母亲要回家去了，”他苦恼地淡淡答一句。

“回家去？她不等她女儿？”我惊讶地问。

“我正要告诉你她的事情，”他忽然站起来，走到书桌前面坐下，把身子俯在桌上，偏了头看我，一面说。这时候我站在书桌的一端，把左膀压在那一堆书上面，听他说话。他的脸上还带着苦恼和悲痛的表情。

“我已经把华的事情告诉了她。我实在不能够支持下去了。昨晚上我回来得很晚，亭子间里没有亮，我以为她已经睡了。然而我刚走进屋坐下来，就听见她在唤我。她轻脚轻手地走进我的房间。头发蓬松，身子摇晃。那张憔悴的脸带着血红的眼睛逼近来，就像一个鬼魂。她站在我面前，唤我的名字。她说她这几晚上整夜都不曾闭眼睛，她说她知道她女儿一定出了什么事情。她哀求我把真相告诉她。她说她已经猜到大半了。我起初还哄骗她，但是后来她哭了。煌，你知道，她是看见我长大的，我做孩子的时候，她还抱过我。现在她哭着，哀求我说一句真话，我能够拒绝她吗？我记得从前华出来进学校的时候，她还嘱咐过我要我好好地替她照应华，免得华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每次回家去，看见她，她总要对我说许多感谢的话。现在……煌，你想我还能够平静地对她说那些假话吗？……我也不去想会有什么结果，我说了，我把真话全说了……”他的眼泪突然迸出来，声音也嘶哑了，他不能够接着说下去。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不是可怕，而是可怜。这表示出来一个失去决断力、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的人的痛苦。

我的心因了同情又一次颤动了。痛苦还压在我的心上，现在更不断地增加。我害怕我自己会燃烧起来。我睁着两只干燥的眼睛望他，好像逼着在问：“以后呢？”

“她并没有什么意外的举动，”宇停了一会儿继续说道，“她也不大声哭。只是她的身子抖得很厉害，几乎使人疑心她要倒下去。她那两只泪眼带了责备和悔恨望着我，声音清晰地接连说：‘我早就料到的，我早就料到的。我担心了二十多

年，我以为可以免掉这一着了。谁知道依旧落得这一个结局。’她走到屋角一把椅子前面坐下来。一个人在那里发出轻微的似哭似笑的呻吟。

“我以为这个打击使她发狂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走到她面前，她抬头看我。她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但是并没有一点疯狂的痕迹。两行眼泪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不等我开口就知道了我的意思。她痛苦地说：‘你不用劝我。我完全明白。我早就料到的。她的性情很像她父亲。我早就怕她会有这一着。所以我给她起了若华（花）这个名字，我不给她读书，我只想教她学做针线，将来嫁个如意丈夫，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也不枉我辛苦地养育她一场。可是我太爱她了。她又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三翻四覆地要我许她读书，我到底拗不过她。她要做什么事情，我都答应她。只怪我自己心肠太软。要是我不放她出来读书，也许没有今天的事情。……你姨父，她父亲……他的事情你不知道，我连若华也瞒着，不告诉她。他死在监牢里，他在那里面不到两个月，受不过拷打便死了。那是宣统末年的事情。那时我肚里怀了若华进牢去看他。他对我说他为什么要干那种事情。他自己并不害怕，只是不忍抛弃我和那个未来的孩子。他相信一定是个男孩，他要我好好地教养他，要他将来承继父亲的事业。我听了他的话，无意间问了一句：要是生下来是女的呢？他不高兴地答道：那么将来随便把她嫁个人就算了。他死了两个月，若华就出世了。我倒高兴，我以为既是女孩，我就可以把她保住了。……谁知道现在连女儿也走上了她父亲的路！’

“她闭上嘴，闭着眼睛，头靠在椅背上，微微地摆动。

“我望着她，我现在才完全明白了。她看事情比我更清楚。她的话使我十分感动，但同时把我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铲除了。我忽然觉得华的事情是无可挽救的了。这就跟我自己得到死刑判决差不多。

“她忽然站起来，带着温和的眼光看我，叹息道：‘我不怪你，我完全不怪你。我是早就料到了的。我现在去睡了。’她颤巍巍地走出了房门。

“她似乎整夜没有睡觉。我时时听见她的咳嗽声，声音里充满着绝望的痛苦和孤寂。这声音使我想起了她的悲惨的一生。在我的心里除了我自己的悲痛外，现在又加上了她的悲痛。我这晚上也没有能够好好地睡觉。

“今天早晨，亭子间里没有声音，我想她大概睡熟了。但是我走过亭子间门口，她忽然打开门唤我，我站住同她讲话。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她淡淡地对我说：‘我再等一天，明天下午就要回去了。’她不再说别的话，也不等我回答，就马上关了门。我站在楼梯上，迟疑着是不是还应该进去同她讲话，忽然我听见亭子间里起了轻微的哭声。原来她在里面哭。我心里非常难受，不敢再惊动她，就急急跑出来，到公司办了事情，又走了几个地方，才到了你这里。

“别人看见我都说我病了。这两天我怎么能够不病？这种生活我实在不能够支持下去了。”

宇站起来，走到床前，一下子就倒下去。这些时候我都没有看见他的脸色，他也不能够看见我的。房间早已落在黑暗

里了。我也不去扭燃电灯。

我在书桌前面坐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宇刚才坐的。现在他躺在床上不作声了。

我们两个就这样地在黑暗里过了许久。他沉重地呼吸着。我却渐渐地到了没有思想、没有感觉的地步。我的心里空无一物，好像我已经死了。

宇最后站起来扭燃了电灯，对我说："我走了。我得到消息再来看你。你自己要小心，你不要多出去。"

他悄然走了，撇下我一个人在房里。

我听清楚了他的话，我也打算依从他。但是他走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出去了。我的脚不许我安静地留在房间里。它们要把我带到我的心想忘记的地方去。

三

早晨我醒得很迟，太阳已经从窗户照进来了。我昨晚在街上跑了一夜，回到家里人还不很清醒。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什么时候才睡熟的。

我仿佛记得从那个弄堂出来走不到一条街，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她的背影就同华的一样。我跟在她后面跑了好几条街。我几次要叫出"华"这个名字，但是我的声音嘶哑了，我自己明明知道这不能够是华。同时我记起了宇告诉我的话：华也许已经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了。然而便是看见跟华的背影相似的女人也可以使我的心多少得点安慰。我的脚知道这

个，它们把我带着跑了几条街。于是在一个十字路口汽车拦住了我的路，我失掉了那个女人。她同华一样地在我的眼前消失了。我走了许多地方都找不到她的踪迹。

我打开窗户，让阳光抚着我的头，我重复地去经历昨夜的情景，我甚至把那个女人当作真正的华。

但是这个也不能够长久地安慰我的心，痛苦和愤怒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记起宇警告我的话，这更增加我的苦恼。我不能够过这种隐匿的生活。我不能够为了一点恐惧就躲藏起来，不做事情，让无益的苦恼来消耗我年轻的生命。

我拚命抽烟，这也没有用，这不能够使我忘掉什么。我让灰色的烟雾包围着我，但是那一对漆黑的大眼睛依旧透过烟雾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耳边时时响着那空虚的咳嗽声。这些使我明白，如果我不做一点事情，我自己就会被无益的苦恼折磨到死。这样的生活是零碎的自杀。

下午两点钟光景，宇来了。他的脸色阴沉，两只眼睛红肿，显然他不久以前才哭过一场。我看见他的面容并不惊讶，我好像早就料到他会带了这样的面容到我这里来，而且也有些明白他会对我说什么样的话。

我们交换了一瞥恐怖的眼光。他先开口了：

“我刚刚送了我姨母回去。开车的时候她没有哭，倒是我哭了。她好像抱了放弃她女儿的决心似的，她把她女儿的事情托付给我。她对我说，不管怎样大的打击，她都可以默默地忍受。但是我看得清楚，她来这里不过住了几天，就像在这里生了一场大病。她咳嗽很厉害，脸瘦得不像样。不知道为什

么我看见她这个样子，就觉得自己犯了大罪似的。所以我哭了……”他说到最后喉咙里响起来，他不能够说下去，他在我的面前哭了。

我的心痛着，在我所经历到的痛苦之上，他又给我添了更多的痛苦。世界是这样地广阔，他却尽量地把痛苦堆在这个房间里。我等待他来，我等了他许久，他却来对着我哭。他的抽泣声在我的绝望之上又添了绝望，使我感到更难熬的心的压迫。痛苦仿佛是没有终局的。墙壁似乎也要倒塌下来了。我挣扎，我忍不住愤怒地大声叫起来：

“为什么要哭？宇，你怎么也学会哭？连华的母亲也不哭！我问你从古时到现在有多少人哭过了？眼泪积起来已经成了大河，难道就缺少你一个人的眼泪？我问你眼泪有过什么用处？收拾起你的愚蠢的眼泪，我不要听你哭！”

我并不是在对他说话，我并不想责备他，我是在对包围着我的痛苦说话。我忍耐了好些日子，但是现在忍耐也到了终局了，我要昂然抬起头来把痛苦甩掉。

宇惊恐地望着我，他似乎不知道我的心情。但是他停止了抽泣。他揩了眼泪，过了半晌才苦涩地对我说：“我不哭……我不哭……不过华没有了。”他从怀里摸出一方破烂的纸条交给我。

我战抖地将纸条一把抢过来。我的眼睛冒出火射在这一方揉皱了的破纸上面。是铅笔写的字迹：

我没有希望了。这事情似乎来得太快，不过也不是奇

怪的；在这个年头并没有奇怪的事情。一切都是可能的。我心里充满着怀念。可是我并不后悔，而且我很快乐，我不会忘记你们。好好地看待我母亲罢！她太爱我了，她也许受不住这个打击。最好不要让她马上完全知道，慢慢地告诉她。你们不要忘记我，你们要小心。……华。

我反复地读着，直到每个字、每句话在我的心上回响起来。我的心很明彻，就仿佛她站在我面前对我说话一般。

"送这个信来的人告诉我，她已经没有了。"宇的声音像丧钟一样地在我的耳边响着。"这个消息我并没有告诉我姨母，这一次我瞒了她。我不能够违背华的意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泪水又从他的眼里迸出来，他的声音又变成了抽泣。

他继续抽泣，声音很低，它却响彻了这个房间，使得屋里的空气完全变成悲哀的了。我那刚才得到的明彻的心境也被扰乱了。我心里只响着一个声音："我心里充满着怀念！"这是她的最后的声音。但是我从什么地方能够找回她来，告诉她我也充满着怀念呢？现在已经迟了。我跟她中间已经隔着一个世界了。在痛苦之上增加了痛苦。在绝望之上增加了绝望。阳光也暗淡起来，天又现出要落雨的样子。一切都是阴郁的，苦恼的，沉闷的。不给我一点希望。宇的抽泣声不停地在我的心上敲打，使我烦躁到快要发狂了。

我不能够再忍耐下去。我的脚颤得厉害，它们第一个要反抗了。不管宇和别的朋友警告过我的话，不怕我也会得着华那样的命运，我不再躲在房间里过隐匿的生活了。我要出

去做一点事情，免得到了太迟的时候。

"宇，我们走罢，到成那里去！"我忽然下了决心地说。

"但是下雨了，"宇惊疑地望着我低声说，一面在揩眼睛。

我朝窗户那面看，一些雨点正向玻璃窗飘来，无力地贴在玻璃上面。没有声音。

我残酷地微笑了。我坚决地昂然答道："这样的雨算什么。我们走！"

1936年3月在上海。

窗　　下*

敏，我现在又唠唠叨叨地给你写信了。我到了这个城市已经有两个多月。这中间我给你写了五封信。可是并没有收到一个字的回音。难道你把我忘记了？还是你遇到了别的意外事情？你固然很忙，但是无论如何你得给我一封回信，哪怕是几个字也可以。再不然就托一个朋友传几句话。你不能就这样渺无音信地丢开了我，让我孤零零地住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你知道我有着怎样的性情，你知道这样一种生活在我的精神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你为什么默默地让我受这些折磨呢？

我还记得两个多月前我离开你的时候，月台上人声嘈杂，我们躲在车厢的一角，埋着头低声谈话，直到火车快开动了，你才匆匆地走下去。你在车窗下对我笑了笑，又一挥手，就被火车抛在后面了。你不曾追上来多看我几眼，我也没有把头伸出窗外。我只是埋着头默默地回想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到了那里，你也许会感到寂寞。你要好好地照应你自己。你也该学会忍耐。……我就怕你那个脾气，你激动的时候，连什么事情都不顾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作家》第二卷第一号。

你看，现在我也能够忍耐了。我居然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个寂寞的房间里住了两个多月，而且不知道以后还要住多久。这其间我也曾起过冲动，但是我始终依照你的劝告，把它们一一地压下去了。这些时候我很少到外面去。每天我就坐在一张破旧的写字台前，翻读我带在身边的几本旧书，和当天的报纸。等到我的腰有些酸痛了，我才站起来，在房里默默地踱一会儿。这样的生活有时连我自己也觉得单调可怕，我的心渐渐地像被火烤似地痛起来。我昂起头大大地吐了一口气。我跨着大步正要走出房门，但是你的话忽然又在我的耳边响了。我便屈服似地回到写字台前，默默地坐下，继续翻读书报。直到朋友家的娘姨给我送晚饭来，我才明白这一天又平淡地过去了。

我常常坐在窗前给你写信。我觉得最寂寞的时候或者火在我心里燃烧起来的时候，我就给你写信。我的写字台放在窗前，窗台很低，我一侧头便可以看见窗外的景物。上面是一段天空，蓝天下是土红色的屋顶，淡黄色的墙壁，红色的门，墙壁上一株牵牛藤沿着玻璃窗直爬到露台上面。门前有一条清洁幽静的巷子。其实这对面的房屋跟我住的弄堂中间还隔了一堵矮墙。越过这堵矮墙才是我的窗下。从我住处的后门出去，也有一条巷子，但是它比矮墙那面的巷子窄狭而污秽。墙边有时还积着污水和腐烂的果皮、蔬菜。

这一带的街道本来就不热闹，近几天来，经过一次集团搬家① 以后更清静了。白天还有远处的市声送来，街中也有车

① 指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从虹口地区搬进“租界”里的事情。

辆驶过，但是声音都不十分响亮。一入了夜，一切都似乎进了睡乡。只偶尔有一辆载重的兵车①隆隆地驶过，或者一个小孩的哭声打破了夜的沉寂。平常傍晚时分总有几个邻家的小孩带着笑声在我的窗下跑过，或者就在前面弄堂里游戏，他们的清脆的、柔和的笑声不时飞进我的房里。那时我就会凝神地倾听他们的声音。我想从那些声音里分辨出每个小孩的面貌，要在我的脑子里绘出一幅一幅的图画，仿佛我自己就置身在这些画图中而忘了我这个寂寞冷静的房间。

如今连这些笑声也没有了。这几天里面我的周围似乎骤然少去了许多人。这周围的生活也起了改变。甚至那个说着古怪的方言的娘姨送饭来时也带着严肃而紧张的面容，吃力地向我报告一些消息。我似懂非懂地把她的话全吞下了。其实报纸上载的比她说的更清楚。

这里一个多月没有下雨，一连几个晚上月色都很好。敏，你知道我是喜欢月夜的。倘使在前几个月，我一定会跑到外面去，在街上走走，或者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坐坐。但是现在我却没有这种心思。而且外面全是些陌生的街道，我又没有一个可以和我同去散步的朋友。所以我依旧默默地坐在写字台前面，望着摊开的书本。时间偷偷地从开着的窗户飞出去，我一点儿也不曾觉得。只有空气是愈来愈静，愈凉了。

“玲子，玲子，”下面忽然起了一个男人的轻微的唤声。

我惊讶地掉头往窗外看去。我的眼前一阵清亮。越过矮

① 指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铁甲车。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兵营就在这附近。

墙，那条水门汀的巷子静静地躺在月光下面。一个黑影扑在门上。

声音是我熟悉的，影子也是我熟悉的。穿着灰布长衫的青年男子到这个地方来，并不是第一次。

“玲子，玲子，”那个年轻人用了战抖而急促的声音继续唤着。他走下石阶到墙边踮起脚轻轻地叩玻璃窗。

房里有了声音，窗户呀的一声开了半扇，一个黑发蓬松的头探出来，接着是女人的声音着急地说：

“你——你，我叫你晚上不要来。外面情形不好，你怎么又跑来了？”

“你开开门，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男人催促道，他的声音里含了一点喜悦，好像他看见少女的面貌，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似的。

“你快说，快说！你快点走，会给我爹碰见的！”女的不去开门，却把头往外面伸出来些，仍然带着畏怯的声音说话。一阵微风吹过，牵牛藤跟着风飘舞。几片绿叶拂到她的浓发上。

“你快点出来说。我说完就走，不会给你爹看见的，”男人固执地央求道。

少女把头缩回去关上了窗户，很快地就开了门出来，站在门槛上。男人看见她，马上扑过去抓起她的一只膀子。

她把身子一扭挣开了，也不说什么抱怨的话，却只顾催促道：“你快说！快说！我爹跟东家①就要回来了。”

---

① 她的东家是日本人。

"你为什么怕见我？难道你真的相信你爹的话？"男人惊疑地说，他轻轻地干咳了两声。

"你不要故意说话来气我。我怕我爹会碰见你。我爹要晓得你还常常来，他定规要想方法对付你，"少女胆怯地答道。男人还没有答话，她又关心地接着说："这样晚你还跑来做什么？你的身体不好，你又在咳嗽。"

少女依旧站在门槛上，男人背靠在门前墙边。等她闭了口他便气愤地说："这个我倒不怕。你爹太岂有此理。从前我们在乡下的时候，他待我很好。那时我们在一起，他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他在你东家这里很得意，就连我的面也不要见了。其实我在小学堂里教书，挣来的钱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跟他女儿来往，也不算坍他的台。况且他的行为就不是什么高尚的。"

少女伸过手去把他的一只手捏住，温和地说："我爹是个糊涂人。他只听东家的话，东家说什么好，就是什么好。我爹说你们是坏人，说你们专教小孩子反对'友邦'①，又说你们鼓励小学生抗这抗那的。"

"这一定是你东家的意思。你爹真是个汉奸！"男人摆脱了少女的手气冲冲地插嘴说。"你难道也相信我是个坏人？"

少女望着男人忧戚地微笑了，她温柔地答道："我当然不跟他一般见识。我相信你是好人。不过我爹完全跟着东家一鼻孔出气。他说过他看见你领着小学生游行，喊口号。他恨

---

① 反对"友邦"：指抗日。

你，他说你是个乱党。你跑到此地来看我，很危险。我很不放心。”

“我不怕。我不相信他敢害我！”男人依旧气恼地说，他接连干咳了几声。他把一只手按住胸膛，喘了两口气。

“你看，你的病还没有好，你又要生气！你也要好好地养息养息。你还在吃药吗？”少女怜惜地说。

“近来倒好一点。好些时候不吐血了。咳嗽也不多。我想大概不要紧，”男人温和地答道。

“我看你千万不可大意。你也应该当心。现在不早了，你还是回去罢，”少女关心地劝道。

这时候，从巷子的另一头送过来皮鞋的声音，在静夜里听起来非常响亮。

“好，玲子，我走了，”男人慌张地说，就伸手去握住少女的一只手，不立刻放开，一面还继续说：“我也就因为这两天外面谣言很多，我很担心你，才特地跑来看看。你要早早打定主意。你从你爹那里听到什么消息吗？”

少女微微地摇头，回答道：“我爹什么话也没对我说。他整天跟东家在外面跑。他从来不给我讲那些话。你不要担心我。这两天情形不好，你自己跑到此地来，倒要当心在半路上出毛病，冤枉吃官司……”她没有把话说完，远远地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她连忙挣脱手，急急说：“你快走，东家回来了。”

“玲子，我走了，明天晚上再来看你，”男人下了決心似地说，就转过身朝外面大步走去。

“明天晚上你不要来，”玲子还跑下石阶挥手嘱咐道。但

是他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连头也不回就走出去了。

少女还在门前墙边站了一会儿。她倚着墙仰起头看天空。清冷的月光没遮拦地照在她的脸上，风把她的飘蓬的浓发吹得微微飘舞。她的并不美丽的圆脸这时突然显得十分明亮了。那一对不大不小的眼睛里充满着月光。我静静地注目看，我不能够看见她的黑眼珠。原来眼眶里包了汪汪的泪水。

并没有汽车开进巷子里来，喇叭声早消失在远方了。少女方才的推测显然是错误的。这个清静的巷子比在任何时候都更静。地上是银白色的。红色的门，浅黄色的墙，配上她那身白底蓝条子布的衫裤。在玻璃窗旁边还有一株牵牛藤在晚风里微微舞动它的柔软的腰肢。这是一幅静的、美丽的、幻想的图画。我不觉痴痴地望着它。我忘了我的房间。我觉得我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了。

少女忽然猛省似地叹了一口气，便走上石阶，推开门进去了。深红色的木门关住了里面的一切。墙壁上的牵牛藤依旧临风舞动，而且时时发出轻微的叹息。

空气愈来愈静，而且愈凉了。房间里渐渐地生了寒气，我的背上忽然冷起来。远远地响起了火车头的叫声。接着就是那喘气似的车轮的响动。我知道我这一天坐了够多的时候了，便站起来阖上书，伸了一个懒腰。就在这个时候一辆汽车驶进水门汀的巷子里来。车子在牵牛藤旁边停住。汽车夫下来打开车门，一个艳装的中年妇人，和两个中年男人从车上出来。三个人都穿西装，我认得他们的面貌。汽车往外面开

走了。

“玲子！玲子！”那个圆脸无须的胖子大声叫道。他伸出手在门上捶了几下。这个人就是玲子的父亲。玲子在房里答应着，开了门。她的父亲恭敬地弯着腰让东家夫妇走进里面，然后跟着进去。门又紧紧地关上了。他们在房里大声谈话，说的全是异邦的语言①。我不明白他们在讲些什么。

敏，我告诉你，玲子和她的父亲，还有小学教员，还有东家夫妇，这些人我都熟悉。我并不曾跟他们谈过一句话。但是我这两扇窗户告诉了我种种的事情。倘使我的小小的房间就是我的世界，那么除了我的两三个朋友外，他们便是我的世界中的主要人物了。他们每天在我的眼前经过，给我的静静的世界添了一些点缀。所以他们的言语和行动会深深地印在我这个渐渐变迟钝了的脑子里。

小学教员第一次到这里来是在一个黄昏。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职业。玲子的父亲一早就出去了。东家是下午回家以后又带着太太一道坐汽车出去的。玲子站在门前。这一家就只有她一个人。东家夫妇似乎没有小孩，也没有别的亲人。他们去了不多久，玲子正在窗下伸手到牵牛藤上去摘那刚刚开放的紫色花朵。一个人影轻轻地飘到她的身边。接着是一个欣喜的唤声：“玲子！”

我看见那个天真的少女掉过头，满脸喜色地接连说：“你——你！”

---

① 异邦的语言：指日本话。

“你看，我果然来了。我答应你，我决不失信，”男人得意地说。

玲子不说什么话。她把身子倚在牵牛藤上，梦幻似地打量他。

“玲子，你老看我做什么？你难道还认不得我？”男人微笑地说。

玲子的圆圆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她说：“我看你气色好多了。”

“近来我自己也觉得好多了，”男子笑答道。他把声音压低了问：“你爹跟你东家一道出去的吗？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爹先出去。他们今天最早也要十一二点钟才回来。你多坐坐，不会碰见他们，”玲子低声回答。

“玲子，我说，我——我看你还是早点打定主意，在此地做事情终归不是好事，”男人说话的声音更低了些。但是我那注意倾听的耳朵还能够抓住话的大意。“你那个东家不是正当的商人。你爹简直是个……”我想他接着一定会说出“汉奸”一类的字眼，但是他突然换了另外的几个字：“他简直忘了本了。”

“你当心点，不要瞎说，会给人听见的，”玲子变了脸色惊惧地阻止道。她又皱起眉头忧郁地说：“我爹决不肯放我走的，我有什么办法？我也明白在此地做事情不好。东家不是个好东家。他们那种古怪脾气也叫人够受。可是我爹说过他将来还要带我到东家那边去。我真有点害怕……”

男人着急起来，他忽然扬起声音说：“那么你还痴心跟着

你爹做什么？我害怕他将来真会带你到那边去，他会入那边的籍做那边的人。难道你肯跟着他去当——？”他似乎要说出先前突然咽住了的那两个字，可是一阵皮鞋的声音打岔了他。三个混血种的青年男女带笑地说着英国话走过来。

“我们进去坐坐，”少女看见人来，吃了一惊，就轻轻地拉了一下男人的衣袖，两人走上石阶推开门进去了。深红色的木门关住了他们的影子。

我依旧坐在窗前。写字台上的书和别的东西渐渐地隐入阴暗里去了。我并不想看见灯光。我让电灯泡板着它的冷面孔。我把身子俯在窗台上，静静地望着下面清静的巷子。空气似乎凝固不动，让黄昏慢慢地化入了夜。灯光从那个房间的玻璃窗里射出来。我听不见讲话声。但是突然从邻近的房间里响起了西方女性的歌声，有人在开无线电收音机了。

过了好些时候，红色的木门开了，一个影子闪出来，就是那个男人。被称为“玲子”的少女也在门槛上出现了。男人急急地往外面走去。玲子却倚着门框默默地望着他的背影。

那个男人以后还来过两次。有一次是在早晨。玲子的父亲和男东家刚出门不久，女东家似乎还在睡觉。男人匆忙地在隔壁门前跟玲子耳语片刻，便走了。

另一次还是在傍晚，那个男人来了以后，他们两个在门前谈了半个多钟头。从这次的谈话我才知道男人在小学校里教书，他患着肺病，而且在这个都市里没有一个亲人；我也知道一点玲子的父亲和东家的关系。

以后许多天都没有看见那个男人的影子。玲子有时候也出去。我见过两次她急急地从外面走回来，都是在傍晚。其实也许不止这两次。我的眼睛有时候也会看漏的。

这个人家还有一个娘姨。不过每天晚饭后我就看见她回家去。有时她白天也似乎不在这里。究竟她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被雇用的，我的眼睛和耳朵却不能够帮忙我探听了。

男东家永远板着面孔，在鼻子下面留着一撮黑胡子，短胖的身子上穿着整齐的西装。女东家永远是浓装艳服，连颈项上也抹了那么厚的白粉。那个圆脸无须的玲子的父亲永远带着谄谀的微笑。

有一次在晚上玲子的父亲一个人先回来了。这一对父女起初平静地在楼上房间里谈话。后来我就听见了玲子的哭声和她父亲的骂声。我听不出来他们为了什么事情在争吵。他们好像在讲那个小学教员的事，又似乎在讲别的事。我仿佛听见他厉声说，不许她再到什么地方去。

这哭声和骂声并没有继续多久，后来父亲和女儿似乎又和解了。楼上露台前两扇玻璃门紧紧闭着。玻璃上盖着花布窗帷。此外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什么了。

但是第二天夜里八点钟光景，玲子一个人悄悄地跑出去了。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才看见她站在石阶上摸出钥匙开门。水似的月光软软地冲洗着她那苗条的身子。

再过一天那个小学教员来了，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他敲着玻璃窗低声唤“玲子”的那一次。

敏，你看，我现在变得多了。这些事情在从前我决不会注意。但是现在我却这么贪婪地想知道它们。而且我可以静静地在窗前站或者坐几个钟头，忘掉了自己，而活在别人的琐碎的悲欢里面。你看，我真的学会忍耐了。我居然冷静地伏在案头写了这么长的信，告诉你这些琐碎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拿这些来耽误你的繁忙的工作呢？

敏，我是告诉你：我已经学会忍耐了，我已经学会忍耐了！忍耐了！忍耐了！

“今天听说外面情形很不好，住在这一带的人都往别处搬，你还跑到此地来？你胆子真大！”又是玲子的声音。

“有你在此地，我怎么放得下心！外面情形真的不好，不一定全是谣言。你应该早早打定主意，”小学教员焦虑地说。

这是在傍晚，两个东家都出去了。玲子一个人在家里。这天从早晨起就看不见太阳。天空带着愁眉苦脸的样子。忧郁的、暗灰色的云愈积愈多，像要落雨，但始终不见落下一滴泪水。空气沉重，也没有一点风。在我这边隔壁人家连床也搬走了。娘姨送晚饭时来告诉我，邻近几家的主人昨晚都在旅馆里睡觉。我还不大了解她的方言，但是我懂得大意。

“女东家要回那边去了。爹一定要我跟她去。你说我还打什么主意？”玲子的苦恼的声音不高，但是我已经听清楚了。我掉头去看下面的巷子。玲子站在牵牛藤旁边。男人挨着窗台。

“你跟她去？你为什么要跟她去？你又不是把身子卖给

他们的！"男人气愤地说，但是声音也不高。话刚完，他咳了两声嗽。

玲子关心地望了他半晌，才胆怯地说："我爹跟他们商量好的。东家说此地不能住下去了，中国人坏得很，万一打起仗来会乱杀人。女东家怕得很，她不肯在此地住下去。她就要回到他们那边去。我爹也说一定要打仗。中国人打不赢，自然就会乱来。……"

"难道你爹就不是中国人？玲子，你是明白的，你一定不会相信他这种话，……"男人似乎咬牙切齿地说。这时候一种火似的情感猛然从我的心底冒上来。我的注意滑开了。我听漏了几个重要的字，我只得用黑点代替他们。等到我再用心去听他们谈话时，送进我耳里来的就只是一阵被压抑住的干咳。

"你刚刚好一点，又生气了，咳起来也怪难受的，"她的声音里交织着好几种情感，连我的心也被打动了。

"玲子，你得马上打定主意跟我走。你跟你女东家到那边去，不会有好处，你跟着你爹那种人过日子，不会有好处，不过白白害了你自己，"男人半劝告半央求地说。他把身子从窗台移开，挨近她，差不多就在她的耳边说话。

"你——你怎么办？"玲子埋着头不回答，却关切地问。

"我？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怎么办？你问你东家，你问你爹，他们知道的！"男人忽然提高声音答道。

"你小声点；会给人听见的。我怕，我怕得很。你说真的会打仗吗？"玲子略略抓住男人的膀子，惊惶地低声问。

“你还是问你爹，问你东家罢。他们比我更知道，”男人生气似地答道，然后又换了语调问：“你女东家几时动身？”

“我不晓得。多半还要等几天。他们做事总是鬼鬼祟祟的。我真不要到那边去！可是我又怕我爹。”

“你怕他做什么？有我在。你打定主意明天就逃到我那里去，你跟我走！”男人的后面两句话是用很轻的声音说出来的。我没有把字眼听准。但是我猜到了那个意思。

“我怕我爹他会害……”玲子迟疑了一下，就用了同呜咽相似的声音说。但是刚说到“害”字，她忽然变了脸色，好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一把推开男人，慌张地急急说：“东家回来了，你快走。下回来罢。”

男人吃惊地回头一看，连忙说了一句：“我明晚再来，”就转身往外面走去，这时玲子已经跑上了石阶。

女东家捧了许多纸包坐着人力车回来了。玲子推开门，又把纸包接过来，等着主人下车，然后跟着往房里去了。

楼下房里有了灯光。然后楼上房里也有了灯光。露台前的玻璃门依旧紧紧闭着。没有人来拉起花布窗帷。

风在我的窗前吹过了。一些细小的声音开始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声音渐渐地大起来。雨毕竟落下来了。

我关了窗户。我不去听外面的声音，也不看花布窗帷。我看书，我写信，我把我的心从窗下那条巷子里收回来。我做我自己的事情。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对面房间里似乎整夜都有灯光。半夜我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听见搬东西声，说话

声，女人的低声哭泣，和男人的责骂。但是我太瞌睡了。

早晨，我醒得很迟。阳光灿烂地照在露台上。牵牛藤的绿叶在微风里颤动。我在床上听见墙外巷子里汽车的声音。等我走到窗前去看时，玲子刚刚俯下头进汽车去。她的脸在我的眼前一晃。这匆匆的一瞥使我看清楚了少女脸上的表情。天真的微笑失去了。除了一对红肿的眼睛外，就只有憔悴的暗黄色。

汽车很快地开走了。留下来的是孤寂的巷子。我把两只膀子压在窗台上，痴痴地望着下面。那里并没有什么可看的景象。但是三个混血种的男女哼着流行的英文歌曲走过了。

蓝的天空，土红色的屋顶，浅黄色的墙壁，围着铁栏杆的露台，红色的门，这些跟平时并没有两样，而且朝阳还给它们添了些光彩。一张面孔在阳光里现出来，又一张面孔在阳光里现出来。仿佛有两个人站在窗前牵牛藤旁边低声讲话。……我的眼睛花了。

“我明晚再来。”

这句话并不是对我说的，但是它却清清楚楚地在我的耳边响来响去。

火一般的情感忽然在我的心上升起来，好像是阳光在我的心上点了一把火似的。

敏，我又来跟你谈话了。我又告诉了你许多事情。现在我似乎应该搁笔了。我为什么拿这些事情来打扰你呢？而且

我翻看我写好的二十张信笺，连我自己的心也被那些话搅乱了。我读到“忍耐”，“忍耐”，“忍耐”这些重复的字，我看到那几个惊叹符号，我对我自己也——

嘘，一个影子在我的眼前掠过。这两个多月来的孤寂的生活倒把我的眼睛和耳朵训练得很锐敏了。我不用掉头就知道那个小学教员来了。

敏，这一次你猜我怎么办？我还是像平日那样连忙把头掉过去看红色的门和牵牛藤么？我在前面不是明白地说过我能够忍耐，而且我能够冷静地旁观着别人的悲欢么？

但是这一次我却不能够忍耐了。我听见唤“玲子”的声音，我突然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把头俯在写字台上，我不愿意再看见什么。

然而我的耳朵是能够听见的。他唤了几声“玲子”，敲了几次玻璃窗，接着就在水门汀地上走来走去。他干咳了几声，后来又去敲门。

一个人的皮鞋声自远而近。于是一个男人不客气地大声说：

“没人。通统走了。”

“我找玲子，”小学教员讷讷地说。

“给你说通统走了！今朝弗会回来！”看弄堂的巡捕粗暴地嚷起来。接着我又听见皮鞋声由近而远。

“玲子，”小学教员忽然轻轻地唤了这一声，过了半晌，他还在那里低声自言自语：

“我知道你会跟他们走的。你太——”

我等着听这下面的话。但是他猝然闭上嘴走了，我听见他的急促的脚步声。

这些又是我所料不到的。

敏，我不再写下去了。我最后还是告诉你：我不能忍耐了，我不能忍耐了！

我后悔昨天晚上为什么不跟着出去追他。但是现在还来得及。我要出去找他。我相信在那个小学里一定可以把他找到。我有许多话要问他。……

1936年9月在上海。

星*

一

海风微微地吹过岛上，把日里剩下的热气全吹走了。整个岛落在一层柔软的黑暗的网里。只有深蓝色的天空中闪耀着无数的明星，这里的星似乎比在别地方都明亮。人们常常这样说：白天是太阳使这个岛特别亮，夜里是星星使这个岛特别灿烂。

灯光渐渐地灭了。一些建筑物稀落地耸立在黑暗里，被茂盛的树木掩护着。几条螺旋形的山路从岩石一般的山顶上蜿蜒地伸下来，一直到下面那些并不怎么热闹的街市。沿街的商店已经大半关了门。路再向海边伸出去。靠码头一带，有几家旅馆，都是些三层的楼房，从那些新式窗户里射出一些灯光到海面上。

海上是一片黑暗，海水似乎静静地睡了。一二十只空的小船连接地泊在这些建筑物的下面。码头上只有几盏冷清清的电灯照着空阔的石板路。几个舟子把船靠在岸边，自己坐

---

* 本篇最初刊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开明书店版《十年》（纪念开明书店创立十周年小说集刊）。

在船头打盹，等候着深夜过海的客人。

平静的海面忽然微微地动起来，溅水声和摇橹声从远处逼近了。一只小船一摇一摆地朝码头驶近。先前寂寞地打盹的舟子都带着兴趣地向那边望。他们的船也跟着海水一偏一斜地在动，直到来船逼近，船上人打起了招呼，他们便起来，把船拨开一点。给来船让了一条路，使它在石板路旁边停住。一个戴白通帽的长身材的青年客人从船上大步走上岸。他把敞开的学生服的钮子扣上，默默地弯进里面的街道去。

码头旁边那家较大的旅馆的二楼上，两扇靠左的通洋台的玻璃门突然打开了。洋台上现出了一个年轻人，他穿了一件翻领衬衫，披着一头乱发，有一张略带苍白色的长脸。

年轻人把身子倚着洋台的栏杆，抬起眼睛望望天空，又埋下头看看海，然后再仰起头去看天。他望着天上那许多星星，亲切地自语道："这些星星全没有改变，只是更亮一点。"他刚说完这句话，就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感情在他的心里往上升。他望着星星，低声唤出了一个人的名字。他用力压住栏杆的冷酷的水门汀扶手，他的眼睛润湿了。他想忍住眼泪。他没有听见外面的叩门声。直到房门开了，一个人的脚步声在房里响起来，他才略带点惊讶地掉转了身子。

进来的就是刚才过海来的那个青年，白通帽还拿在手里，三角形的脸上带着快乐的微笑。两个人对望了片刻，最后还是主人跑过去一把握住客人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会儿，才断续地说：

"家桢！……你居然……来了！我等了你……这几年……

我到处找你……打听你的消息……”

他高兴得又快要流泪了。他慢慢地松开了手。

叫做家桢的客人虽然也很高兴，却不十分激动，这时便平静地答道：

“我早就想来看你。你的信是接到了的。而且你到这里来，报上也登载过消息。……志良，你现在是文学家了。”

家桢的最后一句话像针似地在志良的脑子上刺了一下，他把眉头微微一皱。但是他看见家桢的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不像有恶意，他便静下来，笑着说：

“你真正岂有此理！一见面就挖苦我。我想，过了这几年你也应该宽恕我了。”

“我挖苦你？你不是一个文学家吗？”家桢好意地哂笑起来。他注意地望着志良，用一种上了年纪的人对年轻朋友说话的神气继续说：“你并没有大改变。人稍微瘦了一点，额上多了两条皱纹。我常常听见人说起你，我也读过你写的东西。……我很奇怪你会写出那样的东西！……”

志良听见家桢提起他的作品，马上红了脸，连忙打断家桢的话头说：“不要只顾说话。我们先坐下再说。在洋台上坐，好不好？”他不等家桢回答就端了一把椅子到外面去。家桢便放下帽子，也端了一把椅子放在洋台上。

他们在洋台上坐了。两个人都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却不知道从何处说起，就把眼睛抬起去看对面。对面只是黑黝黝的几个荒岛的影子，那个热闹的都市在这里是看不见的。他们又抬起眼睛去看天，天空却不曾休息，每个星都在飞动。

那一天的繁星系住了他们的眼光。

家桢埋下眼光来看他的朋友，然后亲切地唤了一声："志良。"

志良略略现出惊讶的表情，埋下头看了家桢一眼，马上接下去说："家桢，你们都好罢。"他笑了笑。"不过你们也太狠心了。这几年为什么连信也不给我一封？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是写几个字也花不了多少功夫！"

家桢诚恳地微微笑答道："你固然说得不错。不过我们通一两封信，又有什么好处？我们的环境不同了。这几年来你一天一天地往上面爬。我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家桢的话是无心地说出来的，志良却觉得每一句话都是在刺他。他听不下去。他想起从前的事情心里还有些难过，就打岔道：

"家桢，你不应该说这样的话。这几年我就没有忘记过你们，只是你们把我忘在脑后了。我写过好几封信，你们都不理我。"

家桢似乎知道了志良的心理，便带笑地分辩道："说老实话，我们常常记起你。而且你也不容易让人忘记。刊物上常常有你的文章。我们也常常听见人谈起你的名字。……"他接着说一句解释的话："你不要误会我又在挖苦你，我说的是真话。"

"名字……文章，这些有什么用处！"志良接口叹息地说，他的脸色马上改变了。他又抬头去看天空的星星。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忍不住问了一句："秋星现在好吗？"

家桢听见志良的颤抖的声音，知道秋星的影像还在搅动

志良的心，他有点窘，想告诉志良一件事情，但是又忍住了，只淡淡地答了一句："她很好，我们常常在一起。"

志良不作声了。他默默地望着天空，过了一会儿，又半吞半吐地说："家桢，你可以带我去看她吗？"

"有什么不可以！"家桢勉强笑了一下，又问一句："你真的想看见她吗？"

志良掉过脸用祈求的眼光看家桢，兴奋地说："你一定要带我去看她。我一定要看她。我到这里来就是为着找寻她。"他急切地等着家桢的回答。

家桢略一迟疑，便含笑地安慰道："你不要着急，她会来看你。"他站起来带着沉思的样子走了两步，掉转身子，背向着海和天，身子靠在栏杆上面。

"她会来看我？"志良惊喜地问道。他激动地望着家桢，接连地问："她在什么地方？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家桢把脸掉向外面看了看，立刻掉回来，温和地说："她就在对岸，昨天我同她一起来的。"

"那么她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志良觉得心里一阵暖热，仿佛那颗心就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似的；"她读到我那些信吗？"

"她全读过了，"家桢平静地点点头，解释道，"她在那边有事情。所以让我一个人来看你。她也许明天来看你，她一定会来的。"

志良满意地靠在椅子上，微微地笑了。他的眼睛梦幻地望着海和天，其实都不是，他所看见的只是他的过去和她的过去。忽然他醒过来了，他带笑地絮絮询问家桢："她没有改变

罢？我还记得她那个样子：那张孩子般新鲜的椭圆脸，那一双凤眼，那两道细眉，那一个玉石凿成的鼻子，那一张小嘴，说起话来，是那么清脆。"他极力在回忆中描绘秋星的面貌。"你还记得罢，因为她身材苗条，腰身很细，我们常常跟她开玩笑，叫她做'马蜂'。……"

家桢静静地听着志良的话。他听到"马蜂"两个字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用笑来掩饰他的复杂的感情，一面还说："这叫做三句话不离本行。你又在写小说了，你应该把这些话留给你的读者听。"他掉转身子去看海，海平静地躺在窗下。码头上起了一阵少女的笑声，三个像是卖艺的女郎穿着三种颜色的短衫长裤，从划子里走上岸来，三个人挥舞着绸伞，有说有笑地顺着石板路往里走去了。

家桢的话并不曾使志良扫兴，他还在脑里描绘未来的景象。他是一个小说家，他知道怎么创造背景和创造故事，他这时候甚至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未来的生活，并不去管这是否有实现的可能。他满意地说："我知道她会来的。"

家桢回过头来看志良，他了解志良的心情。他不愿意在志良的兴头上浇冷水。然而他又记起了他的来意，他觉得他应该说出他准备好的那番话。他思索了片刻，便走到椅子前，坐下去，换上了严肃的表情，但依旧用温和的声音对志良说："志良，我们谈句正经话。我问你，你这几年究竟过得快活不快活？"

"你为什么问这样的话？"志良诧异地望着家桢，看见家桢的严肃的表情，更有些莫名其妙了。

"你回答我：你是不是真正快活，像你在文章里所表现的那样？"

志良点了点头，低声答道："我想是真的。"

"我总觉得有些勉强，"家桢说了这一句，看见志良要插嘴，便做手势阻止他，一面接着说下去："你不要打岔，且等我说。我们这几年并不是不关心你。你的文章我们差不多全读过。我们有时也打听过你的消息。我们觉得你跟我们是一天一天地离远了。"

"这是免不掉的事情，"志良终于打岔说。"不过我也并非有意的。我得说句实话：我不能够再相信你们那种办法。我只得走我自己的路。"志良的态度很诚恳。

家桢默默地站起来，把身子靠在栏杆上，依旧是背向着海和天。他恳切地说："你不觉得你的文章里缺少什么东西吗？你自己的路，那是什么路？在你的文章里只有哲学，只有漂亮的警句。你的文章使你显得比你本来更聪明。一般的读者会相信你成功了。但是，志良，只有我们，你的老朋友，我们知道你是无路可走了。……我就是为了这个来看你的。"

这些都是志良没有想到的话，然而正是他害怕听的，现在清朗地在他的耳边响了，不仅在他的耳边而且还在他的心上响了。他苦恼地望着家桢，辩解地回答道："你还是不了解我，你还是像从前那样地不了解我。……你不觉得你们那些牺牲都是徒然无益的吗？我既然可以做一点点比较有益的事情，为什么不做？所以我……"一阵感情的波动使他讲不下去了。

家桢带着自信地望着志良，马上接下去说："你以为你那

些读者会比我们更了解你吗？……你的思想我知道。你会说，要让一切慢慢地自然发展，不必用人力去推动；知识是最要紧的东西，所以应当唤醒愚昧。你这样开始了你的文学生活。你到处发表你的教训，阐明你的哲学。然而结果呢？现在连你自己也不相信你的教训、你的哲学了，你只是在美丽的文字上打转。你那内心的空虚我是看得出来的。你极力在你的文章里面表示你很快乐。然而你的文章里面隐藏着的忧郁、绝望的调子，只有我和秋星两个人知道。……你不要强辩，你说句真话，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缺少什么东西？”

志良起初还觉得家桢故意在挖苦他。后来他的脸色渐渐地变成了青白，好像他心上的秘密被人揭发出来了。他终于爆发似地责备说：“家桢，我们分别了几年，一见面你就拿那些话来逼我？你以为我就会跟着你们去吗？你不要做梦！”他也站起来，走进房间里，在那里烦躁地踱了几步，又走出来把身子靠在栏杆上，俯下头默默地望着海。

家桢依旧站在原处。志良的话并没有伤害到他，但是他为志良感到痛苦了。他默默地注视着志良的举动，等着志良又站到他的身边来，他才侧过身子同情地叫了一声：“志良。”

志良掉过头来，两个人的眼睛对望着，志良觉得受不住家桢的注视，便又把脸掉开去望天。家桢把一只手压在志良的膀子上，用弟兄一般的口吻说：“志良，你知道我不是来吵架的。我依旧像从前那样地关心你。我读你的文章，我比你的一切的读者更明白你，所以我替你担心。倘使你不相信我，我以后也不会再来麻烦你。”

这几句话一直打进了志良的心的深处。他想起了从前的事情，那些时候他同家桢和别的朋友在一起生活。他们两个人感情特别好，还有另一个女朋友秋星，她和他们两个都很好，他们过得像兄弟姊妹一样。然而后来他们思想的差别渐渐地显著了。家桢和别的朋友先后离开了上海。他一个人却留着，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活。于是他成了一个小说家。新的朋友和新的环境阻止了他同家桢他们接触。他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他们。然而秋星的影像却渐渐地在他的脑子里浮现出来。他没法消除这个影像，就让它占据了他的心，使他甚至于跑到这个地方来找寻她。现在家桢来了，而且告诉了她的消息。家桢的面貌和谈话使他回忆起从前的生活和友情。他们的会面在他是很可宝贵的。家桢说以后也许不会再来。他还能够拿这些争辩来破坏他们的友情吗？他抓住家桢的一只膀子，恳切地说："家桢，你不要介意我那些话。我们坐下来，慢慢地细谈。我这里也有地方给你睡。你告诉我你这几年是怎样生活的。还有关于秋星的事情，你也得详细地告诉我。你知道我很关心她，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关心她。"他的声音抖得很厉害，还拖了长的余音在后面，好像这几年来的寂寞，跟着他的话在房间里呻吟。

家桢默默地看了志良两眼，勉强用一种淡漠的声音说：

"志良，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我和秋星已经同居了。"

志良呆呆地望着家桢，好像没有听懂他的话。过了半晌，他才红着脸挣出一句："真的？我倒没有想到！"他走到椅子前，坐下去。他不敢看家桢的脸，却自语似地小声说："你为什

么不早说?”

家桢同情地望着志良，低声回答了一句:“我想你并不关心。”

志良并不分辩。他默默地抬头望着天空。天幕上依旧闪耀着那么多的明星。可是他觉得它们现在完全是陌生的，而且渐渐地黯淡了。他好像在做梦一样。然而家桢的咳嗽声唤醒了他。他埋下头，刚巧遇见家桢的同情的眼光。他不能自主地问道:“我还可以跟她见面吗?”

“为什么不可以?志良，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家桢说，他充满友情地拍一下志良的肩膀。“我不是告诉过你，她会来看你吗?我们还希望你能够同我们在一起住些时候。”他迟疑一下，看见志良不答话，便接着说:“我看你样子很疲倦，应该休息了。我现在走了。我明天和秋星来看你。”

他说完话，马上走进屋子，取了帽子戴在头上，跨着大步出了房间。

志良惶惑地望着家桢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并没有想到说一句挽留的话。

夜渐渐地凉起来，房间突然显得空阔而冷静了。

二

志良一夜尽做奇怪的梦。第二天他还没有起床，旅馆的侍役就送了一封信来，他拆开看，是家桢写的信:

秋星一早来了电话，她回去了，不能来看你。我打算

搭今天十二点钟的汽车回去。倘使你要去看她，可以和我同车去。我在车站等你。

后面还画上到汽车站去的路线。

他连忙跳下床，看表，知道已经过了十点钟，匆匆地穿好衣服，把东西略略收拾一下交代给侍役，就挟着一个皮包出去，走到码头，跳上了一只过海的划子。

到了对岸，他并不停留，马上雇人力车到汽车站去。他到了车站，汽车里已经挤满人，没有座位了。

车站很小。这一条街正在修路，到处是尘土和碎石。好几个来迟了的客人提了小行李站在车站门口。两部空车停在对面。车站旁边摆了好几副卖食物的担子，一些人围在那里吃东西。

志良勉强挤到车上，却寻不着家桢，只看见无数陌生的面孔。他只得走下车，焦急地站在车子旁边，不知道应该怎样办。太阳当顶地晒下来，汗珠不断地沿着他的脸颊流，他的脸发烧，口也干了。他取下草帽当作扇子摇了几下。

汽车开动了，一阵尘土飞扬起来，使他不得不往后面退。他失望地望着车子转了弯不见了，正打算进站去问明下一班车开车的时间，忽然有人在后面拍他的肩头。他转过身子，看见家桢提了一个包袱立在他背后。

“车子已经开了，怎么办？”他着急地问道。

“不要紧，对面还有一部车子，我们上去罢，”家桢安静地答道。

志良抬起头去看。对面两部空车中，前面的一辆已经坐了不少的人。他便跟着家桢跑过去。

汽车里充满着闹声和尘土，一股强烈的汗臭直往他们的鼻端扑来。这些家桢已经习惯了，志良却皱了一下眉头。车上靠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地位，家桢让给志良坐了，却把手里的小包袱交给志良。

"这里的汽车不及上海的好，你也许坐不惯，"家桢站在志良的面前带笑说。

"几个钟头，也不要紧。不过车子里面闷热得难受，"志良一面揩汗一面回答。

"开了车就不热了，"家桢又说了一句，便等着卖票的走过来买了票子。再过片刻车子就震动起来，沿着不很平坦的马路走了。

汽车经过的地方在志良的眼里都是陌生的：起初是街市，以后就进了乡村。车子震动得厉害，同时发出大的响声。他没法跟家桢谈话，便把眼睛掉去看车窗外面。

明亮的阳光照耀着道路。一路上是红的土块，青的树林，黄的田野，亮的河水。一切都是明亮而新鲜。尤其是茂盛的榕树充分地展示了丰富的生命。志良仿佛觉得自己一刻比一刻地变得年轻了。

到了一个地方，车子停下来。客人全下车到江边去搭小火轮，他们应该走一段路。大家都争先往前跑。志良跑到江边，忍不住气咻咻地对家桢说："这个地方真好，我倒有些羡慕你们。"家桢微微地笑笑。两个人走下石级，跳上了船。船不

久就开动了。

这个新奇的环境给了志良以新奇的感觉。他和家桢立在舱面上，以轻快的心情看前方。江面很宽，一片白茫茫的水遮住了他的视线。远处是岸，但是他看不出前面是个什么样的景象。他不知不觉地又在运用他的幻想了。他想像他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于是一个人的面貌马上在他的眼前现了出来。他好像在写一篇小说，刚刚描绘了背景，人物就在背景前面出现了。他无意间掉过头，看见家桢也在看江面。家桢的脸永远是平静的，使人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家桢，你同她在一起过得很快活吗？"志良忍不住这样地问了一句。

"她，你说谁？"家桢忽然回过头来反问道，似乎并没有听清楚志良的话。

志良微微地红了脸，短短地回答道："我是说你同秋星。"

"还好，"家桢简单地答了两个字，马上又加一句："当然快活。"

志良看了家桢一眼，就不再作声了。不久船靠了岸。他们急急跳上岸去。一口气跑到车站。车子正停在那里等候客人。他们最先跳上车去抢了两个座位。

"你看，我们这里的生活就是充满斗争的，"家桢开玩笑地说。

他们两人谈了几句话，车子就开动了。志良看见车子滚滚地前进，知道他们是一刻一刻地逼近目的地了，他便想到快要和秋星见面的事情，他希望家桢多告诉他关于她的事，可是

他又觉得不便多发问。他只是默默地在脑子里描绘她的影像。

车子到了一个大站停下来。一些客人下了车，接着就上来一批新的客人。家桢下车去买了一大包点心，刚回到车上就听见有人在下面唤他。他把点心分了些给志良，然后伸出头去。一个穿制服的中年人找他谈话，就是这里的站长。

"家桢，先前碰见秋星，知道你这班车回来。"站长用普通话说，接着他把脸挨近一点压低声音问道："你知道那边的消息吗？"

家桢点了点头，沉着地低声答道："我看不大要紧。"

站长小心地四面望了望，带了点焦虑的样子说："民团的力量究竟单薄，倘使汪国刚真的在省城里疏通好了，他一定会反攻的。你们要当心一点。"

"我知道，"家桢短短地回答了一句，微微点一下头。站长还想说话，然而车子开动了。

这些话都被坐在旁边的志良听进去了。他知道汪国刚是这里一个土匪的名字。三个月以前那个人还占据着他们现在正要去的那座古城，后来被民团赶走了。他不知道汪国刚如今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站长的话判断，那边的情况似乎不大好。他的心情突然紧张起来。他不免替家桢他们担心。可是他看见家桢的态度安详，便又渐渐地放心了。

车轮声在炎热的空气里单调地响起来。车子不停地在耀眼的红土马路上前进，接连地穿过几匹新开断了的山，许多株茂盛的榕树和龙眼树飞似地往后面退去了。

一切是平静，和谐，明亮。南国的风物以它的迷人的魅力吸引了志良的注意，给他注入了愉快的思想，使他忘记了先前听来的话。

于是汽车进了古城，在一阵喧闹中到了站停了。志良跟着家桢走下车，看见挂钟上的短针正指着四点。四个团丁掮了枪在站上巡逻。另外有两三个穿制服的人俯着身子在检查客人的大件行李。

三

这天晚上已经夜深了，志良还不想睡，他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摊开日记本，在那上面写道：

> 啊，我到底看见她了！我写这些字的时候，我的心还在颤动。我一想到和她见面的时刻，我觉得我的心马上就要爆炸了。是欢乐，是害怕，是痛苦，我说不出当时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又好像只记住我自己一个人。
>
> 她并没有什么改变。不，她完全和从前我们分别时一样。那眼睛，那眉毛，那嘴，那整个纯洁的面貌。这一年来我常常在梦里看见的，这两个月来我朝夕不能够忘记的，今天终于真实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了。这会是梦么？梦会是这么美丽的么？
>
> 我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似乎每一个字每一

句话都要争先出现在纸上。我不能够冷静地安排文字，像我平日写小说那样了，因为这是在写我自己，是的，这是在写我自己……

他写到这里，心跳得更厉害了，他不能够再写下去，这一天的经过又在他的眼前现出来了。一阵激情袭击了他。他放下笔，对着面前那盏黯淡的煤油灯，从头回忆他这天同她见面的经过。——

他和家桢走出了车站就到妇女协会去。那是在一座古旧的钟楼上。从那里望下去，这个古城的唯一的马路和那两排比较繁盛的商店就豁然映入眼帘。她正靠着栏杆看望街景。他们走上楼，转进了走廊，脚步声送到她的耳里，她便掉过身子来看他们。

她带着愉快的微笑唤他的名字，向着他伸出了手。他连忙跑过去，把那只温软的手紧紧握住。他望望她的孩子般的天真的脸，望望她的被蓝色方格子布短衫裹着的苗条的身子，他望望她的星一般明朗的眼睛，半晌说不出话来。倒是她先开口问了："你这几年都好吗？……"

他满意地微笑了，似乎这间屋子突然发亮起来。他轻轻地自语道："还是那么清脆的声音。"他的声音渐渐地高起来："她还关心我，这些年她并不曾忘记我。"接着他就把这两句写在日记本上，又加了一句："听见她的声音，我就像受到一次祝福。"——

回忆之幕继续拉开，他仿佛又站在她的面前了。他望着

她，差不多要流出眼泪。他挣扎了许久才说出一个“好”字。他觉得这几年来不断地压迫着他的那寂寞开始飞走了。他慢慢地放松她的手问道：“你呢？”

她微笑着，像孩子般亲切地答道：“我很好，我在这里过得很快活。”她把他端详了片刻，又说：“你瘦了些。这几年你过得快活罢。我读过你写的那些文章，你写得真美丽。不过……我们还是进去坐罢。”她望了望家桢，家桢笑着点点头。她便领着他们进了会客室。

他们穿过会客室，进了里面的一间屋子。她告诉他这是值日的职员住的地方。她有时就在这里睡。他把屋子看了看：房间小，陈设很简单，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一个柜子，两把椅子。她要他和家桢都坐下。他在床前那张椅子上坐了，家桢却站着对她说：“星，我现在到工会去。等一会儿你陪志良先回家，好吗？”他对她笑笑，又跟志良打个招呼，就大步走出房去。……

“她和家桢感情很好，他们还是互相爱着，”他忽然忍不住说了这一句，声音里充满着羡慕，又带了一点忧郁。但是回忆中的景象却把这羡慕和忧郁马上驱散了。

她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他面前，一面关心地问道：“这几年你就只写文章吗？”

他点点头，眼睛依旧不离开她的脸。

“他们都说你成了有名的小说家，”她并不避开他的眼光，安静地走到床前，坐下去继续说。“我和桢本来没有功夫读小说，但因为是你写的东西，所以也读了不少。不知道为什么缘

故我总觉得你很寂寞，你并不快活。我同桢也常常谈起。他不满意你的文章，他说那里面缺少什么东西。”……

他想到这里，忽然埋下头去激动地在日记里写着：“她说我这几年很寂寞，她说家桢以为我的文章里缺少什么东西。她知道，她应该知道。我缺少热情，缺少爱。我渡过海来寻找她，就希望在她那里得到这个东西。然而她现在——”他迟疑了一下才写完这最后的一句：“不能够把它给我了。”

他忽然掷了笔，用双手蒙住脸。他希望能够暂时忘掉自己。然而回忆又接着来追逼他了。

“你们为什么这几年不给我一封信？为什么我最近写信给你们，你们也不回一个字？你们就忍心把我忘记！”她的话使他记起过去几年的生活。那似淡而实深的痛苦又来压迫他，使他说了上面的话。话是平常的，但是声音里却带着怨愤的调子。

她惊讶地望着他，她还不大明白是什么东西在折磨他的心。她思索一下就同情地问道：“志良，你有什么事情？我想不到你会这样苦恼。”

他把嘴一动，打算马上回答她，但忽然又改变了心思，就勉强地对她笑了笑，摇了摇头说：“没有什么。我很好。……”

他的思想从回忆里跑出来，回到日记上面，他放下蒙脸的手，拿起笔接着先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我没有告诉她，我没有对她说真话。我对她说我很好。她不会知道的。我为什么不对她说真话呢？我为什么不让她知道我心里所想的一切呢？我太懦弱了。”他绝望地搁下笔，又沉落在回忆的海里去

了。——

她知道他没有对她说真话，但也不再追问，便换过话题说："我这几年也有好几次想给你写信。可是事情忙，也不知道你的生活怎样，我又怕会给你招来麻烦。我们的环境既然不同，通信也没有什么好处。你的新朋友一定很多，你的生活也一定——"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听见外面有个女人的声音在唤："秋星。"她连忙站起来，对他匆匆地说了一句："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就走了出去，剩下他一个人在房里。

他听见她在外面跟人讲话，却听不清楚她说些什么。那个声音离他很近，他却觉得跟他隔得很远。好像有什么东西隔在他们两个的中间，他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

他又回到日记上去，在那里写道："我们中间似乎隔了一堵墙，这是无形的，我摸不着它，但是我害怕我们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地互相了解了。"

他不能够再写下去，便阖上了日记本，让回忆之幕再拉开来。——

过了一会儿，她拿了一叠文件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她把文件放进书桌的抽屉里去，另外取出一叠文件交给那个女学生。女学生跟她说了两句话就出去了。她把书桌上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然后对他说："我们走罢。"

"到你家去吗？"他无心地问，便拿起了他的皮包。

"嗯，"她点一下头，陪着他走出去。客厅里有几个女子在谈话，看见他们便带笑打了个招呼。

他们下了楼，沿着马路走去。街上行人不少。商店门口

顾客进出不绝。人力车上坐着大肚皮的女人，被壮年的车夫慢慢地迎面拖过来，经过钟楼下面的大门往后面去了。几个艳装女子撑着花布伞，有说有笑地走在前面。他们过了一条街，在十字路口看见了警察和团丁。然而市面上依旧是一片和平的景象。

"我万想不到你会到这里来，"她忽然愉快地说。"你初到这里，也许觉得不惯，久了你就会爱起这个地方来。可惜你不能够久住。"他们走过了第二条街，就转进了一条僻静的巷子。是石板铺的路，但已经破碎不平了。

"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也许可以多住几天，"他听见她的话，也很高兴，就这样地说了。他还想说别的更重要的话，但是她掉过头来看他，问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去？"

"不一定，我还有事情，"他答道。

"什么事？我可以知道吗？"她带笑地追问。

"我回头慢慢跟你谈罢，"他有些慌张，连忙用这句话关住了门。

她用责备的眼光看了他一下，依旧带笑地说："你还是那种脾气，说话总是半吞半吐的。"

他也勉强地笑了，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也像从前那样，还是那么可爱。"

她温和地笑了笑。他觉得自己脸红了。

他们走的全是僻街，再过两条巷子就到了她的家。她在油漆剥落的门上拍了几下，里面响起一个女孩的声音。她跟

那个女孩隔着门说了两句话，门打开了。她陪着他走进去，穿过一个大天井，进了她的房间。

房里有一些旧式的家具：高大的架子床，宽大的书桌，笨重的靠背椅……再加上方块砖砌的地，阴暗的光线，愈显得房间阴郁可怕。

“秋星，你怎么能够住在这里？”他失望地叫起来。

“为什么不能呢？我们搬到这里已经一年多了，”她惊讶地望着他，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

“这个地方我要是住上一个月，就会发狂，”他把皮包放在桌上，皱着眉头说。

“我也想你会住不惯，上海没有这种房子，”她说。“房间的确阴暗一点，院子里那棵大树把阳光全遮了。不过我们一天很少在家。其实这里也有一种好处，天刚刚亮的时候，吹起风，不知道有多少雀子在树上叫，也很好听。我们常常就在那个时候起来。”

“你们常常这样忙吗？”他打岔地问。

“忙的时候多，而且常常只有一个人回来睡觉。桢有时就住在工会或者学校里，我有时也睡在妇女协会。今晚上桢回来睡，我还要到妇女协会去，”她絮絮地说，好像她对这生活很满意。

他呆呆地望着她，似乎没有听懂她的话。其实话是懂了的，他不懂的还是她这个人。这个念头使他很苦恼，他固执地说：“秋星，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你看，这阴暗的房间，这些陈旧的家具，那些繁忙的工作，这一切只有折磨你，使你一天

天变老的。……”激动使他变得口吃起来，他一时接不下去，就在书桌前面椅子上坐下来。

她微微地笑了，她望着他的激动的脸，温和地说：“志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不要把我看作你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那样。她们是那么温柔，那么多情，那么娇嫩，你写得真美丽。你看我这里还有几本你的小说。”她从书桌上取了一本书，指给他看，随手翻了两下，望着书页似嘲笑似赞叹地加了一句：“只有她们才配住在上海，过你小说里面描写的那种生活。”她不等他答话，马上换过语调说：“你随便坐坐，我到后面弄饭去。”

“我去给你帮忙，”他站起来说，要跟着她去。他忘了回答她前面的话，其实那样的话他也很难回答。

“不要你来打岔，”她连忙阻止道。“你好好地在房里坐坐罢，桢不久就会回来的。”

他听从她的话，让她带着愉快的笑容走到后面去了。他埋着头满屋子踱来踱去。

不久家桢回来了，面容虽然平静，双眉却微微皱着。他看见家桢的脸，忽然想起在车站上听见的话，便问道：“有什么消息吗？”

“虽然有些谣言，现在还不要紧，”家桢平静地回答，接着又压低声音说：“不过我以为你还是早些走好。”

“你们呢？”他惊愕地问。

“我们是不要紧的。你是客人，犯不着在这里冒危险，”家桢恳切地答道。

他却很激动，一时答不出话，迟疑了半晌才装出淡漠的样子说："我刚刚来，还想住几天，多看看你们的生活。"

家桢不答话，却在桌上取了一本书来随意地翻看。他默默地望着家桢，过了一会儿忍不住问道："家桢，我在这里住，不会妨害你们的工作吗？"

家桢起初一呆，以后就笑起来："你这是什么话？你高兴住，随你住多久，不过我们担心你——"

这时候窗外响起了皮鞋声。秋星端了菜碗进来了。家桢马上闭了嘴去收拾方桌。他也去帮忙。菜和饭都端进来了。家桢点起煤油灯，他们坐下来吃饭。……

他想到这里，忽然把眼睛埋下去，又把日记本打开，拿起笔急急地写道："我们三个在一起吃饭，就像从前那样。我们谈了一些从前的事情。那许多事情他们完全没有忘记。我好像又回到从前那种生活里去了。但是不知道怎样我总觉得我跟他们不同。我没有一个时候不偷偷地看她，她的面貌并没有改变。我自己变了。是的，我知道是我自己变了。……"

他不能够再写下去，这"变了"两个字苦恼着他。他绝望地放下了笔。他并不要再往下想，但是回忆之幕却在他的眼前拉开了。——

吃过饭他们随便谈了一些话，她就到妇女协会去了。他和家桢留在家里。似乎先前的话谈得太多了，这时两个人坐在方桌的对面两方，中间隔着一盏煤油灯，大家望着灯光说不出话。他的心似乎跟着她到妇女协会去了。他时时在替她担心。

家桢忽然站起来说要睡了。他并不想睡。家桢却去收拾床铺。在这之间外面响起了捶门的声音。家桢马上走出房去。他听见家桢开了大门，低声谈话。不久家桢走回房里来。他瞥见外面阶上有一个穿学生服的年轻人在等着。

“我有事情，现在要出去，今晚不回来了。对不起，只好让你一个人在这里睡，”家桢抱歉地匆匆说。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吗？”他惊恐地小声问。

家桢摇摇头，说：“不是那件事情。你放心，现在还不要紧，”接着又向他嘱咐了几句话，就跨出高的门限，同阶上站的那个年轻人一道走出去了。他跟着去把大门关好，还上了门闩。……

他嘘了一口气，像经过长途旅行歇脚以后感到了疲倦似的。他站起来，就在房里无聊地走了几步。他忽然想起了一些事情，便又走回书桌前坐下去，抓起笔，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他的胸膛里涌出来似的，他用战抖的手急急地在日记本上写道：“我好容易才把她找到，我不能让她再失去。我无论如何不能失掉她。我不能离开她，我不能一个人走。我要设法使她也离开这里。我不能让她留在这里过危险的生活。……我决不能一个人回到孤寂的生活里去……”

他力竭似地掷了笔，额上冒着汗，心在咚咚地跳。他下了决心阖起日记本，把手掌压在它上面。

灭蚊香的气味在房间里慢慢地散布。夜很静，只有窗外石阶下蟋蟀叫得更响亮了。

四

早晨天刚亮，志良就被窗外龙眼树上的麻雀声惊醒了。他在床上迷糊地再睡了一会儿，忽然记起秋星昨天说过要他早晨到妇女协会去的话，就连忙起身梳洗。在七点半钟的光景他赶到了钟楼。

钟楼的硃红色墙壁抹上了一大片金黄的阳光。她在廊上倚着栏杆同两个女学生讲话，看见他来对他笑了笑。他静静地靠在栏杆上，埋下头去看街景。过了一会儿，她谈完了话，就招呼他进房里去。

"昨晚上睡得还好罢？一个人不寂寞吗？"她一进屋就含笑地问道。"我想不到你会来得这样早。"

原来她已经知道家桢昨晚不在家里睡了。他想他们昨晚上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或者开过什么会议。他很想知道这个，他很想问她，但是他又知道她不会告诉他。他们谈了几句别的话，他终于忍不住问道："秋星，昨晚上你们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免得我替你们担心。"

她把细眉微微一皱，迟疑一下，就笑了，她摇摇头，平静地说："没有什么。桢有他自己的事。"她不愿意他再问，马上接着说："现在这里没有事情，我们到公园里走走也好。"她就这样轻易地换过了话题。

他明白她的意思也就不再追问了。两个人走下楼，往那条微微倾斜的土路走去。

早晨路上还没有多少尘土。晓风差不多使人不知道地在他们的脸上掠过。他觉得心里十分爽快。阳光轻轻地抚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每样东西都比平日明亮。

公园就在眼前，地方很大，却现着荒芜的样子。有几条曲折的小径，交叉地伸到里面去。路旁零乱地长了不少的龙眼树，一串一串的淡黄色果子垂在绿叶丛生的枝上。草长得很高，成了绿油油的一片。在小丘上面立着一个新修的亭子，红色油漆的圆柱和栏杆，鲜明地在绿树丛中映出来。没有门，没有篱笆。公园前面有一座纪念碑。过了这座碑，他们就进了公园。

这里相当静，偶尔有一两个赤脚戴斗笠的女人挑了担子从后面来，走过那条贯穿公园的土路往钟楼那边去了。

"你想不到我们这里也有这么安静的地方罢，"他们走入了小径，在前面走着的她忽然回过头来对他说。

"安静的地方到处都有的，"他漫然应了一句，他禁不住埋头去望她的细腰。

"你要回上海吗？"她又问道，这次却没有回头。

"嗯，"他含糊地应着。

"你在这里还住几天？"

他感到一阵失望，迟疑了一下，才答道："没有一定。"

"你在上海住得舒服罢？"

他想：你为什么老是问我这种话？他这次不回答了，却反问她："你就不想回上海吗？"

"我也许永远不回去了，"她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时她走

上了一个斜坡，在半途就站住了。路旁有几株龙眼树，好些树枝载着刚熟的龙眼低垂下来。她伸手去折了两枝，一面叫他也折。他便也折了几枝，两个人捧着往亭子那边走去。

他们进了亭子。两个人对面地在栏杆上坐下。龙眼枝堆在他们的中间。每人拿了一枝在手里，摘下果子来吃，摘一颗，剥一颗，摘完一枝就把枝子抛到下面去。

"志良，你看我过得快活不快活？"她忽然仰起头望着他微笑，口里还含着一颗龙眼核。

"我现在相信了，"他答道。

"比从前怎样？比从前更快活吗？"

"嗯，"他含糊地应着，但是忍不住唤了一声："秋星。"

"嗯，"她一面应道，一面低头在剥龙眼。

"你说你永远不回上海，为什么呢？"

"谁知道以后的事情。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她忽然伸出手向东边一指："你看那边！"

"那边？"他连忙掉头向东边看。远远地现出来一座山，山顶在阳光照耀下变成了紫色。他问道："你说那座山吗？"

"那边离城不过几十里路，本来可以去玩。但是现在汪国刚在那边，"她平静地说。

"汪国刚，他就在那边？"他惊恐地叫起来。"我昨天还听说他要攻打这里，你不知道？"

"轻点！"她做个手势来使他安静，然后淡漠地说："这个消息我们常常听见，这是第五次了。反正地方很近，他随时都会进来的。"

"要是他这次真的来攻打呢？况且听说他在省城已经接洽好了，"他焦急地问道。

"那只是谣传。而且民团还可以跟他打一仗。要是他再打败，这次就可以把他彻底解决了，"她做出乐观的样子说。

"万一他打胜了攻进城里来，你们又怎么办？"他固执地追问，他的焦虑不住地增加。

"那么一切都完了。他们就会从这道城门进来。要是在夜里我们更不容易逃。所以我说我也许永远不回上海了。汪国刚本来是个恶霸，他很残酷，我有一个朋友被他砍了头。"她说这些话时，声音和脸色都没有改变，好像在叙述一个故事。最后她加了一句："所以我希望你早些走。"只有这句话是带着关切的调子说出来的。

他的心马上紧张起来，脸上起了痛苦的拘挛。唯其他看见她露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他更替她担心。

"秋星，你同我一道回上海去罢，"他严肃地恳求道。

她惊愕地看他，不明白他的意思。

"秋星，你无论如何不能够再在这个地方住下去。我不能让你在这里牺牲。在上海你可以写文章，可以做别的事情，你也可以过得很快活，我要尽力使你快活。我不能够让你冒这种危险，这是不值得的。你马上离开这里罢。"他仿佛看见别人从他的眼前把她抢走了，掷进无底的深渊里去。热情鼓舞着他，他把他过去的寂寞，他的爱都放在声音里面。话像流水似地从他的口里泻了出来。

这些话都进了她的耳朵。她很感动，不愿意多分辩，就

感激地对他笑了笑，温和地说："谢谢你，但是我不能够离开这里。"她站起来把栏杆上堆着的残余的龙眼枝一手推开，坐得靠他更近些，伸手去握着他的一只手，轻轻地加了一句："我也不愿意离开这里。"

"是为了家桢的缘故吗？"他的脸色忽然阴沉了，他的心微微痛起来，他极力抑制自己，发出温和的声音问道。

她微微地摇头，坦白地望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说："不一定是为了他。我固然爱他，但是我也爱我的工作。"

他的眼睛又渐渐地发亮了，一线希望从阴云中透露出来，他便鼓起勇气说："在上海不是也有工作吗？别的地方也有的。何必一定要在这里？"

"但是你不看见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吗？"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绝望地说。

"志良，你为什么这样地关心我？这里不是也有无数的人？为什么你只关心到我一个？"她怜悯地望着他，过了片刻才温和地问道。

"因为——"他说了两个字忽然停住了，他望了望她，苦笑一下，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志良，"她低声唤道。他应一声，再看她一眼，连忙把头转开了。她说："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难道你不知道我爱你吗？"他终于吐出了这句话。脸通红，心里很激动，他站在她面前，睁大两只眼睛凝视着她。他伸出手去握她的手。他坐下来，靠着她的身子。

她微笑了。她的脸色平静。她让他握着她的手，过了半

晌才说："我知道的。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处？我们已经过了那种时期了。现在我们并不能够专靠爱情生活下去。我们还是谈点别的事情罢。"她把手从他的紧握中慢慢地抽了出来。

"但是我，我以后怎么能够活？那寂寞，那沙漠上似的寂寞，那长期的等待……这一切你是不会知道的！"他失去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带着绝望和恐惧地说。

"我知道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两人已经不能够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生活了，"她站起来，像责备又像叹息地说。她倚着圆柱，又掉过脸看他，安慰他说："你已经那样地过了几年了，你以后也会忘记的，而且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他忽然跳起来，抓住她的手，痛苦地说："难道你现在还不能够饶恕我？你还忍心挖苦我？我知道你还恨我！"

她微笑地摇摇头，用怜惜的声音说："我恨你？没有的事，你为什么会想到饶恕上面？你知道我和桢都关心你，不过……"她闭了嘴不再说下去了。

这个"桢"字使他苦恼，接着又是"不过"两个字，他知道现在再说什么话也没有用处了。他无可如何地松了手转过身子，默默地在阶上踱着。

"志良，"她唤道。他应了一声，就站住了，掉转身子来看她。

"忘了这一切罢，想着这些也只会使你苦恼。你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地跟我谈话呢？你看我并没有改变，"她恳切地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带了悔恨地小声说，他觉得自己的

眼睛有些模糊，他不敢再看她的脸，就把眼睛掉开去看远处。在他的眼前远远地横着那座山。但是他看见的依旧是她的脸。“我变了，你们没有改变，我完全改变了。”他渐渐地提高了声音，因为另外一个思想又来折磨他：“但是你不觉得你这牺牲不也是徒然的吗？那座山，那个汪国刚，那个阴暗的房间，那些繁重的工作……究竟有什么好处？你不过白白地毁了你自己，将来没有一个人会记念你，也没有一个人会得到你的好处。……”

“然而我自己是满足了，我并不希望人家记念我，”她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挽住他的一只膀子；她又说：“志良，我们不要说这种话了，”就拉着他沿着石阶走了几步。转了两个弯，她又站住了，松了手指点给他看下面的景象，一面说：“那些街市，那些房屋，那些人，对于你也许是陌生的。然而我是太熟习了。我很爱他们，这种感情我形容不出来。为我自己，我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危险。”她的声音异常柔和，里面带了感情颤动着。“前一次汪国刚在这个城里，我们也在。汪国刚这个人是残酷嗜杀的。我们还看见他穿着长袍马褂，坐了轿子到武庙去拜关帝，他的卫兵手里都拿着大砍刀，还有人打着杏黄旗在前面开道……”

“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她的叙述虽然很平静，但是给他增加了恐怖。他的焦虑继续折磨他，他忍不住打岔地说：“要是他真的在省城里接洽好了，民团一定会失败的，那时你们的处境的确很危险。”他再固执地要求道：“秋星，你答应跟我到上海去罢，我们劝家桢也去，我不能够让你们留在这个危险的

地方。”

她感激地望着他，她的柔和的眼光爱抚着他的脸。她微笑了，眼泪开始在她的眼里闪耀起来。她温柔地说:“我感激你的好意。但是我想留在这里也不见得就有危险。而且这里的人又不止我们两个,比这更危险的情形我们也是经过来的。你就忘了从前吗?”她忽然瞥见下边有两个人正往这上面走来,她知道是家桢和一个朋友，就高兴地说:“我们下去罢，桢来找我们了,还有一个老朋友,也是你高兴见的。”

“嗯,”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却痴呆似地站住不动。她挽住他的膀子,走下石阶,顺着宽阔的斜坡走下去迎接他们。

他们在半路上就跟上来的人遇见了。

和家桢同来的是一个紫色面膛的中年男子,名叫维德,从前和志良在一起工作过。这个人这几年里也没有什么改变,不过宽额上添了两道皱纹，阔嘴上多了几根短髭。他看见志良就伸出手张开阔嘴问:“我们等了你好几年，你为什么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来?”

这样的话叫志良有些发楞了,他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就握着维德的大手勉强答了几句。家桢走到秋星的旁边，严肃地在她的耳边说了两句话，她微微地点着头。这情形并没有被另外的两个人看见。

“志良，你同他们在这里多玩一下，我有事先走了，”秋星看了看志良，匆匆地说了上面的话，就放快脚步走下山坡，往小径里去了。

志良一面跟维德谈话,一面偷偷地望着她的苗条的背影。

五

第二天傍晚，在家桢的家里晚饭摆上了桌子，他们在等候维德。维德本来说过在六点钟光景来的，这时已经是六点三刻了，却还没有维德的消息。家桢疑心出了什么事情，有些着急，就主张不再等他。

他们坐下去，刚吃完一碗饭，外面忽然起了捶门声。

“奇怪，好像不是维德，”家桢惊愕地说，就站起来，走去开门。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学生走了进来。他跑得气咻咻的，带着一张惊惶的脸。他跟着家桢走到石阶上，站在桌子跟前，又看了看秋星和志良，然后用本地话对家桢说：“维德叫你们到学校去。今晚上在那里开紧急会议。”

“又有什么消息？”秋星用本地话问道。

“情形不好，你们到了那里就知道，”学生严肃地答道；随后他又向志良打个招呼，用不很纯熟的普通话问道：“这位就是志良先生吗？”

志良的脸上勉强露出笑容。他答应一声，就客气地请学生在旁边那把空椅子上坐下。

“我不坐了，还要到别处去，”学生推辞说，走下了石阶，家桢把他送出去，关了门回来。

三个人都不说话，匆匆地吃了饭。秋星把碗筷搬到后面去了。家桢一面收拾桌子，一面告诉志良，他和秋星马上要到

外面去，晚上不一定回家睡觉。志良刚要答话，秋星就出来了。她马上对志良说："你明天就走，好不好？"

"为什么这样快？"志良看见她的严肃而关切的表情，便知道他所担心的事情逼近了。他有点害怕，他也想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看见她和别的人都留在这里，他又感到留恋了。而且看见她安静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甚至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如今听她说起明天就走的话，他又不觉痛惜地叫了起来。

"情况很严重，我和秋星都不愿意你在这里冒危险，"家桢低声说，脸上稍微带了一点紧张的表情。

"但是你们呢？"志良关心地问道，他完全失掉了主见。

"我们不要紧，"秋星在旁边柔声插嘴说，"我们会转移到别处去。"她又加上一句："只要你能够安全地离开就好了。"

志良痛苦地望着秋星的脸，想找一个决定的回答。然而他的思想很乱，他便把头略略埋下去。他想：我为什么就跟你们不同呢？

"秋星，我们走罢，让志良在家里休息休息，"家桢催促秋星道。

"我也去，"志良听见这句话，马上抬起头，着急地对他们说。"我可以跟你们去罢？这里太寂寞……"

"好，我们一起去，"家桢稍微迟疑一下就答道。秋星用同情的眼光看了志良一眼，然后到后面去唤了一个女孩出来关大门。

两扇油漆脱落的木门关上了，这三个年轻人踏进了街心，

于是石板路上单调地响起了六只皮鞋的响声。

天还没有全黑。没有别的行人。街道清静得可怕。风时时吹动树叶，发出来轻微的声音。蟋蟀在长了青草的石板缝隙里凄凉地叫着，远远地有几只狗在狂吠。秋星走在中间，家桢、志良两人和她挨得很近。他们走过了一条街，忽然从旁边巷子里跑出一条黑狗，跟在他们后面狂叫，他们便散开来。秋星走在最前面，志良跟着她，家桢在后面赶狗。狗退了几步，在一个空院子门口站住不动了，继续吠了几声，四近还有狗响应地叫着。等他们去得渐远时，狗又疯狂地追上去，扑过去吠。这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又跑来了两条狗，三条狗都跟在他们后面狂叫。他们有时也停住脚掉过身子，狗就远远地望着他们不前进了，等他们再转身往前走时，它们便又追上去吠起来。

家桢和志良没法把狗赶开，也就不理了，让那三条狗在后面吠。它们的狂叫声在这静夜里给人带来了恐怖的感觉。尤其是志良，他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紧张的心情，仿佛前面就有一个可怕的结局在等候他。

“为什么今晚上狗叫得特别厉害?”志良终于忍不住这样地问了。

“其实平常晚上也有狗叫，不过今晚上叫人听见特别不舒服，”许久不说话的秋星接口答道。

家桢先前曾用本地话低声对秋星谈过几句，这时，就对志良说：“你在上海自然不大会听见狗叫，在这里我们天天都听得见。”

不久他们转进了正街，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狗早已跑开了，街上有一些掮枪的团丁往来逡巡。商店里挂着明亮的电灯。黄包车上坐着艳装的青年妓女。一群人匆匆地走过来，另一群人匆匆地走过去。市面上似乎很平静。

后面忽然吹起了军号。街中间渐渐地空出了一条路。每家商店里的人全挤到了门口。一切的活动好像都停止了。一队全武装的团丁，约有一百名光景，排着队齐整地从后面走来，经过这里往前面去了。

"就只有这一点？"志良恐怖地问家桢道。

"当然还多得多，已经开了好些出去了。不过汪国刚的人也不少，"家桢低声回答。

"那么情况真的很严重？"志良担心地低声问。

"见了维德就会知道，"家桢低声回答。

他们到了学校，两扇黑漆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家桢用力在门上擂了几下，里面有人问"是家桢吗？"他答应了，于是门开了半扇，放了他们三个进去，立刻又闭上了。

开门的是一个教员模样的青年男子。他低声对家桢说，"人来齐了，就等你们。"他又跟志良打个招呼，就引他们走过传达室，沿着石阶进里面去。

这个学校是由一座庙宇改建的。两边的房屋是课堂和宿舍，正面是大礼堂。礼堂上燃着明亮的煤油灯，维德用他的粗壮的声音在那里对学生们讲话。断续的字句进了志良的耳朵，使他的心情更紧张了。

"明天停课，学生除回家的外，都散布到乡下去，三年级的

学生已经走了，”那个青年男子用本地话对家桢说。“学生在开会，维德正在鼓励他们。”

家桢略略点着头。这是他们前夜商定了的计划：情况紧急的时候就派学生到乡下去工作。他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严重的时期，他们应当更紧张地工作了。但是他并不害怕。

黑暗中响起了脚步声，一个女子迎面走来，唤了一声：“秋星，”就握着秋星的手，亲密地挽着她往前面走了。她们进了最前面的一个房间，那里面一张方桌上放了一盏煤油灯。灯光十分暗淡。围着方桌坐了六七个人，每个人的脸色都是阴沉的，严肃的。他们正在低声谈话，看见有人进来就闭了嘴，吃惊地向门口看。秋星向他们打了招呼。

家桢一面走，一面同那个青年男子低声商量事情。他们快走到那个门口，青年男子就把隔壁房间的门打开，走了进去，在桌上摸着火柴点燃了灯。这也是一间教员宿舍，里面摆着两张床。

家桢把志良请进了这间屋子，对他说：“我们要商量一些事情，你坐在这里等我们罢，”说完就同青年男子走了。

志良一个人坐在这间阴暗的屋子里。外面也是一片黑暗。隔壁房里起了唧唧哝哝的声音，好像是几个人轮流地讲话。他注意地倾听，但也只听到几个零碎的字，不能连贯起来。而且维德的粗壮的声音有时候会压倒了隔壁的低语。

于是隔壁一个女性的声音抓住了他的全部的注意。那是秋星的声音，虽然很低，但是他也能分辨出来，不过他无法了解话的意义。她讲了许多话，似乎那些人都在静静地倾听，让

她一个人发表意见。

家桢的声音也是他熟习的，家桢说话并不多。接着还有两个人讲话，以后似乎起了争论，但是不久又平静下去了。秋星的声音再响起来。他更注意地听，依旧听不清楚她在说些什么。

志良心里非常焦急，他很想听懂他们的话，他知道那些话里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始终无法了解整句的意思。他明白隔壁那些人带着紧张的心情和休戚相关的态度在讨论目前的重要问题。他知道那些人到了牺牲自己的时节没有一个会是弱者，而且没有一个会替自己打算。这时候外面是一片黑暗，房间里只有一盏半明半暗的灯。蚊虫带着单调的令人厌烦的叫声在他周围飞来飞去。他一个人冷清清地坐在桌子前面，脑子里装满着惊惧和忧郁的思想，等着时间迟慢地过去。在隔壁，那些人集在一起，准备去冒危险，如同去赴盛筵。这是一个何等明显的对照。他开始感到了惭愧。这惭愧同焦虑合在一起，又增加了他的烦躁。他几乎不能够静静地听下去了。

忽然外面起了一阵响动，接着有许多人说话和走路的声音。他起初有点吃惊，但是马上就明白了：大礼堂的讲演完毕，学生们正散下来。

学生们三五成群，接连地走过他这个房间的窗下，激动地谈论着目前的情况，他们讲的都是本地话。他又听见维德在大声唤一个学生的名字，那个人答应了，似乎有三四个人围着维德讲话。后来维德一个人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隔壁的讨论似乎快结束了，发言的人也没有先前那样地

起劲，但是维德的加入又好像添了一点活气。维德跟几个人交换了一些意见。于是屋子落进了暂时的静寂。房门开了，又关上。两个人走出来，经过这窗下往外面去了，志良又听见房门打开，再有三个人出来往外面走去。

他以为秋星、家桢几个人马上就会到他这里来，他盼望着，等待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并没有出来，隔壁又有了谈话的声音，是一个女子在说话，他知道这是宛若，就是先前迎接秋星的那个年轻女子。这天上午他在秋星那里见过她一次，秋星对他赞美过她的勇敢。接着秋星的声音也听见了。维德的声音比较粗壮，家桢的声音永远低沉。但是他仍然听不出意义来。他心里愈加烦躁，蚊虫又不停地飞来叮他。他坐不住就站起来，轻轻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隔壁的门终于又打开了。五个人一起出来，经过他的房间，并不停留就往外面走去，好像把他这个人完全忘记了似的。但是不久秋星一个人走了回来，推开门进了这个房间。

"等久了罢，"秋星一进屋就柔声地说。

"不要紧，"他看见秋星的笑容，就忘记了先前的烦躁的等待，满意地答道。"你们的事情商量好了吗？"

"嗯，"她点点头，想说什么话又止住了。

"情况不太严重罢，有什么消息吗？"他看见她这个样子，又想起了这两天的种种见闻，忍不住关心地问道。

"谣言很多，不过也许不会有什么事情，"她把身子斜靠在桌子上。眼睛望着灯光，有意无意地答道。随后她沉吟一下，又把眼光掉去看志良的脸，志良这时站在靠背椅后面，两只

手腕压着椅背，脸上带着疑虑的表情看她。她唤了一声："志良，"又用更柔和的声音说："你答应我明天走，好吗？"

"为什么？"

"我们担心你的安全。"

"那么你们呢？你们就不怕吗？"他带了十分关切的样子望着她。

"我们——"她迟疑一下，但是被他的眼光追逼急了就直说出来："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不能走……而且我们也愿意留在这里。"

她的话使他感到痛苦。他一方面因为关心她的安全而恐惧；另一方面他又因为她在他和她或者他们中间划出一个明显的界限而感到孤寂和绝望。他甚至疑心她会轻视他。他挣扎似地说："那么你以为我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吗？你们都在这里冒危险，我就忍心一个人走？"他挣红着脸牢牢地望着她，好像害怕他一旦把眼睛掉开就会失掉她似的。

"谁说你是自私自利的人？"家桢的声音接着响起来。他已经推开门进来了。志良惊讶地掉头看他。他诚恳地望着志良继续说："志良，你跟我们不同，你是一个客人，你安全地来这里，你得安全地回去。你留在这里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多大的危险。"

"那么，我不可以给你们帮忙？"他忽然抓到了一个希望，便激动地这样说了。

"现在太迟了，"秋星带着苦笑说；"我们很早就望着你来，可是不希望在这样的时候。"远远地响起了军号的声音，在静

夜的空气里凄凉地颤动着。

“星，你陪志良回家去罢，”家桢猛省地对秋星说，“时间不早了。我今晚在工会里睡。”

“好，志良，我们走罢，我们回家去细谈，”秋星接着对志良说。

“志良就搭明天上午的车走，”家桢阴沉着脸，固执地、发命令似地说。“我明天来送你上车。”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只手电筒递给秋星，一面说：“星，你拿这个去，我等一会儿借维德的用。”

“我们一道走，不好吗？让我来送你一次，把你送到工会，反正我顺路，”秋星接过手电筒，忽然亲密地对家桢一笑，温柔地说。

“好，我们走罢，”家桢顺口粗声答道。

志良埋下头，默默地跟着他们走出门去。

每间宿舍里都有灯光，学生们似乎在收拾东西。维德还没有回来。他们走过传达室，看见先前给他们开门的青年男子站在门口。他跟他们打个招呼便去开大门。

“砰！”一个清脆的枪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响了起来。大家吃了一惊，便停一下。那个青年男子把手按着门闩问道：

“还走吗？”

四周很静，再没有第二声枪响。

“走！”家桢望了秋星一眼，然后沉静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大概是团丁的枪走了火。”

“那么再见罢，”青年男子亲切地说，就开了大门放他们

出去。

广场上寂静无人。在清朗的高空横卧着明亮的北斗星，给他们指示方向。夜太静了，他们甚至害怕说一句话来惊动它，不，是害怕会被别人听见。

他们走出了广场，转过一条窄巷，然后进入了大街，就碰见一男一女迎面走来，秋星不觉惊喜地小声唤道："宛若。"

来的正是维德和宛若。

"你们还回去？马路上交通断绝了，谁也不能通过，"维德严肃地说。

这句话使得平日很镇静的家桢和秋星也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我要到工会去，我还有事，"家桢激动地说。

"你大概可以通过。不过亦吾已经到了那里，你明天去也好，"维德说。

"不行，我非去不可，"家桢思索片刻，决断地说。他望着秋星和志良。"你们回学校去睡罢。我明天上午再来。"说罢，他不等他们答话，便迈步走了。

众人不阻止他；秋星也默默地望着，等他走了两步，她忽然唤道："桢！"

家桢站住，回过头来看。她拿着手电筒走去，一面说："这个还是给你罢。"

"我不要，我看得见，"家桢答道，毅然掉转身子大步往前面走了。

志良的眼里涌出了眼泪。他跟众人走进窄巷时，忍不住

低声问秋星道:“你为什么不阻拦他?他不会有危险吗?”

“不要紧,既然他自己愿意,并且他觉得应该。”她的声音虽然低而平静,但是她把头掉过来看他时,他却看见她的眼里也闪耀着泪珠。她的坚定的眼光透过泪水射到他的脸上。他起初只感到惶惑,他觉得不了解她。可是他们走进那个空阔的广场,他依旧觉得那明亮的眼光还在他的眼前闪烁,而且渐渐地射进他的内部了。

他跟着他们进了学校。

六

这晚志良睡在维德的房里,秋星和宛若同睡。到了半夜忽然一阵密放的枪声把他们惊醒了。

“维德!”志良惊恐地叫起来。

“志良,你也醒了?”维德在对面的床上说。

外面是一片黑暗,房里抖着微弱的灰色的光线。吹着风,砂石在空中飞舞。远远地响起了紧急集合的军号。

“果然打起来了,”志良声音战抖地说。

“大概不要紧,你放心睡罢,”维德这样说了,就起来在光着的身子上穿了一件汗衫。

“维德!”秋星在隔壁大声叫道,“快起来!”

“你们起来了吗?我已经起来了,”维德一面大声答应,一面摸索到桌子前面去点燃了煤油灯。

枪声炒豆似地继续密密麻麻地响着,就像在志良的心上

敲打。维德穿好衣服出去了。他在隔壁和秋星她们说话。学校里这时突然显得热闹了，学生们都醒过来，在大声讲话。

“志良，你起来了吗？”秋星在窗外说。“你还是睡罢，有事情，我们再唤你。”

“不，我马上就起来了，”他慌张地应道，连忙从床上跳下来，揩了揩眼睛，就打开门出去。

秋星和宛若都站在石阶上。天井里榕树下面有好些学生聚在一起低声谈话。一道灰暗的雾遮了他的眼睛，他觉得好像在做梦。夜的寒气使他打了一个冷噤。他默默地走到秋星的身边。

正在跟宛若讲话的秋星听见他的脚步声就掉过头看他，惋惜地对他说：“你来得真不凑巧。”

“事情真的十分严重吗？”他恐怖地问道。

“那也说不定，我想大概不要紧。汪国刚打仗并不行，不过这回总使你受了惊，”秋星答道，这些话好像是说来安慰他似的。

他听见秋星的话，稍微放了心，紧张的心情算是轻松了一点，他分辩道：“受点惊算得什么？你们都不怕，我跟你们还不是一样的人？”

秋星对他微微一笑。

机关枪的声音响了一阵又停了，这时候只有断续的几下“砰、砰”的枪声。

“大概现在休息了，”宛若在一边自语道。

忽然一个响雷似的声音冲破了静夜的网，把空气大大地

震动了。树上的雀鸟惊惶地乱飞。接着又是一排枪。以后炮声继续响着，枪声又密放起来。学生们在天井里惊恐地嚷着。有些人就急急走上石阶进房去。

“汪国刚有大炮，事情有些不妙了，”秋星忽然惊疑地说。

“说不定是省里发的，招安的条件大概讲妥了。省里对民团一向很猜忌，正好利用汪国刚。不过汪国刚有炮，恐怕也不会放，打不准，”宛若愤激地接口说。

“只要我们能够在这里多住五年就好了，现在一切刚有了个眉目……”秋星好像没有听见宛若的话，她用了痛惜的调子自语地说。

炮声停了，排枪依旧在放，似乎近了一点，机关枪声又响起来，在这中间夹杂着一片人声，这是喊杀的声音，但很远，很低。

在冲锋了！志良这样想着，他脸上的肌肉就搐动起来。他的眼前现出了无数根锋利的枪刺，好像就对着他冲过来。他不觉闭上眼睛惊叫一声，声音虽很低，但已经够把秋星和宛若惊动了。

“志良，什么事情？”秋星惊讶地问，宛若也掉头来看他。但是她们看不清楚他的脸部的表情。

志良呆了片刻，才醒悟过来，有点惭愧地揩着额上的汗珠，慢慢地嘘了一口气。

“你冷罢？那么你还是到里面去睡一会儿，”秋星怜悯地柔声对他说。

“不要紧。我不想睡，”他半昏迷地答道，他的眼前仿佛还

有发亮的枪刺在晃动。

“天快亮了，睡睡也好，”宛若也过来劝他。

枪声渐渐地稀了。天空的颜色也淡了些。东方在发亮。星子一颗一颗地隐去，只有太白星还明亮地挂在那里。空气突然冷起来。

“你们这里夜晚很短，”志良望着天空无心地说。

“早些天亮也好，这黑暗真叫人受不了，”宛若在旁边接口说。

军号声无力地响着，以后又停止了。天亮了。一片红霞涂在浅蓝色的天空。风微微地吹动榕树的绿叶，无数的麻雀吱吱喳喳地在树枝上叫起来。

维德回来了，家桢和他同来，那个住在传达室的青年男子跟在他们后面。

“维德，外面的消息怎样？”志良看见他们就连忙走去迎接，急切地问道。这时还留在天井里的少数学生便走上石阶来听维德讲话。

维德把他的血红的眼睛望了望志良，摇摇头，低声说：“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我们决定要你暂时离开这里，家桢要到别处去，他可以和你同一段路。”

这意料不到的答语，使志良楞了一下。他转过头去看秋星。秋星和宛若两人正在同家桢低声商量什么事情。维德拍了一下志良的肩膀。他回过头想对维德说话时，维德已经被那些学生包围住了。

志良一个人站在阶上，他两边都有人在讲话，他仿佛也听

见了维德在和学生谈论到乡间去的事情；家桢和秋星的声音更低，他只能够抓住几个字眼；但是这些他马上就忘记了。他的脑子很迟钝，好像里面装了一堆石子，思想很乱，他不能够决定走不走。他似乎有些留恋，然而又有点害怕。他无聊地走下石阶，到榕树脚下一块凉的石凳上坐了。

学生们开始散了，大家争先恐后地跑进宿舍去，维德同两个学生走进了一个宿舍。外面有人在敲门，青年男子去开了门，进来一个矮小的穿中山服的中年男子，低声问道："预备好了吗？"

"马上就好了，"青年男子一边点头一边回答，便陪着这个新来的人去找维德。

学生们陆续地走出来，站在阶上，排列成三队，大多数的人手里都抱了个包袱，也有的挟在腋下。人数一共是六十几个。

矮小的中年男子一边跟维德说话，一边走出来。他用眼光在学生们的脸上扫了一下，说了两三句话，就带着他们走出去了。依旧是青年男子去开门关门。维德留在阶上和剩下的几个学生谈话。

志良茫然望着这一切，心里很难受。他好像在看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不知道怎样他总觉得他跟那些人，那些动作，那一切事物中间隔了一层纸。他跟他们似乎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志良，你就跟桢一道走罢，"秋星和家桢走到他面前，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肩头上恳求地说。

他好像从梦里醒过来似地抬起疲倦的眼睛看她，不明白她这句话的意义。接着他忽然呻吟地问道："你呢？"

"我自然留在这里，"她柔和地一笑，但是她的声音却有点近乎呜咽，她不再说话，就掉过头，走开了。

志良马上站起来，想追她，但是被家桢阻止了。家桢带了点命令口气地说：

"走罢。你不看见她心里难受吗？"

"但是我不能够在这种时候离开你们，"志良抓住家桢的膀子激动地说。

家桢亲切地但又带了点苦涩味道地说："你的话固然有理，但是你留在这里对我们不会有——"刚说到这里，一排枪声突然响起来把他的话打断了。

秋星马上走过来催促他们：

"你们快走！桢，你还要陪志良回家去拿东西。"

志良昏迷似地站在家桢和秋星的面前，还不能够决定应该怎样办。然而事实已经不容许他有迟疑的时间了。

一个巨大的响雷打在左角的屋顶上，屋顶炸开了，碎瓦和灰尘四处飞舞。土地摇动起来，好像发生了大地震一样。

学生们惊惶地叫着，一齐往外面跑。在灰尘涨漫的空气中，维德的响亮的声音叫起来："不要慌，大家镇静一点！"炮弹的余音消失了，飞舞的灰尘也停下来。门大开着，学生们跑到外面广场上去了。维德的声音在唤"宛若"。

志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只手抓住家桢的膀子。等到一切静下来时，他才留恋地望了望秋星，然后回过头对家桢低声

说："走罢。"

枪声像暴雨似地落着，碎瓦继续从屋顶上落下。维德和宛若一道走着，看见他们就走下阶来说了两句话，催促他们快走，又和志良握了手，然后拉着宛若匆忙地走进宿舍去了。

志良跟着家桢和秋星走出了大门。广场上还有几个学生在那里谈话。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金黄色的阳光，抹在脱落了石灰的墙壁上，在志良的眼睛里看起来好像是淡淡地涂了一片血迹。

他们刚刚走了两步，一个巨大的声音又在后面响起来了。墙壁震动着，似乎要倒下来一般，石灰纷纷落在地上。

"我回去看宛若，"默默地走着的秋星忽然焦虑地说。

"你不同我们一道走？"志良惊讶地问道。

"我不送你了，"她坚决地答道："反正有桢送你也是一样。我还要去妇女协会。"她本来要转身走了，但是看见他带了痛苦的表情望着她，像要说什么话却又说不出来似的，她也觉得心里难受，便伸出手给他，对他笑了笑，感激地说："我们再见罢。不要替我担心，我们一定有机会再见的。"他也茫然地伸出手来，她把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就甩掉它，侧着脸对家桢柔情地说："桢，你路上要当心。"

"我知道，"家桢低声答道，也对她亲切地笑了笑。他们的眼光对看了一会儿，从眼光里交换了一些意义更深的话。她猝然转过身子，往里面跑去。

家桢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大门里面，他始终没有流一滴眼泪。他觉得志良的手战抖地抓住他的膀子。他下了

决心，呻吟似地说了一句："我们走罢，"就拖着志良急急地走出了广场。

一排密放的枪声追赶似地跟着他们。

大街上行人不多。街中间有几个持枪的团丁来来往往。十字路口有警察站岗，同时在一家关着的商店门前驻扎了十多个团丁。

家桢陪着志良走过大街，穿进了小巷。他昨晚拿到了通行证，所以不曾受到留难。那些小巷似乎比在平日更冷静了，除了一两个掮着枪慢慢地踱着的团丁外，再没有别的行人。繁茂的龙眼树从院子里伸出来，垂着累累的淡黄色果实的树枝在明媚的阳光里微微地摇动。但是志良不会注意到这些景象了。接连着密放的机关枪和步枪的声音占据了他的脑子。它们老是不放松他。他惶惑地跟了家桢大步走着。

他们到了家桢的家，家桢用力捶着门，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来开了门，让他们进去。家桢在书桌的抽屉里取了一些文件揣在怀里，志良拿起他的皮包。他们不多在家里停留，又匆忙地出去了。

刚走出门，志良忽然想起了秋星，他关心地问家桢道："秋星不会有危险吗？"

"不会的！我们快走！"家桢用低沉的声音回答。他只顾大步走着，使得志良有些落后了。

枪声刚才停了一会儿，这时又响了起来，起初是断续的几下，以后就是一排密放。这一次真密，好像许多匹骏马奋起蹄子朝着他奔腾过来。他恐怖地跑了几步，抓住家桢的膀子，绝

望地问道：

"秋星，她不会……"

他不能够接着说下去，他睁大一双血红的眼睛望着家桢。家桢不答话，却避开了他的眼光。恰恰在这时候炮声响了，他觉得周围的空气起了一阵大的震动，仿佛两旁的墙壁都会倒下来，压在他的身上。他连忙站住了。等到炮声的余音在空中完全消失以后，他才无力地跟着家桢往前面走。

炮声代替家桢给了他一个回答。这个回答证实了他的恐惧，而且把他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毁掉了。

七

汽车站上车子都开走了，大半是被民团要去运送团丁了。剩了一部坏车子停在那里。许多人挤在站上吵闹地要求开车。站长后来答应把这部车子也开出去。

家桢他们到站时，正看见一群人围着车子争先恐后地挤上去，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在车上找到了两个站立的地位。于是车子很吃力地缓缓开动了。

车上挤满了客人，大家带着紧张的面容激动地谈论战事。空气很坏，而且异常闷热。车子虽然走得慢，但是震动得十分厉害，把站立的客人颠来簸去。

志良和家桢被车子颠簸着。他们用力抓住旁边座位的靠背。家桢的脸上老是带着严肃的表情，他皱着眉头在想什么事情。志良的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他一对血红的眼睛茫然

地望着车窗外面的景物。

依旧是耀眼的红土马路，依旧是新开断的山，依旧是许多茂盛的树木。这一切跟两天以前并没有两样，然而现在它们都失去光彩了。他的眼睛只看见一片灰暗的颜色。有时候就会有一对发光的眼睛在这灰暗中现出来，那些明亮的泪珠就像滴在他的心上一样，他的心隐隐地痛了。

枪声渐渐地隐下去，汽车走得较远了，但是依旧走得很慢，而且除了颠簸之外，它还使人时时刻刻都担心它会马上停下来不能够再开动了。

“真慢得很，”家桢忽然焦急地说。志良惊醒似地掉头看他，希望听见他说两句话来打破这种不确定的痛苦，然而他却闭着嘴不再做声了。

车子像一匹倦马似地困难地捱着路程；后来快逼近那个大站了，它却特别慢起来，似乎动一下也要费很大的劲似的。

忽然前面起了车轮的响声，两部大卡车满载着团丁迎面驶过来，气势很凶猛。这辆车子连忙往旁边避开，车身大大地震动一下，就停住了，让那两部大卡车在旁边飞驰了过去。以后司机再来开车，车子却像固定在地上似地不能够移动了。

司机下车去修理车子，卖票的给他帮忙。客人在车上嚷着，谈论着，抱怨着。过了一会儿，司机回到车上来。车子动了。司机勉强开着这辆病车，差不多一步一步地捱到了车站。

站台上没有一辆车。许多人激动地围着一个职员在谈话。站房门口有两个武装的团丁守卫，里面有一些行李，还有几个带了小孩的女客。

车子一到，整个车站都骚动起来了，大部分的人拥挤地扑过去，有的提了行李想挤上车，有的想打听城里的消息。他们把车子包围着。

然而车子坏了，不能够再往前面开动。司机和卖票安静地甚至带了幸灾乐祸的态度把这个消息告诉众人，便排开人群往站房内走去，留下车子和一车的客人在站台上。包围着车子的人们也就渐渐地散开，让那些带着失望面容的乘客提着小件行李下车来。他们生气地口里抱怨着，踏着大步走进站房去找站长交涉。

站长在楼上。他有要紧的事情。另一个职员来跟他们讲话。车子没有了。说是要到下午才有车开回来。有些客人吵着要退票。

家桢跟站上的职员很熟，他们让他和志良两人到楼上去。站长正在房里打电话。家桢和志良站在外面廊上等候他。廊上有一个凳子，他们把手里的东西和帽子放在凳子上。

过了一会儿，站长挂了电话机走出来，脸上带着焦急的表情。家桢一个人立刻迎上去。两个人低声谈了几句话。站长就走下楼去了。志良倚着栏杆看下面站台上喧闹的人群。家桢走到志良旁边，站了半晌才苦涩地小声道:“志良，那边大概守不住城了。”

志良马上掉过脸惊愕地望着家桢，他的眼睛急急地霎动，他张开嘴想说话，但是话没有说出口，他忽然改变了主意，就默默地埋下头，把两只手撑住栏杆。

楼梯上脚步声响了，站长激动地跑上来。

“一部车子也找不出来，至早也要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有，而且还没有把握，”站长失望地对家桢说。

“但是我不能够等，我马上就要走，”家桢变了脸色说。

“我也知道。但是没有车子怎么办呢？”站长把手按住额角沉吟地说。他忽然放下手，决断地说：“那么我给你设法雇一部人力车，反正路程也不太远。”

“好罢，”家桢点了点头答道。

站长不再说话又匆匆走下楼去。

“志良，我不能够再送你了，”家桢在廊上走了两步，忽然看见志良在注视他，就走到志良的面前，抚着志良的膀子，惜别似地说。

“你答应我，你和秋星以后到上海来看我罢，”志良孤寂地微微一笑，泪水从眼眶里迸了出来，他紧紧地抓住家桢的膀子，好像不愿意把家桢放走似的，他用了近乎抽泣的声音央求道。

家桢默默地点着头。

“你答应我，让我同你们在一起住一些时候罢，我不再写那些小说了，”家桢的点头并不能够使志良满足，他还继续要求道。“只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寂寞……离开你们我是多么地寂寞——”他的话被站长的脚步声打断了。

“车子马上就来，你准备走罢，”站长走上来，略带欣慰地说。

“好，谢谢你，”家桢答应了一声。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把志良介绍给站长说：“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现在到××

去。他刚来，不懂本地话，一切要靠你帮忙，请你好好地照料他上车。”

“那当然，”站长和蔼地笑了笑，就和志良握了手。他刚要说应酬话，电话机的铃声忽然响了。他连忙走进房里去。

“站长是个很好的人，你可以相信他，他会照料你，”家桢望着站长的背影说。

“你没有危险吗？”志良忽然想起家桢的事情，知道家桢一定是带了什么重大的使命到别处去，他担心起来，就焦急地问道。

家桢淡淡地一笑，极力做出平静的声音说：“我看不会有什么危险。你放心，将来我会同秋星一道去看你。”

“那么你们真的不会忘记我？”志良紧紧地握着家桢的手，两眼含了泪感激地望着家桢，半晌才说出这句话。他的声音抖得厉害。

家桢刚要答话，就看见站长从房里走出来。站长的两只小眼睛圆圆地睁着，那强烈的眼光好像找寻捕获物似地抓住了家桢的脸，激动和恐怖使他变得口吃起来。他说：

“汪国刚——进——城了……”

“会这样快？”家桢勃然变了脸色，惊惶地失声叫起来。志良呆呆地望着站长，忽然打了一个冷噤。

“汪国刚打的是本省陆军暂编第一旅旅长的旗号……城里到处起火……民团正朝这方面退下来……”站长一面喘气一面说。

“秋星！”志良忍不住叫了一声，这声音和抽泣差不多。他

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火光，火光中露出了一个女人的头，但是马上就被火焰包围住不见了。他的耳边仿佛响起一片脚步声，汪国刚的队伍提着大砍刀进行着，进行着。他痛苦地掉转头走开，把身子倚在栏杆旁边的圆柱上。

家桢立在站长面前，用力搔着头发，一张脸通红，汗珠从额上滴下来，他好像没有听懂站长的话一样，不作声，只顾咬着嘴唇。

“你还去吗？要不要在这里等一下，看秋星来不来？”站长关心地问道。

家桢忽然放下手，把头往后一扬，于是坚决地、粗鲁地说：“我马上走！”就伸出手来抓住站长的手紧紧握了一下，说声：“那么再见罢！”接着他又加一句：“秋星来，你照料她罢！”然后转身去拿了他的白通帽戴上。志良听见他说要走，也转过身来看他。他走到志良身边，拍一下志良的肩膀，大声说：

“我去了。秋星也许会到这里来……”说到这里，他就毅然地掉转身子大步往楼下走了。

站长跟着他走下楼去。志良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过了半晌忽然猛省似地扑在栏杆上面，大声叫着：“家桢！”

家桢正走到站台上，听见志良的声音抬起头来望他一眼，点了一下头，也不说话，就同站长一起走出了站台。他的白通帽消失在人丛中再也看不见了。

然而那顶白通帽还鲜明地留在志良的泪眼里，而且它不住地往上面升，往上面升，超过了栏杆，一直到他的眼前，于是遮住了他的眼睛。

"我要给你们以晨星。"

同时好像有谁把这句被他遗忘了多年的话在他的耳边反复地大声说了。

他呆呆地望着站台上喧闹的人群。他的眼睛一阵昏花，仿佛有无数金光在他的眼前闪耀。

他觉得他真的看见了星光。

"真是个好人！"一个赞叹的声音意外地把他惊醒了。

他回头看，那个中年站长含了眼泪站在他的背后。站长看见他掉过头，便诚恳地安慰他道：

"等一会儿就有车子，你不要着急。"

他不回答，只是无可如何地苦笑着。他这时候简直想不到一个"走"字。

1936年在上海。

关于《发的故事》(代跋)*

已经是三点钟了。我刚刚写完给春的信，我想应该睡觉了。我便站起来。但是一句话突然映入我的眼帘："我们的生命恐怕还不如一只蚂蚁。"好像一下铁锤打在我的头上，我又坐了下来。

这时候我想起了你给我的信和你所说的事情，我不能够沉默，我便又一次拿起笔给你写几句话。

"我们的生命恐怕还不如一只蚂蚁。"我并不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我在一个朝鲜青年写给我一个朋友的信里看到了这样的话。我的回忆之门突然打开了。我看见了我的过去。我看见了许多人和许多事情。那些都是被我早已埋葬了的。我不要想他们，我不配再想他们。但是他们自己来了。回忆折磨着我，逼着我写点东西。我便写了一篇小说《发的故事》。我也许不配写这种文章，但是我终于大胆地写了。

我写这篇小说是在纪念一个亡友，同时还对几个活着的友人表示一点感激的敬意。这件事情你是能够了解的。我的文章里并没有歪曲事实的地方。不过我的笔端却没有够多的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中流》第一卷第一期。

力量。三年前我的《新生》在《东方杂志》刊完的时候，一个朋友就当面责备我，他说那部小说写得太软弱。在这个朋友的面前，我是无法辩解的。他太了解我这个人了。他知道我写小说不过是在浪费我的青年的生命，他怜悯我，他也常常责备我。而且我也答应过他，有一天我要抛弃写作生活，去作一点有用的事情。我写了《发的故事》，我知道他会责备我写得没有力量。

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十年前在北京曾经出过一份叫做《高丽青年》的刊物，那边的朋友要我写一点东西，我写了一封《公开信》寄去。信里面有这样的话：

> ……在八月的夜晚，明月高挂在天空，微风吹动大门边槐树的枝子。我静静地望着柳的发光的眼睛，让他慢慢地把你们的斗争的全景展开在我的眼前。我渐渐地忘了自己。我跟着他到遥远的地方去了。他告诉我你们中的一个人怎样在半山里碰见了敌人，躲到白杨林里跟他们打了半天，后来又逃了出来；他告诉我你们中有四五个人被五六十个敌人围困在山顶上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每个人拿着两支手枪冲下山来，打死了不少的敌人，自己也死在乱枪下面；他告诉我……

柳并没有对我说过假话。我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的斗争，但是我也认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至少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人，我多少有一点点了解。我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斗争的方式。但是我仍然尊敬他们。文人的笔算

得什么？然而这壮烈的血的斗争是不能被人忘记的。殉道者的血将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朋友，你现在应该明白了罢。我不知道你的朋友中间有没有那种殉道者型的人。倘使没有的话，请允许我把下面一段沉痛的话介绍给你，这也是从那个青年朋友的信函里抄录下来的：

> 你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生来就刚强，就有奋斗精神吗？不，这不是生来如此，而是环境使然的。……我们的生命恐怕还不如一只蚂蚁。在我幼小的时候，我曾亲眼见过许多的事情。把乡村里的无辜的农民任意捉去，挖地坑，倒煤油去烧。你在宽大的马路上站着看罢！一辆六匹马拉的四轮车上装满了在乡村中捕来的青年。这些是每天都可以看见的。从这个虎口逃生的青年，中国便是他们唯一的避难所。是不是连这个避难所也会失掉呢……

这样的话不知道你看了有什么感想？朋友，我相信你，你一定会了解的。

1936年。



还 魂 草

《还魂草》，一九四二年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七年十月，共印行三版(次)。

一九五三年七月由平明出版社重排新版，迄一九五四年七月，共印行四版(次)。

序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① 我常常背诵一位敬爱的前辈的名言。

我的情形也是如此。这几年我没有写过一个短篇，但是我觉得肚里装满了火似的东西。那不少的见闻，那不少的经历，那无量的腥血，那无数的苦难，我全接受了，我全忍受了。我没有能做什么事情，除了把这一切全堆在心里。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一天一天地炙我的骨，熏我的肉。我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我必须拿起笔来。否则我会让火烧死我自己。这样我写了长篇小说《火》，也写了《还魂草》和其他两个短篇（《莫娜·丽莎》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写的）。我拿笔的时候，我觉得满腹正义的控诉要借我的笔倾吐出来，然而写在纸上的，却是这几篇散漫无力的东西。它们不像控诉，倒像呻吟。我失望地放下了笔。

放下笔，我又感到窒息，我又感到胸腹充塞。愤恨仍然像烈火似地在我的心里燃烧。似乎我的笔并没有把堆积在我心上的东西吐出一丝一毫。

---

① 见鲁迅著《野草》的《题辞》。

然而我并不灰心，我要用我这管秃笔继续写下去。希望有一天我会用我的笔扫去“空虚”，写出“充实”来。

那么现在让我暂时向读者诸君告别罢。

巴　金 1942年1月在桂林。

莫娜·丽莎*

"你看这个外国女人美不美?"朋友林喝完了他面前那盆俄国菜汤,忽然侧过头望邻桌,暗暗地指着一位女客问我道。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想:你倒有这种闲情!这个朋友刚从被日本飞机轰炸过的地方跑到上海,两个钟点以前才离开那个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南站,并且还让人把他的绸大褂撕破了一块,现在倒很安闲地评论女人了。

"我看相貌也很平常,"另一个朋友淡淡地回答一句。

"不是,我说她有点像达·芬奇画的《莫娜·丽莎》①,"林感动地说。这时他似乎动了灵感。我想他一定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高射炮的声音晴空霹雳似地突然响了起来。饭店里起了小小的骚动,三个客人急急付了账走出去。林也忘记了莫娜·丽莎似的女人,只顾埋头吃面包。

那位女客还是安闲地坐着。她旁边坐了一个四岁左右的男孩。她正用叉子把一片番茄送进孩子的嘴里。她的脸上还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烽火》第二期。发表时题为《摩娜·里莎》。

① 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大画家,《莫娜·丽莎》是他的杰作之一。

露出微笑，但是这微笑总像带了一点寂寞味。

这个女人我在环龙西菜社里遇见过好几次。第一次她是和一个中国男子同来的。以后就只看见她带着孩子来吃饭。最近一个星期里，我每天正午都在这里遇见她。她带着孩子静静地坐在她常坐的那个座位，眼睛常常求助似地朝四面看，脸上露出带寂寞味的微笑。每次除了她跟茶房或者孩子低声讲一两句话以外，我不曾听见她跟谁说话。

长长的脸看起来很纯洁，棕色的头发垂下来梳成两根小辫子，一对大眼睛天真地闪动着，在白色长袖的衣衫上罩了一件绛色的马甲似的衣服，——这一切使她更像一个少女，而不像是那个孩子的母亲。

我不能断定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连她的国籍我也不知道。她讲话讲得那么少，而且声音那么低，我甚至听不出她讲的是什么一种语言。所以对于林的议论，我并不表示意见。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心肠注意这种事情。我们走出饭店，我就把她忘在九霄云外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那个饭店。这次我是一个人。那个外国女人已经在那里了。她看见我，似招呼非招呼地对我一笑，显然她还认得我。我看她那种神情，好像她迫切地需要朋友的帮助似的。我淡淡地对她打了一个招呼，便拣了靠窗的一个座位坐下了。

孩子顽皮地缠着母亲要求什么事情，母亲俯下头对孩子解说。孩子忽然发觉我在看他，他害羞起来，扭着身子要把脸藏在母亲的背后。做母亲的微微笑了，她抬起头善意地对我

一笑，嘴微微一动，像要说什么话，但是并未开口，她又把嘴唇闭紧了。

我一面喝俄国菜汤，一面奇怪她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会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我自己实在不能解答这个疑问。其实也用不着我解答了。我听见她在说话，而且说的是一种我能了解的语言。

她正在跟茶房讲话。她说法国话。而那个茶房所能懂的除了中国话以外，就只有英俄两种语言。她也可以说几个中国字，但是意思很难懂。所以她跟茶房谈了半天，还不能明白彼此的意思。茶房很着急。她的脸也红了。我听懂了他们两人的话，再也忍不住，便自动地出来做了译员。

原来她在这个饭店里包伙食，到今天还没有满期。她就要到别处去，需要把这里的事情结束。我使他们明白了彼此的意思。我帮忙她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她含笑地向我道谢。

我看见现在有一个机会了。我正想知道关于她的事情，我便趁着这个机会问她要到什么地方去，我想她大概不会拒绝回答。

她果然露出欢迎的表情邀请我坐到她那一桌去。我也不推辞，便端起面前那杯红茶走了过去。

"我要到杭州去，找我的丈夫。我姓孙，"她坦白地说。

我想起我见过的那个中国男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她的丈夫。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只见过他一面。不过我仿佛记得，年纪不到三十，相貌平常，只有两只眼睛跟一般人的不同，它们光芒四射，给整个面孔添了光彩。

她接着说："我的丈夫你大概在这里见过。以前我们每个星期天总到这里来吃饭。他每个星期六都回家，从没有间断过。"她停了一下，侧头看看她的孩子，孩子坐在椅子上注意地听她说话，连动也不动一下。我无意间瞥见了孩子的眼珠，不觉吃了一惊。它们已经是那么明亮的了！我明明在他父亲的眼睛里见过这样的眼珠！

"然而我有两个星期没有得到他的信了，"她带了焦虑地说。"他连一个信也没有！他从来不是一个这么疏忽的人，一定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要找他去。"

她说了这些话，我始终不知道她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着急。我便问道："孙先生在杭州做事情罢？"

她听见这句问话，脸上忧虑的表情立刻消失了，代替它的是得意的神气，显然她是以她的丈夫的职务为骄傲的。她说："他是一个空军上尉。他驾驶飞机的本领很高强。他平日就盼望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常常说要给'一·二八'① 以来那些无辜的被炸死者报仇。现在机会来了。"

孩子听见母亲的话，忽然从椅子上跳下来，缠住母亲嚷道："妈妈，我要看爸爸驾飞机打仗。"

"不要响，等一会儿我就带你找爸爸去！"她侧着身安慰孩子。孩子不作声了，却偎着她站着。她又抬起头跟我讲话。她的脸不像方才那样地发亮了。她低声说："我知道他会做到

① "一·二八"：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开始的上海地区的抗日战争。

那样。现在机会来了，他会像别人一样地尽职的。他常常说，血的债要用血来偿还；又说，他要用他的血洗干净过去的耻辱。我害怕我到杭州去也找不到他。他也许不在杭州了。昨天听说中国飞机被打落一架，驾驶员落在敌人阵地上不肯投降，他打死了几个敌人然后自杀。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姓名，但是我疑心这是我的丈夫。先生，你也知道这个消息吗？"

"是的，我也在报上看见，的确是一个勇敢的人！"我只能这样地回答。

"我想一定是他！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她忽然睁大眼睛兴奋地说。

"那不见得就是孙先生，我想他大概是安全的。我希望你在杭州找到他，"我压抑住奔腾的感情，安慰她道。

她摇摇头微笑了。这是悲愤的微笑，这是痛苦的微笑。她说："先生，你不要以为我就只知道个人的幸福。我们法国人和你们中国人一样，也知道爱自由、爱正义的。我们从没有在强权下面低过头。"她马上又改正地说："其实我现在也是一个中国人！我能够做每个中国女人所能做的事。我也愿意我的丈夫为着他的同胞的幸福牺牲。现在整个的中国怒吼起来了！这正是用血偿还血债的时候。要是我的丈夫真的牺牲了，这正是他的幸运。我会好好地教育孩子。这个孩子很像他的父亲，他将来也会做他的父亲所做过的事。我相信抗战一定会继续下去，一直到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得到解放的时候。"她愈说下去，态度愈激昂，脸发红，两只眼睛发亮。她像一个雄辩的演说家，她的话点燃了我的热情。

我想说话表达我的感情，但是我的心跳得太厉害，我突然变成口吃了。这时孩子在旁边催她，她站起来，不等我说话，就伸出手给我，一面说："再见，我走了。谢谢你。我们将来一定可以再见的。"她停了一下，又加一句："在更好的情形里。"她鼓舞地对我一笑，在她那对大眼睛里，我看出了乐观的表情。

"在更好的情形里，"我感动地紧紧握住她的手，喃喃地念着这句话。我还想挽留她，但是她匆忙地牵着孩子走了。我痴痴地望着玻璃门。那两根棕色的小辫子还在她的脑后晃动。

以后我就没有看见她了。过了两天，朋友林和我再到环龙西菜社去。他喝完了红茶站起来的时候，忽然记挂似地说："怎么今天没有看见莫娜·丽莎？"

"莫娜·丽莎？"我惊讶地问，我还不明白他在指谁。

"你不知道？不要装蒜了！"他讥笑地说。

我并不理睬他。我在想一件事情。两根棕色的小辫子又在我的眼前晃动。我记起了一个法国女人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1937年9月8日在上海。

还　魂　草*

一

敏，五年了，自从那封报告窗下的故事的长信以后，我没有给你写过一个字。每天黄昏，我沿着那条通过这个小镇①的公路散步的时候，我望着四周逐渐加深的夜色，我曾经想过许多友人的事情，可是我没有一次想到你。你看，现在轮到我把你忘记了。我不再像五年前那样成天坐在窗前空等你的信了。

然而今天在林那里拿到你托他转给我的短笺，你的潦草字迹像熟朋友似地招呼我，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那些时候的事。你的方脸带着亲切的微笑浮现在我的眼前，还是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就像你昨天才离开我似的。我跟林谈起你，谈起你那几件使我感动过的事，我们谈得十分高兴，仿佛就和你坐在同一间屋子里一样。

傍晚，我离开了林，在汽车站等了半个多小时，才挤上最后一班车子，匆匆赶回小镇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月一月十五日《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一期。

① 小镇：指重庆郊外的沙坪坝。

车上堆满了人，我不但找不到一个座位，连踏脚的地方也还是费了大力争来的。在这个山城①里，天黑得很早，车开出去时，我的近视眼睛就看不清楚车上的面孔了。车里没有灯，乘客们用谈笑和推挤来驱逐黑暗。

车开出了热闹的街市，就开始颠簸起来。它像一只受伤的猛兽发狂地跳着，呻吟着，在黑暗中奔跑，并不管我们这一车客人的舒适和安全。

我给颠簸了将近一个钟头，仿佛骨头都抖得松开了，最后装满一脑子的给搅乱了的思想，回到家里。我带着疲倦的身子走上楼，进了那个凌乱地摆满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的房间，把手里拿的小包随便往桌上一放，就在床上倒下来。从对面楼房射过来的灯光在我这个房间里撒下了一些影子。

我躺着，我半睡半醒地躺了好一会儿，没有人来打扰我。虽然楼下正街上响着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一辆庞然大物似的大卡车隆隆地在我窗下走过，我仍然安静地躺在原地方，不曾移动一下。直到一个小女孩的清脆的声音从楼梯上送进房里来，我才动了动身子，发出含糊的应声。

"黎伯伯，你的信来了，快开灯！"孩子快乐地叫着，她站在房门口，手里挥动着一件白色的东西。

我站起来扭开了电灯。孩子马上向我跑过来，口里还嚷着："你的信，快拿去看！"略带黑色的宽脸上闪耀着一对漆黑发亮的大眼珠，嘴带笑地张开，让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全露在

---

① 山城：指重庆市。

外面。她把信递给我以后，小小的手伸起来指着她的浓黑头发，得意中略含一点羞惭，说："你看，好不好？"发光的眼睛望着我的嘴，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回答。

我手里捏着信，眼光却跟随那小小手指射到她的头上去，一只红缎子扎的大蝴蝶伏在她搽了油的乌亮头发上，映着电灯光发射出眩目的光彩。

"好看得很，"我带笑地称赞道，又问一句："哪个给你戴上的？"

"妈妈，"她说着又笑了，昂着头笑得阖不住嘴。"妈妈给我在做新衣服，爹爹要给我买新鞋子。黎伯伯，你给我——"她抿着嘴笑，不再说下去。

我看见那一脸天真的表情，觉得这一天的疲倦都给她的笑吹走了，我高兴地问她："利莎，你说，黎伯伯给你做什么？"我还以为她在向我讨什么东西。

"黎伯伯，你给我讲故事，讲些好听的故事，"她拉着我的手，央求地说。

"现在就讲？我肚皮里没有那么多好听的故事，怎么办？"我说着把手放在她的柔软的发上轻轻地抚摩着。她这个意外的回答使我非常满意。

"那么你明天讲，妈妈说你会写文章，肚皮里头故事一定多得很。"

"妈妈骗你的。你找妈妈讲罢，她会讲，"我故意推辞说。

"妈妈也讲，你也讲，你的故事好听。你今天想一晚上，明天就好讲罗。你给我讲故事，我给你送信——"这时她妈妈在

楼下唤“利莎”，她还往下说：“你不在家，我把信给你检得好好的。”

我不能再拒绝她了。我望着她那一开一阖的小嘴，望着她那发光的黑眼瞳，望着她那天真的笑脸，望着她头上那只微微摇动的红蝴蝶，我觉得接触到一个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

“我讲，我讲，”我感动地、愉快地答道。

她妈妈又在下面唤“利莎”。她高声应了一句“来罗”，便放开我的手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她还回过头来嘱咐我：“黎伯伯，不要忘记，明天要讲个像还魂草那样好听的故事啊！”

“哪里有那么多还魂草的故事？你还想听得哭起来吗？”我望着她那一跳一跳的背影带笑说，但是她已经跑出房门听不见了。过了一分钟的光景，她的铃子似的声音又在楼下响起来。

敏，你该记得还魂草的故事，这是我们大家敬爱的一个年长朋友根据民间传说改编的。我第一次听到它时，还是同你住在一起。那天在我们那个房间里，林带了他的五岁孩子来，孩子缠着年长朋友讲故事，年长朋友就讲了这样的一个。将自己的血培养一种草，长成了就用它去救活一个死去的友人。这生死不渝的深厚的友情不仅使林的孩子眼里绽出泪光，连我们也被感动得许久说不出话，只能默默地互相注视。年长朋友的颤动的声音停止了，他埋下头，不看任何人，他的光滑的秃顶和发红发亮的鼻尖，在透过玻璃窗斜射进来的午后阳光下微微摆动。这个情景我至今还不能忘记。

现在林的孩子早已进了初中，年长朋友还在一个南方乡

村里过着他那苦行者的生活，只有你一个人像一阵风来去不留一点踪影。但是今天你的信也来了。跟着你的信，跟着利莎口中讲出的"还魂草"三个字，那个难忘的情景又在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

我拆开利莎送来的信，这正是那个年长朋友寄来的，而且意外地我在信封里发见了你写给我的另一张短笺，笔迹和字句跟我下午拿到的那张极相似。显然是你担心一张纸不容易到我手边，才写了同样的信函托不同地方的友人给我转来。

我拿了你的短笺反复诵读。我愿意把每个字都印在我的心上。我感激你关切的情谊，我知道自己判断的错误，这几年来你并没有忘记我。在你那忙碌的生活中，你还时时在打听我的消息。可是我却像石人一样地沉默了。我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惭愧。

过去的错误无法挽回，不过我还能够不让这样的错误继续下去。所以我趁今晚上电灯还亮着，又没有别的事情绊住我，就坐下来给你写信。我预备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要详细地告诉你我最近的生活情形。

写到这里我迟疑起来了。关于我最近的生活，我应该从什么地方写起呢？又应该写些什么呢？

我抬起头茫然望着窗下的街景。斜对面一家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带着那些绚烂的红绿颜色最先闯进我的眼睛来。在那两个雪亮的橱窗里展览着各种各类的上海奢侈品。这些东西放在任何一个女人的身上都会给她增加美丽，如今却寂寞地躺在受过敌人炸弹蹂躏的街中，向这战时小镇的居民夸耀

它们的豪华了。然而被挤在两个大橱窗中间的大开的门却并不是冷清清的，也有不少的人从那里进出。我还可以瞥见柜台里的店员将包好的物品递给顾客。紧靠着这个百货商店的是一家糖果铺。它即使不是这个小镇上生意最好的一家，也应该被列在最赚钱的商店中间。它的玻璃窗里并没有雪亮的电灯，每天早晨窗内木板上总是摆满了面包和点心，但是一到晚上就只剩下白色木板空望着行人。一天从早到晚总有许多客人拥挤在这个糖果店里，等着店员们的忙碌的手包扎东西。甚至在一个红球挂出以后，这家店铺也无法立刻送走纷至沓来的顾客，早作疏散的准备。

我再把眼光移到街中，接连一个星期的小雨以后遇着两个晴天，泥泞的道路已经变成干燥的了。大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一对一对地走过，仿佛都带着闲适的表情，他们中间不时发出愉快的笑声。在街中谈笑的还有一群一群的穿制服和棉大衣的中学生，所谓一群也不过是三四个到六七个，男的和男的走在一起，女的也爱和女同学结伴。中学生的脚步下得比较快，他们还喜欢向两旁店铺张望。带着儿女逛街的中年夫妇和饭后出来散步的大学教授、中学教员、银行职员以及公务人员也不时在人丛中出现。现在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

我的眼光还在往前面移，它又跟着一部分人进了一家卖面兼卖甜食的铺子。这个小小铺子也是镇上生意兴旺的商店之一，一早一晚总有好些人站在门前，用迟疑的眼光朝里面望，不能决定是否要为一碗面、一碗藕粉或者一瓶豆浆等若干时候。这个铺子和那个百货商店隔得不远，中间不过四五家

店铺，在它的紧隔壁是一个卖火锅豆花的小馆子，一幅白布幔子代替了玻璃窗，人头与火炉的影子"牛皮灯影"似地映在布幔上面。

敏，你看我这趟野马跑得多远，我的笔跟着我的眼光走了这一大段路。我竟然唠唠叨叨地向你描绘这个小镇的街景，这些跟你那忙碌的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想知道的不就是我的近况么？

不过说到我的生活，朋友，你想不到，这些琐碎事情也是跟我的平凡生活分不开的，它们成了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小点缀。譬如说那个百货商店，我为了买利华药皂和三星牙膏曾做过它的顾客；在有警报的日子，我在进防空洞以前或者从防空洞出来，也进过糖果店买面包、饼干。我常常吃那个面馆的红烧面当早餐。朋友们从城里来看我的时候，我和他们也曾在茶铺、面馆、豆花店里消磨过一些光阴。

说起茶铺，我应该告诉你，在这个小镇的正街上，有五家茶铺。我每天总要在那些地方度过一部分时间。我的确喜欢这里的茶铺，要是没有它们，我恐怕会闷死在我这个充满煤臭的楼房里。最大的一家，正如它的招牌所表明的，是一家"茶楼"。在一个宽大的楼厅里放了十几张红漆方桌和六七十根红漆板凳。从那些挂满墙壁的对联上，人看得出来这是本地××会① 集会的场所。不过集会的日子不多。平时一个楼厅里常常只有寥寥十多个茶客，大半是大学生，一个人占据一

① ××会：本地的流氓集团。

张桌子，堆满了纸和书，一碗茶便可以消磨他三四个钟头，他们借这个地方来温习功课。此外有的人则是在这里会朋友商量事情。茶楼下面便是长途汽车站，站内虽有一条供乘客用的长凳，却也有少数人喜欢坐在楼上喝茶等车。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多。除了星期天，早晨和午后茶楼上照例非常清静，黑脸堂倌闲得在柜台里打瞌睡。有时茶楼上就只有我一个顾客，我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一本书上面。或者那个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慢慢地走上来要一碗沱茶，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喝了许久；或者三层楼上那个奶子高高、脸色黄黄的丫头走下楼梯讨一点开水，同堂倌讲几句笑话；或者那个大学生带着笔、墨、砚台、稿纸要一杯绿茶和一杯菊花坐在窗前写文章，他们都不会给我搅乱书本中的世界。可怕的倒是隆隆的汽车声，它使得墙壁、楼板、桌、凳都发生了震动。汽车在楼下经过的时候，我就仿佛立在颠簸的船中，船外扬起的不是浪波，却是尘雾。我如果不转眼地望着窗户，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大股大股的尘土从窗外直扑进来。靠窗的几张桌面立刻铺上薄薄的一层土。

我知道一辆汽车从附近一个市镇开来经过这里往城内驶去了，或者是从城里开往那个市镇去的汽车。它们每天来来往往经过这里至少有二三十次。那种仿佛要震破人耳膜的春雷似的车声，常常从早晨七点钟响到夜间六七点。车轮那样忙碌地奔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喘息。连扑进窗来的每粒沙尘也仿佛带着热气似的。你看，我们就是在灰尘中生活着的。

敏，你不要因为这个皱起眉头。其实在我住的那个房间里情形还要更坏。我的书桌就放在窗前，窗上玻璃被五个月前落在这条街上的炸弹全震破了，现在补上了几块，也留着几个空洞。即使没有大汽车经过，只要起一阵风，大股的尘土就会从这些空洞灌进房里来。要是在晴天有阳光，我还可以看见灰尘在空中飞舞。

我住在一个朋友开的书店的楼上。关于这个房间我可以告诉你许多事，许多你想不到的事。这里原是所谓“双开间”的铺面，楼下却被一家菜馆先租去了一间，书店左边也是一家同样性质的兼卖“小笼包饺”的酒菜馆，所以它不得不夹在两个酒菜馆的当中。在酒馆的屋檐下，就是在人行道上，每一家安放着一个圆形的大炭炉，从早晨到傍晚它们不断地喷出带煤臭的烟，还有燉在铁锅上的蒸笼缝里也不时冒出白色的热汽。倘使笼盖一揭开，这附近就仿佛起了云雾，大股的热汽同煤烟混在一起直往上升，被屋檐阻止了，折回来，就从窗户的空洞大量地灌进楼房里。这时人在房中也会看不清楚他四周的东西。他要是努力睁大眼睛想看穿烟雾，他的眼珠又会被热烟刺痛。这并不是我的夸大的描写，在每个早晨，情形的确是如此。早晨便是烟雾最猖獗的时期。

我现在给你随便描写一段我早晨的生活：

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把我惊醒了，我睁开眼睛，只看见白色的烟雾一股一股地从玻璃窗的空洞里灌进来，好像决了堤的水，很快地就淹没了整个房间，留给我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楼板和墙壁全起了震动，同时好像有什么人在我耳边大

声叫喊。我觉得整个头都在嗡嗡地响。过了片刻，汽车去远了，我的脑子才跟着楼板、墙壁等等慢慢地静下来。

我坐在床上，揉着眼皮，然后戴上眼镜，努力看那些被淹没在白雾中的房内陈设。起初我看见白雾在翻腾，在滚动。后来颜色渐渐地淡了，烟雾也逐渐散去。书桌、书架、书柜、木床、木凳开始清晰地浮现出来。房里就只有这些简单的家具。

我下了床，穿好衣服，走到窗前，那股熟悉的似乎会使人肺部烂掉的煤臭一下子就扑上脸来。我几乎要发恶心，连忙掉转身抓起脸帕和肥皂、牙刷等等匆匆地逃下楼去。

倘使在星期日，那么我睁开眼睛，常常会看见利莎站在我的床前，她一对黑黑的亮眼珠不住地在滚动，宽脸上现出天真的微笑，她捏着一根纸条搓成的细捻子，好像要用它来透我的鼻孔。

"利莎，你又在做什么？"

她扑嗤笑起来："黎伯伯，我轻轻喊你，总喊不醒。"

"你这个顽皮孩子，你哪里是喊我？你明明要透我的鼻子，"我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

"真的，我没有透；我要透，你早就打喷嚏了，"利莎声音清脆地分辩道，两排白牙齿在我的眼镜片上灿烂地发光。她又说："妈妈说黎伯伯晚上写文章睡得晏，喊我不要吵你。我今早晨来过几趟，黎伯伯，你都没有睡醒，我想起妈妈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吵你。"

我伸起手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她说的是真话。有两回她用这样的纸捻子透得我接连打喷嚏，但这还是我来这里不久

刚和她玩熟了时的事情。在这以后她就只拿着纸捻子在我的脸上晃，却没有下过一次手。

"黎伯伯，起来罢，时候不早了，今天天气好，你带我出去走走。"或者——

"黎伯伯，起来，下楼去吃点心。"或者——

"黎伯伯，洗了脸，给我讲个故事。"

如果我问她："你怎么不去上学？又逃学吗？"

她便会回答："今天星期天，你还不晓得？我从不逃学的。黎伯伯，你乱讲！"她还用一根小指头威胁地指着我的前额。

这个孩子有时活泼，有时文静，喜欢用思想，重感情，记性也很好，读书不算太用功，但也不会偷懒，逃学的事情的确不曾有过。我喜欢这个九岁的孩子。

昨天是星期日，早晨我又被她的喜悦的声音唤醒了。她拿着一张纸和一管蘸饱墨汁的小字笔央求我："请你给我写两个字。"

"什么字？"我奇怪地问道，就把笔和纸接过来。

"秦家凤，家字我会写，"她又慢慢地把那三个字重念一遍。

"秦家凤，就是你那个好朋友，梳两根辫子的小姑娘吗？"我带笑问道，便给她写好那三个字。

"就是她，"利莎笑答道，把右手第二根指头放在嘴上。

"你写她的名字做什么？是不是你要给她写信？"我又问道，还把那张纸拿在手里。

她从那件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

拿在我眼前一晃，又笑嘻嘻地放回袋里，然后说："她讲过今早晨来耍，现在还没有来，我写封信去请她来。"

"你们真是好朋友，一天也舍不得分开，"我故意跟她开玩笑。

"黎伯伯，你才是我的好朋友，你讲故事给我听，"利莎似乎有点不好意思，笑着把头一扭，分辩道。她忽然把我身上的棉被往下面一扯，等我连忙伸手拉住，半幅棉被已经离开我的身子垂到楼板上了。她得意地说一句："黎伯伯，快起来！"就回头往房外跑去。我听见她还在楼梯上大声嚷道："黎伯伯，谢谢你啊！"

不到两个钟头，秦家凤来了。这两个女孩亲热地并肩坐在楼下靠书橱的一张方桌旁边，头挨着头专心地翻看一本画报。

我从外面回到书店里，经过那张方桌，忍不住打岔地叫了一声："利莎。"两个年轻的头立刻抬起来望着我。利莎的宽脸上现着欣喜的微笑，她满意地对我霎霎眼睛。另一张瓜子脸上也绽出笑容，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很有礼貌地唤一声"黎伯伯"，点一下头，两根用红绸带扎的小辫子又垂到了脸颊旁边。

我没有别的话好讲，便说了一句："利莎，你好好地陪你秦姐姐耍啊。"

"我晓得，"利莎点头答道。

我上楼去写了一封信，是写给一个远在国外的朋友的，不过短短两张信纸，却花了我不少的时间。我在书桌前几次站

起来又坐下去，刚埋下头又会抬起来。还是煤臭在折磨我。这气味不断地从窗的缺口飞进来，就贴在屋内每一件东西上面，许久都不散去，使得书桌、信笺、钢笔都发出了那种似乎搔痛人心肺的恶臭。好像有一把钝刀子在我的心上用力刮来刮去，使我发出好几声呛咳，才把信写完。

我拿着封好的信和一本没有读完的书大步走下楼去。我打算把信投到邮筒里，然后到茶楼去消磨一两个钟头。

在楼下我又遇见那两个女孩。她们现在不是坐在方桌旁边板凳上看画报了，她们坐在店门口两个小竹凳上唧唧哝哝地谈着闲话。我站在后面想听她们谈些什么题目。她们似乎在谈学校里和各人家里的事。利莎忽然注意到站在她们背后的是我，并不是一个买书的顾客，便唤声"黎伯伯"，秦家凤立刻把她那滔滔不绝的小嘴闭上了。

"你们怎么不再往下讲？"我含笑问道。

秦家凤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她只是微微一笑。

"黎伯伯，你不好，你在偷听我们讲话，"利莎撒娇地说。她站起来，拉住我的一只膀子要我出去，还说："你快去看你的书。我们等一会儿到茶馆里头找你。"

我笑了笑，也就走开了。这天茶楼上的人相当多，四分之三的茶桌都被人占去了。恰好靠窗右边角里那张桌子空出来，我便坐到那里去。

满个茶楼都是谈笑声。几个学生模样的人在打"桥牌"。纸烟的灰白色烟雾在空中缭绕。我摊开书，把注意力慢慢地集中在另一个世界上面。书一页一页地在我眼前翻过。突然

一个清脆的笑声在我旁边响起来。我吃惊地抬起头。在我的正对面两张年轻的笑脸灿烂地发亮，我心里一阵爽快，这意外的阳光把我从那个充满阴郁气氛的世界中救出来了。

还是袁利莎和秦家凤那两个孩子，她们真的来了。

“黎伯伯，吃花生米，”利莎说着就送过一把花生米来。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吃不吃茶？”我吃着花生米，含笑问道，我想把她们留在这里。

“不吃茶，我们刚刚吃了茶来的，”秦家凤客气地说。薄薄的嘴唇包了一嘴的笑。

“黎伯伯，你好用功啊。我们来了好半天你都没有看见。要不是我笑出来，你还不晓得，”利莎得意地嘲笑道，“黎伯伯，当心你要变成一个书呆子啊。”

我立刻把书阖上放在一边，望着她们说：“我现在不看书了。你们坐下来，我们好讲话。大家都不开玩笑好不好？”

“利莎，你看黎伯伯有点怕你了，你快坐下罢，”秦家凤抿着嘴笑道。她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利莎也就在我右边那根凳子上坐下了。她望着我霎霎眼睛，央求地说：“黎伯伯，我们坐下来了。你给我们讲个故事罢。”她说完，又看看秦家凤说：“秦姐姐，你不是来听黎伯伯讲故事吗？”

我把手在利莎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故意做出责备的样子说：“就是你一个人花样多。”

“黎伯伯，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我也是来听你讲故事的，”秦家凤连忙解释道。她亲密地看看利莎。利莎也向着她微微

点一下头。

我把这两张脸上的表情看了一阵。她们说话就像鸟在唱歌，利莎的声音稍微高一点。脸型虽然不同，不过表情却有点相似，只是利莎多一点稚气，秦家凤已经十岁了，略带一点沉静的大人气。此外，纯洁、善良、友爱等等，两张脸上都有，而且两张脸同样充满着朝气，好像早晨刚刚开放的花朵。

“黎伯伯，你不讲，却老是看我们做什么？”利莎不能忍耐地问道。秦家凤不做声，故意把脸掉开看墙上的对联。

“我在想，想好了就讲的，”我顺口答道，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还魂草的故事。故事里面不是也有两个像这样年纪的孩子么？他们不也是像这样亲密地过着日子么？

我把这个故事对她们讲出来。起初她们听见我讲起两个孩子的友情，还以为我是在拿她们开玩笑，后来跟着我的叙述她们看见那两个孩子长成了，友情跟随岁月增加，两颗热烈的心连结在一起，两个人用同样的脚步，到四处去找寻那个普照万物、永不熄灭的明灯。……她们的笑容没有了，利莎靠近我的身边来，秦家凤也移到利莎的旁边。两对眼睛都钉在我的嘴上，她们差不多连气也不吐地静听着。我还看见利莎的右手被捏在秦家凤的手里。

我继续讲下去：两个人永远不停脚地走过许多地方。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夜里，在黑暗的荒山中，两人中的一个跌在岩石上受了重伤。另一个人用尽方法仍然不能挽救朋友的性命。在那个时候据说有这样的一种还魂草，人把它捣碎放在死人口里，可以使死了的人复活。这种草生长在荒山中，并不难

找到，不过要用活人的热血培养，它才会长成粗大的叶子，就可以用来救人。这个人把还魂草找到了，他带回家里，栽在花盆里面，每天早晚用锥子刺出自己身上的血来浇这棵草，在一个星期以后就用草救活了他的朋友。

敏，你知道，故事的结局并不是悲惨的，两个人终于找到普照一切的明灯，给这个世界添了无限的温暖。不过我讲到那个受伤的友人临死的情形，我自己也受到感动，我的声音颤抖起来。我几次差一点讲不下去。我闭上嘴，吞一口吐沫，我就看到面前两个女孩眼里的莹莹泪光。秦家凤频频地埋下头用手绢揩眼睛，她的另一只手仍然把利莎的右手紧紧捏住，而且似乎捏得更紧。利莎好几回掉头看她的朋友，两双泪眼对望一下又掉开，我不知道她们用眼光表达些什么意思。

"我不再讲下去了，我把你们都说得哭起来了，这有什么好处?"我的叙述逼近故事的结尾时，我忽然中断地说。

"你讲，你讲，不要紧的，"利莎抓住我的袖子央求道;"我们真没有哭。"

"你还说没有哭，你看，你眼睛里是什么东西?"我指着她的眼睛说。

利莎的脸立刻红起来。她揉揉眼睛分辩道:"我不是哭。人家心头有点不好过，不知不觉地眼泪水就流出来了。"秦家凤放开利莎的手破涕一笑，她不好意思地掉开头，索性用手绢把眼泪揩去。

"不要害羞，这样的眼泪是很好的，"我感动地对她们说;"我像你们这样大年纪的时候，我听别人讲故事也哭过。"

两个小小的头默默地点了一下，还是利莎先开口："黎伯伯，快讲啊，还有好长吗？"

"快完了。你们看那个朋友已经救活起来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你自己编一点也好。你不是很会编故事吗？你写了那么多的书，"利莎说。

敏，这次利莎的话说准了，还魂草的故事里面已经加进了我的感情，我随讲随编，加了好些描写和叙述，而且给这个故事换了一个更乐观的结局。说完故事的最后一句，我望着她们嘘了一口气，我看见两张年轻的脸上都笼罩着一种明彻无比的微笑，我觉得一股热气进了我的心中，很快地我全身都感到了温暖，我感激地微笑了。

利莎站起来，轻轻地对秦家凤说："秦姐姐，我们回去罢。"她拉开板凳，提高声音笑容满面地对我说："黎伯伯，谢谢你啊。"秦家凤的瓜子脸也向着我点一下。于是两个孩子手牵手地往楼梯那边跑去了。

过了一阵，又是那两个女孩子来唤我回书店去吃饭。在饭桌上她们两个坐在一边。利莎还常常替秦家凤挟菜。秦家凤先放下碗，等着利莎吃完，才一起离开桌子。两个人又手拉手地往外面去了。

敏，以上的话全是两天以前写的。我从晚上一直写到夜深，写到同房间的人睡醒了一觉再睡的时候，才放下笔，折好那些作为信笺的稿纸。但是我的一双腿已经冻到几乎不能够

动弹了。

第二天我便因为受了寒躺在床上爬不起来。我没有吃东西，没有看书，静起眼睛在床上想了一天的事情。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总有你那对炯炯的眼睛在向我注视。敏，你看，我何尝忘记过你？我忽然又想起了你五年前对我说过的话："你要好好地照顾自己，你也该学会忍耐。"的确，我现在已经学会忍耐了。

这天朋友夫妇都来看过我，但是来得次数最多的还是那个小利莎。她上午回家听说我病了，马上带着书包来看我，问我病得怎样，又问我要不要吃东西。她絮絮地向我讲她在学堂里看见、听见的一些事情。看见天真善良的小小脸上的笑容，我仿佛受到春日阳光的抚摩，我心上的郁结全消散了。

她忽然停住嘴，向窗外一看，一团一团的白汽在窗洞口盘旋，她把嘴一噘，生气地自言自语："又是煤臭，真要把人熏死！"她回过头，赌气似地对我说："黎伯伯，这个地方真不好，我们应该搬家。你看，你生病，他们还要熏你。"

她说的是真话。煤臭，煤臭，两个炉子放在窗下，一边一个，早晨生火的时候用烟来熏我们；包饺出笼的时候，用带油香的蒸汽来闷我们；而且整天用那无孔不入的煤臭来刮我们的心。

"搬家？找不到房子，又搬到哪里去？要是有房子你父亲早就搬开了，"我苦恼地答道。

"包饺一笼，排骨面三碗！"粗大的声音在楼下喊起来。这也是人的声音。为什么人对人这样残酷呢？难道我们同他们

中间又有过什么仇恨？无怪乎这个孩子又愤愤地说了：

“他们也是人，为什么这样不讲理？不过多卖几个钱，却不让人家舒服。爹爹向他们办交涉，总讲不好！”

不错，我那朋友同楼下两家酒菜馆的主人办过交涉，请他们把炉子移到店铺里面，不要放在人行道上，却遭他们严辞拒绝。后来实在受不住烟熏，朋友又到镇上警察分署去请求设法。那位制服整洁的讲湖北话的巡官亲自来书店调查了一通，客气地吩咐朋友写一张呈文递上去。这张呈文费了朋友许多天的功夫，呈文上去以后，到现在还没有下文。我们仍然整天受着煤烟熏炙。朋友那个新生的男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养育起来的，现在开始呀呀学语了。

“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一般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知道顾自己，不会想到别人。你爹爹态度不够硬，又是随随便便，所以交涉总办不成功，”我说的全是牢骚话。敏，我知道你听见一定会责备我，我不应该对一个九岁小孩说出这种话。

“我不相信，我就不要只顾自己！黎伯伯，你说得不对，”利莎嘟起嘴固执地说。

我又一次接触到孩子的纯洁的心灵了。这比良药还更能够治我的病。我用感激的泪眼望着她。

“黎伯伯，你不舒服吗？怎么有眼泪水？”她忽然发觉了我的眼泪，又看见我痴呆地望着她，不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就蹲在床前关心地问道。

“没有什么，你说得很对，”我摇摇头说。

“你一定是不舒服。不要讲话了，好好地睡罢，”她像一个

大人似地吩咐我。

下午利莎放学回来，在下面跟她母亲讲话。我刚刚醒过来，觉得心里好受一点，听见她的清脆的、不带丝毫烦恼的声音，仿佛一阵温暖的微风迎面吹来，把全屋子的煤臭吹走了，我感到一阵爽快。

不久利莎走上楼来。她刚刚到门口，就嚷着："黎伯伯，你好些没有?"

"好些了。你放学回来了，"我高兴地说。

她敞开大衣，带跳带跑地到了我的床前。一只蓝地白点的绸子蝴蝶在她的头上微微地闪动。

"我跟爹爹讲过了，要他一定把隔壁开馆子的赶走，赶走了屋里头就没有煤烟了，"她像报告一个重要消息似地认真地说。她满意地微笑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的笑容，低声回答了两个字："很好。"

"黎伯伯，你今天吃过东西没有?"她又殷勤地问。

"我吃过一碗藕粉冲蛋，觉得很好，"我含笑答道。

"很好，"她学着我的口音说，自己也忍不住扑嗤笑起来；"黎伯伯，你真滑稽，不管什么，你总说很好，很好。生了病睡在床上也说很好。你看，满屋的煤臭，你难道也说很好?"她刚说到这里，一辆从城里开来的汽车逼近了我们的窗下，一阵轰隆的巨声带着灰黄的尘土扑进窗里来。她忽然发出一声呛咳，然后拿手绢揩了揩嘴和鼻孔，抱怨地自言自语："人家就不给你安静，一会儿是孔隆孔隆汽车开过来，一会儿又是排骨面儿碗。"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亏你还睡得着，你真能够忍耐!"

我吃了一惊。她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敏，你看现在连一个九岁的孩子也责备我能够忍耐了。不知道你听见会有什么感想？你猜我怎样回答她？

“在这种时候人活着就需要忍耐啊，”我的确是这样地回答她的，而且我还加上一句：“你小孩子不懂得。”

“黎伯伯，你不对，你动不动就说我们小孩子这样那样。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做过小孩子？”利莎噘起嘴不以为然地说。

我不答话，却望着她笑起来。

她要讲话，楼梯上一个叫声把她阻止了。声音不高，我一听就知道是秦家凤的，声音继续着，显然是那个女孩走上楼来了。利莎一边答应，一边往门外跑去。

又是两个孩子手拉手地走进来。“你上去就紧不下来，”秦家凤笑着埋怨利莎道。她快要走到我的床前，便站住，点一下头，唤了一声“黎伯伯”，又转过头望着利莎微笑。

“黎伯伯，秦姐姐听说你生病，特为来看你的，”利莎笑着说。

秦家凤便掉头朝着我接下去说：“黎伯伯，你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你啊，”我点头答道。

“黎伯伯，你不要着急，她今天不是来听故事的。不过你病好了一定要给我们讲故事啊，”利莎高兴起来又跟我开玩笑说。

“利莎，你不好，黎伯伯生病，你还要吵他讲故事，”秦家凤伸手把利莎头上那个蓝花蝴蝶整理一下，一面搭讪地说。

利莎掉转头对秦家凤闪闪眼睛，带笑分辩道：“你现在不

要在黎伯伯面前讨好。讲故事还不是归我们两个听？”她又回过头来看看我：“今天黎伯伯害病，就是你请他讲，他也不肯讲的。”

“我讲，我讲，”我毫不踌躇地接连说，我很高兴，她们给了我这样大的喜悦！我也愿意使她们满意。一个故事自然而然地浮到我的脑子里来了。我便开始说：“从前有一家人——”

两个孩子正在交换眼光。忽然利莎嚷起来：“我们现在不要听，我们现在不要听！”她笑着，秦家凤也笑着。两个孩子马上掉转身，手拉着手轻轻地往楼下跑去了。

我又睡了一觉，醒来时只听见隔壁房间里一阵唧唧哝哝的声音，我的听惯了喧嚣也听惯了寂寞的耳朵立刻分辨出来这是利莎同秦家凤两个人在那里讲话。她们的话似乎越讲越多，话中常常夹杂着笑声，仿佛两个人都很高兴。过了好一会儿，声音终于寂然了。两个人好像轻手轻脚地走出房来。我想她们一定是到楼下去，不过我也动一动头，把眼睛掉向着房门。

我这房门是终日终夜都开着的。这时忽然伸进来两张年轻的脸，黑黑的头发，两朵紫花旁边停住一只带白点子的蓝蝴蝶。两个人的发亮的眼光直往我的脸上射来。我忍不住笑了。

于是两个孩子又带跳带笑地奔进来，很快地就到了我的床前。

“黎伯伯，你今天睡得太多了，”利莎嘲笑地说。

“黎伯伯，我们先前还来看过你，你睡得呼呀呼的，”秦家

凤说了，自己抿嘴笑起来。

“我哪里睡觉？我只听见你们在隔壁叽哩咕噜吵了大半天，不晓得吵些什么，讲得那样亲热，”我也跟她们开玩笑道。

“黎伯伯，你说得不对。我们轻轻地讲话，又没有吵嘴，你怎么说吵了大半天！”利莎笑着辩道。

“这又算是我讲错了。你这个多嘴的小姑娘，我讲不过你。我只问你刚才我正要给你们讲故事，你们为什么一下子就跑开了，是不是嫌我讲得不好？”

听见我这几句话，两个人又互相望了望；利莎闪闪眼，秦家凤笑笑分辩说：“黎伯伯，不是啊。我们怕你讲累了，会翻病的。”

“妈妈说过，黎伯伯生病，不要再请他讲故事，”利莎连忙接下去说了这一句。

看见她们的充满善意和关心的表情，我只有感激地点点头，接连说了三个表示了悟的“哦”字。

“还有袁伯母要我们来问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秦家凤再说。

不等我开口，利莎就接下去：“我晓得，要一碗藕粉冲蛋。”她扑嗤一笑。

“利莎，你真聪明，猜得到我的心，”我也忍不住笑了，却故意称赞她一句。这时夜幕已经罩上天空，在对面楼房中电灯光黄黄地亮了，楼下酒菜馆里显得十分热闹，江苏口音的茶房大声嚷着：“五号的大红蹄、炒肉丝快点！”我也觉得肚子有点空虚了，便说：“那么你们下去的时候，喊人给我买碗藕粉冲蛋

也好。”

“我们现在就下去，我要回去了，”秦家凤对利莎说；然后她望着我，“黎伯伯，我回家去罗，下回再来看你。”

“好，谢谢你，放学时候再来耍啊，”我点点头说。

“秦姐姐，你看黎伯伯真客气，还在说谢谢你，”利莎笑起来说。秦家凤也笑了。

“我要来的，我还要来听黎伯伯讲故事，”秦家凤说，向我行一个礼，就牵着利莎的手走了。

少了这两张发光的笑脸，房里顿时阴暗起来。夜吞没了我的房间。但是我的心和我的身体却是很暖和的。我不扭开电灯，黑暗可以帮助我思索，我在床上翻来覆去想了许久。

还是利莎端了藕粉上来给我开灯的。

这个晚上我睡得早，而且睡得很好。心里非常坦然，一切暗影都消散了。没有噩梦。夜在我的安静的睡眠中过去了。

早晨我又被利莎唤醒。这是意外的事，因为今天不是星期日。利莎站在床前，使劲地推动我的头，惊惶地叫着：“黎伯伯！黎伯伯！快起来！”我睁大了眼睛。

“你快起来！爹爹跟下面吵起来了！快点！他们要拿刀来杀爹爹！”她两只眼睛惊恐地睁得很大，脸色也变成惨白，说话带点口吃，现出了很可怜的样子。

“你不要怕，不会有这种事情，他们绝不敢，”我安慰她说，即刻披起衣服下了床。我听见一个粗暴声音骂着：“娘操×，你有本事你就下来！”

“下来就下来！”我那个朋友气得声音打颤，接着橐橐地走

下楼去。

“快去，快去，”利莎又在催促。

“不要紧，”我一面说，一面穿好衣服同利莎一起走下楼去。我听见朋友太太在隔壁同娘姨讲话，便断定事情并不严重。

楼下店门大开，朋友同一群人往警察分署去了。我们再听不见争吵声。利莎的脸色也恢复了红润。她听见我问她要不要跟着去警察分署的时候，她不回答，却先问我：“黎伯伯，我忘记了，你的病还没有好嘛？”

“完全好了，你要去我可以陪你去。”

“你还没有洗脸嘛，”她望着我说，接着又自言自语：“偏偏不凑巧，张先生进城去了，黄子文又去买菜去。店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张先生是店员，黄子文是练习生，都是睡在我这个房间里的，张先生进城去批货昨晚没有回来。从她的脸色和语意我知道她盼望我陪她去，我便直截了当地说：

“等一会儿我回来洗脸也是一样。那么我就陪你去看你爹爹罢。”

“好，谢谢你！”她满意了。但是她还站在窗下仰起头唤她母亲，问道：

“妈妈，我跟黎伯伯去看爹爹去，好吗？”

她母亲从楼上窗里露出上半身来，小弟弟还抱在怀里。她温和地嘱咐道：“好的，不过你要快点回来啊，你今天还要去上学，不要耽误了。”

“我晓得，我晓得，”她答应着就拉着我的手走了。

在路上她简单地告诉我这件事情的经过：楼下左边那家菜馆生火，煤烟冒上来，完全灌进隔壁房间里，连小弟弟也呛得哭了。利莎的父亲从窗里向楼下讲话，要那个茶房把炉子搬动一下，茶房不肯，就吵起来。她父亲把一盆还未用过的脸水朝炉子上倒下去，火灭了，茶房的身上也溅了水。茶房便拿了一把菜刀出来，说要杀她的父亲，把书店大门的门闩都砍落了。因此她害怕起来。

"你真傻，杀一个人，哪里有这样容易！你看你妈妈都不着急！"我半安慰半嘲笑地说，伸手在她的头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她不作声，脸红起来，不过看脸色，我知道她的恐惧已经渐渐地消失了。她仰起头看看我说："黎伯伯，你没有看见他刚才那种凶相，那个不讲理的茶房——"话没有讲完，我们已经到了警察分署的门前，她便住了嘴。

这分署也是将就用一家商店的旧址改修的。只有两扇铺门开着，却被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堵塞了。我站在门口，除了一堆人头外什么都看不见。小小的利莎几次踮起脚，伸长颈项，也没有用。

里面各种口音在讲话，中间也有她父亲的声音。声音似乎很清楚，但是我仔细听去，却又连一句话也听不出来。不过我知道她父亲不会吃亏，便安慰她说：

"利莎，回家罢。看情形不会有什么事了。你爹爹就要出来的。在这里久站也没有用处，你还要去上学。"

利莎看看我，露出了失望的眼光。她嗫嚅地说："就再等

一会儿罢。”

我了解她这时的心情，便捏住她的手不再作声了。

不久她的父亲便从人丛中走出来。她看见他，马上扑过去，亲热地唤着：“爹爹。”我的笔形容不出她脸上的欢喜的表情。

“你跑来做什么？你不去上学？”她父亲含笑地频频抚摩她的头发。

“我怕他们会欺负你，”利莎偎着父亲，两只手拖住他的膀子，偏起头仰望他，亲热地说。

“不会的，这不过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朋友简短地回答，脸上浮出他常有的微笑。先前的怒气早已消散在九霄云外了。

在回家的途中朋友把交涉的经过对我说了。这次的交涉算是有了结果：署员吩咐茶房把炉子搬开。关于倒水的事，茶房要求赔偿，署员却说：“本来应该罚他五块钱，不过我已经申斥了他，他是读书人，受申斥比罚款还厉害，所以你也用不着再讲了。”这样就遣开了茶房。现在我们还可以听见茶房气愤地在后面乱骂，不过隔了十多步。我们走得并不快，他也不追上来。

“不对，不对，真正没有道理！”利莎愤愤不平地说；“爹爹，你没有一点错，怎么又怪你不是？”她又看看我说：“黎伯伯，我们再去讲去。”

“这不过是一句话，好在炉子的问题解决了，”她父亲还是满不在乎地跟她讲话，脸上依然带着和善的笑容。

我赞成利莎的话，不过我却摹仿她父亲的调子回答道："算了罢，再讲也讲不好的。现在且看炉子是不是会搬开。"

"这次一定搬开，不会再有问题了，"朋友满意地说。他对什么事都是乐观的。

我笑笑，也不讲别的话。

这天天气特别好，虽然山谷里还积着雾，但也显得十分稀薄。冬日的阳光温和地抚摩这条长长的镰刀形的马路。近来常常是愁眉苦脸的天空也开颜微笑了。我站在门前望着在屋檐上、在电线上快乐地唱歌的麻雀，又看看对面楼窗上的一抹金色阳光，我相当高兴。这时店两边炉子里和蒸笼里照常发散出一阵一阵的烟雾，但是我也不去注意这些了。

十点钟光景我在茶楼上听见堂倌说"挂球"，连忙到临街的窗前去看，果然街上有人在跑，一个人问："几个球？"一个人回答："当然是一个红球。"对面的几家商店纷纷在上铺板。

一个红球，这是预行警报了。所谓球便是红纸灯笼，这时它一定高高地挂在川康银行背后山坡上警报台的球杆上面。我用不着到那里去看明白，便付了茶钱拿起书走出了茶楼。

好些天没有警报了，今天雾很稀淡，敌机多半会来一趟，这样想着，我决定先到小学接利莎去。

小学在一条死巷里面。说是死巷也不恰当，因为在巷子的尽头虽是无路可走，却也有一片远景。这里算是高坡，坡下横着一片冬水田，斜对面坡上还有一所女子学校。作为小学校校址的古庙就是在女子学校的正对面。门前有两棵大黄桷树，也应当是年代久远的老树了。

我看见有些小学生陆续从里面走出来，便站在树下等候利莎，不久利莎挂着书包，一跳一跳地在大门口出现了，靠近她同她讲话的便是那个梳两根小辫子的秦家凤。她们只顾讲话，没有注意到我，我便高叫一声“利莎！”。

两个头高高地抬起，两对眼光立刻射到我的脸上，两个人同时惊喜地叫出来：“黎伯伯！”

她们跑到我身边，利莎高兴地拉住我的手问道：“你站在这儿做什么？”

“我来接你们的，现在快走罢，”我说。

我们三个走出这条死巷子，秦家凤应该往右手边走了，便向我和利莎告辞，笑着点一个头，说：“等会儿见。”利莎扬扬手回答她，多余地添一句：“在防空洞里见。”

利莎一家人同秦家凤母女平常都躲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面，我也是。因此放了空袭警报以后我们还有机会看见秦家凤。

我和利莎向左手边走。书店就在眼前。铺板已经上好，两扇门还开着，利莎的母亲抱着孩子立在门口，对我们微笑，还问一句：“是黎伯伯去接你的吗？”

“黎伯伯在学堂门口等我，”利莎得意地答道。她又向我央求说：“黎伯伯，以后有警报你就来接我，好不好？”

“好的，”我爽快地回答她。忽然一辆从城里开出来的长途汽车飞也似地在我们面前跑过去了。车辆卷起大股的灰尘，在空中旋转。我们只好屏住气背转了身子。

“太太，都弄好了，就走吗？”那个矮胖的老妈子拖着两个

大布包一拐一拐地走到门口，喘吁吁地说。

“王嫂，车子哪？还是把车子推去。等到空袭警报发了再走，”利莎的母亲看了看老妈子，就这样回答。

王嫂放下布包，又进去推出了那一架小孩坐的藤车。就在这时候空袭警报的汽笛声响了，声音不很清楚，但是挂在电杆上的警报钟又接着噹噹地响起来。

“空袭了！”利莎兴奋地嚷着。

“我们就走，”她母亲答道，又转身去看王嫂，王嫂把车子推了出来，我便帮忙她把布包放到车上去。

“爹爹哪？”利莎忽然问道。

“爹爹到大学上课去了，他会在那边躲的，”她母亲答道，又把左手里捏的三张白色卡片式的防空证向我递过来说：“还是让黎伯伯拿着防空证罢。”

书店两边的酒菜馆一直到这个时候都是十分热闹的，现在那里面起了一片闹声，客人们慌慌张张地跑出来。那个散放煤臭和烟雾的炭炉也闭上大嘴休息了。

我把利莎母女送进了川康银行，一个人坐在银行侧门外矮树下一块石头上面等候紧急警报。在这里我可以望见警报台上的灯笼，也看得见街中的行人。马路似乎安闲地睡去了，没有气息，没有尘土。寥寥几个穿黑制服的防护团团员寂寞地在岗位附近闲踱。四周很静。鸡鸣、雀噪和人语安详地在空中飘荡，显得特别响亮，特别清楚。

过了一阵，紧急警报还没有来。我坐得有点不耐烦了，便站起来。越过马路我望见山谷里还浮着一张疏疏的雾网，但

已经被阳光穿破了。田、树、沟、屋全露在我的眼前，只是仿佛还被一层玻璃罩住了似的。田坎上有人影在摇晃，树下也显露出人影来。一些人站在公共防空洞洞口等待消息。

“黎伯伯，你还不进来！”利莎从川康银行侧门内探出头来唤我。侧门开着一扇，那个穿制服带手枪的行警还立在门外查看防空证。利莎把身子移到门边，靠在她肩上的还有另一个女孩的头，那自然是秦家凤的了。两双年轻的眼睛带笑地对我霎动。利莎又说：“快进来罢。黎伯伯，你在等哪个人？”

她的话没有说完，我就听见凄厉的紧急警报声，这声音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是一瞬间整个山坡都响遍了。同时急促的钟声接连不停地敲起来。我仰头去看警报台：两个红球全落下了，剩着瘦长的球杆高耸在山坡上。

“黎伯伯，快进来，紧急罗！”秦家凤带点惊惶地催促道。

我进了门，行警也跟着进来，把门关上了。

利莎拉着我的手，往洞口走去。我问她：“你妈妈呢？”

“妈妈她们下洞里去了。”

秦家凤还说：“黎伯伯，我们进洞罢。进去晏了，会没有座位的。”

我把这两个孩子送下洞去，自己走上石级，在洞口立了一阵。

时间在静寂中过得很慢。忽然静止的空气开始动了，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从天的一角发出来，声音逐渐增大，逐渐逼近，仿佛有一只巨大的魔手正向这个小镇伸过来似的。

“来了，来了，”有人发出这低微的惊呼，留在洞外的人一

齐跑到洞口，鱼贯地走下洞去。

洞里点着洋烛，上下两旁都有木板，两排木凳上坐满了人。我走完石级把脚踏上地板，就听见利莎的声音："黎伯伯，到这儿来坐。"我朝声音来的地方看去。利莎坐在她母亲的旁边，这时刚刚站起来，让座位给我，我便过去坐下了。利莎就靠在我的身上。她母亲怀里的小弟弟却已沉沉地酣睡了。秦家凤母女坐在我们的斜对面。

在洞里也还听得见机声，敌机就像是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似的。没有一个人讲话。于是一声巨响打破了沉默，整个洞子微微地震动了一下。

"落弹了，"一个声音轻轻地说。

"大概就在磁器口，"另一个声音轻轻地回答。磁器口是附近的另一个市镇，又是长途汽车的终点。我想被炸的多半是那个地方。

炸弹孔隆孔隆地落下，虽说是巨响，但是传到洞子里却只有轰轰的声音。洞子里空气跟着在震动，我的身子也微微地摇晃了两下。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洞中静得像一座古庙，我连自己的怦怦心跳也听得十分清楚。

接着开始了静寂，放在我和对面座位之间的那根长板凳上，一支孤零零的洋烛发出摇曳的微光，烛泪流了一大滩，火快要烧到板凳了。有人着急地吩咐女工："洋蜡烛，快点！"站在我膝前的利莎突然一口吹灭了火。那些暗黄色的面孔立刻消失在黑暗中。于是火闪似地亮起来手电筒的白光。

另一支洋烛点燃了。可怕的机声已经完全消去。代替它

的是人们的谈话、咳嗽和笑声。有人移动身子往外面走。我闷得难受，也打算出去。我站起来，一只手还搭在利莎的肩上。她掉转头望着我轻轻地说："我跟你出去。"

我牵着她的手走上二十多步石级，出了黑暗的洞穴。阳光使我差一点睁不开眼。但以后我也就习惯了。我昂起头畅快地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我听见利莎自语似地在说："到底是在外面舒服。"

"不要紧，敌机今天不会再来了，"我安慰她说。

一个人影从洞里闪出来，旧呢大衣盖着灰绒线衫和青裙子。这是秦家凤，她一边揉眼睛，一边唤着"利莎"。

"你也出来了?"利莎笑着问她。

"洞里太闷，我坐不下去，"她答道。她又嘟着嘴抱怨利莎："你也不等我，就先出来了。"她把右手绕过利莎的后颈搭在利莎的右边肩头。

"我不晓得飞机走了没有走，所以不敢喊你出来，"利莎闪闪眼睛笑答道。

"那么你胆大，"秦家凤嘲笑地说。

我们靠着洞外石壁随便说了几句话。利莎又缠着要我讲个故事。我便把"能言树"的故事讲给她们听。

我刚刚讲了两段，警报台上又挂起了两个红球，现在是恢复空袭警报了。行警高兴地嚷着："休息球，休息球!"

从洞里陆续走出来一些人。利莎的母亲抱着酣睡的孩子出来了，秦家凤的母亲跟在后面。秦太太面孔显得苍老，身体瘦弱，手里拿着一根手杖，走完最后一级，跨过门就喘了两

口气。

两个孩子都掉转头去看各人的母亲，利莎唤一声“妈妈”，秦家凤却只点头对她母亲笑笑。

“利莎，你又缠着黎伯伯讲故事了，”利莎的母亲带笑地说。

利莎笑笑，我接着往下讲。她们渐渐地被我的故事吸引住了。两个人都不瞬眼地望着我。我也兴奋地继续讲下去。可是不等我讲完，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又来打岔了。

王嫂扛着布包从洞里出来，看见利莎便说：“利莎，回去罗。”

利莎含糊地答应一声，也不看她一眼。王嫂走到侧门旁边，把布包放到藤车上面。

两扇侧门大开，人们朝那里走去。两个孩子的母亲都走到门口了，还回过头来唤她们的女儿。我也不便久站在这个地方，便说：“走罢，我们回去再讲。”

利莎和秦家凤一边一个跟着我出来。街上满是携儿带女背包提箱的行人。有几家商店正在卸铺板。王嫂推着藤车在前面走。利莎的母亲抱着刚睡醒的孩子一边走，一边跟秦太太讲话。

走到横街口，秦太太应该转弯了，便站住等候秦家凤。我问这个女孩：“你跟你妈妈回去吗？”她不答话，却轻轻地跑过去，站在她母亲面前，央求似地讲了几句。

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不过我可以猜到她的意思。果然她站了片刻，望着她母亲点着手杖进入横街以后，便回到我们

的身边来。

我带着两个孩子走回店里，别的人都回来了。为了喝开水，我们又走入楼上的房间。我第一眼便看见满桌满床的尘土。热水瓶仍然安全地立在方桌的一角。我拿起水瓶倒水，两个孩子便动手打扫灰尘。

我们三个人都喝了水。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让她们坐在床沿上，我继续讲"能言树"的故事：

"大树吸收了女孩的眼泪以后居然能够发声讲话了：'……在大地上一切的人都是没有差别的。凡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用种种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幸福，这样的人是不会活得长久的。连那二十二层的长生塔也会在一个早晨的功夫完全倒塌。只有年轻孩子的心才能够永远存在。'"

两对漆黑的大眼睛泪汪汪地望着我的脸。它们是那么明亮。

我继续转述大树的话：

"去罢，伴着你哥哥去罢。你的眼睛也可以做你哥哥的眼睛。他会用你的眼睛看见一切的。去罢，去帮助别人，同情别人，爱别人，这都是没有罪的。"

我自己在做荒唐的梦，还把两个孩子也引入了梦中。她们接连地霎动眼睛，静静地听着我讲完最后的一句。

小女孩扶着瞎眼的哥哥向着大路走去了。给我们留下来这个陈设凌乱的房间。楼下又在叫喊了："排骨面两碗。"接着是一辆卡车吵闹地跑过去。灰白色的煤烟开始从窗的缺口飘

进来。

“怎么又有煤烟?”利莎揉着眼睛厌恶地说。

“楼下又在生火。真讨厌，总不管别人!”秦家凤气愤地说，她也在揉眼睛。

煤烟越来越多，很快地就把这个房间变成了雾海，我忍不住呛咳了两三声，只得同两个孩子逃到楼下去。

两个炉子依然放在原处，都冒着烟。左边酒菜馆里那个拿刀砍门的茶房躬着腰用火钩在掏炉桥，他好像并没有把炉子搬开的意思。

“你看，这就是你爹爹办的交涉，”我生气地说。

“不是说喊他们搬开吗?他们怎么又不听?”利莎惊奇不解地说。

“没有用，没有用!就是熏死也不过我们几个人。哪个肯真心来管这些闲事!”我恼怒地又发起牢骚来。

两个孩子自己很不满意这件事情，看见我也在生气，便不再讲话了。我们都站在店门口。我出神地望着人们接二连三地走进隔壁酒菜馆。

站在我身边的利莎忽然伸手轻轻地拉我的袖子，低声对我说：

“黎伯伯，我相信大树说的话。我要做一个那样的好孩子。”

我惊喜地掉过头看她，她的一双眼睛带着泪水发亮了。

我就像故事里的那棵大树一样，受到了小女孩的眼泪的润泽。我觉得内部起了一个大的震动，我似乎应该对她讲几

句话，但是，我什么也讲不出，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过了好一会儿，才挣出一句："你真是个好孩子。"

秦家凤被利莎留在店里吃中饭，利莎差王嫂到秦家去通知，秦太太也就同意了。利莎今天待秦家凤特别亲热，秦家凤也是一样。但是到五点钟两个人终于恋恋不舍地分别了。

傍晚利莎的父亲回家吃晚饭。他是从磁器口回来的。今天被炸的地点确实是磁器口。他去看过灾区，塌了三五间房子，伤了一个人，炸弹大半落在江里，可以说是没有大损失。

菜馆门前的炉子还在冒烟，我注意地一嗅，又闻到煤气，我忍不住向朋友发问：

"炉子为什么还没有搬开？"

"就要搬开的，这次他们一定搬，"他毫不在意地笑答道，脸上仍然带着乐观的表情。

"你对什么事都太乐观了，"我冷笑道，也就不再跟他谈这个问题了。

敏，我今晚上又给你写了这许多话，告诉你这许多琐碎事情。吃过晚饭后我就坐在楼上书桌前面续写这封信，那时电灯没有亮（不，这是亮了，又熄了），我点起一支洋烛，就靠着摇曳的昏黄烛光照亮我的笔迹。我伏在案上连头也不抬起地专心写着，我一直写到煤烟散尽，菜馆关门，写到四周寂然无声，电灯重燃，写到每家店铺灭灯睡去，我还没有停笔。

现在还是我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四周都是鼾声。同房间的店员和练习生都睡熟了。在隔壁，朋友夫妇和利莎姐弟也睡得沉沉的。楼下马路上只有一片黑暗，偶尔闪起一股电

筒光，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显得多么空虚，很快地它又寂寞地消失在黑暗中了。夜披着它那墨黑的大氅在外面飞行，似乎要扑灭一切的亮光和暖热。寒气像一根蛇从我脚下慢慢地爬上来，它还在啮我的两腿，我感到一阵麻木，两只脚都冻僵了。

这时不过十二点钟，啊，连斜对面那家贸易行楼上的灯光也突然灭了！除了这个房间，似乎再没有光亮。整个街，整个小镇都静静地睡了。那么也让我放下笔跟你暂时告别罢。

二

敏，整整有十几天我没有给你写一个字。现在是午后，窗外下着蛛丝一般的小雨，我刚刚从外面回来。我是冒雨出去散步的，暗灰色的凄惨的天空低低压在我的头上，寒冷的雨丝浇不灭我那火似的热情。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的忍耐又逼近了限度了。我整天关在房间里，只看见那些凌乱的陈设，那些烟，那些雾，那些煤臭，还有那接连的阴天，接连的细雨，和侵骨的寒气，好像我四周就只有那些东西。朋友们的通信也中断了，这些天里我就没有收到一张从外面来的字条，似乎友人们都忘记了我。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利莎的父亲谈到天天高涨的物价和米价，他又讲了些他的同事们的苦况，连他那永远带着乐观表情的脸上也皱紧眉头。他的妻子总是温和地讲话，不常笑，但更少给我们看见她的愁容。她是一个能干的主妇，常常用平静的心境和缜密的头脑处理困难事情。这个书

店便是在她的主持下存在而且逐渐发展的。因此看见她们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我便会想：要是没有这位太太的事务才干与温和性情，我那朋友的乐观也就会有问题了。

我们也曾谈到炉子的事。

“怎么样？搬了没有？”我问道。

“没有办法，”朋友笑笑，摇头说，这次他自己认输了。

利莎在旁边扑嗤笑起来。在这个店里就只有她的脸上充满阳光，充满生气，充满天真的微笑。看见她这张明亮的脸，我觉得灰暗的天空好像开展了一些似的。

我把利莎送进了学校，又回到阴郁的天幕下面。雨继续在落，路上全是滑脚的水泥，在水泥上移动脚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不愿立刻回到书店里去。我觉得有一团火在我的胸膛里燃烧，我全身的骨头仿佛都落在油锅里受着熬煎，连脑子也烧得发烫。我整个头，整个脸都是火。我不能多用思想，我不能休息，我一直在细雨下面走了两个钟头。这其间像魅影似地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各色各类人的影子，我的耳边不停地响着各种各样的吱吱喳喳。“难道在这时候还不让我安静？”我气愤地想着，我的忍耐真的快到了限度了。

就在这时，我忽然又想到你，想到你从前说过的话，我才又勉强镇定了心，回到书店楼上来给你写信。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利莎还没有放学回来，窗前仍旧挂着帘子似的雨丝。看见这好像永远下不完似的细雨，我又觉得火在心里上升了。笔还捏在我的手里，我应该再往下写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我起得特别早，这是我昨晚想好了的抵抗煤烟的方法。我下床的时候，街后面雄鸡的叫声才消失不久。等到我洗完脸打开店门，天已经大亮。那时没有落雨，泥泞的马路上还不见一个行人。在附近三四家店门口，有人站着在扣衣服的钮子。我朝着往城里去的方向在马路上走了一阵，看见白茫茫的晨雾像一片浓烟包围着远近的山、田、道路和房屋，我自己仿佛踏进云雾中去一般。空气潮湿，沉重，而且还带着一种气味。寒气渐渐地穿透了我的衣服，好像有一只冰冷的大手在我的身上抚摩。但是我仍然毫不畏缩地向前走去。

忽然三辆沉重的黄包车带着呻吟般的辘辘声穿过浓雾迎面滚下斜坡来，车子上还放着简单的行李。车上人大概是到磁器口去搭船的。我等车子过去，又回转头看它们一眼，这么快它们就已经被浓雾吞食了。我看不出一点来痕和去路，想不到我自己就是从那白茫茫的一片中走过来的。

我走到镰刀形马路的尖端，对岸的景物隐约地出现了，那里可以说是刀柄，一个山谷隔在这两个高坡中间，现在都变成了雾海，迷迷茫茫，无垠无边，只见那乳白色的东西在翻腾，在滚动。对岸一棵树、一堆屋刚在我的眼前显露，立刻又被雾浪淹没了。我为了想看穿雾海，在这里站了许久，得到的却只是窒息。

我折回来，仍旧呼吸着重浊的雾气。我又走入正街，两旁的房屋渐渐地从雾海中浮现了。那些紧闭的店铺打开了门，一家跟随着一家，学徒、工友、火夫们忙着搬卸门板，整理橱窗。颜色和声音水似地流入街中，再缓缓地往马路的两端流去，或

者集在正街的中心几家饮食店门前，或者拥挤在街旁那条作为菜市的死巷里，或者沿着镰刀形的马路流向远方。

书店门打开了，两旁的酒菜馆照常热闹地接待顾客，两个炭炉毫无顾忌地散放煤烟。蒸笼盖揭开，一阵水蒸汽扑到书店门口，飞入楼上房间。两只粗壮的膀子伸到白雾笼罩的蒸笼旁边，端走了热气腾腾的一笼包饺。

在书店门口站了一阵，眼前流过去五颜六色，耳边响着各种不愉快的声音，我不知道这时候应该去到什么地方。我不愿走在马路上呼吸窒息人的雾气，更不愿坐在楼上让煤烟熏坏我。

利莎挟着书包出来了，两只小手插在青红色方格子呢大衣口袋里面，她带笑地说："黎伯伯，你今天好早啊。"不等我回答，她又央求道："黎伯伯，你送我上学去好吗？"

我高兴地答应了，她给我找到一个去处，至少在利莎的身边，在小学校门口，我还可以在年轻的脸上看出明日的温暖来。

"让我给你拿书包，"我说着便伸过手去。

利莎看我一眼，笑了笑，默默地把书包递给我。

我们走入那条通小学校的巷子，利莎忽然问我道：

"黎伯伯，你为什么这两天总是愁眉苦脸的？你心里头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

我吃了一惊，这个孩子居然像大人一样地讲话，而且像大人一样地猜到了我的心事。但我还是摇摇头否认道：

"没有，没有什么，你不要乱讲。"

"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我记得你才来头两个月一天总是有说有笑的，"利莎固执地说，脸上还带着她那发光似的微笑。

"这两天闷得很，"我解释地答道。我知道这个回答不会使她满意。但是从后面送过来秦家凤的声音："利莎。"利莎连忙回过头去。

秦家凤跑到利莎面前，向我唤一声"黎伯伯"，就亲热地挽起利莎的膀子往前走了，两张年轻的脸上笼罩着喜悦的光辉。

转弯便是小学校，我听见秦家凤在说："我跟妈妈讲好，明早晨请你到我们家里吃面。"明天是星期日，她们不到学校去。

我们走到学校门口，好些男孩子在门檐下玩。我把书包交还给利莎，她除了向我道谢外，还说："黎伯伯，回去要高高兴兴啊。"她笑着对我闪闪眼睛，摇摇手，秦家凤也对我一挥手，然后把手搭在利莎的肩上，两个人走进门内去了。

我留恋地在大树下面站了好一阵。我觉得这个小小的古庙里充满着阳光和温暖。但是在外面，针似的细雨开始飘落下来。孩子们都进到课堂中去了。庙门口是静静的，空空的。我淋着雨慢慢地走回家去。……

我写到这里，天色又黯淡了，我听见利莎的声音在楼下讲话，还有她母亲的声音，她父亲的声音。

啊，利莎在下面唤我，她父亲也在唤我，我应该搁笔到楼下去。

今天傍晚得到林的一封信，他问我一件事情。晚上我写了

一张信纸回答他。我封好信，自己拿出去投到邮筒里，回来看见书桌前电灯十分明亮，砚台中还有余墨，便拿出写给你的那一叠稿纸往下再写。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在饭桌上听见利莎和她父亲谈论送礼的事，才知道明天是秦家凤的生日。利莎要到秦家去玩，准备把礼物也带去。

说到礼物，她父母提出几件东西，利莎都不赞成。她固执地要送一件红绒线衫和一本照片册。照片册书店里有。红绒线衫在斜对面百货商店橱窗里面放了好久。她说秦家凤就喜欢这两样东西，想了许久，都不能到手。秦先生在城里做事，对家庭并不关心，也不大喜欢他的女儿。

“不管。我自己出钱买绒线衫，妈妈给我照片册，”利莎撒娇地说。

她父亲笑起来，她母亲也笑了，母亲说：“你倒说得爽快。你晓得照片册卖多少钱一本？”

“三十五块钱，我问过黄子文的。横竖是我们自己店里头的东西，又不要妈妈另外花钱。秦家凤喜欢它，还是送给她好。横竖妈妈用不着，也卖不出去，”利莎理直气壮地答道。

“你倒会讲话。好，就算我把照片册送给你罢。不过绒线衫却要你自己出钱去买啊，”她母亲温和地带笑说。

“我不是还有两百块钱存在妈妈那儿吗？上回送爹爹围巾不过花了三十多块钱。下个月黎伯伯过生，我也要买条围巾送他，”利莎兴高采烈地说。

“不用你花钱了，我替你出钱罢，你妈妈买一样，我也买一

样，”她父亲和蔼地说。

“那么我也买一样，”我插嘴说。

“都不要，都不要，”利莎摇摇头满意地说；“我只要妈妈给我照片册。别的东西我自己买。我送礼，总要自己拿出点钱来才算是真心送。秦家凤说过，她请我吃面，也是她自己出钱。”

“就让她这样罢，她讲得也有道理，”她母亲对她父亲说，“她倒是个实心的人。”

“好，妈妈答应了，”利莎放下碗站起来快乐地说。她跟着刚才离开饭桌的练习生走到柜台前面：“黄子文，把照片册拿给我。”

“像她这样年纪倒好，一天总是高高兴兴的。我就是生气的时候，看见她一脸笑容，立刻气也没有了，”她母亲感慨似地说，眼光随着女儿移到柜台，声音里泄露出母亲的慈爱。

我没有多讲话。我想到她口中的那条围巾，有一天会作为我寂寞的生日的礼物送来的那条围巾，我眼前突然明亮起来，我感激地微笑了。

敏，单是为了那句简单的话，你说我不应该怀着感激的心微笑么？

三

发出了两封长信，我始终没有得到你一个字的回答。敏，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度出现之后又突然隐去了呢？为什么你

得到我的消息之后又开始沉默呢？难道我那些信函都被误投在大海里面，不曾有一张纸片达到你手边？或者因为我曾经忘记过你，你现在用“沉默”来作为报复？还是等不到我的回信，你就因新的使命奔跑到另一个地方？这都是可能的。而且我还有更多的揣想，它们也都是可能的。……

然而不管这一切，我今天还是在书桌前面坐下来给你写信，这应该是我的第三封信了。

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个你不会记得的，其实要不是我那朋友（利莎的父亲）时常提起，连我自己也会把它忘记了。我计算起来这些年中间我就只记住一个生日，在那天和四五个熟朋友在上海一家广东菜馆里吃过一顿饭，还喝了几杯酒，但那也是七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我却十分快乐。早晨起来，在枕头旁边我发见了一个纸包，上面写着这样的十二个字：“利莎送给黎伯伯的生日礼物”，纸包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条捷克制的毛织围巾。利莎已经到学校里去了。

我把围巾缠在颈项上，我感到异常的温暖，我又一次接触到善良的小小心灵，分得一点它的亮光与热气。我多日来的心上的阴影都给这一点光和热驱散了。我吃过早点就高兴地拿着书到茶楼上去。

茶楼仍然是很空阔的。我还是拣了那张坐惯了的茶桌，堂倌照常过来泡茶。光头微须的矮胖子按照往常的习惯上楼来坐了一阵，黄脸的丫头照例走下楼讨开水，跟堂倌讲笑话。这些跟我不发生一点关系。我的心上没有云翳。我看书看得很

快，今天连这个楼厅也显得特别明亮了。

我的心完全跟着书中的字句在跳动，我忘记注意时间的早迟。后来连堂倌也到三层楼上去了。这样一个大的厅子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我仍然把头埋在书上，直到意外地利莎的笑声响在我的耳边，我才抬起脸来。

又是利莎和秦家凤两个孩子。秦家凤仍然穿着那件新的红绒线衫。利莎的眼光定在我的围巾上面，她笑着嚷道："黎伯伯，拜生啊！"

"黎伯伯，拜生，拜生！太用功罗，过生也该要一天嘛！"秦家凤一面点头招呼，一面笑说道，她点头点得相当深，有点像在鞠躬。

"不要吵，好好地坐下来，我请你们吃茶，"我阖上书笑着说。

"不要坐了。我们来请你回去吃面，爹爹妈妈都在等你，"利莎说着就把我放在桌上的书拿起来，她故意催促："黎伯伯，快走，快走。"

"黎伯伯，你茶钱给了吗？"秦家凤插嘴问道。

"没有，所以我还不能就走，"我答道，我想到底是秦家凤年纪大一点，更细心。

"不要紧，下回来给也是一样，不晓得堂倌跑到哪儿去了？"利莎还在催我。

"等他一下罢，"我迟疑地说。

"利莎，你替黎伯伯大声喊声堂倌，看他来不来，"秦家凤想出主意，对利莎说。利莎果然大声叫了两下："堂倌。"

堂倌咚咚地从三楼跑下来。我瞥见他的影子，就把四张一角的票子丢在桌上，跟着这两个小女孩走了。

店里放着一张小小圆桌，桌上摆满了菜，是利莎的母亲亲手做的。秦家凤的母亲也来了。大家就了座，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面。我还陪着利莎的父亲喝了两杯大曲。他的酒量相当大，今天他喝得不少，酒意已经上了脸，他还不肯放下杯子。他平时讲话不多，现在却滔滔不绝地谈起来。他对我叙述他几年来的遭遇，这里面也有不少的牢骚。沉默的罐子打破了，心里的一切水似地全流出来。他的太太几次暗示要他闭上嘴，他反而讲得更多，而且更加用力讲话。他忽然把酒杯往桌上一放，顺势拍了一下桌面，大声说：

"我在外国住了八年，回国来在大学教书也教了五年了，养一个太太两个孩子都养不了，还要靠开书铺来维持生活，这真是笑话。怪不得我那班同学都改了行。"

虽然还是牢骚话，但他却是带笑说出来的。他的太太在旁边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用抱怨的语调对秦太太解释道："你看，他今天真是吃醉了，自己也不晓得在讲些什么。"利莎和秦家凤时而望着他抿嘴在笑，时而唧唧哝哝地讲许多话。

"我今天才没有醉，我说的都是真话，没有一句假的。你不懂，你完全不懂，"朋友摇摇头着急地说，甚至在这时候笑容也还没有离开他的发红的脸。他太太笑笑，不再向他答话了。她看见我们都吃了饭，便上楼去提了一篮鲜红的橘子下来。

敏，利莎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个实心的人。他自己说他永远乐观。的确，甚至在应该动气的时候，他也带着笑

容。他可以忍受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他也可以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设法为自己找一个正当的出路。他不灰心，也不想投机取巧。他只是安安稳稳地一步一步走那人生的道路。林常常开玩笑地称他做“我们的良好的公民”。

“不过话又说回来，慢慢来，能够忍耐一点，正当地做事，也不见得没有办法。你们看炉子不是搬开了？我说一定会搬开，现在果然就搬开了，”他得意地笑着说，又喝干一杯酒，自己摆摆手说：“不吃了，不吃了。”

利莎正在剥橘子，就剥好一个递到他的手里，笑着说：“那么吃个橘子。”

我听见他谈炉子的事，忍不住扑嗤一声笑了出来。

他接到橘子，望着利莎，称赞一句：“这真是我的好女儿，晓得给爹爹剥橘子。”他听见我的笑声，便回过头来问我：“你在笑什么？”

“炉子不能说是搬开了，右边的一家还会开门的，”我笑着反驳道。

“不过左边的一家总搬了，”他说。

“但这并不是你交涉的结果，还是人家关了门把铺子顶出去的。”

“那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闻不到煤烟就行了。横竖是一样的。我们交涉的目的也就是这一点，你说对不对？”他满意地辩道。

我无话可说了，我知道跟他这样辩论下去，是不会得到结论的。我自然不赞成他的意见。不过我明白这差异是从两个

人的不同的生活态度上来的，我不能说服他，同样他也不能说服我。但我们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然而他也有他的道理。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四天没有嗅到煤烟了。右边的一家酒菜馆因为管账的亏空了钱带着一个股东的妻子逃走了，现在还关着门在整理内部。左边的一家说是因为股东们闹意见便停业把铺子顶给了一家卖杂货的，如今正在装修门面。左边一只炭炉早没有了，右边的一只空空地立在关着的铺门外面，代替它昔时的威风的便是今日的寂寞。

我们接连过了四个比较安适的日子，连呼吸也畅快了许多。今天又是一个难得的晴天，吃完橘子，利莎和秦家凤还为我的生日唱了几首歌。所以我非常高兴。

写到这里，我耳边还仿佛响着利莎的铃子似的歌声。寒夜骑着风帚呼呼地在外面飞行，连墙壁也冻得发出来低声呻吟，但我的心却是很暖热的。写到这里，我不觉快乐地微笑了。

敏，我愿意你知道我这快乐的心情，还希望你也受到它的传染。的确，年轻的我们应该永远保持着快乐的心情啊。

四

敏，我的畏友，请原谅我长久的沉默。我早就说过我急切地盼望着你的来信，可是你的长篇的信函到了我手边这么久，我却不能够坐在书桌前给你写一张稿纸的回答。你很容易猜

到这是什么原因？这一次我是给病抓住了。

我的病是在生日后第三天开始的，起初是四肢发软，后来发冷，以后又发烧。冷起来时，虽然盖上三幅厚被，我也禁不住要在床上打颤，连牙齿也抖个不停。烧起来时我不知道自己躺在什么地方，只是迷迷糊糊地接连做着可怕的梦：自己杀人或者就要被人杀害，或者陷在火烧的房屋里面，或者看见炸弹当头落下，还有许多许多我现在记不起来的景象。烧得最厉害的时候，就像一团火在我的脸上熏，我不得不大声呼喊来发散热气，我不知道自己叫些什么。据听见的人说我的声音并不大，我接连地说了许多话，他们也不告诉我是关于哪一类的事情，只说听不出来我的含糊的呓语。

利莎的嘴在我面前是不会保持沉默的。在我头脑清醒热度减退的时候，她会絮絮对我讲说许多事情，她见到的，听到的，或者别的有趣味的事。有时她也会摹仿我的声音重说一两句我那些呓语，或者忍住笑对我描绘我病中的情形。有一次她说听见我连续叫了几声“我不怕”，却不知含着什么意思。我自然无法给她一个回答，就只好让她时时学着说“我不怕”来嘲笑我。

要是没有利莎这个孩子和她的小姐姐秦家凤，我在病中一定是很寂寞的，或者我的病甚至不会好也说不定，即使病好，也会好得更慢。是她们支持了我的精神，使我能够忍耐这么长久。她们的天真的笑和好心的话便是我这个病人所需要的阳光和温暖。

两个孩子每天放学后便一起来看我。在寒假中短短的休

息日子里她们两个每天总要在我的房间里度过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半天，秦家凤来时多半在下午，有时候还带着课本来，倘使我闭着眼沉沉地睡去，她们就坐在我的书桌前面温习功课。她们有时不发一声，有时唧唧哝哝，但是决没有做过什么响动来妨害我的睡眠。记得有一次我从噩梦中醒来，心还因为悲痛和恐怖颤栗，我不知道眼前究竟是梦是真。我移动眼光，我忽然发见书桌上两个女孩的头靠在一起，吃吃地小声笑着。我吐了一口气，两张年轻的脸立刻掉向着我，笑容还未消散，就像两朵迎着朝阳开放的花，还带了晶莹的露珠，那就是明亮的眼睛了。我的心立刻镇定下来。我听见两声亲热的唤声"黎伯伯"，两个孩子马上跑到我的床前，鸟叫似地争着跟我讲话。

我还听见利莎的母亲说，在我发着高热、昏迷地说着呓语的时候，两个孩子就静静地立在我的床前眼泪汪汪地望着我，或者惊惶失措地到楼下去逼着利莎的母亲三番四次地请医生。袁太太对我说这话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在我面前，利莎大声分辩，秦家凤笑着，不好意思地埋下头。我只是微笑，我的眼光轮流地在两个小女孩的脸上打转，我没有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话才好。

我的病终于有了转机，渐渐地好起来，热度也逐渐在减退。在这中间春天来拜访这个小镇了。我躺在病床上也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从窗外吹进来的微风，从涂抹在玻璃窗上的阳光，从两个孩子以及别人身上穿的衣服，我也可以看到春天的影子。我也在减少我的衣服和被褥，同时仿佛我身体的

重量也跟着在减轻。我可以下床坐一些时候了，我也可以在房间里慢慢地走上二三十步。

有一天两个孩子给我带来了一把小花，青青的细叶衬托着黄色和白色的小小花朵，每朵花都欣欣然昂着头，仿佛还在呼吸新鲜的田野空气。感谢这两个孩子的好心，春天被带到我的房里来了。我一把接过这不知名的野花，就拿来放在眼睛下看，鼻端上闻，我默默地闻了许久，这种带着泥土味的清香似乎慢慢地沁入我的全身，我觉得全个身子都颤抖起来，好像被一种力量在摇撼着似的。

“利莎，你看，黎伯伯拿着花，就像蜂子钉住花一样，”秦家凤在旁边抿嘴笑道。

利莎也笑起来，她抓住秦家凤的手答道：“你不是说害病的人爱花吗？真不错。”她又对我说：“黎伯伯，你这样爱花，我们每天都给你摘点来，好不好？”

“好，”我只能吐出这一个字。我说不出我这时的感情，不过我知道我的活力渐渐地在恢复了。

利莎真的常常给我摘花来，花的种类也渐渐地加多。天气一天一天地暖和，那一片白茫茫的雾海也逐渐地干枯了。早晨醒在床上我看见金色阳光在窗外荡漾，还听见麻雀群在房檐上愉快地唱歌。楼下右边那家酒菜馆换了老板，经过一番装修以后不再卖包饺了，连炉子也搬进厨房里面，我立在窗前不会再受到煤烟的围攻了。

在我的病中，只有过一次警报，但是没有发紧急警报就解除了。我没有离开书店，而且也不想动一下。这天利莎的父

亲在学校里面，母亲抱着孩子躲防空洞去了。利莎一定要留着陪我，她母亲还叫黄子文(那个十九岁的练习生)留下，准备等紧急警报发出后扶我到书店背后那个公共防空洞去。

“利莎，你为什么不去躲？你不害怕？”我感激地问她。

“黎伯伯，你不害怕，我也不害怕，”她笑着回答我。

“今天不会来的，雾罩还没有散完，”黄子文很有把握地插嘴说，自从上次炸了磁器口以后，敌机就不曾来过一次。

“要不来才好，省得黎伯伯跑一趟，”利莎担心地说。

四周异常静。空袭警报发出了大约二十多分钟，市声完全停止，窗下马路上连防护团团员的脚步声也寂然了。我望着这张可爱的小小面孔，心里没有丝毫的恐惧。

利莎看见我不讲话，还以为我心里害怕，便安慰似地对我说：“黎伯伯，你不要害怕，我给你讲个故事。”她真的把她从老师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我听了。故事很简短，她刚刚讲完，警报就解除了，她高兴得拍手欢叫：“黎伯伯，不要紧了。”

我的病刚好时，还遇到一次警报，这回我是躲了的。但是紧急警报发出以后，敌机并没有到市空来，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才听见解除警报。

这以后便是接连的阴天、雨天。空气相当沉闷，天空永远盖着那么多的愁云。但是在这个小镇的四周，万物都在发育生长，欣欣向荣。前两日雨后初晴，我沿着通磁器口的马路散步，路旁山田里油菜花开了，一片黄亮亮、绿油油的颜色十分悦目。小蝴蝶成群结队展开雪白的翅膀在田上自由飞舞。田畔几棵老树也披上了新衣。在这充满生机的气氛中，我的健

康很快地就恢复过来了。

昨夜我还出去看了跟我相别已久的蓝空明月。山谷同田里大片的菜花朦胧地横在月光下面，远处几座山若隐若现，仿佛是淡墨色的画。对岸几点灯光又像停泊在港口中的轮船的电灯。裹在我身上的一件秋大衣抵不住春夜的寒气，我便匆匆地回来。我走到店门口，遇着利莎的父亲，他关心地捏捏我的膀子，叮嘱道："晚上少出去啊，看受了凉又会病倒的。"

我感谢他，但是我得意地昂头说："不要紧，我不再生病了。"

现在我从面前一叠稿纸上抬起了头，窗前马路中正摊开一片清凉的月色，又是一个静寂的月夜。寒气一阵一阵地从窗洞飘进来。

敏，我也应该搁笔了。不过我告诉你：我现在过得很好。不，我应该说，现在我的心境很平静，现在我很高兴。你不要再为我担心。我还告诉你：六天以后便是利莎的生日，她的父母答应她请秦家凤到店里来吃面，自然也请我，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在那天送给她。

五

敏，这封信对你是一个意外，对我更是一个意外。我五天前万想不到接着就要给你写这样的一封信。昨夜我提起笔来，想向你报告一个消息，但是糟蹋了十多张纸，我还写不出一段可以叫人理解的字句。今晚窗外是细雨迷蒙的暮春的凄

清的夜，从几处被损毁的屋瓦的洞隙中，经过了天花板，漏下断续的雨滴，它们给我带来更多的寒意。从窗洞望出去，整个正街仿佛都落在酣睡中，黑夜抚慰着那些疲劳的灵魂。隔壁房内没有灯光，先前还在床上呜呜地抽泣的利莎的声音也寂然了。我的房间里则是一片鼾声，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和黄子文两人的鼾声今晚上显得特别重浊。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面。回忆凝成一块铁，重重地压在我的头上；思念细得像一根针，不断地刺着我的心；血像一层雾在我的想像中升上来，现在连电灯光也带上猩红的颜色。我无处逃避。一闭上眼，我就会看见那只泥土裹紧的腿，和一个小女孩的面颜。我不能在梦里找寻安静，我只有求助于笔，让它帮助我减轻痛苦。

昨天发过警报，而且出乎大家意外地来了敌机，数目是二十七架，在城内和四郊投下不少的炸弹。这是今年的第一次轰炸，却又是如此厉害，连我们这个小镇也不能倖免！

炸弹在这个小镇的上空刷刷地落下时，我和利莎一家人正在川康银行的防空洞里。我们听见飞机盘旋声，听见炸弹下落声，然后便是两三下震撼山岳似的霹雳巨响，一阵风灌进洞来，把立在板凳上的洋烛打落在地上灭了。洞子摇晃了两下，才稳住不动。利莎的母亲怀里的孩子吓得大声哭起来。

在那极短的时间里，我仿佛头上中了一下铁锤，把全身打得粉碎，然后才慢慢地聚合拢来。孩子的哭声被母亲的奶头塞住了。我举目四顾，眼前只有黑暗。我注意倾听，静寂中隐约听见细微的机声。但是这机声也被静寂吞食了。

于是人们像从噩梦中醒过来似地开始吐出了两三句简单

的话。我听见利莎担心地自言自语：

"秦姐姐不晓得躲在哪儿？不晓得她们进城没有？"关于"秦姐姐"的话，利莎先前就讲了许多。这天秦太太母女没有到防空洞来，不过利莎知道秦家凤要跟着母亲进城去看父亲，只是她还不能确定她们究竟动身没有。秦家凤的父亲我没有见过，但听见袁太太说，那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近来跟太太处得很不好，他在城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女朋友。最近他们夫妇为这个女朋友吵过几次架，袁太太也对我讲过了。

"你不要担心，她们一定在城里躲防空洞的，"我知道利莎为这件事情不安，便安慰她道。我这时没有想到书店，也不敢想到书店和我那个好心朋友的仅有的财产。

"你这个孩子心肠倒好，自己的家说不定全光了，你却只担心你小朋友的事情，"利莎的父亲带笑地插嘴说，他笑得似乎有点勉强。

"一定完了，今天炸掉的地方恐怕不少，"利莎的母亲接着说，声音里略带一点焦虑。

利莎默默地捏住我的手，我觉得她的手在微微地颤动。

听见解除警报的长长的汽笛声，她也不笑，脸上还是挂着愁云，好像她丢失了重要东西似的。我拉着她的手急急地走出了银行的侧门，这时还不到下午一点钟。

人们张皇地在马路上乱跑。我一直望过去，前面正街中凌乱地横着大堆木片、砖块和尘土，左边四五家店铺的楼房全倒塌了，另外的两三家被揭去了屋瓦，剩着半倾圮的木架子。右边的房屋似乎还是完好的，我再注意地往那边看，我希望看

到书店的楼房，但是街道渐渐在转弯，而且一阵黄沙似地在阳光中飞扬弥漫的尘土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们加快脚步往前面走。几个提着小皮箱或者布包的人气咻咻地迎面跑过来，口里嚷着："前面走不通，要绕弯，"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却像熟朋友似地对我们讲话，并且报告了被炸的商店的名字。

"利莎，不要往前走了，我们从后面绕过去，"袁太太在后面吩咐道。

"我跟黎伯伯一路走，"利莎转过头回答了她的母亲。她又对我低声说："黎伯伯，我们先到秦家去看看。"她的手微微地抖着。

"好，"我点头答道。我不能说别的话，我的心也跳得很厉害。我同情地看她的脸，脸上全是阴云，显得非常黯淡，我触到她那带着焦虑的眼光，利莎的脸从来不是这样的！我痛苦地轻轻唤一声："利莎。"她抬起头央求似地问我："黎伯伯，她们该不会在家里罢？"

"不会的！不会的！"我坚决地说，我的确相信秦家凤母女进城去了。

转眼便是横街，前面显得异常拥挤，我不知道一大群人在那里做什么，但是我猜得到前面出了什么事情。

"完罗，完罗，"聪明的利莎喃喃说。

我看清楚了：在街的右边高坡上，一排三幢相当精致的平屋现在变成了一大堆瓦砾和一个大土坑，人们就站在坡上坑边挖掘。

利莎丢了我的手疯狂地往前面跑去。我跟着她跑。我们也不管撞到什么人，只求立刻跑上坡去。这时利莎的意志竟然变成了我的意志。我们虽然挤出一身汗通过了人丛中，但是没有达到高坡，我们就被防护团团员拦住了。

利莎说了几句话，没有用，谁都不能够上坡去看，许多人都被拦在下边。利莎还要往前面走，她也把我拉着往前面走。另一个防护团团员跑过来对我打招呼，他便是茶楼的黑脸堂倌。他一面做出拦阻的姿势，一面说："不好过去，有人埋在里头。"

我打了一个冷噤。我听见利莎接连地问："好多人？是哪家的？挖出来没有？"

"多半三几个罢，我也说不清是哪家的，"黑脸堂倌含糊地答道；他掉头朝坡上看了看，不大关心地说："多半就是中间那一家，听说那家有个太太，还有个小姐。"

"不会的！不会的！不是那一家！"利莎生气似地辩驳道。

"不相信，你等会儿自家看罢，"堂倌淡淡地说。我连忙对他示意，叫他不要再往下讲。

利莎板着脸孔掉头四顾，忽然惊喜地叫起来："秦伯伯！秦伯伯！"我随着她的手指望去。一个穿西装的人向着我们这面慌张地跑过来，有一张戴着眼镜的瘦脸。他果然是秦家凤的父亲。

为什么是他一个人？难道她们走在后面？

利莎跑着迎上去问道："秦伯伯，秦伯母和秦姐姐哪？她们在哪儿？"

"我一个人先跑出来的，我怎么晓得她们在哪儿？"他脸色惨白，睁大眼睛，吵架一般地答道。他不理利莎，也不管前面的防护团团员，就拔步继续跑过去，似乎打算一口气冲上高坡。别人拦住他，他便大声叫："这是我自己的家，我要去找我家里的人啊！"这不是叫嚷，倒像是哭号。

"黎伯伯，"利莎刚吐出这三个字，就"哇"的一声，靠在我胸前伤心地哭起来。

我扳起她的脸，慢慢地给她揩干眼泪。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低声对她说："回去罢，妈妈他们在等你。"她让我牵着她的手默默地跟着我走回家去。

秦先生还在用他的哭号似的声音跟防护团团员讲话，那声音一直追着我们出了横街。

到了家。书店完好如前，铺板全未卸下，只开着两扇门。利莎的父母站在门口讲话，听见我报告的消息以后，两人都改变脸色不作声了。

利莎还在抽泣，我便带她到楼上去。我听见她母亲在后面说："不怪利莎，她跟秦家凤那么要好。"我觉得鼻子一阵酸，眼泪马上淌了出来。

我的房间也还是完好的，不过窗上剩余的玻璃全没有了。我想，这个房间一定由别人（不是张先生，便是黄子文，或者是王嫂）打扫过了。

一进屋，利莎就扑到床上去，呜呜地哭起来。我费了许多唇舌，才把她劝住。我还向她解释：秦家凤母女或者躲到别处去了，她们没有理由坐在家里等候炸弹，利莎渐渐地相信起我

这番话来。

但是吃中饭的时候(这天我们在下午四点多钟才吃中饭),利莎的父亲回来说,挖出了两具尸首,都是女尸,一大一小,无疑的是秦家凤母女了。然而我那个朋友又不肯断定是谁的尸首,他说面貌认不出,他远远地也看不清楚。

利莎听见这个消息便不肯吃饭,一定要我陪她再到灾区去。我们又走到高坡下面。

人们还在坡上挖掘。坡下站着一大群连声嗟叹的旁观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们费力挤到前面去。但是,除了一个坑,一堆瓦,一堆木片外,我看不见什么,我的眼光找不到那两具女尸。

"黎伯伯,"利莎痛苦地唤道,她又用低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一句:"她们在哪儿?"

我捏紧她那只微微发颤的手,轻轻地回答道:"我也看不见。"

但是我听见旁边一个女人的口音说:"那儿不是?席子盖住的!挖出来还是两母女紧紧抱在一起,鼻子嘴巴都是血!"

"在哪儿?在哪儿?我怎么看不到?"这是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你眼睛又没瞎,连这点儿都看不见!那儿,那儿,树子底下,席子盖住的,还有只脚露出来,"那个穿蓝布衫的三十左右的妇人吵闹地大声说。

我真想打她一个嘴巴。我又想把利莎的两耳蒙住。可是我并不曾动手,却跟着她那根粗肥的手指朝高坡的另一端望

去。那里横着一条下坡的路，原先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长在路旁，现在树上只剩下几根光秃的空枝，连路旁的青草也被铲去了一大片。就在这棵树下连接地摊开两张草席，一只小小的带泥的腿静静地伸在外面。

“黎伯伯，不会的，不会的！”利莎的带哭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这不是我熟习的声音，但是我听出来在那么多、那么浓的绝望中还有一丝一线的希望。

“利莎，你看，秦伯伯不是在那儿吗？”我低声说。我掉开眼睛，不敢看这张小小的脸，我现在用一句话就把她的希望完全毁灭了。

席子旁边立着三四个人，秦家风的父亲埋着头好像在那里痛哭。一切的疑惑都是多余的了，死吞食了那个垂着双辫的瓜子脸的小姑娘和那个瘦弱的中年妇人。

停了半晌利莎忽然爆发似地说：“秦伯伯，就是他，就是他害她们的！秦姐姐说过她爹爹专欺负她妈妈……”她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起来。

“这次不是他，是日本军人害了她们的，”我解释地说。她不回答，却只是哭着，过了半晌，我又说一句：“还是回去罢。”我忍住眼泪，牵着她的手慢慢地走回家去。

走出横街，她便止住哭声，一面抽噎，一面揩眼睛。忽然她仰起头认真地问我道：

“黎伯伯，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这句问话使我感到惊奇，但是看见她那泪痕狼藉的脸上的庄重表情，我只能够温和地回答她：

“利莎，我们是在做梦。”

她不作声，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然而过了片刻，她又带起责备的调子对我说：

“黎伯伯，你骗我！你骗我！”这次又是一阵抽噎阻止了以后的话。

敏，你不会了解我这时的心情。我真愿意我能够做一个大骗子，把她哄得收了泪笑起来。就让她以后骂死我，我也甘心。但是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学到这样的骗术呢？

“利莎，不要哭了，多哭也是没有用的，”我低声劝道；“你把我的眼泪也哭出来了。”我真的淌出了泪水。这次我们是绕道回家，现在走下斜坡到了田坎上了。

“我要……我的……秦姐姐……我……要……我……秦……姐姐，”利莎伤心地哭道，接着又是一句：“你把她……还给……我。”她看见我不作声，又说：“我不管，我要你还，我要你还！”

“我还你好了，”我无可奈何地随便答了一句。

“我要你现在就还，就在现在！”她赌气地说。

我还是答应一个“好”字。

她走了两步，忽然又哭起来说：“假的，假的，你骗我！”

我咬紧牙齿不作声。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应该做什么事。我只希望夜早点来，让这个孩子在梦里得到一点安宁，让我的心也得到一点平静。天色突然暗起来，太阳落到天外去了。

我们走上野草丛生的土坡，踏着由行人的脚步踏出来的

窄路。利莎的哭声停止了。她忽然弯下身子，连根拔起一棵叶子粗大颜色碧绿的草，捏在手里，出神凝视。我猜想她大概找事情来分心罢，便不去打岔她。

"黎伯伯，这是什么草？"她拿着草向我问道。

"这是野草，我叫不出它的名字，"我顺口答道。

"我要带它回去，拿针刺出手指头的血来培养它，"她庄重地自语道。

"这种野草？有什么用？"我惊奇地问道。

"那么这不是还魂草了，"她失望地说，马上把草丢在地下，愤恨地用脚踏它。然后她抬起头央求我：

"黎伯伯，你给我找一根还魂草来，我会培养它，要我流多少血，我都不怕。"

她的脸颊上还留着泪痕，两只眼睛哭得红肿了。

"利莎，我讲的是故事。还魂草本来就没有的，你不要多想了。我心里也很难过，"我痛苦地说。

她挨近我，把我的一只手紧紧地捏住，停了一下，才说："我晓得这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秦姐姐昨天同我在一起，今天她就在席子底下……"说着她又哭起来了。

这个平时脸上永远带笑的孩子现在却有这么多的眼泪。我想劝她止哭，却反而引出她的更多的泪水，我不能再开口了。

这个晚上没有电灯，书店早早关了门，大家都很疲倦，不到八点钟就吹灭洋烛睡了。我睡不着，又起来点燃洋烛，坐在书桌前面，笔捏在手里，我却始终写不出一句有意义的话。

今天从早晨起就下着细雨，正街上显得十分萧条。下午秦家两具死尸草草地安葬了。墓地离正街有一里多路，小小一块地方，两座矮矮的新坟，还没有石碑，四周是野草和荒冢。

我带着利莎把两副白木棺材送到了墓地。我们已经跟着别人一道走开了，后来又回到那里去。这次我和利莎手里都拿着野花，是我们自己采来的。我们把花放在小小的坟墓前。利莎行着礼，她出神地望着坟，亲切地、像对着活人讲话一般地说："秦姐姐，你爱花，我给你送花来了，是黎伯伯跟我两个摘的。"

我把花分出几朵放在秦太太的坟前，对着两个坟次第行了礼。我听见利莎还在讲话，她的眼光始终定在秦家凤的坟上，她喃喃地说：

"我还要来的，我明天过生，我要来请你吃面，我早就答应请你的。黎伯伯也在这儿，我们一起吃面啊。"

敏，我告诉过你明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你可以想像到那将是怎样的一个生日啊。想到这，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六

敏，今天是利莎的生日，但是一切全改变了。现在必须提笔给你写封短信，报告几件重要的事情。

上午九点钟就发了警报。小镇又遭轰炸，书店楼房全塌了，隔壁菜馆，对面百货商店，和甜食店，还有别的好几家店铺，不是变成瓦砾堆，就是剩着空架子。

解除警报后我那朋友立刻把太太和小孩送到离这里十几里路远的一个亲戚家去。他自己搬进大学的教职员宿舍，还在他的房里给我安了一个床铺。张先生和黄子文，便到各人的朋友处暂住。利莎的父亲恳切地留住他们，也留住我，他说："炸了一回不算什么，我一定要设法在最短期间把书店恢复起来。"因此他需要我们给他帮忙。我答应他暂时不离开这个地方。他对我讲话，脸上不带忧戚的表情，我甚至看见了他那乐观的微笑。他的确是一个奇特的人。

利莎上滑竿以前，把我拉在一边，抓紧我的手，低声说："黎伯伯，你要到秦姐姐那儿去啊。你替我多多去看她，今天来不及请她吃面了……我自家也想不到……"她只顾眨眼睛，泪花在眼里滚动。

"我晓得，你放心去罢。我有空会去看你，"我也低声安慰她。我轻轻地抚摩她的头，那只红缎子的大蝴蝶斜斜地歇在光滑的头发上面，领下别着我送给她的那个蓝花大别针，身上穿一件淡青色西装，脚上穿着她父亲买来的新皮鞋，这些都是为着她的生日准备的！我想多看她几眼，但是我又不敢多看，我觉得心在翻腾。

她母亲在催她上轿了，她看了看滑竿，便转过头来匆匆地对我说："我要回来的。到了雾季我就跟着妈妈回来。"然后她跑到父亲的身边去。

她母亲带着小弟弟。她跟着父亲，王嫂押着行李，被三乘滑竿抬走了。她在滑竿上不住地对我招手，还大声嚷：

"黎伯伯，你要多多来看我啊。"

敏，现在坐在大学教职员宿舍里，一张小小的书桌前面，我还分明地听见这句话。

（你小小的利莎，是的，我要多多去看你，也要多多去看你的秦姐姐。这时你爹爹在我对面咳了一声嗽，我看他一眼，啊，还有，我也要帮忙你爹爹把书店早些恢复起来。）

敏，以上几句，应该是我对利莎说的话，我心里这样想着，不知不觉间就把它们全写在纸上了。我现在也不想将它们删去，就让它们留着做这封信的结尾罢。敌人的大轰炸已经开始，以后我的事情会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我恐怕不能够再给你写像从前写过的那样的长信了。

1941年12月4日在桂林写完。

某 夫 妇*

三年前和我同路去汉口，而且在那里遇见温的那个朋友，忽然寄信来向我打听温和他太太的消息。这封意外的信使我放下工作想了一个整天。我想的是我回到四川以后听见的和看见的跟那一对夫妇有关的事。

我是去年十月底到重庆的，那时我住在西郊某友人的家。我到重庆的第二天，温和他的太太便来看我。他们并不是一路来的，温太太来得较晚。

在重庆看见温，在我的确是一个意外。我离贵阳前就听见朋友说温到甘肃去了。他和几个熟人一起到那边做事，说是抱了非过完五年、十年不回来的决心去的，还带了太太孩子同去。我见到温，才知道前些时候在贵阳听见的是朋友间的推测或者误传。

"明方不同我去，她还要回江津教书，"温说，他那张略现苍白色的脸上仍然带着他常有的温和的微笑。

这笑容和我在汉口看见的没有两样。但是脸颊却瘦了些，而且唇边一圈黑硬的短须使他显得老了好几岁。只有那只手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

和我的手相握时还是十分有力。

“你要当心身体啊，说不定你过不惯西北的气候，”我忽然担心地提醒他说。

“不要紧，我身体相当结实，”他毫不在意地答道。

我不相信他这句话，他的身体一点也不结实。近两年来朋友们常常谈起他的“神经衰弱”，现在我又见到他的缺少血色的脸。但是我也不能在他动身的前一天哓哓不休地向他谈扫兴的话。所以我只是关心地再叮嘱一句：

“不过当心一点，总没有害处。”

“这个我也晓得。”他点点头，笑了笑。他又说：“一个人多吃点苦也好，我以前太没有吃苦了，其实到那边去也不见得就吃苦。”

于是他兴奋地向我谈起他的抱负来。我这时才知道他到甘肃去，是去帮忙一个当县长的朋友做一点工作。县长年纪不大，是一个愿意苦干的热诚的人，他做县长有半年多了，据说还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温相信他可以帮忙这个友人做出一点成绩来。

“说不定会有人骂我做官了，”温忽然自语似地说，他把眉头略为一皱，但是微笑又使他的双眉马上展开了。

我不注意这句话，便也没有回答他，却问道：“听说你抱了非过完五年、十年不回来的决心，真的吗？”

他笑笑，稍微带点不好意思的样子说：“那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不过我的意思是这样：既然到了那边，总得住个三五年才不算白跑一趟。说实话，我年纪也不小了，也应该做出一

点事情才好。自然这也要看环境怎样，别人会不会让你久住下去……"他说得慢，但是态度很诚恳。这证明他的确抱了决心，而且他对这个多少有点把握。

"这很好，这很好。"我也笑笑。

我的话似乎使他很高兴，他站起来，在房里踱了几步，忽然含笑望着我，嗫嚅地说："要是我做得有成绩，你将来可以来看我吗？"

"一定的，一定的，"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他的脸上现出满意的表情。他又说："明方明年暑假要带孩子来，你要是能同她一路走，那好极了。"

就在这个时候明方来了。几年前我叫她做明方，现在我开玩笑地称她做"温太太"。胖胖的，高高的，眼珠黑黑的，眼睛圆圆的。

"你到底来了，就好像你跟他约好在重庆见面似的，"她和我握了手，望着我笑道。"他听说你来了，高兴得很。"她的眼光转到温的脸上。"我们都这样想，恐怕今年不能够在重庆等到你了。"

"但是我来了，我当初也料不到还会在这里看见你们，"我感动地说。

"不过他明天就要走了，"她压低声音说了这一句，忽然转过头去。

房里静了片刻。还是我先开口："孩子呢？怎么不把孩子带来？"

她已经回过头来了，脸上仍然留着微笑，好像她并不曾有

过忧愁似的。她答道:“孩子在他外祖母那里，我们今天走了几个地方，怕他吵便没有带出来。”

孩子只有八个月，我没有见过，听说很可爱，平时不爱哭。

“其实我们应该把小明带出来给你看看才对，”温接下去说，“我们起先有这个意思，后来因为明方要去看两个同学，怕在路上不方便，才把他留在家里。”小明是孩子的名字。

“不要紧，横竖你太太还要下重庆来，下次我们还可以碰见，”我说。他已经告诉我，他太太把他送走后第二天早晨便搭船上江津去。他们两个都不会有功夫再到我这里来。

我们不再提这件事，却夹七杂八地谈了不少别的话，谈到我，谈到他们夫妇，谈到许多我们共同的朋友。我们三个人谈得非常高兴。

天色暗起来。他们说有别的约会，必须告辞走了。

“现在这一别又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再见了，”他紧紧捏住我的手说。

“你怎么就忘记了，他刚才还答应明年同我一道去西北的，那时我们一定要留他至少住一年。”他太太好像故意说这样的话来安慰他，同时也像安慰她自己似的。她仍在微笑，眼光温柔地爱抚着他的脸，不过我看见她一双细眉略略一皱，鼻梁上现出纹路。但是纹路马上又消失了。

“是的，你一定要来，我希望做出一点成绩给你看，”他说着，脸上略略现出喜色，从他的眼睛里射出来的是带着自信的眼光。

“那时候孩子也开始讲话了，你们一定很热闹，”我顺口

说道。

“是啊，小明会乱蹦乱跳，吵得人不安的，”明方声音清朗地笑道，她的眼睛带着喜悦发光了。

做了父亲的温的脸上也带着同样的表情。他溺爱地说：“小明完全像我。脾气就跟我一样，而且脾气比我大。”

“这都是你娇养出来的，”明方含笑地抱怨一句。

温笑了，他解嘲似地对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看见一个小生命慢慢地长大，他会笑，会动，会看你，不由你不心疼他。其实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你，”他掉向他太太，“你和你母亲也是一样娇养他。”

明方没有话讲了。他们走的时候，还恳切地嘱咐我不要去给他们送行，因为我向他们打听汽车和轮船出发的时刻与地点。温坐车走，明方搭船去。她迟一天走，我至少来得及送她。

但是两个人我都没有送，这天晚上我就因为旅途劳顿病倒了。发烧，头痛，胃口不好，四肢无力……我连下楼也觉得麻烦，更不敢想到去汽车站和江边了。

不过我的思想还能够跟随他们，躺在床上，我睡梦模糊中仿佛望见了汽车开动，轮船起锚；清醒时我暗暗祷祝他们旅途平安。

两个月以后，温寄来一封短信，说他在那边过得很好，但是也很忙，因此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希望我暑假践约去看他。又说他太太也许会提早行期，甚至最近就动身也说不定。

读到这封信，我不觉微笑了。温从来就不喜欢写信，即使

有时间，即使朋友们写了长信给他，他也不高兴拿起笔写几句回答的话。这是一个出名的怕写信的人。朋友们知道他的脾气，朋友们也原谅他。

信到后第六天的傍晚，明方忽然来了。她第一句便说："我来向你告别。"

"怎么，你真的就要到那里去？"我惊问道，我想起了温的信。

"当然是真的，"她笑着点点头；"我亲戚帮我买到一张飞机票，刚才来通知说明早晨起飞。"她脸红红的，精神焕发，带着兴奋的样子。

"为什么这样快？"

"我也想不到，我还是昨天上午到重庆的，所以我现在很忙，也不能跟你多谈谈，"她匆匆忙忙地说，刚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又站起来。

"那么你明天便可以看见他了，"我鼓舞地说一句。

她立刻了解我指的是谁，便答道："明天还不可以，至早也要后天，还要坐一段汽车。"

"后天也是很快的，"我说，又问一句："小明也带去吗？"

"带去的，"她答道，随后又笑着解释道："他挂念小明得不得了，每封信都问到小明这样小明那样。要是不把小明带去，他一定不依我的。"我从她的笑容里看出了母亲的慈爱。

"其实我看你也舍不得离开小明，"我笑道。她也笑笑。这应该是一种满意的笑。

"你要我给他带什么口信去？"她问了一句。

我想了一想。我有许多话要对温说，我应该写信，可是来不及了，而且我不想在这时候拿笔，一时恐怕也写不出什么。我便回答她："没有。请你替我问他好。"我又加一句："我希望他在努力做事之外，还要好好地保养身体。"

后一句话在她听来应该是多余的。然而她却带着诚恳的感谢接受了它。她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告别。她感动地说："我一定要把你的话转达。"她又叮嘱道："你暑假一定要来啊，我们等着你。"

我爽快地答应着，一面把她送下楼去。我看着她坐上了黄包车，又望着车夫飞跑地把车子拉起走了。

她去后一直没有信来。过了一个月我到了成都。某一天听见一个朋友讲起温太太也在这里，我觉得很奇怪，详细一问，才知道那班飞机机件发生了障碍，在成都停下来便没有再飞。乘客们有的搭下一班的和以后的飞机走了，有的则被留在成都等候空位，明方便是留下来的客人中的一个。

我第二天去看明方。她住在一个旧同学的家里(同学夫妇都是某银行的行员)，正抱了孩子在客厅里玩。她热诚地欢迎我，我的来访使她感到惊喜。

"想不到我还会在这里看见你，"我笑着说。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会在这里等这么久，"她笑答道。

"他常有信来吗？"

"常有信来。他很着急呢。"

"他身体还好罢，工作怎样？"

"身体不大好，工作倒还不怎么困难。"

我们继续谈了几句关于温的话。白白的圆脸的小明睁大他那对滚圆滚圆的黑眼睛望着我，忽然"嘿嘿"地笑起来。

"你在笑什么？小明，你认得黎伯伯吗？你喊黎伯伯，喊呀！"明方逗弄小明道，她把自己的脸颊偎近小明的，两个人的脸颊都是红红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小明，他会讲话吗？"我指着小明问道。

"还不会，不过会喊爸爸妈妈了，"她答道，又对小明讲："小明，喊声爸爸呀，喊爸爸……"

孩子用劲地唤了一声，相当清楚。

"他爸爸要是听见，一定很高兴的，"她得意地说，她的脸因笑容显得很亮。"啊，小明，喊伯伯，黎伯伯。"

"是的，这个孩子真乖。他爸爸看见他去，一定很高兴，"我接下去说，我想起温去甘肃的前一天对我说的关于孩子的一段话。

她问起一些关于我的事情。然后我问她：

"那么你什么时候可以再飞？"

"大约就在这两三天，航空公司的人说下一班飞机一定有空，他们会来通知的，我昨天才去问过，"她声音平静地说，显然她对搭下一班飞机去兰州的事情很有把握。

我答应过两天再来看她。隔了一天早晨我再到她那里，她出乎我意外地告诉我，她要回重庆去了。"……他昨天来了信叫我不要去，他说他自己也预备回来。"

"为什么要回来？他在那边不是工作得很顺利吗？"我惊

讶地问道。我又加上一句："我还打算今年暑假到他那里去。"

"据说那个做县长的朋友也要离开，还有两个朋友也要走，已经有了一些意外的障碍……"她说，一对细眉紧紧地皱在一起。

"那么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关心地问。

"恐怕还要等一些时候。我打算先回江津去教书，等他回来再决定下半年的计划，"她答道。

"也好，"我顺口吐出这两个字，心里却在想别的事情。我的确准备暑假中到温那里去看看，我从来没有去过西北，很想趁今年比较空闲的时候走一趟。现在听说温要回来，那么我去西北的计划也只好打消了。

"小明呢？"我忽然问道。

"在楼上睡觉，"她答道，眼光掉向楼上，眉毛开展了，嘴上浮出微笑。然后她好像回答我的"也好"两个字似的，接着说："他回来也好。他最近来信说身体不好，神经衰弱相当厉害。那边事情多，又难于应付。回来稍微休息一下也是好的。不过……"

"对，我很赞成，我就担心他身体吃不消。"我猜得到跟在她的"不过"后面的是些什么话，而且我也想过来的：这应该是"他又白跑了一趟"之类，我和她有同感。我们都不盼望他这时扫兴地回到重庆来。我不愿意听她再说下去，便打断了她的话头。

"我想还是劝他养息一年，或者在一个中学里稍微担任一点功课，等他身体养好了再出去做事。你看这样好不好？你

也可以帮我劝劝他，你的话他倒肯听。就是你们两个平常都不爱写信。”说到这里她微笑了，在这笑容中闪耀着一线希望之光。我看出来她还是这样深切地爱她的丈夫，我替温感到幸福。

这时她同学家的老妈子从外面进来报告说“有预行了”。又听见隔壁有人在嚷：“拿出来了。”

“那么你等一下，我去把小明喊起来，”她匆匆地说，就站起来，往楼梯那边走去。

在这个城市里，发预行警报是用一面旗来表示，旗子上写明白“预行警报”，插在十字路口有警察岗位的地方。因此有人看见旗子就说：“拿出来了。”意思就是：发了预行警报。

明方抱了孩子下楼，小明带着瞌睡的样子眯着眼睛，没有哭，也不笑，头上戴一顶白毛线帽子，身上穿一件白毛线衣服，脸红红的。

“我们小明瞌睡还没有醒，连妈妈也不肯喊，连黎伯伯也不肯喊，”她笑着逗弄孩子道，一只手还提着一口皮箱。

“你把箱子给我，我替你拿。”我伸手把箱子接过来。

“你没有别的事情？”

“没有，我陪你去躲警报，”我答道。

“那么，谢谢你。”明方微微一笑，然后又去同小明讲话，她摇动他的身子，把脸偎着他的脸颊，他的眼睛渐渐睁大，他终于“嘿嘿”地笑起来。

老妈子收拾好东西，提了一个布包出来，我们看着她锁了大门。她走得很快，我同明方慢慢地在后面走，明方抱着孩

子，我提皮箱。

天空堆着好些片白云，但是阳光还不时穿过云堆射在街上。我看不见一线蓝天，便断定道："今天不会有敌机来的。"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报告空袭警报的汽笛又含含糊糊地响了。

少数人惊惶地跑起来。一部分人加快脚步往前走。明方对我笑道："你说敌机不会来？"孩子在她的肩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傻笑。

"现在只是'空袭'，怕什么？"我笑答道。我们已经走近城墙，望见那个缺口了，人们接连不断地爬上城墙的缺口，走下城外菜畦荒冢间去。我们也从这里出了城。

我看明方的鼻头上沁出几颗汗珠，呢大衣沉重地在她身后摆动，便问道："你累吗？"

"不累，"她摇摇头答道，然后她又把鼻尖触小明的脸颊，爱怜地说："你小眼睛东张西望，究竟在看些什么？"

孩子快乐地"嘿嘿"笑起来。她对我说："人家跑警报，他倒在看热闹，你看他两只眼睛睁得滚圆滚圆的。他多半以为这么多的人都在赶会，所以他很高兴。"

"这个孩子倒很可爱，他一天老是笑，"我接口说，我们一面讲话，一面走，路窄人多，我们走得慢。后来我们跨过一条干沟，走到一块种着几棵柏树的墓地上去。

土堆似的坟畔蔓草丛生，墓碑全倒下来，有的埋了一半在土里，不肯让人看见一个字。明方拣了一块较光滑的石碑坐了，嘘了一口气。孩子活泼地在她的膝上跳动。

"有了孩子真磨人。他一天一天地重起来了，"她抱怨地说，但是看她的脸色，我知道她对这个孩子很满意。果然她马上就添一句："不过幸好他还不爱哭。"

"小明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我晓得你们两个都爱他，"我接嘴说。

"是啊，他父亲才真是爱他，每封信都要问起他，问他身体加重没有，问他会不会喊爸爸，问他是不是常常笑……问得太多，他连我都忘记了，"她笑着说。

"做父亲的大概都是这样，"我顺口回答一句。我这时刚刚在一个快要踏平了的坟头上坐下，就听见炮声一响，知道是解除警报了。我们便动身走回城里去。

下午我陪她到航空公司去把票子退了。四天以后她搭了某银行的车子回到重庆去。

那天早晨我去送行，那是行员眷属坐的车子，送行的人不少。明方坐的是左边窗的座位。开车的时候，她同孩子都伸出头来望我。我对她挥手，孩子睁着那对乌黑的圆眼睛"嘿嘿"地笑着，引起好些送行者的注意。我看看孩子，又看看母亲，我觉得两张脸像得很。

三个星期以后，我回到重庆，仍旧住在西郊友人的家里。温没有来信。明方早到江津去了。我去过一封短信问起温的消息。她回信说，温大约一个月内动身；她在江津教书，钟点不太多，生活还好，暑假中要回到重庆来。

但是不等到暑假，她便来了。她没有来找我，等我知道她来重庆的时候，她已经动身去广元了。她给我寄来一封信：

××：我是得到他在广元病重的电报，才赶到重庆来的，现在找到了直达广元的车子，明天早晨动身。临行匆忙，没有能来看你，请你原谅。心里乱得很，只求他病势无变化，让我在那边好好地看护他，把他安全地送回重庆来。……明方。

字迹相当潦草，不像她平日写的信。

我等着她带来好消息。我向各处打听温的病情，始终得不到一个确实的答复。

明方一去就没有信来，但是有一天意外地她自己来了。她回来了，她站在我的面前，她还是身材高高的，眼珠黑黑的，眼睛圆圆的。然而她瘦了，她的笑容消失了，两颊的健康红褪色了。她不曾开口，我便知道她要向我报告什么样的消息。

"你看见他了吗？"我颤抖地小声问道，我埋下头不敢看她。

"我去迟了，"她声音苦涩地答道。我忍不住抬起眼睛来。她恼恨似地微微摇着头，眼睛是干燥的，里面却有几根红丝。

"怎么这样快？我简直想不到，"我痛苦地说。

她不答话，埋下头，坐在我的斜对面，一只手撑着右边脸颊。屋子里是一阵难堪的静寂。忽然楼下院子里响起一个小孩的清脆的笑声，接着有两三个年轻的声音哼起了一首歌。

"小明呢？"为了打破这沉默，我发问道。

她抬起头看我一眼，眼睛亮了一下，像暗灰色的天空闪起一股电光似的。她仍然用苦涩的声音回答我："他还在他外祖

母那里。”停了一下她又说：“他一点也不晓得。”她似乎想笑，却又不能笑。

“他不晓得倒好，”我点着头说，我想说几句安慰她的话，但是我找不到适当的句子。我心里难过，怎么能够装出平静的笑容？我接下去再说：“他会慢慢长大起来的，他一定是个好孩子。”

“是的，他会慢慢长大起来的，”她似乎得到一点安慰地说，随后她又加上一句：“没有父亲的孩子向来长得很快。”

这句话使我打了一个冷噤，她的嘴又闭上了。我注意地看她的脸，脸上失掉了从前的那种光采，眉毛深锁，眼睛是干的，眼白上泛着浅红色，眼皮略微肿起来，她一定哭得太多了，现在才显得这么冷静。

“他没有留下什么话？”我不想再拿这种话问她，但是话自己冲出我的嘴来。

“没有，”她摇摇头答道。

“那么他害的什么病？为什么这样快？为什么他们不早些打电报给你？”我不应该说这些类似审问的话，但是我的痛苦逼着我把它们吐出来，用它们来折磨她，也折磨我自己。

“我不知道。”这短短的冷冷的答话是她迟疑了片刻才说出来的，这使我感到惊愕，使我发出下面一句问话：

“他葬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她脸上的阴云堆得更厚了。

我不能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冷淡地回答我，我有点不满意，便追逼地再问一句：

"你真的到了广元?"

她对我这句问话并不感到惊奇，她仍然用她的苦涩的声音回答我：

"汽车过了河，驶进那座古城，我还看见那巍峨的鼓楼，我觉得城里的一切都很朴素、安静，那里决不像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我下车时还疑心我在做梦。"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我现在真正在做梦了。"

是的，那是广元，我认得那个地方。她讲得不错。那座古城的景象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在那里住了三天，不，四天。找到车我马上就逃走了，我恨那个地方，我怕那个地方，我永远不要再看见那个地方！"她忽然换了语调，提高声音切齿地说。

"但是他的遗体不是葬在那里吗？你既然到了广元，怎么又说不知道他埋葬的地方?"我惊奇地问道，我想难道她受了大刺激以后弄得神经失常了吗？不然她为什么对我说这些不可了解的话？

她睁大眼睛望着我，好像我说了什么伤害她的话似的。仍旧是那两颗漆黑的眼珠，但是它们现在显得多么不灵活。忽然她把眼珠大大地动了一下，把头往后一仰，然后猛烈地摇着头，我这时注意到她有着那么长、那么浓的头发！她感情奔放地用相当高的声音说："他没有病，也没有人埋葬他，一颗炸弹打得他没有一点痕迹，真是什么也没有留下来。"

"这不可能！不会是真的！"我仿佛受到当头一棒似的，我突然站起来，把手在桌上一拍，辩驳似地大声嚷道："你不是说

接到他病危的电报吗？”

“那是他们骗我的，他们想不到我会马上赶到广元去，他们还给我打了一个他病故的电报，可是我自己到了广元了。我亲眼看见那个地方，城墙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缺口，这就是那天轰炸的痕迹，死的人不止一个，坑已经填平了。”她停了片刻，又说：“我住了四天，每天都在那个地方徘徊许久，我遇到一次警报，我不走，我就站在那个缺口旁边，我想这应该是他站过的地方，我希望一颗炸弹把我也打得粉碎，让我和他埋在一处，让我的血肉同他的混在一起。我真想就这样死去。但是那天敌机却偏偏不来。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我从没有那样地失望过。”她疲倦地叹了一口气。“以后，我就走了，永远离开广元了。”

我没有讲话，只得颓丧地坐下来，现在除了安慰的话以外，我似乎不应该对她说别的话。但是我将用怎样的话安慰她呢？

“我要走了，”她站起来低声说。

“你再坐坐罢，”我慌张地挽留道，我想不到她会走得这么快。我希望她多留一些时候，我觉得还有许多话要对她说。

“我不想坐了。我本来不想对你说这些话的，现在终于说了，其实说了这么多，也觉得心里畅快一点。”仍然是用低沉的声音慢慢说出来的。她的眼光无力地看四周，右手伸上去按着头发。

“那么你……”

她不等我把话说完，就答道：“我回到江津去教书。我自

然还应该活下去。”

“小明呢？他还好罢，他会成为你的安慰的，你应该……”以后的话没有说出来，但是她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她的眼睛突然亮起来，新近消瘦的脸庞又显得有了生气，我看见一丝笑意从愁云堆中挤出来，但是马上又被另一些阴云盖上了。她同意地点点头，说：“是的，单是为了小明，我也应该好好地活下去，我应该好好地教养他，所以我要把他带到江津去。他在我身边，就像他父亲也在我身边一样。他将来一定可以做他父亲未做了的事。”她停顿一下又加上一句：“不知道会不会轮着他来给他的父亲报仇。”

这后一句话我当时不大了解，但是她走了以后我忽然明白了。她说得对。要小明出来替父亲报仇，那未免太迟了，至少也还要等十几年，在这个广大的中国土地上不是还有着温的许多朋友么？不是还有着无数的像我这样的和温同命运的知识分子么？若说报仇，那应该是我们的事，无论如何不应该轮到小明。

我把明方送上进城去的公共汽车。她临走时答应到江津后便写信给我。她果然不失信。但是那封信以后就再没有消息来。我去过两封信都没有得到回音。三个月又过去了。最近我到她的母亲那里去打听消息，据说她和孩子都活得很好，我想，以后我也用不着为这年轻的母子担心了。

1941年12月27日在桂林。

小人小事

《小人小事》，一九四三年 四 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迄一九四七年八月，共印四版（次）。

猪与鸡*

窗外，树梢微微在摆动，阳光把绿叶子照成了透明的，在一张摊开的树叶的背面，我看见一粒小虫的黑影。眼前晃过一道白光，一只小小的白蝴蝶从树梢飞过，隐没在作为背景的蓝天里去了。我的眼光还在追寻蝴蝶的影子，却被屋檐拦住了。小麻雀从檐上露出一个头，马上又缩回去，跳走了。树尖大大地动了几下，我在房里也感觉到一点爽快的凉意。窗前这棵树是柚子树，枝上垂着几个茶碗大的青柚子，现在还不是果熟的时候。但是天气已经炎热了，我无意间伸手摸前额，我触到粒粒的汗珠。

现在大约是上午九点钟，这是院子里最清静的时候。每天在这些时候，我可以在家里读两三个钟头的书。所以上午的时间是我最喜欢的。这一天虽说天气较热，可是我心里仍然很安静。

这是我的家，然而地方对我却是陌生的，我出门十多年，现在从几千里以外回来，在这里还没有住上一个月。房子是一排五间的上房和耳房，住着十来个人，中间空着一间堂屋，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三期。

却用来作客厅和饭堂。我们住得不算挤，也不算舒服，白天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有的到学堂上课、上机关办公，只剩下我一个在家里，我像一个客人似地闲住着。除了上街拜访亲友、在家读书写字或者谈谈闲话外，我没有别的事情。用“闲静”来形容我现在的生活，这个形容词倒很恰当。

一阵橐橐的皮鞋声在石板路上响起来，声音又渐渐地消失了，我知道这是谁在走路，我不知不觉地皱了皱眉。这也许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但这样的动作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抬起头凝视窗外的蓝天和绿树，我似乎在等待什么。

“×妈的，哪个龟儿子又在说老子的闲话！老子喂个把猪儿也不犯法嘛！生活这样涨法，哪个不想找点儿外水来花？喂猪也是经济呀！”有人在大声讲话，声音相当清脆，仿佛是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口中吐出来的。但是不用看我便知道说话的是那个三十几岁的寡妇冯太太。一个多钟头以前我还看见她站在天井里柚子树旁边，满意地带笑望着一头在泥地上拱嘴的小黑猪，和五只安闲地啄食虫豸的小黄鸡。她的眼光跟着猪和鸡在动，她嘴里叽咕地讲了几句话。她穿一件黑绸旗袍，身材短胖，脸色黑黄，是个扁圆的脸，嘴唇薄，不时露出上下两排雪白的牙齿。我心里暗笑，想着：这柚子树下的人、猪、鸡，倒是一幅很好的图画。她好像觉察出来我在看她，忽然掉转身子，略带忸怩地走出去了。

为着这猪和鸡，我们院子里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吵架的事。大约在十二三天以前，也是在晴明的早晨，说是左边厢房住客的儿子把小鸡赶到厕所里去了，这位太太尖声尖气地在庭前

跳来跳去，骂那个王家小孩。她的话照例是拿“狗×的”或“×妈的”开头。

“你狗×的天天就搞老子的鸡儿，总要整死几个才甘心！老子哪点儿得罪你嘛？你爱耍，哪儿不好耍！做啥子跑到老子屋头来？你默倒①老子怕你！等你老汉儿②回来，老子再跟你算账。你狗×的，短命的，你看老子整不整你！总有一天要你晓得老子厉害。”

“你整嘛，我怕你这个婆娘才不是人。哪个狗搞你的鸡儿？你诬赖人要烂舌头，不得好死！”王家小孩不客气地回答。

“你敢咒人！不是你龟儿子还有哪个！你不来搞我的鸡儿，我会怪你！老子又没有碰到你，你咒老子短命，你才是个短命的东西！你挨刀的，我×你妈！”

“来嘛，你来嘛，我等你来×，脱了裤子，我还怕你……”

冯太太气得双脚直跳，她自然不肯甘休，两个人说话越来越龌龊了。我也不想再听下去。他们大约吵了大半个钟头，王家小孩似乎讲不过往外溜走了。剩下冯太太一个人得胜般地咒骂一会儿，院子里才静下来。我吃过中饭上街去时，看见小鸡们在树下安闲地散步。我走过巷子旁边的小独院，门大开，堂屋中一桌麻将牌，围着方桌坐的四位太太中间，就有那个先前同小孩吵架的中年妇人。她好像正和了大牌，堆着笑脸，发出愉快的笑声。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四位太太还没有离开牌桌，不过代替阳光的现在是五十支烛光的电灯了。

---

① 默倒（四川话）：“心中想到”、“以为”的意思。

② 老汉儿：父亲。

又有一次两只小鸡跑进我们房里来找食物。被我的一个最小的侄儿赶了出去，那时她刚从右边厢房里出去，看见这个情景，不高兴地在阶上咕噜了好一阵子，不但咕噜，而且扬声骂起来：

“你好不要脸，自己家里有东西你不吃，要出去吃野食子，给人家撵出来，你就连腔都不敢开了。真是没出息的东西。”

没有人答话，我叫侄儿不要理她。小侄子低声在屋里骂了三四句，就埋头去读书了。

她继续骂：“挨了打，就不做声了，真是贱皮子。二天你再跑到人家屋里头去，人家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断你的腿！”

还是没有人出来理她，她胜利了。大约半个钟点以后我又看见她坐在牌桌上，不过嘟起嘴，板着脸。

“二天”小鸡照常到我们的屋里来，侄儿不在家，我让它们随意在各处啄食。她那时在院子里讲话，似乎应该看见小鸡们的进出，但是她有说有笑地走出去了。也没有人看见她打断小鸡的腿。

又一天她的小鸡少了一只，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或者就如她后来所说被王家小孩弄死了也未可知，或者是淹死在什么沟里了，总之她没有把它找回来。于是黄昏时候她站在院子里骂：

“狗×的，龟儿子，死娃子，偷了老子的鸡儿，×妈的，吃了就胀死你，闹死① 你，鲠死你，把你肚子、肠子、心子、肝子，都

---

① 闹死：毒死。

烂出来，给鸡儿啄，狗儿吃。你不得好死的！……”

没有人答话。我故意立在窗下看她咒骂。她穿着一件条子花布的汗衫和一条黑湖绉裤子，手舞着，脚跺着，一嘴白牙使她的黑黄脸显得更黑黄了。

“哪个偷老子鸡儿的，有本事就站出来，不要躲在角角头① 装新娘子。老子的鸡儿不是好吃的，吃了要你一辈子都不得昌盛，一家人都不得昌盛！……”

“真像在唱《王婆骂鸡》②，”我的侄儿走到我旁边轻轻地笑着说。我也忍不住笑了。

她整整骂了一个钟点。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光景，她又在自己的房门口骂起来，差不多是同样的话，还有：

“你偷老子的鸡儿嘛，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负的，二天老子查出来，不打死你，也要掐死你，你死龟儿子永远长不大的！……唉，若不是因为生活艰难，哪个愿意淘神喂鸡儿？……你这个小东西，把老子整得好苦，你这个没良心的，短命的！……”

“你在说哪个？讲明白点！”王家小孩从房里走出来，冷冷地打岔说。他不过十一二岁，瘦长脸，颧骨略高，下巴突出。

“说哪个，我就说你！说你死龟儿子，看你敢把老子咋个③！我×你妈，我×你先人！”妇人双脚跳着，好像要扑过去似地大声说，脸挣得红红的，但是她和那小孩中间还隔着一个

---

① 角角头：角落里。

② 《王婆骂鸡》：川戏名。

③ 咋个：怎样。

天井。

“你说我，话就要讲清楚点，不要带把子，”小孩带着大人气指斥道；“你又要×妈×娘的！你给人家×惯了，才随时挂在嘴头。哪个希罕你的鸡儿？你怕人偷，你黑了① 抱着睡觉好啦……”

妇人被这几句话激得更生气了。她这次真的跳下天井里去，不过走了三四步就站住了。她口水四溅，结结巴巴地骂道：

“你骂我……好……我不跟你死龟儿子吵！等你妈回来，我要她给我讲讲清楚，真是你妈给你爹×昏了，才生出你这种短命儿子来！”

以后是一番激烈的争吵咒骂。只是话太肮脏，我受不了，只好牺牲了读书时间，出去拜访朋友。

那是前两天的事。

猪是新养的，关于猪似乎还不曾有过大的争吵。所谓“闲话”，我倒听见过几次。院子里添了一口猪，到处都显得脏一点。同院子的人似乎都不满意，也有人咕噜过，我的侄儿侄女们就发过怨言，但是还没有谁出来向冯太太提过抗议。这时她忽然提起喂猪的闲话，大概她自己听见了什么了。不过这件事跟我不相干，我也不去注意。

“冯太太，你倒打得好算盘，鸡儿也喂，猪儿也喂，”一个老太婆的羡慕的声音插进来说。“今天猪肉涨到八块多了。”

---

① 黑了：夜里。

“严老太，你还不晓得，说起喂鸡儿猪儿，真把我淘够神了，天天在操心，晚上觉都睡不好。一会儿龟儿子黄鼠狼又来拖鸡儿了，一会儿猪儿又闯祸了。就是为这几个小鸡，我跟狗×的王家娃儿不晓得吵了好多架！真是淘神得很。不是我吃饱饭没有事情做，实在生活太高了。不然哪个狗×的还来喂啥子鸡儿猪儿的，”冯太太带笑地说，似乎她对她的猪儿鸡儿十分满意。

“是啊，不说鸡，我是两个多月连猪油气也没有沾到了。鸡蛋也要卖一块钱一个，说起来简直要吓死人，”严老太太叹气似地说。

“是啊，现在东西一天比一天贵，”冯太太应道；过后她又许愿道：“下了蛋，我给你老人家送几个过来。”

“不敢当，不敢当，”严老太感谢道；停一下她又说：“到那时又不晓得会涨到几块钱一个啊。”

“哪个又晓得啊，”冯太太接口道。

“听说昆明阴丹布跌到一块钱一尺啦，”严老太像报告重要消息似地说。

“哪儿有的事，你信人家说！这儿阴丹布只见涨，差不多二十块了，”冯太太高声应道。

在她们谈话的时候三只小鸡先后跳进了我们的房里，居然悠闲地在屋里散步起来。

“你看，它们又跑到人家屋头去罗，喊也喊不听。严老太，为了这些鸡儿我不晓得操多少心，呕多少气，说起来真伤味。你老人家也晓得我是出名好赌的，这几天我连牌也没有摸

了。”

“是啊，我正奇怪咋个这几天没有看到你在张家打牌，我猜未必你戒了赌吗？又没有听说你跟哪个吵过架。原来是这回事。其实打牌也是混时候，喂鸡儿不但混时候，还会赚钱，”严老太附和地说。她又顺口添了一句恭维话：“到底还是你冯太太能干。”

“哎哟，严老太，你倒挖苦起我来啦！我哪儿配说能干！”冯太太大惊小怪般地说。“其实这个年头想点法子挣点外水，也是不得已的事。要靠我们老爷留下来的那点儿钱，哪儿能够过日子！严老太，你想想，我当初搬进来的时候，才五块钱的房钱，现在涨到五十块了，听说还要涨嘞。”

“你们那位方太太说是很有钱，公馆就有好几院，家里人丁又少，也不争① 这几个房钱。咋个还要涨来涨去？”严老太接嘴说。

“越是有钱人，心越狠。几间破房子，一下雨就漏水，一吹风就掉瓦。若不是因为在抗战时期租房子艰难，我老早就搬家了，看她老婆子又把我咋个！”冯太太气愤地说。

“不要再说，她来啦，就是方太太，”严老太低声警告道。

“真是说起曹操，曹操就到。她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来了总没有好事情，”冯太太咕噜道。

我等候着，果然不多久就响起一个女人的高而傲慢的声音：“喂，哪儿来的猪儿？我的房子里头不准喂猪。是哪个喂

---

① 不争：不差。

的？给我牵出去。”

声音比人先进来，然后听见她招呼：“冯太太，你今天没有走人户①去？”

冯太太讲了两句应酬话，房东太太又大声嚷着：“冯太太，你晓得是哪个喂的猪，我这房子里头是不能喂猪的！如今越来越怪，天井里头喂起猪来了。我不答应，我不答应！”

“方太太，我哪儿晓得，我一天又难得在屋头，”冯太太支支吾吾地说。

“我顶讨厌猪。又肮脏，又难看，到处拱来拱去，要把房子给我拱坏了。租几个房钱不打紧，把房子拱坏了，我哪儿来钱培修！”房东太太说着又发起牢骚来了：“如今租房子给人真值不得，几个租钱够啥子用，买肉买不到几斤，买米买不到一斗，还把房子让给人家糟蹋，好好的房子给你来喂猪。”

“方太太，你也不要呕气。我就没有糟蹋过你的房子。我这个人是顶爱干净的。我住别人房子也就当成自家房子一样爱惜。我们老爷生前就时常夸奖我这个爱干净的脾气，”冯太太有条有理地掩饰道。

“那么我倒应当给你冯太太道谢罗，”方太太讽刺般地说。

这时意外地插进来一个小孩的清脆的声音：“冯太太，你的猪儿今早晨又跑到我们屋里头来过。”

“你背时鬼，哪个要你龟儿子来多嘴？”冯太太气恼地骂起来。

---

① 走人户：出门拜客。

“冯太太，是你喂的猪？你刚才还说你不晓得，”方太太故意惊怪地问道。我从声音里听出她的不满来了。

“是我喂的又咋个？×妈喂猪又不犯王法！生活高，哪个不想找点儿外水，这是经济呀！公务人员也有喂猪的。我一个寡妇就喂不得！”冯太太突然改变了腔调厉声答道，似乎已经扯破脸皮，她用不着再掩饰了。

“房子是我的，我不准喂就不能喂！”

“我出钱租的，我高兴喂就要喂。我偏要喂，看你把我咋个！”

“你不要横扯。我把你咋个？我要喊你搬家！”

“我偏不搬！我出得起钱，我不欠房租，你凭啥子喊我搬！”

“好，你出得起钱。我给你讲，从下个月起房钱每一家加一百块，押租加一千块。你要住就住，不住就搬。我没有多的话，你不把猪牵开，房钱还要格外加五十。话说得很明白，二天你不要怪我反面无情。”

“你乱加房钱，我不认。你凭啥子要加我房钱！老子不是好欺负的。老子偏不加房钱，也不搬，看你把我咋个！”

“我也不跟你多说。到时候我会喊人来收房钱。房子是我的。我高兴加多少就加多少，住不住随你！目前生活这样高，单靠这点儿房钱也不济事。我不加，我拿啥子来用！”方太太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大段，不等冯太太答话，便回过头对王家小孩说：

“王文生，你记到给你妈说一声，下个月起房钱加一百块，

押租加一千，不要记错罗。我走了。”

她真的转身走了。冯太太在后面叽咕地骂着：

“你老不死的，卖×的，快五十岁的人啦，还搽脂抹粉卖妖娆做啥子！你就只会迷住你们的老爷。你默倒老子会看得上你。老子有钱喂猪也不喂你狗×的！你少得意点。二天一个炸弹把你房子一下子炸得精光，老子才安逸嘞！”

“房子炸光了，看你又有哪点好处？”王文生幸灾乐祸般地说。

“哪个喊你龟儿子乱岔嘴！都是你狗×的闹出来的祸事！”冯太太忽然扬起声音骂道；“你告状告得好，我默倒你有多大的赏嘞！你们还不是要涨房钱？你默倒给老妖精舔沟子① 一下就舔上了！你这个不要脸的死龟儿子！”

以后这大人同小孩的吵架又开始了，大约继续了二十多分钟。三只小鸡似乎在我房里玩够了，又慢慢地走出去。冯太太好像出街去走了一趟。大半天都听不见她的声音。就只有一只蜂子嗡嗡地在玻璃窗上碰来碰去。天显得更蓝。树叶显得更亮。我感到一点倦意了。

下午我睡了一大觉，醒来听见一阵“伙失伙失”的声音。走出房门，我看见冯太太正躬起身子在那里赶猪，她笑容满脸，并且带着柔爱的眼光看她的小猪。猪并不太小，已经有普通的狗那样大，全身灰黑色，拱起嘴，蠢然地摇摆着身子。

晚上我同侄儿侄女们谈着冯太太的事。已经过了十点多

---

① 舔沟子：拍马屁。

钟，右边厢房里忽然响起一阵“呜呜……打打”的尖声。我一听就知道是冯太太的声音。

“黄鼠狼又来拖鸡儿了，”我那个最小的侄儿说，他满意地微微一笑。

这晚上冯太太为了黄鼠狼拖鸡的事闹了三次，有一次似乎在半夜，还把我从梦中吵醒来了。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左右，冯太太在院子里同王家小孩大声讲话。这次不是相骂，她的语调相当温和：

“王文生，我求求你。你不要再整我的鸡儿，你做做好事罢，我就只剩下这一个鸡儿了。说起来好伤味，好容易长大一点儿，昨晚上全拿给黄鼠狼拖走了，就只剩下这一个孤孤单单的。我好不伤心！你还忍心再整我，我又没有得罪你……”

这种带点颓丧的告饶的调子倒使王文生满意了。他笑着，不答话，却跳跳蹦蹦地跑出去了。王文生的妈妈在城外做事，一个星期里回来住两天。他父亲是一个三十几级的公务员，早晨七点钟上班，下午五点钟后回家。没有人管束这个孩子，有一个十六七岁的聋丫头伺候他。

王文生的影子不见了，冯太太在后面低声骂了一句：“短命的畜生，不得好死的。”聋子丫头站在房门口嘻嘻笑着，听不见她的话。

过一阵冯太太进房去了。王家小孩又高高兴兴地跳进来。他忽然爬上一棵树，坐在枒枝上，得意地哼着抗战歌。小黑猪在树下拱来拱去。孤独的小鸡没精打采地在土地上找寻

食物。

一个清脆的声音打破了宁静的空气："冯太太，我们太太请你快点去。"这是外面那个独院里的丫头在讲话。

"好，我就来，"冯太太在房里应道。过了一会儿她走出来，穿得整整齐齐的。她看看猪和鸡，又看看坐在树枝上的王文生，便站住装出笑脸对那个孩子说：

"王文生，难为你给我看看猪儿鸡儿，不要它们跑出去。将来喂大了卖到钱，好请你吃点心啊。"

"我晓得，"王文生不大客气地点头应道。他望着冯太太的移动的背影，仍旧舒适地哼他的歌，可是等到影子消失了时，他忽然轻蔑地说："哼，你的猪儿长得大，我才不姓王嘞！哪个希罕你的点心？你这个泼妇！"

他一下子就从树上跳下来，身子闪了闪，一只脚跪在地上，幸而有手撑住，没有完全扑倒。他起来，看见聋丫头在房门口笑，就抓起一把泥土向她掷过去。丫头跑开了。他不高兴地骂着：

"我×你先人！有你狗×的笑的！"

以后院子里又显得十分清静了。我从玻璃窗看出去。没有人影，猪躺在树下，鸡懒洋洋地在散步。

我的脸还没有离开玻璃，就看见冯太太一摇一拐地走进来，皮鞋橐橐地响着，她一身的肉仿佛都在抖动。

"那个小鬼跑出去了，这儿也要清静得多，"她在自言自语。忽然她带了惊讶的声调："咋个，今天猪儿萎琐琐的，未必生病罗。"

她走下天井去，关心地看着小猪，然后“伙失伙失”地赶它起来。十多分钟以后她才走进右边厢房，过了一会儿她又出来，口里咕噜着，匆匆地走出了院子，最后还回头看了看天井。

三天后，其实我记不清楚是三天或者四天了，下午两点钟我流着汗从外面回来。天空没有一片云，太阳晒在头顶上。我走进大门口，碰见房东方太太气冲冲地走出来。她脸上的脂粉被汗水洗去大半，剩下东一团西一块，让衰老的皱纹全露出来，电烫的蓬松的长头发披在颈后，（看一眼就知道这是新烫的，我前天才听见侄女们讲过电烫的价钱：一百五十元！）新式剪裁的旗袍裹着她的相当肥壮的身子。一股廉价的香水味（现在不能说是廉价了）向我扑来，我不觉想起了“老妖精”三个字。她后面跟着一个穿短衣服的粗壮的中年汉子。

冯太太领口敞开，坐在房门口哭着，骂着：

“……你狗×的，卖×的，你赔我的猪儿，赔我的猪儿！……你默倒老子是好欺负的。万一我的猪儿有个三长两短，”（我忍不住笑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老子要你抵命。……你默倒你有钱就该狠！老子住你房子，又不是不给钱。就说喂个把猪儿，也不犯王法嘛！……”以下是一些恶毒的咒骂。

严老太和独院里的张太太在旁边论断这件事情，发出几句批评方太太的言论，不过调子相当温和。从她们的谈话，我才知道方太太带了一个用人来向冯太太交涉，结果大吵一顿。方太太还吩咐用人把小猪踢打了几下。她们谈够了时，才挨

近冯太太，俯下身子去安慰她。

“冯太太，算了罢，人家有钱有势，是你惹得起的？况且是为了这点儿小事情。猪儿本来就难喂大。你看它这两天萎琐萎琐的，就像害病的样子。我看还是趁早把它卖掉换几个钱回来好些……”严老太慢吞吞地劝道。

“我不，我不！我偏要喂！老子不怕她老妖精！至多不过搬家！”冯太太带着哭声倔强地说。不过她不久便收了眼泪。她向这两个朋友发了一通牢骚，吐了一些咒骂，听了好些安慰的话，后来就跟着她们走出去了。

院子里静静的，猪昏迷似地躺在地上，它身上并没有显著的伤痕。忽然它睁起眼睛望着我，这是多么痛苦而无力的眼光。

我走进房里，哥哥和嫂嫂从乡下回来了，他们正和侄儿侄女们谈论加房钱的事。房东太太刚才来讲过，口气比我们想像的温和些，说是只加五十元房钱，三百元押租。她对冯太太却提出了较苛刻的条件，因此还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使得两个女人几乎相打起来。小猪就是在两人的争吵中被用人打伤的，要不是张太太们来劝解，事情还不会这样简单地结束。

大约过了一个钟头，我那个最小的侄儿进来悄悄地对我说：“四爸，你快去看，冯太太在给猪儿洗澡。真正滑稽。”

我跟着他出来，立在窗下。树干并没有遮住我的眼睛：冯太太蹲在地上，用刷子从旁边一个脸盆里蘸水来刷洗小猪的身子。小猪有气无力地不断地呻吟，冯太太接连地在说安慰的话。

这晚我和哥哥嫂嫂们出去吃茶，看见冯太太躬着腰"伙失伙失"地、小心翼翼地赶小猪进圈（我应该加一句说明：猪圈在冯太太的住房后面，由一条小巷通进去）。小猪没有知觉似地躺在地上，只微微动一动身子。冯太太表现了极大的忍耐力，她始终温和地挥动着手，温和地呼唤小猪。

第二天我便没有看见小猪出来，再过一天逼近正午的时候，我听见冯太太同严老太讲话。

"今天更不行了，起也起不来，也不吃东西，就翻着白眼儿。我望它，它也眼泪水汪汪地望我，我心里头真难过。畜生跟人是一样，它也有心肠，啥子都懂得，就是讲不出来。"这是冯太太的声音，忧郁中含得有焦虑。

"我看就是那天打伤的，内伤很重，你给它敷点药嘛，看有没有效，"严老太说。

"它会说话也就好罗。我不晓得它病在哪儿，不能给它治病，只是空着急有啥子用。严老太，请你找人给我问一问，看能不能想个啥子法子……"

以后的话被侄儿侄女们打断了，他们一窝蜂地跑进房来，唤我去吃中饭。其实冯太太的话是继续讲下去的，只是我无法听清楚罢了。

这天没有到天黑，小猪就死了。我看见冯太太一个人坐在房门口伤心地哭，才知道猪死。她不吵不闹，声音不大，埋着头，寂寞的哭声中夹杂着喃喃的哀诉。

没有人理她。起初王文生同他的聋丫头含笑地看了一阵。王文生手里捧着一个饭碗大的青柚子，大约是他刚从树

上摘下来的，先前我还看见他爬上那棵柚子树。后来他逼着聋丫头同他抛柚子玩，不再注意冯太太的事了。看热闹的人自然不止这两个，但以后都散去了。夜掩盖了她的影子。夜吞没了她的声音。

这一夜又被日光驱逐了。以后我常常看见冯太太在院子里用米或者饭喂那只唯一的小鸡，有时也喂喂从屋檐上飞下来啄食的麻雀。鸡渐渐地长大了。它闲适地在天井里跳来跳去，但是总带一点寂寞的神气。

又过了几天，到这个月底，冯太太搬走了。我没有看见她搬家，也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只听见说是她一个人照料着车夫搬走的。她的东西不多，但是她也来回跑了三趟。看这情形她的新居似乎就在这附近。没有人给她帮忙。她这个人没有知己的朋友，也是可以料到的事。

我的最小的侄儿对我说起冯太太搬家的事情，他觉得最有趣的是她像抱孩子似地把小鸡抱在怀里，小心地坐上了黄包车。

冯太太搬走后的第二天上午，房东来看了看空房子，吩咐那个跟她来的用人把房屋打扫一番。下午新的房客搬来了，是一对年轻的夫妇。男的是本地人；女的讲一口上海话，衣服华丽，相貌也很漂亮。这对夫妇仿佛还是新婚的，两人感情很好，每天傍晚男的从办公处回来以后，院子里就有了清脆的笑声和歌声。

据说这对新夫妇是房东的亲戚。因此房东到我们的院子

里来的次数也多了。以后不用说天井里石阶上都非常清洁，再也不会有猪和鸡的脚迹。

只是我的房间在落雨时仍然漏水，吹大风时仍然掉瓦，飞沙尘。

1942年在成都。

兄与弟*

在十天的阴雨之后，我见到了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晴空，觉得非常爽快。午饭后回到楼上临街的屋里，预备翻看一本书，刚在靠窗放的书桌前坐下，就听见下面有人说："挂三角球了。"挂三角球只是表示敌人的侦察机到了这个城市的附近。侦察机出现有时是轰炸机来临的先兆；然而往往侦察机回去以后就再没有一点儿消息，至少今年的情形是如此。所以听见说挂三角球我并不着急，不过站起来走到另一面窗户前，越过重重的屋顶向球杆那边望去。

瘦长的球杆上果然悬着那个三角形的红纸灯笼。我又埋下眼光去看横在我面前的那条长街。这是新辟的马路，并非要道，行人不多。路相当宽阔，整洁。对面似乎从前有过房屋，现在却只剩下两三堵废墙，和四五间玩具似的木屋。这些木屋中有的刚刚造好，没有油漆，颜色很新，还是用了木板做屋顶；有的屋顶上盖了瓦，并且有用石灰和泥土糊的墙壁。它们的窗和门是联在一起的，有时人把门紧紧关上；这些木屋就真像是些木箱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现代文艺》第六卷第一期。

木屋后面横着一个小小的斜坡。这个斜坡的一头，堆着从附近各处搬运来的瓦砾，堆得高高的，竟然成了一个小丘；另一头沿着一条人的脚踩出来的小路下去，我看见一片平地，这片地上曾经有过相当整齐的房屋，却被炸毁或者烧掉了，只留下几堵断墙来表示房屋的界限，其中有一堵墙较高，还开着门，不过已是不能关闭的门了。然而我常常看见人从这道门进出。通过这道门，依傍着另一条更大的马路的高壁，人们搭了几间木屋，是用圆圆的木条搭成的，一排三四间，相当大，据说这是一部分建筑工人临时居住的地方，属于某营造厂的。这个营造厂正在修建附近某新厦，大约最近就可以完成了。

街上仍然有安静的气象。一辆黄包车拖过去。三五个行人缓步走来。三角球静静地吊在杆上，仿佛死了似的，动都不动一下。我也像呆了似地在窗前站了好一会儿。动的颜色在我的眼前继续流过，可是我的眼睛什么也没有抓住。

忽然天空里响起了机声。声音越来越大。我一听就知道是我们自己的驱逐机，而且不止一架，但是看却是看不见的。不过我也侧头去找寻飞机的影子，自然没有找到，它们带着巨大的吼声掠过我的头上飞走了。

机声在我耳边响了许久，又渐渐地淡下去，消失了。街中的行人大半停住脚仰头向天空张望，还用手盖在前额上，后来也逐渐散去了。一个穿灰布长衫有八字胡的中年男子走到对面第三个木屋前，开了锁，推开门进去。门仍旧开着，另一个穿蓝布短衫的年轻人走过来，站在门口，跟里面那个中年人讲话。

球杆上的三角球已经取下了，我也没有留心是什么时候取下来的。不过我觉得应该回到书桌前面去了，便转身走回那里，安心地坐下来，打开我要看的那本书。

书本有相当的吸引人的力量，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我的心就被引入那个奇异的世界里游历去了，我忘了周围的一切。但是一些不调和的声音仍然卤莽地闯进我的耳里来。好像是两个人在吵架，就像是在第三个木屋门口谈话的两个人。

我看完长长的一章，吐一口气，放下书，让我的心休息。忽然我听见："你再不给，我就押你的毯子，说过算数，你二天休要怪我，"这是年轻人的声音，并且还像是带着决心说出来的。另一个接着说："你敢进我的屋，我就打断你的脚！"

没有回应，好像那个年轻人已经跑开了。剩下中年人的得胜般的骂声寂寞地响了好儿分钟。我抬起头向写字台前窗外看，马路的另一头朝着高坡爬上去，一大群人正从上面走下来。在高坡的上空悬着那个好像永远不会褪色的蓝天。迎面吹进来一阵微风，把那些咕噜般的骂声全吹走了。我吸了一股清气，过后又吸了一股灰。

在这以后的第十二天，正午也挂过三角球，可是不到一个钟头就取下来了，天气爽朗，晚上天空映出一弯新月。

夜晚我睡得早，其实这个建筑物里别的人通常也都睡得早。有时刚到十点钟，大门就上了锁，房间里就灭了灯。整个房屋静悄悄的，老鼠的跑步代替了人的脚声。这一天相当热。到夜晚还没有退凉。我睡了一觉，似乎没有睡过两点钟，就醒来了。唤醒我的第一是人声，第二是臭虫，臭虫咬得我的颈项

上起了好些疙瘩。

下面马路上人声嘈杂。我不用仔细去听，便知道有人在对面木屋门前吵架。吵架的事在这附近是常有的，也引不起我的注意。不过这天躺在布满了臭虫的木床上，我搔着发痒的皮肤，不能够再阖上睡眼，就只好让那些带怒的话打进我的脑子里来。

“我不在屋里，你进来抱我的毯子，不算偷算啥子？……”这个声音我能够分辨出来，就是住在第三个木屋里的中年人的。

“我讲过我要来押毯子，王老么看见我抱去的……”这个声音对我也不是陌生的，分明是那个年轻人在说话。

“你今晚上又来做啥子？是不是想捞点油水？我的东西都在这儿，少了一件，就是你拿去的。你默倒你跑得了！”

“我来找王老么讲两句话。我才一只脚踜进屋里，哪个碰过你的东西。你不要乱赖人！”

“你不偷我的毯子，老子朗个① 会怪你！老子讲过不准你进我屋里来。看你贼眉贼眼的，就不会有好心肠。你默倒老子的××是好吃的，尝到味道又跑进来了。毯子不抱回来，今天不放你走。”

“老子空手来空手去，你敢不放我走！今晚上你又是狗尿灌多了，发酒疯。老子让你一手，你也要识相点，滚开些，挡住老子朗个？”

---

① 朗个：怎么。

这以后便是一阵喧闹，好像两个人扭打起来，旁边有些人出来排解，把他们拉开了。

"唐五哥，唐五哥，打不得啊，自家的哥子啊，"一个老年人的声音插进来警告道。

"我不怕，我不怕！看哪个打得赢哪个！"那个中年人声音嘶哑地吼道。仿佛他的一双手被人拉住了，他正在那里挣扎。

"唐二哥，你是当哥子的人，就少开一句腔啥。弟兄家有啥子事讲不好。何必就认真动起手来。唐五哥要走，你就放他走罢，夜晚间也闹不出一个名堂啥，"这声音对我相当熟习，说话的人是这条街的一个甲长。

"赵三哥，你不晓得，不看到弟兄家面上我早打断了他的脚，"唐老二理直气壮地接口说。"我前天不在家他拉开锁，把我一床毯子抱走了。我跟他讨，他也不还来。今晚上他又想来偷我。你说我该不该教训他一顿？"

"哪个偷你的毯子？"唐老五气冲冲地抢着分辩道；"我早就讲过，你争① 我钱不还，我才抱去押的。毯子还在张老么那儿，押五十块钱，还有十块钱利钱。你要毯子，就拿六十块钱去取。争账还钱，又不犯王法，况且我也没有多拿你一个。"

"老子争账，自然不会还钱。哪儿有你自己来抱东西的道理？况且这是赌账，不一定要过硬②。"

在一些劝解的话中间，年轻人的响亮的声音又飞起来扑

---

① 争：差，欠。

② 过硬：认真。

进了我的楼窗："哪个说赌账不过硬？我也是五元、十元的关金券从口袋里摸出来的。赢了拿进去，输了拿出来，哪个人都是一样。我上个月输两百元给你，我哼都没有哼一声。×妈你输了就想赖，还有脸皮姓唐？"

淡淡的月光照亮了半个房间，房里静静的，只偶尔响起一个朋友的磨牙声。在邻近的那张床上朋友睡得很好，他什么也听不见。

"我姓不姓唐跟你屁相干！我没有做过丧德的事，没有囤积居奇，我没有铲过地皮，我朗个没有脸皮见唐家的祖宗？我下力挣钱，清清白白……"以后的话说得不清楚，从语声，我便知道这个"唐二哥"的确喝过了酒。

"算了，看我的面子，大家都让一手。唐五哥，你回去嗐。你关上门睡觉，有话明天再讲。明天吃茶，我开茶钱。唐二哥，你也不要再讲了，你唐五哥先走嗐，究竟是一家人，"甲长似乎一面讲话，一面推着唐老五走了两步。

下面人声杂乱，好像吵架的两个主角都忙着向旁观者解释事情的经过，不再大声跟对方叫骂了。

接着是一些人在发议论，说话的人多，论调也不同。大家随便说了一阵，后来渐渐不热闹了，我想，一定是唐老五走开了，那么这场争吵大约就要终止了罢，便闭上眼睛，希望立刻进到梦里去。但是唐老二的尖锐的叫声忽然打岔地冲进了我的耳朵：

"你们放他走了，我又问哪个要毯子？他一定不肯还我。赵三哥，请你去喊他来，喊他还我的毯子。"

唐老二似乎要扑到外面去，却被姓赵的拦住了，姓赵的仿佛带了点不高兴的样子说：

“唐二哥，你未免太不大方了。一床旧毯子值不了几个钱，二天拿钱取回来就是啥。我兄弟这点儿当是赔得起的。况且我不过是个外人，你们倒是弟兄家。”

“我不是他的哥子，有这种打烂账的兄弟，我气都会气死罗，”唐老二生气地嚷道；“赵三哥，请你帮我把毯子追回来，老五听你的话。他平素有点儿怕你。”

“唐二哥，输了钱还账，也不算啥子希奇，都是硬过硬的。你也是明白人，毯子你自家去追罢，”赵三哥嘲讽地答道，从声音里我听出来他的不满和气愤。“不过你们紧吵，吵得街坊上出来说话，你不要怪我。”他说完，不等唐老二答话，便哼起川戏扬长地走开了。

唐老二却从此静下来，起初他还咕噜地抱怨几句，后来也就不作声了。我觉得气闷，便站起来，到窗前去望了一阵。

木屋前面还有五六个人，他们在低声讲话，过后也就散开了。只剩下两个人，一个靠门立着，不断地摇着头；另一个矮小的男子默默地站在阶沿上。一辆黄包车拖着昏黄的灯光在街心慢慢经过。月光淡淡地照着木屋和门前的男子，还是那灰布长衫和瘦长的脸和下垂的八字胡。就是那个嚷着不愿做哥子的人。我看见他的摇摆的头，却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

“唐二哥，我帮你凑点钱自家去取毯子罢，好在六十元也不是大数目，”矮小的男子走到八字胡身边劝慰地说。“究竟是

弟兄，为了六十元钱伤了和气，也值不得。”

八字胡带点气恼地叹了一口气，仍然摇着头慢慢地答道：“老五太欺我了。他平素对我总是大模大样的。这回事情只要他先来讲一声，五六十元钱，我也不是拿不出来。虽说不是一个妈生的，究竟是自家弟兄，闹起来给旁人看见，又有啥子脸面？只要他平素明白点儿，他平素对我这个哥子和气点儿，我们也就闹不起来。……其实也怪我今夜晚多灌了两杯酒。”

隔了一个多星期，上午我从这个建筑物的大门出去，看见对面木屋的门开着，这间木屋已经布置成了一个小杂货店，八字胡和矮小男子低着头在摆设货物。

“唐二哥，今天开张啊，恭喜，恭喜！”一个人走到门前，带笑地大声说。我认得这是赵三哥。

“赵三哥，不敢当，不敢当，请坐，请坐，”八字胡抬起笑脸，两只小眼睛满意地霎动着。“那天夜晚吃醉酒，得罪你哥子，只怕你哥子见怪……”

以后的应酬话我没有听见，我走远了。我走进那条横马路，又看见挂出了三角球。

两三个小孩一面嚷着“挂三角球！”“挂三角球！”一面跑下坡去。从坡下木条搭成的小屋里，有两个工人模样的人走出来。

就在这个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

我和两个朋友听了国立音乐院的演奏会，从国泰戏院走

回家，刚走进我们这条新辟的马路，那个年轻的友人便发出惊叫："看，什么事情！"

人们成群成堆地站在我们左手边，似乎都在望着坡下，坡下有煤气灯的白光，有喧哗的人声，我只觉得好些影子在晃动，但是什么也看不清楚。

"是不是在拍电影，"我随口答道，便向着人堆走去。

"恐怕是木房起火，"另一个朋友说。

这时我们都挤进人堆，而且站在马路的边缘了。靠着汽灯的强烈灯光，我看见坡下的木屋全变做一大堆木条，人们在附近嚷着，动着，搬运东西，许多人站在一处用力抬起一根粗的木头。一个人高高提起灯，大声指挥别人工作：

"这儿底下还有人，还在呻唤！快点……搬！……大家再使点劲！还要使劲！……就在这儿底下！"

我明白：屋塌了。我立刻打了一个冷噤。"伤到人没有？"我顺口问旁边一个不认识的人道。

"打死四五个，有的连脑髓都打出来了。"

"那么救活好多人？"年轻的朋友问一句。

"也只有几个，"另一个陌生人答道；他又说："都是些先生们，哪儿有好大的气力。"

的确看热闹的人是这么多，大家发议论，表同情，却没有一个人下去帮忙抬木条救人。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中年人气急败坏地跑过来，粗卤地把我和那个陌生人推开，一股气跑下坡，一直跑到木条旁边，嚷着："等我来！"他挽起白汗衫的袖子就躬腰去抬木条。

"唐二哥！唐二哥！"有人这样地叫起来。下去的人果然是八字胡。

我觉得惭愧：我自己还是一个旁观者，八字胡倒跑下去救人了。但是他今晚上会做得这样勇敢，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

"唐老五就住在这儿，不晓得他是不是也埋在底下。唐二哥怕是来救他兄弟罢，"一个人解释地说。

我旁边那个陌生人卖弄似地答道："唐老五脑壳上打了一个大洞，早没气了，他的哥子休想救活他。"

八字胡听不见这样的话，他埋着头专心在抬木条，他已经同一些人把木条搬开两根，忽然一个穿短衫的人跑来抓住他的膀子，带点惊惶地大声说："唐二哥，你来得正好，你快去看你们老五，脑壳都打开花了。"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八字胡仰起头疯狂似地嘶声问道。

"我带你去看，"短衫人简单地回答，就把八字胡引起走了。

我的眼光跟着他们的脚步走，到了断墙脚下，那里光线暗淡，人的面貌开始隐入阴暗里，我看不见八字胡的脸部表情，却只见到他突然扑倒下去，仿佛走滑了脚跌在地上一般。

"唐二哥！唐二哥！"短衫人惊怪地唤道。

八字胡不答应，却开始孩子似地哭起来。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唐二哥！快起来，快起来！"短衫人张惶地催促他，歇了

歇又说："唐二哥，不要难过了，还是买个方子① 早点给你们老五收尸罢。"

八字胡站起来，伸出巴掌擦了一下眼睛。朝着我站立的方向叫号般地说了一句："他，他真死了。"一个人提了灯笼过来。我看见在八字胡的脸上眼睛鼻子一带涂上了鲜红的血迹。他的面颜变得可笑而又可怕了。他似乎不自觉地动手抓自己的汗衫，钮扣早已拉开，露出来黄黄的胸膛，他用力在胸膛上抓着。

"唐二哥，朗个你脸上尽是血？"提灯的人惊叫道。

八字胡茫然地伸手再去擦一下脸，血迹更扩大了，他又茫然缩回手来，呆立着，嘴里哼出古怪的声音。

"你先回去洗洗脸，把血洗干净。横竖厂里会给你们老五收尸的，"提灯的人温和地、同情地劝道。

"我去买方子，"八字胡用低沉的声音说，但是他并不移动一步。

"方子厂里会买的。这几个钱厂里也看不起。平白死了好几个人，未必他们还敢说不来收尸？"提灯人说。

"麻哥，你不要怪厂里，厂里的马先生也在帮忙救人啊，"短衫人插嘴道。

"我不怪厂里！如果厂里早把房子搭得结实点，哪儿会出事死这些人？陈老么，你说我讲得对不对，"提灯人不高兴地应道。

---

① 方子：棺材。

“唐二哥，唐二哥，我到处找你！”另一个人跑过来，这是一个矮小的男子，就是同八字胡住在木屋里的王老么，他气咻咻地说，接着又问一句：“你看见五哥了？”

“我去买方子，”八字胡喃喃地说。

“唐二哥，你脸上朗个啦？”矮小人惊叫起来。

“我……我去买方子，”八字胡含糊地说。

提灯人伸手碰碰矮小人的肘弯，带暗示地说：“王老么，你陪唐二哥回去洗洗脸，让他早点睡罢。……五哥的事情有我在这里照应。”

这时突然人声嘈杂，人们抬着一个新的尸体过来。矮小人劝八字胡回家，八字胡连连摇头，表示不愿意。但是他终于被矮小人拉起走了。短衫人也去了别处。新的尸首和新的人引起了注意。

我仍然站在那里。坡下的活动继续进行着。提灯人走到一个穿衬衫的青年面前低声讲话。一个年轻女人哭着跑到停尸的地方，大声唤着亲人的名字。

“××，回去罢，不要再看了，”这句话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传来的，使我吃了一惊。我回转头，看见一个朋友的脸，他伸出手，拍了一下我的肩头，在他背后还立着另一个友人，我才记起来我是和他们一起从戏院里出来回家去的。我在这里已经立了好大一会儿功夫了。

“好，”我点点头就跟着他们离开了人群。

天空逐渐发亮，先前横在我头顶上的大块云片都飘散了。一个淡青色的天盖在上面，街道白白地躺在我的脚下，而且仿

佛从我的脚下伸展到无穷的地方。我们住的房屋就立在眼前。没有灯。从二楼一个窗洞里露出两个人头，一男一女，我认识这一对夫妇。

大门关着，上了锁。我们叫了门，站在人行道上等候工友拿钥匙来开锁。

我看对面那间木屋，门关着，漏出来灯光，但是没有声息。有人走到门前敲门，叫唤："唐二哥！唐二哥！"这是姓赵的人的声音。

木屋门打开。我们大门的锁也打开了。朋友们进去，我留着。我看对面。从木屋里闪出一个人影，是王老么，他低声打招呼："赵三哥。"他接着说："唐二哥睡着了。赵三哥，你找他有啥子事情？"

"他晓不晓得他们五哥打死了？"赵三哥问道。

"他去看过了。他争点儿就要发疯。我们好容易才把他拉回来，才将① 劝睡着，"矮小的王老么小心地答道。

"那么我走了，我也没有啥子要紧话跟他讲，我就是来看看他。我才将晓得他们五哥的事情，太可惜了。虽说他们弟兄间平素处得不好，究竟是亲兄弟啥，我怕他也有些难过，"赵三哥不进屋，就站在门前，轻声同王老么讲话。

"其实他们弟兄间也没有多大意见。唐五哥也是个好人。就是因为赌钱争账押毯子那回事情，两兄弟吵过几回架。二哥后来也失悔。他时常讲他情愿同唐五哥讲和。想不到事情

① 才将：刚才。

出得好快！连我也不好过。赵三哥，你没有看见二哥才将那种神气，我真怕他会发疯，”王老么带着感动的调子絮絮地说。

“这阵子他好些了？……”

“这阵子他睡得很香。明天就不要紧了。唐五哥的尸首今夜晚就会收殓好的。”

“那么我明天再来看他，我想他明天就没有事了，”赵三哥简单地说；他拔起脚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告诉王老么：“今夜晚一共死了六个人，伤了三个，还有一个才将挖出来，腿压断了，厂里总要拿出一笔钱来才脱得了手。”然后他跨着大步朝他来的方向走去，就是朝着出事的地点走去。

“只怪他房子搭得不结实。人都死了，拿点钱有啥子用？”王老么不满意地咕噜道，他转身关了房门。

一阵凉风透过我的西装上衣和衬衫，我觉得背脊发冷，便默默地走进这个建筑物的大门。我听着工友上锁的声音。于是我仿佛落进了静寂的陷阱一般。我在黑暗的过道中摸索着，我摸到楼梯前面。四周静静的。我慢慢地踏上楼梯，一步一步地把楼梯跨完，仍然摸索着，我又进入一条狭长的过道，又静静地走完这条过道。现在我推开自己的房门了。

有灯光，有人影，两个朋友的眼光迎接我。一个友人还问道：“你到哪儿去了？怎么现在才上来？”

“我就在门口，听他们讲话，”我顺口回答道，便走到窗前，伸出头去望下面的街道，我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随便看看。

“在门口听哪个讲话？”友人惊奇地问。“我们没有看见什么人。”

“就是对面木屋里的人，他们在讲那个哥哥和兄弟的事，你们先前不是也看见了的？”

“你真爱管闲事。看见了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还要去打听干什么？早点睡觉罢，你明早晨还要早起呢！”另一个朋友抱怨我说。

我只对他笑笑，这是苦笑。我又掉头去看下面。月亮出来了。街道明亮而静寂，但静的只是这一段马路，在我的左手边，远远的我瞥见亮光和人影，从那里还有人声隐约地传来。人们还在那个地方工作。对面木屋里灯光突然灭了。

我想，弟弟的尸首也许已经搬走了，也许仍然躺在坡下，现在应该被月光照着罢。那么在木屋里睡着的哥哥不知道在做着怎样的梦：是在跟弟弟争毯子，嚷着要打断弟弟的脚呢，还是在坡下抬木条想救活这同一个弟弟，或者倒在尸首旁边号哭呢？

我越想越觉得心里不痛快，便下了决心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把月光也关在外面，然后转过身向着我那张成了臭虫的大本营的木床走回去，今晚我或者可以好好地睡一觉罢，我的心太累了。

1942年在重庆。

夫 与 妻*

夜晚，我坐在去年我写《长夜》的时候住的那个房间里。时候也正是暮秋，门外展开一片朦胧的月光，四周静静的，没有声息。我面前摊着朋友们的来信和没有涂上字迹的信笺。成都、重庆、昆明友人的面容渐渐地在纸上出现了。他们亲切地对我微笑，我的耳边响起了轻微的脚声。好像许多人向着我走过来。怎么，是朋友们的脚声么？难道他们已经到了我的身边？他们会跨过那么远的距离来看我？我感到一阵惊喜。我伸直身子睁大眼睛看看屋子的四角，看看面前的信纸。友人的面容全消失了，有的只是写满了字和没有写上字的大张和小张的信笺。煤油灯的灯芯上结了大灯花，使灯光变得阴暗了。我拿开灯罩，用剪刀去剪灯花。

外面忽然飘起了一个女人的尖锐的哭叫，使我那只捏剪刀的手停住了。我惊愕地侧过头去看房门，两道门关得紧紧的，没有响动。我慢慢地剪着灯花。

女人的哭叫没有停止，男人的粗暴的声音插进来讲话。另一个男声似乎在旁边劝解。我的心安静下来了。我不用多

---

* 本篇收入《小人小事》前未在报刊发表过。

想就知道是一对夫妻在吵架。这原是很寻常的事情。

我拿起笔写信。门外的声音并未停止，仿佛那些人就停留在这一段马路上似的。我写满一张信笺，女人的哭声已经止了，但是吵闹仍然相当激烈。我搁下笔侧耳倾听，却只抓到一些含糊不清的字眼。我烦躁起来，便推开面前的信纸，打开门走出去。

正对着这门，马路上聚了一小群人，大约有十六七个罢，我只看见一些黑影，月色很淡，照不亮那些人的面颜，我跨过屋前那片空地，走到马路旁边。

我找到一个空地方站定了。我用眼光去捕捉面前几个人的面貌。我先看到那个女人：长长的黄瘦脸和塌鼻子，还有一头披散的长发，她穿一件阴丹布长袖旗袍，领口大敞开，被白汗衫掩着的胸膛也露在外面。她气冲冲地抄着两只手站在那里，不耐烦地听旁边一个中年男人讲话。中年男人有一张三角脸，上阔下尖，唇边围了一圈须根，身上穿的是黄色毛线衫和灰色西装裤。他对着两个人谈话，一个是穿黄色制服的警察，另一个不知是哪一类的人，穿的仿佛是灰色中山服，上面罩着黑布大衣，这个人比警察年纪大，但是也只有三十岁光景。此外还有几个人，有的穿长袍，有的穿短衫；另外有一个人扶了一辆脚踏车站在后面，车上有一个小灯，使他的脸显得比别人清楚，他年轻，带一脸傲相，只是身材短一点。

“……她专门跟你作对，你说东，她就说西；你叫她这样做，她偏要那样做。比如说有位先生来定做衣服，讲好五天要货，你赶紧做，她偏不做，你说做扣子，她就要做别的，总要你

到期交不出货，”中年男人压抑着怒气，挥着手说，声音不太大，倒颇用力，他还没有说完就被女人打岔了。

“没有这回事，你在扯谎！”女人愤慨地嚷起来。

“蒋嫂子，你让他讲完，不要打岔他，”穿黑大衣的人干涉道，警察表示同意地点一点头。

中年男人继续说下去：“屋里的事情你叫她做，她不做。我不在家，铺子里的事情她也不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坏，连老主顾也不肯上门。我讲她，她就跟我吵。我讲一句，她就讲十句。我没有动手，她就哭起来。请你们官长断个公道，这种女人该不该打！”

“你扯谎，尽你一个人讲，你没有一句真话！”女人顿着脚，挥动着手对他啐道。

“我不讲真话，你讲真话！”男人大声辩道。

女人做一个发言的姿势。但是穿黑大衣的人开口阻止她：“蒋嫂子，你听我讲几句话，女人要跟男人和气做事才对。女人要靠男人，男人做事，女人要帮忙。常言说男人撑船，女人把舵。比如说他做衣服，你就帮他钉扣子，上衣领。讲好五天交货，你就该帮他四天做出来。夫妻间和和气气才是正理。女人不在屋里好好做事，一天贪玩耍，爱吵架，有哪样好处？你看特察里那些女人①，一天穿红着绿，贪吃好耍，又有哪点好？还不是没有下场！”

女人不能再忍耐了，便大声叫起来：“曾先生，话不能这样

---

① 特察里那些女人：指娼妓。特察里是当时桂林的娼妓区。

讲！"

穿黑大衣的人不让她说完，马上更正道："我是在打比方，讲女人贪耍爱闹没有下场。男人也是一样，男人爱耍，爱在外边胡闹，也不对，也不会有好下场的。"

"曾先生，你不能这样说，"女人显出全身的劲来，她的头只是动着，手只乱摆动，一开口就像要让人知道她是在作长篇的演讲似的；"他讲我哪样哪样，都不是真话。并不是我贪耍爱吵架，我一年到头就难得跟他吵一两回。从今年正月起他到祁阳去，两个月不来一封信，半年不寄一个钱，一连九个月都是我给他做，我给他照应铺子。他说我不做。我不做，我吃哪样？那他的铺子早已关门了。他不回来，也不写一封信，楼上张先生娘子问我，他为哪样不来信，我还说他生意忙，难得有功夫。他回来一句好话不讲，只会发脾气，每天夜晚不晓得到哪里耍去了，到十二点钟一点钟才回来。楼上张先生娘子都晓得，我讲一句冤枉话，我烂掉舌头！……"她越讲越动感情，后来忍不住哭起来，她的喉咙给堵塞了。

"好啦，不要多说了，"穿黑大衣的人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们也不好讲你们哪个人是哪个人不是。你们横顺是夫妻，有哪样话讲不好的。蒋嫂子，你跟着你男人回去罢。再吵闹下去，也就没有意思了。"

"我不回去，"女人把两手在胸前一抄，赌气地说。

警察开始发言，他对女人的"反抗"表示不满，他板起面孔说："现在夜深了，你不回去，你们再吵架，妨害别人睡眠。这几天警报多，夜晚的时间很宝贵，你们不守秩序，我把你们带

到局里去，两个人都没有好处。”

这番话发生了效力。女人听说要带到局里去，她的声音马上低下来，两只手也松开往下垂。但是她仍然表示不愿意地说：“今夜晚不讲好，回去他又会打我。我不给他打！”

“我跟你讲这样，你偏要讲那样。我要你做这个，你偏要做那个。我不打你，还有哪样办法？”男人理直气壮地说。

“你要打，我就不回去。我今天就跟你离婚，”女人的怒气又升上来，她的声音也显得响亮多了，她又把两只手抄起。

“离婚？没有这样容易！我偏不跟你离！”男人说。

“你们再不听话，我都带到局里去。女人口口声声讲离婚，就不是个好东西！难怪你男人要打你。以后你们两夫妻要和和气气，不准再在街上吵闹。听见没有？现在好好回家去！”警察声色俱厉地说。旁边两三个人趁势开口劝女人不要做声，温顺地跟着丈夫回去。女人默默地听他们讲话。

男人胜利地昂头站着，他带笑地说：“我就回去，我就回去。”然后他又解释地说：“是她把我拉出来的。哪个又愿意深更半夜在街上吵架！”

女人不愿意走，但是没有办法，只得埋下头，口里咕噜着，跟着那两个同她讲话的人向来时的路走回去。男人连忙赶到前面，仿佛算是他带路。穿黑大衣的人和警察在谈话，他们一面说，一面走，脚步放得很慢。脚踏车带着灯光一转眼间就消失了。

黑黑的一群人沿着马路朝着山那面走去。我不知道那夫妻住在什么地方，也不想跟着他们走一段路。我仍然立在那

里。静寂渐渐地向我走来，我觉得一股凉风从我的脸颊上掠过，我抬起头看天空，未圆的月面上似乎罩着一层薄雾。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于是我记起了我的房间里的灯和摊在桌上的友人们的信。我便跨过空地向着漏出灯光的门走去。

我推开房门，一声哭叫意外地跟着我进来。怎么，那个女人又在吵闹了？我掉转身朝门外看，但是除了一片朦胧月色，我什么也看不见。声音不响亮，那些人应该走远了。我站在门口倾听片刻，也没有再听见女人的受了委屈后的哭声。

1942年在桂林。

女孩与猫*

由重庆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在屋前空地上看星星。桂林的秋天很可爱。带着草木香味的空气清爽得像要洗净人的脑子似的。夜相当温暖。我感到了几个月来没有享受过的使人忘却疲倦的舒适。为了高空那些发光的世界，我居然站了两个钟点。我听见敲九点钟，又听见敲十点钟。

"凯提！凯提！"女孩的尖声在楼上叫起来。接着一个黑影在二楼廊前栏杆旁出现了。纸窗上映出一个女孩的半身影子。"毛米！毛米！"她似乎向着搁楼呼唤。

我从星的世界回到这个小小的庭前来了。

一排七座木造楼房中只有我们这一座和最右的一家还有灯光。似乎有一两声人语，又似乎只能听见虫声。女孩的影子消失了。忽然一团黑影从隔壁屋檐上跳下，沿着我们楼上的过道跑到里面去了。猫在叫。

"凯提！凯提！米扬！米扬！"女孩的声音又响了，这次她拿着一盏煤油灯从房里出来，沿着过道去追那只猫。

过了片刻。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周报》第十三期。

"张先生，张先生！"仍是女孩的声音。有人在后面答应。

"你看见凯提没有？……是不是凯提回来了？"女孩在问。

她好像得到了否定的回答。

"我明明看见她跑过去。一定是她。可怜的凯提，她瘦多了！她在外面流浪一些时候，现在也该回来了。……"

以后再没有听见猫的声音。女孩终于拿着灯孤寂地回来了。灯光照亮她的脸，的确是一张圆圆的、孩子的面庞，虽然看身材和装束，她应该是二十一二岁的小姐了。头发倒是烫得蓬松的。

对我，这次是第一面。今天早晨朋友张已经跟我说过，在我离开桂林的期间，他找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房客，是一位熟朋友介绍给他的。这是从香港逃难出来的广东小姐。她有一个年轻的男亲戚，不久以前到昆明去了。此外她还有三四个女同乡，年纪似乎比她稍大。她在桂林大约就只有这几个朋友。关于她，张跟我谈了不少的话。我想，张一定对她感到了兴趣罢。我们同住在一所房屋里面，但直到这时我才看见她的面颜。关于凯提的事，张却没有谈过。

就在这个晚上，我向张问起了"凯提"。

"凯提是她喂的猫。她搬来不久买的。那是一只灰色带黑斑的母猫。她很喜欢它。天天买牛肉、猪肝、小鱼来喂它。在三个多星期以前凯提忽然跑掉了。后来回来过一天，又不见了。那是七八天以前的事。以后就没有回来过。不过她相信凯提会回来。"

过了一天。早晨九点多钟，紧急警报刚放过，我正要出

去，却看见楼上那个女孩站在门前，跟马路上走警报的人中间三个广东姑娘讲话。她穿了一件红绒线衫，手里提着一个花布袋子。她跑过空地到马路上去了。

"红衣服，脱下来！敌机来啦！"好几个人的声音干涉道。

她真的把绒线衫脱下，塞进袋子里面去。

我到簸箕岩那边去躲警报。敌机没有进市空，我也不曾入洞。洞里太闷。外面却有很好的秋阳。我在石子路上闲踱着。

过了一个多钟点，还不曾解除警报。躲在洞里的人渐渐地出来了。大家谈着闲话，吃着零食，颇为热闹。我沿着碎石路走得较远一点。我忽然注意到在路边一块大石头上坐着我们楼上的女孩。她埋着头在看书。我多看了她两三眼，她似乎感觉到了，她也抬起头来看我。一张圆圆脸，涂得红红的嘴唇，两颗漆黑的眼睛。眼光里不带丝毫羞涩的表情，她好奇地望着我，善意地微微一笑，似乎在跟我打招呼。我也略略点一点头。她嘴唇动了动，但并没有说出话来，仍旧埋下头去看书。

"黎小姐，好用功啊！"这是朋友张的声音，他忽然从我背后转出来。她又抬起头笑笑。"我在看小说，"她笑道，拿起摊开在膝上的一本书摇了两摇，把金字书脊露给我们看：《简爱自传》。"还不解除！真讨厌！"她说。

"不打扰你了，你看你的书罢，"张客气地说。她又把头埋下去。张掉向着我："老李，你想不想绕回家去？我看今天又不会来了。"

“好的，”我点头说。我再看一眼黎小姐，她安闲地坐在那里，左腿架在右腿上，书摊在左膝上，两手拿着书页。花布袋子紧紧靠在她右腿边。波纹样的浓发盖在她低垂的头上，她专心在看书。这身影在明朗的秋阳下显得很美丽。

我们绕道回到家里，打开大门晒太阳，谈闲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听见解除警报的鸣声。马路上行人渐渐地多起来。终于黎小姐提着袋子回来了。

“你们先回来了？”她笑说，一面从马路跑下屋前空地来。

我们带笑地应了一声。

“张先生，我刚才看见凯提了，”她兴奋地说，站在门前石阶上。

“在哪里？你怎么不带它回来？”张惊问道。

“我看见它在一家篱笆门里头，我唤它，它望着我，后来又跑开了。一定是它：我认得！”她说。

“恐怕你看错了。是它，它一定会跟你回来的，”张说。

“说不定它不认识路，”她说。“我记住了那个地方，我一定要去找它。”她两眼睁得大大的，眼珠黑得可爱，我在那眼光里看到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寂寞。她带着轻快的步子走进里面转到楼上去了。

大约三四天以后罢，晚上九点多钟，我躺在楼下的床上，借着煤油灯灯光在看书。在郊外这时候是很静的了。要是偶尔有一个夜行人在马路上走过，他的最轻微的脚步声，我也可以听清楚。忽然一只猫在走廊楼板上跑起来。然后它又跳到

梁上去，在那里叫了几声。

黎小姐要是没有睡，她一定会记起她的凯提来罢。——我刚这样想着，就听见她的声音："凯提！凯提！"随后是开门声，脚步声。黎小姐拖着木鞋一跨一跨地在楼上过道里走着。"凯提！凯提！来！"她亲密地对猫说话。猫叫了一声，又跑动起来。这次猫似乎跑下楼梯了。黎小姐大声唤着："张先生！你看，是不是凯提下来了？"她似乎站在楼梯口讲话。

住在我隔壁房里的张答应着，开门出来了。他一定也拿了灯，因为我从天花板上看见灯光在移动。

"凯提，凯提！"张也在唤。他还学着做猫叫。

"张先生，是不是凯提？"她在问。

"找不到，它跑啦。我看它不是凯提，凯提不会回来了，"张答道。

"凯提会回来的，我相信它会回来的，"她说。

"黎小姐，你回去睡罢，"过了一会儿张又说。

女孩失望地嘘了一口气。木鞋的声音又响起来。张也回到房里了。

"张，我看你明天还是买只猫送给她罢，"我隔着木壁对张说。"不然，你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呸，你少讲点风凉话！"张笑骂道。

"我这是真话啊，"我说。

张不理我，他吹灭灯睡了。

我没有睡，我仍旧在看书。大约过了四五十分钟，忽然木鞋声吵闹似地大响，女孩惊喜地叫着："张先生！张先生快来！

凯提找到了！凯提回来了！”

张从梦中醒来，答应着，下床，穿衣服，开门，上楼。我为着他自找麻烦的事暗笑。他自然不觉得可笑，好像做二房东就有这种义务似的。他上了楼，说着话，走着，忙着。他们闹了好一阵，然后他下来了。可是我没有等他下来就吹熄了灯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张，他就含笑地报告我："凯提回来了。"

"在哪儿？"我问。

"在楼上。"

"那你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我笑道。

"不要乱讲啊，"他指着楼上低声说，脸上现出满意的笑容。

黎小姐下楼来了。"张先生，李先生，"她高兴地招呼我们。

"黎小姐，听说你的凯提回来了？"我问。

"回来了，它瘦得可怜，在外面太辛苦了，"她怜惜地说。"我去给它买点猪肝来。"

"黎小姐，我们去给你买，"张献殷勤地说。

"不，我自己去买，"她说："要是你有空，请你上楼去看看凯提，我把它拴在走廊上，怕它挣脱逃走。"她甜甜地一笑。

"好，我马上就去，"张答道。我想笑，又不好意思笑出声来。

这天午饭后，黎小姐牵着凯提下楼来了。这是一只普通的母猫，全身灰色中带着黑斑，四肢白白的，身子相当瘦，走起路来慢吞吞的，没有精神。

“张先生，你看凯提，多可怜！我带它到外面去晒晒太阳，”黎小姐说。

“它猪肝吃过了？”张问道。

“吃光了。它在外面一定没有吃过好东西。不然，不会饿成这样。明天我给它订一份牛奶。”

“好的，凯提碰到这样一位主人，也是它的福气，”张在拍马屁了。我想说：“这种时候好些人连饭都吃不饱，你还拿牛奶来喂猫！”可是我不好意思说出来。

黎小姐带着小猫走了。我跟张讲了两三句玩笑话，便出去拜访朋友。我是到六合路去的，走过木桥时，看见黎小姐正站在桥头，小猫乖乖地蜷伏在她的脚边。她凝神望着桥下的沙石和未曾枯尽的水，一只肘靠在栏杆上。我没有惊动她，便走过去了。

一点半钟以后，我回到家。黎小姐坐在门前石阶上，她坐的是摆在我们客堂里的一把宽大的竹沙发，凯提在她的沙发前动着脚游戏。黎小姐手里拿着一本书，可是她并不读它，她的眼光定在凯提身上，她脸上露着笑容。

“李先生，你看凯提多么好，多么可爱，”我走过她面前时，她抬起眼光，得意地说。

如果允许我说真话，我要说，可爱的不是凯提，倒是黎小姐的一双灵活的黑眼珠，和她那甜甜的笑容。

"是的，凯提回来，你一定高兴极了，"我附和道。

"我知道它会回来的。它是个浪漫的猫，爱在外面跑。不过外面风浪太大，它跑倦了，也该回家了，"她说得那样认真，差一点叫我发笑了。可是我并没有笑，我多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使人想到她渴望着什么，她缺少着什么。我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什么东西把她和猫连在一起呢？这只猫不就是她的缩影么？她不是把凯提当作她的小妹妹么？这个想法太怪，太唐突她了。我不敢说出来。

晚上她小心地照料着小猫睡觉。她牵着猫上楼时，还吩咐："凯提，你跟张先生、李先生说声'明天见'啊，我们凯提要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她又是自己出去为凯提买食物。她临走时把凯提拴在我们客厅里方桌脚下。"李先生，你替我看着它啊！"她叮嘱道。

我答应了。起初我的确注意地望着那个小生物的一切动作。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忘记了它的存在，我的眼光、我的心都转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我接到了邮差送来的信函，我接到了当天的报纸。……等到小姐提着猪肝、小鱼回来，问起凯提时，我才发觉它不知在什么时候挣脱绳子溜走了。

我惭愧地红了脸，我盼望小姐责备我。可是她并不说一句抱怨的话，她失望地把猪肝、小鱼提到后面厨房里去。接着她的脚步声就在楼梯上响起来了。以后她也就没有下楼，——自然只限于这一天。张回来，我把凯提出走的事告诉他，他却

把我骂了一顿。当时我想起小姐夜深拿着煤油灯寻小猫的情景，我觉得我应该挨骂。而且我相信我挨骂的事，小姐一定知道，至少张会上楼去告诉她。

然而从这天起我就再没有听见小姐提起凯提这个名字。她似乎应该忘记了。不过我明白她还记着它。

八个长日子终于捱过去了。也没有人再说要把凯提找回来的话。但是在一个下雨的早晨凯提突然回来了。张先生看见它，其次是我，最后是小姐。它不知淋了多久的雨，身上的毛都粘在一起了。它蜷伏在门槛里面，身子缩做一堆，头枕在尾巴上。张唤起它，它走路很吃力，一歪一跛的。后来我们才发见它受了伤，腿给人打坏了，近尾巴处还脱了毛。

"凯提，可怜的凯提！给人欺负到这样！你为什么早不回来？不知道是谁会这样残酷，欺负这一个小小的生物！"她一边用毛巾给它揩身，一边爱怜地说，她还拿药擦它的伤处。

雨一直落着，她穿着从香港带来的雨衣出去买猪肝和小鱼。她一定要自己去买。她还说她喜欢在雨天穿雨衣走路。

这一天小猫受着优待，受着细心的看护。可是它的精神越来越差。下一天雨止了，出了太阳，天气暖和多了。但是它静静地躺在门槛里土地上在抽气。它不动，也不吃东西。眼光多么无力。

"张先生，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小姐痛苦地问。

可是张也没有办法。

到了晚上猫的情形还是这样。小姐没法弄它上楼，就让它睡在楼下，她从自己的床上，抽出一条草荐，给它做被褥，让

它睡得温暖。她还在下面陪着它，直到夜深才上楼去。

就在这个夜里猫死了。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死的。早晨我们起来，看见它侧着身子躺在地上，已经僵硬了。

“可怜啊，可怜啊，就这样完结了，”小姐连声叹息道。

“黎小姐，你打算把它怎么办呢？”张问道。

“我想找个地方埋它，给它做个坟，”她说。

“好，我去办，”张英勇般地说。

“我也去，我看到一块地方，风景很好。我们还可以给凯提竖个墓碑，”小姐激动地说。

两个人一块儿走了。张用报纸掩住死猫，不让人看见。他的另一只手还提着锄头。

我进城去办事。晚上我回来，同张闲谈，谈到凯提，才知道他们把它葬在石桥（不是木桥，那近得多）旁边一个小树林里，还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

“我们走的时候黎小姐还流了眼泪呢！她真是个富于感情的人！”张称赞道。可是我并不同意他的话。

第三天上午我借着躲警报的机会，到了石桥旁的小树林，在小河边一棵树下看到一个小小的土堆，堆上竖了一个小小的木牌，上面写着“凯提之墓”四个字，是女人的笔迹。我在木牌前面立了许久。这四个娟秀的字在对我诉说一个女孩的寂寞。

1945年10、11月重庆——上海。

生 与 死*

就在到贵阳的那天下午，我坐人力车到××路去找一个朋友。刚拉到路口，车夫不愿意上坡，便把车子放下，我无法同他办交涉，便依他的话下车来。车钱只有十二元。我身边没有小票子，拿了一张百元的大票给车夫，他却说找不出。这倒叫我为难了。后来还是车夫提议道："买包烟来吃罢，他会找钱的。"因为在这街口有一个小小的烟纸店，店面很小，不过收拾得非常干净。柜台里坐着一位宽脸细眉、白净皮色、太太模样的女人，年纪不过二十六七的光景。我不会抽烟，我也没有买什么东西，我只求她换一百元的小票给我。她含笑地站起来，讲一口道地的北平话，打开抽屉，把小票子数齐了递给我。我付了车钱，正要上坡时，忽然听见楼上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叫"福英"，接着是那个女人的应声。我回过头去看，女人跑到楼梯脚前仰起头在对楼上的人讲话。

过了五六天我又去××路。我站在街口避开一部下坡的人力车，我的眼光落到烟纸店的柜台上。那个女人坐在柜台里，旁边站着一个穿浅黄色中山服的中年男子，正俯下头跟她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四四年贵阳《中央日报》副刊（月、日待查）。

讲话。女人温顺地微笑着。这天她脸上还擦了一点粉。

我在贵阳住了两个星期，临走的前一天，把行李送到车站以后，不知道怎样，我觉得非常寂寞。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上磨着，心里似乎空得很，在旅馆里别人不肯给我安静，我自己也坐不住，我只好到街上去消磨我的光阴。我从三点半钟一直走到天黑，在八点钟光景我经过××路口，听见锣鼓声，看见一大群人围在烟纸店门前，我挤进人丛中去。

烟纸店里电灯异常明亮，门前路上停了一具棺材，已经上过了漆，棺材头上放着几捆纸钱，堆得高高的，往下是一个木香盒，里面插了一对蜡烛和好几炷香，这香盒底下垫着纸钱，再往下又散乱地放了几叠纸钱。紧靠着棺材脚放了一张方桌，桌旁插了一根招魂旛。桌下放着小小一盏路灯，桌上供着白纸的灵位。棺材旁边，在街中放得有两张方桌，一些人围了方桌坐着打锣鼓。

“什么人死了？”我惊讶地问我自己。我便走到供桌(放灵位的方桌)前面去。我正要看灵位牌上的字，不，我已经看到白纸上写的“上寿显妣”四个字了，忽然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引开了我的注意。

“请诸位先生稍微休息一下，我有几句话要报告。”我听见的好像是这样的话。我便离开供桌，走上人行道。

锣鼓声停了，我抬头看那个烟纸店。店前人行道上站着一个穿灰色中山服的中年男子，我认得他，因为他有一张橄榄模样的脸，头发剪成平头式样，顶上盖着一堆直立的短发。他眼睛哭得红肿了，手里拿着一个相片架子，他先鞠一个躬，接

着便说：

“报告各位，我女人的病起先是请通善堂的黄先生看的。他是妇科的名医，他说我女人有四个月的毛毛。他给她吃安胎的药，我晚上一点钟去请他来给我女人看病。后来我又陪我女人到××医院去看，医院里内科王主任是很有名的。他说绝不是毛毛，他可以写保票，他要我女人照X光，那天是星期四，医院里要星期一、三、五才照X光。我女人的病又给耽误了。她死的时候，人很清楚。我们两个还睡在一张床上。她早晨四点钟坐起来，叫我走开，她自己穿好衣服鞋子，刚站起来就昏过去了。……她的病是给我耽误了的。要是请个好医生也不会死。可是我是个男子汉，不知道女人的事。她不是有毛毛，她害的是倒经，我们是民国二十五年结婚的，我们夫妇感情很好。我对不起她，我劝各位，以后你们的女人生病，要留心请个好医生来看病，不要给耽误了。我说的黄医生，他一口咬定我女人有毛毛，他叫黄××，住在××街××号。我女人自来就有倒经病，就是行倒经，她不会有毛毛的，她名叫陈福英，陈是耳东陈，福禄寿的福，英雄的英，……”

他讲的却不是道地北平话了，不过总是北方的口音。他说话时两只手不住地上下舞动。他说几句，便要停一下，叹一口气，眨一眨眼睛。众人静静地听着，这些人的眼光全射在他的脸上。他说到“英”字，又抽咽地吐了一口长气。他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他向众人点一下头说：“好，我报告完了，谢谢你们。”他侧着身子，看看手里的照片，又点着头对木香盒说：“陈福英，我报告完了，我把你的事情向各位报告

了。医生害了你，他拿了钱也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这一生是好夫妻。只怪我没有福气。"他停了片刻"这也是你的命不好。不然你不会死得这么早。你要我买口好棺材，我也买了，你要我烧多少钱，我也烧了。……你要的什么我都办到了。我也就只有这一点力量。"

他走到供桌前面，把照片架放到桌上。他端端正正地立在供桌前。锣鼓敲起来，一个穿蓝布袍的瘦脸汉子在旁边唱着："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他行完礼，走进店里去了。两个工人在路牌旁边原有一大堆纸灰的地方烧起钱纸来。

锣鼓停了。四周的人走了一部分。我又到供桌前面去。我刚刚站定，却看见橄榄脸从店里跳了出来。"我还有一件事情向各位报告……。"

"王先生，不要讲了，你歇一会儿罢，"一个梳两根小辫子的黄脸女人拉着他的衣袖说。

"不要紧，我不累，我一点儿也不累，她今天保佑我，所以我一点儿也不累，"他不断地点着头。然后他又转过身，两只手向上下舞动："我还有一件事要报告，就是我的女人说过，她死了，要我一年以后才结婚，我一定听她的话。"他又向着棺材说："陈福英，我一定听你的话，你看我什么事都依你。"他亲密地说着，好像是在对他活着的妻子讲话似的。

"王先生，不要再讲了，你进去歇一会儿罢，"黄脸女人又跑过来说。另一个穿灰布中山装的年轻男子走过来，边劝边推地把他推进店里去了。

我身边有两个中年女人在讲话。一个问："他在讲啥子？"

另一个回答："他在讲他女人生病的事情，他在报告。"头一个不耐烦地说："这有啥子好讲的？"另一个再答一句："他讲医生看错病把人害了。"头一个说："这是命，这都是命，没有错的。"

钱纸烧过了。打锣鼓的人散了。两张方桌全空着。一个穿浅蓝布长袍的光头三角脸的男子，在朝着街的一张板凳上坐下，他也不招呼谁，却把眼睛望着远处，独自唱了起来。我惊奇地望着他那张带了得意的表情的脸，一面注意地听他的歌辞。他唱了许久，我只听出四个整句：

知心朋友有几个　反面无情世上多……

有酒有肉谈笑话　朋友常来打哈哈

他的嘴刚刚闭上，站在他旁边一个衣服破褴、手拿竹竿的老乞丐就接着唱起来。我听不懂这个老人的唱辞，却看得清楚他那张污黑的老脸上的忘我的表情。他闭着两眼，把下巴放在竹竿头上。他唱了一段，一个年轻人端了一杯茶放在方桌角上，客气地说："大哥，请吃杯茶。"

"是啊。"老乞丐端起杯子喝了。

我又抬头去看灵位牌，忽然听见人行道上，一个男人在低声说话。

"……他这两三年运气好了，赚到二三十万。"我听到这一句话，便转头向店门口看，说话的是刚才推橄榄脸进店去的年轻人，听话的是两个老太婆。等我刚刚回头，又听见他说："走了好几家，都要一万几。后来回来买到这副，只要八千块钱，这副棺材，还可以睡，这也是运气。"我索性望着他，听他讲下

去："他以后接女人也不容易，有学问，有见识的看不上他这二三十万块钱；要讨人家大姑娘，他今年三十多了，哪个大姑娘愿意给他。……像这样的女人真少有，不管你打她骂她，她还是和和气气给你烧茶煮饭。哪怕她在哭，朋友伙来，她马上揩干眼泪水有说有笑的，哪个不讲她好！……"

我把眼光掉回到灵位牌上去。这一次我看全灵位牌上的字了。正中一行"上寿显妣王母陈太君之灵位"。一边是"三魂游地府"，另一边是"七魄赴朱陵"。我再看照片：一位白净皮色、宽脸细眉的太太半张开嘴在微笑。我想到换钱的事，心里也有点不好过，好像谁泼了一盆冷水在我头上似的，我打了一个冷噤，我连忙掉转身子。方桌旁边坐满了人，现在唱歌的是一个年轻的兵士，我听见他正唱着"……一学剃头要刀快，二学……"。

一个穿深蓝布长衫留八字胡的男人忽然跑过来打岔说："各位弟兄对不起，请休息个二十分钟的样子，吃根烟，吃杯茶，我们还要打堂家事。对不起啊！"接着他又叫："张洪兴，拿包烟来，倒茶啊！"

接着橄榄脸又出现了，他客气地说："对不起各位，小兄弟没有好好招待，请原谅。"他连连点着头，众人谦让着，抽着烟，喝着茶，大家高高兴兴，有说有笑，那个穿灰布中山装的年轻男子还站在烟纸店前招呼客人。忽然一个穿军装的长脸人从人丛中走出来唤道："方成先"（大约是这三个字罢），年轻男子转过头来带笑地回答一声："特务长！"

"哪个死了？"特务长指着棺材问道。

“王二嫂，”年轻男子答道。

“王二嫂？”特务长惊讶地说；“我前天早晨还看见她好好地坐在柜台里面，什么时候死的？”

“今早晨四点半钟。”

“真想不到！”特务长奇怪地说。

“人要死哪个又想得到！”年轻人说，他无可奈何地笑了笑。特务长笑了，他笑着走了。

“各位，对不起，小兄弟没有好好招待，”橄榄脸又跑过来向那些坐在方桌旁边抽烟喝茶的人道歉。年轻男子和黄脸女人拉住他的两只膀子说：“不要讲了，你上楼去睡一会儿罢。”

“我不累，我女人在保佑我，我一点儿也不累，”他还红着脸吃力地解释，可是他的声音已经哑了。我离开这里时满耳都是锣鼓声。我最后一次回头看那个烟纸店，楼上露台里，摆着好几盆花，两扇玻璃小窗上挂着红色窗帷，映出房中的电灯光来。

1944年在贵阳。

后　记

一九四二年三月起我从桂林到重庆、成都，又从成都、重庆回到桂林，整整花了七个月的长时间。这个期间内我只写了三篇类似小说的东西。而且是在几个地方写成的。

本来我想在《小人小事》的题目下写十篇像《猪与鸡》一类的小文章，但是那一年里，我就只写了三篇。一九四四年五月再由桂林去重庆，路过贵阳时在旅馆中续写了一篇《生与死》。今年十月在重庆又写了《女孩与猫》，到上海以后才完成。这类小文章我不想再写下去了。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

巴　金 1945年11月在上海。



英雄的故事

《英雄的故事》，一九五三年九月由平明出版社初版。一九五六年六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重排新版，迄一九七九年三月，共印行二版(次)。

一九六四年九月由作家出版社排印一版。

寄朝鲜某地*（代序）

——给志愿军某部政治部李希庚同志

窗外是漫天的阳光，孩子们的清脆的笑声随着微风飘进我的屋子。麻雀在对面的红屋顶上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刚落过了一天的雨，早晨的空气是特别新鲜，特别干净。我坐在书桌前面，读着朋友们的来信，我有一种不能用言词形容的幸福的感觉。这个时候我想到了你，我想到了你们。我想到那个风景如画的山沟。我想到寒夜在你那半山的土屋子里谈话的情景。我想到我们在夜半爬过山头、望着远处敌人在前沿阵地投下的照明弹、走回住处的情景。……我想到的事情太多了。我没法把它们全写出来。我只说，你们把我的心拉得好紧！在任何时候我的心都在你们的身边。一静下来，我就仿佛听见你们的声音。你那天晚上读给我听的一段日记不断地在我的记忆中重现。今天我又翻出你的来信，我又读着你怀着燃烧似的热情写下的话："当祖国慰问团到达时，在晚会上我们互相拥抱、抬起来在会场打转，足有一个钟点，人们的心沉静不下来。那是什么支配着人们呢？"我目睹过这样的情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月报》总第六期。发表时题为《寄朝鲜某地——给李希庚同志》。

景，我了解你写这些话时候的心情。的确再没有比这种热情的表现、这种爱的表现更激动人心的了。今天我坐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重读你的来信，你的面貌，你们的面貌仿佛还在我的眼前。

阳光温暖地照在我的身上，这是春天的阳光。在这里春天已经来了。在你们的那个山沟里也许还垫着很厚的雪，我不知道溪水解了冻没有。我不知道半山的枯枝上有没有鸟的叫声。冬天一定还留在你们那里。你说："今年冬天会过得很好。"我虽然还没有得到你后来的信，可是我也知道你们怎样度过冬天。那些天暖了就会滴水的小小的土屋子在冬天是比较暖和、比较干燥的。可是雪化了，下了一天雨以后，说不定一堆土跟好几块大石头就会塌下来堵住房门。雨下得太久了，有的屋子地上就成了一片泥泞。白天房里难得见到阳光，夜晚屋子的每个洞孔和缝隙都让草垫和雨布遮得紧紧的，为了不泄露灯光，你们牺牲了户外的空气。我摊开你的来信就仿佛见到你那张用木板钉起来的小桌子和你那张木板的小床，就仿佛见到你们整个的简单、朴素、艰苦的生活。这一切在我的记忆里显得多么亲切。

我说到你们的艰苦的生活，你一定会提出抗议。你不承认"艰苦"的字眼，我在朝鲜遇见的志愿军的同志们，不论是干部或战士，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这个字眼。的确，我在哪一个人的脸上没有见到那种衷心快乐的笑容呢？我在哪一个山沟里没有听见那种响亮的英雄的歌声呢？你该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在你那间半山的小屋里吃着从祖国带来的糖果，不是有人

说过，祖国跟自己的心贴得这么近，是多大的幸福吗？我也记得一件事情：去年八月里雨季中的一个下雨天，我在朝鲜农家的前廊上听见一个害疟疾的年轻战士的谈话，他跟另一个患病的同志讲他的心情。他说："到晚上我烧得更厉害。卫生员叫我多喝凉开水，我一壶一壶地喝了。口还是干，可是肚子胀得没办法。卫生员还叫我喝水。我说：给我吃个桃子罢。卫生员告诉我，没有朝鲜币。他存的那一点朝鲜币都给病号买桃子吃了。我那个时候烧得人有点糊涂了，我真想吃桃子，可是听见他的话，我又清醒了。我很感动。今天我有地方休息，有凉开水喝，有这样好的卫生员照应，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过四五天，天一晴，我又看见他高高兴兴地拿起洋镐在那个塌了的洞子前面挖土了。

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正因为见得太多，我才更不能忘记。我曾经用我的笨拙的笔写过一些英雄的面貌，可是同样牵系住我的心的，还有你们的面影。没有人称你们做英雄，然而每个英雄的事业里都有你们的份。功臣榜上没有你们的名字，然而你们却是启发、鼓励、帮助英雄立功的人。你来信说："我们在编本部的英雄集，"将来祖国人民也会为你们编印英雄册子。我在你们那里住的一个星期是我留在朝鲜的最后几天，因为要跟你们分别，我便想把你们的生活、你们的面貌和谈话更深地记在心里。我越注意你们的生活，越了解你们，我越不能不敬爱你们。在这最后的几天里面一个热水袋一直压在我的心上。在安东我没有找到它，后来在沈阳一家百货公司里我终于得到了它，才去掉心上的石头。并没

有人要我找寻热水袋。这是我的良心对我的要求：在那些日子里我看够了一位同志的痛苦：就是跟我同住在一间土屋子里的那位科长同志，他在胃病的折磨中始终没有放弃工作。每次我看见他一只手捂着肚子一只手写字的情形，我就想：一个热水袋多少可以减轻他的痛苦。晚上他因胃痛不能入睡，在对面床上翻身的时候，我劝他休息几天。他笑了笑，说："为了这点病就丢开工作吗？"我没有话可以说服他。这种在志愿军中间极为普遍的高度的责任心是任何力量所不能动摇的。你不是也在扶病坚持工作吗？可是你检查了工作从另一个地方回来的那天却对我说：身体渐渐好起来了。你没有说假话，你的身体的确比我入朝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好多了。你说，从工作中身体得到锻炼。我说，爱和信心使你逐渐恢复健康。艰苦反而培养了你们的乐观的情绪，因为你们在紧张的工作里，在任务的完成中找到了快乐。你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想到自己。我看见你们笑得高兴的时候，那就是从祖国传来了好消息了，那就是前线打了胜仗、祖国的生产建设更有了保障了。

你们的心永远向着祖国，你们把自己的一切全献给祖国。有一天你们看见了祖国慰问团给战士们带来的烟斗，上面印着金字："祖国——我的母亲"。你们想：为什么不给我们也带来这个呢？"祖国——我的母亲"，这六个字不是比什么都宝贵吗？对你们，这不是一句空话。你们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在这里。从你们口中我听过不少热情的语言。每个人都谈起不同时期跨过鸭绿江的心情。一位师的宣教科长对我念过战士

的快板诗："又是雪来又是风，千军万马往前进；冒雪跨过鸭绿江，只见江水清又清。……"我看过一位同志的日记，我至今还记着这样的话："从今天开始向祖国告别了……静静的鸭绿江摆在面前。晚上人静得像江水一样，开始渡江。"短短的三十几个字说明一种非常严肃的心情。另一个宣教科的同志告诉我，他第一次踏在朝鲜的土地上，匆匆地回头望一眼，北岸的几点宁静的灯火就像母亲的眼睛一样在对他微笑，他激动地在心里说："为了你，我还有什么不肯拿出来的？"在任何时候他都想着那一夜的宁静的灯火。你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着祖国的不灭的灯火。它是你们的热爱的泉源。刚到朝鲜的时候，我有机会看到一位营长的战斗日记。我记得下面这一段话："我一抬头，就看见被敌机炸毁的房子。'是谁把朝鲜人民的日子给毁了呢？'我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像被火烧了似地难过。要是我们祖国人民受到这种痛苦，我应当怎么办呢？我真希望叫我这个营很快去打仗。"这不正说明了每一个志愿军的心情么？

我又想起前年强渡临津江的场面。你对我谈过那些场面，别的同志们也常常谈起它们。在那个时候，敌机不断地投弹，大炮接连地打在江心，江面是那样宽，寒冷彻骨的水又流得那么急，水浅的地方也达到人的胸前，河底还有敌人装的带刺的铁丝网。"那真是拿命来拚啊。可是没有一个人害怕，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都想着祖国。我们一直勇敢地朝前走。脚给铁刺挂破了，也不感觉痛。别的同志牺牲了，也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不管怎样困难，我们完全过去了。敌人也料不到

我们会这么快冲破他们的封锁口胜利地渡过江！”一个军的秘书科长这样说。有一次一个文工团的女同志兴奋地谈过她渡江的情形：要不是两个男同志跟她手挽手地一块儿过去，她早已给水冲走了。这个资产阶级出身的少女虽然因此害过一个时期的病，可是她在炮火中锻炼得坚强了。后来有一个时期她到连队工作，她感到能够为战士们做一件事情是她的“最大的幸福”；她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她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大的光荣！”她能够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她对祖国的爱，所以她活得快乐，所以她的感情跟战士们的感情结合在一起了。

那天晚上在你们那个山沟里，敌机飞过我们头上的时候，你翻出来一九五一年的日记，把铁原阻击战中一个团政治委员的来信读给我听，你不是没有用意的。在战争进行得最激烈、我们的英雄们用血肉守住阵地的时候，在援军还没有到来、少数的战士用刚毅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挡住多数的敌人前进的时候，直属队的二十多个同志拿着决心书来要求首长给他们战斗的任务。这种对祖国的热爱，这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使得那个刚强的政治委员差一点忍不住落下眼泪。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你最近来信报告了许多胜利的消息。你说：“东、西、中三线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今天的胜利局面正是这许多英雄的热血换来的，也正是你们的艰苦的工作换来的。现在我坐在阳光照耀的窗前，想到你两年前的旧日记，我还不能够制止我的心的猛跳，那些不能被人忘记的艰苦日子，不正是说明你们的深厚的爱的最好证据么？所以你

们见到“祖国来的亲人”，“毛主席派来的代表”（你们这样地说过了多少次！），就没法控制你们那种奔放的热情了。

窗外响起小孩的歌声。他们唱着你们熟习的歌子：“雄赳赳，气昂昂……”他们唱得多快乐。我爱听他们的歌声，我知道你们也爱听他们的歌声。孩子们的歌声是你们在山沟里很难得听见的。孩子永在你们的思念中。在你们的土屋子里墙壁上，除了领袖像以外，还贴着祖国的孩子们的照片。孩子们对你们笑得多天真，多亲切。在坑道里，在战士们的“住室”里，我也见到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孩子们的照像，常常有人在照像下面写着：“为了下一代”，或者“保卫我们的下一代”。的确有不少的英雄为了保卫下一代流尽了他们的血。你们的心血也正是为了保卫下一代一直在流着。每次我听见你们谈到祖国孩子们的幸福生活，你们的声音里流露出多么深的感情。当你们接到祖国孩子们寄来的慰问信的时候，当你们在收音机前面听到祖国孩子们的欢乐的声音的时候，你们的脸上现出多愉快的光彩，你们仿佛得到最大的酬报了。愿这封信把上海的春天的阳光跟幸福孩子们的歌声一起带到朝鲜，带到你的寒冷的土屋子里，带给你，带给你们，让你们知道：你们也无时无刻不在祖国孩子们的思想中。你热爱祖国的孩子，每个志愿军都热爱祖国的孩子。孩子们是你们的“未来”，也是我们全体的“未来”，这又是多么美好的“未来”啊。你们为祖国所尽的一切力量会在孩子们的无限的幸福中得到最大的酬报！

1953年3月在上海。

坚强战士*

兹将志愿军党委会……批准授予我部……个人的光荣称号公布如下：……授予×××师×××团五连战士张渭良"坚强战士二级英雄"的光荣称号……

——摘录志愿军××部政治部通报(1952年10月2日)

一

他醒过来了。

他觉得浑身发痛。左腿上负伤地方痛得更厉害。他想把身子移动一下，可是四肢没有一点力。他又在这个干了的浅水沟里躺了一会儿。四周很静。风吹动沟旁小树的绿叶。阳光还没有照到沟里来。天气实在好，不热也不冷。他微微动了动头，眼光无力地往上看。晴天，绿的树叶，碧绿的草，草上有发亮的露珠，开着的野花，一只鸟飞过……跟祖国江南的地方差不多。他伸出右手揉了揉眼睛。左胸上忽然大痛一下。他皱了皱眉头，竭力不发出叫声。他静静地躺着。他的眼光落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文艺月报》总第一期。

在左腿上。伤口已经包扎好了。炸破的棉军裤上还有血迹。伤口一直在痛。他想起了他先前包扎伤口的情形：为了包扎伤口，两个救急包都用上了，可是还不济事，他身上的伤口太多了。他又从裤袋里掏出毛巾，毛巾在左边裤袋里。他用力一抽，就抽出来一根打断了的两寸长的股骨。他看见那根带血的骨头，心都紧了，他想道："我完蛋了。"他楞了一下。但是他马上又忍住痛把股骨塞回去，用毛巾把伤口包起来。包好伤口以后，他觉得力气已经用尽，就倒在沟里，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了。这是天亮后的事。现在看太阳光，他知道他并没有睡多久。但是他不像先前那样地绝望了。"我并没有完蛋，"他想道，他的瘦脸上露出了微笑。"我不会完蛋。我要活着回去，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同志们都在等我……"他想着，他觉得痛苦似乎减轻了些。他用右手摸摸右边胳膊下的一颗手榴弹，又把左边胳膊下那颗手榴弹看一眼。他的眼睛亮了一下。他想："我用不着担心，我还有武器。如果让鬼子发觉，第一颗手榴弹可以炸死几个鬼子，第二颗手榴弹就用来跟鬼子拚。我绝不做俘虏。"他记起了昨天晚上的情形：跟他同路到敌人阵地上去抢救伤员的一个担架员踏响地雷牺牲了，他也受了伤；他叫另一个担架员把伤员背回去。他跟那个年轻同志分别的时候说："我用不着等你们来找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会爬回来！"他的枪也交给那个同志带了去。"把我这支自动枪也带回去，交给连首长。我这里还有两颗手榴弹。"那个同志已经完成任务回到连里去了。同志们知道了他的事情。他们一定在替他着急，为他担心。这个时候他们一定在班排里

谈论他，在连里谈论他。大家在等着他回去。他的弟弟一定也很着急地在等着他回去。同志们会出来找他，他们会出来接他。“不，我要自己爬回去。省得同志们为我的缘故多冒一次险。”他在心里说。他的嘴角挂上一丝笑意，他好像看见了同志们的比亲人还要亲的笑脸。“我不会离开你们，”他想道。他觉得精神渐渐地好起来了。他的思想也更活动了。“躺在这里只是白白地消耗精力。我脑子清楚，身体也能够活动。为什么不应该自己爬回去？凭这点伤，就要麻烦别的同志吗？这里离敌人近，万一再出了事情……”他下了决心了。闭上眼睛养息了一会儿，他开始考虑怎样爬回阵地的问题。问题很简单：他不能让敌人发觉，必须在晚上爬。这个沟倒是很好的隐蔽地方。他白天在这里休息，晚上再动身往回爬。

他这样决定了以后，一时很兴奋，就不顾痛苦，把两只手（右手特别用力）按在沟里砂土上，咬着牙用力一挣，把半个身子坐起来。尽管伤口痛得厉害，他叫都不叫一声。他就靠在沟旁边斜坐着。额上绽出大颗的汗珠。脸挣红了，耳朵里嗡嗡地响得厉害。他也不去管这些。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又睁开眼来。他听见了那个熟习的声音。“老汉奸”（战士们习惯用这个名字来叫敌人的炮兵校正机）又在前沿阵地的上空盘旋了。除了下雨天，它就从没有缺席过。它到处找目标，指挥炮打过来。“等着罢，总有一天要把你揍下来，”他抬起头骂了一句。他的手无意间挨到棉军服的口袋，碰着一样硬的东西。那是一个硬面的袖珍笔记本。“我还留着它做什么？”他想道。他从衣袋里掏出来笔记本和家信。这些东

西是不能落在敌人手里的。部队的番号，连首长上的课……都记在笔记本上面。“干脆毁掉罢，”这个思想在他的脑子里闪过。他不再迟疑就把信撕碎，塞到嘴里嚼成了纸浆。小小的笔记本是他在一个多月前托人从祖国买来的。他翻开第一页，就看见毛主席的照像。他呆呆地望着毛主席的脸。毛主席带着慈祥的笑容在看他。他不由自主地带着感激轻轻唤了一声：“毛主席。”毛主席好像就在他的面前。他很激动，他觉得他身上突然添了一股力量。他小心地把照像从笔记本上撕下来，小心地折好照像放在棉军服的右边小口袋里面。他带笑地在心里说：“我会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一定要活着回连里去。”他把笔记本上写满了字的十几页全撕碎嚼烂了。

这件工作花去他不少的时间，也把他仅有的一点力气耗尽了。左腿和左胸一直在痛。但是他并不灰心。他什么也不想，闭上眼睛躺了一会儿。忽然他觉得口渴。他睁开眼睛。没有水。他的右手抓起一把草，又丢开了。他动一下，伤口就痛。他想道：“时间还长，我应当忍耐。”

这是第一个考验。“不管怎样，我应当忍耐。”他咬着下嘴唇，这样想道。

二

他居然捱到了傍晚。他整天发热，口渴。太阳照在沟边的时候，他的内衣让汗水打湿了。在四月底五月初的天气，晚上他出来执行任务，穿着棉衣，当时他完全没有料到出来抢救

伤员会自己负伤。棉衣棉裤虽然让地雷炸破了好些地方，但是在白天穿着还是一样地淌汗。出了汗他更觉得口干，要忍耐实在不容易。可是他终于熬过去了。有时候他很清醒，有决心，有信心；有时候他昏昏迷迷地睡着，他觉得不舒服，他一直在做怪梦。

到了傍晚，炮兵校正机的声音没有了，天气也在太阳落下去以后转凉了。他突然清醒过来。盼望了一天的机会到了，他很兴奋。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力量爬回阵地去。他毫不迟疑，就开始朝沟外爬。

跟昨晚上一样，他还是脸朝着天，仰起身子在爬。他用两只肘拐和一条完好的右腿支着身子，头朝前，脚在后慢慢地向前移动，半个背和半边屁股在地上擦着。两颗手榴弹仍然放在胸膛的两边，他爬一步就把它们向前移一下。地并不是平坦的，除了石子，还有野花、野草、树根和折断的树枝。……这一切使他爬起来更感困难。但是他已经爬过一个夜晚了。他不会因为这些困难改变自己的计划。不管怎样困难，怎样慢，他却是一步一步地向自己的阵地爬去的。

夜来了。半圆月被一片云遮住。但夜并不是漆黑的。他的眼睛看得见近旁的东西。他慢慢地爬着去找来了两根两尺多长的树枝，他把它带在身边继续向前爬。月亮从云里出来。板门店上空的银色光柱也明亮地在西边现出。那是停战谈判会场区的标帜，它正好给他指示方向。他爬一段路，就休息一会儿。他不觉得累。伤口仍然发痛。但是他也不注意，他已经习惯痛了。他这样地爬了好久。他估计爬了十公尺的光景。

他的头碰到了铁丝，他爬到敌人的铁丝网跟前了。他感到紧张。“这是一个关，”他想道。他没有带剪刀来。他只好从底下钻过去。他试了两次，脸上给划伤了。他在铁丝网跟前爬来爬去。铁丝网像镰刀似地朝着他，把他包围着。他始终绕不过去。他瞪着它，没有一点办法。最后他决定还是从网底下钻过去。他慢慢地把网底下的草弄干净了。他又用先前拾来的树枝去拨铁丝，弄了好一阵，他总算拿树枝顶住了铁丝，把铁丝网撑起来，下面有了缝隙，够他慢慢地爬过去。他的棉衣给网上的铁刺挂住了。他费了不少的力气，才挣脱了铁刺爬过去了。

他爬过了铁丝网，已经是下半夜了。夜相当凉。可是他仍然出了一身大汗。他吐了一口气。他揩了揩汗。他停下来。他这时又觉得口渴，而且感到饿，肚子里好像被什么东西在搅动一样，不停地响着。伤口像被烈火烧着似地痛得厉害。他用力咬嘴唇。他努力要不去想这些。他继续往前爬。可是他的头刚一动，后脑袋刚在地上擦一下，他就觉得浑身痛起来。他立刻又停住了。接着他跟自己发了脾气，他气恼地说：“才两天就熬不过了？你想想你当初是怎样出来的！”话倒是顺口说出来，但是去年夏天在上海近郊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情景马上就在他的眼前重现了。他报了名，他的弟弟也报了名。村干部向他们提意见，要他们留一个在家搞生产。他的弟弟说：“哥哥，你年纪大了，你留在家，让我去。”他说：“你年纪小，应该留下来，我去。”母亲对他们说：“家里的事情我管得了。你们都去罢。”他们从村里出发的时候，母亲还嘱咐过他：“你要

带好弟弟，为祖国立功。”母亲又说：“你们要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让大家过着和平安稳的日子才回家……”还有出国前的那些热烈的欢送会他也记起来了。他心里想：“大家都把我们叫做最可爱的人。我连美国鬼子都没有看到，就踏响什么鬼地雷，把左腿炸断了。倘使连这点伤都熬不过去，白白地死在这里，那才丢人！”他咬紧牙齿，继续爬起来，而且爬得比先前快。他不休息，接连地爬着。

另一道铁丝网又横在他面前，他用先前的那个办法爬过去了。过了铁丝网仍是高高低低的起伏地。月亮落下去了，夜更凉。他的内衣湿透了。砂土在后脑袋上显得冰凉。润湿的草贴着他的发热的脸颊。他渴得难受的时候，就抓了一把草塞在嘴里乱嚼。

干得发痒的喉咙有了一种舒适的感觉。他四肢松弛地躺在河边草地上，右手捏住一把草，眼睛望着天空。天开始发白，发亮。清晨的空气像一只母亲的手在摸他的脸。他倦得只想睡觉。

“我要当心，不能麻痹大意。我应当找个隐蔽的地方，”他忽然睁大眼睛对自己说。他向左右两边掉头看。不远处有一丛矮树，他就爬到矮树下面草丛中去。到了那里他只觉头发昏，四肢无力。他什么也不想，就闭上眼睛沉沉地睡着了。

三

白天，阳光烤着他的皮肤，刺痛他的眼睛。他想着自己的任务，再也睡不着了。他睁大眼睛注意地望四周，一面在考虑晚上应当朝哪里爬，一面在警戒敌人。同时他拉长了耳朵，听敌人那面发出来的冷枪、冷炮。

正午的太阳晒得他头昏，伤口痛得更厉害了。他渴得没有办法。他时时落进半昏迷的状态里做起梦来。他的梦很短，而且不连贯，但都是些打仗的梦。他不是梦见敌人追赶他，就是梦见他守住一个山头用手榴弹打退敌人的进攻。……

他终于熬过了这一天。夜来了。四周响起一片青蛙的阁阁声。饥渴、疲乏和疼痛的感觉并没有减轻。但是他的脑子非常清醒，眼光也不曾减弱。他认清了方向，开始爬起来。他爬得慢，爬得很吃力。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迷路。板门店会场区的光柱，还有敌人炮弹爆炸的火光，都在给他指出正确的方向。

他又爬过了一道铁丝网。他已经有经验了。口干得难受，肚子饿得厉害。他拔起身边一些野草，放到嘴里嚼了一阵；他吞不下去，又把草吐出来了。

他一直爬到天亮，才找了一个隐蔽地方，闭上眼睛休息。

四

他又熬过了一天。这一天也是在昏迷的状态中度过的。他又做了些打仗的梦。他梦见他的左腿负重伤，他在交通沟里来回爬着打击敌人。他梦见炮打在他的左腿上。他梦见他那住在上海近郊的母亲。他梦见他那生下来就吃苦、终于送给别人的亲生女儿。他梦见他那让地主逼死的父亲。……在梦里他一直得不到安宁。他浑身发烧，手也常常在动，在抓他的棉军服，把他那本来炸破了洞的棉衣撕得更破了。左腿上的伤口愈来愈痛。左胸也在痛。饥和渴不断地折磨他。头一直在旋转，肚子里发生了一阵绞痛，好像肠子被扭转着似的。"我能够忍耐，我绝不屈服，"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脑子里盘旋。他一直在跟痛苦作斗争。不论是昏迷或者清醒，他始终没有哼叫一声。

夜又来了。他觉得烧退了些。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四周的景物并不模糊。他又头朝前、眼望天那样继续爬起来。虽然爬得非常慢，非常痛苦、吃力，可是他始终充满了信心。

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沟旁边，天快亮了。看见水，他的眼睛发亮，他的身子也变得轻松多了。他兴奋地努力爬到河跟前，洗了脸，漱了口。水冰凉地打湿他的脸颊。他感到舒服地吐了一口气。

河拦住他的去路。其实这只是一条小河沟，不过两三公尺宽，水也不深。要是在平日，他一个箭步就跳过去了。可是

现在望着这河沟，他急得没办法。他把头挨到水面，又马上缩回来。他把右手在水里搅一下，他没法摸到河床。就是这样的简单动作，也费了他很大的力气。他连动一下也不容易。动一下就增加他的痛苦。

“怎么办？难道我就在河边等死？”他绝望地想道。他在河边躺了一会儿。炮声在不远的地方响了。他忽然警觉地问自己（话还是说在心里）：“我躺在这里做什么？我不是对同志们说过：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爬回去。难道这是一句空话？对志愿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我还怕这么一条小河？”他忍住痛用右手按着河边长满草的地，勉强把头抬起来，向两边看了看，然后又放下头来。他想着。他的手在草地上摸索。他摸到自己带在身边的树枝。他忽然露出了笑容。他想到办法了。他很兴奋。但是天亮了。他还得等一天。他叹了一口气，连忙隐蔽起来。

五

这一天他躺在隐蔽的地方，动了整天的脑筋想着一件事情：他必须在这天夜里渡过这条小河沟。

白天他的伤口一直在痛。太阳晒得他浑身发烫。他做了好几个怪梦。然而他还是醒的时候多。他忘了饥渴，忘了疲倦，急切地盼望黑夜早来。

黑夜终于来了。天气也凉爽了。他马上开始工作。他顺着河岸爬来爬去。他在找寻粗的树枝。他花了不少的时间，居

然找到了一根三公尺长的松树枝。他又朝另一个方向爬去。他爬了许久，居然又拖回来两根同样粗的树枝子。他要把这三根粗枝当作桥梁，横架在两岸上。他在平时做这样的事情，不费一点力。可是现在他爬来爬去，用尽力气，桥还是架不好。他越着急，越没有办法。汗出得多，浑身都湿透了。他紧张地爬来爬去，他一直工作到半夜，终于把三根树枝都架在小河上面了。他做完这个工作，虽然倦得要死，可是他感到了不能用言语说明的快乐。他望着河沟，得意地想道："我总算把你征服了。"他把手榴弹塞在棉衣的两边大口袋里。他又注意地望了望架在河上的粗树枝。他慢慢地爬过去：小心地把头和身体，还有受伤的左腿放在并排架着的树枝上面，右手和右腿放在水面。他的左手捏着小树枝，当做撑船的竹竿使用，右手和右腿在水里一曲一伸，头也慢慢地在树枝上面擦着向前移动。他出了一身汗，还没有爬到河对岸去。他接连喘了几口气。他的手和脚、他的头一直不停地在动。耳朵里响得厉害。眼睛也花起来。他突然觉得四肢不能动了，浑身像给针刺着似地痛个不止，一直痛到心里。他咬紧牙关，定一定神，渐渐觉得脑子清醒了些。"大家在等我。我还有一口气，只要我不死，我一定要回去！"他用了低到只有他自己听得见的声音说。他想起了出发前张指导员的鼓励的微笑和关心的嘱咐。他想起了同志们平日的友爱的帮助。他忽然又想起了毛主席照像上的慈祥的笑容。他觉得心里一阵热，他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一股新的力量。他用了全力动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头。他不再想什么了。他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不管怎样慢，不管怎

样费力，他终于爬过了河。

“我又胜利了！”他觉得整个身体内都响着这个胜利的声音。他真想畅快地笑一两声。但是他爬上对岸，不过三四步光景，他觉得全身骨头好像散了一样，就在草丛里昏过去了。

六

他很快地就醒了过来。天亮了。炮弹在不太近的地方爆炸。他吃了一惊。眼看是一片金光。岸边连一棵矮树也没有。他找不到一个隐蔽地方。他吃力地把头向左右动了两下。他决定爬回到河沟里去，就照昨晚那个办法半边湿半边干地躺了一个整天。

这一天他昏过几次。可是他醒过来的时候，他仍然不曾忘记他那爬回去的决心。他的疲乏和痛苦在增加。他的勇气也在增加。有一次他在半昏迷的状态中，拍着右胸说：“来罢，再大的痛苦，再多的痛苦，你们一齐来罢。看我能够熬到什么时候！”

晚上月光抚摸他的烧脸。上嘴唇肿得厉害。一阵剧痛包围住他的整个身子。他说不出哪一个地方最痛。他觉得除了头发以外，整个身子都在发痛。敌人忽然打起炮来。炮弹从附近的上空飞过。炮声接连地响着。一下就打了十几炮，但以后又沉寂了。炮声并没有给他带来恐惧，他反而觉得敌人的炮弹在给他指路。他并不曾迷路；他自己的阵地分明在山的那一边。

他爬得比前一天慢，休息的次数也加多。但是他知道，他相信他爬一步就离自己的阵地近一步。"只要我不停止，不管怎样慢，我总会爬回去，"他常常这样地想。他又碰到了铁丝网，而且也居然照从前那样地设法钻过去了。他正打算休息，右手无意间挨到了一根很细的铜丝。他吃了一惊。他知道他碰到什么东西了。"又是你！"他生气地骂了一声。但是接着他却想："我应当特别小心，再碰响地雷，我就完蛋了！"他听过起雷英雄的报告。他又刚刚吃过地雷的亏。他也知道一点对付敌人地雷的办法。"我不惹你，"他低声说。他用了最大的努力聚精会神地沿了地雷线慢慢地绕着弯爬。他爬来爬去，爬了许久，始终没有爬出敌人的布雷区。到处都是细铜丝。他爬不动了，躺在细铜丝旁边。他闻到自己身上的刺鼻的臭味。不但左腿，连左胸上的小伤口也在发臭了。耳朵里一直在响。他愤恨地想道："难道我就死在这里？难道我就让这个小小的东西制服了？"他睁大眼睛望天空。月亮和星星都很亮。远远地有两下炮声。青蛙的叫声一直响个不停。"同志们怎么想我呢？如果我不回去，他们会以为我给鬼子抓去了。不行。我绝不让敌人抓我当俘虏！即使我再没有机会打鬼子，我也不能死在敌人阵地上。我不能对不起同志们。要死也应当爬回去死在同志们的中间。"愤怒在他的心里燃烧。他觉得他还有充足的力量克服面前的困难。就是死逼近了，他也要跟死斗争。"我要挖掉你。看究竟哪一个胜利？"他狠狠地骂了一句。他侧着头把细铜丝放在嘴里，他用尽力气咬断了铜丝。他顺着铜丝慢慢地摸到地雷跟前。就是那个长方形

的平台雷，它安安稳稳地摆在地上。他看清楚了它。他轻轻摸到另外的两根铜丝，把它们也咬断了。他又扭下了撞针，取下了雷管。“看你再有本事害人！”他得意地骂了一句。接着他又照样地起了另外一个地雷。“我胜利了！”他想道。于是眼前一黑，心里一阵难过。他晕过去了。

他醒过来。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感到寒气浸进他的骨头。身上非常不舒服。他觉得整个身子都不是他的了。他动动头。他的眼睛朝天空望去。大片的灰白云正在空中移动。“我躺着做什么？”他惊讶地问他自己。他把眼光掉向两边看。起下来的地雷还在他的旁边。这个战利品增加了他的信心，也增加了他的力气。“我还有充足的力量，敌人的诡计制服不了我，”他想着，瘦得可怕的脸上浮出了微笑。他小心地继续朝前爬，后来又起了三个地雷。

天开始发白。他有点紧张。他想：“我得赶快通过这个布雷区。”他注意地一看，前面地雷还多着呢！右边地雷也不少。他只好向左面爬。他爬了三四公尺的光景，到了一块稻田，田里积了两寸深的水。他没有时间仔细考虑了，立刻爬下去。他侧着身子靠着田堤，躺在那里迎接第六天的太阳。

七

太阳晒得他的脸发烫，晒得他浑身发热。他顺着田堤爬到一棵矮树荫下。棉衣的右面半边湿透了，贴在他的身上很不舒服。左腿上包扎伤口的纱布棉花已经浸透了血和脓，再

粘上尘土和砂泥，像是一张抹布。血和脓水还不断地从那里流到外面来，好些苍蝇集在这四周争吃这些脏东西。连伤口里生的蛆也开始爬到外面来了。它们正在各处乱爬，乱钻。他觉得一刻比一刻地难受。伤口也越痛得厉害。他的心再也不能静下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啊！”他苦恼地想道。他解开棉衣的扣子，把棉衣拉开。他闭上眼睛，把右手捏成拳头在胸膛上打了几下。他的痛苦并没有减少。他突然睁开眼睛，不顾一切地背靠着田堤坐起来。耳朵里一阵乱响。眼睛发黑。他咬紧牙关。他的身子紧紧靠着田堤。他昏昏沉沉地挣扎了一阵，终于迸出了一个愤怒的声音：“我要活。”声音很低，只有他自己听见。但是他仿佛推开了压在身上的重东西一样，他仿佛从泥潭里爬上岸来了一样，他仿佛扑灭了烧在他身上的火一样。他清醒过来了。他满头是汗，汗水还从他的脸上滴下来。苍蝇成群地争着吃他的脓血。他动一动手，伤口就大痛一下，左腿和左胸都痛。苍蝇也飞起来，但是马上又飞回原处叮住了。“我要活，”他想道。“为什么我不要活呢？难道这些痛苦就叫我屈服吗？我忘了我是为着什么出来的！我不是出来援助朝鲜人民的吗？那么我为什么不要活呢？……我当初抱了多大的决心出来抗美援朝。到必要时连性命都可以牺牲，还怕吃不了这些苦？”他从旁边的矮树上摘了一根带叶的枝子，拿来赶苍蝇。赶了两三次以后，他索性把伤口上的纱布解开来。一股臭味扑上他的鼻端。他看见伤口，心都紧了。这哪里像活人的腿部，它简直是一个烂了的桃子！溃烂的肉，脓和血混在一块儿，成团的小蛆在那个洞孔里蠕动。他

望着伤口发呆。他让一群苍蝇挤在那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楞了一阵。他的两只眼睛忽然射出坚决的光芒。他咬紧牙关。他下了决心了："再大的苦我也要忍受下去。不管伤多么重，我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得爬回去。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是代表祖国人民出来的。我一定要为祖国人民争光！"他找了一根细小的树枝，把伤口里的小蛆一团一团地挑出来。他做这工作很费力。痛使他不能做得快。手捏不紧小树枝，蛆常常从枝上掉下。他的手也开始不听他指挥，它毫无理由地抖起来。眼前也时常发黑。但是他一直集中注意力，忍耐地慢慢做下去。他不停地挑着，挖着。他终于把蛆从伤口里全挑出去了。在身上乱爬的蛆也弄光了。

他满意地吐了一口气。忽然他的眼前一阵黑，他不由自主地倒下来，他什么事也不知道了。

八

他醒过来，没有力气，没有欲望，他甚至不想动一下。他已经不介意痛苦了。他昏昏沉沉地躺在稻田边，时而睁开眼睛，时而闭上眼睛。口里干得像要烧起来一样。他有时伸起手胡乱抓一把水泥放在嘴边，嘴里似乎有一点舒服的感觉，但同时他又觉得有许多根细针一齐刺痛他的上嘴唇。他动一下，身上就大痛一阵。他躺着不动时又觉得整个身子都不是他自己的了。苍蝇不断地攻击他，他的左腿，他的上嘴唇，他的脸，他的左胸都成了目标。他挥着手赶它们。它们飞走了

又飞回来。

炮兵校正机一直在天空中打大圈子。那个使人厌烦的声音到他的耳边倒像是苍蝇的嗡嗡声了。有时候他觉得整个头被烈火烧着，耳边有人在摇铃子。他的手在田堤上抓，在水泥里抓，他也不知道在抓什么。他突然张开嘴，好像要叫喊。可是他没有叫出声来。他觉得难过到极点了。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挣扎。

他一直是处在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中。他一直在做梦。炸弹在他的四周爆炸，火燃烧到他面前。他始终不屈服，他一直在阵地上坚守。责任感，荣誉心，对祖国人民的爱，对同志们的爱，对敌人的恨……这一切在梦中支持着他。痛苦、疲乏和饥渴消耗了他的全部的精力，但是爱和恨，责任感和荣誉心给了他一种坚强的力量。他跟死亡斗争了一天，最后他又胜利了。

到了傍晚，他渐渐地清醒了。他也不去回想什么。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活着爬回自己的阵地。"他又开始爬起来。他越爬越感到吃力。他一天比一天地爬得更慢。两肘的棉衣已经磨穿了。背和屁股上面的棉花也快磨光了。磨得厉害的地方已经起了泡，有的泡破了，开始出血了。

月亮出来了。周围有几层白云。板门店的探照灯光像一把尖刀似地划开西边的天空。他一直在往前爬，不管怎样慢，他始终没有弄错方向。他一直保持着信心。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地昏过去。可是醒转来以后，他又继续爬行。

他终于爬完了稻田地，到一条供灌溉用的小水沟跟前了。

沟边长满了野草。沟里水已干涸。他爬到沟里，刚停下来，就失了知觉。

月亮完全隐在厚的云层里面。板门店的光柱也显得暗了。过了一阵忽然下起大雨来。雨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他惊恐地睁大了眼睛，他浑身湿透了。内部的干枯的感觉消失了，但是伤口痛得更厉害。他闭紧眼睛，咬住牙关，用力爬出沟去。他爬到沟外，雨点仍然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雨水浸入了伤口。他觉得左腿更加肿痛，上嘴唇也更加肿痛，左边胸口也一阵一阵地大痛。他找不到一样保护他的东西。忽然心里一阵难过，接着他又晕过去了。

他醒过来，整个身子都泡在水里。伤口好像让人用烧红的铁在烙着。浑身痛得麻木了。雨势倒小了些，但是如丝的细雨就像针尖一样地刺在他的身上，脸上。眼前一阵黑，一阵亮。耳朵里一直响着铃当声。呼吸很急，吐一口气，嘴唇和鼻孔就像让烈火烧一下，痛得不得了。他想呻唤，却叫不出声音。他想动，却没法动一下，肘和腿都不听他的指挥。

“这简直是在受拷打！”他痛苦地想道。“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他绝望地想道。他觉得他仅有的一点精力也在逐渐消失，连睁大眼睛的力气也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在死下去。“这一次我真完蛋了，”他闭上眼睛放弃一切地想道。他恍惚地觉得他已经落在水里，逐渐地在往下沉了。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睁开眼睛，惊疑地想：“这就是死吗？”惊疑中含有不小的怨恨。“为什么要受过这一切的痛苦以后才死？我的任务完成了吗？难道我自己一点力量也没

有？……”他想一下又停一下，他要集中思想也得费大力。“没有完成任务，就是死了也丢脸。当初是我自己报名要出来的。当初自己说过要出来保卫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的。”他又想：“当初入朝的时候，看见炸坏的朝鲜房屋，炸死的朝鲜老太太、小孩，自己不是发过誓要赶走美国鬼子替朝鲜人民报仇吗？那个时候我是怎样说的？”……

雨势又转大了。他的整个身子、整个头、整个脸都像在受着鞭打。他晕过去了。醒来十多分钟又昏过去。但是不久又醒过来。始终有一股力量拉住他，使得死亡无法到他跟前。他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忽然想道：“这就是考验吗？”接着又想道：“还有更大的考验吗？”雨一阵大一阵小，他想一阵又停一阵。那力量一直维系住他的思想的活动。“我害怕考验吗？有过害怕考验的志愿军吗？”他想道。“我害怕什么啊？……我从前过的什么日子？翻身以后过的什么日子？我还害怕什么啊？”

他想到什么，就见到什么。他一直在做梦：都是很短的梦。他梦到他住在破庙里，一天吃不饱穿不暖，把亲生的女儿送给别人作童养媳。他梦到地主逼死他的父亲，一家人忍气吞声埋掉死人不敢伸冤。那么长的、黑暗的痛苦日子！他的胸膛起伏得厉害。过去的噩梦太可怕了。他看见母亲眼泪汪汪地望着他。他想叫一声“妈”，可是他的咽喉哽住了。但是……景象变了。母亲的瘦脸上生了肉，她笑起来。他们一家人团聚在一块儿，他分到了地，分到了房子。全家人欢乐地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头，享受自己的劳动的果实。母亲的笑脸，

弟弟的笑脸，一家人的笑脸。那些兴奋的、快乐的日子……

三十一年来的旧事断续地在他的梦里重现了。它们使他痛苦，但是也给他带来快乐。他躺在草地上，浑身湿得像一只落汤鸡，他已经失去人相了。他现在过着痛苦难熬的非人的生活。可是在梦里他又把三十一年的生活重新经历一次。

他最后又从这些梦中醒过来了，从昏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他还活着。他定了定神。"活着是多么好的事！"他想着。他已经活到了今天，也应该活到更幸福的明天。"倘使没有新中国，我哪里能翻身？我今天一定还住着破庙，受冻挨饿，看别人脸色，欺骗人，说胡话，受人气。我也可能出不了上海就死了。我死了有什么人来管我？然而，今天我在这里受苦，同志们都在想念我，同志们都在等我回去。好多人的眼睛在望着我。祖国人民的眼睛在望着我。我是在为着自己挣扎吗？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挣扎到底。"他又想到他的弟弟："我们出发的时候，妈嘱咐过：要带好弟弟。我至少应当给他立一个好榜样啊！"他越想下去，越兴奋，越忘记了自己。他觉得他那一切的痛苦已经离开了他。他觉得他又有了勇气和力量了。

雨完全停止了。吹起一阵风来。黎明前的空气很冷。可是他也感觉不到了。他那个受尽了折磨的身体好像不再是他的了。他的精神中没有一点痛苦。

天渐渐在褪色，在发亮。四周就只有流水的声音。他爬到一棵栗子树跟前，也不觉得怎么吃力。前面还有一道龙形铁丝网拦住他的去路，他也不怕它！他用右手抹去脸上的雨

水。他快乐地想："我又胜利了。"突然他感到一阵温暖，他觉得有一股力量通过他的全身。他抬起半个身子靠着树身坐起来。在短时间的头昏、眼花、耳鸣之后，他望着微微发红的东边天空。清晨的空气愉快地抚着他的脸。他掉头往四面看。他放心了。他并没有走错路。他熟习这一带的地形。那些树，那个坡，那边的山，那几块突出的大石头，那一间给炮弹打毁了的独立房子……他都知道。他明白顺着这条沟再往北走百多公尺，爬上一个小山头，就看得见自己的阵地了。

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埋头看看自己的身上。他没法整理他的又烂又脏的棉衣，在他的瘦得见骨的身上那只是一堆打湿的破布、烂棉花。他也再没有纱布、棉花来把伤口重新包扎。他皱了皱眉。他马上抬起头看别处。天已大亮，太阳也出来了。草上、树叶上还有水珠。一只鸟在附近的树枝上欢叫来迎接金色的阳光。这一切给他带来一种舒畅的、亲切的感觉。

"活着的确是多好啊，"他低声自语道，他的上嘴唇肿得不像是他自己的了。他想到了他的家乡的早晨。山啦，树啦，田啦，水啦，早晨的太阳啦……哪一样不像他的家乡的？但是，炮兵校正机又在天空出现了。又是那个"老汉奸"的讨厌的声音。在他的家乡哪有这种声音？在他的家乡有的是男男女女在田里的笑声。他们笑得多快活！他想到翻身的日子，就想到了毛主席。他把棉衣小口袋中的照像取出来。打湿了的纸粘在一起。他小心地把它揭开来。他又看见毛主席的笑容了。毛主席好像带着鼓励的眼光在对他微笑。他把照像望了

许久，他动了感情地轻轻唤了一声："祖国，"然后他带着笑容闭上眼睛，靠在树身上睡去了。……

又到了晚上。他已经想好过铁丝网的办法了，天一黑就开始工作。他找到一根长木棒，拿它穿过网底，然后在他这面用两根小树枝交叉成斜十字形，把长木棒支起。现在网底有一个空隙了。可是空隙并不大，铁丝网又多又重，网上还布满了洋铁罐，铁丝一动就会叮叮当当地响起来。他小心地用两只手（尤其是右手）去挖网底的土。土质并不太紧，不过对于他这却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他的手指头挖出了血，他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尽了，才挖成了一个小坑，很艰难、很吃力地从那里爬了过去。

天快亮了，他为了这件事就花去了整整一夜的功夫。他又着急起来了。他必须在天明以前把刚才挖起来的土重新盖好，把支起来的木棒和树枝抽开，否则他就会暴露自己，给敌人发现。于是他又忙了一阵，然后才爬到一个炮弹坑里藏起来。

天亮了。他忽然听到了自己阵地上的机枪射击声，声音非常清楚。他又听见自己人的声音了。他兴奋地想：同志们离他这么近，很可能就要过来了。他躺在炮弹坑里高兴得几乎要笑出声来。

九

正午的太阳晒到炮弹坑里，像烈火一样地烤着他。他的

脑子糊涂了。他觉得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身上。他想挣扎，可是他又昏迷地睡去了。有一次他梦见了连长和指导员，他又梦见了他的弟弟。他们关心地盯着他，对他说话，要他回去。他摇摇头说："伤太重啦！怕不行了罢。"他们动手拉他，他就醒了。然而他还是昏昏沉沉的，闭上眼又睡着了。他又做起这一类的梦来。

最后一次他醒过来，太阳已经偏西了。他的脑筋也清醒多了。他有一种从火窟里逃出来的感觉。他想起了先前的那些梦，想起了那些亲爱的面孔。他难过，他又高兴。他恨不得马上就爬到他们的面前。他在心里说："首长和同志们平日那样关心我，现在一定在惦记我。已经八天了，他们会不会以为我已经当了俘虏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炸弹爆炸声，他也看到了自己阵地上冒起来的烟。从爆炸声和烟柱看来，他知道离自己的阵地更近了。他欣慰地想："再爬两个晚上就会到自己家了。再加一把劲！我一定要活着回去。"

他又爬了一个夜晚，而且绕过了一座小山。离自己的阵地越近，他越兴奋、紧张。身体越弱，痛苦越大，困难越多。但是他的信心也越高，精神也越强。他晕过去的次数逐渐增多，但是醒过来他还有力量继续往北爬。他常常处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就是在这种时候他也没有停止爬行。他的两肘早磨出了血，屁股上和背上的皮也破了，到处都是血。身上只剩了一层皮，肚子也陷进去了。破棉裤显得太大，他没法系紧它，它老是在往下褪。他就索性把裤带套在颈项上。痛苦不断地在增加。但是它也不会给他带来更大的损害了。一个念头一直

在他的脑子里转来转去："离自己的阵地越来越近了。"无论是清醒或者昏迷，他都保持着这一个念头。任凭怎样大的痛苦都不能把它赶走。

他已经不大感觉到饥饿了。饥饿折磨他最厉害的时候，他也熬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对任何痛苦都有了抵抗力。他在挣扎中变得更坚强了。他愿意忍受更大的考验。

早晨天还没有大亮，他在朦胧中看见前面一座黑乎乎的山。"坦克山！"他差一点要叫出声来了。他高兴地想："我的确没有白费功夫。绕过去就看见自己的阵地了。"

他望着那座熟习的山，眼里含着泪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他安慰地对自己说："我就要到家了！"

他充满了信心。他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好好地休息一下。我一定过得了最后的一个关。"

但是他的身体更加衰弱了。白天里他醒过好几次，又晕过去几次。到了天黑，他觉得清醒了些。好像痛也减轻了些，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他爬了几步就停下来。他想动一下也动不了。他挣扎了一阵，没有用，身子好像瘫了一样。

"难道我就这样完了吗？"他绝望地想道。忽然他用痛苦的声音轻轻叫了一声："祖国啊……"

他连思索的力量也失掉了。他昏迷地过了一阵，伤口痛得使他又清醒起来。他想叫，却发不出声音。可是他的眼睛看得清楚了。月光照在他的脸上，把树叶的影子映在他的嘴角。他在蓝天中看不到一片云。他出神地望着，望着，渐渐地他能够思想了："一点危险也没有。安静得很。为什么我还躺

在这儿等死？”他觉得奇怪。他动一下手，又用力移动两只肘拐，仰着身子爬一下。痛得太厉害了。可是身子并没有移动。他闭上眼躺了一会儿。

“不行！”他忽然睁开眼来。“绕过山就看得见自己的阵地了，难道我连这一点勇气也没有？才几天我就熬不过痛苦了！那么平日的积极算什么？平日讲爱讲恨都是空话吗？都是假的吗？放弃挣扎，就是死！我自己死得丢人不说，连我弟弟，连班里的同志、排里的同志、连里的同志都没脸回去见祖国人民了。……不，我还有一口气。我一定要爬回去。就是死，我也让同志们、让祖国人民知道我这番心思。”这样的思想鼓舞着他。他兴奋得忘了痛苦。他用了最大的努力，居然不停地爬起来了。

他终于绕过了“坦克山”。他终于望见他那么熟习的自己的阵地了。那个山头静静地耸立在月光下面，他看不出一点动静来。

“没有问题，他们在等着我，”他激动地想道。他望着那个黑黑的山头，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好像已经回到自己的阵地上一样。

但是紧张以后的松弛的感觉又使他进入了无梦的睡眠状态中。

十

第十天早晨的阳光在抚摸他的黑瘦脸，那张脸上到处是

泥土，到处是血。鼻子和嘴唇烂成一片，嘴边一圈又硬又黑的胡须。脸上最显著的东西是一对失神的大眼睛和两边陷进去的脸颊。他被炮声惊醒了，正躺在山脚两块大石头旁边的砂土上。他睁开眼睛，可是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他迷迷糊糊地过了许久。

渐渐地他恍恍惚惚觉得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他的眼前似乎罩着一片雾。他什么念头也没有。后来他开始觉得有一样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身上，他动弹不了。后来他又觉得痛，觉得难过。他的眼前的雾逐渐在散去。他的身体里的东西搅动得厉害。他的思想也活动了。于是他的手、他的身子也活动了。他看见自己的阵地就在面前。他好像受到了一个大的震动似的，脱离了那种衰弱到极点的半睡眠状态，精神突然振作起来。他兴奋地睁大眼睛望着自己的那个山头，他安慰地想："我胜利了。我毕竟胜利了。"他看见在阳光中发亮的草上的露珠，他偏着头伸出舌头去舐它们。他的干燥的喉咙有一种舒适的清凉的感觉。他鼓起勇气挣扎着爬上了一个小土坎。他的左脚给一棵矮树碰了一下。他感到一阵剧痛，又昏过去了。

他又醒过来了。麻木的手和脚不能够动一下。太阳照在他的身上。湿的棉衣在冒热气。他慢慢地把眼睛移向那个山头看。就是那个熟习的地方。同志们一定在那里等他。他们可能看到他。他应该设法唤起他们的注意。他应该向他们发一个信号。他越想，越激动，觉得全身发热，力气逐渐在恢复。眼前是一片光明。眼前的景物都充满着欣欣向荣的生命。他

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信心。他突然坐起来，脱下身上那件又破又脏的棉衣，把白布里子向着自己的阵地，他看见那里没有动静，便解下伤口上的白毛巾，使出最后的力气挥动它。太阳烤得他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他的手再也举不动了。恰好他身边有一根小树枝，他就把毛巾系在树枝上，把树枝插在身边。他躺在地上，两只眼睛望着自己的阵地，手轻轻地摆动树枝。他相信同志们会看见这个信号，他相信同志们会下山来救他回去。他没有一点疑惑。他想笑，又想哭。他想大声唱《志愿军战歌》。

十一

同志们的确在等他。同志们的确看见了他发出的信号。

那天黎明前那个年轻的同志带回他负伤的消息以后，同志们都在为他的安全着急，还有人批评那个年轻的同志不该撇下他、自己背着伤员先回来。当天晚上那个年轻的同志又到敌人的阵地上去找他，走错了路，没有寻到他的踪迹就回来了。下一天夜晚又有人出去找他，找到了地方，却见不到人。他明明在那里躺过，但是他显然到别处去了。这周围并没有一点搏斗的痕迹。他不会是让敌人捉去了的。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他可能是自己爬回阵地来了。

同志们都记着他的那句话，都相信他的那句话："只要有一口气，我就会爬回来。"他平日就是一个说了就做的人。他不会说空话。而且他是一个积极分子，什么事都肯带头做，从

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他的自动枪挂在洞口的石壁上，没有人动它。大家看到他的枪就想到他本人，因为没有看到他回来都着急得不得了。同志们白天在山头侦察，晚上就下山去寻找。每天都是这样。虽然这些天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可是谁都不肯放弃希望，大家都相信他一定活着，一定会回来。

所以到第十天，郭宝祥教导员还跑到阵地前头去观察。教导员是一个非常爱兵的干部，这些天一直惦记着他的事情，差不多每天都要跟张指导员一块儿去观察他的踪迹。教导员知道这个战士的性格，不相信他会做俘虏，不相信他会在困难面前低头。这一天教导员看见了远远地有一样白色东西在慢慢地摇动，再注意地一看，的确有一样白色的东西在那里，大约有两百多公尺的光景。教导员马上叫通讯员把望远镜递过来，用望远镜一看，人和毛巾都看到了。

“对，是他，一定是他回来了！”教导员高兴地对指导员说，便把望远镜递给指导员。教导员吩咐派一副担架去把他抬回来。

这个消息马上传遍了本连的每个洞子。同志们兴奋得不得了，大家争着报名去抬担架。每个战士都愿意最先见到这个勇敢、坚强的同志。卫生员忙着准备医药和绷带。炊事班准备熬大米稀饭。指导员一直拿着望远镜盯住他不肯放松，生怕把他失掉。

到了傍晚，副排长带着两个战士和一副担架把他接了回来。

“我总算回来了，”副排长把他从昏迷中叫醒以后，他就只说了这一句话。他的声音低得几乎教人听不清楚。他躺在山坡下一个小土坎上，头底下枕着两颗手榴弹。脸瘦得失了人相，除了烂鼻子、烂嘴唇外，还有一对失神的眼睛。两肘磨得血淋淋，一身都是血。左腿和左胸的伤口还在流脓出血。他的痛苦是很大的，是谁都想像得到的。可是他却望着副排长高兴地微笑了。这笑容一直留在他的脸上，以后一连几天同志们来看他的时候，都见到他的笑脸。回到连队里见着指导员，他马上问一句：“指导员，我的枪带回来没有？”他知道枪带到了，他放心地吐了一口气，又说一句：“我的武器一点也没丢失。”有人问他为什么一直在笑。他说：“我什么困难都过来了。”他疲乏地闭上了眼睛。

一个星期以后，他躺在医院里对他的弟弟说：“告诉同志们：我的伤养好以后，我马上就回来跟同志们一块儿打美国鬼子，消灭敌人。”军文工团的同志们来访问他，他对一个年轻同志说：“我是代表祖国人民出来的，我不能够给祖国人民丢脸。”

1952年11月28日在上海写完，

1955年7月在北京修改。

一个侦察员的故事*

傍晚，天气突然变了。起初刮一阵风，接着又落下几滴雨。乌云把刚露脸的星星全遮盖了。晚上可能下一场大雨。我从一个地方走回我的住处。我的脚步下得急。我想躲过那场雨；我也想回去加衣服：我感到冷。我走进窄小的巷子，我的住处看得见了。在一个人家的门口，我看见李干事站着在跟一个瘦小的广东战士讲话。我以前并没有见过那个战士，但是我觉得他的面孔很熟。我断定他是广东人，因为我的几个广东朋友都有那样的嘴唇，那样的鼻子，那样的眼睛。

我已经走过他们的身边，而且离我的住处更近了，我看见房东家的大姑娘背着她的三岁的弟弟从她家的大门里出来。可是李干事忽然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回过头去看他。他要我到他那儿去。我便又走回到巷角那个人家的门口。

"我介绍一个同志给你，"李干事带笑地对我说，然后指着跟他谈话的战士："这是×××团侦察排的黄山同志。"

我就在他说出我的名字的时候伸出手去握了黄山同志的手，接着问一句："你是广东人？"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工人日报》。

“我从广东来，”黄山同志用普通话回答，黑黄的瘦脸上露出笑容，两只眼睛光闪闪地望着我。

“我们要跟黄山同志谈话，要整理他的材料。你来参加好吗？”李干事问我道，他不等我回答，马上又解释道：“他就住在这个老乡① 家里，我们就在他屋子里头谈，刘干事也要来参加。”

这时我看见刘干事从街上转进巷子里来了，便简单地答道：“我参加。”

刘干事除了一小叠白纸外，还带来两支洋烛。他的年纪跟李干事的差不多，他们的面貌也相像，都是长长脸，二十几岁的年纪。我们四个人都进了老乡的院子。坐在廊上的三十多岁的朝鲜女人含笑地招呼我们，以后又掉过头去，跟她旁边那个七八岁的男孩讲话。我们先后脱了鞋，上了走廊，进了黄山同志的屋子。

在屋子的中央有一张小圆桌。刘干事点燃洋烛，用烛油把洋烛固定在小桌上。我们就围了桌子在炕上坐下来。在屋角，有一张毯子顺着墙横铺在炕上，毯子上面盖着一件棉大衣：这就是黄山同志的床铺。

“晚上不冷吗？”我顺口问了一句，外面又刮起风来。

“不冷，”他简单地回答，笑了笑，就转过脸向着刘干事问道：“现在就开始吗？”

刘干事摊开纸，掏出自来水笔，点一下头说：“好罢。”李干

---

① 志愿军喜欢称朝鲜老百姓为“老乡”。

事接着说："先喝点水罢，"就拿起钢精水壶在桌子上那三个印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西南人民赠"绿底白字的搪瓷茶杯里斟满了水。

黄山同志的瘦脸上立刻现出严肃的表情。他的眼睛望着烛光，好像他在这一闪一闪的烛光中又见到过去的那些日子。他开始了。他讲的一切好像就是他现在看见的。那是他在十多天前经历过的事。那个时候我住的地方离他活动的地方不远。而且几个月前我还到过他的阵地。所以他的叙述使我感到格外亲切。

"我就从十一日讲起。上级给我们捕俘的任务。捉活舌头是我们侦察员的份内工作。完成不了任务，不但对不起上级，也对不起祖国人民。所以大家都下了决心要做好准备工作。那天黄昏，我和三个同志就偷偷地过了河，到敌人的阵地上去侦察。那天是阴天，连一颗星也没有。路也不好走。我们很机警地朝前走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发出来。我们后来到达了预定的地点。那就是无名高地上一个相当密的树林。我们四个人就躲在这个树林里头。晚上很冷。不过我们也不觉得太冷。大家都是受过锻炼的同志，也习惯了这种生活。不过兴奋和紧张却是免不掉的。第二天太阳一上来，敌人就出现了。那些美式装备的李伪军素来比美国兵狡猾，不过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们已经跑到他们的阵地上来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走过树林，他们有说有笑，打打闹闹，有的背枪，有的空手，随随便便，一点警戒也没有。他们没想到我们就在他们的旁边。我们看见他们这样麻痹大意，觉得更有把握对付他们。

我们这一天安安静静地在树林里头把这附近的地形全画下来，画得清清楚楚。而且把敌人的××高地的地形也画下来了。我们兴奋了一天。到晚上，我们安安稳稳地回到了我们的阵地。”

黄山同志说到这里，停一下，咳嗽两声。

“喝点水罢，”李干事带笑说。

“对，”黄山同志应道，他感谢地笑笑，拿起茶杯来喝了水，又接着讲下去：

“我们回来以后，大家的情绪都很高。谁都不想休息，就连夜研究捕俘的办法，讨论战斗的方案。一个班分成三个小组，一个小组捕俘，两个小组掩护。第二天还开了一次小组会。十三日晚上，我们一个班又渡过了河。出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带两颗手榴弹，一颗用来对付敌人，另外一颗留着给自己用。我们侦察员是不能够让敌人捉住的。每个侦察员都预备着一颗手榴弹，到必要时候就用它来让自己跟敌人同归于尽。敌人把我们恨透了。他们的确吃了我们不少的亏。”他满意地笑了笑，但立刻又带着严肃的表情往下讲道：“那天晚上刮着西北风，一路上就听见松枝、树叶、草叶摇动的声音。天黑得像锅底，只有几颗星星。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着走到隐蔽的地方，埋伏好，派一个组担任放哨的工作。我们就在黑暗里等着天亮。风时吹时停，天亮前实在冷。不过我们兴奋得不得了。我们盼望天马上就亮，我们可以完成任务。大家都充满信心。我们终于看见天发白，慢慢地就大亮了。鸟在叫，太阳也出来了。我们紧张地等着，我们相信敌

人就要过来了。我们约定敌人来就丢石头作记号，要是人多就不打，人少就打。我们埋伏在里头的树林离敌人要经过的小路不远。我们听见敌人讲话的声音，大家连气也不敢出。班长埋伏的地方离我近，我掉过头去看他一眼。他对我点点头。讲话声和脚步声越来越近。人数大概不少。我们决定不动。我又看了班长一眼。他们过来了，都戴着钢盔，背着卡宾枪，一身美式军装，摇摇晃晃地走过去了。班长朝我看，露出笑容。他的意思我明白，那就是：忍耐一下。机会不会逃掉。敌人一共过去十三个，可是后面还有。我又听见他们讲朝鲜话的声音。我们只好等着。第二批敌人又过来了。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过去，做梦也没想到我们就在他们的附近。我数着人数，一个，两个，……一共是八个。我旁边一个同志想动，我连忙摆手止住他。在这个时候性急不得。我们的任务是捉活的。八个伪军过去不久，又来了七个，里头有一个大个子忽然朝天打了一枪，跟着就哈哈大笑起来。我想：这些没用的家伙，胆子小得很。我们真要动起手来，你打空枪有什么用！我又跟班长交换一个眼色。我们的心思是一样的：等着捉后面来的。以后就听不见脚步声了。等了好一会儿，都没见后面的敌人过来。我想：难道就过完了吗？我有点着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听见皮鞋声。这次过来一个敌人，背后背着一个木头架子。他慢慢地走近，我想：机会来了，又朝班长望一下，他点点头。我们屏住气等着。他走到水沟那里忽然停下来，弯着身子在沟里洗手。活舌头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跟班长又交换一个眼色。我再掉转头去望着那个家伙。我觉得他

的动作很慢。可是他到底洗好手站直了。他想走开。就在这个时候，班长把手一扬，我连想也不想就跳了出去，一下就跑到那个家伙面前，拿枪对住他的胸口，喊了一句朝鲜话：'不要动，跟着走就不杀你！'那个家伙做梦也没想到会碰见我们，吓得他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就举起两只手做了俘虏。这个敌人是下山去打饭的，所以背了木头架子。我们捉到了活舌头，大家高高兴兴，推的推，拉的拉，顺着山沟小路回去，跟掩护组的同志们会合了，穿过树林，走到河边，时候还不到六点半钟。河水涨到了六七公尺深，两百多公尺宽，我们没法过去，只有在附近隐蔽，等到天黑过河。我们一边在研究渡河的办法，用两个人看守俘虏，两个人放哨，其余的人休息。敌人后来发觉了我们。到十二点钟，一个班的敌人朝河边搜索过来，让我们打跑了。后来敌人又来得更多，满山都是敌人。情况相当紧急。我们固然有把握对付这一群敌人的进攻，可是我们担心俘虏会带不回去，那就是完成不了任务，多丢脸。我越想越急，越想越难过。我宁愿牺牲，不愿意完不成任务空手回来。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下了决心。"

黄山同志挺起腰，他的眼睛里发出逼人的光芒，好像他的眼睛看见的不是这一间阴暗的小屋子，和盘腿坐在炕上的我们三个人，却是那两百公尺宽的河面，他对着河面表示了他那不能阻止、不能摧毁的决心。我的眼前也现出了那河面。水流着，流着。一个人勇敢地跳下去了。那是黄山同志。我的心紧了一下。我把头一动，我的眼睛碰到了他的明亮的眼光。

"我便对班长说，"黄山同志接着说下去，"我说：'班长，我

们不能够硬拚，敌人太多，况且我们的任务是捉活舌头，万一俘虏逃掉或者给打死了，怎么回去交代任务，上级怎么了解情况？'班长问我：'那怎么办呢？'我说：'班长，让我游水过去，跟六连取得联系向上级报告情况，一方面要求炮兵支援我们，一方面要求派船过河接大家回去。'班长说：'好！太妙了。不过你有把握游过去吗？河面这样宽！'我说：'班长，我有把握，只要你们坚持十分钟。'班长点头说：'对。不管敌人来多少，我们坚决打退它。你快过河罢！我们等着你的好消息。'我答应一声，就脱掉外面的衣裤，跑到河边，一下就跳进河里去了。"

黄山同志停了一下，他拿起茶杯喝了两口水。我说："另外换一点罢，水已经冷了。"我伸出手去拿钢精水壶。他笑笑，摇摇头说："不。喝冷的也好。河里头的水比这个冷得多。"他放下杯子接着说下去："我们广东人会游水的多。不过我游得并不好。我进到水里头，第一个感觉是冷气浸到了骨头。可是我也不去管这个。我只记得我的任务。我拿出全身力气拚命地游起来。我没有游多远就让敌人发觉了。敌人从××高地朝河里打起炮来，他们想不让我过去。炮弹落在我的前前后后，竖起来一根一根的水柱。我一点也不怕。我只想到同志们在后面等着我。我必须活着过去，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我只想到，我不能软弱，软弱就是自杀。我咬紧牙关拚命地跟河水斗争，跟炮弹斗争，跟自己的身体斗争。我看见炮弹往近处落下，就马上钻进水里去，一个大意就喝了两口冷水。可是我又钻出水来，定定神，用尽力气朝前面游。敌人一共打来二十多发炮弹，炮弹打在我前前后后，可是就没有一个弹片打在

我身上。敌人炮打得越厉害，我的勇气越大，信心越高。有几次我快支持不住了。可是我想到我的任务，想到留在后面的同志们，我相信我能够克服任何的困难。志愿军里出现了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难道我一个侦察员连一条河都游不过去？我想，不管你河面怎样宽，你总是在不断地缩短，只要我不松懈，一直游下去，我一定会游到对岸。……我游着，游着，果然一下就游过去了。我很兴奋，鼓起勇气，一口气爬上岸。我回过头朝敌人的山包看一下，我说：'好，你打罢，我们马上就要叫你够受的！'……"

黄山同志说到这里，他高兴地笑了。他脸上的表情说出来他的内心的愉快。这以后他的脸上一直带着笑，他一面往下说："上了岸，吐了几口水，我就跑，穿过一大片稻田，我一口气跑到了六连连部。还不过十分钟。我见到连首长，报告了情况。我把敌人进攻的方向和地形都讲清楚了。六连的全部重火器马上开火来支援我们，并且很快地跟重炮取得了联络，得到了上级的批准。不到一会儿功夫我们的大炮响起来了。几百发炮弹全打在山洼里，只看见那个地方一片烟雾，打得土完全翻过来了。这不消说，够敌人受的。我相信敌人一定给打垮了。……等到天一黑，我们把胶皮船打好气，开过对岸去。上了岸，再到原来的地方，我拍手，没有应声，起初我大吃一惊。可是我不相信我们的同志受了损失。我断定他们一定是转移到一连的阵地上去了。我接着就到一连的阵地上去。他们果然都在那里。他们看见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我把他们全接回去了，一个也不少，我们一个班不但没有伤亡，反而

添了一个捉来的俘虏。我们把活舌头捉回来了。"

"那么敌人呢？敌人的伤亡大不大？"我插嘴问道。

"敌人的伤亡倒不小，我说过够他们受的，"黄山同志答道，他短短地笑了两声。"他们给打死打伤的一共有七八十。第二天我又过河去，我看见到处都是血。"

黄山同志停了停，又说："我就只做过这点小事情，这是我的本份工作。同志们却给我评了个二等功，上级也批准了。现在又选我出来参加全军功臣代表大会，我实在惭愧得很。这怎么算得上功？要是我们侦察员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我们还配称为侦察员吗？我们都是挑选出来的，都是经过考验的，我们早就把生命献给了祖国了。我不过是朝鲜前线上那许许多多侦察员中间的一个，而且是一个最平凡的。我不提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想到他们，我又难过，又愤恨。我们排里就有个姓金的联络员勇敢地牺牲在敌人的手里。不过我们已经替他报了仇了。"

黄山同志越说越激动，他讲到立功的时候，脸上还露出抱歉的表情。可是后来他讲到"把生命献给祖国"，他的脸也挣红了。我看得出他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火在他的心里燃烧，他要把他的满肚子的话吐出来。他的热情感动了我和那两位干事。我们都不眨眼地望着他，注意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我的确是最平凡的一个。我们侦察员中间出过不少的英雄，有过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譬如青年团员蔡金同，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他有一天执行任务在小山上警戒，打死了十多个进攻的敌人，自己左手手腕打断，额上挂花，右面大

腿也挂了花。肠子给打出来一节。他咬紧牙关把肠子塞进肚子，又拉过打断了的左手手腕按住肚子上的伤口，他就这样地有时爬着、有时跪着走，居然走了几里路，而且过了河，回到自己的阵地上。他真比得上古时候盘肠大战的英雄罗通。”

我早听见人讲过蔡金同同志的故事，也知道他的几处伤都快治好了。医生锯掉了他的左手。可是他在医院里还写信给他的同志们说：“我还有一只右手可以打枪，打手榴弹，我要在伤口痊愈以后重上前线。”蔡金同同志被称为“钢铁战士”，他的确配得上这个称号。他的故事在志愿军各部队中间传布很广，不知道鼓舞了多少年轻战士。我来迟了，错过跟他见面谈话的机会。我很愿意从别人的嘴里多知道一些他的事情，所以我问黄山同志：“你见过他吗？”

“没有，”黄山同志摇摇头答道。“我很想见见他，向他学习。他是我们的榜样。”

“你太客气了，”李干事笑着说，“你不是也给我们侦察部队树立了一面旗帜吗？”在他说第二句话的时候，外面下起雨来。从雨声可以断定雨下得很大。

“我哪里比得上他？我还差的远！我……”黄山同志谦虚地说。可是他的话被打断了。女房东从开着的房门进来，脸上带笑，用朝鲜话大声说：“志愿军同志，下大雨了。关上窗罢。”原来我们只放下窗帘，没有把那两扇纸糊的窗户关上。李干事立刻站起来，要去关窗，但是女房东已经把窗户给我们关上了。“你们谈话罢，我不打扰你们，”她又说，和善地笑了笑，就出去了。

"朝鲜大嫂子真好。这家房东还是军属。她丈夫在人民军里头，"李干事带笑称赞道，脸上现出衷心愉快的表情。

刘干事点点头，便埋下头去看摊在小圆桌上的白纸。纸上布满了细小的黑字。

李干事看见我不讲话，便对我说："你到这里还不太久。你住久了，你一定爱朝鲜人。朝鲜人不但勇敢、勤劳，而且亲切、热情。"

"我知道，"我带笑地打断了他的话。我的确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来证实他的说法。我在一位朝鲜老太太的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后来搬到十几里外的另一个地方去。有一天那个老太太走了十几里路来看我，她只想知道我在这里是不是住得舒适。

"朝鲜人对我们实在太好了。特别是我们侦察员得到他们帮忙的地方实在不少，"黄山同志接下去说。"我们大家爱讲金老大伯的故事。去年我们友军某单位有几个侦察员在三八线上一个村庄里执行任务，在一个金老大伯的家里住过，后来又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去，新的地方离金老大伯家不过几里路。有一天李承晚的特务带了几个美国兵和李伪军到金老大伯家来捉人。他们找不到人，就逼金老大伯讲出我们侦察员的住处。金老大伯一家人都让美国飞机炸死了，就只剩下一个小孙女跟他一起过活。他任凭敌人怎样威逼，也不肯讲一句实话。他设法把小孙女差出去给我们侦察员报信。等到我们侦察员赶去，金老大伯已经让敌人弄死了。我们捉了两个俘虏，其余的几个敌人全打死了。后来听见俘虏讲，金老大伯

受了伤还骂不绝口，说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朝鲜人，说凡是真正的朝鲜人都要替他报仇，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会替他报仇。他全身没有一处没有伤，到处都是血。眼睛睁开，满脸怒容。大家谈起他来没有人不感动。”

黄山同志停了停，接着又说一句：“像这样的人，像这样的事情，在朝鲜战场上到处都是。”

我知道金老大伯的故事，已经有文工团的同志把它编成歌剧，在部队里演出了。我看过这个歌剧的演出，我也曾受到感动。

“对，我也听见过金老大伯的故事，”李干事感动地说，他脸上的笑容看不见了。可是他的眼睛里射出来强烈的光，那是说，一种崇高的感情在鼓舞着他，他虽然坐在这间阴暗的屋子里，心里却在想远方的一些人和一些事情。“我还听说过金永洙的母亲救出李治黄的故事。”

“对，我知道。那也是我们侦察员的事情。金永洙的母亲用手榴弹使自己跟敌人同归于尽，让金永洙跟李治黄逃走。这个年轻女人的确了不起！”黄山同志赞叹地说。

“中国人跟朝鲜人的友谊是用血凝固的，”刘干事忽然抬起头放下纸笔，用颤动的声音说，他不转眼地望着黄山同志。

“我也这样想，”黄山同志带着严肃的表情说。“我们的每一滴血，都不是白流的。我自己已经打定了主意：我如果不看见朝鲜人得到幸福，我就永不回国。”他的脸上露出坚决的表情，我知道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今年我亲身碰到一桩事情：我们搬过一次家，刚搬好住下来，第三天旧房东老大娘便

叫她媳妇走十几里路来看我们，说是她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志愿军同志搬过去没有房子住，她醒来不放心，所以叫媳妇来看我们是不是住在露天里头。媳妇看见我们有房子住，她才欢天喜地回去了。我平常难得流眼泪，那天我想了又想，我流了眼泪了。朝鲜老大娘连做梦也在想念我们，关心我们。这样深的感情真叫人忘不了。"他停了停，又说："看见朝鲜的老大娘，我就会想起我自己的母亲。看见朝鲜的小孩，我就想起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在这里我们常常说：一人吃苦，万人享福。在五年前，在十年前我不会懂这个道理。今天我懂了：那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爱那些人啊。所以如果我爱惜自己放过敌人，让敌人伤害那些人，这算是什么爱呢？"他越讲下去，越兴奋。可是话说得并不急，反而慢了，好像感情堵住他的喉咙，他没法把它吐出。他挣红脸，微微张开嘴，望着我们。过一会儿，他突然站起来，说："我出去一趟，"他就走出房门，在廊上穿了鞋子，出去了。

在外面雨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先前只顾听黄山同志讲话，没有注意到别的事情。这个晚上女房东烧了炕，屋子里暖和，我坐在炕上越坐越热，觉得坐不住了，就站起来，去开了窗门。

天空仍旧是一片漆黑，看来还要下一阵大雨。女房东还点着灯在房里磨什么东西，从她的房里传出来轻微的、单调的声音。朝鲜秋夜的寒风扑到我的脸上，我打了一个冷噤。但是我仍然把头伸在外面，我觉得全身暖和，心里特别暖和，因为我的心里也充满了爱。

“老刘，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李干事的声音在说，“我常常想，我能够在朝鲜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像黄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见过多少。生活在这样的人中间，的确是幸福。”

“老李，我问你一句，”刘干事说，“如果你处在黄山的境地，你怎样办？”

“我吗，我一定照他那样办！”李干事起劲地答道。“难道我不是一个新中国的人？……”

黄山同志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走进屋子来了。他的瘦脸上带着坚定的、乐观的表情。

1953年1月2日在上海。

黄文元同志*

一

我到黄文元同志的连队的那个黄昏，天正落着小雨。送我来的江干事在半山跟我分手到别处去了。我翻过山，就碰见连部派来接我的战士。这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四川小伙子。他身上披了一张雨布。他的圆脸一直带着亲切的微笑。他把我那个手提包接过去，高高兴兴地往前面走了。山上长满了灌木，路很窄，而且弯弯曲曲，要是没有他带路，我走到天亮也到不了连部！

“同志，你辛苦了！”他忽然回过头来说。

“我哪里辛苦？你们才辛苦啊！”我说。

“我们一点儿也不辛苦。你看我们把这些山建设得多好！我们在这儿安家了。同志们都很满意。就是大家想祖国想得不得了，”他带笑说，脚步渐渐地慢下来。

“哪个又不想呢？人出了国反而觉得跟祖国的关系更密切了，”我答道。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三年七、八月号合刊。

“是啊，”他说，“我们听说祖国建设得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多高兴。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也在参加这些建设一样。……”

我们没有交谈几句话，就到了连部，他改口说：“到了。”

这是一个砂石洞子。洞口相当亮，但是望进去却只见一片黑暗。人站在洞口就感觉到有一股凉气扑过来。

“你把雨衣脱下来进去坐坐罢，”他说。

我脱下雨衣，才注意到我浑身湿透了：打湿外面衣服的是雨；打湿里面衣服的是汗。“同志，谢谢你，”我说，“你贵姓啊？”

“我叫黄文元，”他笑了笑，回答道。接着他又说：“副队长来了。”

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不高不矮的、瘦瘦的年轻人，眼睛相当大，脸色黄黄的，下巴底下有一个小洞。他衣服穿得整齐，满脸带笑，向着我伸出手来，一面说：“你辛苦了。”

我跟副连长握过了手。他告诉我：“队长、指导员他们都不在家，开会去了。”通讯员拿来了部队自己做的矮木凳，我们在洞口坐了一会儿，谈了一些话。副连长便叫黄文元同志把我带到我的住处去。

黄文元同志提着我那个手提包在前头走，我跟在后面。路有点滑。他走得慢，我赶上他并不费力。我们顺着交通沟走了一阵，爬过一个小坡，又走下交通沟，走不多远就到了我的住处。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砂石洞子。我们从交通沟走下三级台阶，就进到洞里。里面不深，走了五步就碰到那个神龛似的

炕。炕前两边立了两根木头柱子。右边石壁上有一个小洞，洞里放了一盏小小的菜油灯。

“请休息罢，你今天也累了，”黄文元同志说，就把手提包放在炕的一个角上。这张炕很大，可以睡三个人，上面已经铺好了草垫和雨布。“你有铺盖吗？”他带笑问道。

“有。你不要管我了，”我带笑回答。我把雨衣脱下，挂在左边柱子的一根钉子上。

“对。我去给你弄点儿开水来。你先休息罢，”他说着，不等我表示意见就走出去了。

我打开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床毛毯来，铺在炕上，又取出几本杂志用毛巾包着做枕头。我把床铺弄好了，便又取出干的汗衣和衬衫，脱下湿衣，换上干衣。我换好衣服坐在炕上，朝外面望去。洞子外是一片漆黑。雨还在淅沥淅沥地下着。我听见附近有人说话的声音，我知道这个连的战士们都住在我四周。我想到他们就有点兴奋，我在计划着明天怎样开始访问他们。我忽然听见了脚步声。一个人影晃了进来。

“开水来了，”黄文元同志的年轻的声音说。他右手提一个军用水壶，左手拿一个搪磁饭碗，那张湿雨布还披在他身上。他把搪磁饭碗放在炕上，然后拔开水壶的塞子，给我斟满一碗冒着热气的开水。“你喝水罢，喝了水，可以休息了。我就住在隔壁三班洞子里头。有什么事情你找我好了。明天见。”他说完向我敬个礼就大步走出去了。

二

第二天早晨，我睡在炕上，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在讲话，又听见舀水、泼水的声音。我吃了一惊，睁开眼睛朝洞口一看。黄文元同志站在洞口，躬着身子，用一个小面盆在舀洞子里的水往外面泼。还有一个人站在洞外跟他讲话。我坐起来一看，地上淹了水，我那双胶底鞋已经浮在水面上了。我穿好衣服正要光着脚走下炕去，忽然一个声音阻止我："李林同志，你不要下来。你等一等。我就会把水舀干净的。"这是黄文元同志讲的话。他接着又说："我们指导员来看你。"他刚说完，洞外那个人就走下台阶来，对我大声说："李林同志，你不要起来。马上就会把水给你舀干净。你再睡一会儿罢。"

洞子里阴冷，我坐在炕上只觉冷气逼人。我受不住冷气，也不能旁观着黄文元同志给我舀水。我唯唯应着，却俯下身子把胶底鞋拿到手里，穿在赤脚上，把裤脚挽得高高的，就走下地来了。

我在水里走着，水只盖过我的脚背。黄文元同志给我让了路。我走出洞口，见到指导员。一个瘦瘦的、高高的年轻人，左眉上面有一个刀伤疤，眼睛很亮。他伸出两只手来握我的一只手。

"真对不起，没有好地方给你住。你一来就淹了水，"他抱歉地说。"还是到我们队部去住罢。"

"你太客气了。我住在这里很好，跟战士们住得近一点，

谈话方便。我喜欢这个洞子，”我客气地回答。

“昨天我们去营部开会，没法赶回来接你，照顾得不周到，很对不起，”指导员含笑地说出这些客气话，他脸上有一种恳切的表情，使我不好意思对他说没有意义的应酬话。我只望着他笑笑。他不等我答话又接着说下去：“你这个同乡照料你怎么样？不错罢。你看他这样年轻，却是个很好的战士，还立过三等功呢。他又是个青年团员。你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旧社会留下的坏东西。像这样的战士，我们连里有不少。”

指导员说到这里得意地朝洞口看了一眼，笑了笑，然后又说：“我陪你到班里去看看，让他把水舀干了，你再回来洗脸。”

我说声“好”，就跟着指导员离开了这里。我们顺了左边交通沟走着。天晴了，太阳刚从云层中冲了出来。交通沟里还没有干，但有些地方已经铺上了一点土，走起来也不太滑脚了。

“不下雨的时候，这个地方住起来真不错，”指导员称赞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他走在我的前面。“你看不出罢，这一片山上到处都是人。我们把朝鲜的山都挖通了。”

“啊，”我只能够这样地答应一声。我在朝鲜住了三个月，也翻过一些朝鲜的山，听过一些英雄的故事，这些话在我听来非常亲切。

“敌人的指炮机又出动了。这个家伙天一晴就出来，没有人不讨厌它，”指导员抬起头指着天空说。我也抬头望，我看不见敌人的炮兵校正机（就是指炮机），却听见了那个讨厌的单调的声音。

“不要紧，它看不见。不会让它找到目标的，”他自语般地说。我们顺着交通沟转一个弯，再走几步，就看见几个战士坐在一个洞口擦枪。他们看见指导员，站起来敬了礼，又坐下做他们的工作。

“这是三班住的洞子，”指导员回过头望着我说。

我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天，星期天战士们擦枪、写家信、洗衣服。……

“晒衣服要当心，指炮机就要到头上来了，”指导员忽然注意到交通沟上面一棵马尾松上晒了一件白衬衫，便大声对擦枪的战士们说，“不要麻痹大意啊！”

一个战士朝坡上看了一眼，对另一个战士说：“收起来罢。”那个战士就去把衬衫收起来了。同时从洞子里又走出来一个战士，年纪稍微大一点，颧骨略高，嘴唇上边有几根胡须。他向指导员敬个礼，大声说：

“报告！”

指导员问了他几句话，他答了几句。指导员然后给我介绍说，这是三班长。“你生活上、工作上有什么需要，都可以找三班长。黄文元就在这个班里。你高兴到我们队部来谈谈，更欢迎。”

三班长讲了两三句客气话。指导员又引我往前面走，三班长陪着我们，他一面走，一面在跟指导员低声谈话。我们又走过两个洞子，那是二班和一班的。有的战士在擦枪，有的战士在写家信，有的在看书。再走过去，到了一块小小的圆形地方，坡上有两棵树掩护着。一颗敌人的没有开花的炮弹倒立

在地上，朝上的一头已经磨得光光的，一直在发亮。靠交通沟边放了一把崭新的镐和几把旧镐。

“这是我们这里的铁匠铺，”指导员摩抚着当作铁砧用的炮弹壳，得意地说。

“这几天工作做得很不错，已经找到窍门了，”另一个战士在旁边接嘴说。

我们在这里耽搁了一阵，指导员便对我说：“李林同志，你请回去罢，洞子里一定弄干净了。我现在回队部去，有什么事情要我们办，请你随时告诉我。我下次再来找你。”

指导员走上旁边的台阶，到坡上去了。三班长陪我走回我住的那个洞子去。

三

我就这样在这个地方住下来，开始跟战士们认识了。

我自己说是来体验生活，来学习的。战士们却把我当作从祖国来的亲人看待。他们亲切地对待我，给我各种方便，不管在生活上或者工作上。其实我的工作也很简单。我轮流地跟三个班的战士们一块儿生活，参加他们的学习与活动（我在第三班的时间比较多些）。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我在旁边看他们怎样生活、学习与活动。

晴天，校正机大清早就出来了，有时候一架，有时候两架，老是在这一带的山头转来转去，一直到傍晚才回去。所以在这里也不可能有较大的活动。但是一天除了睡午觉以外，战

士们也少休息。一切的工作照常进行。就在这个山坡上，栗子树旁边，还立得有杠架。天晴时候，在昏暗的暮色中总有一些战士在那里翻铁杠子。晚上点名前常常听得见歌声。

我到这里的头三天，他们让我一个人在洞子里吃两顿饭，都由黄文元同志给我送来。战士们吃粗粮的时候，也让我一个人吃大米，或者吃饺子。我向黄文元同志表示：我愿意跟他一块儿在他们班里吃饭；我希望在他们吃粗粮的时候，也给我吃粗粮。我还说，我喜欢吃高粱米饭。

黄文元同志笑笑，他像小孩子似地回答我："指导员、副队长招呼过的。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他不披雨布，只穿一身宽大的军服，就显得人特别矮小了。

我讲了一些别的理由。他还是笑着说："指导员、副队长并不是说李林同志不能够吃苦。不过你年纪大了，不能够跟我们年轻人比，是应该照顾的。你饭吃得这样少，"他关心地望着我说。

我知道多讲也没有用，便换了话题，跟他谈别的事情。

接着我就去找三班长交涉，跟他谈过两次，都没有用。后来我自己到连部去见到指导员和副连长，跟指导员说明我的理由，最后得到了他们两个的同意。所以从第四天起我就跟三班的战士们一块儿吃饭了。

战士们对我的态度始终是一样的。可是我的感觉却有些不同了。我拿着饭碗，蹲在洞口地上，或者坐在小小木板凳上，或者坐在洞内炕上，吃着战士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谈话，或者参加他们的谈话，我觉得我跟他们中间的距离近得多了。

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非常自然。

这个班里一共有十一个人，北方人居多，也有广东人，四川人就只有黄文元同志一个。他年纪最轻，还要一个月才满十八岁。比那个脸黑黑的瘦小的广东战士陈大仁还小一岁。陈大仁同志喜欢唱歌跳舞。黄文元同志爱说话、爱笑，我很少看见他皱眉头。星期天下午吃饺子，同志们从伙房里领到用鸡蛋粉、青菜、罐头肉拌好的馅儿来，擀面包饺子的时候，黄文元同志的眉毛就会皱起来。他说，四川人不作兴拿饺子当顿吃，饺子饱不了肚皮。他吃起饺子来，食量比别的战士差。可是吃过饺子以后这一天也没有听见他嚷过饿。他看见我吃饺子比他还少，便得意地笑道："我没有说假话罢。四川人都是这样。"

"在这里没有四川人、广东人、北方人、南方人，在这里只有中国人，"陈大仁同志用不纯熟的普通话说。

"对，"别的同志们齐声表示同意。

"我也承认你说得对，"黄文元同志点头带笑说，"不过我总忘记不了四川。我只想坐一回新修好的成渝铁路的火车。"

"你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应该说，你更忘记不了綦江县，更忘记不了你们那个村子，更忘记不了你房屋后面那条小河。我已经听见你说过好多遍了，"陈大仁同志开玩笑地说。

黄文元同志不笑了。他已经放下了碗。他不作声地用一只手托住下巴，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似的。旁边一个年纪较大的同志笑起来说："你们看，他又在想家了。"

黄文元同志放下手，站起来，眨了眨眼睛，愉快地笑了笑，带着感情说："我还用得着想家？我连我屋门口那棵黄桷树有多少粗我都记得清楚。离开家才不过一年多，我哪一样记不得？"

"那么你又在做见毛主席的梦了，"陈大仁同志说。

"对，对。黄文元，你把你梦见毛主席的事情讲给李林同志听罢，"那个叫做王国兴的河南战士在旁边鼓动他。

"我不说，"黄文元同志带点害羞的样子摇摇头，就迈着快步子顺着交通沟逃开了。

也没有人去追他。三班长转过脸来朝着我，解释地说："黄文元是个好同志，你没有理由不喜欢他。他不喜欢多讲自己的事。他做梦都在想立个大功回祖国去见毛主席。"

四

这天，天黑以前，我坐在我那个洞口，正在翻看一本前一天我从连部借来的画报，黄文元同志给我送开水来了。我留住他，我要他告诉我他梦见毛主席的事情。

他笑笑，蹲下来，用一个小石子在地上画着，刚要说话，又不响了。过了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望着我笑，两颗黑黑的眼珠骨辘骨辘地在转动。他说："我说。说起来很简单。一个月以前罢，那天我听见归国代表做的报告以后，心里头只想见毛主席。那天心里头特别高兴。我梦见打仗，仗打得很凶。我守住山头，敌人攻上来了，我还有一个手雷、一颗手榴弹，我都扔

过去了。敌人打退了，我立了功，回国去见到毛主席。好像跟毛主席对面讲话一样，我心里头有好多话要告诉毛主席，总是说不出来。我告诉他老人家，我是个青年团员，以后我就结结巴巴地讲不出话。我一着急，就醒了。我高兴得不得了。我马上喊醒班长。我说：'班长，班长，我见到毛主席了！'班长说：'你见到毛主席？你是在做梦啊！'我说：'我梦见打仗，立了功回国去见到毛主席。'班长说：'你好。我也在做梦，我也梦见打仗。可是我并没有见到毛主席。'第二天班长讲出去，大家都晓得了。他们都笑我。不过我晓得他们大家都想见毛主席。"

他的脸发红。他好像不是害羞，他兴奋得很。接着他又埋下头，用石子在地上写字。

"你一定会见到毛主席的，你不是已经立了三等功吗？你再立个一等功也不难，"我半鼓励半安慰地说。我注意他在地上写的字，我看出来他写的是"决心"，他写来写去都是这两个字。字写得并不好，但是笔划清楚。

我便问他："你要是真地见到毛主席，你说什么话？你想过没有？"

他并不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没有好好想过。不过我有一句话要说。我要说：我绝不给你老人家丢脸。"

他说话的时候，一对眼睛盯着我的脸。他那种严肃和诚恳的表情使我感动。我不愿意随便用一句话来扰乱他的思想。所以我沉默着。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我不相信他，便又说："我说不

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想骗他老人家。我真是这样想：我不止是不给他老人家丢脸，不给祖国人民丢脸，不给我村子里人、我家里人丢脸，不给同志们丢脸，李林同志，说实话，我也不愿意给你丢脸……”他越说越急，终于兴奋得有话讲不出来。他忽然改口说了短短的一句：“我回去罗，”就站起来朝他住的那个洞子走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那个穿着略微发绿的浅黄色军服的瘦小的背影。在他身上我看不出一点特别的地方。这三个月来我不知道看见了多少这样的背影。他已经回到班里去了。可是我却不能够把心再放到画报上面。我还在想他的那几句话。他绝不给我丢脸。这是我头一回听见的话。……我把画报卷起来，捏在手里。我在我的洞子外面一段交通沟里来来回回地走了许久。我想的不再是黄文元同志的话。我想的是鸭绿江那一面我在那里生长的、我住惯了的土地，和在土地上面生活的人。

这天晚上我睡得比较迟。我站在洞子前面那个小坡上一棵矮树下。在淡淡的月光中我看见远远近近起伏的山坡和坡上的灌木。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场的探照灯光，像一根光柱似地耸立在我的洞子背后的天空。有飞机驶过的声音。在右边什么地方远远地悬空挂起了三盏灯。我知道敌人又在投照明弹了。大炮声时响时停。今晚上敌人炮打得不多，有时候轰隆轰隆地接连来几发，过后又寂然了。

敌人一直在拖延谈判，朝鲜的母亲和孩子一直在受苦，听到远处的炮声，望着四周那些黑暗的山包，我不由得想起祖国

的万家灯火。我很希望有一个人走来跟我讲话：我需要找一个人来听我讲出这个时候在我心里激荡着的感情。但是四周没有人声。战士们都睡了。

我知道还有岗哨是醒着的。他们一直小心地警戒着。我不愿意去扰乱他们的注意。我一个人在那个坡上站了许久。

五

这一夜我睡得不好。第二天早晨我醒得迟，还是黄文元同志来叫醒我的。

"李林同志，你是不是生病了？"他站在炕前睁大眼睛关心地问道。

"没有，我很好，"我答道，连忙从炕上跳下来。

"你要当心啊。我怕你过不惯我们这种生活。这两天我们这儿打摆子的人多起来了。我们班长昨天晚上也打过摆子了。你觉得不舒服，马上就跟我讲，我就去找卫生员来。指导员、副队长都关照过的。万一你不当心得了病，家里人晓得多着急啊，"他一本正经地起劲说，好像害怕我不相信他的话似的。

"谢谢你，我会当心的，"我感激地答道。我接着就问他："你身体好罢？在朝鲜生过病没有？"

"李林同志，你不要看我生得短小，我身体很好。我从来不生病，"他孩子似地得意说。"在这儿日子过得很快乐。同志们一块儿学习，一块儿工作，大家感情很好。我写信回家，家

里人都高兴。"

"你常常跟家里通信吗？他们都好罢？"我插嘴问道。

"我两三个星期写一封信回去。我父母都不认得字。我两个妹妹都还小。我去年五月报名出来的时候，我们乡里头在进行减租退押。我父亲从前耕地主的田，现在来信说，分到土地耕自己的田，日子过得好多了。有一个小妹妹在乡里头上学念书，"他兴奋地说着他自己的故事。说完，他不让我再讲话，敬个礼就走了。

还不到吃早饭的时候，天开始下起雨来。起初雨很小，但是在我们吃饭的中间雨突然变大了。我吃完饭，回到住处，虽然只有十几步路，我的雨衣已经湿透了。

我坐在洞子里补写了几天的日记。我想起今天上午有小组讨论会，便冒雨到三班去旁听。

战士们分坐在三个炕上，讨论已经开始了。昨天打过摆子的三班长坐在洞口一个小凳上，看见我就站起来让路，请我进去。别的同志坐得靠拢一点，让了一个座位给我。我只好爬上炕坐下了，正坐在黄文元同志的旁边。

陈大仁同志正在讲话，让我打断了，现在他继续讲下去。洞子里光线不够，我不能看清楚每个人的脸。可是陈大仁同志正坐在我对面，座位离洞口近，所以我看见了他那种严肃认真的表情。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只朝洞外看。我听见他说：

"……保卫开城，不仅要有决心，还应该有信心。大家要这样想：不能够依靠别人，应该依靠本小组。上级号召寸土必争，要做到这样，第一，要大家一条心，第二，要有至死不屈的

精神。……”

陈大仁同志的嘴刚闭上，黄文元同志的激动的声音就响了起来。他说：“我说！”王国兴同志也说：“我来说！”但是黄文元同志开口在先，所以三班长叫黄文元同志先讲。

他一开口就很紧张，眼睛望着地上，声音低，而且有点发抖，跟他平时讲话完全不同了。他好几次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是这样的情形。他说：“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注意我们。我们绝不能让全世界人失望。……我们要把一切顾虑丢开，不能有一点儿依靠飞机大炮的心思。到了某一些情况，只有一个人也得打。我们要学赵伯生排，打得只剩下两个人都挂了花，他们还守住山头，赵伯生烈士身带重伤，敌人攻上来要抓他俘虏，他跳崖牺牲，另外那个同志用冲锋枪打死了敌人，到底守住了阵地。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好的工事。我们现在有坑道，随便敌人好多人来攻，我们一定要消灭他在前沿。……”

他讲话讲得慢，显得很费力。他说了这段话，额上冒出了汗珠。他好像还想说下去，但是他再找不到他觉得适当的话，他忽然粗声讲了一句：“完了，”就闭上嘴，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手帕揩汗。王国兴同志接着发言了。

讨论认真地继续下去。每个战士都讲出了自己心里的话。话不完全相同，但意思却差不远，大家的心是一样的。

会结束以后，雨还没有停止，仍然哗啦哗啦地下着。我先走出洞子回自己的住处去。

我刚走进自己的洞子，脱下雨衣挂起来，就看见黄文元同志和另外一个年轻战士一块儿走过洞外向右边去了。他们披

着雨布，一个人拿洋镐，一个人拿铁锹。过了不到半个钟点，他们从原路回来了，又走过我的洞外。

“黄文元同志，”我在洞里唤他，唤了两声。他已经过去了，又走回来，下了台阶，进到我的洞里。

“李林同志，你在喊我吗？”他带笑问道。雨点像珠子似地从他披的那张雨布上滴下来。他把洋镐靠壁放着。

“你们刚才到哪儿去？”我问道。

“班长喊我们到弹药室去看看。雨下大了，害怕淹水。还好，没有淹到，”他答道。他朝洞里四处看了看，马上又说：“李林同志，你要当心啊。今天这场雨不停，不到天亮这个洞子又要淹水了。这儿山上都是这种砂石，一下雨，到处都浸水。”

的确这个洞子里，地上壁上发潮，泥土也浸了水在发亮，好像没有一块干地方似的。我不愿意多耽搁他的时间，我只说了一句话：“幸好朝鲜的雨季过去了。”

“还不能说完全过去啊。不过这些洞子也不会出大毛病，”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说一句：“我等会儿再来，”就拿起洋镐走上台阶，走到大雨里去了。

六

这天雨一直没有停过。天刚黑我就在炕上睡了。

我睡得很好，并没有做梦。但是忽然间一声巨响把我惊醒了。我第一个念头是：洞子垮了。我睁大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连忙用手电在洞子里到处照了照。洞口台阶上有一堆

散开的砂土。一定是洞口砂石塌下了一块来。我看表，快到十点钟。战士们都睡了。雨也小了。我想今晚上不会有大问题，便放了心，闭上眼睛。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黄文元同志的声音。他大声叫着："李林同志，李林同志！"

"喂，什么事？"我大声问道，就披起衣服在炕上坐起来，拿手电往洞口照去。

"洞子里头没有塌罢？我来给你把灯点起，请你把手电给我照一下，"他在洞外说。

我一边答应："洞子里头没有塌，"一边用手电给他照路。他刚走下台阶，忽然一声雷响，接着他发出一声"啊呀"。我一惊，手电光马上灭了。我大声问："黄文元同志，你怎样了？打到没有？"马上用手电去照他。

"没有。不是我跳得快，差一点儿就挨到了，"他带笑地说，就走到右边石壁上放油灯的地方擦燃火柴，把灯点燃了。

"李林同志，今晚上你不要吹熄灯。只要雨不再下大，就不会再有问题。你小心点儿就行了，"他关心地嘱咐道。

"谢谢你。你还没有睡？麻烦你罗，"我感激地说。

"今晚上好几个洞子，有的浸了水，有的洞口砂石塌了一块两块的。一排长来吩咐大家小心，要大家轮流坐夜。三班长起先又打摆子了。刚才我正在坐夜，听见响声，就跑来看看。请你把手电借给我用一用，"他说了，就伸出手来拿手电。他接过手电以后，就走出洞去。他站在外面，用手电照洞口上方的石壁。他好像把每个可能崩塌的地方都看到了。

我忽然听见另一个人讲话的声音，声音小，我听不出是谁

在讲话。过后黄文元同志在回答，声音也不大。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过了一会儿，黄文元同志一个人进来了。

“不要紧，不会再塌了。我到处都看过了。你放心睡觉罢。我们还有人在外头守着，”他高兴地对我说，把手电还给我。

“好，好，”我连说了两声“好”，接着便说：“你回去睡罢，辛苦你罗。”

“不要紧，”他答道。“刚才三班长来过。他不放心，自己来看看。他刚刚打过了摆子，他还要进来看你，我报告他你很好。他才回去休息了。队部刚才也派人来问过，指导员、副队长看见下了一天大雨，都担心洞子会出毛病。他们要我们好好照应你。你尽管放心睡罢。今晚上你这外头加了一个岗哨。”他说到这里，不等我插一句嘴，突然说一声：“明天见，”就大步走出去了。

我连忙打开手电给他照路。但是他已经出了洞子，连背影也看不见了。

七

第二天天晴了。我从洞口那一大堆砂土上面跳过，走出阴湿的洞子，呼吸清早新鲜的空气，看见碧绿树叶上一片金色的阳光，和一些在阳光下发亮的水珠，我非常高兴。

昨天休息了一天的炮兵校正机又在天空盘旋了。大炮声间歇地响着。有几个战士拿着铁锹和洋镐顺着交通沟走来，

有的把用树叶做成的防空帽戴在头上，有的把防空帽系在背后，他们走过我旁边，跟我打个招呼就往前走了。

我刚洗过脸，三班长带着陈大仁同志来了。陈大仁同志一手拿铁锹，一手拿洋镐，显得生气勃勃。三班长脸色焦黄，颧骨显得更高，嘴唇没有一点血色，一件旧棉大衣披在身上，他看见我，有气无力地打个招呼，说："昨晚上受了惊罢？我们马上把土弄干净。"接着陈大仁同志放下洋镐，拿着铁锹，走下台阶，动起手来，把洞口堆的砂土一锹一锹地往外面抛。

"三班长，摆子还没有好？吃过药吗？"我问道。"黄文元同志说你昨晚上还来看过。"

他又笑了笑，答道："卫生员给过我药吃，一种黄色药片。今天大概不会发了。昨晚上听见声音，过来看看，幸好雨小了，洞子塌得不厉害。我没有来惊动你。晚上队部派人来问过。一排长也来看过两次。临时加了一个岗哨。黄文元在这里坡上守了你一个晚上。我们害怕半夜雨下大了，再出毛病。"

三班长现在说话较慢，声音小，但是并不显得太吃力。他的失神的眼睛望着我，脸上一直露出亲切、关心的表情。他不等把话说完，就拿起洋镐去挖地上的土。

"三班长，等我来，你有病，"我听完他的话，才想到我应当自己动手，便走过去，伸手去拿他手里的洋镐。

"不要紧。我打摆子不算病，"三班长不肯把洋镐给我，他摇摇头笑答道，仍然用洋镐挖土。

我没有办法，只得站在旁边看他们工作。洞口塌下来的

土弄光了。陈大仁同志又在把刚才堆在交通沟里的土抛到坡上去，仍旧是一锹一锹地，他抛得很高、很准。他那发红的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

“昨晚上，洞子塌得不多罢？”我问三班长。

“不多。我们那个洞子没有塌。二班、六班的塌了一点。炊事班的也塌了一块，”三班长答道。

“这种砂石洞子挖起来很不容易。洋镐下去就是一个火星。当初挖它的时候，手都磨出血了，一天也挖不了多少。可是一下雨，它浸了水，就松了。你用手一扳，它就落下一块来，”陈大仁同志插嘴说，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消散。

“今年雨季又算熬过去了。再多的雨也难不倒志愿军，”三班长毫不在乎地答道，他的眼睛忽然亮一下。他充满信心地笑了笑。他脸上的病容现在看不见了。

我注意地望着他，他忽然掉头看了看洞口上方的石壁，他说：“这上头再加两三根木头就没有问题了。昨天——”他的话没有说完，忽然让一个大的爆炸声打断了。

“敌机来炸二连的阵地了，”三班长皱了皱眉头，放低声音说。笑容收敛了，脸上现出一种憎恶的表情。

“几时，我们弄两尊高射炮来，好好地揍它一顿，不让它逃掉一架，”陈大仁同志生气地骂道，他更用力抛土，两三下就把工作做完了。

敌机俯冲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三班长便爬上小坡，隐在一棵树下，朝右边前面第四个山头看。我也跟着到坡上去了。四架飞机轮流地俯冲下去轰炸那个黄黄的山头。每一声巨响

过后就冒起一股黄烟，或者一道火光。机关枪响一阵又停了。

我越看越气，恨自己不是一个高射炮手，不能用炮打下那些空中强盗……

敌机俯冲了几次就往南逃走了。可是第四架飞机的影子还没有消去，我忽然注意到两架“油担子”正朝我头上飞来，我连忙把身子朝树下一躲。这时我才注意到三班长早已走了。陈大仁同志也不见了。

“油担子”带着它们那种叫人听起来不舒服的声音一直往西北方飞走了。这以后清静了一会儿。可是等我回到洞子里，大炮声又响起来了。炮声稀，响了几下又停一阵。

我把这几天的笔记整理了一下，然后走出洞去。我想去看看三班长。我在交通沟里刚转过弯，就看见三班长朝我走来。他告诉我营部来了通知，要我今天下午三点钟到那边去参加一个会议。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他还告诉我，起先敌机轰炸二连阵地，二连并无损失。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八

下午黄文元同志背着枪带着伪装（就是那顶树叶帽）送我到营部去。我们有时在交通沟里走，有时碰到交通沟里淹了水就爬上坡去，在灌木丛中弯弯曲曲地顺着人走出来的小路走，有时还要接连地从交通沟上跳过。我们在灌木丛中找路的时候，他常常回过头来问我：“你不累罢？是不是走慢点儿？”他听见树枝、树叶的响声大了，就连忙站住，准备伸手来扶我。

有时他还抬头望望天空，听听有没有飞机的声音。

我一面走，一面跟他谈起话来。我说："昨晚上原来是你在我洞子外头站岗，我还不知道。你没有睡罢？"

"睡罗。今天早晨睡的。昨晚上后来不落雨了，我才放了心，"他高兴地答道。接着他又说："现在我们生活很好。吃的用的样样都有。还发得有保健丸。听他们参加过五次战役的说，那个时候才苦嘞！然而我们就是过那种日子也打了胜仗！"

我问他参加过战斗没有。

"就是那一回，我跟我们副班长陆方策捉了两个美国鬼子，他现在回国学习去了，"他带笑答道。

我想起来了。我就问他："你就是那一回立的功吗？"

他不回过头，却大步朝前走着，他短短地答道："那不算什么，那是靠了副班长。"刚说完这句话，他一步跳过一个较宽的交通沟，连忙站住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当心点儿，"就伸手来拉我。

我也跳过去了。我要他告诉我，他立功的经过。

"真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很简单，两句话就说完了，"他答道，把脚步加快了。

我又向他要求一遍。

他站住了，回过头看我一眼，答道："好，我说。"等我走到他身边，他又朝前走了。他一面走一面说，脚步放慢了些，因为我们现在朝上走，要爬过这座山。他说："就是一个多月以前夺回无名高地的那一回。无名高地就是今天早晨敌机轰炸

的那个山头。我参加的是突击组。爆破组把铁丝网爆破了。我们跟着自己的炮火走。副排长喊我们冲锋，我们就冲上去。平时我跑路脚杆软，现在一冲就上去了。我们冲过去。敌人的地堡没有给炮火打掉的现在也给我们炸掉了。敌人挡不住就逃走了。接着打来好多空中炸的炮弹，同志们挂花的不多。我找到一个单人掩体，就在那里头打了一阵。后来打扫战场，搜索敌人。我跟副班长一起，我们在交通沟里找到两个美国鬼子。他们躲在交通沟的防炮洞里头。他们都是大个子，半个头露在外面。我们喊他们出来，他们不肯出来，副班长力气大，硬把一个鬼子拉出来。第二个鬼子吓得哇哇叫，跟着举起两只手出来了。副班长跟我一个人捉一个俘虏，每人右手拿两支枪，左手捉一个鬼子。回来大家笑我说：你这样一个小个子倒捉了一个长人回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前面是美国鬼子，鬼子吃了好几次亏，后来换防了，现在换来李伪军，李伪军比鬼子狡猾多了。后来要给我立功，我说这算不得功，人家刘光子一个人捉六十三个英国俘虏，那才是功臣啊！要立功在后头。”

“你真有志气，”我大声地称赞道。他讲得很简单，好像不愿意多讲过去的事情似的。可是他的话使我很高兴，跟他在一块儿走路，我感到兴奋和快乐。“你订了立功计划吗？”

“我们班里每个同志都有自己的立功计划，”他低声答道，话没有说完，又不响了。我们已经走到小山顶上了，他站住，转过身子问我：“要不要休息一下？你觉得累吗？”

汗已经打湿了我里面的衣服，可是我并不觉得累。我知道营部离这里很近了。我希望一口气走到营部，在那边休息，

便回答他："不累，慢慢儿走罢。"

"好，"他说，我们刚翻过山顶，他忽然问我："李林同志，你一时不走罢？"

"没有一定，还可以住个把月，"我顺口答道。我不知道他问话的用意。

"个把月？"他自言自语般念着这三个字。过后他又回头来对我说一句："太短罗。"他笑了笑，把头掉回去了。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忽然很激动地说："李林同志，你不要笑我。我真希望我能够在你走以前立个大功。"

"那么我一定等着你，"我笑着回答。本来我还要讲下去，可是我只顾说话，没有注意路上的石子，右脚让两根断掉的树枝和一块小石头绊了一下，左脚站不稳，我马上抓住旁边的一棵马尾松，才没有跌下去。

"当心啊！"黄文元同志吃惊地说，连忙伸过手来扶我的手臂。这样我们关于立功的谈话就打断了。我也没有机会引他再谈这个问题，因为营部就在前面了。

九

我在营部见到团长，他来主持这个检查反击战准备工作的会议。我们分别将近三个星期，他还是那个样子：笑容满面，精力饱满，显得比营长、连长都年轻。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愉快地笑着："我们很想念你。"放开手他又说："师长还打电话来问起你。现在要让你看打仗了。"他笑得真快乐。

开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带着严肃的面容。讲话的人不少，跟这个工作有关的各级干部都讲了话。团长注意地听每个人讲话，他自己讲话简短而扼要，清楚而有力量。他主持会议，掌握得非常好。

会议继续了将近四个钟头，经过反复的讨论以后，在七点光景结束了。团长、营长和教导员都留我在营部住一个晚上，他们担心我不习惯黑夜走山路。我没法拒绝他们的好意。团长回去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热情地说："你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我笑着，我知道他这句话里的意思。我就要看到一次出色的战斗了。

这一晚教导员一定要把他的床让给我睡。我在睡觉以前，还坐在营长的炕上，听这个失掉左手大拇指的三十岁光景的营长谈他的一些战斗经验。营长的炕挖在大洞中的一个小洞里，炕前面还放着一张木头拼成的方桌，桌上除了一堆文件外，还有一架军用电话机。

营长谈到他那个在去年五次战役中牺牲的通讯员，忽然沉默了，方桌上那盏用罐头做成的菜油灯的黄色灯光使我看见他脸上的严肃的表情。我心里也有点难过。我想告辞，但是我不愿意在他悲痛的时候离开他。我的眼光在壁上扫了一下。壁上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彩色画。两个打红领巾的小孩（一男一女）从画上望着我笑。

"营长，你有小孩吗？"我指着那张画问他。

他把眼光移到画上，他答道："我有一个女儿，也有这样大了。"他点着头慢慢地笑了。"她过得很好。祖国的孩子们都过

得好。”过了一阵，他把眼光移到我的脸上，亲切地说：“你早点休息罢，我看你今天也够累了。”

他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我今晚上的临时住处去。一刻钟以后，我就睡在教导员的炕上了。我吹灭了油灯，阴冷的小洞子里只有一片漆黑，我忽然想起黄文元同志的谈话：我仿佛看见了他那张带笑的年轻的圆脸，我替他高兴，我知道他等了好久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十

第二天早晨，下着小雨，但是不到两个钟头雨就住了。天上仍然密布着灰色的云片。营长和教导员留我吃过早饭后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回连部。

我到了连部，又让指导员和副连长留着。我在连部记录了一些材料，吃了晚饭，才动身回去，指导员和副连长带了一个通讯员跟我同去。

副连长走在我的前头，他回过头问我：“你觉得黄文元怎样？”

“很好，我很喜欢他，”我老实地回答。

“我也喜欢他。他在各方面都不错。不过在文化上请你多指导他啊。”他说完又回过头来看我，摸着自己下巴底下那个小洞，眼睛发亮。他高兴地笑了。

“副连长，你那个小伤口最近还流脓吗？”我问道。

“不常流了，”他仍然笑着回答。

我们这时正走到一排阵地的交通沟口，看见一排长和一排副走过来。我们的谈话就打断了。他们站住向连首长敬了礼，回答了几句话，便回转身跟在连首长后面慢慢地走着。我知道他们要向连首长报告事情，就迈着快步往前走了。

我走过三班的洞子，看见黄文元同志蹲在洞口，把头俯在一张用木板搭成的矮桌子上，用心在写字。王国兴同志站在他背后。我也走到他背后去。原来他在写墙报的稿子。他已经用自来水笔在一张白纸上画好一个挑水的战士，现在正在画的下面写字："王国兴同志真不错，挑水总是他挑得多，装得满，跑得快……"

"帽子画得不像，画成女人的头发罗！"站在他背后的王国兴同志抗议道。

他不回答，放下笔，偏着头仔细地看了看。

"你看，我们的帽子哪里是你画的这样！"王国兴同志继续说下去。

黄文元同志仍然不作声。他回过头来看看说话的同志，又看看他自己的画。忽然他扑嗤笑了。他站起来，默默地走到洞口贴墙报的地方，注意地望着贴在那里的一张志愿军归国代表的照像（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然后他得意地走回来，笑着说："我明白罗。"他又蹲下来裁了一小条纸，涂上浆糊，贴在先前画好的人头上，另外画一个戴军帽的人头。他一笔一笔仔细地画着。画好了，他又回过头来望着王国兴同志问一句："现在像不像？"

"帽子像了，可是相貌不像。"

“我又不是画家，我是个战士啊，”黄文元同志笑着说。接着他又问我：“李林同志，你说对不对？”

王国兴同志抢着代我回答了：“不对。大家都说：志愿军没有不会的事情。”

他不笑了。他想了想，然后慢吞吞地说：“你说得对。我到朝鲜来不知道学会了多少事情。”他又拿起笔继续写他表扬王国兴同志的快板。他写完了，自己念了念，把笔插回衣袋里，站起来，笑着说：“我以后还要好好地学习。”他拿着写好的稿子进洞里去了。

我便回到我的洞子里去。洞里阴暗潮湿，但水瓶却是滚烫的。黄文元同志并没有忘记给我换开水。我喝过水，又出去。我想去找指导员和副连长。我走过三班的洞口，看见黄文元同志一个人靠着交通沟，拿了一封信低声在念。先前那个看画的王国兴同志跟陈大仁同志两个蹲在地上，在矮桌上摊开棋盘下象棋。

“得到家信啦？”我顺口问他一句。

“今天到的，”他抬起头对我笑笑。

“家里人都好吗？”我又问一句。

“都很好。我家里人都鼓励我立功，”他笑答道。

“他们知道你在无名高地立功的事情吗？”

“不会这样快。而且他们希望我立大功啊！”他压低声音答道，也许他不愿意让旁边两个同志听见。

“好，”我只简单地说了一个字。这个字里面含着很多的意思，可是他不会了解。我不能够对他说：你的机会就要来

了。但是我相信他的计划不久就会实现。

十一

黄文元同志等了许久的机会终于来了。两个星期后的某一天早晨，三班长(他的摆子已经治好了)来通知我：团长约我今晚上到他那里去，他下午派人来接我。

我知道团长约我去干什么。其实最近几天来我从三班战士的生活与活动中已经看出一些征象了。我非常兴奋，在洞子里坐不住，便走出去。我想去找的第一个人便是黄文元同志。我并不打算跟他讲什么话，我只想看看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事情。我走到三班的洞子前面，看见那个班的战士都在洞子的内外：有的在擦枪，有的在整理伪装；有的带着严肃的表情，有的露出愉快的笑容。黄文元同志坐在矮木凳上检查他的冲锋枪。他看见我，微笑着，点一个头，也不说什么话。陈大仁同志站在交通沟旁边编防空帽，也含着深意地对我笑笑。三班长从洞里出来，站在洞口批评一个同志的伪装不对。他把每个人的伪装都检查过了，然后叫他们全到洞里去，听他讲话。

我在洞外听不见他讲些什么。不过我想得到他讲话的内容。他讲了十分钟的光景就出来了。他笑着招呼我，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他想跟我讲话，我也想跟他讲话，可是我们对望着，讲不出两句整句的话来。我知道他的心完全在那一桩事情上，我的心也是这样。但是谁也不能够讲到它。我不能

像这样地浪费他的宝贵时间，我便打一个招呼走开了。

吃早饭的时候，我再到三班的洞子。同志们都在。今天很少有人讲笑话。而且大家吃得多，讲得少。一种严肃的空气笼罩着这个地方。但是我并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看过每个同志的脸，而且我看了黄文元同志好几次。拿他们脸上的表情来说，严肃中带有一种毫无挂虑的愉快。它好像在告诉人：一件重大的喜事就要来了。

吃完饭我有着跟黄文元同志谈话的机会。他今天话特别少。他始终不谈那一件他同我都知道的事，连一句暗示的话也没有。他只说他给父母写了信，信上也提到我：他跟父亲说，我回去可以告诉他家里，他们在朝鲜生活得怎样好。我在这个时候插嘴说："你家里的地址我还不知道。"他答道："等你走的时候，我把地址抄给你。"

我们谈得并不起劲。后来他们要开小组会，讨论问题，我便回自己的洞子去休息。过了好一阵，我又去看他们，他们还在开会。我便顺着交通沟到二班的洞子去，二班的战士们也在开小组会。我再往前走，一班的战士们也在洞子里开会讨论。

我回到我的洞子里午睡了一个多钟头。起来以后，稍微休息一下，喝了一点水，我再到三班的洞子去。战士们全坐在洞子里，指导员在跟他们讲话。我知道他们今天的工作很紧张，便不再去打扰他们。

到吃晚饭的时候，我还跟他们见过一次面。大家吃得快，谈话更少，在和睦的空气中吃完了饭。黄文元同志跟我谈了两句闲话，一眨眼间就看不见了。陈大仁同志在洞子里整理

东西。别的战士们也都忙着。我知道那个重要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感到紧张。我在一两位战士的脸上也看到激动的表情。

我顺着交通沟往前走去。我走过一二班的洞口，战士们都忙着。黄文元同志在跟一个一班的年轻战士讲话，看见我走过，笑着打个招呼。我一直往前走，一面想着那件重大事情。我想像着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和战果，我想像着黄文元同志凯旋归来的情形。我忽然听见一个熟习的声音叫着："报告！"我吃惊地抬起头，看见一个通讯员站在我面前举手敬礼。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团部的通讯员。

"小丁，你来接我吗？"我带笑问他。

"团长叫我来接李林同志，牲口在山下面，"小丁答道。

"那么你陪我回去拿点东西，"我说。

"不要紧，现在还早，"小丁说，便跟着我向我的洞子走去。

十二

天黑以前我和小丁动身去团部的时候，一、二、三班的战士们都已经离开他们的洞子了。我没有跟他们告别，我有一种歉然的感觉。

我们在路上多绕了两个弯，只因为小丁很谨慎，他愿意让我多在交通沟里走，少走在坡上，免得时常从交通沟上面跳过。我们走了一阵子，刚从交通沟跳到坡上，走不几步，忽然从旁边一条交通沟里走出来一行人，背着枪、绑上伪装，一声

不响地转着小弯往下面走了。我便站住向他们望去。我先认出来的是一班的战士。接着是二班的。后来三班长也出现了。我走下两步注意地看，陈大仁同志看见了我，稍微露一露笑容，动一下头。跟在他背后的就是黄文元同志。黄文元同志也朝我点一下头，笑一笑。但是这动作做得非常快，一下就过去了。不注意的眼睛是不会看出来的。黄文元同志后面还有好些人。我用眼光送他们，我没有挥手，只在心里暗暗地说了一句："祝你们胜利。"我不等这一行人走完，就转过身对小丁说："我们走罢。"小丁默默地站在我旁边，我看得清楚他那羡慕的眼光。

十 三

我赶到团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许久了。团长和政治委员都不在家，留下一句话：叫小丁送我到师部去。我在政治处休息了十几分钟，跟江干事谈了一阵话，喝了水，就骑着马到师部去了。

时间已经不早，师的首长还在开会。一个参谋来给我安排了住处，让我睡下了。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师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才知道昨天晚上的会开得很久。今天一大早师长又出去了。他们要我白天多休息，说晚饭后带我到指挥所去。

"一切都很顺利，都照着预定计划进行。部队已经到了指定的地点。敌人没有什么动静，今晚上一定把×××高地拿

过来，”政委两眼发光，很有把握地说。

“今晚上你就看得见我们的战士执行任务多准确、多迅速！这些战士大部分你都认得。你在他们那里住了不少日子。你觉得都是些普通人罢？你看看他们打仗，你就更了解他们了，”政委满意地微笑着，拿起搪磁茶缸喝了两口茶。

他的话并不只这些。它们使我非常兴奋。我离开他以后也没法休息，我一直在运用我的想像力。我好容易盼到了出发的时刻。

政委和我一块儿去，两个通讯员跟着我们。别的人都早去了。我们到了那座灌木丛生的山头，天还没有大黑。师长和几个参谋都在指挥所里，外面也有几个人分散地立在树下。政委和我立在一棵栗树下面。

“就是那个山包，红山包右边那个，上头有几棵大树的，”政委把那个山头指给我看了。“你看准表。时间一到，你听炮声罢。”他说完，便到指挥所里去了。

我一秒钟一秒钟地等着。我看看表又看看山头。四周相当静。夜色逐渐加浓。在山头还没有让夜色完全盖住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到了。”我刚把头向政委掉过去，炮声响了。

许多尊炮一齐发射。只看见火光一闪一闪地奔出去，仿佛前后左右都有。声音响成一片，快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炮打得好准！”政委在我旁边称赞道。很多的炮弹都落在那个山头。但是另外的两个山头也是我们炮弹的目标。

“敌人的炮群给压住了，”政委高兴地笑着说。

炮打了十分钟就停止了。我知道黄文元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就要动作了。我聚精会神地望着那个山头，连眼睛也不敢眨一下。忽然看见一下花炮似的火光，只见许多股细细的火丝一亮就灭了。停了一下又同样地亮了一次，以后再亮一次。

"铁丝网爆破了，"政委用愉快的声音说。

一颗绿色的星从那个山头升起来，在半空中亮了一下又灭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看政委，他马上告诉我：

"敌人的信号弹。"

接着一颗红色的星升了起来，这颗星好像更亮，而且升得更高，但是过一下也就看不见了。

"我们发起冲锋了，"政委的亲切的声音轻轻地在我耳边响着。

很快地又有两颗红星光闪闪地升起在漆黑的天空。我又听见政委的声音：

"突破前沿了。只有两分钟。"

我欢迎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马上想像着黄文元同志端着枪冲锋扔手榴弹的情形。但是我的眼光始终不离开那个山头。在那里又现出爆破筒的花炮似的灿烂火光。接着又有另一种火光在空中一闪一闪地亮着。

"这是敌人在打炮，空中炸，"政委又说。我仍然注意地望着那个方向。我听见一个人在跟政委讲话："……敌人还在抵抗，往外扔手榴弹。"他的话刚说完，天空中突然飞起了三颗红星。

"占领阵地了，"政委用更愉快的声音说。他埋下头看他

的夜光手表，又加一句："一共才十五分钟。"

我再朝那边望去，漆黑中仍然不时地亮着一闪一闪的火光，敌人还在打炮。夜渐渐地冷起来。跟着我们来的通讯员送来一件棉大衣给我披上。

"你还记得我今天上半天讲的话罢。真是多准确，多迅速……"政委的话还没有讲完，师长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手，用他那爽朗的声音告诉我们：

"战斗结束了。现在在打扫战场。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顺利进行的。"从他说话的声音里我听出他的喜悦来。我也感到他的喜悦了。他接着问我："李林同志，你觉得打仗怎么样？你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罢？准备了好久，十五分钟就完了。哈哈，"他笑起来，声音并不大，但这是很满意的快乐的笑声。

一个参谋走到师长身边，跟师长交谈了几句话，又走进指挥所去了。师长又把先前的谈话接下去说："其实在战士们却并不简单啊。"

"虽说是打小仗，你也看得出来：我们现在是越打越强了。我们说要拿什么山头，就拿下什么山头。十五分钟！你说快不快！"师长接着又说。然后他转向政委："你陪李林同志先回去罢。我留在这儿。"

我再向那个刚拿下来的山头望一次。一片漆黑，什么也望不见。敌人在另一个地方打炮。炮声并不密。我看不出什么动静。

我跟着政委先走了。

十 四

这个晚上我心里说不出地高兴。我看见了胜利。我真愿意马上把胜利的消息告诉祖国人民。我想到黄文元同志，想到陈大仁同志，想到三班长和别的许多同志。我想到指导员，想到营长，想到团长，想到师长和政委。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回到祖国，回到四川，到了黄文元同志的家乡，把他立功的消息告诉他父母和两个妹妹。那一家人多么亲切地接待我。

第二天上午，我见到师长和政委。师长握着我的手，带点兴奋地说："敌人一个加强连完全解决了，一个也没有跑掉。"

我向他道贺，我顺便问一句："我们伤亡小罢？"

"很小，很小。一共不到十几个，"师长兴奋地答道。"可是这回又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你得去采访一下。这是你的好材料。"

"什么人？哪一连，哪一排的？"我惊喜地问道，因为参加昨天战斗的除了一连的一排外，还有二连的一个排。

"黄文元，就是你在的那个连队的战士，青年团员，"政委也带了点激动地说。

"黄文元！我跟他熟。他现在在哪里？我就去找他！"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

"他牺牲了，"政委简单地说，后来又加一句："我很可惜没有好好地跟他谈过话。"

我楞了一下，好像跌了一跤，爬不起来。我半天讲不出一

句话。

师长坐在用木箱做成的矮椅子上，默默地抽着烟，过了一阵，他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踏灭了。"警卫员！警卫员！"他大声叫着。

警卫员进来了。

"你去催一声，快点把早饭开来！"师长有点不耐烦地吩咐道。

警卫员敬个礼退出去了。

师长忽然站起来，在这个土屋子里走了两三步，在我面前站住了，望着我说："李林同志，你答应我好好地给他写篇文章。我请你一定写。他那种感情不简单啊！不能让它埋没。这样高的道德品质……我实在没有话说……"

"应该让祖国人民知道……"政委插嘴说。

"可是他的事迹我还不清楚，"我只说了半句，早饭就开上来了。

"就这样罢：吃了饭，我们就送你到团部去。政治部派得有干事到那边去帮忙整理材料，"政委道。

"好罢。我从团部就直接回连队去，"我同意地说。

在吃早饭的中间我跟师长和政委谈起黄文元同志的事情，我把我所知道的全说了。他们还不厌烦地询问一些细节。

我动身去团部的时候，师长紧紧握着我的手，用亲切的眼光望着我，诚恳地说："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请你打电话给我们。"

政委一直把我送到上马的地方。马在山路上开始小步走

起来，一个通讯员跟在我后面，我回过头去，政委还站在那棵白杨树下向我挥手。

十五

我在团部政治处主任的土屋子里意外地见到了陈大仁同志。他站起来向我敬礼。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话好，忽然想到一句，就笑着说了出来："你回来啦！"我自己也觉着笑得勉强，因为我接着不由自主地吐出一句："黄文元同志怎样啦？"

他眼睛一红，泪水立刻升到他的眼腔里来。他咬了咬嘴唇，然后低声回答我："我亲眼看见他牺牲的。他真勇敢！"

他坐下来，回答了主任的一些问题之后，便转向着我，他那对发红的眼睛像看一个亲人似地望着我。眼睛里没有泪水了，现在有的是爱的光和恨的光。这就说明他心里交织着这两种感情。

"陈大仁同志，请你谈谈昨天的战斗，昨天的胜利罢，"我后来请求似地这样说了。其实我更想知道的是黄文元同志的英雄事迹，可是我又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引起他难过，也让我自己难过。

"好，我谈罢，"陈大仁同志点点头说。他把眼睛掉开了。他什么人也不看，他在看地上。"前天晚上我们出发的时候碰见过你，到了潜伏的地点，天已经漆黑了。我们三个人一组分散开来，藏在茅草中间。我跟黄文元、王国兴一组。我们离山

顶上敌人的铁丝网不到一百米，这一带一棵大树都找不到，只有些野草同马尾松。敌人特别机警。连一只野鸡飞起来，也要惹他们打一两梭子机关枪，打一阵炮。敌人虽然狡猾，可是我们伪装得很好，我们从头到脚都插满了野草、树叶，真叫人看不出来。同志们大家都遵守纪律，一点响动也没有，始终不让敌人看出什么来。我们已经熬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了。还只有几个钟头就可以完成任务了。时间越近，我们越兴奋，但是也越沉着，更不敢动一下。我跟黄文元距离最近，不过四米多，我旁边有一块石头。不过我的地势比他的高，我看他看得很清楚。我有时候望他，他也望我，我们彼此做个笑脸。我现在还记得他的笑脸。”

陈大仁同志闭了嘴，仍然埋着头在望地上。主任用温和的声音说：“你喝口水，休息休息罢。”这个年轻的战士抬起头来看我们，眼睛红红的，却没有泪水，他摇着头说：“不，不，我说。”他又接着往下说了：

“就在一点钟的光景，敌人突然盲目地打起炮来。我们知道这是敌人害怕，发炮壮胆，不过我们更加小心地提防了。过了两点不久，一颗燃烧弹突然落在黄文元旁边。等我望着他的时候，他身上的草已经燃起来了。半个身子都是火。他把身子向右边微微一侧，左手动了一下。他没有能够弄灭火。而且他的衣服也烧起来了。我着急地向他动着头，我要他在地上滚一下，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可是我不敢讲话，他也没有注意到我。他如果站起来，当然很容易扑灭火；他就是在地上大滚一下，也可能把火弄灭。可是他就会暴露目标，

不但我们的反击任务不能完成，连我们两个排的同志们都有被消灭的危险。火延烧得很快。我急得不得了，我真想跑过去帮忙他扑灭火，可是我不能这样做。他一定不许我这样做。我还记得出发前首长特别对我们讲过：'你们执行任务，要靠巧妙的伪装，要靠沉着，更要遵守纪律。哪怕有人给敌人子弹打中了，也不能暴露目标。'这个时候大概我们的首长看到潜伏地上起了火，命令炮兵向敌人阵地开炮，扰乱敌人的注意力。我看见黄文元伸出手把冲锋枪和爆破筒放开，推得离他远一点。火已经延烧到他的全身了。他起先还用手去扑火，但是他不站起来；单单谨慎地动两下，不会有多大的用处。他后来就索性不动了。他静静地伏在地上，两只手插在土里头，让火在他身上烧。他本来把下巴压在地上，眼睛向前。忽然他把脸掉过来看我。他那张圆脸通红，满脸汗珠，嘴唇闭得紧紧，眼睛亮得怕人。我一看就知道他忍着多大的痛苦。衣服烧着肉，烧得嗤嗤地响。他的身子微微发抖，脸上的肉也在抖，他的手越插越深，完全插进土里头去了。我知道他连一秒钟都是不容易熬过去的。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我真害怕看他，我又不能不看他。我也咬紧牙关，一手抱住枪，一手抓紧一把草，我差一点忍受不了，我要站起来救他。可是他的眼睛牢牢地望着我，眼光一点也没有乱，它好像在说'纪律！这是为了胜利，为了完成战斗任务！'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我又恨，又急，心里又难过。我受不了，我不敢看他，我把眼睛闭上。我忽然听见他在轻轻地唤我。我睁开眼睛，他稍微抬起头来，他的帽子着了火脱掉了。短头发在烧着。他把头在地

上擦了几下，还是擦不灭火。他又抬起头，朝着我小声说：‘我为了祖国，献出一切。……我不能够完成任务……我的武器给你，你好好地完成任务罢。’他熬不过痛，一下子就把头埋下去，整个脸压在地上，不叫一声，也不再动一下。他整个身子都给火包住了。……”

陈大仁同志闭上嘴，用手指揉了揉眼睛。他仰起头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我们默默地望着他。谁都讲不出一句话。我咬紧牙齿。我什么也不敢想。我好像看见了黄文元同志的年轻的圆脸，脸上没有笑容，却烧起一脸的火。过了一会儿，陈大仁同志自语似地小声说：“我一讲起来，就看见他在我眼前。”他歇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这天没有风，火烧得慢，一共烧了两个多钟头，他牺牲了。他的确为祖国献出了一切。当初有火星飞到我脸上，烧起了泡，我一直不觉得痛。我心里只有恨，我立誓要给烈士报仇。同志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大家把敌人恨得不得了。时候一到，我们的大炮像一阵大雨打到敌人的山头，敌人的地堡都给摧毁了。炮火一停，我们就出动了。我马上飞跑到黄文元烈士的身边，用我的棉大衣盖住他的身体，把他留下来的冲锋枪和爆破筒拿走了。我们爆破组接连着把三道铁丝网都爆破了。我跟着突击组同志们一块儿冲上去。每个人忘记自己地大声喊着：‘给黄文元烈士报仇啊！’我们真恨！真愿意拿性命跟敌人拚到底！敌人抵挡不住，躲在剩下的几个地堡里头，往外扔手榴弹。我们喊话，他们也不肯投降。最后我们不顾一切把爆破筒塞进这几个地堡，连人连地堡一下子炸光了。不

过十五分钟，我们就完全占领了阵地。”

陈大仁同志讲完了，埋着头，低声在咳嗽。别的人都不作声。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眼前只有一团火，一张年轻人的圆脸，一具烧焦的尸体。我仿佛听见一个坚决的声音：“我献出一切。”

“李林同志，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主任在跟我讲话。我掉过头去望他。他继续说：“没有问题就让他去休息一会儿，他也够累了。”

“我不累，我不累，”陈大仁同志插嘴说。

我惊醒地望着陈大仁同志，眼前也是一张年轻人的脸，他现在是黄文元同志最亲近的战友了。他用过黄文元同志的枪和爆破筒。黄文元同志的最后的话也是对他说的。在他的身上我见到了黄文元同志的影子。

“黄文元同志还留下什么话没有？”我望着他，问道。

“没有，”陈大仁同志短短地回答。接着想了一下他又说：“前天在交通沟碰见你以后，他后来小声跟我讲过一句：‘我应该把家里地址先给李林同志的。’我没有答话。我想这没有什么关系，回来给不是一样！谁知道他就不回来了！”他讲不下去了，又埋下头望着地上。

主任站起来说：“让陈大仁休息休息罢。”

我马上也站起来。陈大仁同志也跟着站起来了。他敬过了礼。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过了半晌才说出话来：“我等着跟你一块儿回班里去。”

十六

我在团部只住了一天，便跟着陈大仁同志一块儿回到三去班了。

洞子里一切如旧，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动。我仍旧在三班吃饭，仍旧参加这个班战士们的一切活动。除了黄文元同志外，这个班还有一个挂花的同志，到休养所去了。我跟其余的战士们处得更熟。这个班牢牢地牵住了我的心。所以有一天团长到这里来，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很可以做三班副了。"我为这句话高兴了半天。

我说"一切如旧"，这只是不正确的、表面的说法。我很快地就注意到这里的生活跟从前并不一样了。我不能够再见到黄文元同志，这使我痛苦。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洞子里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他带着一脸火站在我的面前。但是跟三班的同志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正站在旁边听我们讲话，因为同志们不断地谈到他，好像他仍然活在大家中间，而且永远活在大家中间一样。大家尊敬他、热爱他，做任何事情都拿他作榜样，他的名字鼓舞着每个战友，大家都说：不要给黄文元烈士丢脸，每个人都骄傲自己是黄文元烈士的战友。在这个班里面，工作更积极，学习更有成绩，团结更加紧密——空气跟从前不一样了。

有一天上午，我听见指导员跟一班长和三班长讲话。指导员含笑地对他们说："……这个班没有问题。不管交给它什

么任务，都可以完成。每个人都可以做黄文元。”

就在这天傍晚，王国兴同志在跟陈大仁同志下象棋，忽然站起来说：“黄文元班还会出‘熊包’吗？”

陈大仁同志看见我走过，便唤住我说：“李林同志，黄文元家里有信来了。”他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信来，又加了一句：“指导员叫拿给你看看。”

我接过信来，取出信纸摊开读着。信是他的父亲寄来的，话不多，但是说明了几件事情。第一件：家里人知道他立了三等功，很高兴；第二件，家里人都好，他妹妹读书成绩不错，父亲被选做军属模范，还到重庆去开过会；第三件，家里人要努力生产，迎接他胜利归来。我把信看了两遍。我又看信封，信封上有详细的发信地址。

“李林同志，你可以给他的父亲写封信罢，”陈大仁同志说。他的话也许是顺口说出来的，然而它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

晚上坐在洞子里，我想起我答应过黄文元同志的事，想起他最后说的应该把家里地址给我的话，我掏出笔来伏在炕上给黄文元同志的父亲写了一封信，把我看见的事情（跟他儿子有关，而且不涉及军事秘密的）简单地告诉了他，让他相信他儿子并没有死。

我拿起笔，就放不下来。我一直在想着黄文元同志，我很激动，我觉得心里的话越来越多，必须完全倾吐出来。我开始写师长要我写的文章。我写了一整夜。敌人的稀落的炮声整夜不停。我的笔也就没有停过，到天亮我写完了我的文章。

我用许多话说明一件真实的事情：为祖国献出一切的黄文元同志并没有死！

1953年6月22日在上海写完。

爱的故事*

我住在志愿军某部政治部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两架美国轻轰炸机从这个山沟的上空经过，在沟口的小村子里投下几颗炸弹和燃烧弹。这个小村子有二十几户人家，被炸以后完好的房屋不过三分之一，其余的全炸毁、烧光了。朝鲜老百姓牺牲了三个，受伤的有十多个。志愿军的同志们在敌机走了以后便赶到村子里去帮忙做抢救的工作。

政治部宣教科的干事王敬同志到得最早。他一个人最先冲进一所正在燃烧的房屋里去，把一个不能走路的朝鲜少年救了出来。少年的母亲从十几里外的亲戚家赶回村子里，又哭又笑地抓住王敬同志的膀子不放他走。

我跟王敬同志同住在山沟中一间土屋子里面，我们相处不到半个月，但已经很熟了。他今年不过二十五岁，身材不高不低，身体健康，力气也不小。他是一个热情的人，喜欢讲话，喜欢唱歌。他会讲朝鲜话，跟朝鲜老百姓处得特别好。这天他回到政治部来，脸上、手上都烧起了泡，左手的伤比较厉害，衣服也烂了几处。卫生员给他擦了药，还把他的左手包扎起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展望》第二十五期。

来。晚上他因为伤处痛，睡不着，在铺上不住地翻身。他的失眠引起我的失眠，于是我们两个就在黑暗中闲谈起来。我提到早晨的事情，他很兴奋，对我详细地谈起经过的情形。

“我应当从三个月以前讲起，”王敬同志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调到这里来，在原单位工作。我们刚搬到一个村子里，暂时借住老乡的房子。那个村子有二三十户人家。小孩相当多。几乎每家都有小孩，大部分的小孩都到七、八里外去上学，一到下午，小孩们回来吃过晚饭，都出来在街上唱歌、跳舞，做各种的游戏。我在休息的时间也喜欢出来看小朋友们玩。

“我们办公室斜对面一家人家没有小孩上学，家里也比较清静。可是我走过那家的门口，常常看见那间大开着窗门的屋子里有一个男孩的光头。他那张圆脸上总是带着笑容。并没有人理他，他一个人在笑。每次我看见他，他手上总拿着一面圆镜子，高高地举起来。我听见人说这是一个生病的小孩。可是我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而且我奇怪他拿这面镜子做什么用呢？

“这个人家还有一对老夫妇和一个中年妇人。朝鲜的老太太喜欢跟志愿军同志讲话，不管你懂不懂，她总是又说又做手势，一定要说得你点头答应才闭嘴。所以我很快地就跟她相熟了。一天下午逢着朝鲜的节日，她拉我到她家去吃饺子，我推辞不了，只得进去吃了两个豆粉馅儿的土红色饺子。我跟她谈起那个玩镜子的男孩，问她，他是她的什么人。她说，他是她的外孙，今年才十三岁，本来住在另外一个地方，现在

跟他母亲一块儿暂时住在这里。她引我到男孩的屋子里去。男孩坐在炕上，拿了一本地理教科书低声在念。他母亲在屋角缝衣服。男孩看见我，便放下书，点头招呼。他的脸颊虽然不很红，但是脸上气色还好，没有一点病容。我问他外祖母，为什么不让他出去走走，外面空气好得多。她望着他，现出难过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指着她自己的腿小声告诉我：他的腿坏了，是美国飞机炸坏的。我跟男孩谈了几句闲话。后来我问他的名字，他拿起一支铅笔，把头埋在旁边一个小圆桌上，在他那本地理教科书的背面写了三个中国字：李光玉，又用朝鲜音念了两遍。三个中国字写得相当端正。我看见小圆桌上的那面镜子，便问他：'你喜欢镜子吗？'他笑笑，点点头，拿起镜子来照了照。我不明白他的意思。我把镜子拿过来看了看，也看不出什么来。我也没有多问就告辞走了。我坐在廊上穿鞋子的时候，老太太还在旁边等着送我。我问她：李光玉的父亲在什么地方。她小声回答我：上次李承晚军队打过来的时候，给他们抓去杀掉了。我害怕惹起她伤心，便不敢再问了。

“过了两天，晚饭后我走过李光玉家，又看见他拿着镜子在玩，我便走进去。他母亲和外祖母都不在家，外祖父在上房里看书。我不进屋，就站在窗外跟他讲话。我问他腿痛不痛，他说不痛。问他上学没有，他说今年只上了一个多月学，腿就坏了。我又问他拿镜子做什么用，他笑笑，把镜子递给我，我拿着镜子照了几下。镜子正对着大门，我把镜子拿得高一点，头稍微偏一点，正在门外街上跳舞唱歌的朝鲜小孩的影子就

在镜子上面映出来了。我又把镜子向左、向右移动了几下。我明白镜子的用处了。我把镜子还给李光玉，我说一句：‘我明白了。’他现出很高兴的样子。我谈了一阵话走开的时候，他很亲切地说：‘你要再来啊！请常常来啊！’

“第二天早晨，我走过李光玉家，老太太头上顶着一个包袱从里面走出来。我知道她现在去赶集，看见她招呼我，就站住跟她谈了几句话。我问她，李光玉的腿究竟怎样。她摇摇头，说：‘没有办法。两只腿都坏了。医不好。’她接着向我解释：那一天他正在学校里上课，美国飞机把学校炸坏了。房子全塌了。学生炸死十几个，伤的更多。李光玉半个身子埋在瓦堆里，救出来以后医了一个时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最后说：‘孩子好胜。他一直相信腿医得好，他还想去上学呢。我和他母亲不敢对他说真话。’老太太说着说着，就流下眼泪来了。

“以后我常常去看李光玉。我想到他不能够爬到窗台上看外面，只好用一面镜子摄取小朋友游戏的街景，我更同情他，而且愿意设法减轻他的孤寂生活的痛苦。我教他唱中国歌，我把从祖国寄来的画报借给他看。他也教我读朝鲜文，教我念他念过的朝鲜‘国语’课本。

“这样过了两个星期的光景，有天上午，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睁大眼睛好奇地望着街上的行人。我惊喜地问他：‘怎么，你出来了？’我当时居然以为他的腿好了，所以很高兴。他笑着回答：‘他们抱我出来的。你到哪里去？’我有任务要下连队去一趟，我只告诉他：‘到那边去，’顺

手朝前面指了一下。'你好好地玩啊。我看你的身体渐渐好起来了。'我的话刚说完，他就接着说：'我要走了。'我又吃了一惊，连忙问他：'你到哪里去？'他说：'我跟妈一块儿回自己家里去。我们明天走。'他接着把地址告诉我，又说：'你到我们家来玩啊！'他两只大眼睛盯住我，他笑得很亲切。我听见他母亲在房里大声问他：'你要不要进屋子里来？'他回过头去大声说：'我还要坐一会儿。'然后他又掉过头来看我，说：'要来啊！'我说：'一定来。我明天送你走。'我还想再说话，可是我想到我的任务，我只好跟他分开了。

"我在连队里住了一晚，第二天上半天又到团部去过一趟，下午才赶回来。我担心会见不到他了。可是我刚走进村口，就看见他母亲头上顶一个包袱，右手拉住一根粗绳，绳子后面拖着一部小车子。这种车子不过是一个木箱下面装上四个轮子罢了。李光玉光着头，穿一件新的白布衬衫，坐在木箱里面，两只手抓紧箱子边。我看见他，就惊喜地叫声：'李光玉！'他也大声喊：'王东木[①]！'他母亲也招呼我。我跑过去，抓住他左手，一边说：'你们回家去了？你好好保养身体啊！'他也把右手伸过来捏我的手，高兴地说：'我终于等到你回来了！再见。你要到我们家来啊！'我连声回答：'我一定来，我一定来！'他母亲在旁边说：'王东木，你一定要来啊！我这个孩子就想着你。我们很感谢你。'李光玉接着说：'我们永远想着你。'我们又握了两回手，才分别了。我回头去望他，他也回头来望我。他不住地向我招手。我忽然想起我在团部的时

① 东木（朝鲜话）："同志"的意思。

候，团长刚得到一包从祖国带来的水果糖，抓了一把给我，我当时就塞在裤袋里面。现在我把糖拿出来，捏在手里，跑到车子跟前，把糖放在他怀里，话也不说，就跑开了。我听见他还在我后面喊'王东木'，我心里也有点难过。

"以后我一直抽不出功夫去看他。我只好向他外祖母打听他的消息。她只说他很好。她也不常去看他。他母亲来过两次，两次都来看过我，总说她儿子怎样想我，要她带口信来，请我去玩。

"不久我就调到这里来工作了。我知道李光玉家就在沟口的村子里，等到我安顿好了以后去看他。他正坐在院子里一张草席上面念书，看见我，他高兴得叫起来。他拉住我的手不肯放。他说：'王东木，我等你等了好久了！'又说：'我身体好得多了。'我也很感动。我问他：'你能够走吗？'他摇摇头说：'还不能够。不过我相信我将来会走的。现在我觉得腿有力气了。'他脸上的笑容一直没有散过。

"以后我跟他又常常见面。下午休息的时间里我只要没有事情，就散步到李光玉家去。最近你来了以后，我还去过几次。今天早晨看见敌机轰炸那个小村子，我一直在担心李光玉的安全。等到敌机一走，我连忙跑过去。我到了那边，人们正在救人救火，忙做一团。我跑到李光玉家。房子已经烧起来了。我刚到门口，一阵烟朝着我扑过来，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我退了一步，我大声叫：'李光玉。'我的眼睛给烟熏得发痛，熏得流眼泪。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李光玉叫'阿妈妮'①的

① 阿妈妮（朝鲜话）："母亲"、"妈"的意思。

声音。我着急得不得了，我觉得好像我的亲兄弟在向我求救一样。我什么都忘记了。我不顾一切地朝院子里冲进去。我眼前尽是火光，当时心里一慌，不知道朝哪里去好。可是我马上就定了神，我认出来他住的那间屋子。我自己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劲，我看见两扇矮矮的窗门大开着，我一面喊：'李光玉，'一面就踏上窗台跳进屋里去。他向着我伸出两只手，嘴里不知道在叫些什么。我一把抱住他，抱起他来，又从窗台上踏出去。我刚刚跳出屋子，窗帘给火烧断了掉下来，打在我左边膀子上，一团火正落在我左手手背上。我也不去管它，只顾抱着李光玉朝门外跑。那个时候我什么痛都感觉不到，我只想到一件事情：我救活了李光玉。我冲出大门，跑两步就跌了一跤，我马上爬起来，抱着他又朝前跑。一直跑出了村子，把他放在那棵正在开花的栗子树底下，我才觉得脸上痛，手上痛。幸而李光玉没有受伤，他小声哭了一阵，才完全清醒过来。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唤着：'王东木，王东木。'我跟他在树下坐不到一会儿，他母亲就赶回来了。她看见儿子就扑过去，母子两个抱在一块儿大声哭着。"

王敬同志突然闭上嘴不响了。他又在铺上翻一个身。我以为他还要讲下去，可是过了半天，他并不作声。我忍不住问道：

"以后呢？"

"以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他短短地答道，接着又说一句："睡觉罢。"

我们都不讲话了。我闭上眼睛，希望能够马上睡去。可

是我越想早睡，越睡不着。我一直听见他在翻身。我知道他也是醒着的。前线敌人的大炮响一阵又停一阵，好像今晚上炮也打得多些似的。

“怎么你还睡不着？”我终于又开了口。“你伤处痛吗？”

“痛？那算什么！”他激动地说，又翻了一个身。“我一闭上眼睛，就看见李光玉朝着我伸出手的样子。我在想他，我在想朝鲜的小孩。志愿军里面就没有一个人不喜欢朝鲜的小孩。你只要听听他们的歌声，看看他们的跳舞，看看他们的笑脸，他们热情地拉着你的手，亲热地喊一声‘叔叔’，喊一声‘同志’，你能够不爱他们吗？他们见惯了敌人的飞机、炸弹，见惯了敌人的大炮、枪刺，见惯了火和血，受尽了家破人亡的苦，然而他们还是勇敢地、勤劳地、快乐地生活下去，长大起来，你能够不爱他们吗？我今天所做的事不过是尽我自己的本分。我现在更明白一个人心里充满着爱的时候，他绝不会害怕危险，绝不会害怕困难。什么艰巨的任务他都完成得了。我今天做的事你将来也会做的，因为你也有这样的爱啊！……”

他终于睡着了。他那断断续续的鼾声妨碍我的睡眠。我在想他刚才的这一番话。他说得对，虽然我到朝鲜不过两个月，我也已经有了这样的爱了。可是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用行动来表示我的爱呢？……

我多么羡慕他！

1953年9月27日在上海。

后　　记

这本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短篇小说集是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在上海写成的。我在朝鲜战地生活了七个月，带回来不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可惜我缺乏一支有力的笔，写不出英雄的面貌来。因此，这本小说集只可以说是我的试作，但正如我在我的朝鲜通讯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后记”中所说，英雄们的深厚的爱、深切的恨和他们的崇高的心灵、英勇的事迹早已飞越过这里的受难的河山而活在祖国人民的心中，热心的读者甚至从草率的试作中也会看到他们所熟悉的面影。倘使这些“英雄的故事”能够把响遍朝鲜战地的英雄的声音带回祖国，让读者们受到鼓舞，那么我这三个月的劳作就得到最大的报酬了。

小说四篇中《坚强战士》和《一个侦察员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不过我自己并没有见到张渭良同志，我手边有的关于他的材料都是间接得来的。志愿军某部曾思明同志的一篇短文给了我不小的帮助，但我更应当感谢朱主印同志，他就是我在小说里最后提到的那个“年轻同志”。他把张渭良同志在病床上对他讲的话全告诉我了。李希庚同志、路坎同志、张文苑同志、孙佳林同志都跟我谈过张渭良同志的英雄事迹，我愿

意在这里感谢他们。

我见过黄山同志，也跟他谈过两次话。“故事”中写的全是真实的情景，只除了关于金永洙母亲和金老大伯的谈话。黄山同志当时并没有谈到这两位朝鲜的英雄，我把另一位战士同志的谈话移植在这里了。那天晚上跟我一块儿在老乡屋子里的刘新、李中两位同志要是读到我的小说，一定记得他们给过我的帮助。

黄文元同志不是一个真人。我把我在朝鲜遇见的几个四川青年战士给我的印象合在一起写成这篇小说。但是我那几位年轻朋友仍然强壮地活在朝鲜的战地上，我在小说的最后所写的是邱少云烈士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它太使人感动了，我想借用它来给我的平凡的文章添一点光彩。我还是感谢某部的青年团员张国礼同志(他是从四川省綦江县来的战士)：他告诉我他梦见毛主席的故事，也对我讲起他抓到美国俘虏的故事。

最后的一篇《爱的故事》写出了我的一点粗浅的体会。我在朝鲜某地认识了那个坏了腿“用镜子摄取小朋友游戏的街景”的男孩。可是自从他坐在装上四个轮子的木箱里让人拖走以后，我就失掉了他的音信。我至今还在想念他。今天，我充满着爱的怀念写这篇故事，我还存着一个希望：有一天某一位同志读到我的文章，会给我带来那个朝鲜孩子的消息。

1953年6月27日在上海。



明珠与玉姬

《明珠与玉姬》，收入作者一九五六年所作的短篇小说二篇，一九五七年四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初版。

活　命　草*

一

一九五二年秋天我在朝鲜的时候，曾经在开城附近一个村子里住过二十多天。我本来住在志愿军挖的坑道里面，可是整整一天的大雨把这个洞子冲塌了。幸亏同志们冒着雨帮忙我搬到老百姓家去，我才没有给埋在洞子里头。

这份人家姓金，家里的人除了老大爷、老大娘和守寡的媳妇以外，还有一个十一岁的小孙子。房子不大，就只有两间正屋和一间侧屋。他们全家人住正屋，把侧屋让给我住。屋顶全是用茅草盖的，侧屋的门和一扇窗子都歪斜了。廊上，就在侧屋门旁边，靠壁放了一张供桌，桌上立着一个人的牌位，是用布条盖住的，牌位前有时候供着花，有时候供着水果或者食物。我搬进来的第二天大清早，就看见媳妇在供桌前面低声哭，但是她马上揩干眼泪，放下牌位上面的布条，离开供桌，到走廊边上，伸下脚，穿上船形鞋走出院子去了。接着小孩揉着眼睛从正屋走出来，看见我，带笑招呼一声。我指着牌位问

*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六月号。

他："这是谁？"他说是他的爸爸。

小孩叫金明珠，会听也会讲中国话，说是跟志愿军叔叔们学的。他的妈妈和祖父母却只能说"你的"、"我的"、"大大的"几个中国字。有时候我跟他的祖父母讲话讲不通，他就出来充当翻译。倘使他译不出来，就"这个""这个"地哈哈笑起来了。只见他那两个乌黑的眼珠滚来滚去。圆圆脸，浓眉毛，厚嘴唇，配上一个塌鼻头。他衣服穿得少，脚上不穿袜子，一天有说有笑，而且跳跳蹦蹦。好像他认识所有这里的志愿军叔叔，他在路上碰见任何一个志愿军叔叔，都要行礼或者打招呼，或者说一声"你好"。志愿军叔叔也高兴跟他讲话，或者摸摸他的头。

他在附近一个小学里念书，早晨吃过早饭出去，下午很早就回家。他常常跪在走廊上，俯在一张小桌子上面做功课，也常常在地里帮忙母亲做事情。他在院子里来来去去，嘴里总是哼着歌子。天气好的时候，傍晚他就和附近人家的几个男女小孩在房屋前面空地上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附近一家姓朴的有一个女孩，年纪跟他差不多（他叫她做"玉姬"），他们两个感情很好。玉姬常常来找他，有时他也到玉姬家里去。老大爷和老大娘都很喜欢玉姬，还留玉姬在这里吃饭。他们用铜饭碗盛饭，用铜筷子挟菜，菜无非是马铃薯、咸菜或者辣椒之类。孩子们吃得真香。有一回金家做饺子，我看见明珠端了一碗，给朴家送去。

玉姬看见我总是笑嘻嘻的，两只漆黑的眼睛在短短的前刘海下面一闪一闪的，一根手指头衔在嘴里，天真地望着人，

真讨人喜欢。我说："玉姬，跳个舞罢。"我连说两三次，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把肩膀一端，手一举，跳起《拖拉机》① 来了。她边唱边跳，明珠在旁边和着唱。跳完一个舞，她还跳第二个。最后明珠、玉姬两个人一块儿跳起《羊山道》来。

村子离当时的停战谈判的会场板门店不远，靠近中立区，白天看得见会场区上空的四个银色汽球，晚上看得见耸向天空的探照灯光柱。敌人很少在这里投炸弹，也难得向这里发炮。大约在四个月以前这个村子里忽然落下十几发炮弹，打毁了几间房屋，伤了几个在地里劳动的女人。金明珠的母亲就在那里受了点轻伤，她现在走起路来，腿上还有点不方便。她一天很忙，除了在家里做饭，照应公婆和孩子吃饭以外，白天出去劳动，晚上常常点着半明半暗的油灯在屋子里纺线到深夜。

在这里整天看得见美国飞机。有时候一架或者两架喷气式在天空闪过，留下长串的烟痕。我们看得最多的是炮兵校正机（我们又叫它做：指炮机）。它整天在天上转来转去，给炮弹寻找目标。它常常给远远的东面那个山头引来一阵炮弹。我们看得见山头冒烟，可是这里的老百姓并不害怕它，看见它也不躲避。

有一天我睡到半夜，忽然给人叫醒了。金明珠推开房门，接连地在叫："志愿军叔叔！"我看见窗外高高地亮起一盏电灯，又听见飞机的声音，大吃一惊，连忙问："什么事？"孩子紧张地回答："快起来。照明弹。"我穿起衣服走出去。孩子拉着

---

① 朝鲜话译音，意即桔梗草，这是流行的朝鲜民歌。

我的手，说："妈妈他们到后面山上去了，我带你去。"他刚说完，连队里的通讯员来了。通讯员来接我到指导员那里去。我们三个人走到外面，看见好几个朝鲜妇女牵儿带女地躲在大树、草堆和房屋的荫影下面，慢慢地朝山上走去。树下有人在叫："明珠！"声音不大，但是我一听就知道这是玉姬的声音，我对明珠说："你跟玉姬一块儿走罢。我到他那儿去，"我指着通讯员。明珠果然跑到玉姬那儿去了。

美国飞机继续投下了十多个照明弹，在这附近盘旋一阵，就飞走了。我在天亮以前回到金家。金明珠坐在走廊上等我，看见我推开大门进来，就惊喜地叫着："志愿军叔叔，"朝着我跑来，抢着把大门关上了。我感动地问他一句："你还不睡？"他说："妈妈他们都睡了，我给你守着门。"我谢了他，回到侧屋里。我以为他回屋去睡觉了。可是我睡在被窝里，忽然听见他母亲唤他的声音。我听见他的应声，才知道他就坐在我的房门口。他母亲接连唤他几次，他才回到房里去。

第二天清早我在院子里打水洗脸的时候看见金明珠，我问他昨天夜里坐在我房门口不睡觉干吗，他说：睡不着。我洗好脸，送他到学校去，在路上我又问他几遍。他答道，他想陪他的爸爸。我紧紧捏住他的手，又问他："你爸爸喜欢你吗？"他仰起头看我，说："我爸爸喜欢我。他常常带我到地里去，他教我唱歌跳舞，他给我讲故事。……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家里过得很快活。我们家里真少不了他。他在的时候，家里不是这样。不打仗的时候，大家都过得好。要是不打仗，朴玉姬也不会没有爸爸、妈妈。"我想安慰他，刚说了一句："过去那些事情

不要多想了，"他就接下去说："我知道，我并不害怕……"我们已经走到学校门前了。

有一天傍晚八九个男女小孩在金家门前小小的空地上做各种游戏，我坐在一根长板凳上看他们玩。天黑了，孩子们陆续散去了。朴玉姬没有走，她同金明珠两个坐在我左右两边看天上的星星。我摸摸朴玉姬的头，问她，将来长大了，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毫不迟疑地答道：参加国立艺术剧场，做一个舞蹈演员。前两天有一个从平壤来的朝鲜人民代表团，带着由国立艺术剧场一部分歌舞演员组织成的"艺术团"到这里演出，慰问志愿军。我带着这两个小孩去看过"艺术团"的精彩节目：舞蹈、唱歌，和一个小小的歌舞剧：《一封信的故事》。玉姬看得特别高兴，她很羡慕那个年轻的舞蹈演员。我也问过明珠：长大了要做什么事？他昂着头回答："当人民军。"我含笑说："等你长大，战争一定早结束了。"他大人气地答道："我保卫祖国，不让敌人进来！"他也许想到《一封信的故事》里面那个人民军战士罢，我刚刚这样想，玉姬就在旁边插嘴说："他要替他爸爸报仇。"他接着说："志愿军叔叔已经替我爸爸报了仇了。"他虽然这么说，但是他一提到爸爸，脸色就变了。他眼里含着泪说："我的爸爸是在敌人撤退的时候给杀死的。"他停一下又说："玉姬的爸爸给敌人带走了，她妈妈前几个月给炮弹打死了，她现在住在她姨妈家里。"玉姬不大会讲中国话，但是半懂半猜地明白了他说的中国话的大意。她的脸色也变了。她偎在我的身边，挽住我一只膀子，连声问道："志愿军叔叔，你说，他们会杀死我爸爸吗？"我安慰她说："不会的，

不会的，他们不敢。”金明珠却粗暴地在旁边插嘴说：“会的，会的。”朴玉姬挣红脸说：“不会！不会！”我推一下金明珠的膀子，暗示他不要再讲那种话。可是他好像在生气，只顾照自己的意思讲下去：“会的，会的！我听说，他已经给敌人杀死了！”朴玉姬流出眼泪，大声说：“不会！志愿军叔叔也说不会！你瞎说，你骗人！”她讲的都是朝鲜话，金明珠对她讲的也是朝鲜话：“我不骗你，你的爸爸已经给敌人杀死了，我将来会替你的爸爸报仇。”朴玉姬哭着说：“我的爸爸没有死！他活着，他活着，你撒谎！我不跟你好了！”金明珠生气地回答：“他现在还活着，就是在给敌人做走狗！我是为你好，才说你爸爸被杀了。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他吵架似地站起来，走开了。朴玉姬在我旁边伤心地哭起来。我慢慢地用话劝她，替她揩干眼泪，好容易把她劝得不哭了，她规规矩矩地坐在我身边，望着星星出神。

这个时候金明珠的母亲捧着一个碗从院子里出来，到什么人家去了。附近一带静悄悄的。金明珠几次走进院子去又走出来，好像还在生朴玉姬的气似的。我接连唤他几声。他终于又坐到我旁边来了。女孩看见他，就噘起嘴，把脸掉开。他也不理她。我看见金明珠有一点懊悔的意思，便温和地批评他不该动气。我只说了几句话，就使他安静下来。两个人不再吵架了，可是都不讲话，谁也不理谁。我觉得像这样僵下去不大好，就想了一个收场的办法。我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罢。”两个人马上齐声说：“好。”我看看她，又看看他。我喜欢两个人的同样又黑又灵活的眼珠。我对金明珠说：“我讲中

国话，你得翻译给玉姬听啊。行不行?”他点点头，说:“你快讲罢。”

我给这两个孩子讲了一个故事。

二

“从前，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个小孩住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的父亲是朋友，他们两个从会走路的时候起，就常常见面，常常在一块儿玩。他们是同一年生的，姓张的比姓李的只大几个月份。

“乡下的日子一直过得不好。并不是地不肥，地长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可是绝大部分都给地主和公差拿走了。在乡下很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张家和李家也是这样。两个小孩看惯了父母的愁眉苦脸，他们也帮忙家里人干活，也跟别的孩子们一块儿放牛。他们在山坡上放牛的时候，常常谈起各种各样美好的事情，谈起他们自己做过的好梦。他们梦见：山坡上开满好看的花，地里到处都是快乐的歌声，太阳整天不落，仓里装满粮食。每一家人都住在干净的瓦房里，每一个小孩都在学堂里念书。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幸福的笑容……他们梦见的事情太多，他们越谈越有劲，他们越谈越相信他们在梦里看见的事情不是假的。小张先说：‘这一定是明天的事情。’小李接着说：‘对，明天就会实现。没有地主，没有公差，大家快乐地过日子多么好。’两个小孩的心思一样，语言也一样。他们在一块儿即使不开口，也不会觉得寂寞，好像你已经看透了

我的心，我已经看透了你的心似的。两个人一天不见面彼此都觉得仿佛丢了什么东西一样。

"两个人一天天地长大起来，虽然仍旧吃不饱，穿不暖，可是两个人都活得很健康。我并不是说，他们变成了两个大力士，一只手举重千斤。我是说：穷苦并没有把他们的背弄弯，并没有把他们的眼光缩短。他们仍然相信明天大家就会过快乐的日子。他们用尽力气帮父母干活，想尽办法改变生活。他们从来不灰心，干活干得累了或者事情失败了，他们只要在一块儿谈几句话，彼此用鼓励的眼光看看对方，疲劳和失望好像马上就飞走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胸膛里有双倍的火热的心。

"他们的努力好像没有一点用处，他们始终没法叫自己的父母发出快乐的笑声。天空整天布满大片的黑云，太阳越来越少见面了，不断地吹起冷风，扬起大股的灰尘。接着就来了荒年。生活越来越困难了，他们父母的背也越来越弯下去了。村子里到处都听得见叹息，到处都听得见哭声。天完全暗下来，从此就不见了白天，不见了太阳。地主的狗腿子和公差打着灯笼到处跑，凶恶地催租、催税。人们躲在家里挨饿，等着太阳出来。水井里发出恶臭。瘟疫流行。有一天小张的父亲死了，他刚刚把父亲埋好，母亲又死了。小李陪他流眼泪，想尽方法安慰他。小张哭够了，揩干眼泪对他的朋友说：'死了的人不能再活转来了。可是活着的人还可以不死。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我要出去寻找太阳，寻找我们梦里那个永远不落的太阳。'小李问他：'要是你找不到太阳呢？'小张回答：'找

不到太阳我宁肯死在外面也不回来。'小李紧紧握着小张的手，说：'好，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太阳，哪怕走到天边，我也情愿。'

"两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就这样离开家乡寻找太阳去了。到处都是黑暗，他们没有灯笼，永远摸索着往前面走。他们走过一片哭声的城市，也走过没有人迹的深山。他们听见人们诉苦的话，也听见虎、狼的叫吼。他们吃干粮，吃水果，吃草根、树叶。睡在人家的屋檐下、深山的草丛里。两个人睡在一处，两只手紧紧捏在一起。他们永远怀着希望，好像始终有一线光明在给他们引路。常常不是小张就是小李发问：'你累吗？'另一个就回答：'不累！'发问的人也就说：'我也不累。'一个人问：'你饿不饿？'另一个人就回答：'不饿！'他们找到了什么可吃的东西，总是愿意自己少吃，让朋友多吃。

"有一天不知道怎样小李从山上跌下去，一直跌到山脚。小张不顾一切地跑下山去找他，居然在山脚岩石上找到了。小李受了重伤，满身是血，不住地呻吟。小张扑到他身上去，唤他，用手绢揩他脸上的血。小李含着眼泪说："你一个人往前走罢。我不能够陪你走了。只要你活着，只要你找到了太阳，我就是死在这里也甘心。'小张哭着说：'你不会死。我不能把你丢在这儿，一个人去找太阳。'他把小李背在背上，走到村子里去。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人家，在那里放下他的朋友，可是小李已经不省人事，手脚也都冷了。别人劝他把小李埋在土里。他不肯，他不相信小李会死。他唤小李，小李不应；他摸小李的胸口，那里还有一丝热气。人们嫌他固执，谁也不肯

收留死人。他却说小李并没有死。他宁愿睡在露天里、冰冷坚硬的石头上，也不肯抛开他的朋友。

“他一连守了两天，小李胸口上那一点热气仍然不散。天忽然下起一阵冰雹来。他耽心朋友的身体再受到损害，就伏在小李的身上，让自己给冰雹打得一身疼痛、头脑昏昏沉沉，免得小李的那点热气消散。一个老年人同情他，就走过来劝他走开，劝他不要干这种无益的事。老人说，他的朋友一定会死，除非有人找到‘活命草’用来延命。小张听说，便拉住老人苦苦哀求，要老人说出生长“活命草’的地方。老人用怜悯的眼光看他，摇头说，即使找到活命的仙草，没有人肯牺牲性命，也无用处，因为‘活命草’需要用活人的鲜血来培养。小张说，他愿意为朋友牺牲性命，只求老人帮助他找到活命的仙草。老人望了他半晌，忽然说一声‘好孩子’，就微微笑起来：‘这种草并不难找到。这种草就生长在你们来的那座山上。’老人接着向他解释：倘使他把草挖起来栽在地上，用自己的血来培养它，等到蓝色的草叶变成红色，就把它们摘下来捣碎放在死人嘴里，连死人也可以给救活。

“小张马上爬上山去，在半山找到了那种蓝色的药草，带回来种在路旁。他一边照应小李，一边照老人的吩咐，用锥子刺在自己的腿上，他忍着痛，不断地把血滴到草叶上去。起初草叶反倒显得更蓝了。后来他的两只腿痛得麻木，草叶才慢慢地泛起一点红色。他兴奋地对自己说：‘小李不会死了。’他多高兴！就用力把锥子刺得更深些。伤口越是痛得厉害，血越是流得多，草叶也越是红得快。不到一天的功夫，草叶完全

变红了，可是小张的脸已经白得像一张纸了，等到他把草叶捣碎，放进小李的嘴里，刚拿开手，自己就晕倒在地上了。

“小张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小李正跪在他旁边，用布片绑他腿上的伤口。他放心地唤了一声：‘小李，’他微微地笑起来了……”

三

我讲一段，金明珠就翻译一段给朴玉姬听。朴玉姬忽然把我的左手紧紧地捏住。我听见她接连地催金明珠：“快，快。”

一个白色人形从草堆后面转出来，朝我们这面移动。我看出来这是金明珠的母亲，她走到我们跟前，打岔地说一句：“玉姬，你姨妈在找你，快回去！”她走进院子里去了。

“我就回去，”朴玉姬答道，她用力摇我的膀子，激动地小声说，“志愿军叔叔，快讲下去，快讲下去！”

我说：“已经讲完了，你回去罢。”

金明珠接着说：“没有讲完，后面一定有！”朴玉姬也说：“后面一定有。他们究竟找到太阳没有？小张是不是死了？……”

我爱怜地责备金明珠和朴玉姬：“你们真是好奇的孩子！故事哪里会讲得完？不用说，小张没有死，小李也没有死。他们继续去寻找太阳。究竟他们找到太阳没有，我不知道。不过请你们自己想想：明天会不会有太阳！你们看：天上那么多

的星星！板门店的光柱今晚特别亮！”

朴玉姬站起来，说：“志愿军叔叔，谢谢你，我回去了。明天我们还要来听你讲后面的事情，后面一定还有很长很长的……”

“小张同小李的事情，”金明珠插嘴说，他也站起来了。他听见女孩对我说：“再见，”便亲热地对她说一句：“玉姬，我送你回去！”两个孩子手拉着手转过干草堆不见了。他们讲话的声音还随着凉爽的晚风送到我的耳边来。

1956年5月在上海。

明珠和玉姬*

一

我第二次去朝鲜，是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半个月的光景。

过了一个月，我到开城附近金明珠的村子里去。我仍然住在金明珠的家里。一年不见，金明珠这个孩子长高了。我到他家的时候，没有看见他。他放学回来，听说我来了，放下书包连忙跑到我房里，一见面就用两只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嘴巴笑得闭不拢来。他那一对乌黑的眼珠显得更亮、更黑了。"志愿军叔叔，你真来了！"他好像见到了亲人一样。

我用左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带笑地看看他，说："你一点也没有变，只是中国话讲得更好了。"

我还是住那间上次住过的侧屋。屋子似乎干净了些，歪斜的门和窗都修整好了，而且屋里多了一盏电灯。廊上原来有一张立着金明珠父亲牌位的供桌现在也撤掉了。此外，就没有什么改变。院子里开着草花，水井管子仍然立在那个不

*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号。

曾蓄水的小池子旁边。

金明珠的祖父和祖母身体好像比从前好，看见我，有说有笑，问长问短。金明珠的母亲的脸上笑容也多了，不过还是不喜欢讲话，走路时，腿上的毛病也看不出来了。

晚上我从连部走回金家，月光照亮了路，我走过田坎的时候，仿佛闻到一阵一阵的稻子香。我看到密密的一片长得很高的水稻，心里非常高兴。田里淙淙地流着水，好像小孩们躲在稻子丛中小声讲话一样。

"志愿军叔叔，"一个年轻的声音在后面叫我。我马上听出来是金明珠的声音，便站住回过头看他。他跑到我跟前，拉住我的膀子含笑说："我赶上你了。"

"你到哪里去了？"我对他笑笑，问了一句。

"我从李老师家里来。李老师打摆子，我给她送点桃子去，"他答道。

我们一边走，一边谈话。我向明珠问了些学校里的事情，他答得很详细。他得意地告诉我，学校刚搬了家，还是志愿军叔叔们帮忙修建的新房子。（我后来才知道学校的房子是村里人自已动手修建的，志愿军不过出了一点人力罢了。）

我们走到明珠家前面那棵大树底下了。我看见他们家左面那间临街屋子的门窗打开了两扇，射出来不太亮的电灯光，三四个孩子立在廊上，身子贴着门窗朝里望。有人在屋里一块挂在墙上的黑板上面写粉笔字。我听见十几个女人的声音在念朝鲜文："我们国家，民主朝鲜，我们国家，人民的国家……"

这是朝鲜小学国语课本的第一课。女人们念得很高兴，老师用手指指黑板，她们跟着念黑板上的粉笔字，念完一段，就有人发出笑声。

“你们在做扫盲工作，”我对明珠说。

明珠不见得就懂“扫盲”两个字的意思，但是他点点头，说：“停战了，许多事都做起来了。”

“你高兴吗？”我问他。

“大家都高兴，”他答道。

我朝天空望了望，板门店那面的探照灯光柱不见了，好像天显得更大、更蓝似的。可是我隐隐约约地听见了飞机声。

明珠看见我望着天空不作声，他好像猜到了我的思想一样，一边望天，一边解释：“美国飞机还是天天在飞。夜里听得清楚些。”接着他又问我：“志愿军叔叔，你说美国飞机干吗还天天飞？不是停战了吗？”

“谁知道他们干什么鬼把戏？总不会有好心思的。不过我们也用不着害怕，”我简单地答道。

“志愿军叔叔说得对，我不怕，”金明珠说，“不过我恨美国飞机，玉姬也恨。”

他提到“玉姬”，我就马上想起椭圆形脸上短短前刘海下面的一对漆黑的眼睛，我问他：“玉姬呢，怎么没有看见她？”

“她就要跟她姨妈搬走了。她姨妈不是我们这里的人，是逃难来的，”明珠答道。

“她什么时候走？”我又问一句，我记起来朴玉姬小姑娘是金明珠的好朋友。

"下个月，"明珠短短地回答，但是他马上抓住我的一只手问我："志愿军叔叔，你还记得玉姬吗？"

"我记得她说过她要做个舞蹈演员……"我说，我想想，笑了起来。我仿佛看见朴玉姬轻飘飘地举起两只手，偏着头跳朝鲜舞。

"她做不成演员了，"明珠忽然打断了我的话，好像生气的样子。

"为什么呢？"我诧异地问。

金明珠告诉我：半年前有一天傍晚美国飞机经过这里，向村子里投了三个小炸弹，毁了几间房子，朴玉姬给埋在房子底下，救出来医治了两个月，现在左脚还有毛病。

我很想马上去看朴玉姬，又觉得晚上去不大方便，我就说："我们明天去看她。"

"现在去不去？她姨妈在念书，玉姬在家里，不会睡得这么早，"金明珠怂恿我道。我知道他的心思，我就答应了。

二

金明珠把我领到朴玉姬家里。大门开着，房里有灯光，有人在纺线。金明珠大声讲朝鲜话："玉姬，志愿军叔叔来了。"

小姑娘在房里应了一声，就推开糊纸的窗门走出来。我们已经走到廊前，我不让她走下来，就用朝鲜话问她："玉姬，你还认得我吗？"

玉姬借着房里射出来的电灯光看我一眼，马上用两只手

捏住我左边膀子摇了摇，高兴地笑起来，说："认得，认得。……志愿军叔叔，你到底来了。"她笑着笑着，声音变了，她抬起手揩眼泪，肩头不停地一上一下。

"玉姬，你怎么啦？"明珠吃惊地问道。

我看见她流眼泪，心里也有点难过。我装出笑容拉她坐下来，一面说："玉姬，你坐下，我们慢慢谈。"我也在廊上坐下。我又问她："你好吗？"

"我很好……我们常常想着你……上次美国飞机投炸弹，我还以为会见不到你了……叔叔，你到底来了……"她兴奋地说，她好像想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可是她激动得厉害，两只眼睛一直盯着我，说不下去。她的相貌没有多大的改变，似乎比去年瘦一点，白一点，颧骨显得高一点，眼睛也显得大些了。

我紧紧握住她的一只手，温和地说："现在停战了，你可以好好地念书了。"

她点着头接连说了几个"是"字。一边揩眼泪，一边笑起来。金明珠就插嘴告诉她，我还是住在他家里，又讲了他今天看见我的情形。他们两个又谈起了别的事情。

玉姬微微斜着身子，跪坐在走廊上，讲得高兴的时候，她埋下头咯咯地笑着。她刚笑过，又起劲地对明珠讲学校里的事，我在旁边注意地看她，我看不到她左脚的伤痕。

"啊哟，我忘记了，"她正讲得起劲，忽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就站起来，走进屋去了，接着捧了几个桃子出来，放在我面前，说："志愿军叔叔，请吃！"她又递了一个桃子到金明珠的手里。

我这时才注意到她的左腿虽然有点瘸，可是走起路来也并不太吃力，我觉得心里轻松了些。金明珠开始吃桃子，一面吃一面讲话。

“志愿军叔叔，吃啊，”朴玉姬看见我不吃，就拣了一个桃子塞到我手里，一定要我吃。我没法推辞，就掏出手绢把桃子上的细毛揩掉，吃起来。

“你不吃？”我问她。

“我吃过了，”她笑答道，高兴地望着我，两颗漆黑的眼珠不停地转来转去，忽然说：“志愿军叔叔，哪天给我讲个故事啊！”

“好，”我爽快地答应了。我摸摸她那剪得短短的头发，这个时候我真愿意答应她任何的要求。

我们离开的时候，她的姨妈还没有回来。她一定要把我们送出大门。她站在门外挥着手连声叫：“志愿军叔叔，再见！”

我走了好几步，回过头，还看见这个十二岁姑娘的白衣白裙的瘦小身形，还听见她那充满感情的声音。

三

第三天早晨我和金明珠一块儿出去。我们同走一段路，在一个歪斜的十字路口分手了，我回过头还看见他朝着山脚新建的校舍飞跑，追赶几个走在前头的男女同学。学校门前有二三十个穿红色、绿色和白色衣服的小孩在一块儿唱歌

游戏。

傍晚前我从连部回到金家，满脸须根的副连长跟我同路，他说是要看看我住得怎样。他一路上尽遇见熟人，大家全称他“副连长同志”。小孩们也跑过来迎接他。

“副连长，我看整个村子的老百姓都是你的朋友，”我羡慕地说。

“当然啦，我在这儿住了一年啦！”副连长满意地笑答道。“老实说，我爱上了这个地方啦！”

我们到了金家，一群小孩正在门前小小空地上做游戏。金明珠第一个看见我们，就跑过来打招呼。副连长拉住他的手说了两句话。我忽然注意到朴玉姬在跟一个身材比她高一些的女孩讲话，就朝着她走去。她也看见我了，便挽住那个女孩的膀子慢慢地走过来。

“志愿军叔叔，我去看过你，你不在家，”玉姬含笑说，两个女孩都站住了，玉姬仍然紧紧挽住她的朋友的膀子。

“你知道，我白天不在家。这个时候你来就会看见我，”我也带笑回答，我感谢她的拜访。

她看看我，动了两次嘴，才说出来：“我到你房里去过了。”她忍住笑又接下去说：“你不要责备我啊，我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我顺口问了一句，我还以为她在开玩笑。

“我把你那件衬衫拿去洗了……”她又掩住嘴笑起来。

“你拿去洗了？为什么不先跟我说？”我惊讶地问，我为了自己的疏忽着急起来。我早晨换了衬衫，把穿脏了的塞在枕头底下忘记带出去。

“我没有看见你啊，”她满意地笑着，又加一句：“你在家一定不让我拿去洗。”

“你真调皮！”我说着轻轻敲一下她的头。我找不到责备的话，也找不到感谢的话，我就说：“我自己会洗啊。”

“玉姬，下次不可以啊，”副连长在旁边插嘴说；“你要当心你的脚。”他关心地朝她的左脚看一眼。她穿着敞领学生服，系一条短短的黑布裙，裙下是大裤脚的粗白布裤子、袜子和黑色船形胶鞋。

“副连长同志，报告你，我的脚没有问题。‘向前走’、‘向后转’都行，”玉姬突然立个正，举起手向副连长行个军礼，说完又掩住嘴哈哈笑起来。

“玉姬，不要开玩笑了，唱个歌罢，”副连长也忍不住笑起来。金明珠和别的几个孩子都笑了。

玉姬点点头，马上就唱起来，接连唱了两个中国歌：《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和《我是志愿军》。

李顺姬（就是玉姬的女朋友）、金明珠和别的孩子都跟着她唱。有的孩子发音准，有的孩子唱的不像是中国话。不过他们唱得很认真，而且声音里有感情。

副连长第一个拍掌赞好，他说：“再唱个朝鲜歌罢。”

玉姬又唱起《拖拉机》，她不由自主地举起双手，孩子们一下子都散开，边唱边转着身子跳起朝鲜舞来。玉姬没有跳舞，她仍然站在我们的面前，手举起又放下了。副连长伸出手去，在她的头上摩抚了两下。她的眼睛向上看，脸上仍然带笑。

金明珠没有参加舞蹈，他走到我旁边，拉住我的一只手，

一边唱歌，一边看玉姬。

"志愿军叔叔，到你的房里去，"金明珠小声对我说。

我懂他的意思，我刚回答一个"好"字，副连长听见了，就接下去说："我去看你的房子。"他又用朝鲜话对玉姬说："玉姬，我们到里面去。"

孩子们刚开始唱第二首歌，玉姬默默地跟着我们朝金家大门走去，刚跨进门槛，听见李顺姬的声音在叫"玉姬"，她回头一看，对我们说："我等会来，"便又跨出去了。金明珠跟着我们走进侧屋，但是马上就不见了。

"我看见他们就想起我自己的孩子，"副连长从侧屋走出来，坐在走廊边上，眼睛朝大门外看，出神地说，他很和善地微微一笑。

"你有几个孩子？"我坐在他的旁边，顺口问道，我知道他早已过了三十岁了。

"两个，一男一女，大的一个年纪跟明珠、玉姬差不多，在家里上学，照顾得很好，"副连长慢慢地回答，眼睛仍然朝门外看。

我站起来，我不想坐了。我心不在焉地说："我喜欢这些孩子。"

"对，我喜欢，"副连长好像在自言自语。他看见我走下石阶，到院子里去，就跟在我后面。我们走到大门口。他忽然激动地说："这几年在朝鲜我看见过多少小孩的尸首。我心里真难过，好像自己的孩子给人杀死一样！我真恨敌人。就像玉姬——"他说到这里突然不响了。

我看见了玉姬：她脸上带笑，嘴在动，身子在转，两只手非常灵活地一上一下……她在跳舞。跳的不止她一个，还有两个女孩。六七个孩子在旁边唱歌助兴。

玉姬跳得很高兴，另外两个女孩也很高兴，别的孩子都很高兴。

副连长站住，用朝鲜话叫了一声“好”。

玉姬越跳越起劲，越跳越快，她兴奋得一张脸通红。我很高兴，我也替她高兴：她仍然能够跳舞。

我刚刚拔步朝她走去，忽然看见她的身子一侧就倒下去了。我吃了一惊，只听见孩子们在叫玉姬。我连忙跑过去，副连长也过来了。

金明珠扶着朴玉姬站了起来。孩子们围着她问：跌坏没有？玉姬脸上仍然带笑，她接连说：“不要紧。”

副连长接着吩咐明珠：“你送玉姬回家去休息罢。”

玉姬虽然摇着头说：“不要紧，用不着休息，”可是她终于让明珠扶着走了。她还回过头来，含笑地向大家挥手说“再见”。

孩子们继续在跳舞、唱歌。副连长提议：“到玉姬家去看看。”我们两个跟着明珠和玉姬的脚迹走去。

四

夜色已经在我们不知不觉中降了下来。两个孩子的背影就在前面路上，轮廓非常清楚，可是显得柔和。他们走得很

慢。玉姬的左手搭在明珠的左面肩头，她把左脚尖轻轻挨着地面，单单用右脚走路。我忍不住在后面唤了一声："玉姬。"

两个人同时站住了，玉姬回过头来看我们。

我们走到他们跟前，对玉姬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玉姬有说有笑地回答我们。她说，今天跌一跤是她自己不当心。她半年没有跳舞了，过几天她要好好地跳舞给我们看。

我们一边谈话，一边走，虽然走得很慢，不久也就走到朴家了。

副连长在大门口站住，温和地对玉姬说："我回去了。你好好休息罢。我明天来看你。"他轻轻地拍两下玉姬的膀子。

"副连长同志，再见，"玉姬刚说出这几个字，就扑到他身上呜呜地哭起来了。她接连地说着一句话："我要跳舞啊……"金明珠吃惊地唤她，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我望着副连长。副连长轻轻地摩抚玉姬的短发，不作声地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用朝鲜话说："你一定能够跳舞，一定……玉姬，好啦，朝鲜女孩不应当哭。"他扳起她的脸，替她揩眼泪。

"我不哭，我不哭，"玉姬呜咽地说，便离开了副连长。

"是啊，朝鲜女孩是不哭的，"副连长点头说，"那么我走了。"他又对我说："你坐一会儿罢。"我答道，我要回金家去，玉姬却挽留说：

"志愿军叔叔，你不要走。"

我们跟副连长说了"再见"，我就和玉姬、明珠两个走进院子去了。

正屋里亮着电灯，有人在纸糊的门窗里面问："谁呀？玉姬吗？"

玉姬和明珠都讲了话。门窗推开，一个白衣蓝裙、身材矮小的圆脸少妇走出来。我认得她是玉姬的姨妈，就跟她打了招呼，她热情地讲了几句欢迎的话，要我进屋去坐，我就在走廊上坐下来。

玉姬的姨妈告诉我，她停战后接到丈夫的信，说是他受过伤，已经复员，现在在平壤工作，要她到他那里去。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两年多不知道她的下落，她也以为她见不到他了。她很兴奋，很高兴，她好像忘记了过去的痛苦，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她的幸福全讲给我听。她最后说："他今天又来了信，要我马上动身……"

玉姬和明珠一直在旁边注意地听她讲话，到这个时候，玉姬忽然插嘴问道：

"这么快！什么时候走？"

"我想后天早上就走。"

玉姬和明珠同时小声地叹了一口气。我在心里也跟着这两个小孩叹气。我为他们后天的分别感到难过。

明珠忽然噘起嘴说："你原说下个月走。"

姨妈高兴地答道："他今天来信说，房子已经弄好了，催我们去。我当然早些去。"

明珠又问："婶子，你们还回来吗？"

姨妈顺口说："不回来了。我们在那边安家了。"

明珠不做声了，玉姬对他小声讲起话来。

我又跟姨妈谈了几句话，心上好像搁着一块石头，觉得坐不下去，就告辞了。

明珠说："志愿军叔叔，我跟你一块儿回去。"他就站起来。玉姬也跟着他往外走。我们走出大门，听见姨妈关心地大声说："玉姬，不要走远了，早点回来啊。"

玉姬答应了一声。我就说："玉姬，你回去罢。"玉姬又答应了一声，可是仍然跟着我们往前走。

金明珠忽然站住了，他对玉姬说："玉姬，我将来一定到平壤去看你。你要写信来啊。"

玉姬点头说："我一定写信给你，你也要写信啊。"

"我写，我写！"明珠接连地说，最后又加两句："你回去。当心你的脚啊。"

我说："玉姬，回去罢，明天见。"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玉姬拉起我的手说："志愿军叔叔，我还说哪天听你讲故事呢！想不到就只有明天一天了。"

她还做一个笑脸。我怜悯地拍拍她的肩头，温和地说："不要紧，我们还有时间。你明天吃过晚饭来，我给你讲故事。"

她笑笑，说："谢谢你，我明天一定来，我还要给你送衬衫来！"接着她又大声说："志愿军叔叔，再见！明珠，再见！"就掉转身，一歪一斜地走进去了。

我和明珠一路上不讲话，快要到家的时候，明珠忽然抓起我的手捏得很紧，一面央求道："你明天就给我们讲'活命草'

的故事罢。”

“我去年不是讲过了吗？”我问道。

“我想再听那样的故事，”他说。

我觉得我很了解他的心情，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地拍拍他那只手，安慰他道：“你不要难过，你跟玉姬一定会再见面……我明天就讲好朋友再见面的故事。”

五

“明天”晚饭后，朴玉姬把洗得很干净、熨得很平的衬衫给我送来了。我在侧屋里招待她和金明珠，请他们吃中国的水果糖和罐头菠萝。这天早晨司务长到团部供销站去领物品，我请他代买了这些。

他们高高兴兴地吃过了菠萝，睁大两对天真的漆黑的眼睛望着我。我心里充满了爱，好像有许多话要从我的胸膛里冲出来一样，我激动地讲着故事，可是我却觉得：话不听我指挥，故事自己从我的嘴里奔跑出来了：

“从前，没有多少年以前，两个好朋友住在一个小县城里。两个人在一起长大，年纪还不到二十。这两个人跟你我差不多，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有幻想，也会做梦。他们不是‘活命草’里找寻太阳的小张和小李，他们是两个小店员小周和小王。两个人都生在贫苦人家，不同的是小周有父有母，小王住在姑母家中，他还有一个姐姐嫁在远方。

“小王姑母家隔壁有一位年轻姑娘，她跟小王在一个小学

里念书，毕业后也常常见面，两个人性情投合，产生了爱情，他们私下订了婚约。小周想到他朋友的未来的幸福也很高兴。

“姑娘本来出身贫苦人家，可是她的父亲后来发了财，离开了简陋的平房，住进了高大的洋楼。姑娘的感情始终不变，她一直爱着小王，而且准备走出洋楼，嫁到王家，或者跟小王一路远走高飞。

“然而到了紧要关头，父亲出来干涉。他不但不许女儿再跟小王来往，他还用种种手段强迫女儿顺从父亲的意志，最后他把女儿嫁到一个有钱人家。

“小王用尽力量想争回自己的幸福，想帮助姑娘脱离囚笼。小周为了朋友也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可是他们的努力毫无用处。姑娘终于屈服了。小王要再见她一面也不可能了。

“小周看见小王一天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心里很难过，就劝他：‘忘了那个姑娘罢，将来另外找一个还不是一样！’可是小王忘不了她，好像每条街上都有姑娘的脚迹似的，他每走一步路，就看见姑娘的背影在前面晃动。

“小王没法在这个小县城里再住下去，他决定到远方去找他的姐姐。小周说了许多挽留的话都没有用。小王动身的那天，小周陪他走十几里路，送他到火车站，一路上两个人边讲话边流眼泪。小周不断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他知道小王不会回到这个地方来了。小王流着泪说：‘我不会回来，你不会出去，我们怎么见面呢？’

“两人分别的时候，小王拉着小周的手，说：‘我们一定要

见面。我们就约定要——十年以后的今天，这个时候，在京城御河桥桥头见面。'小周接着补一句：'要是谁结了婚，生了孩子，就把家里人全带去。'

"他们就这样地分别了。小王给小周来过两封信，以后就再没有信来。小周写信到小王姐姐那里去，过了几个月原信退回，说是受信人搬了家。后来小周也换了工作，结了婚，生了孩子。可是音讯中断以后，两个好朋友连彼此的死活都不知道了。

"十年过去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小周已经带了妻子和一男一女到了京城。他们全家四口站在御河桥桥头，等候分别了十年的小王，从十一点钟等到十二点，并不见小王的影子。妻子对丈夫说，小王不会来了。'十年前一句空话怎么能够相信？'

"小周说：'小王一定来，他绝不会失信。'小周在桥头走来走去。他的妻子心里暗笑，'怎么会有这样傻的人，居然为了十年前一句空话跑到京城，到桥头空等！'

"小周左等右等都等不到小王，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十多分钟了。'是不是小王遇到了不幸？'小周想着，就着急地搔自己的头发。

"一个人起先在旁边打量小周，现在忽然走到小周跟前问一句：'请问你是不是姓周？'小周答应一声'是'。又问：'你是不是周某某？'小周又答应一个'是'字。他认出那个人是送电报的人，马上就想到那个人可能带来了小王的消息。那个人笑起来，递一份电报给他，高兴地说：'这封奇怪的电报我们都

认为无法投递，现在居然送到了。请你签个名罢。’

“电报上写着：‘某月某日十二点钟在京城御河桥桥头交周某某收。’然后接着：‘我生病，住在某某市某某医院，不能按时到京城和你见面，请原谅。’最后署名‘王某某’。

“小周高兴地把电报递给他的妻子，一面大声说：‘他还活着，他还活着。我们就到某某市去看他。’

“第二天小周带着妻子到某某市某某医院去看小王，才知道小王患重病，施过大手术，现在躺在医院里休养。小王还只是孤零零一个人，小周夫妇在某某市住了将近三个星期，照料小王出了医院，搬回住处，安顿好了，才带着儿女回到故乡。过几个月小王也到小周夫妇家中作客……”

六

还是照去年的老规矩，我用中国话讲故事，金明珠译成朝鲜话给朴玉姬听。我讲一段，他口译一段，明珠口译得并不慢，然而玉姬还是不断地催他：“快，快。”

他们两个起先坐在我对面，以后越来越移近我，后来就一个靠在我左边，一个靠在我右边。等到我闭上嘴，他们还急切地问：“以后呢？”

“以后没有了，”我短短地回答。看见他们呆呆地不作声，我又加一句：“总之，两个人都活得很好。”

“他们应当活得很好，”金明珠高兴地说，接着他走到朴玉姬跟前蹲下来，对她说：“玉姬，我一定到平壤去看你。”

“可是不要等到十年啊，”玉姬说着就笑了。

“十年？我才没有那种耐心！一年罢，”明珠着急地说。

“地址有了，就用不着到桥头空等了，”玉姬笑道，好像在讲一件有趣的事情似的。

“不过你的地址要是改变了，一定得先通知我，”明珠说。

“那么你也一样，”玉姬说。

“我们通信不要中断啊，”明珠说。

“我会写信的，你也得多写啊，”玉姬说。

“我们就这样约定罢，”明珠说。

玉姬笑着拍手说：“好，好。志愿军叔叔给我们做证人。”

我在旁边看他们两人带笑讲话，很高兴，到这时就笑着插嘴说：“我做证人，我做证人。”

接着我跟他们讲了几句笑话，玉姬笑得弯腰，明珠哈哈大笑。明珠笑够了时忽然一本正经地对玉姬说：“明天你们去开城搭火车，我送你到开城。”

“你不要送我们，你明天要到学堂去，”玉姬望着他说。

“我明天不用去学堂了，我今天请好了假，”明珠得意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我还可以替你拿行李。”

“我自己会拿，我自己会拿，”玉姬摇着头接连说了两句。

“我替你拿，”明珠又说一次。

“我不要你拿，我不要你拿，”玉姬仍然接连说了两句，她显然是不愿意别人可怜她。

“好，你自己拿，”明珠赌气似地说。他站起来，就往外走。

“明珠！”我着急地唤了一声，我觉得他不应当这么容易

动气。

明珠马上回转来，把红着脸噘着嘴的玉姬望了一下，忽然用很亲切的声音说："玉姬，你的脚还没有治好，你要当心啊，"就在她的身边坐下来。"我替你拿拿行李有什么关系呢？"

"你要拿就拿，不过你不要跟我生气啊，"玉姬带哭声地说。

"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明珠带笑地说。"我再生气，你就不理我，志愿军叔叔也不理我，大家都不理我。"

我就插嘴说："你们先前还要我做证人，现在就在说生气不生气的话，我这个证人也不要做了。"

他们两个都有点懊悔，听见我这么一说，马上挨到我身边来，向我解释，吱吱喳喳地讲了一阵，我听得心里只想笑。我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又摸摸那个孩子的头，我真喜欢他们。

"玉姬，玉姬，快出来！"李顺姬站在院子里叫道。

"什么事？"玉姬从开着的一扇窗里伸出头去问道。

"快出来玩，我们等着你，"李顺姬走到窗前说，她带笑地招呼了我。

"快去，明珠也去。就只有这几个钟点了，玉姬，还不跟你那些朋友好好地玩一阵？"我催他们出去玩。

两个人你望我、我望你地过了一阵，笑着说一句："志愿军叔叔再见！"就走出屋子，下了走廊，穿上鞋子，跑到外面去了。

不到一会儿功夫，我听见外面孩子们的歌声，在我的耳朵里朴玉姬和金明珠的声音好像特别响亮，特别动人。

七

晚上，外面临街屋子里妇女们琅琅的念书声和断断续续的笑声夹杂在一起。朴玉姬的姨妈带着玉姬到金家来了，她们跟金明珠的祖父、祖母和母亲谈了一会儿，也向我告了别。她们走出院子，玉姬跟明珠还站在大树底下叽叽咕咕地讲了一阵话，后来还是她的姨妈催促她走了。

第二天大清早，朴玉姬和她的姨妈步行到开城去。金明珠果然提着一个包袱跟她们同行。姨妈头上顶着一个很大的白色包袱。玉姬头上也顶得有一个淡青色小包袱，左手还拿了一根木棍。她走起路来，左脚有点不方便，可是她仍然不停地朝前走。明珠好几次要搀扶她，她似乎更愿意依靠自己的努力。她虽然不让明珠搀扶，可是她仍旧有说有笑地跟明珠走在一起。

我在后面望着他们：他们越走越远，走了好久，忽然一棵大树和几间房屋遮住了他们。他们转了弯不见了。

我一直站在路旁，脚踏在半尺高的草上，耳朵里装满了叫人心烦的蝉声。等到我转身回去，我才注意到露水把我的布鞋打湿了。

傍晚，我从连部回来，走到金家门前，七八个小孩在小小空地上跳舞、唱歌，他们中间没有金明珠。我走进院子，看见金明珠一个人坐在走廊上出神。

“明珠，”他的祖母在正屋里叫他。他走进屋去，过一会儿

又出来，看见我，带笑招呼一声，也不说什么，仍然坐在走廊上，两只手抱着靠在一起的两条腿。

“明珠，你怎么不出去玩？”我问道。

“我不想玩，”他回答。

“你看见火车开吗？”我又问。

“我看见，”他点点头。

“那么你还在想什么？”我继续问。

“我在想玉姬，她到了那边，没有朋友，多寂寞，”他说。

“不要紧，她会有新朋友，”我找了话来安慰他。

他笑了笑，点点头说：“她上学，一定有好多同学。她会找到新朋友的，不然她一个人多寂寞。”

“你不要担心，玉姬会过得好，”我说，我知道他在想念他的好朋友，我也替他不好过。

“她应当过得好，”他含笑道，过了一会儿，他忽然又问我一句：“她不会忘记我罢？”

“不会的，她等着你一年以后去看她啊，”我答道。

他好像没有在听我的答话，他在自言自语：“我知道她不会忘记我。……她就是忘记我也不要紧，只要她不寂寞就好了。”

“你在说哪一个？”我故意这样问他。

“玉姬，朴玉姬啊！我永远忘不了她！”他带着感情地说，好像从梦里醒了过来一样。

1956年9月在上海。

后　　记

我在朝鲜认识好几个小朋友。这几年来我闭上眼睛就看见他们在我面前唱歌跳舞。他们生活得相当艰苦，可是他们聪明、活泼、勇敢、热情。他们在战争中失掉了自己的亲人，失掉了一切使他们生活舒适的东西。可是他们的爱和同情心，他们的乐观的天性都没有失去。他们的歌声和舞姿使美丽的朝鲜的河山显得更加美丽，给英勇的朝鲜人民增加更多的英雄气概。在朝鲜的寒冷的秋、冬之夜，他们的友情温暖了我的心。

我到现在还常常想到他们。这两篇小说就是在怀念中写成的。我写的并不是真人真事，然而在朴玉姬和金明珠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的每一个朝鲜小朋友。他们的悲欢使我的心激动得厉害。他们过去的苦难使我感到痛苦，他们的光明的前途使我高兴万分。我爱他们，我祝福他们。我写下他们的友情，愿中国的孩子们从这里得到些许的温暖，愿中国的孩子们紧紧握住从鸭绿江彼岸伸过来的小朋友的手同唱友情的歌。

1956年8月7日。

李 大 海

《李大海》，一九六一年十二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

朝鲜的梦*（代序）

这几天上海的天气特别热。我也曾在朝鲜的村子里度过炎热的夏天，看见窗前篱墙外高耸的白杨，我就想起朝鲜的一草一木。在好些炎热的或者凉爽的夜里，我坐在不开灯的小吉普车上，经过两旁长着白杨树或者开花的栗子树的公路，在这个美国千万吨钢铁所炸不断的交通线上，我闻到了草木的清香。这是八年前的事情。可是听见似乎不知道疲倦的知了叫或者敲鼓般的蛙鸣，我觉得好像还住在朝鲜的乡村里一样。

八年来我不知做过多少朝鲜的梦。到现在还有一股强大的引力把我的心拉向那个英雄的国家。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谈起在朝鲜的那段生活，就会有昂扬的心情。我想到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也觉得自己生活里有了更多的光彩。谁不曾在朝鲜洗过冒热气的温泉，喝过清凉的溪水！但是不少的人有这样一种感觉：那里有一个仙泉，在仙泉里洗了澡，即使不能脱胎换骨，至少可以洗掉一些思想中肮脏的东西。在朝鲜谁不曾看见美国汽油弹所引起的大火、敌人炸弹和炮弹所毁坏的生命和房屋而愤慨万分！在斗争最尖锐、爱憎最鲜明的地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六〇年八月号。

方，我们的心都受着煎熬，有一些自私的东西渐渐地化成了灰烬。我怎么能够忘记那些可纪念、可宝贵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怀念那个时期的生活！我怎么能不反复地重温朝鲜的梦！

在我那无数的梦里总有一个白衣白裙的身形。每逢我静下来回想朝鲜的生活，我就会看见穿白衣白裙的“母亲”或者“嫂子”。至今紧紧地系住我的心的正是这些朝鲜的“阿妈妮”。不论是在炎热的夏天，或者积雪三尺的严冬，不论是在穷苦的乡村或者中立区的开城，多少朝鲜的母亲把我当作亲人一样。她们不仅让我有遮风挡雨的地方，给了我种种的方便，而且耽心我受冻，早早地烧好了地炕；更不用说，她们常常关心地嘘暖问寒。哪怕是在破旧的茅屋里，我也有住在自己家中的温暖感觉。每一次我跨进一个人家的木门槛，走到擦洗得很干净的木廊前，并不需要讲什么话，白衣白裙的阿妈妮就带着慈祥的笑容欢迎我，好像母亲在接待她久别归来的游子。我离开一个地方，用辞不达意的简单语言，向相处几天的阿妈妮告别的时候，从细小的眼睛里滚下来的泪珠和起皱纹的脸上又哭又笑的表情常常引出了我的眼泪。有一次我在一位老大娘的家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回到附近的城市以后，无意间在街上遇见老大娘的小孙子。第二天老大娘就走了将近二十里路，来看我是不是住得舒适、活得健康。我还记得八年前一个秋凉的深夜，我们的吉普车跑过了好些炸空了的城市，在明德里加油站旁边一棵大树下停下来，疲乏不堪的司机同志敲着附近人家的门，一位头发花白的阿妈妮看见我们，就笑着说：“请进来。”好像我们都是她正在等待的亲人。她给我们腾出来一大

块地方，一定要我们把铺盖卷拿进去摊开休息。第二天我们怀着谢意向女主人告别，她握住我们的手絮絮地讲个不停，无非要我们在路上小心，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像这样的事我岂止经历过八件十件！到过朝鲜的同志谁不曾遇见八个十个亲似母亲的阿妈妮！有一天起雷英雄姚显儒对我讲到他的经历。他到朝鲜不久便让敌人炸伤了左脚。人们用担架抬着他，经过一个地方，在一位老大娘的家里休息。老大娘做饭给他吃。同志们抬他到山上去躲警报，老大娘也跟着担架上山照料他。后来担架离开那里往后走的时候，老大娘拉住姚显儒同志的手，送他走了好几里路，还不肯回去。姚显儒同志养好伤重上前线，就再没有见到这位朝鲜的母亲。他谈起她来，眼睛里还闪着泪光。我虽然不曾有过起雷英雄那样的经历，但是我却有同样深的感情，同样深的怀念。我越是爱朝鲜的阿妈妮，就越是恨那些破坏她们幸福生活的美国强盗。

好几年我没有听到"阿妈妮"这个称呼了。可是在书报上见到这样的三个字，我就仿佛坐在干净的木廊上听老大娘讲话，看老大娘纺线，或者在院子里看年轻的志愿军同志帮老大娘舂米，跟老大娘谈笑，听他们亲热地连声唤"阿妈妮"，或者站在一个农家的门前，望着灯光摇晃的临街纸窗，听老大娘和嫂子们齐声念朝鲜文："我们国家，民主朝鲜……"；我就仿佛生活在朝鲜人民中间，生活在友谊的海洋中间；我就仿佛看见许多双慈母的眼睛殷殷地望着我，听见充满感情的声音接连地说："再来啊，再来啊！"我才知道这些年我的心并不曾离开朝鲜，并不曾离开那许多像母亲一样爱护过我的阿妈妮！

我在朝鲜住的时间并不长。然而我带回来的友情却是无穷无尽的。在那些日子里，好像整个北朝鲜都是我的家，在任何地方我都受到亲切的招待，阿妈妮比得过我的母亲，孩子们叫我“叔叔”，年轻人称我为“同志”，中年妇女好像都是我的嫂子。语言的隔阂并不妨碍我们彼此的了解。一次简单的招呼就唤起生死不渝的感情。不管美国飞机疯狂的投弹、敌人大炮盲目的发射，朝鲜的阿妈妮仍然活得很坚强，很勇敢，而且充满那么深厚的感情和那么乐观的精神。那些时候在朝鲜的城市和乡村里从来没有断过歌声和笑声。我们坐着车子在敌机威胁下跑过公路和山沟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谁都知道有许多人愿意为自己交出生命，自己也愿意为许多人献出一切。我的确深切地感到我们和朝鲜父母、兄弟、姊妹中间血肉相连的友谊。

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回祖国也有两年了。我没有机会看到那些动人的分别场面，可是人们含着眼泪对我谈起他们在朝鲜的“母亲”。也有人跟我一样不断地做着朝鲜的梦。我们在梦里常常看见朝鲜人民和平建设的幸福生活。尤其是像我这样同阿妈妮共过患难的人，我多么希望听见她们幸福的笑声，看见她们欢乐的舞姿。金日成首相称朝鲜的妇女为“英雄的妇女”。朝鲜的阿妈妮能够忍受绝大的痛苦，却不肯在敌人面前落一滴眼泪。可是为了志愿军，她们会哭得、笑得像孩子一样。我知道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美国飞机轰炸了一个小县城，不少的人牺牲了。第二天几位老大娘和大嫂子还走到二十里以外去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部队同志们共同欢

庆我们的国庆佳节，她们有说有笑，又歌又舞，好像不曾遭遇灾祸一样。这样的妇女的确是英雄的妇女，是美帝国主义所不能战胜的。她们给战争中的朝鲜添了多大的战斗力量，她们也一定会为和平建设时期的朝鲜驾起千万匹千里马向前飞奔。

今天的朝鲜跟八年前的朝鲜完全不同了。一座一座花园一样的社会主义城市在废墟上建设起来。荒凉的乡村里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工厂和学校。人们用忘我的劳动把祖国建设得比战前更美丽、更富强。千千万万的阿妈妮不仅享受到家人团聚的幸福，也有充分的机会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国家。……

我的朝鲜的梦是做不完的。梦景越来越美。我甚至梦见了和平统一的朝鲜，梦见了共产主义的朝鲜……可是在任何时候，不论是梦中或者梦醒，我都听见一个同样的声音，那就是八年前充满友情的声音："再来啊！再来啊！"

不论是梦中或者梦醒，我都用同样一句话回答："我一定要再来！"因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斩不断、分不开的。不论是梦中或者梦醒，我都带着感激的怀念遥祝千千万万的阿妈妮身体健康，幸福无量。

1960年7月在上海。

副指导员*

一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以后，我到志愿军××部去进行采访工作。我在某团第一营的一连和二连住了一个时期，后来又到了三连的连部。连长和指导员都到团部学习去了，只有一位二十四岁的副指导员当家。副指导员名叫张强，他陪我住在山上从前搭的一个掩蔽部里，白天却在掩蔽部左面坡上那个简陋的住室里办公(那里是连长、指导员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其实他在办公室的时间并不太多。排里、班里一天断不了他的脚迹。这一班修建新住室，那一班搭新炕，战士们一边说笑话，一边劳动，这里那里都少不了副指导员。电话机装在坡上那间办公室里，电话铃常常响，老是要副指导员接电话。他一天从早忙到晚，却忙得十分高兴，那张丰满的长脸上老是带着笑容。

某一个上半天，他和二班的战士们一起搬石板、石块和石片，一层一层地砌着地炕，不小心擦破了胳膊皮，却带着笑自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文学》一九六〇年十、十一月号合刊。

言自语："我的肉不结实。"我正走到那里，听见他这句话，就含笑问他："副指导员，你说谁的皮肤比你的更结实？"恰恰在这个时候通讯员小周跑来请他去听电话。他把手伸到军帽下面搔着光头，说了一句："这真抓瞎！"接着笑了笑，就跟着小周走了。

"我们的副指导员一定要活一百岁。他浑身是劲。越是劳动得多，越是工作忙，他越高兴，"那个年纪不到三十、身材短小的二班长正在砌炕边，带笑地说道。

一个二十多岁的四川战士在旁边上泥，就接下去说："跟副指导员在一起劳动，你不会觉得累。不管工作再多，再苦，他总是高高兴兴的。班长，你说他哪一天不是笑嘻嘻的？就是那回他救出金老大娘来，手都烧伤了，他回来还有说有笑，总说：不痛，不痛！"

二班长点点头。过了两三分钟，他忽然抬起头来说："我想起来了，有一回，就是头一次打了黑山包下来，他几天不曾笑过。"

四川战士听见这句话，便收起笑容，简短地说："那回不同，那回大家都难过啊。"

二班长继续砌炕边，一面自言自语："我说，炕比炉子还好，炉子烧到半夜火一灭，一样挨冻；炕只要烧好了，睡一夜不成问题。"他就把话题岔开了。

四川战士听见他这样说，又搭腔道："班长，你好好地砌罢，把它砌严。现在一马虎，将来漏烟呛人，你负责。"

二班长笑了笑，望着他说："小李，刚停战的时候，你还想

回国呢。怎么，现在想通了吗？”

“班长，你说人的思想就一成不变吗？从前我那样想，现在我不那样想了。美国鬼子还在南朝鲜捣乱，天天破坏停战协定，现在喊我回国，我连饭都吃不下！”四川战士有点不服气地答道。大家都笑起来了。

讲话的自然不仅是二班长和四川战士。我站在这里听了一阵。战士们劳动得十分愉快。不到多大一会儿功夫，地炕就要砌好了，可是副指导员还不曾回来。我忽然想起教导员在营部等我去拿材料，便离开了这些“有说有笑”的战士，一个人往山下走去。

在营部我不但借到了自己需要的材料，还有机会向营长和教导员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得到了他们详细的解答。他们殷勤地留我在那里吃了晚饭。我回到三连连部，站在我住的那个掩蔽部门前小平台上抽烟休息。月亮刚刚从东面山头升了起来。这一轮金黄色的大圆月好像是一面铜镜；青灰色的天空中还有一抹浅红。掩蔽部背后好几棵大树上知了一直叫个不停。从右面坡上那个新平出来的小操场，送过来手风琴的声音。我知道战士们又在练习跳舞了，便把眼光移向那里。我看见浅黄色的制服在绿树丛中转动，又听见年轻人的笑声。我出神地望着那里，望了好一会儿。我有一种又轻松又愉快的感觉。

“我听见音乐就着急，我学过跳舞，”副指导员的熟悉的声音忽然钻进了我的耳朵。我转过头看山下。他正从下面走上来，在他的背后跟着先前在下面砌炕边的二班长。二班长

并不搭腔，不过短短地应了一声。副指导员抬起头，他那发亮的眼睛看见了我。他带笑地大声说："××同志，你回来了！"

"我才回来，"我笑答道，顺口问一句："副指导员，你不去跳舞？"

他笑笑，就走上坡来了。"我还有事，"他答了一句。

"听说连长、指导员都要回来了，"我又说。

"星期天回来。他们回来就好了，这几天真抓瞎！"他说着，又把手伸到军帽下面搔了两下。接着他侧头对二班长说："我们走罢。"两个人就走过我身边到上面办公室去了。

二

我仍然站在这个小平台上。战士们还在小操场跳舞。山脚下那一排白色平房前面空地上，移动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我知道村子里的朝鲜小姑娘们在跳舞唱歌。但是我只能看出衣服的颜色。仿佛天空中撒下了一道浅灰色的网，把整个山下都罩在网里。我看见那些平房里亮起了灯光。在我的右面忽然响起了洪亮的歌声，战士们唱着《我是志愿军》从小操场跑下山去。

我的思想好像跟着这些年轻的声音在往山下跑，跑到半山就停了下来，因为声音突然分成三股，往三个不同的方向散开了。

"战士们回到班里去了，"我感到亲切地自语道。四周相当静。有一点虫声，有一只蛙在叫，还有断断续续的两三声蝉

鸣。我眼前那个灰色的网早已变成浅黑，连山下的白屋也看不清楚了。

“××同志，你一个人在这里！”副指导员的充满喜悦的声音在我左边响了起来，我没有注意到他是什么时候走下来的。

“副指导员，二班长走了？”我问道。

“班里有事，他回去了，”副指导员答道。

“这里真静，下面村子里老乡也不多，”我又说。

“现在老乡们都回来了。他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了。……”副指导员用关心的调子说；“两个多月前这里可不静啊。就在停战前一天，下面还落过弹。”

“伤人没有？”我连忙问了一句。

“一位老大爷牺牲了；老大娘受了伤，现在已经治好回来了。房子烧光了。那几间白房子还是停战以后修起来的。朝鲜老乡真坚强！”副指导员的眼里忽然闪起了火花。

“山下面那个金老大娘就是我们副指导员救出来的，”通讯员小周从上面下来，站在旁边听我们谈话，便插嘴说。

我听见人谈起朝鲜的老大娘，眼前就现出多少白衣白裙的身形、多少和善的面孔同慈祥的笑容。她们的痛苦像火一样烧着我的心。我愤怒地骂了一句：“美帝国主义真是禽兽！”

“你说得对。只有在朝鲜住下来，才明白美国鬼子给朝鲜老乡带来多大的灾难！”副指导员点头说，他把军帽揭下来，接着又把它戴回到光头上去。“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排住在这里。我是排长。我们的战士经常帮老乡们做点工作。金老大娘对我们特别好。她丈夫有病，睡在家里。她只有一个儿子，

参军以后便失掉了联系。就是在停战前一天，敌机来了，又投弹，又扫射。房子马上烧着了。我带一个班去救火，烟熏得人睁不开眼睛。金老大爷牺牲了。老大娘奔回家来，发狂似地嚷着，直往火里扑，拦都拦不住。我跑进火里去找她。我看见她歪歪倒倒，舞着胳膊保护自己的眼睛。衣服也烧着了。她一直在叫她的丈夫，声音都叫哑了。我奔过去抱住她。她拚命挣扎。我好不容易将她拖了出来。她在火里还乱打乱踢，等到救出来认出了我，她抱住我大哭。我心里也很不好过，好像看见自己母亲受难一样。她的腿、她的胳膊都烧伤了。"

"你呢？"我问了一句。

他揉了揉眼睛，淡淡地答道："我的伤很轻，很快就好了。不到十天老乡们修建新房子，我们也去帮了忙。老乡们很高兴，都说，旧的烧掉新的来，新的比旧的更好、更漂亮。我也想，尽管你美帝在停战以后还不断地捣鬼，可是你总毁不了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

副指导员愈谈愈兴奋，他还谈了一些话。这中间，小周离开了小平台又走了回来。月亮已经升在无云的高空。知了休息了，小虫却起劲地唱出欢乐的歌声。风吹在我穿单军服的身上使我感到凉爽、舒适。三排长来了。副指导员便结束了谈话，同三排长一起到坡上的办公室去了。

三

我走进掩蔽部，点燃了洋烛，在桌子前坐下来，翻看从营

部带回来的材料。

这都是英雄们立功的事迹。功臣并不限于三连。有几个功臣我已经访问过了。还有一些我尚未见到，也有三四位是牺牲后追评的。材料不是一个人写的，一部分写得相当生动，另一部分就显得潦草。而且整个抄稿上的字迹歪歪斜斜，看起来有些吃力。我一边慢慢地看，一边慢慢地把这些英雄事迹摘抄在我的笔记本上。烛光摇晃得厉害，我写一阵，就得放下笔揉揉眼睛。

“××同志，你还不睡？”副指导员走进来，亲切地说。

“现在还早，我抄点材料，”我放下笔，答道。

他就在方桌的另一面坐下来，埋着头望了望我面前的材料，大声说：

“郭永章，这是个好同志。第二次打黑山包，就是靠他炸垮了敌人的大母堡，才拿下来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找他来跟你谈谈。”

郭永章是二班长的名字。我还不曾看完他的事迹，只知道他是在拿下黑山包的战斗中立了二等功的，便指着材料对副指导员说：“我的确想找他谈谈。材料我刚刚看到头一段，全篇也不过一千多字。”

“这是我们的文化教员写的。当时上级催得紧，郭永章又不肯多讲自己的事，所以写得简单些。”他说到这里，就站起来，说：“你还是早些休息罢。我要到郭永章那个班去一趟。有个战士发疟子，我去看看。这几天发疟子的人又多起来了。”

副指导员走出掩蔽部以后，我开始摘抄二班长郭永章的

立功材料(他立功的时候还只是普通的战士)。我在材料中看到另一个名字：张林。据说郭永章那次冲锋的时候，大声喊着："同志们冲啊！替张林报仇！"然而张林同志的事迹并不在这份材料上。我抄完材料，副指导员还不曾回来。我知道他可能各排各班都去过了。我本来想等他回来，请他谈谈张林的事情，可是我又耽心会妨碍他的工作。而且时间不早了，战士们应当熄灯睡觉了，副指导员回来，也应当休息了。所以我放好材料和笔记本，就吹灭了洋烛，躺在那个铺了稻草和雨布、再盖上白布单的土台上睡了。

我睡到半夜，忽然惊醒起来。漆黑的屋子里亮起一股白光。我看见副指导员站在我这个当作床用的土台前面。我呆了一下，副指导员亲切地说："××同志，晚上很冷，我给你盖件大衣。"我连忙说："我不要，我不要。"我看见他身上穿的仍然是那件单军服，便问一句："你还没有睡？"他含笑说："我已经睡了一会儿，刚才出去查过铺。外面很冷。我把大衣脱下来给你盖上，想不到把你吵醒了。"原来夜已很深了。我说："我不冷，你拿回去罢。"可是他已经收起电筒走开了。他就睡在旁边那个较小的土台上。不到几分钟的功夫，我听见了他的鼾声。

四

第二天早晨我走出掩蔽部，看见副指导员蹲在屋前小平台上洗脸。他站起来，跟我打个招呼，放好脸盆，就下山去了。

我立在掩蔽部门口，望着他的背影往下转来转去，一下子就不见了。山洼中一片白雾，山下的村子也看不到了。我朝远处望。有一座山头只剩了一个顶，别的几座山尖都飘着雾。雾愈来愈浓，只见满山白烟，仿佛前面就是白茫茫一片大海。

我洗了脸。面孔圆圆、鼻头平平的小周从办公室里走下来，给我打个招呼，就朝通右面山坡的小路走去。过了一会儿，他从炊事班那里端来了一碗豆浆，放在那张用木箱做的矮桌上。我在一个用木板和空罐头做的小凳上坐下，喝着冒热气的豆浆，跟小周谈了几句话。我看见左边和对面的山头都罩上了阳光，雾在发亮，在移动，在消散。知了开始大声叫起来。小周打扫了这个小平台。我把昨天从营部借来的一叠材料拿出来在小平台上翻看。

"那么就让他们五个人去罢，换两个人去打草也行，"副指导员说着话走上来了。走在他后面的是文化教员。我知道他们在商量选拔文娱骨干到营部去的事情。他们很快就谈定了。文化教员走到我面前，看见我刚才放在矮桌上的材料正摊开郭永章事迹的那一页，便带笑说："材料写得太差，我不会写，请你指教啊！"

我把眼光移到材料上，在那里停留了片刻，忽然想起了昨天晚上的那个疑问，便说："教员，你不必客气。我正要请你谈谈张林的事迹，我在这份材料上找不到。"

文化教员停了一下，才答道："张林的材料大概拿到团部去了。"接着他又望一下副指导员，说："你还不如请副指导员谈谈。他很清楚。他们是一家人。"

我感到意外地看了副指导员一眼。他伸起右手到军帽下面搔了搔他的光头，说了一句："他是我的哥哥。"

我愣了一下，倒是副指导员爽快地说了："今天晚上抽个时间扯一扯罢。"

我只说了一句感谢的话，也就不再提张林的事情了。

五

这天下午三点一刻钟，我和副指导员、文化教员、通讯员小周在小平台上吃晚饭。副指导员吃得很快，我还不曾添饭，他已经放下碗了。他站起来，笑着对我说："××同志，请你在家里等我一会儿，我回来就跟你扯我哥哥的事。"

他并没有让我等多久，过了半点多钟就回来了。他坐在小凳上喝了大半茶缸的凉开水，解开军服的钮扣，道歉似地带笑说："对不起，教你等久了。"他从右边裤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翻了一下，接着又把它放了回去。他抬起头说："我不看本子，随便扯扯罢。"

"张林是我的亲哥哥。我们弟兄自小在地主家干活，挨打、挨骂、受冻、挨饿。解放后斗了地主，分了地。我们弟兄一块儿报名参军，一块儿到朝鲜。我们都分配在三连，他当战士，我在连部当通讯员。他立过几次功，当了班长。他在一排一班，我后来到一排二班当副班长。第一次打黑山包的时候，本来要调他到师里去学习的，因为战斗任务重要，他要求留下来，上级也就同意了。他很高兴，起劲地进行准备的工作。每

天天还没亮，全班的人都起来了。大家练习爬山，演习进攻。战士的动作要是不合要求，他就耐心地纠正，并且做出示范的动作给大家看。在休息和游戏的时候，他有时也会找个别的战士谈话，不让任何一个人心里有顾虑。他还带着大家练习瞄准投弹，学习爆破动作，因为这个班上有好几个新战士，他们离开祖国的农村才几个月，还不熟习战斗的事情。他和大家一起在住室的门口用松枝和野花扎了一个'凯旋门'，在门上还贴了些宣传鼓动的标语。大家的情绪都很高。……"

副指导员停了一下，拿起祖国慰问团送来的那个茶缸，喝了两口水，又接下去说："上级决定：一班担任突击，同二班并肩前进，给全连打开冲锋的道路。在出击以前，张林还不放心，亲自摸到敌人的铁丝网跟前，去检查突破口。我们两个班在自己挖好的待蔽洞里待了整整一天。晚上十一点钟，我们的大炮开始响了。炮弹不停地在我们的头上飞过去。黑山包上亮起来一团一团的火。过了两分钟，张林就带着第一组跟着炮火向前冲去。他跑在最前面，看见前面有两个大地堡，恰好我们二班的爆破手朱明也赶上去了。他们一个人对付一个地堡。他扑过去把一个手雷从地堡的枪眼投进去，连忙向左边闪开。地堡马上爆炸了，六个敌人全死在里面。朱明也把另一个地堡解决了。道路打开了，部队也跟上去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正在延伸，炮弹爆炸的硝烟笼罩着整个山头，十米以外就很难看清目标，瓦斯呛得人快透不过气来。张林正在前进，忽然发觉他刚才向地堡扑过去的时候，敌人的枪弹打中了他的右胳膊。不过这是轻伤，他也不去包扎，就忍住痛继

续往前跑。他听见左边不远的地方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敌人的几挺机关枪从一个暗堡里射出密集的子弹来。我们的冲锋部队就给这几挺机关枪压在山腰，没法上去。张林看到了这个暗堡，连忙把第二个手雷的插销拔开，朝暗堡冲过去。他接近暗堡的时候，忽然从侧面飞过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小肚子。可是他一步也不停，就像猛虎一样扑上去，从后门把手雷扔进去了。暗堡塌下了，机关枪都变成了哑巴，敌人完蛋了。张林也昏倒在地上。……”

副指导员一面说，我一面写。他说得不慢，可是我写得并不快。我只能匆匆地记下大意。他忽然闭上嘴，拿起茶缸，埋头喝了一口水。停了片刻，他又抬起头，放下茶缸，继续说下去：

“我到了上面，看见张林躺在血泊里，人事不省，一节一米多长的肠子从小肚子上的伤口出来了。我轻轻地扶起他，要背他下去。他忽然醒过来了。他睁大眼睛望着我，教我不要管他。他严肃地说：‘任务要紧！快争取时间继续前进，彻底消灭敌人！’我还不忍离开他。他却嘶声叫起来：‘同志们，大家狠狠地打啊！给祖国争光、给毛主席争光的时候到了！……’”

通讯员小周来找副指导员去听电话。他不说什么，只是把手伸到军帽下面搔了两下，就朝左边坡上跑去。

小周望了望他的背影，回过脸来，看见我把自来水笔挟在笔记本里，知道我要休息了，便对我说：“副指导员平日很少讲他哥哥的事情，他们弟兄感情很好。”

“你见过他哥哥吗？”我问道。

小周摇摇头说："我没有见过。我是在拿下黑山包以后才来的。我听见人说他们弟兄相貌差不多。张林喜欢唱歌，那天出发的时候，他还在唱：'炮火震动着我们的心，胜利鼓舞着我们……'"

我把小周的话记在笔记本上。小周又往下说："听说那天把他抬下来的时候，他一路上昏昏迷迷，一直在喊：'狠狠地打啊！'抬到包扎所就断气了。后来给他评了一等功。……"

我正在记录小周的话，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原来副指导员匆匆地跑下来了。小周已经在茶缸里盛满了凉开水。副指导员坐在原处，端起茶缸喝了两口水，看见我摊开笔记本在等他，便抱歉似地说：

"我得抓紧时间讲完它，过一会儿我还要到营部去开会。……当时，我就冲上去了。我解决了敌人的两个地堡，同志们都上来了。鬼子的枪都不响了。我不放心张林，折回去找他。我突然听见一阵枪响，原来冲锋枪和卡宾枪的火力交织着从敌人的一个住室里射出来。阵地上敌人的火力又渐渐复活了，我们的前进部队遭到了敌人的侧面射击。我看见同志们暴露在敌人的炮火下不能前进，怒火直往上冲，便拿出一颗手榴弹，向那个火力点爬去。阵地上布满炮弹坑、石头、树枝，弹片同被炮弹翻起来的树根和土块，把我的衣服都挂破了。我正在爬，忽然看见前面火光一闪，跟着起了一声轰隆的巨响，那个火力点马上就没有声音了。我知道这是张林干的事情，便在这附近找他。我走过了先前跟他分手的地方，后来又跳过一条交通沟，离交通沟不远找到了他。……"副指导员埋下

头静静地过了片刻。小周在旁边望着我，他的眼光好像在说：副指导员心里不好过啊。他的眼圈已经红了。

“他躺在地上，军服全破了，满身都是血和泥土，肠子出来一大段，右腿也打穿了一个洞。我叫醒他，他还拉住我的手吃力地说：‘我差一点儿爬不过交通沟……那包炸药……差一点儿……也丢不进去……’他又昏过去了。那几个一班的同志也来了，大家都伏在他的身边喊：‘班长！’他又醒了过来。大家告诉他：‘我们胜利了！任务完成了！’他吃力地接连说了两个‘好！’字，又说：‘我知道我们一定会胜利。以后你们还要继续狠狠地打美国鬼子啊……’他勉强笑了笑，又昏过去了。同志们用担架把他抬下去，到包扎所，他就牺牲了。”

副指导员站起来，默默地走了几步，又朝山下望了望。刚刚休息了片刻的知了又烦躁地叫起来了。

“这是一年前的事情。可是我一提到它，就好像看见我哥哥把打出来的肠子塞进伤口去，抱起一包炸药，咬紧牙关，朝敌人的火力点爬去；我好像看见他昏过去又醒转来，小肚子上的伤口擦着树枝、弹片、砂石，吃力地一步一步往前爬；我好像看见他慢慢地支起身子，用力扑过交通沟，倒在交通沟对面的边沿上；我好像看见敌人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腿，他停一下又往前爬；我好像看见他忽然抬起身子把那包炸药扔到敌人的火力点去；我好像看见……”副指导员的带着痛苦和愤怒的声音突然停止了。他转过身，走回到矮桌前，又在小凳上坐下去，望着我说：“他的仇总算报了。头一次打黑山包，我们全部歼灭了美国鬼子三个步兵排，一个火器排；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第二

次打黑山包，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一共消灭了二百三十几个美国鬼子，而且把黑山包拿下来了。我们不仅拿下了黑山包，而且接连拿下好几个山头。好罢，你不肯停战，我们就揍你！不断地揍你！揍得鬼子只好在停战协定上面签字。我们不怕鬼子不老实，它再敢动一下，就揍它，朝鲜人民也要狠狠地揍它！”他又端起茶缸，一口气把水喝光了，站起来说：“我要讲的话都讲了。……我讲得不好。……××同志，你还要了解什么？指导员后天就回来了，他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排长，知道的事情多。”我看见他的脸上渐渐地现出了笑容，我知道他又在准备安排什么工作了。他可能在等待我的新问题，也可能在打算向我告辞到营部去。我还想留他多谈几句，我就向他发问了：

“副指导员，你家里都好吗？”不用说，我想知道的是张林家里的情况。

“很好，很好！”副指导员答道，这一次他笑了。他从左面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我前两天接到的家信。”他从信封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请看这张照片。”

我把照片拿在手里。我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坐在正中，一个四岁的男孩站在她的膝前，两个梳双辫的年轻女人站在她的背后。衣服都很整齐，脸上都带笑容。

“我知道这位是你的母亲，”我指着颧骨高高的老大娘说。“这位是……”我指着那个大脸、大眼睛的女人说了三个字就咽下了其余的话。他在旁边替我接下去说：“这是我的嫂子。”我便指着那个身材较高、脸也丰满、穿花衣服的年轻女人说，

“那么这位就是你的爱人。”他笑着答一声“对”。我又说：“这个小孩是你的侄儿罢？”他点点头，又说了一个“对”字。

“你一家人都在？”我把照片交还给他的时候，又问一句。

“还有一个十九岁的弟弟到县里学习去了，”他笑答道，就把照片放回信封，揣到袋里去了。

“那么这封信是——”我只说了这六个字，我望着他微笑。

“是我爱人写的，”副指导员爽快地接下去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参军的时候，我们结婚不过半年，她还是个文盲，现在她可以写信、读报、记笔记了。她信上说：家里生活很好，母亲身体健康，嫂子当上劳动模范，到县里开过会了。她也受到了表扬。她还向我挑战：她要争取当军属模范，争取参加慰问团到朝鲜来。——”

他突然闭了嘴，我忍不住替他接下去：“她要你立功，要你也争取参加归国观礼团到北京，是不是？”

他笑笑，过了两分钟，才答道：“这些事情在解放前连做梦也想不到。”

“这几年想不到的事情太多了，”我说。

“还有一张照片，也请你看看，”他说着又递给我一张照片，这是从笔记本里取出来的。我把这张二寸半身照片拿在手里，望着上面那位小眼睛、厚嘴唇、满脸笑容、额上有几条皱纹的朝鲜老大娘出神。

“这就是金老大娘，她今天早晨给我的，”他解释道；“我上次忘记告诉你，金老大娘治好伤回来，前些天得到了儿子的信，她儿子在东线，在人民军里当军官。她多年没有照相了，

这次特地照了相给儿子寄去，她也给了我一张。”

我交还照片以前，把它翻转来看看背面，我看到了两行不十分端正的中国字。一行是“金贞淑”，另一行是“中朝亲如一家”。我便问一句：“她自己写的？”

“我在下面碰见她。她拉我到她家里去，她当着我的面写的。她还说，她将来要到中国，要到我家里去看看我母亲，也要请我母亲到朝鲜来玩。她想得真多，讲得真高兴，”副指导员一边说，一边慎重地将照片放回在笔记本里面。他又笑了笑。

小周在坡上办公室里大声讲起话来。大概又是电话来了。可是副指导员却好像不曾听见似的，望着我说下去：“××同志，你说战士们都在讲我成天高高兴兴，不知道累，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生在这样好的时代，谁不高兴呢？我一高兴，劲就来了。越忙越有劲，我从来不觉得累。只是我能力差，当副指导员还是停战以后的事。这些天连长、指导员都不在家，真抓瞎！你来了几天，也该看出来了。……”他看见小周从坡上下来，便闭了嘴，望着小周。

“副指导员，教导员来电话，要你马上去，”小周还不曾走到他面前，就大声说。

“好罢，××同志，晚上再扯罢。”副指导员亲切地对我说声“再见”，匆匆地往山下走了。

六

我站在小平台上望着副指导员的背影。这个对我显得非常亲切的背影很快地消失了。我回头看小周。小周也不在这里。可是一两分钟以后，小周的声音又在办公室里响了起来。我埋下眼睛看山下，仍然找不到副指导员的影子。那一排白色平房顶上冒出了烟，烟雾飘到了小山头。"老大娘在烧饭了，"我这样想道，便移动脚步往下面走，我也许想走到平房去看看。

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二班的新住室。我昨天还在这里看战士们砌地炕，现在炕已经砌好，那个四川战士坐在屋子外面一块石头上，把干树枝放进炕洞口烧起来。二班长从住室里走出，带笑说："我说不漏烟，你还不相信。现在没有话讲了罢。"

四川战士满意地笑了笑，答道："副指导员帮忙砌的炕还会有问题吗？"

二班长失声笑了。"小李，你真鬼！你提到副指导员，我还有什么话好讲？"二班长刚刚说到这里，看见一个脸上没有血色的战士慢腾腾地走过来，便换了口气说："小王，你不多睡一会儿？到这里来干吗？"那个年轻的战士有气无力地答道："班长，我现在好多了，想出来走走。卫生员拿来的桃子真好吃。"

二班长又笑了。他问道："小王，你知道桃子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等小王回答，自己接下去说："副指导员拿出他的津

贴交给卫生员，请司务长买些桃子来，给发疟子的病号吃。”

发疟子的年轻战士轻轻地吐出了一个“啊”字，接着又说了一句：“我还不知道。”

二班长温和地笑道：“真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了！”

烧炕的四川战士马上含笑插嘴道：“班长，你知道的事情多，跟我们讲一点儿也好。”

二班长得意地笑道：“小李，你倒会出主意。可是我不像你，我不会摆龙门阵。我还有别的事。”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们大家都喜欢副指导员，可惜你们没有见到他哥哥，他同他哥哥是一个样子。真是两个好同志，好上级！”二班长动感情地赞了这一句。他到这个时候才向我说：“××同志，你要报导我们连里功臣的事迹，你不能把张林同志漏掉啊。”

我站在他们旁边听他们谈话，有时走两三步，但马上就转身回来。他们同我熟悉了，并不介意。我听见二班长的话，便接嘴道：“郭永章同志，请你什么时候跟我谈谈张林的事迹，还有你自己的事……”

二班长不等我说完就打岔道：“张林同志的事迹你请副指导员谈罢。我的事实在值不得谈。”他那张黑黄色的、看起来像是很健康的瘦脸突然发红，他又把眼睛掉去看那个正在冒烟的炕洞口了。

我不肯放过这个机会，连忙接下去说：“郭永章同志，副指导员刚才跟我谈过了。他要我找你谈谈。”

二班长不看我，也不答话。过了两三分钟，四川战士在旁

边替我帮腔道："班长，你这回非讲不可了。"二班长望着四川战士笑了笑，说："行了，不用烧了。"他又对我抱歉似地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好讲的。"他还说："××同志，你要不要到我们班里去看看？"

我知道他指的是二班的旧住室。新住室刚刚搭好，他们还没有搬过来，新的地炕既然不漏烟，那么过两天他们便要迁居了。他邀我到旧住室去，一定是要跟我谈话。我便点头应道："好罢，我现在跟你去看看。"

我们两个一路走到二班的旧住室。旧住室在新住室的后面，我们往右朝上走了十几二十步便到了那里。这个茅棚一样的屋子里没有人，外面土坡上倒有讲话的声音。我们进了屋，二班长便说："请在炕上坐罢。"屋子里有两个大炕，他匆匆地走到一个炕前，拿过自己的包袱，打开了它，从一个小纸包里取出一张纸来。他把纸交给我，一面说："张林亲笔写的信。"

我接过纸来。这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带格子的白纸，纸上有用自来水笔写的笔划清楚的小字，我把纸拿到住室门口，轻轻地念出信上的话来：

永章同志：

我们那天谈话以后，我还是不放心。你说打仗要死人。你还说志愿军入朝后，牺牲的烈士不少。你忘记了毕竟是活的英雄多。死的只是极少数。我们任何时候都应当有胜利的信心。我即使在战斗中死掉，我也相信我

们一定会得到胜利，革命一定胜利。我们班要执行任务了。可惜你还在疗养所，不能回来。我一定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你。

敬礼！

张　林　××日。

二班长已经走到我身边来了。我掉转身把张林的信递还给他。他接过信声音低沉地说："这是他出发前一天写的，信到我的手里，他已经牺牲了。"

我默默地望着他。他又讲下去："我那个时候思想搞不清楚，老是想，打仗要死人。我把打仗跟牺牲连在一块儿，老是以为上战场就要做烈士。张林同志是我们的班长，他找我谈过两次话，跟我讲了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道理。他批评我成天板着脸、想牺牲、没有一点积极的快乐情绪是不对的；他还批评我常常跟新战士谈我这种看法更不对。他说，英雄抱炸药跟敌人同归于尽，当时也只想到怎样消灭敌人，不会想到自己牺牲不牺牲。他讲得很多，头一次他狠狠地批评了我，我还不大服气；第二次他讲得更诚恳。我的心给他打动了。没有想到过两天我出去打柴把左胳膊摔坏了，到疗养所住了一个时期。我回到班里，副指导员刚调来当班长。他把张林同志的信交给我。他告诉我，张林同志受伤以后在阵地上还提到这封信，要他把信交到我的手里。他在张林同志留下的东西里面找到了信。我请他跟我讲讲张林同志牺牲的情形。他讲了。他说，他看见张林同志牺牲，并不惋惜，他只想到他哥

哥完成了任务，给他立下一个视死如归的好榜样。副指导员讲他哥哥的事，他自己并不哭。我倒哭了。他也不劝我。他只说了一句话：'我已经向上级要求下次的任务了。'我拿着张林同志的信读了不知多少遍。我明白副指导员那句话的意思。后来我就参加了二打黑山包的战斗。"二班长说到这里，突然闭了嘴，不等我问话，便拿着那封信走回到他的炕前去了。

我跟着他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屋子里光线暗，但是我也看得出来，他站在炕前，俯下头，将信慎重地放回到小纸包里面，又将包袱包好放到原处。我在等他。

他走到我面前，听见我说："郭永章同志，你讲讲以后的事情罢，"他答道："我讲完了。"

我接着又问："那么二打黑山包的事情呢？"

他又笑了笑，摆摆头说："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你不是立了二等功吗？"我再说一句。

这一次他不笑了，他带了点歉意答道："这是张林同志的功劳啊。"他看见四川战士同患病的战士谈着话走到了门口，连忙小声补了一句："还有副指导员的功劳，"就撇开我，朝那两个年轻的战士走去。

我慢慢地向门口走，可是我并不打算再提刚才谈过的事情，我知道他今天不会对我再讲什么了。

1960年9月15日在上海写完，

1961年6月初在杭州修改。

回　　家*

"班长！班长！"

侦察排一班班长李明忽然听见有人叫他，声音是那么熟悉。他含糊地应了一声，吃力地睁开了双眼。他看见一对在黑暗中发亮的眼睛。两只手正在轻轻地摇他的肩膀，但马上又松开了。那个很熟的声音激动地说："班长，你，你醒过来了！"

李明躺在地上，他觉得冷冰冰的雨点打到他发热的脸上来了。他有气无力地答了一句："醒过来了。"他望着年轻战士汪永的非常亲切的圆圆脸，又说："小鬼，你还在这里。下雨了。"

汪永擦了擦自己的眼睛，高兴地说："班长，没有下雨啊。你醒过来就好了。"他把他那只沾了点泪水的手伸过去，紧紧捏住李明的右手，又说："班长，你昏过去了。我爬过来喊你，喊了好一阵，你才应声。你的伤不要紧罢？"

李明勉强地笑了笑，说："小鬼，你又哭鼻子了。我的伤不要紧，我是震昏过去的。你瞧，我包扎得很好。"他伸起左手在

* 本篇最初发表于《解放军文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号。

自己的肚皮上摸了一下。一根皮带束紧了给子弹穿破的棉军服，遮住了临时包扎上的纱布。他又说一句："我能起来。"他用左手支着地将背往上抬。他刚刚坐起来，忽然感到一阵利刀穿心似的痛楚，连忙咬紧牙关，又倒了下去。

"班长，你要小心啊！"汪永小声惊叫道。他仍然捏住李明的右手，关心地问："班长，你伤口痛得厉害吗？"

李明摇摇头，短短地答道："不痛。没有问题。"强烈的火药味和离这里不远的隆隆炮声使他记起先前激烈的战斗来。副班长高启成押着两个"舌头"回去了。汪永用密集的子弹把十几个敌人压在地上。他李明接连扔出了三颗手雷。第三颗手雷扔出以后，他就失掉了知觉。他想到这里，便着急地问："小鬼，那些鬼子呢？没有逃掉罢？"

"班长，你那三颗手雷把他们全送上西天去了，"汪永松开手兴奋地笑着回答。

李明满意地答了一个"好"字。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好些了，身上也有了一点劲，便略略提高声音说："我看不用等副班长来接我们了，我回去带担架来接你罢。"他坚持着用力坐了起来，还动手拉紧腰间那根皮带。

"班长，你在做啥？我看，你的伤也不轻，你不能一个人回去！"汪永又惊又急，他趴在地上抬起头来，而且使劲将头抬得高些，他用央求的口气继续说下去："班长，还是我们两个一路回去罢。我即使不能走，我还能爬啊！"

"小鬼，你的伤重些，你得听我的话，不要乱动。就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能走，我经验多，办法也多些，"李明坚决地说。

他弯起两腿，右手撑着满是弹片、碎石和断枝的松松的砂土，用力转动身子，居然站起来了。他的身子摇晃了两下。他又感到一阵痛，痛得厉害，好像有一把尖刀在割他的肠子一样。他头上一直在冒汗。他站定了，望着汪永那张吃力地抬起来的脸，按住自己的肚皮，慢慢地弯下腰去。他轻轻地拍两下汪永的肩头，亲切地说："小鬼，你要保住腿，就不能乱动啊。我给你找个隐蔽地方，保险些。你好好歇一会儿罢。"他听见汪永唤"班长"，也不等汪永讲下去，就伸直身子走开了。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忍住痛俯下身去对汪永说："小鬼，找到地方了，就在前面。我搀你去。"他伸出手去搀扶汪永。

汪永连忙摇摇头说："班长，让我自己走，我能爬过去。"他说着就开始爬行。

"小鬼，你不要急，让我来搀你。"李明温和地劝阻道。虽然汪永接连地说："班长，你不要管我，让我自己走，"虽然李明觉得伤口一阵一阵地痛得不轻，李明还是把汪永一直扶到那个长满野花和杂草的干沟跟前。

敌人的炮弹带着哨子一样的声音在他们的头上飞过。他们看见一团一团的火光，听见不远地方的爆炸声。李明让汪永侧着身子躺在这个浅浅的沟里。他听见汪永说："班长，我睡好了，你走罢。"可是他一只手还放在汪永的右胳膊上，他在沟边停留了一两分钟，才站起来，说："小鬼，我走了。我一定带担架来接你。我来不了，副班长会来，同志们也会来。"

"班长，你放心，我只要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回家，"汪永感动地回答。

"小鬼，你千万不要乱动。还是等着担架来接你罢，"李明坚持地说；接着他改变语调说声"再见"，就转过了身。他刚刚走了两步，又听见汪永在后面唤他，便回到汪永的身边去。

"班长，你带一颗手榴弹去，我还有一颗留给自己，"汪永说，他把别在背后皮带上的手榴弹取下了一颗，要交给班长。

李明迟疑一下，便接过了手榴弹，别在自己的腰间。他紧紧地握了握汪永的右手，亲热地说："小鬼，我走了。你要小心啊！"他把这周围看了看，右面三四米远有一棵给炮弹打弯了的大栗树耸立在那里。他认清了地方，就踏着坑坑洼洼的砂土往北走了。

敌人的炮火又静了。风一阵一阵地吹到李明的脸上，四周时时有沙沙的声音。天空漆黑，李明拿出指北针来，捏在手里，让它来引路。马尾松、断树桩、碎石、弹片和土坑常常绊住他的脚，增加他伤口的痛。他走了好一会儿，好像还听见汪永的轻微的咳嗽声。他站住回头望一眼，却不见那棵打坏了的大树。他想，走了这么一阵，怎么还听见小鬼的声音？他着急了。他加快了脚步。可是走不多远，他又不得不停下来。冷风从穿了孔的棉军服的破洞里刺到他的身上，好像灌进了他的伤口一样。他咬紧牙关，把棉军服整理一下，将纱布拉紧一点，将皮带扎得紧些，将手榴弹别得更稳。他停一阵，又走一阵，越走越觉得身体重，两腿无力，伤口痛。他好几次差一点摔倒，也的确摔倒过两次。汗珠大颗大颗地顺着两颊往下掉，军帽早已湿透了。有时他停下来，又觉得好像冷气钻进了他的脑袋一样。不用说，他并不害怕这一切。他曾经忍受过更

大的痛苦，他的胳膊上、腿上还留着好几处伤疤。这个时候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回家，尽快地回到"家"里。他有时好像听见汪永的咳嗽声，有时又仿佛听见排里、班里同志们讲话的声音，有时又好像看见副排长那张和善的笑脸和团长那对仿佛要看透他的心一样的眼睛。他觉得痛楚渐渐地减轻，两条腿渐渐地又有劲了。他不停地走了好一阵，左手拿着指北针，右手摸着手榴弹。他自己也说不出已经走了多少路。可是痛的感觉又逐渐地强烈了，好像那把尖刀又在他的肠子里绞来绞去。他咬紧牙，弯下腰，拿右手按住伤口。他正在吃力地走着，忽然觉得心里一阵难过，他不住地淌汗。他难过到了极点，一下子什么也不知道了。

李明又睁开了眼睛。他好像大梦初醒一样，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躺在地上。砂粒冷冰冰地刺着他的烧脸，断枝和碎石割破了他的手。指北针还紧紧地捏在左手里。他忽然记起来了：小鬼在等我！他着了急，就要站起来。可是一次不行，两次也不行，他试了几次，才站定了。他想：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他马上提起右脚朝前踏了一步，左脚也跟着往前面移动。他一只手按住肚皮，另一只手拿着指北针。伤口一直在痛，路上常常有东西绊住他的脚。可是他不大在乎这些了。他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地回到"家"，带担架来把小鬼抬回去。他的脚步快一阵又慢一阵，但是他坚持着不再停下来。他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伤痛；他一直在想那个年轻战士的事情。汪永那张带孩子气的圆脸老是在他的眼前出现，连左颊上那个伤疤

也非常显著。汪永是他班里的好战士，他带着汪永出去执行任务已经不止一次了。这个年轻战士勇敢、灵活、聪明、听话，每次都是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有一回他们两个到敌人阵地去捉“舌头”，抓到一个美国鬼子押回来，半路上遇到了伏击。他们消灭了十几个敌人。他的左腿负了伤。汪永一边扶着他，一边押着俘虏胜利地回到家里。同志们给汪永评功，汪永说：“我到朝鲜来，就是要打美国鬼子。抓到一个俘虏，还不是靠班长！我有啥功劳？”又有一回，他带着两个侦察员到敌人阵地，观察敌情。他们趴在草丛中整整趴了二十几个钟头，动也不敢动一下。美国兵把空罐头盒子同香烟头扔了好些到他们身上，一个美国兵的大皮鞋差一点踏到汪永的头上了，可是汪永一声也不响。他们完成了任务回到部队里，过两天他带着全班参加打伏击，完全解决了一个排的敌人。汪永脸颊受伤，血流满面，也不肯下火线，总说，自己是穷苦人出身，一定要替朝鲜的穷苦人报仇。又有一回，汪永谈到了自己，说是当初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母亲不同意。这个年轻人便反复向母亲解释：“我们从前讨过饭，解放了，才有吃，有穿，有房子住。这种幸福从哪里来？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要保住这种幸福，就应当先保卫祖国。光顾自己，啥也保不住！”说来说去，终于把母亲说得高高兴兴，亲自送儿子报名参军。还有一回……像这样的事岂止还有一回！……李明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兴奋。他的脸上常常现出愉快的笑容，心里不断地称赞：“多可爱的小鬼！”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他觉得自己可以一口气走到“家”了。突然间，他的脚给炸烂了的铁丝网绊了一下，他差一

点摔倒在那堆铁丝上面。他吃了一惊，站定以后，居然鼓起勇气跳了过去。他又继续往前走。这次他走不到多远，便感到一阵难堪的痛楚。他用更大的力气按住伤口，仍然迈起大步前进。他充满了信心：他已经走到熟悉的路儿来了。可是不知道怎样，他忽然又昏倒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李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发觉自己背朝天趴在地上，脸给砂子刺破了，像是给许多小虫咬着一样。他两手空空，指北针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他也不去管它，便侧过脸，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脸颊和掌心都是湿的。他知道脸上出了血。他也不在乎这种针刺似的小痛，匆匆地在棉军服上擦了一下手，弄掉了掌心上的砂子，就要站起来。可是这一回不行了。他一连试了几次，痛得满头大汗，牙齿格格地响，却始终立不起。他恼恨地骂道："我不信就憋死在这里！"他忽然想起了汪永的话："只要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回家！"他便爬着朝前动了几下。他带点哂笑地说："我就学学小鬼罢。"他又高兴起来了。他用两个掌心和两个膝头支住身子向前爬行。他吃力地爬行了一阵，忽然听见一声巨响，原来敌人的炮弹在不远的地方炸开了。他静静地伏在地上。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抖掉了满脑袋、满脸的砂土。然后他两手支着地，用力移动两腿，经过一阵努力，他居然站起来了。他兴奋地朝前迈步，刚刚走了几步，忽然腿一软，整个身子滑倒下去，在斜坡上滚了两下，给一棵马尾松挡住了。一阵绞心的剧痛使他又失去了知觉。

“班长！ 班长！”

李明听见有人在远处唤他。他想答应，却觉得四肢发软，张口困难。唤声似乎越来越近。他挣扎了一会儿，才发出微弱的应声来。他睁开了眼睛。汪永那张冒热气的年轻的圆脸俯在他的脸上，一滴眼泪落到了他的嘴角。

“小鬼，你怎么来的？”他惊喜地问道。

“班长，你又昏过去了？我看，你的伤不轻啊！”汪永不回答班长的话，却关心地问道。这个年轻战士又高兴，又耽心，又着急，大颗的眼泪又落下来了。

“小鬼，你怎么的？又哭鼻子了！”李明有气无力地微笑道。“我没有问题。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昏过去了。现在不要紧了。你说，你是怎么来的？”

汪永用肘拐轻轻地触了一下李明的胳膊，在他的耳边小声说：“班长，我抓了个俘虏。”

李明惊讶地再问一句：“在哪里？”

“班长，你看，他左脚还在我的手里，”汪永得意地说。原来他右手拿着一支手枪，左手捏住一个美国兵的左边脚胫。那个身材高大的美国兵直挺挺地趴在地上，脑袋受了伤给包扎好了。汪永用力一拉，美国兵哇哇地叫了起来。他们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汪永用中国话骂了一句：“闭嘴！”他马上不响了。

“小鬼，你真行！”李明称赞了一句。接着他又兴奋地催问：“你快说，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汪永笑答道：“班长，说起来恐怕你也不相信，真是容易得

很。你走了以后，我一个人睡在沟里，心里好难过。我想，我既然能爬，为什么一定要等你们拿担架来抬回去？哪怕是爬一段路也好，你们也可以少走一段。我就爬出沟来，慢慢儿爬着走。我经过一棵树旁边，刚刚爬到一个土坎下面，忽然听见树叶子在响，好像有人在走动一样。我就躲在那儿，把手榴弹拿出来，悄悄地等着他。这个坏蛋果然大模大样地走过来了。哼，他还想抓俘虏！他的脚还没有站稳，口里喊着啥鬼话。我忽然拿起手榴弹，朝他右边小腿上使劲打下去。想不到他个子虽高，其实不中用，马上就来个倒栽葱，正好倒在我旁边，差一点儿就压在我身上了。我不等他起来，就扑过去，拿手榴弹打他的脑袋，他也拚命打我那只受伤的左腿。我自己也不晓得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力气。我还缴获到这支手枪。他的脑袋也是我给他包扎的。……”

李明不等汪永讲完，就插嘴赞道："小鬼，你真不简单！”

汪永听见班长的称赞，心里很高兴，便谦虚地接下去说："班长，不是我本事大，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这位少爷兵会享福。我抓他的时候，还闻到他一嘴的酒气，我差点儿呕出来了。”汪永觉得有趣地笑了。“这个鬼子很听话。我把手榴弹别在背后，左手捉住他一只脚，右手拿着手枪，叫他在前头爬。我在后头推一下他的脚，他就朝前爬一步，我也跟着爬一步。我们就这样爬到这儿来了。”

李明满意地点头说："小鬼，你很会用脑筋。这个办法想得好。我们两个照这样把鬼子押回去罢。你到前面去，现在让我来押他。我们一块儿爬回去。”

汪永说："班长，你在前头带路，还是我来押俘虏。我有了经验了。"

李明想了想，忽然问一句："小鬼，你对付得了吗？"

汪永爽快地答道："行，没有问题。"他又加一句："班长，我跟你一路走，我的信心更大了。"

李明满心欢喜。他真想同他这个可爱的小战士拥抱一次。他鼓励汪永道："小鬼，离'家'不远了。再加一把劲，天亮前一定到得了'家'！"

"到了'家'，多好啊，"汪永笑答道。他好像看见了那所没有大门的朝鲜房子，同志们在不点灯的木板廊上开小组会……他着急地说："班长，我们快走罢。"

李明同意道："好。"他又嘱咐一句："小鬼，你要小心啊，鬼子很狡猾。"他们便向前爬行。过了好一会儿，李明忽然抬起头望前面。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条白色的东西，他知道快到公路了。这条废弃了的公路是敌人炮火的封锁线。他回头对汪永说："小鬼，你紧紧跟着，有事情就叫我。过了封锁线，就不要紧了。"他从这个长着些马尾松、灌木、野花、杂草的斜坡朝下爬去。他的肚皮有时挨到了地面，痛的感觉时而敏锐，时而麻木。他听见自己爬行的声音，也听见后面美国兵和汪永爬行的声音。美国兵的吐气声又粗又响。又过了一会儿，李明停下来，关心地问一句："小鬼，行吗？"

"班长，行！"年轻的声音爽快地答道。

"好，再加一把劲，就到'家'了，"李明满意地说，又继续往前面爬去。他爬过了最后一段凹凸不平的斜坡，满脸汗珠，浑

身也湿透了。忽然一滴冰凉的水珠落到他的脸上，接着又是一滴，两滴。他皱起眉头说："小鬼，下雨啦。"

"班长，下雨不下雨，我们一样爬回去，" 汪永毫不在乎地答道，声音还是那么坚决。

李明暗暗地赞了一句："小鬼真不怕困难。"聚拢的眉毛马上展开了。

大的雨点像枪弹似地一齐落下。不到一会儿功夫，他们从头到脚、从背到胸全打湿了。荷荷的水声掩盖了美国兵的哇哇叫声。班长和战士都忘记了自己身上的伤痛。两个人拖住俘虏连滚带爬地到了坡下，一身全是泥水，两手磨出了血。后来暴雨渐渐地转小了。李明掏出毛巾揩了揩脸，看见美国兵像一只落汤鸡，在雨中积了水的地上发抖，也不去管他，又问汪永："小鬼，行吗？"

"班长，行，没有问题，"汪永仍然爽快地回答。其实他和班长一样，伤口浸在泥水里痛得彻骨，不过他觉得比这个再厉害若干倍的痛楚也制服不了自己。

"很好，"李明放心地笑着。他接着亲切地鼓舞他的战士说："小鬼，你真行。我们在天亮前一定能到'家'。"

公路上到处是泥水，到处是泥坑。仍旧是李明在前面爬行，俘虏在中间，汪永紧紧捏住俘虏的脚胫跟在后面。他们爬了不多几步，美国兵忽然落到泥坑里去了，接连发出哇哇的叫声，不肯上来。李明掉转身去，帮忙汪永拉他，一个人拉手，一个人拉脚，费了不少力气，才把这个满身污泥的高个子拖出水来。可是他还赖在泥地上不肯走，李明和汪永只好拖着他朝

前爬。

“这个坏蛋到了这儿还不老实，我真想揍他几下！”汪永动了气骂起来。

李明听见汪永的话，并不搭腔。过了一两分钟，他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一句：“小鬼，你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汪永诧异地问。可是他不等班长讲话，又接下去说：“我怎么不记得？明天是国庆节嘛。”

“明天？应该说是今天，天快亮了，”李明带笑说。

“班长，那么我们排长就要看见毛主席了，”汪永兴奋地说。

李明觉得眼前一亮，仿佛他自己也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了。他含笑地点头说：“对，再过几个钟头毛主席就要走上天安门城楼了。”

汪永觉得班长好像忽然加了一把劲，高个子美国兵的重量一下子减轻了许多，他也用力去拉那只毛腿的脚胫。雨终于停了。他们越爬越快，不久就出了公路，爬进一块乱草丛生的地方。美国兵哼了两声，忽然扑到草上去，就趴在那里，不肯再往前爬一步。

“真是出洋相！什么‘王牌军队’，尽是这种怕死鬼！”李明轻蔑地嘲骂道。

汪永一直在想北京的天安门，听见班长这两句话，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便搭腔道：“这就是纸老虎嘛，你把他戳破，他就变狗罗。”他拿手枪口戳一下俘虏的腰，大吼一声：“快走！”美国兵马上耸起屁股哇哇地叫起来，头也不抬，一耸一耸地朝前

移动了。

李明同汪永一个用手榴弹，一个用手枪，一左一右这样地押着美国兵在泥水里继续爬行了一阵。吹起了一阵风，树叶和草片沙沙地响了一会儿。夜特别冷。湿透了的破棉衣挡不住风，寒气好像浸到他们的骨头里来了。美国兵做出痛苦不堪的样子勉强爬行着，又打颤，又呻吟。

"小鬼，还行吗？"李明很关心地又问一次。

汪永微微抬起头，充满信心地答道："班长，行，完全有把握。"

"小鬼，明年真要轮到你上北京了，"李明半鼓舞、半夸奖地说。他仰起头看了看天空，深灰色的天幕上隐约地露出几颗星星。他又朝前方看，黑乎乎的山，好几棵怪物似的大树。他知道离"家"更近了，又关心地问一句："小鬼，要不要歇一会儿？你的腿——"

"班长，我的腿不要紧，"汪永不让李明说完，连忙打岔道。尽管他那只打断了的左腿越来越沉重，好像还在把他的身子往后拖，但是他不愿意教班长替他耽心。他说不要紧，他的确相信自己能够把这条断腿带回"家"去。这些时候他一直在想另一件事情。他忽然兴奋地唤一声："班长，"接着差不多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真想见见毛主席。"

李明愣了一下，然后挨近汪永，伸过手去，轻轻地拍拍汪永的肩头，破烂的棉军服上全是污泥，又粘又湿，还在滴水。他喜爱地唤了一声："小鬼！"

汪永亲热地应了一声："班长。"

李明小心地看了看旁边埋头爬行的美国兵，然后低声问汪永："小鬼，你要是真的看见毛主席，你对他老人家讲什么话？"

汪永充满感情地答道："我讲美国鬼子……不，我讲朝鲜老大娘……我讲班长你……其实，不消我说，他老人家全晓得。我只想用尽力气喊一声'毛主席万岁！'……班长，我觉得不管我们在这儿做啥事情，毛主席他老人家全看得见。"他顺手拔起旁边一棵正在开白花的小草，把几片湿透了的草叶放进嘴里嚼了一阵，然后吐出来。他尝到一种令人感觉舒适的香味。他觉得朝鲜的小草也是很可爱的。他的求生的欲望仍然十分强烈。他的脑子更清醒了，心情也更畅快。他不再为自己那只断腿耽心了。他也不再为班长的伤痛耽心了。他好像看见满面红光的毛主席在前面给他们引路。他仍旧拿手枪口戳美国兵的腰，一直在泥水中朝前爬行。

"小鬼，你真会讲话，讲得我都乐了，"李明一面爬，一面带笑说。泥水不断地浸进他的伤口，他痛得像发了绞肠痧一样。但是他觉得再有天大的痛楚也不能动摇他的信心。他和小鬼汪永一样，他已经看见毛主席了。那个耸起屁股像狗一样在旁边爬行的美国兵忽然哼了一声。他轻蔑地看了鬼子一眼，举了举那颗手榴弹又放下来，自豪地想道："你算什么呢？我负伤又不是头一次。治好了还要来打你。"然后他把眼睛掉向汪永，说："小鬼，你讲得好。的确，连我们现在在这里做的事，毛主席也看得见。"他看见了汪永粘满泥土的脸上那对滚圆的黑眼睛，虽然不怎么清楚，但是天开始发白了。那张有趣的脸还

在笑呢(只有那块伤疤给污泥遮盖了)！还有前面小路旁边、水沟另一面的一丛灌木和三几间炸塌了的茅屋。他满心高兴地对汪永说："小鬼，你瞧，我们真要到'家'了！"

汪永同班长一块儿押着俘虏越过田坎，爬上一条小路，路上的泥水和石子，路旁的花草和树木从阴暗中显露了出来。小河沟里水涨满了。他们出来的时候，河沟里的水刚刚淹过他们的脚背，现在会超过他们的膝盖了。汪永有点着急，忍不住问一句："班长，我们怎么过去？"

李明的眉头皱了一下，又展开了。他继续向汪永打气，故意用不在乎的口气说："小鬼，你胆怯了？想办法啊！"

"对，一定有办法！"汪永答道。他知道只要再加一把力，就胜利了。他注意地望着河沟同两岸，一面在动脑筋。他忽然睁大眼睛兴奋地说："班长，有办法了。你押着鬼子先过去。我在这儿拿手枪看住他，他决不敢耍花招。"他停了一下，又说："等你到了对面，我就跟着过去。"

李明看了汪永一眼，简单地问半句："小鬼，你的腿——？"

汪永不假思索，马上答道："班长，我行。我会游水，咬紧牙齿就过去了。你在对面接我罢。"他这时的确没有顾虑。他倒有这样一个想法："反正左腿是无望的了，拚着性命再用它一次罢。至少班长可以把俘虏押回去。"

李明又看了汪永一眼，沉着地说："小鬼，你趴在我身上，我们一块儿过去罢。你仍然可以用手枪监视鬼子。"

汪永知道班长的脾气，有点为难，但是也只好答应道："班长，好罢。"他们两个押着俘虏爬行到河沟边。鬼子又哇哇地叫

了两三声。他们不知道鬼子在讲什么，汪永拿手枪口抵住鬼子的腰，鬼子就不响了。河水开始在他们的眼前发亮。汪永看了看河面，正在打算怎样过去，忽然听见班长说："小鬼，你瞧，对岸有人来了。"汪永一抬头，便看见斜对岸一丛灌木后面转出来两个人形，马上又听见班长高兴地说："副班长来接我们了。"班长用暗号跟对岸的人联系。

"家里的人真的来接我们了！"汪永这样一想，立刻觉得眼前明亮，浑身轻快，腿上的伤痛仿佛也好了许多。他一面小心地监视身旁的俘虏，一面等候对岸的消息。

夜色刚刚褪尽，一片白雾就把对岸淹没了。他们的四周也是一片好像在飞腾似的白色浓雾。汪永牢牢地望着眼前这个没有人样的美国兵。他听见溅水声和熟悉的讲话声，他感到极大的温暖，好像睡在朝鲜老大娘家的热炕上一样。"我到底把俘虏带到'家'了，"他想了又想，忍不住发出一声轻轻的笑。

1960年10月15日在成都。

军长的心*

一

我带着行李站在山脚一棵大树下面等车，已经等了很久了。靠山脚有两间用树枝搭成的屋子。那个头发全白的老大娘(半个月前我见过她一面)几次走过来请我到屋子里去休息，看得出来她也在替我着急。我带着笑向她道谢，我只能说寥寥几个朝鲜字，因此我也没法使她安心。她后来就索性站在我旁边，伸出头去望那条顺着山脚爬出去的公路。可是她的视线又给山遮住了，这条公路好像钻进了山中间一样。她看不见车的影子，又缩回头对我笑笑，摆摆手。我也笑笑。我看手表，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将近一个钟头了。我怀疑，是不是车子出了事情。我又想，也可能是柴秘书对司机同志讲错了时间或者地点。然而要打电话到师政治部去问个明白，我必须带着行李翻过山回到营部去。说实话，我早就急起来了。但是我看到老大娘那副带好意的笑容，又渐渐地安静下来。

在这些日子里天黑得较迟，却又黑得很快，不知不觉间公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六一年一、二月号合刊。

路就隐藏起来了，我只看见一点点白颜色，不用说，仍然看不到汽车的影子。我正在发急，老大娘忽然笑起来，指着公路消失的方向，接连对我点头，反复地讲一句朝鲜话，我也懂它的意思：来了，来了！

我仍然看不见车子。但是我听到了车轮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接着喇叭也响了。我连忙和老大娘握手表示感谢。小吉普在树旁停了下来。我刚刚拿起行李，司机同志已经跳下车了，说一声"给我拿"，就把行李抢了过去。我上了车，老大娘还站在车旁点头挥手。

车子开动了，老大娘和我互相说"再见"。她讲中国话，我讲朝鲜话，她念字不准确，我的读音更差。不过我并不怕讲错，反正她了解我的感情。

车子并不回头，就沿着山脚的公路开出去。我坐在驾驶台旁边，望着挡风玻璃外若隐若现的公路，心里还在想朝鲜老大娘的事情。忽然有人在后面拍我的左肩，我回过头去，便看见军帽下瘦脸上一对非常明亮的眼睛。我听见了一声笑，那个熟悉的声音接着说："巴金同志，你一定等急了。你没有想到我会跟你同车罢。"

我当时并不曾责备自己粗心大意，连后面座上有人也看不出来。我却惊喜地说："军长同志，你在车上，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军长笑答道："同志，你看见车子上了篷，就应当猜到我在车上了。"

他说得对。我曾经搭过他的车，司机同志老郑告诉我：一

号首长身体不好，怕冷怕风，坐车出去总要把车篷上起来。车篷的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入朝以后跟军长接触的时间虽然不多，却常有机会同他见面，他那愉快的笑声和爽快的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耳朵里。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也见过他整天紧张地工作。为了上个月那个攻占无名高地的战斗，他整整忙了一个多月。战斗在十五分钟内结束；打退敌人的三次反扑，也不过花了四个多钟点。可是战斗前的准备工作，不论大小，他都要过问，他到过师部和团部去开会，甚至下连队去看过。他说："准备工作做得越好，胜利的把握越大，伤亡也越小。"战斗结束后，我替他算了一笔细账，连活捉带歼灭，敌人一共给解决了将近三百，缴获的战利品很多，自己的伤亡却还不到二十。关于车篷的话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听到的。我这才注意到军长的瘦脸显得更瘦了，也想起他前些天还讲过他的失眠症渐渐地加重了。有一次在谈话中我就说出他应当休息一个短时期的话。他放声大笑说："照你的意思，我早就得改行了。你不要看我的身体坏。我打起仗来，跟美国鬼子再拖十年也没问题。"参谋长在旁边插嘴说："不说十年，我看再拖二十年你也行，就只怕要把美国鬼子拖垮。"两个人同时哈哈地笑了一阵。我常常听见他的笑声，这种笑声又渐渐地把车篷的印象给我冲淡了，况且今天换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司机开车，我又是在仓卒间上车，难怪我没有想到军长的车篷了。

我不谈车篷的事情，却换了话题说："军长同志，你出来怎么不带一个警卫员？"

"我把他留在团部了，"军长答道。"你现在也不用到师里去了。我已经跟陈主任讲过，接你回军里住几天。这两天我不太忙，可以抽点时间跟你聊聊。"

"那太好了，谢谢你，"我高兴地说，我感谢他的这个安排。上个月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在饭后闲谈中偶尔提到过去的生活，我讲起我当初怎样拿起笔写小说，他也谈到他怎样参加革命。我刚到军里就听见人说军长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这时便请他谈谈长征的经历。他起初干脆拒绝，后来又推到"将来有空的时候"。现在他接我到军里去住几天，他可能要对我讲长征的故事了。

车子不开灯，在公路上奔跑。军长不作声了，他好像闭着眼在养神。我默默地从挡风玻璃望出去。前面的路在我的眼里显得更模糊了，我只看见车子靠着山在转弯。树枝忽然伸进车里来，马上又被奔跑的车子抛到后面去了。我看到了防空哨的小屋，屋前一个战士挥着白旗，说了一句："没有敌机，开大灯走罢！"车子驶过了防空哨的岗舍，马上开了灯，跑得更快了。

我们的小吉普接连追过了好几辆嘎斯车，继续往前跑。不久我看见了灯光。原来坡下有一座桥。一长列的嘎斯车从桥上一直拉到对面的山脚。有的开大灯，有的开小灯，有的不开灯，它们像一条大长虫在那里蠕动。我心里有点着急。要是敌机飞来了，这些车子怎么办？果然，我听见了一声清脆的枪响。眼前的亮光马上灭了。我们的小吉普并不要过江，它仍然顺着山路走去。为了不要跟对面的来车相撞，它的确是用

小跑步在走。

“敌机来了，”司机同志毫不在乎地说了一句。他看见来车渐渐地少起来，便增加了行车的速度。我起初只听见车轮在路上摩擦的声音。司机同志不慌不忙地在黑暗中开车前进。后来我听见熟悉的机声了。声音越来越近，好像敌机就在我们的头上一样。

“不要紧，只有一架飞机，它就会过去的，”这些时候一直不作声的军长忽然在后面讲话了。

我点点头，笑答道：“关了灯就不要紧了。它什么也看不见。”

可是这一架敌机刚刚过去，马上又折回来了。它就在这座大山的上空绕圈子。

“今天晚上敌机又要搞什么花样了，”军长自语道。

“是不是在跟特务联络？”我回过头向他发问。

“不一定。我回去要好好地查一下，”军长从容地说。

“挂天灯了，”司机同志微微笑道。我转脸朝前面看，在我们右面，离我们并不太远，半空中悬着一个亮，就像一盏明亮的街灯一样。我刚刚眨一下眼睛，灯就多了一盏，比头一盏挂得稍微高些。

弯弯曲曲的公路在照明弹的亮光下现了出来。司机同志马上开快车朝前飞跑，他嘴里还在咕噜：“你给我打灯，我就跑得更快。”

我还看到了第三颗、第四颗照明弹。可是车子顺着山坡拐了几个弯，穿过一带树林，很快地钻进了山沟。车子在沟内

鹅卵石的小路上颠得厉害。它走了一阵，前面的路给好几根横放的大木头拦住了，它便停了下来。两个警卫班的战士走到车子跟前。

我先下车。军长也跟着下来。飞机声仍然传到我的耳里，可是不及先前那样响了。警卫员向军长敬了礼。军长把披在身上的呢大衣拉了一下，吩咐道："把巴金同志的行李拿到客房去。"他又对我说："你先到我房里去坐坐罢。"

我跟着军长到他的住室去。我们还没有走多远，刚刚拐了弯走上山坡，忽然听见一声枪响，瞥见了一道红光。军长马上站住，转身看对面的山头。什么动静也没有。军长等了几分钟，又向左右看了看，仍然没有响动。但是飞机声又自远而近地来了。

"明天起要好好地搜索一下，"军长说了这一句，又继续往前面走了。我吃力地跟在后面，我不熟悉这里的路，也不习惯摸黑走山上小道。军长常常回过头看我，鼓励地说："你不要急，就要到了。"

我只有在白天和傍晚到过军长的住室，走的还是另一条路。不过我也知道他的住处离客房并不太远。警卫员扛着我的铺盖卷跟了上来。我们又转了一个弯，到了山坡的另一面，我跟着军长踏上那个泥土上面盖石片的梯级往上走，却看见扛行李的警卫员往下面去。我们走了二十多级，就上了一个小平台，军长的住室就在这里了。军长掀开了雨布，推开了木板门，点燃了桌上的洋烛，马上又出来高声叫通讯员。他叫了两次，听见了应声，便拉起雨布招呼我进去。

这个房间跟我半个多月前看见的差不多。靠窗放一张白木条桌，桌上有一架电话机，一个角上堆了些报纸和文件。旁边还有一张小桌，放了一架收音机。对着门有一张小圆桌和四个用木箱改做的凳子。挨着条桌靠门的一头还放了一把椅子，也是用木箱改做的，不过加了一块作为靠背的木板。这些凳子、椅子都比我在志愿军别的单位见到的好看些，我记得它们。有一次军长带了点自豪感指着它们对我说："这些都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我从前还学过木匠呢。"

里面还有一个小间，是用木板和白布帘子隔出来的。有一张用木板和两条板凳搭起来的床，床上就只铺了些稻草和白布被单。床头有两三口四四方方的镔铁箱叠在一起。这都是我半个多月前在这里吃饭的时候见过的。

我刚刚在凳子上坐下，通讯员小冯进来了。军长马上吩咐："快给我们搞点水来喝。"小冯答应一声，又对我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就出去了。

军长取下了呢大衣挂在木板上，拿起电话的耳机，讲了两次话，要警卫班今天晚上加强警戒。他放下耳机，在屋子里走了几步，便坐在椅子上，望着我说："你这半个多月辛苦了罢。前面连队里条件差些，我们还可以对付过去，你们刚刚从祖国来的人有点不习惯罢。"他不等我搭腔，又往下说："你看我这个窝怎么样？嗯？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些土建设。不怕它美帝国主义拿多少万吨钢铁倒在朝鲜的山头，我们用这些土建设就能顶垮它！"

我看看他那张黑黄色的瘦脸，这张脸在摇曳的烛光下显

得更黑黄了。可是他突然发出一阵愉快的笑声，他笑得那么高兴，好像他的脸一下子也发亮了。我感染到他这种愉快的心情，我也微笑了。我同意地说："对。你们这些窝比钢骨水泥的建筑还安全得多。说实话，我真不想回去了。我在这里感到多大的温暖啊！"

"你不想回去，就在这里住下来罢，"军长恳切地说。他看见通讯员拿了两个搪瓷茶盅进来，便把有盖子的那个接到手里，两只手捧住它，继续说："你想到哪里去，我就送你到哪里去。你应当多跑跑，多看看。朝鲜人、志愿军，这都不简单啊。同志，你看得多，接触得多，你不能不动感情！你起初也许会奇怪，怎么这么多的好人都集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你住下去就渐渐地明白了。"他揭开盖子喝了两大口热茶，把茶盅放在条桌上。"我今天看到一件事情，"他说了这半句，忽然站起来，走了两步，又站在小圆桌旁边说下去："离团部不算远的那个村子，今天遭到敌机的轰炸。我们有几个伤病员在那里疗养。看见老乡的房子起火，我们的卫生人员和伤病员都跑去抢救。有一个大病刚好的战士跑进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背出一位生病的老大娘来。他衣服都烧起来了，他还忍住痛把老大娘放到安全的地方，才扑灭自己身上的火。一个卫生员为了抢救小孩，自己一只胳膊断了，还用另一只胳膊紧紧抱住那个小孩。我赶到了那里，大火刚灭。那个一岁多的小孩一直在哭，小王抱着他在哄他。一位老大娘在旁边对小王讲话，小王好像没听见似的。——小王就是我说的那个卫生员。敌机忽然又来了。这次只有一架飞机，它来得很快，阁阁

阁地响了好几下，就逃走了。只看见几股尘土飞起，不曾伤一个人。我当时站在一棵树下，要躲也来不及了。我远远地望见小王把小孩放在地上，自己用身体遮住他。旁边那个老大娘马上扑到小王的身上。两个人都想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别人。敌机逃了以后，他们从地上起来。小孩在地上直哭。小王还要弯下身去抱小孩，可是支持不住，要不是老大娘扶着他，他就倒下去了。还是我的警卫员把他搀到疗养所去的。小孩由老大娘抱走了。我后来到疗养所去。好些老乡跑来慰问小王他们，听说要输血，都抢先要献血。那个老大娘还把无母的小孩抱来看小王。老乡们看见我去，老大爷、老大娘、大嫂子把我团团围住，有的比划，有的哭，有的讲，好像我是他们最亲的亲人一样。同志，你一定想不到，我也流了几滴眼泪，我说过，不能不动感情啊！我在疗养所，跟老乡们在一起，跟我们的卫生员、伤病员在一起，我觉得我们的心、我们的感情都是一样的。这种心连心的感觉我在朝鲜天天都体会到。你住久了也一定能体会到。你多写罢，越多越好。我们也要多写。你们作家用笔写，我们用子弹、用手雷、用大炮写。你口诛笔伐，我们夺取山头。不管美国代表哈利逊在板门店会场接连耍赖逃会，我们一定要把鬼子揍垮，挤垮。它不停战就把它挤到海里去！同志，你只要肯多住些时候，我一定让你看到我们的新作品，大作品！"

军长像这样地激动，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这段话的内容太多，感情也太多，我不能随便用几句话回答他。而且我的心也被他的话打动了，好像他用一根火棒在我的内部搅了一

下，我的整个思想都乱了。我在同一个时候想到几件事情。但是不管我的思想怎样乱，我决不能用沉默对待他热情的谈话。所以我看见他闭上嘴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在那把所谓椅子上坐下来，捧起茶盅喝茶，我就说："你说得对，我们真该多写，不管是用什么写。总之有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有多少力量就拿出多少力量。我们是在跟凶恶的敌人斗争啊！"我说到这里，军长忽然大声插进来重复说一句："对，我们是在跟凶恶的敌人斗争！"他连连地点头。我的话被他打断了，一时接不下去，我想到了另一件事，便说：

"我想到你说的那个地方去看看，有没有困难？"

"可以，可以！"他放下茶盅站起来说，"我找人陪你去。你要是不觉得累，明天一早去也成。直接到来凤里，更方便。"

我心里很激动，一点也不觉得累，就向他表示希望明天早晨到来凤里去。

"没有问题，我会给你安排好。你现在到客房去休息罢，可能明天很早就出发。"他说到这里就大声叫："通讯员！通讯员！"他看见小冯揭起雨布走进来，吩咐道："你送巴金同志到客房去。"

我和他握手告辞，跟着小冯走出房去。我还不曾放下雨布，又听见他在摇电话机了。

二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那个从上海郊区参军来的小通讯员

叫醒了我，说是军长的车子已经在沟口等候了。我匆匆地洗了脸，跟着他跑到沟口去。

车子仍然停在昨夜停车的地方，开车的还是那个年轻的司机同志，不过车篷已经收起来了，车头插了几根带绿叶的树枝。政治部宣传科的丁干事陪我去，他站在车旁跟司机同志讲话。

我们上了车。车子开出沟口，穿过了树林，天已经亮了。车子今天走另一条路，直接去来凤里。这条路我还不曾走过。我们起初走了一段傍山的新路，后来就走进了两旁有树的公路和夹杂着石子的土路。天大亮以后不多久，丁干事指着前面一个村子对我说："这就是来凤里。"我还看见空地上有几棵大树，几个小女孩正在树下跳舞。车子开到那里就停了下来。小女孩们马上跑到车旁，笑容满面地连声唤志愿军叔叔，好像看见了亲人一样。我接触到一种平静、欢乐的气氛。我跳下车，亲热地回答孩子们的招呼。我有点怀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然而开车的又明明是昨天到过来凤里的年轻司机。

我跟着丁干事走过了一道小桥，进了村子。在村口我们遇见一位头发灰白、眼睛里有血丝的老大娘。她看见我们，就带说带笑地跑过来，两只手紧紧握一下我的右手，又捏捏丁干事的手，接连说："你们来了就好了。"丁干事可以讲一点朝鲜话，他跟她谈了几句。老大娘不肯离开我们，她一定要陪我们到疗养所去。

我们走过一些人家。大树荫下，那些用石片盖屋顶的房屋都是完好的。门前紫色的木槿花开得正繁，院内水井龙头

安闲地立在那里，上了屋顶的瓜藤上有几个惹人眼的大瓜。可是我们转一个弯，就觉得眼界突然开阔了。除了几棵叶子稀少、树枝断折的栗树，和几座顶破墙垮的房屋外，前面只有一些瓦砾堆和剩了半截的烧焦的树干、树桩。还有几个穿白衣的人躬着身子在瓦砾堆上找东西：有老大爷、老大娘和十多岁的男孩、女孩。

老大娘忽然变了脸色，指着瓦砾堆咬牙切齿地说："这都是昨天烧掉的。同志，美国飞机真可恶，放机关枪，不要我们救火！要不是志愿军同志帮忙抢救，我们可苦了。"

丁干事大概说了两句慰问的话。我不懂话的内容，可是我看见老大娘接连地点头，脸上又现出笑容来。

我们走过了瓦砾堆，顺着路转了弯。就在这路口有一棵大树，枝上有一个新的伤口，一根桠枝打断了。地上有好些树叶。我看到这棵受了伤的大树，忽然想起军长的话来。军长就是在这里看见那一切的。可是他不曾讲到自己经历的危险。这棵树不止一处受伤，我又看到树干上的一个子弹孔。地上的落叶大半是烤焦了的。

疗养所在山脚，背靠着土坡，是部队自己用旧材料改建的，也是石片的屋顶、土墙和木板门。我们远远地就看见几个老大娘和中年妇女顶着东西走进那个院子去。

"她们是来看志愿军同志的，"老大娘含笑说，"昨天晚上还有人来。大家对志愿军同志都有意见，他们不肯收下送来的东西，连吃的东西也不肯收。既然是亲人，为什么不肯收呢？不对！不对！"

丁干事把老大娘这番话翻译给我听了。可是他找不到适当的朝鲜话来解答老大娘的疑问。他着急地讲了好几句，老大娘只是不同意地摇着头。

我们走到疗养所的门前。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绿衣黑裙的少妇正顶着空包袱跨出了门限。她看见老大娘，带笑招呼了一声，也给我们打了招呼。

“你昨天不是来过吗？怎么大清早又来了？”老大娘诧异地问道。

这个少妇先高兴地笑了笑，然后说：“只有几个梨子，昨天送来不肯收，我今天又送来了。我不管收不收，放下就走。上回我在田里给炮打伤，要不是那位志愿军同志背着我跑开，替我治疗，我早就没命了。今天不收这几个梨子，我心里过不去。我说，你不肯收，那么你就把我背到田里去让敌人炮打罢。”她说完又吃吃地笑起来，而且边走边笑。她走得很快，好像害怕有人从里面跑出来追她，把梨子还给她似的。

果然有一个工作人员从里面追了出来。他看见丁干事，招呼了一声，便站在门口，用朝鲜话唤那个少妇。少妇回过头挥了挥手，讲了一句话，又继续往前急急走了。他笑了笑，看见我们还站在门前，便向丁干事摇摇头说：“这些老乡真是没有办法。”

丁干事叫他做“小金”，把我介绍给他，问他所长在不在。他便引我们去见所长。

所长正在一间病房里，丁干事就在门口对他说明了我们的来意。这个四十光景、身材瘦小的人紧紧握住我的手，诚恳

地说："欢迎你来。一号首长对我们太关心了。他昨天给了我们很多的指示和帮助，还把小史留在这里帮忙。昨天这里很乱。今天已经好多了。这个病房里是我们自己的人，还有一个病房暂时收容老乡。是不是就先看这个病房？"

我跟着所长朝里走去。我站在门口听所长讲话的时候，就注意到那位陪我们走了大段路的老大娘一下子不见了。我想，她可能是到老乡住的那个病房去了。我靠墙站着，一边听所长的介绍，一边抬起眼睛看房中的六张病床，我忽然看出来那位老大娘就站在左角上的病床跟前，俯下头在对一个病人讲话。我无意地指着那个方向说："原来她先进来了。"

"她是来看小王的。昨天她守了半夜，怎么又来了！"所长微微皱起眉毛说。

我听见"小王"两个字，马上问道："小王的胳膊怎样了？"

"伤得厉害，大概要切除，"所长的眉毛皱得更紧了，他压低声音答道。"这个小青年身体真棒，他受了几种伤，都不吭声。他救了一个小孩，老乡们对他可好了。"所长停了一下，又指着小王对面那张病床说："这个战士从火里背了一位老大娘出来，右胳膊和右边胸部都烧着了，幸好烧得不厉害。那位老大娘本来在生病，今天天刚亮就跑来了，现在还守在病床跟前。"果然那里也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坐在一只矮凳上。

"刚才有位大嫂子送梨子来，我们在门口碰上了，"我想起了那个少妇的话，便说了这样一句，也含有问询的意思。

"有的，她来过两次，我们不收她带来的梨子，她放下就走了。她一口咬定，小王救过她的命。其实，救她的是另外一个

战士，早已回到连队去了。不管我们对她怎样解释，她都不相信。最后她急了，就说，总之是志愿军同志救她的。她还要求输血。昨天有很多老乡来要求输血，我们都没有接受，我们自己已经能解决了。送来吃的东西，我们也推辞了。有些人像这位大嫂子那样放下东西就走，或者不收就不肯走，我们也只好收下，后来送到老乡的病房去。"所长仍然小声地说话，免得惊扰病人，也不愿意让病人听见。我再注意地看病床，就只有靠里的两张病床有老大娘在照料。另外四张床上的病员除了小王斜对面的那一个以外，都是病刚好又受了轻伤的，他们躺在床上看小人书。小王斜对面的那个病员头上包着绷带，左边脸连眼睛都给遮住了，正睡得昏昏沉沉的。所长指着他说："这也是一位好同志，他一共救了三条命。他第二次冲进火里去，背出来母子两个，母亲已经昏过去了，还紧紧抱住吃奶的孩子。孩子的外婆赶到医院来，守了我们这位同志一整夜，天亮了，才到另一个病房看她女儿去。朝鲜老乡们就是这样：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深的感情！可是又那么坚强！昨天才经过残酷的轰炸，今天她们仍然有说有笑……"

所长陪我和丁干事到每张病床前站了一会儿。我看到小王了。圆中带扁的脸，大大的眼睛，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他看见我们勉强笑了笑，声音很轻地说一句："我今天好多了。"我对他讲了几句慰问的话。他微微点两下头，又说一句："请转告一号首长，我的伤不要紧。"老大娘紧紧捏住他那只完好的左手，含笑地望着他，对他说："我的好儿子。"小王对面病床上那个战士侧起身子躺着，整个右胳膊都包上了绷带。那位头

发花白的老大娘坐在矮凳上眼泪汪汪地望着他，有时低声问一句话。这个方脸浓眉的战士看见我们走到他跟前，知道是从军长那里来的，便说："一号首长太关心我们了。他昨天忙了大半天。要不是他帮忙扑灭我身上的火，我的伤不会这样轻。"我肚子里的几句慰问话到了这时都成为多余的了。我在这里站了几分钟，看见护士送药来，我才走开。

我在这个病房里耽搁了不到一个钟头，那个昏睡的伤员一直没有醒。其余三个轻伤的病员都跟我谈了话。……

我们又跟着所长到暂时收容朝鲜老乡的病房去。一到门口，我们就听见里面吱吱喳喳，声音不高，可是讲话的人多，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我们走进房里，整个房间马上安静下来。过了两三分钟，声音又起来了。好些人（都是女的）在招呼所长。也有人在问："昨天那位首长还来不来？"联络员小金在这里担任翻译的职务。六张病床上只有五个受伤的老乡，可是房里却有十二个朝鲜妇女。据说昨天受伤的老乡在十个以上，不过除了那个少妇外，其余的都伤得不重，有些到所里包扎一下就走了。就是住下来的也都向所长要求，想马上回家。其实她们的家已经烧光了。只有那位烧伤的少妇头上缠着绷带，脸色白得像一张纸，颧骨高高地突起，眼睛没有光彩。她勉强露出笑容，说了两三句感谢的话。她抱歉没有能够去看护那位搭救她的志愿军同志；没有能够向那位首长道谢。她的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坐在她的床前，也跟着感谢志愿军同志救了这母子两条性命。

我在这个房间里站了半个多钟头，听老乡们跟所长谈了

好些话。从她们的表情、语气和话的内容，我想像不到她们昨天才遭遇了不幸，现在都是无家可归的人。

我后来又到所长的房里坐了一阵，听他谈了些昨天的情况。他还谈到军长昨天讲过，要他尽先考虑怎样援助受灾的老乡们，叫他拟个简单、切实的计划。

我和丁干事在所里吃过早饭，步行到团部。我在团部见到团长、政委和参谋长，谈起来凤里的事情，才知道军长昨天到过团部，并且有过指示了。下午政委到来凤里去了一趟，他回来后满意地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可是他还来不及谈出具体的办法，军长派来接我的车子开到了。天色已晚，我也想早点赶回军部，便匆匆地告辞走了。

这次是老郑开车。他告诉我，今天搜山，在山头洞子里找到一部收报发报机，并没有抓到人。说是明天还要继续搜山。

三

我回到军部那个土屋顶、土墙壁的客房里，上海通讯员点燃了洋烛，又送来了热茶。我坐在那把有靠背的椅子上喝茶休息。上海通讯员刚刚用雨布和木板遮好了窗里、门内的烛光，军长就推开木板门进来了。

"怎么样？跑了一天也够累了罢？都看到了吗？动了感情没有？"军长一开口就发出他那亲切的、愉快的笑声，跟着就来了一连串的问话。

我连忙站起，笑答道："不累，不累！"等到他坐下以后，我

便对他谈起这一天的见闻和印象来。

他注意地听我谈下去，偶尔端起茶盅喝两口茶。我谈到团政治委员回来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他点头插嘴说："他刚才跟我通过电话。先送点粮食去，再帮忙老乡搭几间房子，他们那个团包下来了。"

我什么都谈过了，这时便提起大家对他表示感谢的事。我刚刚讲到他帮忙扑灭战士身上的火，他忽然站起来带笑地打断了我的话："我几乎忘记了，我是给你送东西来的。"他从披在身上的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两小盒咳嗽糖，放在我手边那张小方桌上，接着又从军裤的边袋里摸出另一盒来，打开了纸盒，取出一颗糖放进嘴里。他一边津津有味地细嚼，一边说："政委今天早晨从志司① 回来了，送了我四盒，现在分两盒给你，这是他在志司买的。你打开尝尝看，这也是从祖国来的糖啊。"他又哈哈地笑了。

我知道他不愿意我谈他自己的事情，我也就不再往下讲了。我照他的话，打开纸盒，取出一颗咳嗽糖放在嘴里。他好像在想什么事情，一连嚼了三颗糖，嚼得发出擦擦的声音。

我不习惯于这种沉默，便又开口了，我央求道："军长同志，今天你有空，讲点长征的故事罢。"

军长抬起脸，望着我，摇摇头说："长征的故事讲起来太长，过一半天把政委也找来，大家谈谈。他讲起来更精彩。"他背着烛光，我看不清楚他脸上的表情。

---

① 志司：志愿军司令部；志政：志愿军政治部。

“你今天先开个头也好，”我再央求道。

他又摇一下头，声音低沉地说：“我现在正想到另一件事情。”他马上站起来，提高声音说：“我给你讲一段我抗战时期的经历罢！”他在这个上下四方都是土的房间里踱了十多步。他的脸向着烛光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色发红，两眼发光，脸上的肌肉微微搐动。我正在想应当用什么话使他安静下来，他忽然开口了：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昨天跟你讲话的时候，很激动。我参加革命二十几年，大大小小的仗不知道打过多少次，我也亲手打死不少的敌人，在朝鲜我还见过给美国鬼子屠杀的上百个妇女的尸首，我不会有婆婆妈妈的心肠。我只有对敌人的仇恨。可是昨天我流了眼泪，到晚上我还很激动。我看见老大娘，就想起从前救过我的老乡。我看见小王，就想起小朱。小朱是我从前的勤务员，小王的相貌真像小朱。我刚刚看见小王，我差一点要叫出‘小朱’来。我奇怪：怎么小朱复活了！”军长停了片刻，他又在先前坐过的凳子上坐下了，端起茶盅，喝了两口小冯刚刚送来的热茶。

“小朱当然不会复活。不过我也可以说他在小王的身上复活了，”军长继续说。“昨天我想小朱的事情想了一个晚上。我并不是伤感，我越想越兴奋：小朱复活了！同志，你没有见过我说的那个小朱，可是你今天刚刚见过小王。小朱就是那个相貌。他当时还不到二十。他给我当勤务员也不过三五个月。我跟你讲讲小朱的事情罢，那个时候我在××地当卫生部长，碰到日本鬼子秋季大扫荡，我在做收容病号的工作，到

了××山，我突然发了恶性疟疾。我回到了××地，烧还没有退尽。过一天又厉害了，小朱成天守住我。天还没有亮，敌人把我住的那个村子包围了。日本鬼子堵住了门口。小朱叫醒我，说：'部长，鬼子来了！'我翻身就起来，当时烧得昏昏沉沉，爬墙爬不上，还是靠小朱把我推上去。我翻过墙就跑，跑了十几米，一枪打中了我。我当时只觉得身上凉凉的。我还在跑，可是敌人追上来了。我正在着急，忽然听见有人在后面大声喊：'八路军回来了！活捉日本鬼子！'这明明是小朱的声音。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意。可是我听见好几声枪响，又听见敌人的叫喊。我又跑了两步，忽然倒下去，什么也听不见了。等到我醒过来，血已经流得不少了。敌人的声音也没有了。我想小朱大概给敌人抓走了，我心里很难过。我要站起来，可是用尽力气，也没办法。我不能躺着等死，我站不起来，就爬着走，痛得我咬紧牙齿，咬紧衣角，我总算爬过了小河沟，躲在一块棒子地里，迷迷糊糊地躺着。我一嘴的血，老是呼噜呼噜地响，噎得太厉害了，我就吞一口。敌人正在河沟另一面棒子地里搜索，搜出人来就当场打死。我迷迷糊糊躺在这一面，动也不能动，我心里想敌人过来，我还有两颗子弹，总不能让他们捉活的。可是鬼子只在对面搜索一阵就走了。我听见鬼子在烧房子，在宰羊；他们在河边洗羊，我也看得见。起初我还想，根据敌人的规律，他们应该撤退了。可是他们吃过了饭，还不见撤走，仍然在山头。"

军长闭上了嘴，把右手伸到前额，朝上抹了一下，将帽檐推高一些。他又站起来，走了三五步，然后坐下去，接着说：

“我本来在讲小朱，现在却唠唠叨叨地讲起自己的事情来了。好罢，我就照这样讲下去。我当时躺在棒子地里，只希望早些天黑。可是棒子的影子老是过不去。一等两等，后来看见太阳离山头不过几丈了，觉得又有了希望。想不到鬼子忽然赶着一群羊吆喝着跑下来了。我想这下可完了。羊一来，敌人就会发现我了。幸好羊有一个习惯，它们跟着带头的羊走。先头的羊已经跑到了河边，在喝水，后面的羊跟着。虽然有几只羊走得慢，敌人也不追赶，却在后面安闲地走着。有的羊走过我的身边，有的羊脚还踏在我的肚子上，吃我头上的棒子叶。我总算忍住了，否则我稍微动一下，都会给敌人发现的。羊群终于过去了。当时是初七、初八，月亮早早出来了，我现在又有了希望。我便起了爬出去的念头。我听见敌人在山头打枪，我想抬头，却抬不起来。我咬紧牙关抬起了头，两只耳朵一直嗡嗡地响着。我用力坐起来，定了定神，抓住棒子秸想站起来，还是不行，就用手支住，慢慢爬到梯田的墙根，后来就跪着，头昏眼花，看见月夜越来越黑，分不清东西南北，扶着墙慢慢地爬行。我不辨方向，费了许多力，又爬回这附近来了。我一灰心，就索性坐在石头上不动了。过了一会儿，我又有了一点劲，我的思想又活动起来了。我想，趁现在天没有亮，我还是往前爬罢。到天亮我爬进了老乡的茅草棚里面，就在那里躲起来。当天下午老乡才偷偷地进来了。他煮了一锅山药蛋，给我端了一碗汤来。我喝了汤觉得比什么都舒服。喝过汤以后，我可以把血大块地吐出来了。我又吃了两个山药蛋，喝了水。我精神好些了。我决定等天黑尽了爬上山去找部队。

谁知快到天黑，我发了高烧，迷迷糊糊睡到了半夜，才醒转来。我正在着急，小朱忽然钻进来了。他看见我就哭起来。他说，昨天天亮前他跟敌人闹了一阵，差一点给敌人抓住，亏得一位老大娘救了他。他后来换了衣服出来找我，只看到一些死尸，他担心我牺牲了。今天他又找了我一天，到处打听，碰到了那个老乡，才赶到茅棚里来。他把我的伤口包扎好了，背着我上山去找部队。我们走错了路，还不曾找到部队，天快亮了，敌人分几路攻了上来。小朱把我藏在洞子里，他搬石头把洞子堵死了。我们在洞子里又待了一天，我渴得没有办法，又发起高烧来。小朱看见我烧得难受，想出去给我搞点药，顺便打听消息，也给我捎点吃的喝的来。我叫他不要出去。他说：'部长，我不能看见你这样受苦啊。'他认为自己跟老乡的关系很好，他出去会想到办法。他不听我的劝阻，天刚发白，就搬开了堵洞口的几块石头，钻出去了。我又把那几块石头放好。过了大半天，有人来了，到我这个洞口看了一下，站了几分钟就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可是过了不到一个钟头，鬼子又来了，这次却不走了，一直站在那里，好像在设法弄开石头。我在里面已经把枪准备好了，忽然听见下面有人在唱《国际歌》，我一听就知道是小朱的声音。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唱歌？鬼子叫了一声，转身就往下跑。歌声没有了。鬼子在追赶小朱，小朱等鬼子跑近了，打一颗手榴弹过去，把那个鬼子打死了。可是好几个鬼子跑过去抓他，放了好几枪，后来打伤了他的腿，才抓到他，把他带走了。我在石头缝里看得清清楚楚。他一路上骂不绝口。我在洞子里昏迷地睡过了

这一天，到了晚上，组织派人来接了我出去。不用说，这也是小朱找人联系上的。鬼子在天黑前也撤走了。我向人打听小朱的消息，后来听说敌人在撤走以前把他活埋了。”

军长说到这里，闭上了嘴，站起来。他挺起胸膛默默地踱了几步，慢慢地走到我的面前，伸起右手在前额、眼皮和鼻梁上擦了一下，放下了手，又说：“同志，就是这个小朱，要不是为了我，他很可能是今天朝鲜战场上了不起的英雄。我想到这样一个好青年，我怎么能不激动？说实话，这些年我就不曾忘记他。我到处看见像他这样的好青年。尤其是我们来到朝鲜以后，那些新参军的小青年真教你感动。他们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多少发光的东西。”他走了几步，又站到我的面前，昂起头说：“同志，我的确高兴啊。我看见好的品质天天在成长、在发展，我多高兴！我今天在这里想的不单是把美国鬼子赶下海去，我还在想我们党的事业，我们国家的前途，那都是无限光明，无限美好，要超过我目前所能想像的多少倍。我很兴奋，我睡不好觉，我在想，我也要迎头赶上啊，我在想，我怎样才不会落在这些小青年的后头！”

他又走到条桌前，在那个凳子上坐下来，忽然哈哈地笑了两声。他又拿了一块咳嗽糖放进嘴里，一边嚼，一边说：“你要听过去的故事，我倒喜欢讲今天的故事。你多到我们部队里跑跑，你会听到很多很多生动的故事，比你们作家写出来的更生动，更打动人心。同志，你可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你们写得不生动，我是说那些活生生的人啊，不是简单几笔就写得出来的。同志，我问你，我在这里嚼咳嗽糖，是什么样一种心情，

你能写出来吗？”

他这句意外的问话倒把我难住了。我应当怎样回答呢？我一时的确想不出适当的话来，我一连说了几个“这个”，却接不下去。

军长又站起来，哈哈地笑了两声。他好像满心愉快地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的确不简单啊。所以我劝你住下来，多看，多接触人，在我们部队里到处都是放光的红心。不瞒你说，我自己也是天天在受教育……我唠唠叨叨讲了这么多，我得走了。等一会儿我叫人来接你到我房里去，我还有一点点刚从祖国捎来的东西招待你。”他点一下头，就用一只手拉紧身上披的大衣，另一只手打开木板门，掀起雨布门帘走出去了。

我没有答一句话，我却跟着他走到屋子外面。他已经转身踏上石级朝上面走了。我站在客房前小小的空地上，抬起头还看见他的身影在往上移，坡上还有两三处亮光，深灰色的天空洒下来一点点微光。我听见流水声，原来从这空地往下走几步，就是一道小溪，溪上还有战士们搭的石板桥。我忽然听见一声枪响。我愣了一下，但是我看见坡上的亮光一下子全灭了，我也就明白了。果然传来了自远而近的机声。这时我才注意到山沟里真静，除了水声，就只有越来越响亮的飞机声。敌机在这里的上空盘旋了好一阵，没有投弹，没有扫射。我也一直站在屋子外面，听着机声，想着军长的话，想着我答不出的那个难题。我在揣想他对我讲话时的心情。我越想越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对我来说，这的确“并不简单”。他考我，要我写出他的心情，我可能交白卷。我不能不承认在他的部

队里短短的三个多月中间，我已经接触到不少放光的红心了。我觉得接触最多的还是军长的那颗心。

敌机仍然在我的头上盘旋，山沟里仍然没有别的声响。可是我忽然听见了军长的愉快的笑声。可能是他在上面什么地方大笑起来，也可能是我在回忆他的谈话，想起了先前的那几声哈哈。我这个习惯于幻想的脑子又在活动了。我好像看见了军长的心，它在放光，它在燃烧。我越想仿佛越看得清楚，我的眼睛越明亮，我的心越暖和。我在一阵兴奋中，有了主意了，我要写一颗放光的红心，即使我写不出军长细嚼从祖国来的咳嗽糖的心情，只要我能忠实地记录下来他的谈话也好。

这样一想，我连那可厌、可恨的敌机声也忘记了。我转身回到客房里，在条桌上摊开稿纸，坐在军长先前坐过的凳子上，写下我的一些见闻。我想把它当作考卷，明天送到军长那里去。

1960年11月18日在成都。

附记 我在这篇小说里借用了一位少将同志的一段谈话。他当时是志愿军某某师的政治委员。一九五二年七月底八月初我在他那里住过几天。在我的笔记本上用整整十六页的篇幅记录了他几次的谈话以后我又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在南京举行的授军衔、授勋章的典礼上见过他一面。我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最近我翻看了那些记录，看到自己的歪歪斜斜的笔迹，很亲切地想到在朝鲜战地认识的敬爱的朋友们。请读者允许我在这里写几句话表示我对那许多“最可爱的人”、尤其是对那位少将同志的感激与怀念。

1960年11月25日记。

李　大　海*

"作家同志，你也来采访李大海的事迹吗？在我们师的英模大会闭幕以后，不到一个月的功夫，同样的话我已经讲过二十几遍了。今天我也只能讲些老话，因为我准备好的就只有这么一套。它们对你也许不适用。不过你还可以下连队去访问李大海本人，同他生活一个时候，你一定会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现在只好请你耐心地听听我的老话了。

"这些天我接待过六七位朝鲜的记者，他们那股热爱英雄的劲真不小。他们喜欢一竿子问到底，教你不得不多讲，不得不把什么都讲出来。可我们的'无畏战士'李大海却又是一个闭上嘴就不想再张开的人。你要他多讲话比什么都困难。要他讲他自己，那就要他的命了。所以我们主任交给我这个任务：要我来介绍李大海的英雄事迹，因为我写过他的立功材料，也帮忙整理过他在英模大会上的典型报告。我在宣传科工作，当然不怕讲话。可是就算我能说会道罢，我又怎么能够讲出英雄的心来呢？因此我常常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表示了要见见本人的愿望。上级既然同意了，李大海也只好硬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文学》一九六一年一月号。发表时题为《无畏战士李大海》。

头皮出来。记者用了种种方法也不能引他多讲几句。他们问一句，他简单地答一句，而且答话都很平常，没有一句惊人。他们没有办法，就要求给他拍照，为他画像。这可教李大海受窘了。事后他也发过两三次牢骚：'老江，多给我宣传，有什么好处呢？仗又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大家都有份。单靠我一个人，不说打仗，就是挖一条坑道，也不晓得要挖多少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别人并不同意他这种看法。不单是朝鲜记者，连附近许多朝鲜老乡都知道志愿军里有这么一位英雄，朝鲜政府授给他二级战士荣誉勋章的消息也早在老乡们中间传开了。就在英模大会闭会的第二天，我们这一带的老乡邀请他到里人民委员会去作报告。他们已经邀请过几次了，我们首长后来只好答应。可是这样一来又把李大海急坏了。我也忙了好些个钟头，帮忙他整理报告的文字。他当然不能把英模大会上的典型报告拿去对老乡们再讲一遍。看见他那种紧张样子，我也真替他着急。他出去打仗的时候，反倒很从容，很愉快。

"那天晚上是我陪他去的。正下着小雨。老乡们穿得整整齐齐，年轻妇女还穿上漂亮裙子，拿着鲜花，来到会场。有的老大娘和大嫂子头上还顶着吃的东西。我们到了会场外面，就听见场内人声嘈杂，人们进进出出。里委员长把我们接了进去。场内的人一下子全站起来鼓掌欢迎。大家都在讲：'就是他，挂勋章的！'我们到了前面，人们静静地坐了下来。里委员长向大家介绍李大海的时候，他向大家敬礼，全场的人一齐站起来，朝着他深深地鞠一个躬，接着又是一阵热烈

的鼓掌，急得他回头对我小声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便在背后鼓励他说：'拿出你"无畏战士"的英雄气概来。你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怕这个！'接着又是小学生来献花，又是奏乐。他没有办法，只好开口讲话了。幸好同来的联络员小尹熟悉他的事迹，翻译起来不会有困难。他报告完了，弄得满头大汗，以为可以走了。谁知老乡们把他团团围住。这一位老大娘过来摸摸他胸前的勋章，又摸摸他的宽肩膀；那一个大嫂子紧紧握住他的手；几个年轻姑娘送来朝鲜的点心；还有一位白胡子老大爷捧了一碗酒来向他敬酒。会场里没有灯。我们进来的时候，里委员长一路上划了好几根火柴，我也照那样拿火柴当电筒使用。不过会场里也并非一片漆黑，外面朦胧的月光从大开的窗户射进来。我们看得见每个人的轮廓，只是看不清楚面貌。本来是用不着亮的，而且李大海也喜欢这样。可是有些年轻妇女在下面叫起来：'我们要看看英雄的相貌！'有一个干部马上划一根火柴照着李大海的脸。他接连划了七、八根火柴，李大海胀得满脸通红，可是还有人叫看不清楚。于是人们关上窗点起了几枝火把，拿到李大海跟前来。这下子大家都满意了。老乡们把李大海围在中间，自己唱起朝鲜歌，跳起朝鲜舞来。大家有说有笑，只有李大海一个人站在那里东望西望，我看见他努力在忍住眼泪。他有时也跟着哼几声，也动动手，动动脚，做几下跳舞的姿势。这个会一直到深夜才结束。我和李大海同小尹三个人一块儿走回我们师政治部。这一次他不发牢骚了。我倒有些奇怪，便带笑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忽然抓住我的左胳膊说：'老江，你不懂，我憋了一肚皮

的东西，真想找个地方好好地哭一场。’我这才又想起他在会场里忍住眼泪的事情，便问道：‘你为什么想哭？你瞧，老乡们大家又歌又舞，一直在笑！’他把我的左胳膊用力摇了摇，激动地说：‘老江，我看见老乡们今天那么高兴，我也很高兴。他们跟我家乡的亲人有什么不同！可是我忽然想起敌人飞机很可能明天后天来滥炸一通。这些老乡又怎么办呢？美国强盗专门欺负和平人民，他们打仗打不过，就拿老乡们出气。我想到老乡们的灾难，我心里难过极了。我恨不得一个人做十个人、一百个人的事情，恨不得从早干到晚。只要能够早一天消灭敌人，保住和平，我就是连骨头都化成灰，我也高兴。可是现在教我当英雄，做报告，受欢迎，我心里多着急啊！我算什么英雄呢？我入党宣誓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就比去年那件事情高得多。可是我今天还是靠去年那个小功白吃人民的伙食。想想，我真着急啊！老江，好同志，以后这些事就索性请你代劳罢。我给你敬个礼！’他说到这里，就举起手对我行起礼来。小尹在旁边笑起来了。他这个意外的动作把我的脑子搅糊涂了。我听他那些话起初很感动，后来听到‘代劳’和‘敬礼’，又觉得好笑，等到他真的站住敬礼，我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我要答礼又来不及，连忙把他的手拉下来，着急地说：‘你不要乱讲啊。人家要看看英雄的相貌，我怎么能代劳呢？’他又抓起我的左胳膊，用力捏紧它，正经地说：‘那么，当了英雄就不要去打仗吗？’我了解他这时候的心情，知道多讲也没有用处，我就说：‘你不明白，你去找我们的主任。’我们回到政治部，第二天早晨他真的去见了主任。我不知道他对主任讲了些什么

话。可是以后我就多了这个差使。不用说，这也不能算是‘代劳’。我先前已经讲过，有时候他仍然得出来见朝鲜的记者。他碰到这样的事情，忙了一阵，完成任务以后，有时当天回连队，有时第二天回去，他临走总要来找我，皱起两道浓眉，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对我说：‘老江，你在主任面前替我讲几句话罢。下次把这个也免了。好同志，还是请你代劳罢。你对客人多讲几句，我就免掉了。’我害怕他又要敬礼，连忙拉住他的右手，抢先说：‘公事公办，你不要又敬礼行贿啊！’这么一来他也忍不住笑了，那两道漆黑的浓眉也舒展开了。他解嘲似地说了一句：‘那么我们就这样分工罢。’便高高兴兴地走了。李大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作家同志，你没有见过李大海，你要我描写他的英雄面貌。你自己不妨想像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相貌。你引用俗话说：‘人不可以貌相’，所以你想见见李大海本人，便于将来描绘无畏战士的真实面貌。李大海不在这里，你短时间又不到他的连队去。怎么办呢？好在我手边还有一幅画，这是我们宣传科的一位干事画的，曾经挂在英模大会的会场上。请你看看这幅画。李大海就是这个相貌：四方脸，紫红色脸膛，浓眉大眼，宽肩膀，高大身材。画上这位又高又大的李大海，在闪着火光的背景里，一只手端冲锋枪，一只手拿手榴弹，押着一大群举起双手、垂下头的萎萎琐琐的美国兵。可惜画家并没有看到那个精彩的场面。我听见人说那个时候的李大海比画上的更威武，那许多鬼子比画上的更萎琐，更丑，那种贪生怕死的可怜相叫人看了觉得可笑又可恨。李大海那个班

当时的班长说：'就像一个人赶一群羊一样。'其实李大海不见得比鬼子高，可是那些鬼子好像一下子就缩短了半截。他们居然不顾羞耻地说：李大海不是人，是神，所以他们六十五个敌不过他一个。有的鬼子还说：'这下性命可保全了，全靠我老婆在家天天祷告上帝，上帝保佑我。'可是我们的李大海怎么说呢？他笑笑说：'可惜那些好武器，白白给这一群贪生怕死的笨蛋糟蹋了，还抵不过我一个土造的飞雷！'那天在英模大会上，我们这个郡的女性同盟派了几个代表来献旗。那几位年轻的朝鲜妇女听说李大海一个人捉了六十五个鬼子，就把他围住，大大地夸奖一番。她们吱吱喳喳地讲个不休。他却窘得'这个'、'那个'地说不出来。后来有个姑娘伸起大拇指赞他是'了不起的大英雄'。他就说：'志愿军里英雄多得很。我却是最不中用的，连这个都比不上！'他把小指头伸了出去。就是在前天，他有事情上来，后来动身回连队去，他把我拉到小山坡上栗树下面坐下，偷偷地问我：'老江，你告诉我：真正的英雄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不明白他的用意，就开玩笑说：'就像你这样：相貌堂堂，身材魁伟，脸形方正，面如重枣，跟戏里的关老爷差不多，只差一部大胡子！'他一听就着了急，拉住我的胳膊说：'呸，谁有功夫跟你闲扯！老江，咱两个是老伙计了。我的心你也猜得透。你的文化比我高，你学习的机会也多些。你说，做个英雄究竟应当怎样？'他最近常常叫我做'老伙计'。其实我还是这半年多因为整理他的材料才跟他接近的。不过这样一来，我们谈话的机会就多了。我写不好的时候，当然要去找他打破沙锅问到底。我有问，他就得回答。

他认为他把自己的事情都对我讲过了。我也自以为他的事情我全知道。其实他的心我哪里猜得透？我知道他不是跟我开玩笑，我只好正经地回答他：'你自己不就是英雄吗？你这个"无畏战士"的光荣称号是志愿军党委赠给你的，是战友们一致公认的。难道你还有什么意见？'他连忙摇摇头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要当英雄，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要当英雄，还应当有许多、许多更大的贡献；像我这样做了一件小事情就当英雄，太容易了。老伙计，请你抽个时间好好地替我想一想，我还应当做些什么事情，越艰苦越好，只要对祖国人民有利，对革命有利，我愿意多吃苦。'敌人的指炮机一直在天空中慢慢地绕圈子。它那讨厌的声音小一阵接着又响一阵。我们前面偏右那个山坡上有两间房子和几棵小树。这时敌人忽然打了两颗烟幕弹到那里，房子和小树全隐在烟雾里去了。李大海指着那个方向恼怒地说：'敌人又要害老乡了。我恨不得把那些炮、那些飞机全毁掉！'他站起来，说一句：'我回去了。'说实话，我对他发生了感情，我不愿意跟他分别，我就拉住他的手问他：'老李，你哪天再来？'他望着我说：'这要看你老伙计了。你能替我多挡一下，我就可以少来。'他说完，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他现在不再向我敬礼，他跟我握了手。他迈着大步朝坡上走去，一面低声唱《志愿军战歌》。我默默地望着他那高大的背影，一直到他跳下交通沟不见了，他那"雄赳赳……"的歌声也消失了，我才转身回到宣传科去。我一路上就在想李大海的问题。这个人的心比我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我了解他太少了。我又想起在我们这次谈话的前两天，他出来见到

我，对我说，他已经向主任要求过了：要是一时打不了仗，就调他去挖坑道，他身体壮，力气大，拿锤，掌钎子都行。他一天干两班都吃得消。作家同志，我不是在替他吹牛。我亲眼见过他挖坑道。天还很冷，他却光着上半身，抡起铁锤，狠狠地朝钎子上打，一下接一下，从来没有失过手。他满头大汗，一身泥土和石屑，嘴里还高兴地哼来哼去。他们打坚石洞，每一班可以打一个半眼，八十公分。有时他掌钎子，手也稳极了。抡锤的同志失了手，问他痛不痛，他的手给打肿了，他还笑着摇头说：'不痛，不痛。同志，你不要老打空锤啊，不然我们会落在别的班后头了。'……我现在看出来了，他这颗心要安静一分钟也不行。他这个人一刻也闲不住。前两个月他当上了副排长，住在一个班里。他什么事都是带头做，帮别人做，教别人做。他把整个班带得好像是一个人。他们真是一条心！战士们讲起副排长就像在讲亲人一样。他待他们再好也没有了。谁有困难，他就主动地帮忙解决；不懂的，他就教；思想搞不通的，他就找你一次两次地谈话。他每天晚上要给战士们盖被子，一天还要管战士们衣服穿多穿少；可是分配工作、交代任务，却一点儿也不含糊。他提起意见来也很尖锐。他对战士是这样，对我们也是这样。譬如他同我已经搞得很熟了。可是有一次我帮忙他整理典型报告的稿子，他讲我写。我要是认为他讲得不对，写好一段念念，又要他重讲；或者我就对他说明在这一段要求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已经这样地搞了一个整天，到了晚上还点着蜡烛继续搞下去。后来我实在支持不住了，拿着笔听他讲话，就打起瞌睡来。他讲了两遍，我一个

字也不曾听进去，我还要他再讲。他笑了笑，慢吞吞地说：'老江，我们还是去要求首长，这个报告不搞了罢。'我勉强睁开眼睛问道：'为什么？你累了吗？'他笑答道：'我不累。你倒累了。我在讲话，你在打瞌睡，工作怎么搞得下去？我看，还是让你好好地睡一觉罢！你跟我们当战士的不同。我们当战士的一连几夜不睡觉，也顶得住。不然，怎么能守住阵地？不说我们，就拿几位师首长来说，刚入朝打大仗的时候，他们不都是几夜不闭眼吗？老弟，你还年轻，你不明白这是严肃的工作啊！'他第一次叫我做'老弟'。其实我比他小不了几岁。他讲完话仍然面带笑容。可是我给他窘得满脸通红，我的睡意一下子全跑了，我出了一身汗。我连忙向他检讨。他笑着拍拍我的肩头，温和地说：'老弟，以后要注意啊。祖国人民叫我们做"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不是到朝鲜来打瞌睡的啊。'他就只有这一次叫我做'老弟'，这是他对我不满意时候的称呼。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在工作的时候打瞌睡了。李大海让我受到教育并不止这一次。我常常讲话不注意，讲错了，我喜欢解释说是'走火'。有一回他听见了就摇摇头，皱起浓眉说：'老江，不行啊。走火，出了事故要受处分啊。'我以后也不好意思再用'走火'的话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了。像这样的例子其实是很多的。李大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管大事小事，他都一样地认真。又有一回，我对他说：'遇到小事情马虎一点，也不算什么。说错了一句话，只要不犯政治性错误，也不算什么。何必这样认真，这样紧张！'他注意地望了我一会儿，忽然一本正经地问道：'我们准备典型报告稿子的时候，有一两句

话不妥当，为什么一定要花许多功夫另外想出一两句换上去呢？你不是说不算什么，何必认真吗？'我又无话可答了，只好收回我那些废话。

“作家同志，你可能和有些人一样，也想知道李大海过去的事情。我自己对这个也感兴趣。可是说实话，在这方面我知道的很少。李大海不喜欢讲他的过去。我同他在一块儿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有机会跟他谈话，我也向他正式提出要求，我甚至说我整理报告，写材料，都需要知道他的过去。他却笑笑，摇摇头说：'免了罢。你就说我从前是个放羊的孩子，这就行了。'我要是逼急了，他就说：'老江，等我下次立了大功，再谈这些罢。'我知道他今年入党批准的时候，写过自传。我便问他在自传上写些什么。他笑笑说：'我们穷人出身都差不多，大家都是一样。'总之他不肯讲自己的事情。不过有一天他特别兴奋，在谈话中不知不觉地漏出了好几句。我才知道他小时候在地主家里放羊，过旧历年地主家请客，他端酒打碎了杯子，给人打得满身伤痕，赶了出来。他一路哭回家，在床上睡了好几天，那时他还不到十岁。他十四岁的时候，父亲在地主家干活，有一天地主叫人把他父亲抬回家，已经死了。他父亲生前欠了别人的债，债主马上跑来讨债，他母亲给逼得没办法，只好听伯父的劝，答应再嫁，才还清债，又把他父亲埋了。以后他就到伯父家给伯父干活，到十九岁又给国民党抓去当兵，还到过外省，过了三年，才逃回甘肃乡下来。解放以后他报名参军，后来他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朝鲜。这就是他过去的经历。我把我所知道的全讲了。作家同志，你

要是能够同李大海在一起住上十天半月，你也许有办法多知道一些。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个宝库，只要你有耐心慢慢地挖，你一定能得到许多许多发光的、宝贵的东西。

“现在我应当谈他的英雄事迹了。其实这以下的话才是我讲过二十几遍的老话。我刚才讲的那些话都是临时想起、临时讲出来的。有些采访的人不愿意听这种‘啰苏的废话’。可是你们作家喜欢描写人的精神面貌，也许用得着我这些废话。所以我今天多介绍了一些。另外有些人却只想知道李大海的立功事迹，他们一见面就要求我马上讲一个人怎么能够活捉六十五个‘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兵。其实这一段事迹，叫我讲起来，非常简单。作家同志，你虽是头一次到战地，你也能想像到李大海当时干的都是‘说时迟、那时快’的事情。他下决心，他一举一动都不能有一分钟的迟疑。在紧急的关头上，最需要的是果断，他要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来个思想斗争，展开一下内心活动，那么他很有可能给鬼子抓走了。他的决心是早就下定了的，他的内心活动在打仗以前就展开过了。有一回，我也曾问过他究竟有没有过思想斗争。他笑笑说：‘鬼子倒真是有思想斗争。我也看得出来，他们一直在想究竟是打还是逃命。想到打仗保不了命，他们干脆跪下来投降！我们呢，我们上战场以前什么都准备好了！’李大海去年还是战斗小组长，他在接到切断敌人后路的任务向前插进的时候，听说上级还要他们捉几个俘虏，他就下了决心：‘你鬼子武器多，我不希罕你的枪；你人少，我就要你人，越多越好！’前一天他们那个连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占领了敌人一座山头。他们接到

新任务以后一个晚上又走了八九十里。他们整整两天没有吃饭，没有休息，当然有些疲劳。可是大家的情绪都很高，只想很好地完成任务，不要让打败了的鬼子有一个逃回去。他们到了目的地，李大海跟着连长跑上山头，遇见了营长。营长命令李大海这个小组马上顺着山梁往右面插，占领那个大山头，控制着山下面的公路，不让敌人从这里逃跑。他带着组里两个战士顺着山梁飞跑，到了那个大山头，找到了隐蔽的地方，就朝下面看。下面有一条小公路，公路旁有个小村庄。村里乱哄哄的，有很多人，还有汽车，有坦克。正在这时，一个战士在旁边对他说：'组长，敌人上来了。'他一看，果然有九个背枪的鬼子正在慢慢地朝上爬。他想捉活的，就同两个战士商量了一个办法。他还说：'鬼子最怕迂回包围，你们两个就在山头掩护我，让我一个人偷偷溜到鬼子背后，冷不防地打它一下，一定能够制服他们，捉几个活的回来。'他看了看地形，拉紧了腰带，把枪梭子、手榴弹都别在腰带上，一只手拿冲锋枪，一只手拿飞雷，便顺着山的右侧，爬到敌人的背后。他找到了一块大岩石，旁边尽是些马尾松，他躲在岩石后面，连气也不敢出，害怕给敌人发现。他很小心地端着冲锋枪，瞄准了几个正在慢慢往上移动的敌人，一梭子弹扫了过去。只听见一阵哇哇的叫声，五个鬼子倒下去了。可是剩下的四个敌人不但不转身逃跑，反而朝岩石这面扑过来。李大海觉得奇怪：鬼子居然有这样的胆量！他想：'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捉活的。'他端起枪等着。谁知道从岩石下面一下子钻出来一大群敌人。他注意到还有几个帐篷。他吃了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多

的敌人！我刚才怎么不曾注意到！’他一扣火，糟了！子弹打完了。他来不及换梭子。不过不要紧，他还有一个飞雷。鬼子先是害怕，后来看出岩石后面只有一个人，胆子又大了些，他们也想过来捉活的。几十个人拿着枪朝他慢慢走来。他不慌不忙拿起飞雷，从岩石上扔了下去。飞雷在大群敌人中间爆炸了，炸得鬼子到处奔跑，乱成一团。他就趁烟雾弥漫的时候，再装上一梭子弹，端起枪跳下去，一面扫射，一面追赶。他打得快，打得准，鬼子倒的倒，跑的跑。枪里的子弹打完了，他就捡起敌人的枪来打。鬼子只顾自己逃命，乱跑乱嚷，他们没有人来指挥了，越跑越挤在一堆。李大海赶上去，大喊一声：‘站住！’鬼子们吓得失魂丧胆，一个跟着一个扔了枪跪在地上，两只手高高地举起来。他端着枪把人数点一下，不多不少，六十五个。可是现在难题又来了：这个地方离山下小公路不远，万一敌人知道了来增援，怎么办？眼前跪着的六十五个鬼子又怎么押回去？他忽然想起口袋里还带得有专门给俘虏看的英文传单，便掏出来扔了过去，同时把别在腰带上的那颗手榴弹拿在手里，另一只手仍然拿着枪，提防着鬼子耍花招。他还记得两句英语喊话，就用他那响亮的声音喊道：‘缴枪不杀！’‘快走！’鬼子们看了传单，听了喊话，果然高高兴兴地站起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排成两行，乖乖地朝山上走去。李大海一只手端冲锋枪，一只手拿手榴弹，押着这一群俘虏走到山头。两个战士都在山头等他。他们先前也放过枪打那些逃散的敌人，一面又在注意山底下小公路上的动静。后来班长也上来了。李大海一直不回来，他们有些着急。班长正打算

报告上级，派人去寻找李大海，忽然听见树枝在响动、人们在走路，连忙往下一看：一大群敌人上来了。班长叫那两个战士准备好，自己再往下看。敌人全举起两只手，而且多数鬼子钢盔丢了，军服也破了，有的人还头破血流，一路呻吟。那个年轻的战士忽然惊喜地大叫：'组长回来了！'班长听见这声欢叫，乐得几乎跳起来，可是走在前头的鬼子却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只听见李大海在后面威武地大吼一声：'快走！'……

"作家同志，我对一般来采访的人，都讲到这里为止。对你，我想更用不着多讲了。其它许多细节你根据你这几个月来的见闻也可以想像出来。不用说，单靠我这篇短短的介绍，你要了解像李大海那样的英雄人物，是不可能的。请原谅我讲话坦白，不会有这么容易的事。所以我劝你到李大海那个班的坑道里去住些时候，即使是一天、两天也好。你看看他怎样工作，怎样生活，找些机会多跟他谈谈。你一定能够比我了解得更多，也更深。你一定能写出一篇介绍他的好文章。我希望早些读到这样一篇文章。这是真话。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想写，始终写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喜欢这个英雄。作家同志，你一定要去，我求你。你要是决定到他那里去，你就约定一个时间，你来找我，我陪你走一趟。今天我不行，明天也不行。后天起哪天都行，只要先跟我们主任讲好，写封介绍信到连部就行了。你答应去吗？好极了！我等着你。后天起哪天都行。你一定要来啊！再见！"

我跟某某师政治部宣传科的江干事在廊下握手告别以后，跨出了院子的门槛，走了几步，无意间回过头去。江干事

也走出来了。他站在门前白杨树下，看见我回过头，便向我挥手，大声说："你一定要来啊！"他身材瘦小，脸上肉也不多。可是他身体结实，好像满身都是劲。嘴唇薄，会讲话。眼睛发亮，而且流露出一种容易传染给别人的热情。即使不是为了李大海本人，单单他这番谈话也可以引动我翻过两座山来实践我的诺言。

我的确不曾失信。可是我来迟了三天，这是"后天"以后的第四天了。我走到那个小院子的门口，江干事正从里面出来，看见我，带笑地说一声："你来了。"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过了一两分钟还不放开。

"你那天讲的话我还记得。你今天可以陪我去吗？"我含笑地问道。我看见他收起笑容愣了一下，连忙加上一句："去找李大海。"

"哦！"他慢慢地吐出了这个声音。他好像记起来了，点了两下头，爽快地答道："可以，可以，马上就去。"

"那么我们一路去找主任罢。"我兴奋地说。

他摇摇头说："不用找主任了。请你就在这里等一下，我进去讲两句话。"他匆匆地走进院子去了。

我在门口等了不到十分钟，江干事又出来了。他短短地说声："走罢。"我就跟着他顺着门前小路，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他走得快，却讲得很少。我问他一句，他总是回答半句。他那张滔滔不绝的嘴，今天好像给什么东西堵住了。他也不让我看见他那对发亮的眼睛。我疑心他发了疟子，想问他是不是有病。可是他走得那么快，我刚刚气咻咻地赶上了他，他

又朝前面急急走了。我跟着他翻过一个小山坡，又走了一些路，到了一座大山的脚下。他忽然在前面小树林里站住了。我到了那里，意外地发现稀疏的树林里有几座黄土盖顶的新坟。江干事不等我发问，就指着中间的一座坟对我说："就在这里。"我惊疑地走近一看，坟前竖着一块长方形的木牌，上面有一行墨笔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畏战士李大海之墓"。我默默地向这座新坟鞠一个躬，然后惊愕地问江干事："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江干事从军服的左面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郑重地翻开篇页，取出一张折好的纸递给我，短短地说了四个字："你看这个。"

我把纸摊开，慢慢地念着上面的字：

刘连长，孙政指，吴排长：

我们为了保卫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是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我们就要离开你们了。我们没有能好好完成任务，多消灭美国鬼子。请你们替我们报仇，早日把鬼子赶下海去。这是我们的希望。

祝我们共产主义革命胜利！

李大海

这张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虽然写得潦草，但是笔划清楚，只有最后一个"海"字笔划不全。不消说，这是李大海的笔迹。我读完这封"遗书"，只知道李大海已经牺牲，可

是我仍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我把“遗书”小心地还给江干事，痛苦地问道：“他是怎样牺牲的？你那天怎么没有讲起？”

江干事叹了一口气，他压低声音答道：“那天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是我们那天就去，我们还可以看见他，跟他谈几个钟头。这是你走后第三天上半天的事情。这几天敌人在前面又吃了败仗，到处乱投弹来出气。那天敌机分几批轰炸他们的山头，单是炸塌他们洞子那一次，就投了五个凝固汽油弹和十二颗炸弹。洞子塌了，把李大海和班长、还有六个战士埋在里面。同志们马上冒险跑去抢救，挖开洞口的土。可是一则，敌机接连来捣乱，又投弹，又扫射；二则，洞口堆的土太多、太厚，还有一块大石头堵在洞口，挖起来很费事，所以挖到黄昏才挖开了洞子。我赶到那里，洞口刚刚挖开。一个年轻战士躺在洞口的一边，身旁有一堆土和石头，还有两把小镐和两把小锹。十字镐只有短短的一截，而且嘴尖磨秃了，铁锹也坏了。再往里走，里面住室里两个炕上，一边睡四个，另一边睡三个，都是穿得整整齐齐，身子伸得笔直；每个人都是头枕着包袱，身上盖着雨布。李大海和班长睡在一起。电筒放在他右手旁边，右手放在胸前，左手垂在腰旁。他一对大眼微微闭上，嘴也闭得不紧，两道浓眉一点也不曾皱拢。他的脸色虽然变得紫中带黑，可是十分从容、镇静、安详，好像在睡觉一样。在班长和战士们的脸上也看不出一点紧张、痛苦和害怕的表情。我们都是这样猜想：洞子炸塌以后，李大海马上组织大家挖土，想从里面挖开洞口。大家刚刚挖掉一层土，就碰到那块大石头，它

把洞口堵死了。他们还用力挖那块大石头，可是小镐、小锹都磨坏了，石头也不曾动一下。在前头挖土的那个年轻战士忽然闭了气倒下了。李大海他们又用这些不顶事的旧工具继续挖了一阵。又有两三个战士快支持不住了。李大海知道毫无办法，马上教大家把身上的土弄掉，都睡到炕上去。他像平日那样照料大家睡好，替他们盖好雨布。他自己也躺在炕上，从笔记本上扯下一张纸，拿出自来水笔，用电筒照着，从容地写了一封信，放在旁边，用电筒压住，然后伸直身子盖好雨布，闭上眼睛。他身体最好，他也死在最后。他到最后一刻仍然充满坚定的信心，相信共产主义革命一定胜利，关心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幸福生活，希望早日把美国鬼子赶下海去。他到最后一刻，还念念不忘他的上级、他的战友和他的同志。李大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江干事停了片刻，忽然昂起头、挺起胸、提高声音说："我们看见他们遗体的时候，我们把他们遗体抬到这里安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流过眼泪。我们主任在坟前讲了话。李大海的战友们在坟前庄严地宣了誓，他那个班的其他几个战士都来了。他给大家树立了一个'无畏战士'的榜样。同志们一致表示：为了革命的胜利，愿意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在坟前唱起了雄壮的《志愿军战歌》。我们觉得好像李大海就在前面用他那响亮的声音给我们领唱一样。"

"作家同志，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无畏战士李大海的最后了。"江干事就这样地结束了他这段并不短的叙述。他注意地望着我，好像在等候我发表意见。我又看见他那对发亮的眼

睛，而且又感染到他那奔放的热情。我热烈地跟他握手表示感谢，他也用两只手紧紧捏住我那只右手。我们激动地对望了一会儿，我觉得睡在坟里的那个人把我们的两颗心拴在一起了。

我们离开这个地方，走了十多步，还回过头去望了两次。下沉的太阳正照到树梢，把树林照得又红又亮。江干事忽然说了一句："老李他们睡在这个地方多暖和啊！"他的声音多么亲切，他好像是拜访了好朋友以后、兴奋地走回家去一样。

1960年12月2日在成都。

附记 李大海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写这篇小说时借用了"二级孤胆英雄"刘光子的一部分立功材料和李江海烈士的一部分事迹。

再　　见*

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课余演出队在上海演出，头三场的票子早就发光了。我在机关里分到一张第一天的票子，兴奋得不得了，当天回到家，匆匆地吃过晚饭，连忙搭电车到剧场去。我下了车，走到那条街口，就看见黑黝黝的一大群人站在剧场大门外台阶下，把街都拦断了。人声闹哄哄的不知道在讲些什么。我走过去，好不容易挤到门前。三级台阶上都站满了人。我拿着票子朝人缝里走，刚走上一级，忽然从右面伸过来一只手，拉住我大衣的袖子，把我拉了下去。我吃惊地回头去看。原来是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他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手里的票子，笑问道："你有没有多的？"我摇摇头说："我就只有这么一张。"我又问他："你是不是约了熟人来？"他失望地答道："我自己没有票子，哪里还敢约别人？"我只好安慰他道："过两天我设法给你要张票子。像你这样等票子，不见得有用处。"他笑了笑，说："我已经等了半个多钟头了。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像我这样在等票子的。大家都想见见最坚强的人！好罢，我总算等到一张了。你一定要给我

---

* 本篇最初发表于《四川文学》一九六一年四月号。

啊。”他跟我握了手表示感谢，就转身走了。我看见大群的人涌进剧场，知道时间快到，心里有些着急，第二次要挤到台阶上去，才发现铁门拉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可以容两人同时出入的空隙。不过，门外的人都很守秩序，高高地举着票子，依次进去。我正站在人们后面静静地等候轮值，又有人把我拉走了。这一次找我讲话的却是一位中学教员，手里还牵着他那个十岁的儿子。不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在打我手里这张票子的主意。我先声明我只有一张票子，也没法找到第二张。他就爽快地说出来他的要求。他奔走了一天，从朋友那里要到两张票子，可惜有一张是明天的。他希望我把今天的票子换给他，让他们父子一块儿进场。否则只好“麻烦”我把他的儿子带进去，随时照料一下，他在散场的时候，到剧场门前来接儿子回家。他说，他儿子听见学堂老师讲起“最坚强的人”的事迹，很受感动，吵着要看这些“叔叔”、“阿姨”们的表演，他也愿意让孩子受一次深刻的教育。总之，他的理由很多。我不能说他的话不对，我又知道他的住处离剧场相当远，而且，那个圆脸小孩一直不眨眼地望着我，多么希望我答应他父亲的要求！我什么话也不讲，就把今天的票子交给他，从他的手里拿过来明天的票子。父子两个那种高兴的样子简直不用提了。两个人同时说一声“谢谢”，就跑到台阶上去了。这时有票的人都已经进去。两面铁门中间的空隙倒显得很宽了。只有几个来迟了的人匆匆地走进那道关口。父子两人一下子就不见了。

时间已经到了。铁门虽然不曾关上，却已经拉拢了。可

是那许多等票子的人仍然站在寒风里，舍不得离开。我又望了望剧场门口明亮、温暖、亲切的电灯光，便掉转身，迈着大步往电车站走去。

我在八仙桥的站台上等电车。我背后人行道上一家商店早扭开了无线电收音机，从那个大喇叭里送过来演出队张家琛同志的朗诵：

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
我们永远和祖国心连心。
…………
只要我们心脏还在跳动，
就要坚决为共产主义斗争！

我掉过头去。商店门前聚集了十几个行人，他们静静地听着这首诗。

从北站开出的五路电车到了这个站台。我跟在十多个人后面上了车。电车上并不怎么拥挤，只有几个人没有座位。车轮吵闹地在轨道上前进。人们在车厢里谈起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的表演，有的人看过了电影短片，有的人读过了《人民日报》上的介绍文章，有的人知道一点点他们的事迹，有的人在北火车站见到欢迎他们的动人场面，有的人参加了慰问团到过朝鲜。不知道怎样，这些人居然凑到一个车厢里来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谈下去，好像一些熟朋友在一起谈家常一样。还没有轮到我发言，电车就到了我应当下去的站头了。

我到了家。家里的人很惊奇我怎么回来得这么早。她们

又拉着我问这问那，要我谈些演出队同志们的事情。她们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完了朗诵诗和女声独唱《不见英雄花不开》，十分激动。我只好把换票子的事老实地对她们讲了。我实在谈不出什么，我女儿就出来讲话了。她是初中二年级学生，在学校里听见老师讲过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演出队的故事，又和同学们集体去看过新闻短片《最坚强的人》，还读过几篇介绍他们的文章；她知道谁跳什么舞，谁唱什么歌；哪一个节目最感动人，哪些表演最精彩……她谈起来头头是道。她不但知道得比我多，而且她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把票子换给别人，自己并不后悔，家里人也没有批评我。可是我恨不得马上飞到剧场去。就是在那里站三个钟头，只要能听到英雄们响亮的声音，看到英雄们愉快的舞姿，我也情愿。

然而我不能不等了一个整天，才走进剧场。我坐在池座上，看到幕拉开，舞台上出现了站成上下两排的服装整齐的部队歌手，他们一个个挺起胸，昂起头，脸上露出表示衷心愉快的笑容，多数人胸前挂着金光闪闪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年轻的指挥举起手来，他的指挥棒一动，《大合唱》就开始了。这是演出队自己编写、自己作曲的新歌；这是歌颂总路线、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的英雄的凯歌。全体听众用那么热烈的掌声表示他们的感动和兴奋。面向着歌手们的指挥便掉转身来向听众们致谢。我才看出他就是整个脸和两只手全给汽油弹烧伤了的涂伯毅同志。《大合唱》以后又是很雄壮的《十月联唱》。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年轻干部把手都拍红了。这下面的节目有诗朗诵，有快板，有口琴合奏，有竹笛独奏，有东北民间

歌舞《闹元宵》，有四川清音《放风筝》，每个节目都得到观众们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也激动得厉害。我觉得在这个剧场里我不仅看到出色的表演，我还看到了最坚强的心。舞台上的同志们把自己鲜红的心掏出来给我们看，那些心就在舞台上燃烧，放出来强烈的光和热，照到、烧到我们的心上，照出那些肮脏的东西，烧掉那些肮脏的东西。我有时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又有无限兴奋的感觉。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想到台上的同志们和我自己。我不能不时时拿自己跟他们相比，有时为我自己惭愧得满脸通红，有时又为他们感到无上光荣。

“了不起！真是奇迹！看得我又难过，又高兴！我现在有更大的信心了。想想看，他们都能够，为什么我不能够呢？”我旁边那个年轻干部一面拍掌，一面很激动地对他的女朋友说。

“我觉得我们自己生活的安排也应当重新考虑一下。我们过去总是替自己打算得多些。”那位两根小辫垂到肩头的年轻女同志小声答道。她那张鹅蛋形的脸也是红红的。她把头埋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双目失明的一等革命残废军人谢立云同志在台上出现了。我先前在节目单上看到这个名字觉得很熟，却想不起什么时候见过他。现在看见他的面貌：长方脸、浓眉毛、大鼻子、厚嘴唇，又听见他的声音，我断定我在朝鲜前线见过这个人，而且跟他谈过话。可是我仍然想不起我们见面的地方。

谢立云同志坐在台上，怀里抱着“鱼鼓筒”，左手打一对“剑板”，右手敲“鱼鼓”，从容地唱起他自己编的《人民公社好

像初升的太阳》来。他用生动的形象化的语言介绍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仿佛一位讲解员引着我们去参观人民公社一样。我很奇怪，没有眼睛的人会看得这么细，这么清楚。生产的发展，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共产主义的美丽远景……没有一样逃过他的眼睛。他唱得那么自然，那么愉快。他带着满脸的笑容，熟练地动着两只手和一张嘴。只有他的两眼紧闭，而且微微凹进去。不过两道浓眉并不曾聚拢。不用说，他不会看见这个剧场。可是他好像比我们看得更多，他看见他唱的那一切新人新事，他看见那一切激动人心的场面，他看见……

我的眼光又落到他胸前挂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朝鲜军功章上面，我忽然想起来了：他还有一对又大又亮的眼睛！他就是那个步行机员。我六年前在朝鲜开城附近见过他。我们在一个连队里见面，我们分住在两个靠近的洞子里。开饭时候，我们和连长、指导员、文书、通讯员们都蹲在洞子前面空地上吃饭。我们在一起不到一个星期，他比我先来，也比我先走，他回到团直属的通讯连去了。以后我就没有再看见他。后来我又到了别的单位，更无法知道他的情况。是的，就是这个人，一定是他。我当时用的那个笔记本上还有他的亲笔签名。这样一想，我兴奋极了，在座位上也有点坐不住了。刚巧这个节目演完，谢立云同志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下去以后，报幕员出来宣布“休息十五分钟”，观众们纷纷站起来，陆续走出场去。我抓住这个机会，连忙从右面一道太平门穿过走廊，走到后台。

我说明我要见谢立云同志。有人把我引进一间小小的休息室，我不过等了两分钟，他就在一位胖胖的护士的扶持下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先开口说："谢立云同志，你还记得我吗？"我用两只手紧紧捏住他的右手，高兴地大声说："我叫××，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们一起在开城附近住过几天。你有任务先走了。"

他也把左手伸过来摸我的手，摸了一两分钟。他忽然笑着接连点头，亲热地说："我记得。我们在一起共过患难，我们那两个洞子都给雨冲垮了。"

我接下去说："对，我们那天刚搬走，过一个钟头就下起大雨来。我那个洞子晚上就垮了。"

"是这样。我的洞子到第二天下午才给砂土堵死。你当时还不肯搬。我看见洞子靠不住了，土大块大块地掉下来，地下也在冒水，再要下一场大雨，我们即使不埋在里头，也要受伤，我才劝你搬走。指导员因为我住在你隔壁，他要我照顾你。他还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说服你搬开。前一天晚上虽然没有出事情，可是指导员一夜没有睡好觉！"他只顾兴奋地说下去，忘记叫我坐，也忘记自己坐。我也是这样。我们谈了一会儿，在旁边照顾他的护士同志却讲话了。她含笑插嘴道："你们坐嘛。坐下谈话更方便。"她说了就把谢立云同志搀扶到那张靠壁放的长沙发跟前，让他坐下。我也走到那里，就坐在他的左边。护士同志又给我们端了两杯茶来，放在沙发前那个长长的小茶桌上，就出去了。她掩上门的时候，还对我笑笑，说了一句："你们多谈一会儿不要紧。"

"对，你说得对。我那个时候没有一点经验，给指导员添了好些麻烦。"我坐下以后，就接着他先前的话带笑说："我记得我搬到老乡的房子里，你还来看过我。我们坐在廊上谈了一个多钟头。"

他笑道："是啊，你记性真好。"他伸过右手来，想拉我的手，我也把右手伸给他。他又用两只手拿着我那只手，轻轻地摸它。"我还记得，我们的任务改变了，我搬到连部那个洞子住了一天，第二天不到天黑，就回到通讯连去了。你还送了我一节路。"

我接连地点着头说："对，对。你背着步行机，拿着天线杆子，走得真快。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还说过要给我写信。"

他马上接下去说："我本来要给你写信。可是我回到连里，过两三天又出去了。不久，战斗打响了，我就挂了花回国了。你也想不到我会比你先回国，在国庆以前我就离开了朝鲜。"他说到挂花，声音就有些低沉，再说到"离开朝鲜"，声音更低了些。他听见场内响起了铃声，便换过口气说："下半场就要开始了。你可以进场了。"

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离开他，也不想使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地中断，因此向他表示："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空，你要是有空，我倒愿意跟你多谈一会儿。"

他刚刚扶着沙发的靠手站起来，听见我的话，高兴地点头说："我有空，我有空。"又坐了下去。他忽然补问一句："你不看后面的节目吗？"

"不要紧，我下次看也行。"我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们分别

了六年，见一次面也不容易啊。”

“是啊，是啊！可是我们到底再见面了，大家都很好。”他含笑地说：“你好罢？我想你一定很好。你看我也很健康啊。”他把头抬高，胸口挺起，两只手微微张开，好像要让我一眼看明白他的身体很强健似的。

我先前在台下就看清楚了，现在又看了他一眼，便称赞道：“你的确很健康，比我上次在朝鲜看见你的时候，还要好些。”不用说，我有意避免提到他那对发亮的眼睛。此外，他的确像一个身心都很健康的人。

门给人推开了，那个胖胖的护士走进来，带笑地说了一句：“你们还在讲话。”要不是她开了口，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她已经化好了妆，梳一根松松的大辫子，穿一身粉红色的短衫裤，再系上一条绿色围裙。

谢立云同志不知道她快要上台参加表演了，听见她的声音，就说：“同志，我碰到老朋友了。你让我们多谈一会儿罢。”

护士同志满意地笑了笑，说：“你们谈罢。等我卸了妆再来接你。”她走到门口，还回头看我，含笑道：“同志，请你多多照顾他啊。”

我也带笑地点一下头，答道：“好，我会照顾他。”

她掩上门以后，我们又继续谈起来。

“我真高兴，会在上海碰到你。”他拉着我的袖子说。“我还记得，那一天下了几次雨，我们那两个洞口的土开始垮下来，水也流不走。我在我的洞口用空罐头舀水往外倒。你也在你那个洞口拿铁铲一铲一铲地把落下来的砂土弄走。我们一边

讲话，一边动手，后来指导员带了两个通讯员来帮忙。……”

我不等他讲完，就接嘴说：“我也记得，我睡到半夜，黑暗中给一个大的响声惊醒了，我还以为敌人的炮弹打到洞口来了。我忽然听见你大声喊我。你耽心洞子垮了，连忙带着电筒跑过来看我，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卷起我的铺盖和垫被，硬把我拉到你那个洞子里去。我就在你那个炕上睡过了这一夜。”

“对，对！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好像还是昨天的事。”他不停地点了好几次头，等我讲到一个段落，他又开口了。“我在朝鲜过了两个雨季，只过了一个冬天。现在在朝鲜已经下雪了。在上海倒还暖和。”

“我也还记得朝鲜的大雪。在雪冻起来的‘玻璃马路’上，我不晓得摔过多少跤。”我感到亲切地回忆道；“我也觉得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我刚刚到三连的时候，那天我们吃过晚饭，你在洞子前面空地上试验步行机。你打开机器，听见敌人讲话的声音，你把耳机给我戴上，我听见鬼子军官在发脾气骂人。”

“对，对，我都记得。不到一个月，我就用上它立了功。”他也在回忆当时的情景。

“你立了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高兴地插嘴说。话出了口，我才想到他就是在那次战斗中负伤的。

“是啊，我当初讲过要给你写信，你给过我地址，”他把头向我这面伸过来，又拉住我的一只手，慢慢地说。“可是从阵地下来以后，我怎么能写信呢？那些时候我向你讲什么话好呢？”

他渐渐地提高了声音，“现在好了，我可以亲口对你讲了。我从阵地下来，左腿挂了花，两只眼睛看不见，一个耳朵也聋了。腿同耳朵后来都医好了。只有眼睛没有办法。我下来以后有一段时期的生活已经记不清楚了。不过我还记得阵地上的情形。”

他停了一下，放开了我的手，伸手到小茶桌上去摸什么东西。我知道他要拿茶杯，便把那个高高的玻璃杯递到他的手里。他双手捧起杯子放到嘴边。我就说：“谢立云同志，你要是记得，谈谈也好。”

他喝了两口茶，就放下杯子。“我说！我说！”他带笑地说起来；“我今天碰到在朝鲜认识的熟人，真高兴。你愿意跟我谈，我怎么不想多讲几句？不过阵地上的事情讲起来也很简单。我们那次分别以后，不到一个月，在拿下八九点六高地的战斗中，我同叶敏两个跟在一营的文参谋长后面冲上了山坡。你大概还记得叶敏同志罢。他是小个子，也是我们的同乡，那次你到三连的时候，他还在那里，跟我住一个洞子，过一天他就先走了。我同叶敏两个当时正在朝上跑，敌人的炮弹就在我们的四周爆炸。等我们两个跑上主峰，找到文参谋长，两个人都挂了花，他伤了左膀，我伤的是左腿。尽管伤口痛，这点轻花实在算不了什么。上面到处都是敌人丢下的东西，还有鬼子的尸首。同志们忙着加修工事。我和叶敏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洞子把机器安起来。我跟叶敏商量好，他负责电池和天线，我负责通话，一定要好好地完成任务。他插起了天线杆子，我打开机器，文参谋长跟团指挥所联络上了。我在机子里听

到敌人忙乱的叫话声，就报告文参谋长：敌人联络很忙。文参谋长说：‘鬼子一定在准备进攻。’他一面吩咐同志们作好迎击的准备，一面叫我用暗语向团指挥所汇报了情况。他还特别嘱咐我们要保护好步行机。他说：‘等一会儿就要看你们了。你们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啊。’我们两个都说：‘首长放心，只要人在，机器就没有问题。’果然第二天天蒙蒙亮，敌人就开始反扑了。先是几架飞机来狂炸，然后一阵一阵排炮打过来，跟着鬼子就顺着山坡朝上爬。天线杆子同天线给敌机炸断了几次，都让叶敏一节一节地找回来接在一起了。联络始终没有断过。文参谋长发觉鬼子偷偷朝上爬的时候，他命令我赶快要求炮火支援。我害怕机器会给震坏，一直把它垫在腿上，抱在怀里。我当时正瞪着眼睛、张着嘴对着送话器大声讲话，忽然一颗炸弹落到洞子前面，轰隆一声，不知道有多少砂石、泥土一齐打进洞来。我的帽子同耳机都震掉了，我满嘴、满眼、满脸都是砂土，我一下子痛得麻木了。我听见文参谋长在喊我，我马上清醒过来。我连忙吐出嘴里的砂土，可是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我想：不要紧，只要嘴能说话就行。我继续向团指挥所传达文参谋长的要求，赶快用炮火来杀伤敌人。我拚命大声地喊，我才发觉我的左耳也震聋了。我伸手去摸到了耳机，把震断了的耳机线接好。我喊叶敏，也不见他答应，我后来才晓得他已经牺牲了。我找不到叶敏，就伸手到处摸，把电池也找到了。我放了心，把电池放好，靠自己瞎摸来换掉已经烧得滚烫的电池。这时我们自己的排炮已经打过来了，敌人的反扑也给打垮了。我们一连打退了敌人几次的反扑。鬼子

丢下好多尸首逃跑了。后来文参谋长又要求增援一个班。一个班的战士很快地就上来了。真是要炮炮到；要人人到。这回步行机比什么都灵。敌人后来又反扑了两次，仍然让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以后就不敢再上来送命了。”

他眉飞色舞地谈了上面那一大段话，他的手也时时在比划。他是那么兴奋，好像他不是坐在沙发上，却仍然坐在那个小小洞子里，抱着步行机一样。说到最后他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声音也低了些，他又说：“我从阵地上下来，就给送回祖国了。”

他听见从他嘴里吐出来的“祖国”两个字，感到非常亲切。我们在朝鲜的时候，就常常用这样的声调讲起祖国。我回到国内却难得听见人们把这两个字当作非常具体的东西，用那么深厚的热爱和怀念来讲它。他这么一讲，把我也带到当时的朝鲜战地去了。我带着强烈的感情插一句嘴：“是啊，我们的祖国！”

他连忙用低沉的声音接下去说：“可是我刚刚到东北医院里的时候，我思想上还有些搞不通。像这样回来，怎么对得起祖国呢？况且眼睛瞎了，耳朵聋了，左腿又挂了花，成了残废，以后又能做什么呢？难道要祖国养我一辈子吗？我自己不能替祖国做事情，我还有脸向祖国伸手？我想来想去，难过极了。可是我起初不肯暴露我的思想，把什么都憋在心里头。不过护士同志常常给我读报，讲各方面的新人新事，又讲些模范伤病员、休养员的故事，我的思想渐渐起了变化。我开始觉得自己不应当消极，不能让这点困难就逼死我。志愿军里头有多

少坚强的人，未必偏偏我一个人不中用？我也想通了些，就把我的思想向大家讲了。这样一来，我更得到医院负责同志和别的好多同志的帮助，思想的问题算是慢慢地解决了。我完全不悲观了。后来我的腿医好了，左耳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就回到成都来，进了教养院。我们在院里的生活、学习、劳动等等，这两天上海报纸上都有介绍，我们秦队长在每次演出前，也谈了一点儿。我也就不讲了。最好请你到我们院里来亲眼看看。的确值得看一下。”（我插进了一句：“我要来。”）“在教养院里我学到的东西真多：我学会了念盲人书报；我学会了搞一点儿轻微的劳动；我学会了编快板、编唱词；我学会了写歌子、写文章。我们也上政治课，也学习时事，进行讨论。这几年来我们祖国的大事小事，我都晓得。我才明白我的心眼并没有瞎。我编过不少的快板、歌词，歌颂那些惊天动地的变化，来采访的记者同志拿走了几篇，在报上发表了。”（我这时又插嘴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学的竹琴？”）“竹琴吗？学得不久，还是这两年才学的。”（他愉快地微微一笑。）“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爱听贾瞎子的竹琴，什么《华容道》，什么《处道还姬》，他那三个‘罢’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高兴的时候也学着哼两三句。后来我们院里办晚会，自己搞节目。我听见只有一只手和一只眼睛的易如元同志吹竹笛吹得那么好，又听说两只手都截掉了的黄天然同志打乒乓球打得那样精彩，我什么困难都不怕了。我对任何事情都有勇气和信心了。我就自己练起竹琴来。我一边练，一边回想贾瞎子那些有名的唱腔，越想越有味，很快就学会了。不过我这是无师自学。要唱旧的

节目，我连词都记不全，也编不来；况且我又会编几句快板、歌词，为什么不唱点新人新事？所以我就编了些新词来唱。我头一次上台表演，唱的是我们教养院的生活，同志们都听得很高兴。大家常常鼓励我，供给我材料，以后我又编了好些新节目，有的给自己唱，有的给别的同志唱。我昨天晚上表演过后，今天上午有位记者来采访消息，这是一位女同志，她问我：'你在五二年眼睛就看不见了，怎么能参观人民公社，看得这么清楚，写得这么形象化？'我回答她：'我眼睛瞎了，心不瞎。不但人民公社，我什么都看得见。等我回到教养院，我还要写篇歌词唱唱你们的上海，唱唱上海人民的生产干劲，唱唱上海人民接待我们的热情。'她还是不大相信我的话。我又说：'同志，我看不见你，我却晓得你人胖胖的，脸红红的，身材高高的。不消说，这是别人对我讲的。我晓得你心里还想说：'在旧社会，残废的人为了生活，只好卖唱、算命、上街要饭；在今天的新社会，你们不肯睡在床上让国家白白养活你们，你们还要苦学苦练，"没有眼睛照样读书看报，没有双脚也能疾走飞奔"；你们真不简单，真是最坚强的人啊。'我说到这里，听见她噗哧笑起来，我又往下说：'其实这很简单，很平常，连你也办得到。你想，连我们残废的人都能够，像你这样健康的人还不能够吗？我们都是一样热爱共产主义事业的人，都愿意为这个伟大的事业多做事情。既然愿意，就干嘛，就加油多干嘛。我们想告诉观众的就是这几句话。我们的观众也懂得这个。'我又问她是不是党员。她说申请报告已经打上去了，可是还没有批准。我说：'那么你就努力争取嘛。我在朝鲜的时候并

不是党员，我还是眼睛瞎了以后入党的。同志，你记住我的话：努力争取嘛。'这位女同志把我的手握了几次，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看她倒是个好同志。她说以后还要来找我。……"

我们正谈得很高兴，卸了妆的护士同志进来干涉了。其实她已经进来了好一会儿，静静地站在门口听他讲话，到这时她开口了：

"谢立云同志，你应当休息了。你今天从早晨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嘴。现在是最后一个节目，快要散场了。"

"好同志，这是难得见面的老朋友嘛，让我们再谈一会儿好不好？"谢立云同志把脸掉向声音来的方向带笑地央求道。

"不能通融了，这是秦队长交给我们的任务。"她笑答道。她又含笑地向我点头示意。我忽然想起她先前对我讲的那句话。我当时明明答应了她。可是她一走我马上忘记了。我并没有照顾过他！现在又看见她的笑容，我也只好站起来。我拉起谢立云同志的手，紧紧地握着，一面说："我要去看最后一个节目了，你也好休息一会儿。"

他也站了起来。在我要松开手的时候，他却把我的两只手拉住，亲切地说："你去看罢。张家琛同志两只手都截掉了，他不但能弹琴写字，他还会拿扇子跳舞。这不简单啊，的确值得一看。"这次倒是他自己说出了"不简单"三个字。

我打算走了。可是他仍然拉住我的手。他刚刚拿开一只手，马上又把它放在我的藏青呢制服左肩下的口袋上面，慢慢地摸了一阵。他惊讶地问道："同志，你怎么没有戴上纪念章？"

“我害怕弄掉，放在家里了。”我不在意地答道。我的眼光却停留在他胸前金光闪闪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深灰色的朝鲜军功章上面。

他摇摇头惋惜地说：“同志，你今天应该戴啊。我们演出队的同志大半都到过朝鲜。我还记得，那天半夜我拉你搬到我的洞子里去，还把你的纪念章掉到水里头了，后来用电筒照着捡起来的。”他笑了笑，便放开了两只手。护士同志在旁边用眼光催我走，我便趁这个时机告辞出来了。我走到门外，还听见他那充满感情的声音：“再见！再见！”

我到了台下，还来得及看见张家琛同志和涂伯毅同志的活泼、轻快、欢乐的舞姿。幕落下以后，只听见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观众们一齐站起来，拚命地鼓掌欢呼。幕又升起来了。人们拿着花束跑上台去，向全体表演者献花。演出队的同志们都站在台上。我又看到谢立云同志了。他站在张家琛同志和涂伯毅同志的中间，昂起头，挺起胸，满脸笑容，整洁的军服上，军功章和纪念章灿烂地发亮。他后来把花挟在腋下，兴奋地鼓起掌来。

幕落到第三次，观众们还在热烈地鼓掌，不肯散去。于是又升起了幕，台上的人把花一枝一枝地抛下来，台下的人又不停地将花枝抛上去，大家尽情欢呼，好像在过欢乐的节日一样。

我最后跟着拥挤的人群走出了剧场。我刚刚走下台阶，前面有几个年轻人用激动的声音谈话，我只听见一句：“我们这个时代真伟大！”他们已经跑远了。

三天以后我又到这里来过一次，我还替那位出版社的朋友找到了一张票子。我又听到谢立云同志的竹琴节目《给美帝算命》。他用生动的、形象化的语言，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揭露了它的阴谋，讽刺了它的丑态，严厉谴责了它的罪行，最后指出了美帝国主义的注定的灭亡。真是一篇痛快的好文章。我在他谢幕以后，本来还想再到后台去找他谈谈，可是听说最近他心脏不大好（他那天向我隐瞒了他的病），我便不敢去麻烦他。这以后，我下乡去了一趟。我不曾注意到日子过得那么快，我回到上海，我的女儿马上告诉我，她已经在文化广场看过了演出队的表演，并且听过了广播大会上的精彩节目和秦队长的告别讲话。她还说演出队快离开上海了。第二天上午、下午我去沧州饭店拜访谢立云同志，不巧两次都碰到他到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去了。我只打听到他们下一天搭火车到南昌去。第三天上午我又匆匆地赶到沧州饭店，演出队正在开总结会，同志们男男女女坐满了一个大房间。我不便打扰他们，就站在会议室门口跟谢立云同志谈了几句话。我问到了他们当天下午从沧州饭店出发的时间。

可能是我听错了话，也可能是他当时没有讲清楚，我下午赶到北火车站的时候，演出队的全体同志都已经在车厢里坐好，送客的人们也早到齐了。人们隔着朝上推开了半截的玻璃窗谈话。有的还紧紧地拉住彼此的手不肯放；有的一个人同时对几个人讲话，又用眼光去找寻更多的人。我来迟了。我只好慢慢地穿过人丛，用眼光找寻车窗里的熟面孔。

我见到了年轻诗人张太明同志，这个“没有双脚也能疾走

飞奔"的英雄，我见到了下肢瘫痪的女歌手何长俊同志，我见到了张家琛同志、涂伯毅同志和别的许多同志……，他们都在跟车窗外送行的人亲热地谈话。我最后才在一堵只打开一个缝的玻璃窗的角上看到了谢立云同志的长方脸，他和也是双目失明的樊宁然同志（他的"金钱板"唱得多好！）坐在同一个窗口，正在跟车窗外月台上一个高身材的年轻女同志谈话。我连忙跑到窗口，大声喊："谢立云同志！"他一面答应，一面从窗缝里伸出一只手来。我紧紧拉住他那只手，高兴地说："我到底找到你了。"

"我在等你，我晓得会再见的。"他的声音不高，也不急，里面却流露出很深的友情。他接下去再说一句："而且以后还会再见的。"

"我来晚了。"我又感动、又抱歉地说。

"不晚，不晚；我们来得早一点。"他带笑说。

"你下次来，一定请你到我家里坐坐。"我恳切地说。

"我一定要到你家里去看看。你也要答应到我们家里来啊。"

"你们家？"我愣了一下，无意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他答道："你晓得我家里的人都给国民党保长害死了。不过你忘记了我还有个很温暖的大家庭。"他愉快地笑了笑，又加一句解释："我们那个教养院……"

我不等他讲完，连忙点头回答了几个"对"字。

他又说："我有篇东西想拿给你看，可惜来不及了，等将来改好了再寄给你罢。不过方同志前两天帮忙我整理了一份稿

子，你若是等不及，向她要来看看也好。我写的是《上海工人干劲大》。你一定能帮忙我修改。”他便把我介绍给方同志。我早已看出来她就是谢立云同志上次讲过的那位记者，果然是“脸红红的、身材高高的、人胖胖的”姑娘。她刚刚跟樊宁然同志谈了话，听见谢立云同志的介绍，马上爽快地对我说：“等我抄好，一定给你送一份去。”她还要讲话，可是列车员同志过来通知我们，快往后退到白线以内，说是要开车了。

这样一来，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但是月台上人声却更嘈杂。我刚刚说了一声：“要再来啊！”火车就慢慢地动了。我不停地挥着手，不停地大声喊：“再见！”我看见谢立云同志也在窗内挥手，还听见他用带哭的声音高叫“再见！”。樊宁然同志也是这样。我跟着列车跑了几步。在月台上朝前跑了好几步的人很多。我还看见涂伯毅同志眼里的泪珠；张太明同志站着在挥手，他的眼睛也是湿的；何长俊同志坐在窗口接连地说：“我会再来的。”眼泪已经落到她的嘴唇上了。

一片“再见”的声音送走了列车。送行的人都散去了，我还站在月台上望着已经伸进了苍茫暮色中的空空的轨道。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抓住我的左胳膊，一个女同志的声音说：“我真想跟他们一道去。”我回过头，意外地看到方同志的红红脸，现在连眼睛也红了，而且满脸都是眼泪。

“不要难过，谢立云同志不是说还会再见吗？”我同情地安慰她道。

“不！我不难过！我是兴奋啊！”她一面分辩道，一面用手帕揩去脸上的泪痕。她还害怕我不懂她的意思，又解释道：

"我为什么要难过呢？我天天想到他们，学习他们，我会天天跟他们再见。……"

我跟她在车站大门外分手以后，走在灯火辉煌的街上，我还在思索她的话，她这个解释倒是我不曾想到的。

1960年12月10日在成都。

团　圆*

我从王主任的房里出来，雪早已住了。山坡上一片白色。石头砌的山路一级一级蜿蜒地伸到下面去。王主任住在半山。我的住处在山下。我在这个军的政治部作客已经一个多星期了。晚饭后我常常同王主任散步到山沟口；有时我也到他的房里坐坐，听他谈些战斗故事。王主任才四十出头，比我年轻，可是他知道的事情很多。他喜欢讲话，要是兴奋起来一口气讲两个钟头，也不让人插嘴。我同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拿着兵团政治部的介绍信到这里来找他，我们头一次见面，谈不上十句，他就称我“老李同志”。等到他陪我走进我临时的住室、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索性简单地叫我“老李”了。我同他在一起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我有什么话就老实地讲出来，讲错了，他马上给我纠正。我向他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倘使他抽不出时间，他会不客气地告诉我他没有空。我刚刚住下来，他就派了一个小通讯员照应我。可是他也任我一个人随意地到处走走。因此这个落过雪的晚上我从他的房里出来，并没有人送我回去。他本来叫他的通讯员送我下山，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文学》一九六一年八月号。

我说我喜欢一个人慢慢地在雪地上走，谢绝了他这番好意。他也就不坚持了。

雪在我那双笨重的厚皮靴下面发出吱吱的响声。我在这些相距不很近的石级上留下了一对一对的脚印。我左弯右拐，走得浑身发热，一面在回想刚才听到的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越想越高兴，就不再注意眼前的东西。我正走得起劲，忽然撞到一棵松树上，其实也不能说是撞，只是我的右胳膊挨了挨树干，压在枝上的雪落下了一点儿，有一片贴在我的脸上。我抬起头往上看，脚还在朝下移动。我没有料到脚踏在垫了雪的土坡上身子会站不稳，要不是我连忙抓住旁边矮树的树枝，我一定滚到下面去了。

我站定以后，正在因为这场虚惊暗暗责备自己的粗心，一面掏出手帕揩去脸上的汗珠，忽然听见一个清脆的声音："同志，怎么啦？摔伤没有？"原来有一位女同志在我背后讲话。我不曾回头，马上答道："不要紧，我踩滑了，没有摔倒。"

后面的声音又说："李林同志，原来是你！小刘没有来？"王主任派给我的小通讯员叫小刘。

我知道这位女同志叫王芳。就在前天下午她到王主任房里谈工作，我正在那里，王主任便向我介绍，说她在报社工作，写些通讯报道还不错。她现在既然认出我来，我只好转过脸去向她答话："小刘在下面等我，我现在回去。"

她向我招了招手，亲切地说："李林同志，你到我们这里来歇一会儿罢。"我这时才看出她站在一个住室的门前，这间黑阴阴的屋子一大半藏在山里面，房里的灯光遮得严严的。这

个山坡上有不少这样的屋子，白天我一眼就看见，夜里却不大容易分辨出来。

“王芳同志，谢谢你，我回去了，下回来看你，”我带笑地答道，便不再理她，我的脚又往下移动了。

“请你等一等，我送你回去，”她说着，就跑下坡来。我正埋下眼睛看下面那些积了雪的白白的石级，可是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我不要她送我，却又不能阻止她。她已经走到我背后来了。

“李林同志，你上了年纪了，以后夜里出来要带通讯员啊，”她关心地说。我不愿意她送我走到住室，也不喜欢她这种口气，可是想到她那张少女的瓜子脸上两颗好像刚刚油漆过的透亮的黑珠子一样的眼睛，和棉军帽下面两根又黑又粗的辫子，又觉得她小小年纪对我讲这种话有点可笑。我只说：“你不要送罢，就只有一点点路了，”并没有讲别的话。的确山路只剩了十几级，不过我还要顺着山脚走一段路才到得了我那个住室。我把脚步加快了些。我打算赶快走下山坡，转身对她一挥手，说声“再见”，省得她为我多走那么一段路。可是她也加快脚步跟着走下来。她还着急地说：“李林同志，你慢慢走，看摔倒。”她看见我不停步，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又说：“我一定要送你回去。”她说了这一句，自己发出一声轻微的笑，马上加一句解释：“你是我们军的客人啊。”

我到了山下，她也下来了。我含笑对她说：“王芳同志，谢谢你，请回去罢。”她望着我笑了笑，说道：“我送你到家。”我只好陪着她往前走了。

我们在这条看不见灯光的积雪的小路上走着。我因为她坚持送我感到抱歉，没有讲话。她却带笑地说："你太客气了。雪冻起来，路上不好走。我们走惯了有时还要摔倒。我们是不要紧的。你上了年纪，不能过于大意啊。"

我感谢她的好意，便对她老老实实地解释我的习惯。我们就这样地谈起来，一边谈一边走，不知不觉地到了我的住室门口。通讯员小刘烧暖了炕等我回去，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出来迎接。

我邀请王芳到我的屋里坐坐，她不肯进去。我要小刘送她上山，她也谢绝了。她还笑着说："李林同志，你别看这里很静。这里满山都是我们的人。我还怕什么呢？明天见！"她举起手向我敬个礼，又对小刘说一句："小鬼，你好好照应李林同志啊！"转身便走。她的脚步是那么轻快，半新的棉军服穿在她的身上并不显得臃肿。

"王芳跳舞唱歌样样好，同志们哪个不夸奖她多才多艺，"小刘站在门口说；接着他自言自语："你叫我小鬼，其实你不过跟我一样的年纪。"然后他揭起雨布门帘，推开木板门，进去把蜡烛点燃，我也跟着进去了。我听见了小刘的话，我记得他对我讲过他今年只有十九岁。

"你看过她跳舞？"我顺口问了一句。

"她以前在文工团，开晚会总少不了她，跳新疆舞，唱大鼓书、唱《王大妈要和平》，样样好！"小刘眉飞色舞地说，他好像回到在台下热烈鼓掌的时候了。

我觉得奇怪，便问他："那么她为什么又不在文工团了？"

“首长，你不晓得？”小刘诧异地反问道，这个活泼的年轻人不习惯叫我的名字，却喜欢笼统地称我做“首长”。我为这个称呼向他提过几次意见，可是他坚决不改，我也拿他没有办法。他那张滚圆滚圆的胖嘟嘟脸上没有一个时候不见笑容，你看到他那两颗骨辘骨辘转个不停的乌黑眼珠，你也不便向他板面孔。因此我只好装做没有听见，让他叫去。

“我当然不知道。我知道了，还用问！”我顺口答道。

“她摔伤了，回国去了一阵。回来就到报社工作了，”小刘只是简单地答了两句。这一次他不笑了，不过两颗眼珠仍然骨辘骨辘地转动。他在炕沿上坐了下来，让抖得厉害的烛光在他的胖脸上不停地扫来扫去。

我等着他以后的话。谁知他静静地望着烛光，闭紧了两片厚嘴唇。我坐在这个洞子里唯一的木凳上，右胳膊压住桌子的一个角，我什么也不想，只是连声催他：“往下讲，往下讲。”

“人家真了不起！摔坏了腿，血淋淋的，哼都不哼一声。当初送她回国的时候，大家都很难过，以为她不会再来了。谁知三个月不满，她就回来了，”小刘说。我看得清楚，笑容一下子又回到他的胖脸上来了。“那天我听说她回来了，我在沟口等她，车子半夜才到，文工团好几个同志也在沟口老等。车子刚停，她正下车，那些女同志就拥上去把她抱起来。她们又哭又笑，好亲热啊。我拿起她的背包就走，送到文工团。后来包围她的人散开了，她才看见我，紧紧拉住我的手说：‘小鬼，你还是这样胖。’我看见她一点儿也没有变，心里高兴，就问她：‘王芳同志，你还唱歌吗？’问得她笑起来了。她说：‘我为什么不

唱呢？我还学会了好些新歌。我一定要唱给大家听。'过了两天，我们军里开晚会欢迎祖国来的首长，添了一个新节目，就是她唱的《在天安门前相见》。大家拚命鼓掌把手都拍红了。"小刘恳切地望着我："首长，不是我替她宣传。她真是唱得好，你一定爱听。"

我点点头笑答道："好罢。"其实我倒真以为他在向我宣传了。我再问一句："她不是离开了文工团吗？"不等他答话，我又加一句："你还没有讲她是怎样摔伤的。"

"她到前线坑道里去慰问嘛，"小刘忽然大声说，他这是回答我的后一句话。"文工团时常下连队，有时候还到坑道里去演唱给战士听。女同志一到连队，总要帮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拆洗铺盖。你没有办法不让她们做这些事，哪怕你把衣服藏好，她们也会找出来。我那个时候，还在五连当通讯员，王芳她们到我们连来演出。我们进了坑道三个月没有看到文工团的节目，战士们兴奋得不得了。小小的坑道里没法跳舞，他们就唱歌、说相声。坑道里点了灯，又点了蜡烛，十多个人挤在炕上，一点儿声息也不出。文工团来的人虽然不多，节目可不少。男同志唱快板、说相声，女同志唱歌，节目个个精彩。不过战士们总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一会儿就完了。大家老是要求：'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战士们要求一次，就加一个节目。嗓子唱哑了，就哑声唱。后来女同志声音都哑了，只有王芳一个人嗓子没有坏，她最后还给我们唱个大鼓书《新棉衣》。我们刚刚穿上祖国送来的棉军装，听她唱起祖国亲人缝棉衣、寄棉衣的一番心意，每句话都好像落在我们心上一样。唱得

我们心里真暖和。哪个不夸她唱得好！文工团在我们连里住了几天，战士们差不多全听到演唱了。王芳的嗓子越唱越好。她后来听说岗哨还没有听到演唱，她就跑出去找那些人，亲自唱给他们听。我起初听见二排战士小曹讲起，我还不相信。”小刘说到这里忍不住先笑了。“首长，我从来不听说有这样的唱法。我想起就觉得好笑。可是小曹却一本正经地讲下去：‘……那天擦黑，我正在站岗，文工团那个女同志来了，她过来就说：“同志，你辛苦了。我是军里的文工团员。军首长派我们来慰问你们。你尽管执行你的任务，我不会妨碍你。我唱个歌给你听，我就在你耳朵跟前唱，只有你一个人听得见。”她真的这样小声唱起来，唱完一个，又一个。天黑了，她才走开。’小曹还说：‘我站在山头，不晓得从哪里来那么大的劲，浑身暖得很，满肚皮的高兴，好像一晚上都听见那个好听的歌。我真盼望敌人偷偷地跑上来，让我抓一两个俘虏，来报答军首长的关心。’……”

小刘忽然停了下来。我不再催他了。我已经摸到了他的脾气：他平日讲话不多，但是动了感情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要是他把什么话憋在肚里，那么晚上就会大讲梦话。我这个洞子里一张炕上可以睡四个人，现在只有我和他各睡一头。他讲梦话，免不了要吵醒我，我早晨向他谈起，他便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他父亲跟哥哥“闹不团结”。哥哥是个村干部，工作很积极。父亲思想落后，成天只想到个人利益，事事要求照顾，常常跟哥哥找麻烦。“他总说：‘我是军属嘛，我们正清到朝鲜去为了啥？’为了啥！我到朝鲜来，又不

是为了我们家！人家杨根思抱起炸药跟敌人同归于尽，连眉毛也不皱一下，我算啥呢？军属应当起带头作用才对！自己有力气，能走路，能劳动，还好意思要求照顾？”他的话讲得不少。原来他得到家信，心里不痛快，没有讲出来，就做了怪梦。我说：“你写封信回去劝劝你父亲罢，多讲讲道理，他也会明白的。”他果然听我的劝，给他父亲写了信去。他还把信给我看过，写得很不错。他这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文化水平并不低。他说，他刚入朝的时候，只认得七八百字。可见他到了部队以后，有很大的进步。

燃剩了的蜡烛芯偏垂下来，烛油开始往下流。小刘连忙站起来，用两个指头把那段发烫的烛芯拉断，丢在地上，他的眉毛也不曾皱一下。他站在木板桌前，接着中断了的话题讲下去：“我们连的一排住在最前沿，文工团的同志们坚持要到那里去演出。指导员教我陪他们去。走这一段路并不容易。他们刚刚走到，不肯休息，就演唱起来。那里的坑道很低，女同志就跪在炕上唱歌。说相声就蹲在炕上说，炕上不行，就在又滑又湿的地上干。王芳说书，鼓架子支不开，就请男同志托住鼓。他们还到了最前沿，王芳站在射口跟前唱歌，她唱得战士们个个满意。大家都说：‘同志，再唱一个，叫河那边的敌人也听听。’第二个歌还没有唱完，敌人的炮打过来了，炸的坑道直摇晃。可是王芳连眉毛也不皱一下，还是唱得很起劲。……我们在一排几个班待了一天，天黑了才动身回连部去。战士们紧紧地拉住文工团同志的手不肯放。我们走了不远，下起了小雨，山路更不好走了。走到半路，敌人接连打来几炮，震

得厉害。不晓得怎样王芳的鼓连鼓架子一起掉下去了。她着急起来，跟着声音下去找鼓。我正在前面带路，听见别人叫王芳不要下去，连忙转身回去找她。已经来不及了。她摔下去了。我没有听见她的叫声，我只听见别人的叫声。我们都说不清楚她是怎样摔下去的。我下去找到了她，她的左腿给岩石撞坏了。她不让我背，我一定要背她，我一口气把她背到连部，让卫生员给她包扎好，当夜就抬到医疗所去。我看见指导员，马上检讨：指导员叫我照应他们，我却背了摔伤的人回来，我没有完成任务。战士们听说王芳摔伤了，纷纷写信派代表慰问她，大家还表示决心要替她报仇。指导员同意我的要求，让我到医疗所去看她。我把我嫂嫂给我缝的慰问袋也带去了。她睡在病床上，脸色不好看，人也瘦了。旁边还有个文工团的女同志。我笑不出来，也讲不出话来。我把写好的慰问信交给她，把慰问袋放在她手边，不知不觉眼泪花滚出来了。我转身就走，倒是她把我唤住了。她说：'小鬼，怎么啦？远远地跑来一趟，话都不说一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只好当她的面揩干了眼泪，向她检讨。我刚刚开个头，她就笑了，她打断了我的话。她说：'同志，你背我走了那一大段路，我还没有谢你，你倒来检讨，哪有这种道理？你回去，请对同志们说我的伤不要紧，养好了还要唱歌给大家听。'我临走，她要我站近些，她要唱个歌感谢我。我劝她不要唱，那位女同志也劝她不要唱。她却坚持说：'我的腿摔坏了，嗓子没有摔坏啊。小声唱两句是不要紧的。'我只好走到床头。她真的小声唱起来。她唱的是《歌唱祖国》。她快要唱完，那位女同志就向我努了努嘴。等

她刚住口，我就告辞走了。我不走，她一定还要唱。我看见她虽然唱得高兴，脸上也有了血色，可是唱了歌，也显得累。”

小刘这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不嫌话长，只担心会有什么意外事情打断他。忽然在我们的头上响起了一个大雷，这个洞子好像给人推着，一推一放，来回摇晃了几下。燃了半截的蜡烛倒在桌上，我连忙把它扶起来，又用烛油凝住了它。敌人又在放冷炮了。我朝木板门看了看，门露了一个缝，小刘走到门口，把门关紧，然后坐到炕上。他不等我催促，又往下讲：

“过了不久，我给调到军里来了。我一来就听说她要回国治病。我真替她担心。我还是怪自己那天没有好好照应她，不然她决不会摔坏腿。我向文工团打听到开车的时间。没有想到五号首长也去送她，我就跟去了。她是让人抬上车的。文工团好多同志都在场。她躺在担架上，看见五号首长来，高兴极了。五号首长叫她安心治病。她却接连说：‘五号，你答应了的：我治好了就回来！我一定要回来！’五号首长拉住她的手说：‘小鬼，我们都等着你。’她平日叫我‘小鬼’，现在也有人叫她‘小鬼’，我觉得好笑。五号首长叫了她好几声‘小鬼’。她看见我，也叫起‘小鬼’来，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送她的人不少，她跟我只讲了两三句话。她说：‘小鬼，再见，我一定要回来。我等着你立功的消息。’看她的样子，她好像没有一点儿痛苦。可是我听见人说，她在医疗所常常在梦里痛醒。文工团同志们跟她更亲热。快开车的时候，她大声唱起了《歌唱祖国》，同志们跟着她唱起来，大家正唱得起劲，车子动了。我们

一面唱，一面挥手。歌唱完，车子已经不见了。有些女同志在揉眼睛。五号首长一句话也不讲，等到大家都散了，他才慢慢走回去。”

我听见小刘讲起王主任，就仿佛看到那张浓眉大眼、须根满颊的宽大脸，我很难想像他闭紧嘴唇的表情。那天我在他房里遇见王芳，他向我介绍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同志”。他不止一次叫她做“小鬼”。她对他的态度我也记起来了：又尊敬，又亲切，尽管她先在屋子外面叫一声“报告”，然后走进来敬个礼，谈话中一直称他“五号”。——

“第二天文工团一位同志给我捎来一样东西，”小刘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把我的心拉回来了。“想不到就是我送给王芳的那个慰问袋，就是我嫂嫂给我缝的那个慰问袋。还有王芳写的一封信。信上话不多。她说，这是她送给我的纪念品，她找不到比这个袋子更好的礼物。她教我不要替她担心，她说她一定要回来。我们都没有想到她这么快就回来了。她还是唱得那样好。她还是成天高高兴兴。”小刘说到这里，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我看见他笑容满脸，知道他一定在想像一些使他最高兴的场面。我不想打岔他，他讲了这么多话，也应当休息了。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王主任，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老李，你以后可要小心啊！摔伤了怎么办？”我只是笑笑。他又说：“我得向小刘下个命令，不管你到哪里去，都跟着你。”我并不直接回答，却望着他说了一句：“王芳的嘴真快。”他忽然哈哈地笑了，他笑得很有趣，好像脸颊上黑黑的一片数不清的须根都跟

着动了起来。

“你想不到小鬼居然认真提我的意见。你要是摔伤了哪里，我可得向小鬼好好检讨了，”王主任忍住笑对我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王芳，便想到了小刘的那段谈话。我顺着他的口气把话题引到王芳的身上。

“听说王芳唱歌唱得好，”我开头说。

“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喜欢听。你呢？”

他忘记了我就只见过王芳两面，不说她唱歌，连哼一句我也没有机会听到。可是我不提这个事实，我却乘机发问：“那么为什么不让她回到文工团去？她又没有摔坏嗓子。”

王主任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奇，他笑道：“老李，你一定受到小刘的宣传了。你为什么不问王芳本人呢？”

这后一句话把我的嘴堵住了。我只好笑笑，又说：“你是首长嘛，应该问你。”

他看了看我，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似的，忽然走到门口，推开带半截纸窗的木板门说：“我们下去走走。”我便跟着他走出这间藏在半山里的屋子。我上山的时间跟昨天差不远，可是下山的时间早得多。天还不曾黑，山坡上仍然一片白色，只有蜿蜒的山路是灰黑色的，石级上的积雪已经铲掉了。灌木枝上的雪也早落散了。我紧跟在王主任的背后，踏着泥泞的山路一级一级地往下走。冷风一阵一阵地刺痛我的脸，我有时也会皱一下眉头。可是王主任却在我前面哼起歌来。我一下就听出他在小声唱《歌唱祖国》。“这不是王芳喜欢唱的歌吗？”我想起来了，正要跟他讲话，刚刚说出三个字“王主

任……”，我的右手忽然抓到了一根下垂的树枝，我连忙站住。他回头惊问道："老李，你怎么啦？"

"就是这个地方，我昨天差一点在这里摔倒，"我这样回答他。他只说了一声"啊"。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微微抬起头，朝上面不远处一间屋子看了看。那间只露了门和窗的屋子就是报社，雨布还不曾放下，木板也没有装上，人们正在那里面工作。

"老李，你不能大意啊。连小鬼那样灵活的人也会摔伤的。你刚从祖国来，要是摔伤了抬回去，我怎么对得起祖国人民呢？"王主任忽然一本正经地讲起来。我口里唯唯地应着，一面小心地下着脚步（我的确害怕摔倒），一面等着他回答我那句问话（我不想打岔他）。可是我们一直走到山下，他什么也不说。

现在我们往沟口走去，不是朝着到我住室的方向。路上两天的积雪已经冻硬了，还让人们的鞋子磨得又滑又亮。我走不惯这种"玻璃路"，走得慢而且吃力。王主任却走得快，又很从容。他注意到我落后了，便停下来，带笑地责备自己："我再三教你小心，自己却带你走这条路。你回家那条路上的雪给小刘铲过了，不像这里，"他的手朝前面一指，"就到那里为止罢。今天不到沟口了。"他指的是前面那座"抗美亭"。我刚来政治部，他引我到那里去参观过。我们两个坐在战士们做的简单木凳上，望着对面的山景。他满意地说："不坏罢，这是我们的风景区。春天看花，秋天看红叶，冬天看雪景，虽然比不上祖国的苏杭，可我们是在战地啊。"

我跟着他走上几级石阶，进了“抗美亭”。茅草檐下木板横额上三个大字就是他写的。这里原是一间老乡的茅屋，给敌人的炮弹打坏了。部队住到这条山沟来，便把它改成这样一座亭子。我坐在木凳上，拿右胳膊压住圆木桌，静静地望着对面山上白地青花的大幅“线毯”，忽然听见了飞机声，我用眼光去搜寻敌机，却一架也没有找到。

“老李，”王主任亲切地唤我。我应了一声，便侧过脸去看他。“我看你太好奇了，调工作也是寻常的事情……”他说到这里，忽然改换了语调提高声音说，“小鬼，你到哪里去了来？”

我惊讶地跟着他的眼光望去，看见王芳在下面站住了，两边脸颊冻得通红，她是从沟口那个方向走来的。她抬起头答道：“我到文工团取了稿子，”接着又含笑说：“五号，你们在这里欣赏雪景吗？好雅兴啊！”

“小鬼，我正在跟老李谈你的事，”王主任半开玩笑地说。“你自己来讲好不好？”

王芳摇摇头，两根长辫子也跟着动了两下，她笑嘻嘻地说：“我不来，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五号，你教我讲，我只好检讨。”

“好罢，你就来检讨罢，让我也听听，”王主任仍然在开玩笑，从他的声音和脸色我好像看到一种类似父爱的感情。

“五号，下次罢。我得马上回报社去，他们在等我，”王芳笑答道，她把手里拿的那卷稿子举到她头上摇了一下，就转过脸朝我们来的那个方向走了。她走得并不慢，两根辫子在背后微微地甩动，我看不出她的左腿曾经摔坏过。

王主任含笑地望着她的背影，很有感情地自言自语："小鬼毕竟是小鬼啊。"

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便问他："你在讲王芳吗？"

他点点头说："对，"便侧过脸来看我，眼光非常深透，仿佛要看穿我的心一样。他忽然问道："老李，你看小鬼像谁？"

我给他问住了，答不出来。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到一个面貌同王芳相似的人。

"小鬼跟她母亲一模一样，"他继续说，他不再等我的回答了。

我几乎要脱口说出这句话："你怎么知道？"可是我并没有说。我却问道："那么你见过她的母亲。"

"我怎么没有见过！她母亲就是我的老婆，"王主任毫不迟疑地说。他掉开脸慢慢地搔起他的须根来。他又在望对面的山景，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我愣了一下，过了几分钟才问道："那么她就是你的女儿？"

他正望着那个发光的雪白的山顶，听见我的问话，便侧过脸对我说："她还不知道。"

我不大了解，便再问："她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微微笑起来，平静地说："你不用替我着急。到时候她自然会知道。"

"她母亲呢？难道她母亲也不知道？"

我看见他收起了笑容。我看见他用力搔须根，把两边脸颊都搔红了。我看见他皱起两道浓眉。他忽然唤了一声："老李。"我刚刚答应，他马上接下去说："我知道你一定会问到底。

我又管不住自己这张嘴。过去的事情讲起来总是不愉快的。已经快二十年了，可是好像在眼前一样。……我和小鬼的母亲从北方到上海，在一家印刷厂当小职员。我们住在亭子间里面，生活苦，不用说；还处处受气。那个时候上海是有钱人的世界，帝国主义者、巡捕和流氓到处横行。小鬼出世了。她母亲一向身体弱，自己带孩子睡得不好，吃得不好，人越来越瘦，不过也没有什么大病。我老婆本来也可能活到今天，要不是——"他突然站起来，我以为他要离开这里，便跟着他起立。可是他咳了一声嗽（声音真响！），往下面路上扫了一眼，又坐下来了。

"有一天晚上她上街买东西。就在北四川路，她好好地走在人行道上。几个外国水兵喝醉了，拿着酒瓶一边走一边胡闹。他们看见我老婆，想调戏她，便朝她扔酒瓶。一个酒瓶打在我老婆的胸口，把她打倒在地上。有个水兵还拿脚踢她。幸好有两个行人搀起她来雇黄包车送她回家。从此她就不曾起床，病了不到两个月就死了。我一个人，白天要工作，还要带一个不满一岁的女儿，实在不容易。后楼有一家宁波人也姓王，只有两夫妇和一个儿子。男的四十多岁，在工厂里做工，女的只有三十几，儿子十多岁了，念过小学，后来到印刷厂当学徒。这家人跟我非亲非故，可是他们对人热情，看见我遇到不幸的事，自动地出来给我帮忙。我这样也能对付过去了。可是小鬼还不到三岁，我就被捕了。起初关在提篮桥，后来关到苏州监狱里。我在提篮桥的时候，花了钱找人带信给后楼那位姓王的，托他照顾我的女儿。我说，我要是能出来，当然还

给他一切的费用；要是我日久没有消息，那么女儿就归他们，由他们处置。那位姓王的居然到牢里来看过我。他教我放心，他说他们夫妇把我女儿当作自己的孩子，决不亏待她。我哪天出来，就哪天送还给我。我在苏州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苏州快要沦陷了，国民党反动派才把我放出来。可是去上海的路已经断了。我后来参加了部队打游击，始终没有到过上海。我曾经托人到上海照地址打听，可是听说那一带房子烧光了，什么都问不出来。这些年我始终一个人过活。我有时候也想念我那个孩子。我一直等着她。”

王主任又停下来。他搔了搔脸颊，忽然抬起来，提高声音说：“像这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有了。”

我很想知道以后的事，可是我又觉得我没有权利给他唤起那些痛苦的记忆。而且在他讲话的时候，我们的四周渐渐地暗下去了。我的眼睛也有点模糊了，我看见了小刘的身影。他大概是来找我的，远远地望见王主任和我都在这里，就站住了。我默默地等待着王主任的起立。

“去年年初我来到朝鲜，做梦也想不到居然找着了线索，”王主任并不站起来，却改变了语调继续讲他的事情。“当时我还在师里，在那次××山的阻击战中，在最紧张的时候，我到了×××团。这个团奉命坚守××山，仗打得激烈，敌人的炮火厉害，我们当时还没有现在这种坑道，只有些简单的临时工事。我们虽然打得好，可是伤亡很大。我们必须守住主峰。不用说，这是艰巨的任务。上级的命令是坚守三天，我们的战士说一是一，决不讲价钱。敌人进攻越来越猛，人越来越多，

可是都给打下去了。第二天晚上阵地失掉过两次，但马上就夺了回来。到第三天下午情况更加严重，阵地上没有多少人了。我当时在团政委那里，他已经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前面指挥所接连来了几次电话。友军来不及赶到。需要人！已经从直属队中抽出一批送上去了。这里只剩下一些身体弱的同志。怎么办？我们正在考虑，忽然听见一声响亮的'报告！'，直属队的同志们拿着决心书进来了，一个个昂起头挺起胸膛，声音坚决地要求战斗的任务。一共二十五个人，是分几次进来的。团政委批准了十九个，留下了六个。六个中间有一个人再三要求，一定要到前面去，最后团政委也同意了。这个人叫王成，年纪不过三十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我听他口音，看他相貌，觉得很熟，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后来我忽然记起来了，就跑出去找他。他们二十个人拿起枪做好伪装，准备出发。我唤住他，问了两句话。他果然是后楼王家的儿子。他还记得我原来的名字。我们虽然没有谈话的时间，不过他还是讲了一件事情：王芳也参了军来到朝鲜。王芳这个名字是我起的。我总算知道我女儿的下落了。王成的话没有讲完，我们就分开了。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它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战事稳定以后，我常常想起我的女儿。我知道她在朝鲜工作，跟我离得近，这是多么好的事情。我真想见她一面。大概过了两三个月罢，我到军里开会，晚上文工团给我们表演节目。担任女声独唱的文工团员一出来就把我吸引住了。完全是我老婆结婚前的那个样子。我向坐在我旁

边的宣传科长问她的姓名。科长说：'她叫王芳。你听不出她还是上海人呢。'用不着怀疑了。明明是我的女儿。天大的幸福来得这么容易！我高兴极了。晚会结束，我看见她，跟她讲了几句话。我称赞她唱得好。我问她上海家里还有什么人，她说父母都在。我又问起她的父亲，她说父亲是个退休的老工人，叫王复标。我跟她拉拉手就告辞了。心里的话一句也没有讲出来。可是我放心了。以后我还听过她唱歌，看过她跳舞，我决不放过这样的机会。我高兴看见她，高兴跟她谈话。可是我始终没有对她讲过一句话，明说或者暗示她是我的女儿。她的父亲明明在上海，我怎么能说我是她的父亲呢？而且我自己的名字也改了。要是王成那天没有牺牲，他也许会告诉王芳真实的情形。现在只有写信到上海去找王复标帮忙。然而我不愿意这样做。说老实话，起初我也想过让王芳弄清楚谁是她的父亲。后来我自己放弃了这个打算，我看出来她多么爱她那个父亲。过了一些时候，我到军里来当政治部主任，经常跟她见面，她对我很好，只是不知道还有我这么一个父亲，我也下决心不让她知道。我看见她唱歌受欢迎，看见她工作积极，态度好，心情舒畅，我只有高兴。我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王主任忽然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拍我的肩头，我又听到了他的笑声："老李，我什么都讲了，你该满意了罢。可是这些话你千万不能写出来啊！"

我也站了起来。我紧紧地捏住他那只手，表示了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复杂的感情。夜早已来了。可是亭子外

面到处闪着淡淡的白光。天也是一片灰白色，路白亮亮地横在我们的下面。我跟着王主任走到下面的路上。我早就看出来小刘还在不远的地方等我。我在跟王主任分手之前，一直以为自己的那些疑问全得到了满意的解答。后来我看见王主任上了坡，自己一面往前走，一面听小刘讲话的时候，才想起来王主任并不曾答复我那句问话：她为什么不回到文工团去？不过我也并非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我是来熟悉英雄人物、了解英雄事迹的，不能把王主任给我的大堆书面材料丢在一边，却在一件小事情上跟他纠缠。所以我打算不再向他提那一类的问题了。

两天以后，吃过早饭，我去访问一位立了一等功的英雄连长，这是王主任给我安排的。小刘领我走一条小路，虽然东弯西拐，可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就到的连部。我没有想到王芳已经在那里了。她参加了我和赵连长谈话，不但记了笔记，而且不时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我们在连部吃了晚饭，她和我一路回来。我们三个人仍然走小路，路上还有泥水，但是也不怎么滑。两旁有不少矮松。小刘带头，我走在最后，我们走得慢，一面走，一面谈，起初谈的是赵连长的事情，从一个英雄又谈到其他好几个英雄，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不用说还是两个“小鬼”讲得多。后来小刘忽然把话题转到了王芳的身上，热烈地称赞她唱歌好。王芳答道：“我已经改行了，还要你替我宣传？”我想起了王主任的话，可是我仍然静静地听他们讲下去。小刘说：“不管你改行不改行，群众需要你，你也得唱。”王芳噗哧笑道：“小鬼，我看你真要到宣传科去了。好像

我是什么著名歌唱家似的。我哪里说得上唱歌？我不过喜欢哼几声。大家要我唱，我从没有说个'不'字。"小刘笑道："我相信你。我真该向你学习。可是我希望你不要改行。我不明白你为啥不回文工团去？"我注意地等着王芳的回答。她不马上答话，也不笑，脚步还是像先前那样。小刘回过头来看她，她声音平静地答道："小鬼，并没有特别的原因。我讲出来，你就明白了。我的腿不大好，五号照顾我要我暂时到报社帮忙。他还说，过些时候就让我回文工团。"小刘又把他那张胖嘟嘟的皮球似的脸掉过来，带笑地问道："那么你快要回去了？"王芳摇摇头，正经地说："不一定。我现在对报社工作也很感兴趣，在报社还不是一样工作！"小刘固执地说："不过战士们都喜欢听你唱歌，你唱起歌来真打动人的心。"王芳微微扬起头，笑着说："谁相信你，你又在宣传。你说，人家朝鲜妇女谁不会唱，谁又唱得比我差？"小刘有点着急了，回过头，认真地嘟起嘴说："我不会开玩笑，我讲的都是真话。你不信，你问这位首长。"他指的是我，他的眼光在找寻我。王芳也掉头来看我，两根粗辫子在我眼前晃了一下，两颗明亮的眼睛露了点诧异的眼光，也带了点笑意。我不会撒谎，我就说："王芳同志，我虽然没有听见你唱过，可是小刘已经对我夸奖过好几次。"小刘满意地笑了。王芳掉开脸笑道："李林同志，你已经受到宣传了。"我马上接一句："王主任也是这样讲的。"她不作声了。小刘更加得意地说："我的话是宣传。五号首长的话总不是宣传罢？"我想换一个话题，便问她："王芳同志，你的腿没有问题罢？"她又回过头来，微笑道："李林同志，谢谢你。你瞧，我不

是走得很好吗？”我同意地点了一下头。小刘却在前面说：“有时候我看得出来，也有点吃力。”王芳嗔怪地批评他：“小鬼，就算你的眼睛尖！”小刘还在前面自言自语：“也应该注意啊。”王芳故意不理他，却对我解释：“腿刚好，关节炎又发了。我在锻炼。过一两个月天暖了，就好了。现在也没有什么困难。”我听她讲得坦白、诚恳，便想起了另一些事情，我又问她：“你上次回国养伤，到上海家里去过吗？”她答道：“我本来也想回去看看。五号也同意我回去。可是我一出院，就回到部队来了。在部队里住久了，心都留下来了。谁不想早一天回到朝鲜！”我听她的声音，感觉到一种能感染人的热情，每句话都显得很亲切，我忍不住再问：“那么你不想家吗？”出乎我的意外，她笑了，接着她反问我：“李林同志，你说你想不想家？”我爽快地回答：“我当然想家。”她接下去说：“我也想啊。爸爸妈妈也想我。不过我不是到朝鲜来旅行的，工作不结束，就是回到家里也待不住。”我又问：“你家里人都好吗？”她答道：“都好。除了我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弟弟，念高中。我有个哥哥，去年在朝鲜牺牲了。”她最后一句话教我们不好搭腔，慰问、同情一类的话在这个时候都是多余的……幸好我们快走到政治部，前面就是沟口了。我以为她不会再讲话，不想她又开口了：“说实话，我当初得到消息，还偷偷地哭过一场，哭得真伤心。我们兄妹感情好。他是刚解放就离开学堂参军的。他头一批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他当时在×××团。五号亲眼看见他出发上前线。他们都说他勇敢。……我真不中用。人家朝鲜妇女死了多少亲人，从来不哭一声，她们反倒把头抬得更高，脚步也

更坚定，照样地唱歌跳舞。”小刘忽然在前面插嘴道：“我看你也很乐观啊。”这句话把她惹笑了。她说：“小鬼，你不要表扬我了。人家朝鲜妇女才算乐观呢！你看她！”她朝前面一指。我看见沟外大树下两间简陋的茅屋，我知道她指的是柳老大娘的外孙女。外孙女今年十八岁，几个月前跟着母亲来看外婆，在路上母亲给敌人炮弹打死了。她亲手埋了母亲，一个人走到外婆家来，就跟着外婆一块儿生活，白天在外面种菜，晚上在家里纺线。正巧姑娘顶着水罐从院子里出来，高高兴兴地唱着朝鲜歌。她看见王芳，远远地含笑招呼一声。王芳带笑地讲了两句朝鲜话，姑娘也答了几句。王芳对我说：“她是我的老师。我跟着她学会了好些朝鲜歌。”后来小刘告诉我，她向那个姑娘学到的不仅是朝鲜歌，还有朝鲜话和朝鲜妇女的动作……

我们进了山沟，走了一段路，听见有人叫“王芳”。文工团的陈团长站在山坡上。王芳朝那里点点头，就离开我们上山去了。我听见她得意地说：“材料都有了。”山坡不陡，可是她的脚步也不慢。我望着她的背影，却看不出她的腿有什么不方便。我掉开脸正往前走，忽然听见小刘发出一声惊叫，声音并不大。小刘这时不在前面带路，他在我旁边，而且落后了一两步。我连忙抬头一望。我看见文工团团长搀着王芳的一只胳膊。他在讲话，王芳在笑。我着急地问小刘：“她摔倒没有？”小刘松了一口气答道：“还好。给陈团长搀住了。”我说：“她以后要多加注意啊。”小刘嘟起嘴说：“她就是这样，只会想到别人。对自己就糊涂了。”我觉得这两个字用得不对，便说：

“她不是糊涂啊。”想不到小刘却生气似地反问我：“首长，你说不是糊涂又是啥？”

对这句问话，我想他自己一定比我更知道应当怎样回答，我就不再作声了。

这天晚上我在住室里整理笔记，常常想到王芳的事情，我担心她的腿又会出了毛病。第二天早饭以后，我正在住室前面跟小刘讲话，忽然看见王芳朝着我们走来，脚步轻快，满脸笑容，远远地就大声嚷着：“李林同志，你们好。”那么她的腿没有出毛病了。我真替她高兴，便走去迎她。

她走到我面前，拉住我的手说：“李林同志，你一定要给我帮忙，”就把一卷稿纸塞到我的手里来。“我写的大鼓词，请你替我看看，一定要认真地修改啊。”她笑得多天真。我打开稿纸，刚看到题目《猛虎连长赵生贵》，听见她说：“我走了，下午来取。我写不好，请你认真地修改啊！”她转身就走，教我来不及挽留。我只好在后面大声说：“你走路要注意啊。”

“她就是这个脾气，不接受意见嘛，”小刘在旁边自言自语。我看了他一眼，他那张皮球脸上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笑容。我便拿着稿纸走进住室去了。

稿纸上字迹清楚，文字也不错，我一口气念了两遍，字字上口。赵连长的英雄事迹全写出来了，也很生动。我们昨天一路去访问英雄，我刚刚把笔记整理好，她却已经写成了鼓词。我越念越满意，最后摘出几个不大恰当的字，又写了几条意见，不等她来找我，我先给她送去。

报社里有三个人工作。社长也是熟人。王芳正在看校

样，我把我的意见对她讲了。报社在一个不算小的洞子里，是由天然洞挖大的，白天不用点灯。她坐在一张很小的木桌前，看见我进去，连忙带着歉意向我解释，她的工作马上就完了，正要到我那里去取稿子。我那些小意见使她满意。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又跟社长交谈了几句，便告辞出来。我走出洞口，听见社长大声说："王芳，校样交给我，你快去罢。"我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事情，可是我刚刚走到山下，王芳已经赶上来了。她笑嘻嘻地说："李林同志，谢谢你啊！"

"王芳同志，你到哪里去？"我问道。

"到文工团排练节目去，"她短短地答道，把手里那卷稿子举了起来。

我就在这里跟她分了手，我满心高兴地想：我有机会听王芳唱歌了。王主任已经为我安排好一个星期内到连队去，我大概用不着推迟我的行期。

果然隔了一天，小刘给我打了晚饭来，就兴奋地对我说："首长，今天有晚会，你到底等着了。"他那张胖嘟嘟的脸好像包不住笑就要绽开似的。接着王主任又差人来通知：他五点前到我这里来陪我去参加晚会。

晚会在司令部一个地下的礼堂里举行。我们从政治部去要翻过一个土坡，山路不算窄，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间就到了那里。礼堂中没有凳子，矮矮的舞台下间隔地横放着十几根圆圆的木头，上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刚刚在前排找个空隙坐下，节目就开始了。

王芳的京韵大鼓排在第三。鼓词我已经念过几遍，现在

由她口里唱出来却添了不少的光彩。我虽然不像王主任那样听得出神（他就坐在我的左边），可是我也让她的演唱吸引住了。我前两天见到的赵连长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好像就在台上指挥全连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什么武器都用过了，子弹打完就用石头打。他们整整守了六天，只伤亡十六个人，却消灭了七百多敌人。最后赵连长把阵地交给友军，自己拖着打伤了的脚，抓着树枝，摇摇晃晃地往上面爬。战士们说："连长，山这么高，你挂了花怎么走？让我背你上去。"他说："我脚上只穿了一个眼，山再高也没有我共产党员的决心高！"他终于爬过了高峰，到了后面。太阳出来了，照亮了他的紫色脸膛，一双漆黑的眼睛闪露出胜利的喜悦。他看见向他走过来的教导员，严肃地敬一个礼，然后紧紧地握着教导员的手，仿佛握着最亲爱的亲人的手一样。……

王芳进去了，大家还在热烈地鼓掌。王主任在我的耳边接连说了两遍："不错罢？是她自己编的。"我掉头往旁边看，我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小刘。他蹲在一个角上，一张胖脸笑得像孩子似的。我不能不对王主任讲真话了："她的确有才能，要好好地培养啊。"

"我知道，"王主任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头。

晚会结束，小刘打着电筒给我照路，走原路回去。翻过土坡的时候，我看见远远地有好些明亮的灯光，一下子全灭了。小刘站住倾听一下，说一句："不要紧，"又往前走了。一路上我很兴奋；不仅是王芳的演唱，所有的节目都使我激动。我接触到那么丰富的精神面貌，那么广阔的心灵。我以为在我看

来是很新的东西小刘早已熟悉了。可是他似乎比我更兴奋。他一晚上都在讲梦话。我偶尔也听见了两句："我下了决心了，""我连心也可以挖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离开军政治部的那天，到王主任的房里辞了行回来，小刘给我打好了铺盖卷，在住室里等我。他要回到原来那个连队去，五号首长已经答应了，要另外派一个通讯员来照应我。他向我表示了歉意。他虽然高兴回连队，可是他的讲话和举动都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感情。我也不愿意这么匆匆地跟他分别。最后我同他约定，过两个月到那个连队去看他。

我并不曾失信。可是我去迟了些，已经是好几个月以后了。这中间我到过几个部队，也见过王主任几面，还听过几次王芳的演唱，也知道她已经回到文工团。我常常怀念小刘，因为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后来忽然听说小刘在的那个连队打了胜仗，把敌人占据的一个无名高地拿下来了。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三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听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我听到了许多捷报以后，再得到那个连队的胜利消息，我很难制止想会见小刘的欲望。过了国庆节，我便动身到那个连队去。

我拣了个下雨天动身，因为在这样的日子敌人的炮兵校正机不大出动，炮也打得少些。通讯员小吴背上我那简单的行李，我穿一件雨衣，他披一幅雨布，我们安全地走到了五连连部。我们在坑道里见到了连长。他已经得到了通知，又热情、又亲切地接待我。我和他交谈了半个钟头的光景，便提起

小刘的名字，还说我想见见小刘。

“对，对，刘正清，是个好战士，”连长点头说。

我连忙说明我跟刘正清很熟，并且把那次分别的情景也讲了。

“不凑巧，他回国了，”连长略略皱起眉毛说。

我诧异地问道：“他回国去干什么呢？”我自己马上兴奋地接下去说：“参加国庆节观礼吗？”

连长摇摇头说：“他挂了花，送回去了。”

“他挂了花？伤重不重？”我愣了一下，惊问道。

连长看了我一眼，声音低沉地答道：“两条腿都断了。”

我变了脸色，着急地追问：“他……他没有危险吗？”

连长昂起头说：“这个小青年还嚷着要回朝鲜来打美国鬼子呢！”

“他能回来吗？”我顺口问了这一句。话出口我才觉察到它是多余的了。

连长看了我一眼，激动地说：“要是真依他的话，他一定会回来。这些小青年都有那么一股劲，你简直拿他们没办法。他是这样挂花的：那天他跟着我上去，打到最后，主峰上还有个敌人的大母堡攻不下来，火力猛得很，我们牺牲了几个同志。我十分着急，拿起一包炸药，打算自己冲上去炸掉它。刘正清在后面拉住我的衣服，要求我把任务交给他。他一上去就把母堡解决了。可是他自己满身是血，两条腿都完了。担架员来抬他，他还说：‘我要坚持，我要打。’我后来去看他。他皱着眉头，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我却不听见他哼一声。我告诉他要给

他请功，他还说自己没有好好完成任务，应当检讨。真是个有趣的小青年。战斗刚结束，军文工团的同志就来慰问我们。有位女同志还给刘正清输了两次血。……”

“那位女同志是不是叫王芳？”我忽然打岔地问道，其实我的猜想也没有多大的根据。

“对，就是王芳！大家都喜欢听她唱，”连长点头笑答道。我看他的脸色，他好像奇怪我怎么会知道是王芳输的血，他又好像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感到满意。

连长一口气告诉我这许多事情，都是我所想知道的。我一时想不到更多的问话，这天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小刘虽然回国，但是我总算践了约，我在这个连队住下来了。

我在这里睡的炕是两个通讯员让出来的，不用说，也就是小刘睡过的炕。头两三天我睡在炕上半夜里好像总听见小刘在讲梦话，其实这次跟我来的通讯员小吴一上床就安静地睡到天明，全是我自己在做梦。

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住些时候，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我忽然接到王主任的电话，说是祖国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教我马上回到军政治部去。

我到了政治部，还是住在从前住过的地方。我几个月不来，山沟里也有了不小的改变。人多了，路宽了，房屋增加了，树木也茂盛了。沟口用松枝搭了一个牌楼，上面有这样的九个字：“欢迎祖国人民慰问团”。我走了一段路，见到好些熟人，还隐约听见文工团同志们的歌声。我放好行李就去见王主任。

王主任在房里跟王芳谈话，一面在看手里的几张稿纸。他见我进去，高兴地大声笑道："老李，你来得正好，正要请你帮忙。你先看看再说。"他跟我握了手，就把稿纸塞到我的手里来。

我也跟王芳握了手，然后摊开稿纸一看，原来是一首欢迎慰问团的《献诗》。笔迹很熟。我朝王芳看了一眼，她对我笑笑。我知道诗是谁写的了，就站着小声念了两遍，觉得不错。我还看到王主任修改的句子。我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意见，只说了两声"很好"，便把诗稿交还给王主任。

可是等我告辞出来，在自己那个住室里刚刚坐定，王芳就进来了。她手里拿着诗稿，一边说，一边笑："李林同志，你一定要好好给我改一下。要在欢迎会上朗诵的啊。"

她又把诗稿交给我。看她那神情，她并不是在对我讲客气话。我只得接过诗稿认真地再念了一遍。

她看见我还是不提什么意见，便挑出几个她自己认为不大妥当的句子要我替她解决。这次我总算给她帮了一点忙。她满意地拿回诗稿就向我告辞。我要留她，她却笑着说："我还要准备节目，再不回去，我们陈团长可要急死了。下次来罢。"

我就说："那么我陪你走一段罢。"她还要推辞，我却跟着她走出了洞子。

出得洞来，我一开口就提起她给小刘输血的事情。她听到小刘的名字，马上说："小鬼有个东西要我交给你。"我连忙问："什么东西？"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脸色马上变了，压低声音

说："笔记本。小鬼还说——"

"他怎么说？"我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他等了你几个月，他还以为你回国去了呢，"她答道，埋下头往前走，也不再看我了。

我过了半晌，才再问一句："他伤得怎样？"我心里不好过，我好像又看到小刘那张皮球似的脸，他那么高兴地说："我一定等着你！"

王芳一面走，一面说，好像在自言自语："小鬼从医疗所上车回国的时候，两条腿都锯掉了，他还在哼《歌唱祖国》，还说装好了假腿就回到前线来。他比我坚强多了。我上次回国，他送我……"她的声音变了，她立刻闭上了嘴。

她一直不讲话，我后来实在忍不住又问一句："他没有危险罢？"

她忽然抬起头，提高声音说："他一定会活下去，比我们还活得久。他没有腿，也能做许多、许多好事情。"她很激动，不过声音很坚决。但是这以后她又不作声了。

我们默默地走到了文工团的住室。我拿起笔记本，马上打开翻看，在第一页上，我看见小刘亲笔写的四行字：

忠于团

　　就要忠于自己的工作

爱祖国

　　就要爱自己的同志

王芳站在我旁边，低声念出了这两句话，然后解释道："小

鬼说，他以后不一定能再见到你，请你留下这个做纪念罢。这些字是他入团的时候写的。”

我郑重地放好了笔记本，跟王芳紧紧地握一次手，就走了出来。我表面上并不露出什么，我不愿意使她分心。

我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一路上埋着头在想小刘的事情，也没有注意走到哪里了。忽然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了我的左胳膊。我吃惊地抬起头来，看见王主任一对带笑的眼睛和一张快要让胡须遮没了的脸。

“老李，你怎么啦？我对面走来，你都看不见；叫你，你也不应！”他大声笑问道。额上直冒热气，他把军帽朝上面推了一下。

我勉强笑了笑。我老实地告诉他我在想事情，我还想把小刘的笔记本掏出来给他看。可是他并不注意听我讲话，他眨了眨眼睛，笑着说：“老李，有个好消息，小鬼的父亲来了。”

“小鬼的父亲？……不就是你吗？”我惊疑地说。我没有懂他的意思，我还在想小刘。

他笑了：“你怎么搞的？我说的是她在上海的父亲王复标，参加慰问团，明天就要到了。”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忽然高兴起来：“那么王芳一定很满意了。她知道吗？”

“我刚刚得到电话，正要去告诉她。我还想看看节目准备得怎样了，”他答道。

我看得出他很兴奋，我替王芳高兴，也替他高兴。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情，又问一句：“他知道你在这里吗？”

王主任摇摇头说："他怎么会知道呢？快二十年了。就是见了面他也认不出我来。"他忽然收了笑容，压低声音严肃地说："我正在考虑，明天见到他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我就是某某人……"他伸起手搔了搔右边脸颊，又在搔左边的。

我不等他讲完，就打岔说："为什么不告诉他呢？"

"是啊，我也很想跟他谈谈。他要是知道我还活着，一定很高兴，"王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脸上又露了点笑意。"不过要是他把小鬼还给我怎么办？"

"那么你们父女团圆了，"我这样说，只是因为我一时找不到另外的话。

"我们父女不是已经团圆了吗？我喜欢小鬼，不过我不愿意教王复标难过啊。"

"那么你——"我插嘴讲了这三个字，就让他打断了：

"所以我打算不让他认出我是某某人。对我来说，她叫我五号，叫我爸爸，还不是一样？"他看见我不作声，又加上几句："对王复标来说，可不同了。他是看着小鬼在贫苦中一天一天长大起来的。我不能逼着他对小鬼说：'我不是你的父亲，'我不能把小鬼从他手里抢走。"

他只顾谈话，不知不觉地跟着我走了一大段路，把我送到我的住室门口了。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我让他进去坐坐。他说要到文工团去看节目，我看见留不住他，便对他说："要是王复标愿意把女儿交还给你，你怎么办？"

他愣了一下，搔了搔脸颊，忽然微微一笑，答一句："让我仔细想一想，"就转身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他昂起头，挺起

胸，迈着大步，哼起《歌唱祖国》来。

他的高兴传染给我了。我回到住室里翻看小刘的笔记本，除了第一页上那四行字以外，还有“刘正清，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个字写在书前衬页上。这个笔记本是新买来的，小刘还来不及在上面记录什么。我把他写的那些字反复地念了好几遍，阖上本子，我又想到了小刘。然而我想来想去，总是看见他那张包不住笑的胖脸。我甚至想到他真的装好假腿带着笑走来了。我便拿起笔给他写了一封慰问、感谢和鼓舞的信。

晚饭后，我拿着信出去交军邮，回来经过文工团，便弯进去看王芳。文工团的洞子里很热闹。大家都在认真排练欢迎慰问团的新节目。王芳在练京韵大鼓《欢迎祖国来的亲人》，刚刚开头，我站在旁边听完它。她的脸色和声音告诉我一件事：她心情舒畅。我也看得出来她动了真感情。鼓词写得朴素而生动，我以为是她写的，她却向我介绍这是文工团陈团长的创作。接着她很高兴地对我说：“爸爸明天要来了。”我立刻接一句：“我早就知道了。”她笑道：“一定是五号告诉你的，是不是？”我望着她那孩子似的得意神情，点了点头，算是我的回答，却再问她：“你高兴吗？”她笑了，爽快地答道：“我当然高兴。我离开他三年多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心里想，你没有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我看见她还有工作，也就不再往下问。我在这里待了好一阵，趁她忙着的时候，一个人静静地走了出来。一路上遇见的人都在谈慰问团的事情。我也在想慰问团的事，不过我想的尽是跟王主任和王芳有关的。我想了半天，却想不出一个

结果来。

这一天我去过王主任的住室，可是听说他到司令部去了。第二天我找他三次，却始终不曾见到。第三天倒是他来找我了。

“老李，你昨天跑到哪里去了？我打电话找你，说是找不到。我想请你去看看我们的节目行不行，”他一进来就大声说。

我起初大为惊奇，我明明在这里，他却说找不到。后来问明白，我才想起昨天晚饭后赵连长来看我（他来参加欢迎慰问团的活动），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告辞的时候，我送他出去，还陪他走了一大段路。我便照事实回答了。

“这要我负责，我忘了早通知你，”王主任带笑解释道。“《献诗》的效果还不坏。听说你也出了力，倒要谢谢你。”

“哪里是我出力！都是你那个小鬼的功劳，”我笑答道，听说王芳朗诵的效果不坏，我自然也高兴。

他满意地笑道：“废话不说了，我来约你跟我一块儿到司令部去参加欢迎慰问团的宴会。”

“慰问团来了？那么你见到王芳的父亲了！”我急切地问道。

“见到了。还是从前那个相貌，变化不大，就是头发花白了，”他答道。“我们昨天半夜一点钟把他们接来的。大家真高兴。我跟他拥抱起来了。王芳也去了。她们还献了花。”他的脸上又现出了愉快的笑容。

“那么你们一切都讲明白了？”我连忙问道。

他哈哈笑了起来："我什么也没有说。他高兴，我高兴，这就够了。我安排好小鬼给他献花。小鬼挽住她父亲的胳膊讲个不停，一直把她父亲送到招待所。他们两个都很高兴。我还要讲什么呢？"

我又问道："你不是跟他拥抱过吗？难道他还认不出你来？"

他仍然愉快地笑着说："他以为我在拥抱从祖国来的亲人，决不会想到这里还有他的老朋友。"

我摇摇头，正经地说："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你们分别二十年见一次面并不容易。你至少应当让他知道你是谁。"

他并不考虑我的意见，仍然笑着，他批评我："老李，你怎么这样罗嗦！不要再讲废话了。我们走罢。"

我诧异地看他的脸色。在他那张刚刚修过的脸上连一点点不愉快的表情也没有。我便闭上嘴跟着他到司令部去了。

司令部新修的礼堂在半山上树林中，比旧的地下礼堂大多了，亮多了。厅子里摆了十四张白木方桌，上面放好了碗筷。壁上贴了好几张欢迎慰问团的红字标语。台上静静的，台口有一张铺上红布的桌子。我们进去的时候，有几个干部在里面安排座位。他们看见王主任，便过来向他请示。我一个人在厅子里站了一会儿，知道了自己应该坐哪一张桌子，便悄悄地从另一道门出去。我站在门前看山景。对面也是山，树木很多，有一点点草花，有红叶，还有鸟叫，不大像在战地。我忽然听见人声，原来慰问团的同志们到了。他们是从上面走下来的。我注意地看那一行人。王芳挽住一位老人的胳膊，一

边讲话，一边走。我不用问，也知道那个老人是王复标。我等着他们走近，打算找王芳谈话。王芳已经看见我了。她不等我开口，就把老人引到我跟前来。她十分欢喜地含笑说："李林同志，我爸爸来了。"我对老人讲了我的名字。老人脸红红的，眼睛不大，颧骨显得高些，穿着干净崭新的蓝布中山装，笑容可掬地用两只手握住我的右手。他说："同志，你辛苦啦。"他讲的是带点宁波口音的普通话。我客气地回答了两句，就跟着他们进去了。

军长和政委都已经在里面了，他们是从另一面的门进来的。他们亲切地接待客人。客人接连地来。上海杂技团的同志们也来了。后来大家都坐定了。我恰好跟王复标父女同桌，这当然是王主任安排的。王主任也坐在这一桌，他和王复标坐在一面，就在王复标的右边；在他右面坐的是一位不大讲话的农民代表。他高高兴兴地跟王复标父女交谈。在军长和慰问团分团副团长先后站起来致词的时候，老人常常掉过眼光看王主任的左边脸。我坐在他们对面，心里又在想他们的事，所以连这样的动作也注意到了。

在主客双方致了词以后，大家站起来敬酒。整个厅子里尽是带笑的讲话声。王主任举起盛了酒的搪瓷茶缸，首先跟王复标碰杯，碰得小茶缸直响。王主任跟全桌的人都碰了杯。他跟王芳碰杯的时候，还说："小鬼，你们父女见面，你要多喝酒啊！"王芳端起小茶缸点着头说："我喝，我喝。"她非常高兴地看了看王复标，然后喝了一小口酒。她坐在王复标的左边，接着她又端起小茶缸向王复标敬酒。王复标笑道："你敬主任

的酒罢，”他自己满意地把小半茶缸的葡萄酒喝光了。王芳又一次含笑点头说：“我要敬的，我要敬的。”

我注意到王芳跟王主任碰杯的时候，王复标轮流地看他们两个，脸上笑容淡了，他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王主任又高兴又关心地说：“小鬼，我不要紧。你晚上还有节目，不能多喝啊。”王芳却笑起来了：“五号，你今天怎么啦？你刚才叫我多喝，现在又叫我少喝。”她不等王主任答话，又端起杯子向我敬酒。我看见她那种衷心愉快的表情，我也很高兴，我为她的幸福喝干了酒，谁能够像她这样在一张饭桌上有两个真心爱她的父亲呢？

“你问得好。你们父女见面是桩大喜事，你的确应当陪你父亲多喝几杯。可是我现在想起来了，晚会上你还有重要的节目，你醉了怎么办？”王主任红着脸解释道。我懂得他的眼光，那是父亲的慈爱的眼光，他好像只想到女儿的幸福。他接下去补一句：“你要照顾你父亲吃菜啊，”马上转过脸对王复标讲话，大大地夸奖王芳。这些时候他一直很兴奋，讲话的声音也有点变了。

王复标听得出神，不住地微微点头，笑容又出现了。他喝了酒，脸更红了，眼睛更小了。我看得出来他仍然在注视王主任的左边脸颊，有时他的眼光也会移到王芳那对闪闪发光的眼睛上。王芳微微摇头，微微笑着，她看看王主任，也看看王复标，同样的话她说过两次：“阿爸，主任在表扬我，你不要全相信啊。”王主任却只管讲下去。

众人又喝了一阵酒，吃了一些菜，大家谈得十分高兴。王

复标忽然收起笑容，没头没脑地向王主任问道：

“主任，有个人你认得不认得？”

“谁？”王主任惊愕地反问道。

“就是你们同乡，他叫王东，东南西北的东。主任，你一定认得他，”王复标睁大眼睛，注意地望着王主任说。

王主任轻轻搔着自己的脸颊，迟疑地说：“对，有——这么一个人。”

王复标连忙激动地再唤一声：“主任！”王主任掉过脸去看他。王复标就在王主任的耳边说：“主任，你就是王东罢，我认得。你左耳下面那颗痣还在。”他的声音在发抖，他把右手放在王主任的左胳膊上面。

王主任接连点了两下头，就端起代替酒杯的小茶缸，满脸通红地站起来，把茶缸送过去跟王复标碰了杯，又兴奋，又感动，带笑地望着王复标，热情地说：“复标同志，我的老朋友，的确是我。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喝干这杯酒罢，我真要感谢你。”他大口喝干了酒，让王复标看见了茶缸底，还说一句：“我干了，为你的健康。”

王复标也喝了酒，紧紧握着王主任的手哈哈地笑道：“主任，你真是王东同志，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原来你在这里！解放后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我总算找到你了！喝酒，喝酒！我们干杯！”他笑得多快活！

他们又喝酒，又讲话，又笑，仿佛这张桌上就只有他们两个似的。别的人都诧异地望着他们，连王芳也不明白他们在讲什么事。她那么关心地望着他们，她几次想插嘴，都插不

进去。

不用说，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我都了解。我一直关心、一直想解决却无法解决的问题现在很自然地解决了，而且符合我的愿望。我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同时我又在留意他们的举动，听他们的谈话。

王复标忽然侧过脸去看王芳，指着她对王主任说："你还认得她吗？"

王主任两眼发光地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他除了满意地、欢喜地笑着外，再没有其它的动作。

王芳又愣了一下，然后伸过头去，惊奇地问她的父亲："阿爸，这是什么意思？"

王复标看见她的愣相，觉得好笑，他反问她："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你知道主任是什么人？"

王芳疑惑地看看王复标，她笑答道："他是我们的主任嘛。"

王复标把嘴伸到她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王芳的眼睛睁得那样大，眼珠显得那样亮，她兴奋地问王主任："五号，我爸爸的话是真的？"

我听不见王复标对王芳讲的话，我想王主任也不会听见的。可是王主任却激动地答了三个字："是真的。"他还接连点了几次头。王芳又注意地看了看王主任，然后转过脸小声地向王复标问了几句话。

就在这个时候，军长和政委过来向王复标和那位农民代表敬酒了。接着慰问团分团的副团长又过来向王主任和别的

人敬了酒。我注意到王芳一直在看王主任，不但脸在笑，连眼睛也在笑。敬酒的人走开了，王主任连忙站起来，端着小茶缸到别的桌去敬酒。王芳刚刚站起，手碰到小茶缸，马上又坐下了。她又把脸掉向王复标，小声地谈起话来。她很激动，也很高兴。可是她似乎并不着急。王主任也不着急。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倒把我一个人急坏了。我多么不能忍耐地等着听他们父女间的头两句对话！他们怎么能够那样地从容！

王主任终于端着空茶缸回来了。王芳立刻站起来迎着他。她满面含笑地站在他面前，高高地举起茶缸，倒了一点酒在他的茶缸里，然后跟他碰杯，亲热地唤一声："爸爸，"声音并不大。她喝干了酒，又说："我真的一点儿也不知道。……再没有更教人高兴的事了。"她紧紧捏住王主任的手，埋下了头。

"小鬼，不要再喝酒了，"王主任干了杯以后温和地说。他看见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泪水，便补一句："我早就知道了。"

"那么，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王芳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带点埋怨的口气说。

王主任轻轻地搔了搔两边脸颊，慈爱地说："他才是你的父亲。他把你养到这样大，而且教育得这样好。我怎么能教你离开他呢？"他微微地笑了。

"我决不离开你们，"王芳只说了这一句，就回到座位上了。我仿佛听见她的带哭的声音。可是她刚刚坐下，又在小声跟王复标谈话了。我看见王复标红红的脸上又出现了满心欢喜的笑容……

晚会开始，政委致欢迎词以后，便是王芳朗诵的《献诗》。

王复标、王主任和我都坐在第二排。王主任让我们两个坐在他的两边。谁都看得出来王芳今天晚上特别高兴。我却觉得她那对像擦过油似的亮眼睛一直朝着我们这一排。她笑得那么甜。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她朗诵的每一个字都进了人们的心。她那么愉快地、那么热情地朗诵下去,好像她打开了自己的心在迎接亲人一样。我很感动,可是我并不曾忘记观察那两位"父亲"的脸色。他们两位都是一样,脸上带笑,时时点头,不转睛地望着王芳,一直到她向观众敬了礼、转身走进后台的时候,他们才跟着别人鼓掌,而且比任何人热烈。

"她还有个更好的节目,"王主任笑着告诉了王复标。他又掉过脸来看我,好像也要我知道一样。我意外地发见他两只眼角上有泪珠,便轻轻地问他:

"王主任,你怎么也流了眼泪?"我的声音并不是平静的,我也动了感情了。

"我太高兴了,"他激动地说,拍了一下我的肩头。但是他马上诧异地自言自语:"这是什么节目?"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节目。原来军文工团的陈团长陪着上海杂技团的丁团长走到台口来了。他先把杂技团的丁团长介绍给大家,然后说丁团长听了《献诗》以后要向大家报告一个消息。接着丁团长用响亮的声音说:

"我们慰问团第四分团的王复标代表委托我向同志们报告一个消息:他在这里找到了他分别了将近二十年的老朋友,他女儿的真正父亲。刚才朗诵《献诗》的王芳同志就是志愿军王主任的亲生女儿。我们慰问团第四分团周副团长要我代表

全团同志祝贺王主任父女团圆……”

“老朋友，你怎么搞的？”王主任有点狼狈，他红着脸抓住王复标一只胳膊抱怨道。他来不及说第二句话，王复标已经站起来，第一个鼓掌了。

一刹时大家都站起来，王主任也只好起立。只听见一片欢呼和掌声。好多人都朝王主任这里看。军长大声在嚷：“王芳呢？叫她到这里来！”

王芳满脸通红，两眼发光，走到第一排，向军长敬了礼。军长拉住她的手连声说：“同志，给你道喜，给你道喜啊。”慰问团的周副团长也跟她握手。好些人围着她跟她拉手，向她问话。

“王主任！王主任！”军长忽然回过头来大声唤道。可是王主任早已离开座位不见了。“王主任呢？警卫员，去请五号来……”

我是看见王主任走出去的。这时我又想起了他，便悄悄地离开这个人声嘈杂的会场，掀起雨布门帘到外面去了。

会场里舞台上汽灯点得雪亮。可是外面一点灯光也看不见。幸好那一轮被白云遮尽了的秋月还洒下些朦胧的余光，让我一眼就看见王主任一个人静悄悄地站在树下。我向着他走去。他听见脚步声，回头看了看，说了一句：“你也出来了。”

“我是来找你的，”我小声答道，“大家都等着你去。”我忍不住又问：“王主任，你为什么躲在这里？”

他又搔起脸颊来。他说：“我想安静一会儿，我就出来了。老李，我想起了从前的事情。……一切都来得不容易啊……我

在想——"他突然闭了嘴，有人来了。王芳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爸爸，"王芳两只手拉住王主任的右手亲热地唤道。她停了半晌，才接下去说："你一定要跟我讲你过去的事，我知道你吃了不少的苦。这些年你一直是一个人——"她的声音变了，她讲不下去了。

王主任把左手压在王芳的手上，感动地说："孩子，我一定讲给你听。这些年我一直等着你。我并没有白等啊！不过我想不到复标同志会来这一手。他怎么可以说他不是你的父亲呢？不管他怎样说，你对他可不能改变称呼。至于我，你叫我五号，叫我爸爸，都是一样。你本来就是我的女儿。"

"爸爸，你放心，我一向都听你的话。你，你还是我的上级啊！"她说到这里忽然高兴地笑了。

父女两人以后的谈话我就没有听到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权利留在这里听他们讲下去，而且我刚刚走开，军长的警卫员就走过去，举起手敬礼，大声说："报告！"……

慰问团的同志们在司令部一共住了三天。他们离开这里的前夕，司令部还为他们举行了舞会。我虽然不会交谊舞，却也让王主任拉了去。我坐在靠墙壁放的长板凳上看别人跳舞。王复标坐在另一根板凳上。他在那里坐了几个钟点，王芳就坐在他的身边，两个人一直讲个不停。她仍然叫他"阿爸"，他仍然唤她"阿芳"。我觉得他们仍然是一对十分亲爱的父女。

到十二点钟，有人宣布舞会结束了。我站起来，正要走出会场，不知道由谁开始，人们忽然互相拥抱起来。我连忙躲到

一个角上。我看见军长和周副团长都给人抬了起来，在会场上转来转去。我看见王主任同王复标抱在一起，王芳和上海杂技团的一位女同志抱在一起。人们大声唱着《志愿军战歌》，热情地转来转去。不是跳舞，只是简单地、没有节奏地打转！王主任和王芳碰到一处了。一个笑着叫“小鬼”，一个笑着叫“五号”。他们叫得比从前更亲热，但是也更自然。

我还以为大家这样地转个几分钟就够了，却没有想到人们越转越热烈，不愿意停下来。后来连我也让上海杂技团的丁团长拖进圈子里去了。他看见我穿一身军装，把我也当成了志愿军。我起初还有点勉强，可是不到一会儿功夫，我也疯狂地转起来了。我只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同祖国在一起，我的心紧紧地挨着祖国。我感到莫大的幸福。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我甚至觉得我跟大家合在一起分不开了。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可是大家就这样热情地转了一个多钟头，还不想分开。等到我和王主任同路回政治部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两点多钟了。

我又兴奋又疲倦，一路上讲话不多。王主任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走了一段路，他才开口。他突然问我：“老李，我们是不是在做梦？”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便反问道：“王主任，你为什么说是做梦？”

“太幸福了！”他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也感动地说：“不是梦！梦哪里有这样美？”

过了几分钟，他忽然抓住我的右胳膊，恳切地央求：“老

李，你替我写出来，王复标的事情你一定要写。这样一个好同志，不把他写出来，我的心永远放不下。你一定替我写罢。”

“我写，我写！”我不假思索、爽快地答道。

我送走了慰问团以后，就履行我这个诺言，开始写下我的一些见闻。我说是写王复标，可是我写得更多的却是王主任和王芳。我写了以上的两万多字，却不想马上送给王主任看，我担心他不满意，会把这几十张稿纸撕掉。

1961年7月20日在上海。

《飞罢，英雄的小嘎嘶！》*

一

我最近在我的家乡成都住了将近四个月。我的住处离大街不远，我每天早饭后出门散步，常常不知不觉地走进了大街。尽管马路大大地加宽了，尽管街心和两旁人行道都十分干净了，这十多年的变化的确大得很，连路上的行人和商店店员的面貌也完全不同了！可是大街上的一切在我的眼里仍然显得非常亲切。我更满意的是我再也看不到过去那些愁眉苦脸了。这一天我出门稍稍晚一点，商店门全打开了，来往的行人也多了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得干干净净，一路上有说有笑，一个个眼笑眉开。我虽然不认识这些迎面过来的行人，却觉得每张脸都是我常见的。我走进商店，年轻的店员也像接待熟人一样地接待我。我买好自己需要的东西，高高兴兴地走回住处。我走到十字路口，那里有一家照相馆，玻璃橱窗里陈列了几张幼儿园生活的彩色照片。孩子们胖嘟嘟的脸笑得多么甜！我越看越喜欢。大卡车驶过来的声音我是听见了

---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河北文学》总第五期。

的，这样的声音我也听惯了。虽说在这些大街上载重的大卡车并非川流不息地来来往往，但也不是十分罕见的东西。我打算等卡车过去，就走下人行横道，我正在掉转身子，忽然听见一个意外的大声音（我知道卡车停下来了），接着人声嘈杂起来。不知是我的动作迟缓还是人们动得敏捷，我朝街心望过去的时候，那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大卡车就停在当中。我心里一紧，我以为一定是车子撞伤了人。可是我又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踌躇了一下，还是朝街心人丛中走去。我走了不过四五步，人们就散开了。一个年轻姑娘扶着一位穿棉袍的老年人正朝人行道上走。老人嘴里含含糊糊地不知在讲些什么。姑娘声音清脆地说："爷爷，你不要说罗。亏得那位同志拉你一把。人家膀子撞得血淋淋的，也没有抱怨过一句。"老人还在讲话，我仿佛听见了一句："我在怪我自己嘛。"可是老人已经让姑娘搀着上了人行道，我的眼光也让另一个人吸引住了。我首先看到的是那只带血的右胳膊。褪了色的蓝布棉中山装的袖子破了一大块，半截袖口垂了下来，棉花露出一大片，全染红了。我的眼光刚移到脸上，就听见这样的话："同志，还是让我回去罢。我不过擦破一点儿皮。"声音非常熟。我看那张脸，我忍不住要叫起来。我的嘴动了三次，才叫出了一声"老吴！"。是老吴，一定是老吴！那个穿深蓝色棉制服、帽子后面垂两根长辫的女交通警察正在跟他讲话，他听见我的叫声，马上朝我这面看。他那张黑黄黑黄、方方正正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左边脸颊上那个伤疤仍然显著，有点像笑涡。差不多连成了"一"字的两道浓眉忽然明显地分开来了，

我又看到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我听见那个很熟的声音说："巴同志，原来你在这儿！"他说着就要过来找我。那个女交通警察连忙把他的左胳膊挽住，又惊又急地说："同志，你不能走开啊！我要送你到医院去。"

我走到老吴跟前了。他看见我便说："巴同志，请你给我证明一下，我这点儿伤不在乎，不进医院也会好。"圆圆脸的女交通警察见他固执不肯听话，又好急又好笑，不等他把话讲完，就插嘴对我说："同志，你来得正好，你是他的朋友，你劝劝他跟我到医院去看医生嘛。三轮车还在等我们。"老吴还要讲话，我也打算讲话，可是旁边好几位不认识的人已经开口了。他们有的温和地劝告，有的正经地发表意见，都主张送老吴到医院去。我当然附和大家的言论。我看见老吴又把两道浓眉聚在一起写出一个出色的"一"字，知道他并不愿意，可是他也只好跟着女交通警察坐上三轮车走了。

我正在懊悔没有向老吴要地址，我想：以后怎样同他见面或者跟他通信呢？老吴忽然在三轮车上回过头来唤我。我连忙跑到刚刚停下来的三轮车旁边。老吴伸出左手递给我一小方纸。我以为他把他的地址给我了，却听见他带笑说："巴同志，请把你的地址写给我。"我知道时间对他是很宝贵的，也看到女交通警察脸上焦急的颜色，我一句话也不说，急匆匆地把地址写了下来。三轮车就向前飞跑了。

街心的人早已散尽。大卡车也不见了。但是人行道上还有人三三两两，边走边谈。我无意间听见他们的话，谈的正是老吴的事情："不能怪司机同志。那位老爷爷不依照交通规

则，不走人行横道，穿马路又不看四面八方……”

“是嘛，车子过来他也不理。亏得那位同志，连自家性命也不顾，跑下去拉开他，不然他就没命了。自家不小心害得别人吃苦。”

“听说那位同志是公社的干部，还是从朝鲜回来的志愿军，救了别人伤了自家，幸亏伤得不重……”

“不重？你去撞一下试试看！不痛惨才怪！”

“我并没有说不痛嘛。不过你看人家一点儿也不在乎，连医院也不肯去，到底是朝鲜战场上的英雄，与众不同啊……”

他们都是年轻人，谈得很起劲。我无意地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路。我很想把我知道的有关老吴的事情告诉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听这一类的话。可是我怕自己讲不清楚，又耽心他们没有功夫，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回到了我的住处。在那座小楼上，我坐在写字桌前，从玻璃窗里望出去。院子里静静的。那条石板铺的门道非常清楚地迎着我的视线。一个穿蓝色棉中山装的人推着一部自行车顺着门道从外面走进院子里来。“老吴来了！”我忽然想道，连忙从侧门到走廊上去看。原来是一个陌生人，只有身上的衣服跟老吴穿的差不多。我完全没有理由误认他作老吴。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便回到写字桌前开始我日常的工作。

我埋着头专心地写字，忽然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我立刻放下笔站起来。我毫无根据地认为：老吴来了，便转过身去迎接他。不用说，进来的并非老吴，却是一个送信人。

我了解这种怀友的心情，我原谅了自己，就索性放下工

作，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准备花整个上午甚至整天的功夫把老吴迎接到我的脑子里来。

二

我第一次看见老吴是在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当时我入朝还不满一个月，一天傍晚我坐兵政的小吉普到开城去。车上除了我还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通讯员小赵。小赵带着我的铺盖卷坐在后面。我坐的是驾驶台旁边的前座。宣传部李部长送我到山沟口上车，他指着司机同志对我说："这是你的同乡，立过二等功的，他送你去！"司机同志站在前面插得有带叶树枝的小吉普跟前对我微笑。我跟他握了手。他笑着说："我叫吴万山，成都人，大家都喊我老吴。"我答了一句："那么我们还是小同乡。"他点点头，又说："我听你口音就晓得。"

车子开出山沟不多久，天就黑了。车子跑得快，老吴开着小灯，他精神专注地望着前面。车子刚刚绕过一座山，老吴忽然关了灯。接着我听见一声枪响。飞机声渐渐近了。车子仍然在黑暗中飞跑。我正奇怪老吴怎么看得清前面的路，飞机一下子到我们头上来了。它飞得低，好像在追我们这辆小吉普，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好几部嘎嘶车。这个时候我只听见飞机声和车轮声。

"不要紧，"老吴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他很沉着地开着车子朝前飞奔。飞机声又由大变小了。但是就在我以为敌机远去了的时候，它却折了回来。前面半空中出现了一盏电灯。老

吴哂笑道："敌人怕我看不见开车，给我打灯笼了。"他刚说完，电灯又添了一盏，就挂在前一盏的上面。接着又出现了第三盏，一盏比一盏高。我想，一定还有第四盏，第五盏……可是突然响起了"阁阁阁"的声音。在这样的扫射之后，又是投弹。我看见了火光，听见了爆炸声，心里有些紧张。小赵在后面说话了："不知道打中了谁的车子。"

"这些强盗！"老吴生气地骂了起来。他仍然沉着地开动车子，一面继续讲话："前头那座桥就是它们的目标，炸了快一年了，从没有断过。真是废物！"

我们的小吉普朝着桥头奔去。打中了的嘎嘶车在桥的另一面燃烧。我远远地望见有人在扑灭火。老吴接连骂了几声"强盗"。我看不清他的脸色，可是我想像得到他那种咬牙切齿的表情。三颗照明弹离我们越来越近。公路明显地一直伸到桥头。我看得出来老吴始终在留意空中的声音。于是最下面的照明弹突然灭了。我们的车子快到桥头，三颗照明弹全不见了。车子驶过了桥，停在一棵大树下面。

"巴同志，我们在这儿歇一会儿，"老吴匆匆地说。他跳下车，就朝前面那辆打中了的嘎嘶车跑去。

老吴跑得真快，等我下了车，他已经奔到嘎嘶车前，拿着刚刚在河边弄湿了的棉大衣扑上车去，把一股新冒起来的火盖住了。接着小赵也奔了过去。我到了嘎嘶车前，火已经灭了。车上车下都是呛人的浓烟和刺鼻的焦味。老吴和另外两个我未见过的同志站在车前谈话，一面用毛巾揩脸。小赵从车子后面转了出来，身上也染了点焦味。

我连忙问小赵："有没有损失？"

小赵答道："不多，不过一两箱罢。"

我听见老吴大声说了一句"开城见"。他朝着我走来，声音轻快地说："没有事了。请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把车子开过来。"他不等我答话，就奔到小吉普那里，把车子开过来了。

我和小赵都上了车。车子开动后，我忽然听见有人叫"老吴！"，原来嘎嘶车的司机助手抱着一件棉大衣从后面追上来，口里嚷着："你的棉大衣！"老吴停了车，接过那件焦味很重的棉大衣，塞到自己背后。他听见那个年轻的助手笑着说："你真慷慨，帮了忙还要送件棉大衣，"便答道："不要紧，放在你们那儿还少得了！告诉老马，快点收拾好开车。我在开城等你们。"

我们的吉普车又开了小灯朝前跑起来。小赵从后面拿起老吴那件揉成了一团的棉大衣。我以为他想折好它。可是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崭新的一件棉大衣给烧了几个窟窿，真可惜！"

"有啥子可惜！"老吴在驾驶台上接嘴道。"烧坏了两箱公家的东西才教人心疼！"

我连忙问："损失了些什么东西？"

老吴答道："不要紧，损失不大。都是从祖国买来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他的话还没有完，小赵忽然在后面打岔道："你就披我这件大衣罢，我现在用不着。"小赵真的把自己的棉大衣披在老吴的身上了。老吴推辞地说："小鬼，你自家穿罢，

我不冷。”可是小赵不拿走棉大衣，他也就让它搭在自己的两个肩头。

吉普车继续向前奔跑，它一会儿跑过两旁有树的公路，一会儿绕着山脚左弯右拐，然后又走上平坦的公路。我的思想也动得厉害，它时而在祖国，时而在朝鲜，它好像在作一种努力：把祖国的生活同这里的生活连在一起。车子忽然停了下来。我不但吃了一惊，而且身子朝前一扑。

小小的一束野花扔进车来，扔到了我的怀里。接着是一句中国话：“志愿军叔叔好！”念音不准确，可是声音清脆，我一听就知道讲话的是朝鲜小姑娘。

她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短衣和一条白色裙子，头上盖着黑黑的短发，脸蛋冻得通红，瘦小的脸上有两只显得很大的眼睛。她的年纪不过十一、二岁。她把右手伸到我的怀里来，笑着说：“中国沙拉米① 大大的好。”她的手好冷！我把它紧紧捏在我两只手里。老吴在驾驶台上用朝鲜话向她问话。他们一问一答。她把右手缩回去，走到老吴那面去了。他们又谈了几句，老吴忽然掉过脸来问我：

“巴同志，她要走路到开城去找她外婆，我们带她去好不好？”

“当然好，”我答道。小赵马上在后面接下去说：“到我这里来。”

老吴把小姑娘抱上车，拿小赵那件棉大衣裹住她的身子，

---

① 沙拉米（朝鲜话）：“人”的意思。

把她放到后面小赵的身边。小姑娘不住口地用朝鲜话说:“谢谢。”老吴从裤袋里掏出了一个馒头，塞到小姑娘的手里，说:“你吃罢。”他又开起车子飞跑了。

“她的妈生病，睡在家里，她走路到开城去。让她一个人走，恐怕走到天亮还到不了！我看见这些小姑娘，心里总有点不好过，”老吴又在驾驶台上讲起话来。

“老吴同志，你有小孩吗?”我问道。

“有个女娃子，我入朝后才生的。我爱人也不寄张相片来，我连我那丫头儿是胖是瘦也不晓得，”老吴答道，他高兴地笑了一声。

“你放心，你的女儿瘦不了，”小赵在后面插嘴道。

“小鬼，你怎么晓得我的女娃子瘦不了?”老吴忽然正经地问道。

“你的爱人长得高高大大。鼎鼎大名的四川省劳动模范王巧英，谁不知道！你自己身材也不低。你们怎么会生出瘦小的姑娘来?”小赵得意地答道。

老吴忍住笑，骂道:“小鬼，你一天就爱瞎扯！这些事你不懂，少开腔！”

小赵笑着大声分辩道:“难道那张戴大红花照的相片是假的！”他不让老吴讲话，便抢先向我解释:“他爱人写信来，他找人念给他听，事情就传开来了。”他接着又换过口气说:“巴同志，你不要看老吴一天嘻嘻哈哈，他真有一手啊。他下了决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那是他初入朝的事。后来他爱人来信，他就不找人念了。他自己写回信，几张纸也写不完。”老吴插

嘴说一句："你又在冲壳子①！"他也不理睬，只顾往下说："他还给墙报写文章。当初他拿起生字本念来念去，边念边打瞌睡，我真耽心他开车会翻觔斗。"老吴忍不住噗嗤一笑。"现在我放心了。"

老吴带笑回答他："要不是巴同志跟朝鲜小朋友在我的车上，我现在就翻个觔斗，看你还敢不敢瞎扯！"

"志愿军叔叔！"朝鲜小姑娘早把馒头吃光了，忽然大声唤起来。老吴连忙用朝鲜话问她有什么事。小姑娘也用朝鲜话问："开城快到了吗？"

"快了，快了，"老吴用朝鲜话答道。然后他对小赵说："小鬼，不要尽说废话了。你好好照顾小朋友罢。孩子心里很急……"他的话还没有完，听见一声枪响，他马上关了灯，连嘴也闭上了。

这以后老吴就专心开车。小赵在后面有时跟小朋友交谈两三句。我静静地靠在座位上。车子不快不慢从容地跑过一条又一条平坦的公路。我渐渐地感到了朝鲜春夜的寒气，也闻到了朝鲜春夜的土香。小赵忽然轻轻地说了一句："小姑娘睡着了。"老吴立刻小声吩咐他："把我那件大衣给她盖上，不要教她着凉。"

"我早给她盖上了，她睡得真好，"小赵高兴地答道。

车子继续走了好一会儿！忽然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响雷"，左面山头冒起了火光。小姑娘在梦中哭着叫起"妈妈！妈

---

① 冲壳子（四川话）：吹牛的意思。

妈！”来。

“小朋友怎么啦？”老吴关心地惊问道。他的眼睛仍然注视着前面若隐若现的公路。小赵正在摇动小姑娘的身子，不停地大声叫她。

小姑娘不哭了。小赵回答老吴：“她做了怪梦了。”老吴一面开车，一面用朝鲜话安慰小姑娘。我听见小姑娘声音带哭地接连说：“我不哭，我不哭。”她停了片刻，又问，“志愿军叔叔，快到了罢？”

“就要到了，”老吴温和地答道。果然不久他就开了灯，加快了车速。我听见小赵在后面对小姑娘说：“你看！那是什么？”便抬起头看墨色的天空。我看到了那根伸入云层的高高的光柱。我知道这就是板门店停战谈判会场区的探照灯光了。

“到了，到了！”小姑娘兴奋地说。她笑着拍起小手来。老吴在驾驶台上跟着她说：“到了，到了！”他也满意地微笑了。

车子驶进了开城，穿过那些荒凉的街道，驶过了筑在城中心的钟楼。小姑娘高兴地嚷起来：“那边！那边！”

老吴停了车。小姑娘很快地脱掉棉大衣跳下来，连说了两声“志愿军叔叔，再见！谢谢啊！”就往黑暗里跑。老吴和小赵都在车上用朝鲜话大声叫：“慢点！慢点！”可是她已经不见了。

我手里还拿着她扔给我的那束野花，便对老吴说：“我们把车子开过去看看。”

老吴点了点头，就把小吉普开到白衣白裙消失的地方。车灯照亮了一堵烧剩的砖墙，墙脚有一间破木板搭的屋子，只

有一半露在地面上。

“一定在这里头，”老吴刚说了这句话，破木板门就打开了，小姑娘叫着“志愿军叔叔”，奔上地面来，奔到车前，扑到老吴的怀里，拉了小赵的手，又拉我的胳膊。她笑得多高兴。

我听见有人在叫“顺姬！顺姬！”我知道这是谁的唤声。我把眼光射了过去。破屋门前出现了一个老妇人，一身干净的白色短袄和白色长裙。她站在那里，一只手搭在眉毛上，挡住从车灯射过去的亮光。

小姑娘大声应着，她又向我们说：“志愿军叔叔，再见！”就要朝破屋跑去。老吴连忙拉住她，又从裤袋里掏出两个馒头塞到她两只小手里，亲热地说声“再见”，就松了手让她走了。我们看见她跑到她外婆那里，看见她们两个向我们摇手（顺姬的手里还捏着馒头），听见她们大声说“再见”和“谢谢”。我们也向她们挥手说“再见”。老吴忽然叹了一口气，就把车子开走了。

“老吴，你把馒头都给了她，自己吃什么？”小赵在后面问道。

“我一天吃得饱饱的，少吃半顿不要紧。人家小姑娘又冷又饿，住这样的地方……”老吴正经地说。我朝他的脸上看，我第一次看到他那种奇特的“一”字眉毛。

小赵不等他讲完，就接下去说：“我知道你在想你自己的女儿。”

老吴带点批评的口气答复小赵道：“小鬼，你懂得啥子！我那个女娃子，她才真幸福啊。多想想人家罢。”

小赵不做声了。我也不讲话。老吴也沉默了。小吉普又穿过一些没有半间完好房屋的街道，终于在城外一个地方停了下来。我的目的地到了。

我匆匆地下了车。我离开老吴的时候，他还在驾驶台上大声说："巴同志，再见！"我听见车轮的声音，却不知道车子开到什么地方去。

三

我在开城郊外住了下来。军政治部秘书科的王秘书把我引到一家朝鲜人家，我手里还捏着那束野花，小赵扛着我的铺盖卷跟在后面。王秘书在门上拍了几下。门开了。一位白衣、白裙、白头发的老大娘站在门内带笑地欢迎我们："你们来了。快进来。"她把我们带进木板廊上一间靠里的干净小屋子。我把花放在屋内一张一尺高的小圆桌上。王秘书点燃他带来的蜡烛。小赵在地炕上摊开我的铺盖。我们正在谈话，老大娘忽然在廊上叫起来："飞机！"我们听见了敌机的很大的声音，王秘书连忙将蜡烛吹灭。他说，这里虽是"中立区"，可是美国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大家还是小心的好。王秘书和小赵刚走，我就躺在地炕上睡了。

第二天下午，我午睡起来，正在房里看材料，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大叫："报告！"我连忙走出房门，看见老吴站在廊下院子里。他见到我，便带笑说："巴同志，我今晚上要回去了。你要不要带信？有没有事情？"

"我没有信，谢谢你。你上来坐坐罢，"我高兴地答道，好像看见了老朋友一样。

"我不耽搁你，坐一会儿就走，"老吴带笑说。他坐在木板廊上，解开脚上球鞋的带子，脱了鞋，走上来，跟着我进了小屋。

我们两个都坐在地炕上，中间隔着那张一尺高的小圆桌。我们刚刚坐定，老吴忽然从裤袋里掏出一大把五颜六色的水果糖放在小圆桌上，亲切地笑道："请吃糖，请吃糖！"他自已先拿起一颗糖，剥开包皮纸放到嘴里去。

小赵走进屋来，听见老吴的话，笑问道："你在哪里弄来的糖？"

老吴那张不算瘦的黑黄脸上铺满了笑容，两道浓眉显得特别黑，特别平。他噙着糖笑道："你们吃了，我就说。巴同志，你吃罢，不要客气嘛！"他看见我们都把糖放进了嘴里，便接下去说："老马给我的。他刚才在安东买来。祖国来的糖，不简单啊！你们多吃几颗。"

我听见这几句话，便抓起桌上的糖，放到他面前地炕上，说："这是别人送给你的，你自己留着吃罢。"

老吴马上捧着糖站起来。他又把糖放到小桌上，笑着说："巴同志，你不要客气嘛。小赵这个小鬼天天想家，让他多吃两颗也好。"

小赵带笑辩道："巴同志，你不要相信他的话。我家里又没有一位戴大红花的劳动模范，哪里像人家不是挑战，就是竞赛，不是寄相片，就是寄荷包。一封一封信写得比糖还甜。他

不用吃糖，连心里也甜了……”

“小鬼，你再瞎扯！看我不把这些糖全塞进你嘴里头，让你心里也甜一下！”老吴骂道。可是，他仍然坐在地炕上满意地哈哈笑着。

小赵不理他，却换了话题说：“昨天我也给老马帮过忙，不过我不像你那样向人伸手讨糖吃。”老吴刚刚开口说了一个“我”字，小赵不让他插嘴，又换过语气说：“说句公平话，老吴有什么东西，从来不肯藏起来，总要分给大家。”老吴忍不住带笑地插进来一句：“你又在冲壳子！”

“我讲的全是真话，”小赵只顾认真地往下说；“别人不是存了毛巾，就是存了袜子、鞋子。只有老吴一个人什么也没有多的。不是他浪费，他全送掉了。连他爱人亲手做的荷包，他也送给别人。”

“不是荷包，是脸帕口袋！”老吴笑着分辩说。“可见你的话靠不住！”

“我的话千真万确！”小赵扬起眉毛得意地说，好像他自己做了值得表扬的事一样。“只要有人向他讨，他连爱人的相片也舍得拿出来。”小赵说到这里自己先笑了。

“给别人看看老婆的相片，有啥子稀奇！我不像你们那样封建，”老吴笑道。

我看出来，小赵虽然喜欢跟老吴开玩笑，其实对老吴大有好感，老吴也并不因为他这些话生气。老吴的年纪比小赵的大，根据我的眼睛判断，老吴可能过了三十，小赵不过二十光景。可是他们好像谈得来，处得好，两人中间还存在着友情。

这种判断使我高兴。我初到朝鲜，开始在志愿军中间生活，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对什么都感到兴趣。所以老吴和小赵很容易引起我的注意，打动我的心。还不到一天的功夫，我们好像已经成了熟朋友。同他们在一起，哪怕坐在这间简陋屋子的地炕上，哪怕听他们谈些信口讲出的玩笑话，我也觉得很亲切，很愉快。不用说，我也想参加他们的谈话。可是我无法跟他们开玩笑，因为关于他们我知道得太少了。我只好改变话题谈别的事情。我便插嘴问老吴：

"老吴同志，老马的车子是不是昨天晚上赶到的？损失究竟大不大？"

老吴收起了笑容答道："他机器出了毛病，在天亮前才赶到。损失不大，合起来不过一箱多点儿。从祖国买来的笔记本、自来水笔、口琴、糖果都损失了些。这次刚刚买来给军里开会用的。有的要做奖品……"

小赵刚刚把一颗水果糖放进嘴里，他望着老吴眨了眨眼睛，插嘴说："我看要不是巴同志在车上，你昨天又会冒险来一下。"

老吴抱歉似地笑了笑："这有啥子稀奇！我的确爱跟敌人开开玩笑，斗斗法。况且这是公家的东西嘛，老马又是我的老战友。"

我不大懂他们的谈话，带了点不安地问道："老吴同志，是不是我妨碍了你？给你添了什么麻烦？"

"不是！不是！"老吴连忙摇头答道。"我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你安全送到开城。"

小赵一定看到了我那疑惑不解的脸色，他含笑对我解释道："巴同志，你没有听懂我的话。我在说你把我救了。要是你不在车上，老吴就会开起大灯把敌机引开。老马的车子可能不会出事。可是说不定炸弹、燃烧弹、机关枪子弹都会落到小吉普上面，我当然也'报销'了……"

"你又在冲壳子！"老吴笑着打断了他的话。

"你说你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小赵忽然红了脸，认真地质问老吴。

"我又不是有意干的，"老吴答道。他勉强笑了笑，露了点窘相。

"我听见人讲过两次。有一次你开空车走过一个渡口，好些车子挤在那里。敌机来了，在头上飞了一阵，开始低飞扫射。你把车子掉转身，开起灯拚命跑。敌机给你引开了。你的车子左弯右拐，时快时慢，有时又躲在大树下休息，引得敌人报销了不少的机关枪子弹和炸弹。听说你左腿也打伤了。"

我看见老吴把他那两道浓眉皱成了一个显著的"一"字。可是他听到小赵的最后一句话，忽然笑了起来，理直气壮地驳道："你明明信口开河。我左腿受伤是老马亲眼看见的。你不信可以问老马。我们开车送粮食到前线，我怎么敢冒险？"

小赵红着脸固执地说："我们现在不谈受伤不受伤。我只问你：有没有那样的事？"

老吴勉强笑答道："我说过我不是有意干的。"

我明白小赵在向我宣传老吴的英雄事迹，老吴却不愿意别人当他的面提起那些事。我听了他们两人的对话，对我这位

小同乡也有了较深的了解了(不消说，这是我自己的意见)。说实话，我喜欢这个人，也愿意跟他在一起多谈。我便又换过话题，向老吴问起朝鲜的一些情况，也对他讲了些祖国建设上的成就。小赵也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三个人一直谈到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请老吴在上面写下他的名字。老吴高高兴兴地掏出他那支英雄牌金笔，在笔记本后面空白页的左下角写了三个笔划很粗的小字：吴万山。

四

这天傍晚小赵陪着我在附近散步。这一带所谓"中立区"，有不少的人家。虽然多数是破房，到处有断瓦颓垣，废墟上还种了些菜，但是也有几间整齐的房屋。朝鲜老大娘和大嫂子穿得干干净净，头上顶着包袱或者罐子来来去去。姑娘和小孩们在屋前空地上唱歌跳舞。眼前这种熙熙攘攘的欢乐景象，跟我在那个只有寥寥几份人家的山沟里常见的大不相同了。我信步走了一阵，忽然听见有人叫我。我抬起头朝前面看，老吴刚刚从一家院子里跑了出来。

"老吴同志，你还没有走?"我含笑问道，我高兴又见到了他。

"就要走了。我回来拿东西。再见!"他举起手大声说，手里拿着一个绣花的慰问袋。

我的眼光跟随他的背影朝前望去。我看到了那辆小吉普。小赵在我旁边说："我们赶上去。"

我们赶到车旁，老吴已经坐在驾驶台上坐好了。他伸出头在跟人讲话。我认不清那个人是谁。小赵指着他对我说："老马，他从前是老吴的助手。"

老吴看见我走近，在车上朝我一挥手，带笑地说声："巴同志，再见！"便开起车子走了。

我望着车子转了弯。小赵跟老马谈起话来。我这才看清楚老马是一个瘦小精干的年轻人。他脸上肉不多，显得颧骨高高，可是一对眼睛相当亮。他们正在谈论老吴，我便插嘴向老马问起老吴受伤的事情。

听口音我知道老马是上海人。他离开家乡不过一年几个月，我长时期在上海工作，所以我们一谈便熟。我们三个坐在一家院子的木门槛上，老马兴奋地谈起了老吴：

"……我们是老战友。去年我们一道在军后勤汽车连。他是班长，我当他的助手。我们开一部嘎嘶车，安全行车两万多公里，没出事故。后来他挂了花，治好以后就调走了。他是个好同志，好司机。他爱护车子就像爱护自家的小人①一样。他不管多么疲劳，停下车来也不肯休息，总要认真检查车子，把车子擦洗得干干净净。有时他真困，快睁不开眼睛，他不是跑到小河边弄点水洗洗眼睛，就是抓一把雪擦擦面孔（一到冬天，朝鲜遍地大雪，不像在上海几年才看见一次雪，一天半天就化了）。我看见他这样苦干，我也不敢偷懒了。

"去年秋天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两个开车子送粮食到

① 小人（上海话）："孩子"的意思。

前线，已经走了大半的路程，不晓得怎样让敌机发现了。突然‘噗，噗，噗，’我们头上挂起了一排‘天灯’，照得公路亮晃晃的。我们当时找不到隐蔽的地方。说真话，我心里有点紧张。老吴倒很镇静，他加足了马力开起车子冲过去。一梭子机关枪子弹扫过来，都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车子仍然拚命地跑，老吴一面给我打气：‘不要怕，我们斗得过它！’敌机追上来了，又是一梭子机关枪子弹。这一回打中了车上盖的篷布，烟火冲进了驾驶台。老吴马上停车，教我跟他一道爬上车去，把着了火的篷布拉开。谁知他打开驾驶台的车门，刚刚下车，就昏倒在地上，一脸都是血，原来他脸上、腿上都挂了花。我先包扎好他的伤口，又转身去把车上的火扑灭。敌机还在上空转来转去，又扫射，又投燃烧弹，都没有打中。老吴醒过来了，他在旁边大声叫起来：‘老马，快，快，开车冲出去！’我又是急，又是恨，一时没有主意，我就问他：‘班长，你哪？’他说：‘老马，你不要管我，前线的粮食要紧，要保证按时送到啊！’我还有点迟疑不决。他生气了，叫哑了声音批评我：‘老马，你是个党员，你怎么这样婆婆妈妈的？这一车子粮食打坏了，哪个负得起责任？快冲出去！’我只好听他的话。我把他搬到一棵树下，又拿棉大衣盖在他的身上。他很着急，接连催我开车冲出去。我把粮食送到了。我整夜都在耽心他的伤。第二天我回到连里，才晓得他已经给兄弟部队抢救到医院去了，他们还给他施行了手术。后来我又听说，他醒过来见人就问：‘老马把粮食送到没有？有没有损失？’他晓得我把粮食送到了，才放心养伤。……”

老马谈起老吴越谈越有劲。小赵听见人表扬老吴更是万分高兴。我当然也愿意多知道老吴的事情。要不是有人来把老马叫走，他很可能跟我们谈到半夜。

五

我在开城住了一个多月。我找过老马几次，我还想听他谈谈老吴的事情。可是我只见到他两面，而且两次都是在嘎嘶车旁边，跟我们匆匆地交谈了几句，他就坐上驾驶台开起车子走了。我在访问、座谈、看材料、记笔记、写通讯报导以后的休息时间里也曾跟小赵闲谈，他常常谈到老吴，只是他谈的都是些我已经知道的事情，至多不过增加一些细节而已。

我正打算离开开城到前沿的坑道里去访问最近攻占××高地的英雄连队，一天上午我在房里写信，忽然听见一声熟悉的"报告！"，我刚刚站了起来，老吴就推开门进来了。他是带着笑声进来的。他来得这么突然！我的右手让他的两只手紧紧捏住的时候，我还疑心是在梦中。

"老吴同志，好久不见你了。"我满心欢喜地说。

"我回祖国去了一趟；又送我们主任到志政开会，"老吴笑容满面地说。"我昨天夜里来的，睡了一觉，起来就来看你。"他从裤袋里掏出一包"白锡包"放在小圆桌上。"我给你带来的。我在天津买到两包烟，一包请大家抽光了，这一包留给你。巴同志，我晓得你们拿笔杆的人都爱抽烟。听说这是上海出的好纸烟。"

我其实抽烟很少，一天难得抽两支。可是老吴看见我抽过一支烟，他就记在心里。我现在要说服他把“白锡包”收回去，毫无办法。小赵进来了。我听了他的劝告，终于让了步。于是我们三个人又安静地坐下，在亲切、和睦的气氛中谈起来。

不用说，还是老吴谈得多些。他谈了回国后的见闻，也谈到他最近的情况。我非常羡慕他：他浑身是劲，对什么都很乐观，而且永远是那么高兴。虽然他两只眼睛里都有血丝，显得红红的，可是他动作、讲话都不带丝毫的倦意。

我看见老吴那双发红的眼睛，又注意到他左边脸颊上那个带黑色的伤疤，才觉得他的脸有些消瘦了，便关心地劝他：“老吴同志，你要注意身体啊。你看你眼睛都熬红了，是不是昨晚上又没有睡好？”

老吴不回答。他望着我，两道眉毛又连起来了。他忽然问道：“巴同志，你还记得那个朝鲜小姑娘吗？”

我点点头，说：“我记得，她叫顺姬。”我马上想起了白衣白裙的小小身形和那束早已枯萎了的野花。

老吴接着说下去：“对，小姑娘叫金顺姬，那天我跟你们分别以后，车子开到钟楼附近，我找到了金顺姬外婆家，把小姑娘接上车，顺路送她回家。哪个晓得到了那儿，她认不得自家的家了。我们找来找去，只见一些瓦堆，路边还有大半截烧焦的树干。随后我们碰见一位老大娘，她提了个篮子走过来。我问她，才晓得前一天夜里敌机来丢了几个燃烧弹，把啥子都烧光了。我又问她晓得不晓得金顺姬的妈。她只说死了十多个

人。老大娘上了年纪，耳朵又不好，跟她讲话很吃力。金顺姬在瓦堆跟前走来走去，一句话也不讲。我们的谈话她都听见了。我找不到别的人。老大娘讲来讲去都是那几句。她后来就爬到瓦堆上头去了。我也只好把金顺姬带走。小姑娘上车以前一直在发愣，上了车忽然伤心地哭起来。我劝她、哄她，都没有用。她要她的妈。她哭了半个多钟头，就在车上睡着了。我把车子开到家，她才醒过来。第二天我向我们主任报告了经过的情形。主任教我把金顺姬送到文工团去。她在文工团女同志那儿住了一个多月，人也长胖了。我昨天晚上送李部长到开城。我们主任教我把金顺姬送回她外婆家去。巴同志，你想不到，小姑娘上车的时候，文工团那些女同志都哭了。小姑娘对她们才亲热嘞！她上了车又跳下去。她学会了好些中国话，会唱中国歌，喊'阿姨'才喊得亲热嘞！那些女同志每人送她一样东西。她们还给她缝衣服、做脸帕口袋。她带走了整整一个包袱的东西，都是大家送给她的。我把她送到她外婆家，跟她分手的时候，她拉住我的手拚命喊'老吴叔叔'，不让我走开。她说中国话接连说了几次：'我要走到你们那里去。我要去看阿姨，看叔叔。'她哪儿会走得到？那么远的路，她连地点也搞不清楚！李部长在车上等我。我只好咬紧牙齿甩脱她的手，跑到车子跟前。我一路上听见她哭着喊'老吴叔叔'，我心里头真不好过，我差一点儿也流出眼泪来了。昨天到了开城，我一晚上尽做梦，闭上眼睛，就看见金顺姬拉住我的手不放我走。我从来不是这样。……"

小赵听得出神了，我无意地看到他两次揉眼睛。老吴的

两道浓眉又连在一起了。这一次那个出色的“一”字显得有点可怕，因为在它下面还有一对熬红了的眼睛。

“老吴，你这样不行啊。睡不好觉，开起车来会出事故的！”小赵不等老吴讲完，关心地打岔道。

老吴忽然把头一扬，出乎我意外地笑了笑。他回答小赵道：“小鬼，你放心，我不会像你那样婆婆妈妈的。一两晚上睡不好觉，也是寻常的事。我又不是一块石头，怎么能不动感情？你哪天回去，到文工团一问就明白。哪个不夸金顺姬好！”

小赵静静地听老吴讲话，他满意地点着头。他的脸正朝着院子，他听见外面的人声，抬起头一看，连忙低声对我说：“李部长来了！”我们三个都走出屋子，到廊上去迎接这位新来的客人。

“你来找你的小同乡摆龙门阵，是不是？”身材较高的李部长看见老吴穿好了鞋子站在廊下，便开玩笑地说。老吴带笑答应了一个“是”字。等到李部长走上木廊跟我握手的时候，他就悄悄地走出了院子。



六

这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老吴。过了三天我离开开城的时候，小赵也动身回兵团去了。我在几个连队中间住了四个多月，见到也听到不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却始终不曾听见人提过老吴的名字。老吴送给我的“白锡包”纸烟，我只抽了十

多支，每次点燃一支捏在手指间，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我那位一见如故的小同乡。我在连队里打听不到他的消息，可是我没有丝毫的焦虑。我相信回到兵团我就有机会同他见面。

果然我回到兵团，在政治部住了一个星期，后来开车送我回国的司机同志又是老吴。

政治部主任不在家，仍然是李部长送我上车。我们走到山沟口小吉普跟前，我看见老吴从驾驶台上跳下来，心里一喜，便唤声“老吴同志！”，他马上跑过来笑嘻嘻地紧紧捏住我伸出去的手。

“你们又可以大摆龙门阵了，”李部长望着老吴带笑说。

老吴放了我的手，愉快地笑着回答李部长道：“首长，我跟巴同志几个月不见了，路上总要讲几句话嘛。不过请首长放心，我保证把巴同志安全送回祖国！”

“那就好。不过记住路上少吹牛啊，”李部长点了点头嘱咐他道。

“首长晓得我这个脾气，就不要紧了，”老吴得意地笑道。

车子开出了山沟。我仍然坐在驾驶台旁边的前座上。一阵一阵的秋风吹过，我感到很舒适。崭新的棉大衣穿上了身，我觉得十分暖和。我跟老吴交谈起来。老吴起初谈话较多，他问起我这几个月的情况，也谈了谈他自己的一些事情。我才知道他三个月前回国治过病。再一问，他便告诉我他回国去把左腿上那颗枪子取出来了。我奇怪，为什么连那个对他极感兴趣的小赵也不曾提起子弹的事？

“这种小事情我没有让小赵晓得。不然，他又会讲开了。

现在腿好了，跟好人完全一样。以前天气变的时候，还有点隐隐的痛，”他带笑解释道。

他还告诉我，他得到他女儿的相片了。“肥胖肥胖的。不像我，像个大冬瓜！”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了头一次做父亲的人的喜悦。

可是天黑以后老吴就闭上嘴了。车子不开灯在山中间转来转去。我看得出他很小心地望着前面那块挡风玻璃，又很注意地倾听空中的机声。时时有枪响。有些迎面过来的嘎斯车刚刚开灯，立刻又关上了。爆炸声时起时落，火光时隐时现。有一次老吴开足马力在一排照明弹下面冲过那个给照得雪亮的封锁口。这是我在朝鲜度过的一个极不安静的夜晚。说实话，我有些紧张。可是老吴仍然很镇静。他后来居然小声唱起了文工团编的那首歌《飞罢，英雄的小嘎斯！》，他的嗓子听起来并不悦耳。然而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能鼓舞别人的自豪感。

深夜一点多钟，车子才停了下来。旁边有几棵大树和几间茅屋。老吴跳下车，轻松地笑道：“巴同志，以后没有问题了。这儿是明德里加油站，我找个地方，你好好睡一觉罢。明天可以白天开车。”他便跑到一家茅屋前去敲门。等到我搬下了铺盖卷，他已经找好住处回来接我了。老大娘让给我们半间屋子。我们摊开铺盖倒下去，我刚刚闭上眼，就睡着了。

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八点，老吴已经做好早饭了。米和新鲜蔬菜，还有鸡蛋粉和罐头肉，都是从兵团带来的。真正的成都味，还有辣椒。我们吃了早饭，打好铺盖卷，搬上车去。

九点钟我们的小吉普开出了明德里，得意地跑上阳光照耀下的公路。老吴浑身是劲，心情舒畅地摆动方向盘，唱着《飞罢，英雄的小嘎嘶!》。看他满脸的笑容，听他轻快、喜悦的声音，我觉得他的心好像已经飞起来了。我觉得我的心也跟着飞起来了。车子就这样顺利地将一座一座的高山和一条一条的公路抛在后面，不停地前进。我们中途在一个农家做过了晚饭，把剩下的一点米和罐头肉送给那位善良而热情的女主人；我们还在一片瓦砾的龟城住过了一晚，一位和善、好客的老大爷把他屋子的地炕让出一半来，他同我们睡在一起。

早晨八点半以前，老吴又欢喜又骄傲地把车子开过鸭绿江桥。江水依旧碧绿、平静，连微浪也没有。大半年前我过江入朝的时候，日记里有这样的话："江桥是炸毁后修复的，伤痕尚在。"现在桥身焕然一新了，回到分别了七个月的祖国，我觉得土也是很香的。

老吴把我送到兵团留守处。我在那里受到了亲切的招待。同志们还给我安排了一个整洁的房间。我和老吴在一起吃过了早饭，还想找他谈谈，可是他一晃就不见了。我到院子里去找他。那辆满身尘土的小吉普已经洗得干干净净，却不见老吴的影子。我回到那个小房间，看见老吴的"脸帕口袋"仍然放在窗前小方桌上，旁边还有一本前不久才出版的《朝鲜通讯报告选》。我拿起书来翻了几下，看见书上有很多用红色铅笔画的大圈小圈，我想，他看书这样用功，倒比我强多了。我知道还有机会看见老吴，也就放了心。方桌两旁各有床一张，被单和铺盖都是新的。我便在一张床上躺下。我早晨三点半起

身，在车上颠簸了几个钟头，下了车又忙了这一阵子，也感到一点倦意。因此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躺下去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熟，睡得很久。我一觉醒来，发现桌上的“脸帕口袋”不见了。书也不见了。我连忙跑出去找老吴，院子里也不见了那辆小吉普。我问别人，听说老吴的车子早已过了鸭绿江。我正奇怪他为什么不辞而别，无意间看手表，才知道我整整睡了五个多钟头。

我只得失望地回到小房间。我忽然在方桌上看见一张写了字的信纸，便拿起它来。我首先看到的是“吴万山”的署名。我激动地念完了信：

> 巴同志：我就要开车过江了。我来向你告别，看见你睡得很香，不敢叫醒你。我路上没有好好地照应你，请你原谅。我已经见到马主任。留守处派人去买车票，晚上送你上车，请你放心。祝你顺利回到上海。请你保重身体。希望你再来朝鲜，再来我们部队。希望你常来信。致
> 革命的敬礼！
>
> 吴万山 即日。

七

我反复地回忆有关老吴的那些事情，花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我好像又回到八年前去了。

我回到上海不久跟老吴去过一封信，说几个月后我要再

去朝鲜，重到他们的部队。他寄来一封回信表示欢迎，还告诉我他们部队的一些胜利消息。这就是我跟老吴最后的联系了：一年以后我才再去朝鲜，我访问的又是另一个部队，在那里没有人知道老吴的事情。虽然我不曾忘记这个朋友，可是我已经八年没有听到"吴万山"这个名字了。只是在我从朝鲜带回的大堆材料、报纸、笔记和信函的中间，还有一样老吴留下的东西："白锡包"纸烟壳。这个不值钱的"纸烟壳"教我常常记起过去的那一段生活来。

想不到我居然在成都碰到了他！我多么急切地等着他来，我真想跟他长谈！

我等了整整大半天，又等了一个整天，却始终不见老吴的影子。我打算再等个半天，下午就出去到派出所或者医院打听他的消息。可是就在第三天清早我刚刚洗好脸，正在喝茶，听见有人走上楼来，我马上放下茶杯，转过身去。我还以为上来的又是送信人。忽然一个陌生的女人声音在门外说："巴同志在家吗？"我连忙走到外屋，一面说："在家，请进来。"

站在门外的女人走进外屋来了。我的头一个印象是她身材高大。其实她也不过比一般的本地女人稍微高些，宽些。她有一张黑红黑红、长得很丰满的椭圆脸，一头又黑又厚、齐到后颈的短发，两片厚厚的、红红的嘴唇，一对不大不小、又黑又亮的眼睛。她一进来，便向我深深地点一个头，带笑说："我叫王巧英，吴万山要我带个口信来。"其实她不讲出姓名，我也猜到了她是谁。八年前小赵讲的那些话一下子又回到我的脑子

里来了。

“原来是吴大嫂，请坐罢，”我兴奋地说，一面拿起热水瓶给她泡茶。

“我不吃茶。我还有事情，就要走的，”她客气地说，可是我已经把茶杯放到外屋正中那张小圆桌上她的面前了。她接过茶杯，说了两声：“多谢，”就在长方凳上坐了下来。

我坐在她的对面，客气地说：“多坐一会儿罢。”我又关心地问：“老吴伤得怎样？他还在医院吗？”

王巧英同志答道：“他昨天就回家了。他的伤不要紧，养几天就会好的。他教我来问巴同志明天有没有空。他自家不能来看你，想请巴同志到我们东风公社去看看。顺便到我们屋里坐坐，吃杯茶。他说巴同志还没有见过我们的女娃子。”

“吴大嫂，我有空。我明天一定来。我上午就来。我很想看见老吴，也很想看见你们一家人。”我爽快地答应下来了。“不过我不晓得到你们那里怎样走法。”

“我们把路线都画好了，请巴同志看看。公社的地点、搭哪一路公共汽车，都写得很明白。”她说着就从棉大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来，把夹在本中的一张纸递给我，周到地问：“巴同志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我明天吃过早饭搭公共汽车来，”我连忙答道。

“我明天就在汽车站等巴同志，”她满意地说，就站了起来。

“吴大嫂，再坐坐罢。你明天不用等我，我有了路线图就

找得到。"我客气地挽留她。

她带点歉意地笑了笑："我要去听报告，不能坐了。巴同志，我明天上午九点半钟在汽车站等你。多谢你啊，你肯到我们那儿去，吴万山一定高兴死了。他常常讲起你们在朝鲜的事情。"她带笑地离开了小圆桌。我看见留不住她，只好陪她走出去。

我们走到楼梯口，她侧过脸对我说："巴同志，请不要下楼了，我骑车子来的。"她马上加快步子下楼去了。我当然也跟着她下了楼。

小楼门前台阶上栏杆旁边果然有一辆女式自行车。王巧英同志推动车子下台阶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顺口问道："吴大嫂，你们公社的社长是哪个？是不是老吴同志？"

她侧过脸看了我一眼，很大方地含笑答道："我是社长，吴万山管农具修配厂。他五八年底才回来。上级本来留他在外面工作，他几次打报告要求回农村搞生产，后来就批准了。他爱管事，一天总闲不住。他去年搞出了几样新的东西，还得到省里的奖励嘞！最近他正在动脑筋，说要搜集旧材料、旧零件，给我们公社装一部卡车。他爱搞，就让他搞嘛，横顺不花公家一个钱……"

她一面走一面讲话，我在旁边注意地听。她推着自行车慢慢地从院子里走上了石板铺的门道。我抢先走到前面，把那两扇整天掩着的黑漆大门打开，送她出了门。她跟我握了手告别，正要跨上车子，我忽然又问："吴大嫂，老吴同志高兴的时候，是不是还爱唱歌？"

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好像感到兴趣地笑了笑，然后大声说：“他啊，就是那个脾气，一天从早笑到晚，唱来唱去都是那个《飞罢，英雄的小嘎嘶！》。现在连我们的女娃子也会唱了。他说他在朝鲜就爱唱那个歌。他将来还要给我们公社开车子运东西嘞！”她跨上了车，说声：“巴同志，再见！你明天一定来嘛！”就蹬着车轮朝右边走了。车子跑得很快，一霎眼间就转了弯不见了。我的眼睛马上失去了那个非常鲜明的深蓝色背影。她真像飞去了一样。

我在大门口站了许久。我在等她回来吗？不是。我在等老吴来看我吗？更不是。我在抓回刚才那段短短的时间。我在回忆她那几句话。我在倾听老吴爱唱的那个歌《飞罢，英雄的小嘎嘶！》。我仿佛看见老吴开着他自己装配的卡车在东风公社的大马路上飞跑，飞跑！

“飞罢，英雄的小嘎嘶！……”我不知不觉地用我的左嗓哼了起来。

1961年8月15日在黄山。

后　　记

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八月这一年中间，我写了七个短篇，都是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关的，或者更可以说，都是怀念我所敬爱的英雄朋友的文章。我写这些小说，似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我写的虽是别人和别人的事情，可是我自己也在小说里面生活。我执笔的时候，好像回到了九年前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见到了那许多勇敢而热情的友人。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我希望得到读者们的宽容和原谅。

我将去年写的散文《朝鲜的梦》作为短篇集的“代序”，放在卷首，并无深意。但是我要说，我这七篇小说都是接着《朝鲜的梦》陆续写下来的，而且都贯串着同样的感情。有些话我在小说里没有说或者说而意未尽，在“代序”里可能找到。

我很高兴在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伟大节日后四天编好了这个短篇小说集。

1961年8月19日于黄山紫云楼。

杨 林 同 志

《杨林同志》，发表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文艺》总第一期。

杨林同志

我回到师部的那天晚上，敌机来投了一颗炸弹，就在我住的那家朝鲜老大娘的房子附近爆炸了，空地上现出了一个大坑，却没有毁屋伤人。第二天师政治部陈主任就叫人把我的行李搬到半山上一个洞子里去。这天下午我在另一个地方参加座谈会，晚上才回来。当天下过雪，雪垫得厚，我走了一段路，到山脚下。

整个山都是白的，上山的路看得出来，我对小通讯员说了一句："上去罢！"就迈步上山。我还是第一次走这条路，不知道高低，这一级一级的山路每一级中间的距离相当大，我走了几步，就感觉到吃力。"李林同志，慢点走。"这个跟着我从××山八连来的小通讯员接连说，他紧紧跟在我后面，扶着我，拉着我。最后我站在洞子前面，满头大汗，喘了几口气，小通讯员在旁边带笑说："李林同志，你年纪大，在城里头住惯了，要慢慢走。"我谢谢他，说："今晚上多亏你帮忙。你辛苦了。"我为自己感到抱歉，我才四十几岁，在他的眼里就显得"年纪大"，行动需要人照应了。

小通讯员笑笑说："我不辛苦。照应李林同志，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嘛。好……我去点个亮，让你早点休息。"他走进

洞去了。

这个小通讯员才二十岁，叫杨林，圆圆脸，圆圆眼睛，身材瘦小，却相当结实。他是我的同乡，四川人。我在××山八连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在连部当通讯员，郝指导员有时派他跟着我到班、排里跑跑，我同他就熟了。这次陈主任派车接我，郝指导员说："你去的时间不长，让杨林去照应你罢。"杨林没有讲什么，就打好背包跟我上了车。他入朝不过几个月，可是他最初在师部待过一个短时期，到了这里他并不陌生。车子在傍晚开出，深夜到达，管理员作了安排，杨林很快就把我的住处布置好了。我睡在老大娘家一个小房间里，杨林却背着背包找陈主任的通讯员郭卫去了。我在车子上给颠簸了几个小时，感到疲倦，在铺上睡下来闭上眼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好，连附近落了一颗炸弹也没有惊醒我。我仍在做我的梦，却没有想到把杨林急坏了。

杨林给爆炸声吵醒了。他连忙跑过来看我有没有受惊。老大娘倒醒着。我却睡得很好，他唤我两声，唤不醒。他也不走开，就坐在我房门外木廊上裹着棉大衣打盹，睡到了天明。

我起来上厕所，天刚刚亮，走出房间看见杨林在打扫院子，我问道："有什么事？你这样早起来了！"

"没有什么事，"他一面打扫一面说，"我来给阿妈妮做点事情。你再睡一会儿罢。"后来我听这里的老大娘说，才知道他听见炸弹声就跑来了。我便问他："你为什么不喊醒我？"他笑道："你睡得好。喊不醒。"我说："那么你就应该回去睡觉。"他又回答："我害怕敌机再来，就等在这儿，有事情我好喊醒你。"

我看了看他的脸：两颗滚圆的漆黑眼瞳好像一对发光的玻璃珠子停在那里。此外，圆圆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征。这是一个普通的健康的年轻人的面貌。在这一对发亮的眼瞳里，我看到了新的充满生气的东西。我想起了郝指导员告诉我的事情，我就问他："听说你这次来朝鲜，你妈不同意是不是？"

"我妈同意了。我妈今年五十七，我还有个哥哥，大我十岁，前年接了嫂嫂。我要参军的时候，我妈思想搞不通。"杨林讲到这里，眼睛一亮，他微笑了。"我报了名回家，她不给我饭吃。我买了十个鸡蛋，请嫂嫂煮三个给我吃。我又劝妈说：'人不能忘本，不能光想到自家啊！想想当初我们怎样，如今我们又怎样。'有人帮我做我妈的工作，我妈思想搞通了，她自家送我去参军。"

"你家里过得不错罢？你说有人帮忙做工作，是什么人呢？"我再问。

"我们从前受过很多苦，如今翻了身，有吃，有穿，有屋住。"对后一句话他就不回答了，他只是笑笑，那一对黑眼瞳一下子更亮了。

那是下午的事情。这时我走进洞里，杨林已经把蜡烛点燃了。烛光摇晃得厉害。洞子不算小，是一个长条，有一张长的土炕，炕前还有一张简单的木头小桌子。被子铺好了，我们两个人睡在炕的两头。

"李林同志，你今天累了，早点睡罢，"杨林站在小桌前对我说，又带笑地加上一句："今晚上我不会喊醒你。"烛光在他的脸上晃来晃去，那一对黑眼瞳还是很明亮。

我的确感到疲倦，又感到眼睛不舒服，说声“好”，便脱衣睡了。他接着吹灭烛，也上了炕。

我本来想睡，可是倒下去以后，思想却活动起来。洞子里阴冷，我翻来覆去，总不能入睡。我想起下午座谈会上几位年轻战士的声音、相貌。有北方人，有南方人；有圆脸，有长脸；眼睛有大有小；但这些脸和杨林的脸有相似的地方：端正、健康、有生气、充满精力；他们讲起话来好像什么都肯告诉你一样。那几位战士和杨林的年纪差不多，参军入朝的时间也不久，可是都参加过战斗立了功。他们谈起自己的事迹，谈得很简单，看得很平常。听他们谈话，消灭敌人、保护人民、献出生命，都是份内的事、普通的事。这几张脸连续在我的脑子里显现。还有一张不太圆的脸，脸上一对眼睛也很黑很亮，嘴唇厚厚的，这是郭卫的脸。我真喜欢这些年轻人的笑脸。我想着，心又渐渐平静了。我把压在被子上面的棉大衣盖好。

就在这个时候，睡得很好的杨林忽然讲起话来，声音不小，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不把美帝赶出去，我绝不回家。”我翻了一个身。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讲梦话。他咳了一声嗽，然后又静下来了。

这样一来我的思想又给搅乱了。我又想起了这天下午的座谈会，那几位年轻战士谈他们英雄事迹的时候，我边听边记，我偶尔注意到坐在炕角的杨林也在那里记下什么，他听得很注意。我早先在连部就听见郝指导员说杨林入朝以后学文化很努力。他同我在一起，也常常问起这个字怎么写，那个字如何念。他一定是在记录那些战士的事迹，他记得很认真。

我很想看看他究竟记下些什么。

我这样想来想去，脑子不肯休息。我开始感觉到洞子里气闷。我就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好衣服，披上棉大衣，拿着手电筒走到洞口。我轻轻地走着，不要发出响声，免得把杨林惊醒。

我走出洞，一股冷气扑到脸上。又落雪了。雪花满天飞舞，落在我脸上、手上，化成一滴一滴的水。上面是灰白色的天空，山下茫茫一片白雪，没有灯光。我在洞子前站了几分钟。我感到冷。我看表，北京时间还不到十点。我来朝鲜也有三个多月了。在我家乡很少见过这样的大雪，而且现在天气开始转暖了。我忽然想：这个时候家乡的人在干什么？我觉得我同杨林的梦有些接近了。

我转身进洞。我听见杨林的声音："李林同志。"洞子里又闪着微弱的烛光。杨林也穿好了衣服，他揉着眼睛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又下雪了。我睡不着，到外面去看看。你怎么也起来了？"

他看了我两眼，说："我看见你不在，我怎么不着急？照应你是我的任务嘛！你要是摔下去怎么好！"他说到后来轻松地笑了。

我感到惭愧，就说："你放心睡罢，没有事了。"我不再说话，就在炕上睡了。在黑暗中我还看见那对明亮的黑眼膛和那一张圆圆的笑脸，我的思想还是不平静。我听见了杨林的不太响的鼾声。我后来也睡着了。

第二天大清早，我起身的时候，杨林不在洞里。我走出洞

子。雪早停了。我看见杨林拿着一把铁锹走上来。他带笑说，额上、嘴上还在冒热气："李林同志，你不用担心，今天路好走了。"原来他把路上的积雪铲过了，土级铲平了些。本来我倒真担心路不好走，现在我顺利地跟着他走到了下面。

我刚刚停住脚，就听见有人唤我，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兵团文工团的王协理员，他后面还有人，都是文工团员，有男有女，年纪很轻，脚步非常轻快。王协理员是我的熟人，在兵团里见过几面，有一张褐色的瘦脸，厚厚的嘴唇，三十岁不到，广东人。他问我："你什么时候来的？又碰到你了。今晚上要看我们演出啊。"他很热情，捏住我的手不放，一连讲了三句话。

看他们的演出，陈主任已经给我作了安排。我们交谈了彼此的近况。文工团的部分团员在祖国学习节目，回到兵团，到部队演出，现在到了这个师。他们是昨天深夜到达的。就住在我右手上边两个较大的洞子里面。当时这些人上山吵吵闹闹，我居然一点也不知道。

我同王协理员谈话的时候，几个文工团员也在和杨林交谈。我听见他们称赞他做了"好事情"，给大家带来方便。杨林却拉住他们问祖国的情况。因为他们有事情，我要到陈主任那里去，我们就一起走了一段路，转了弯，才分手。

陈主任住在紧靠山脚的一间没有人住的破房子里。房子稍微修缮了一下，里面有地炕，房外有木廊，旁边还有一小间没有地板的小屋子。他睡在有地炕的屋里，就在木廊上吃饭、会客。他听见我的声音，从屋子里揭开当门帘用的雨布走到廊上来，高兴地招呼我："老李，把你搬到洞子里，你没有意见

罢。没有想到鬼子用炸弹欢迎你。"他哈哈地笑了起来。他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一张瘦脸生气勃勃。他很精干，又是一个直性子。

我坐下来对他谈起昨夜上山的狼狈情况，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我想得不够周到，我以为四川人会爬山，没有想到你在大城市住惯了，又使惯了笔杆子。不过有这个小鬼照应你，我想问题不大。"

"你说杨林吗？"我惊讶地问道。

"对，这个小鬼在我这里待过一段时期。初来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就是吵着要下连队，不愿意待在上面。问他为什么，他说来朝鲜是为了打仗。再问他，他说：'不打仗就想家，想妈妈。'真是个小孩。"他爽朗地笑了。"我后来把他交给郝平。现在不同了，懂得多了。郝平没有对你谈过吗？"

我不知道陈主任指的什么，一时答不出来。他接下去说："有一次他跟着郝平回连部，下过几天的雨，他们连部坑道口上方裂开一个大口，掉下一大块砂土，郝平刚走到洞口，小鬼看见就跑上前去，把郝平一推，两个人都倒了，小鬼膀子上受了点伤，左手半个月举不起来，他连哼都不哼一声。问他当时怎么想法，他说来不及讲话了，只好用自己身体顶住。"

我还不知道这件事，虽然郝指导员也对我谈过一些别的事情。"啊……"我这样答应着。陈主任又点燃一支烟，往下讲："我前些时候到郝平那里去过，看见这个小鬼。才几个月，不同了，好像长大不少。不过还是提要求，想到班里去，想打仗。"讲到这里陈主任又大笑了。"我当初参加红军，比他还小，

我什么也不懂，只晓得报仇。我只有十六岁，父母给反动派杀害了，红军经过我们那里，我就跟着红军走了。今天这些青年都比我那个时候强。看见他们，我真是满心高兴。你报导功臣的事迹，可是没有立功的英雄还多得很，你也可以找两个普通的年轻人谈谈，譬如我的通讯员郭卫，还有杨林……这些小鬼……"

陈主任一向健谈，要不是郭卫摆上饭菜，让我们吃饭，他还会谈下去。同桌还有宣传科的吴科长。我吃着祖国运来的罐头肉和鸡蛋粉做的菜，心又回到鸭绿江那边的祖国去了。我深切地感觉到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我应当把这些年轻战士的事迹多向祖国报导。陈主任这次找我来就是要我接受这样的任务。我已经开始工作了。

我们正在吃饭，王协理员来了，他来找陈主任和吴科长，谈演出的事。吃完饭我听见他们谈话，知道这次文工团还要到连队演出，要分散到坑道里演出，也要到八连演出。王协理员兴奋地谈他们的计划和决心。吴科长详细地谈他的安排。陈主任有时作一点补充。他们谈得起劲。我要去参加宣传科为我布置的青年战士座谈会，就先走了。

我参加了整个上午的座谈会，八个青年战士谈他们的事迹和心情。和昨天的会不同的是，发言的人中有一半不曾立过功，其中就有郭卫，有的入朝不过几个月。他们谈得朴素、简单，但是谈的是真实的事情和真实的感情。我尽可能多地把他们的谈话记在本子上。我注意到杨林也在记录。不过他

更多的时间望着讲话的人，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瞳动也不动一下。特别是他的朋友郭卫讲话的时候，他嘴唇边露出微笑。

散会以后，我同杨林走到我头一夜住过的老大娘的家里去休息。路上我问他听了这样的发言有什么想法。

“我要学习他们，”他答道。

我说：“你做梦也说：不把美国鬼子赶出去，绝不回家。你的决心真大啊。”

他红着脸说：“我就是爱说梦话，把啥子心事都讲出来了。不瞒你李林同志说，我初到的时候常常想家。我自己跟自己思想打仗。后来我决心大了。有时候我梦见我妈要我回去，我不答应。”

我们走进了门前有棵栗树的小院子，瘦小健康的老大娘像招呼亲人一样，问这问那，问我搬到哪里去了，住得是不是舒服。她笑起来眼睛眯得很小。老大爷不讲话，但他也用笑脸欢迎我们。他们的木廊擦洗得很干净，光滑发亮。老大娘就让我们在廊上休息。我对杨林谈起他的笔记本，说我想看看。他爽快地从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

这是一个普通的笔记本，是一位上海工人赠给“最可爱的人”的纪念品。头一页是毛主席的像，接着的一页上面有杨林写的几个大字：“把一切献给祖国。”另一页写：“一定要做一个好通讯员。”然后又写：“牢记指导员讲的故事。”以后就是记录别人的谈话，记得不全，只是一些重要的句子，但笔划很清楚。昨天和今天的会上他记的都在这里。我看那些简单句子，也能明白别人讲些什么。有好几处地方，他写了“向张祥言烈士

学习"的字样。我一下子想不起张祥言是谁。我把笔记本还给他的时候附带问了一句。

"就是指导员的老师嘛，"他答道。两只黑眼瞳又不动了。

"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那是两个月前在八连连部发生的事情。杨林又在向郝指导员要求到班里去，他表示不愿意当通讯员。郝指导员起初不做声，他伸起右手放在嘴上，五根指头用力把两边脸颊摸了一下，托住了下巴，眼光落在遮窗洞的木板上面，然后移到杨林的脸上，他说："我上次答应给你讲我当通讯员的事。……我从小就吃苦，也没有念过一本书，连一个'大'字也不识。我后来参军当通讯员。我跟着一位指导员，他对我真好，一有空就教我学文化，逼我识字。有一次我跟着他去打仗，我执行了通讯任务，回到他的身边，他挂了花。部队开始转移阵地，敌人炮打得猛，我把他背下火线。他去休养的时候，我仍然跟着他。……他看了不少书，本本都念给我听，讲给我听，有时还要出题叫我回答。我要是答不出，要是不认真听，他就摇摇头说：'小鬼，每个人都要往前走啊！你也不会当一辈子通讯员。你不好好学文化、学政治，要是你当了指导员，你怎么办？你会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啊！'我听他这么一说，再也不敢偷懒了。"

杨林不眨眼地望着指导员，听见指导员忽然静下来了，哪怕是一分钟，他也不能等待似的急着问："那位指导员现在还在部队吗？"

指导员摇摇头，声音低沉地说："他牺牲了。他是在解放

锦州的战役中牺牲的。他指挥两个排堵住了敌人一个团十几次的猛攻，最后剩下十多个人，仍然守住阵地。他受了重伤，还趴在地上指挥作战。后来友军消灭了敌人，同我们会师了。我背他下去，他两手两腿都断了。我刚刚把他湿漉漉的身子背在背上，他说：'小鬼，又是你背我，这是第二次了。谢谢你啊。你背起来，我一点也不痛。'他看见我掉眼泪，他还批评我：'小鬼，这是革命啊，像你这样哭哭啼啼怎么行！'我听他这一说，倒真的哭起来了。他又说：'不要哭了，我们打了大胜仗，应当高兴啊。……少我一个不要紧。你记住我的话，你将来也会当指导员的，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解放全中国……要坚强啊……要乐观啊。……'"指导员掏出那块用降落伞改做的手帕揩了一下眼睛，又把手帕放回裤袋里，加上一句："我到今天还记得我这位老师的话。"

杨林站在条桌前，仍然望着指导员的黑黑的长方脸，泪珠从眼角落下，他也不去揩干。他忽然挣红脸正经地说："指导员，我一定记住。"

指导员点点头说："记住就好。"他看看杨林，又看看旁边另外两个青年战士，他微微露出笑容说："要是他看到你们这些小青年，他会多高兴啊。……你们一定要大步往前跑啊！"他伸起手把军帽往上一掀，手指头在额上搔了几下。我才看到他的额上本来长头发的地方，现在是一块发亮的、淡红和浅白色的伤疤。……

老大娘端着一盆团子从房里出来，笑容满面地说："吃罢，阿妈妮做的东西，你们一定要吃。"我推辞，杨林也推辞，我们

又说又比划，但是没有办法。老大娘把杨林当作儿子一样，老大娘做出生气的样子，后来又笑了，终于逼着杨林吃了一个团子，老大娘才满意地走开了。

我阖上笔记本，交还给杨林，含笑问一句："你现在不要求到班里去吗？"

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听指导员的话。"

天还没有黑，演出开始了。陈主任差郭卫来找我时，我正和杨林到剧场去，在半路上遇着了。郭卫同杨林是同时到朝鲜的熟人，年纪差不多，见了面很亲热，总是有谈不完的话。路有点滑，走得慢。我们到了剧场，王协理员已经讲完话，节目开始了。陈主任招呼我坐在他旁边。我们都坐在木头上。杨林和郭卫坐在我的旁边。

剧场是利用山脚原有的一个大洞子改建的，可以容纳两三百人，一根一根的木头横倒在地上，当作座位。舞台很简单，是新近筑成的，在明亮的汽灯下面，显得干干净净。我回头看后面，木头上坐满了人，许多张年轻战士的脸，许多对漆黑发亮的眼珠，全朝着舞台。

节目不多，有歌有舞，有独唱，有合唱。内容是反映祖国人民的新生活，歌颂毛主席，歌颂党。合唱《东方红》开始，最后一个节目是舞蹈《抢渡大渡河》。每一个节目结束，战士们都热烈鼓掌，露出满意的笑容，我听见杨林对郭卫说，他入朝以后还是头一次看见这样好的节目。郭卫说，他看过朝鲜人民军协奏团的慰问演出，也很好。杨林说，看了这些节目，更

爱祖国，晚上一定要做梦。郭卫笑着说，他高兴起来，就睡得特别好，不做梦。我觉得好笑，真是小青年的想法。演到最后一个节目，剧场里特别安静，人们聚精会神地望着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争分夺秒，有敌无我，奋不顾身……勇士们的一举一动牵引着两百多个战士的心。我侧头看杨林，他睁大眼睛，嘴微微张开，好像在说："快！快！"他把郭卫的手拉住。郭卫也不眨眼地望着台上的红旗。勇士过了江，红旗插在对岸，胜利了！战士们热烈鼓掌。杨林小声对郭卫说："最好再演一次。"他也拚命鼓掌。大家站起来，有秩序地陆续散去。

"老李，你到我那里去坐坐，"陈主任对我说。我们又走到那个小院子，在木廊上坐下来，我坐在用木箱改做的椅子上。陈主任叫郭卫沏了两杯茶。

夜很冷，院子里还有积雪，廊上长条桌上烛光暗淡，摇晃得厉害。

"老李，看了这些节目，更想祖国了。好啊！"陈主任端起茶杯带笑地说。

"我看，你会想到更远的日子，那些忘不了的日子罢。"我接下去说，我知道他是经过长征的干部。

"对，我当然忘不了，"他歇了歇，好像他眼前出现了那些日子的景象似的。"当时哪里想得到今天！但是有些人脑子里的的确确有个今天。虽然模模糊糊说不清楚，但总是有个今天。"他看了看郭卫同杨林，他们在小声谈论什么。他又说："小鬼，你们现在幸福多了。你们想也想不出我们当时的情况，你们听听也好。"

两个通讯员听见他这么说，就走了过来，望着他那张带着刚毅表情的瘦脸，等待他讲什么。他咳了一声嗽，就讲道："我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年纪比你们还小。那年我们过了金沙江以后，就爬上一座高山，正是在大热天，起先还很热，走了三分之二，有的人就气喘得不得了，也有人口渴得没有办法，把路旁的雪水捧起来喝，一喝下去就倒下死了。一坐下来休息，也就站不起来，闭气死了。我看见自己的阶级弟兄就这样白白地死去，也哭过几次。可是哭过后我还是要硬起心肠往前走。我就是经过这样的考验来的。"

杨林和郭卫都瞪着眼出神地听陈主任讲话，两个年轻人的眼珠都是黑亮黑亮的，杨林的眼睛稍微大一些，郭卫的嘴唇厚一些。陈主任喝了一口茶，他好像不打算讲了，可是看见年轻人听得那样注意，他又往下说：

"草地上没有人烟，气候时常变化，时而下雪，时而下雹。……我们晚上只好在山脚草坪上用竿子支雨伞，或者拆被子搭帐篷，自己待在里头。……有时候下大雨刮大风，把帐篷一吹就吹得很远，那时人就只好淋雨。有一次下了一整天的大雨，淋得人只想找个洞子钻进去。……我们每天煮一点稀的东西吃。后来实在没有东西，就把脚上穿的牛皮鞋脱下来煮起吃。……我们还走到一片陷泥地，一个不小心陷下去，就起不来，死在里头……"

杨林的嘴里忽然冒出一句话："首长，你们真坚强啊！"他自己马上觉得不该出声，就站直了身子。陈主任微微笑了起来，说："小鬼，我那个时候也是通讯员。"停了停又说："朝鲜战

场上最艰苦的日子，一口雪一口炒面的日子也比那个时候强得多。可你们都没有赶上。”

“我们来晚了，”杨林又惋惜地说了一句，郭卫连忙拉他袖子，他就闭上了嘴，脸上还有笑容，看得出他对陈主任怀有敬爱的感情。

“来晚了不要紧，反正仗还有得打，”陈主任带笑说，他又喝了一口茶，把杯子放在长条桌上。“我知道你想打仗，一直没有赶上机会。不要紧，你好好锻炼罢，你们那里的一七〇高地不是大家都讨厌吗？敌人不肯谈判，就把它拔掉……”一七〇高地是八连的眼中钉，就在××山前面，郝指导员经常提到它。

屋子里电话铃响了，打断了陈主任的话，是师政委打来的，政委和陈主任在谈什么事情，我就告辞走了，陈主任也没有留我。

我在积雪的路上走着，一面和旁边的杨林讲话，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今天给母亲寄了一封信去。我问他信上写些什么。他说：“我请她不要多想我，我向她保证我要争取打仗立功，把喜报送到家里去。”我就说：“你妈一定很高兴，有你这样的好儿子。”他说：“我妈好久没有来信了，多半是他们忙，来不及替我妈写信……”他还要讲下去，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叫：“杨林，”我们站住回过头去看。郭卫跑了上来。他到了我们面前，敬个礼说：“李林同志，首长叫送来的，他说刚才忘了拿给你。”他递了一个小纸包给我。我打开纸包，现出两盒咳嗽糖来。这种糖在祖国是极其普通的。我说：“你替我谢谢主任。”

我把纸包塞在棉军衣的口袋里，继续往前走。

我们回到洞子里，杨林点燃蜡烛，我打开纸包，看到陈主任的一封短信：

李林同志：从祖国带来的糖，分两盒给你，请收下这份来得不易的礼物。此致

革命的敬礼！

陈正昌 ××日。

我准备分一盒给郝指导员他们。我打开另一盒，我噙了一颗糖，也让杨林尝一块。我说："含着祖国来的糖，心更贴近祖国了。"

这一晚我睡得很好。

早晨醒来，我感到冷，盖在被子上的棉大衣落到地上了。杨林不在洞里。我穿好衣服，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片，我拿到洞口看，原来是杨林留的字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他写着：

报告李林同志：半夜里鬼子炸坏了老乡的房子，杨林去帮忙，请你先到首长那里。

脸水等等他都准备好了。我把字条揣在衣袋里，走出洞去。我以为落弹的地方较远，因为我在睡梦中毫无感觉。可是走到山脚，我又遇见王协理员，他正在和文工团员讲话，看见我，他激动地说："一位阿妈妮牺牲了！"他的眼里射出来火一样的

眼光。

我愤怒地问："在哪里？"

"不远，就在那里，"王协理员指了一下，他又说："你那个小通讯员也在那里帮忙！"

我急急地跑向他指的那个方向。原来就是我两天前住过一夜的人家。房子没有了，剩下一堆土、瓦片和断木头。门前那棵栗树也只剩下半截树桩。土堆里挖出来的东西堆在雪地下，也没有多少完整的了。朝鲜干部、志愿军人员和老大娘们在那里，有的在瓦砾堆里挖掘，有的在哭，有的在商量事情。

杨林看见我就奔过来，他的军服扯破了，上面有大块的污迹，脸上污黑，手上有血迹，一张脸冒着热气，黑亮黑亮的大眼睛被泪水罩住了，他拉着我的一只手，说："阿妈妮牺牲了。"我捏住他的手，过了半晌才吐出一句："老大爷呢？"这一家就只有一对老夫妇，儿子是人民军战士，在这次战争中牺牲了。

"在那里，"他指了指。我朝他指的方向看去。老大爷蹲在一棵光秃的树下，拿着一根长烟管，默默地吸着，吸着。

"挖出来，阿妈妮已经断气了。……老大爷捏着拳头，不讲话……"他说不下去了。

"不要太激动……记住这个仇恨，"我低声说，眼前现出那张笑得眼睛眯起来的、和善的黄瘦脸，我想起了干净得发亮的木廊，和她满心高兴地端来的团子，我心里一阵难过。我拍了拍杨林的肩头，"没有事情，回去洗个脸罢。"我走到老大娘的遗体前，她躺在木板上，头上盖着白布。我行了一个礼就走了。

杨林跟在我后面，走了一段路，他忽然问我："李林同志，

我可不可以再要求首长让我到班里去？”

我想：又来了！但是我同情他，我只说了半句：“你昨天不是还说……”

他好像等不及了，好像忍耐不下去了，他说：“我要打美帝，要给阿妈妮报仇！”不像在说话，倒像在呻吟。

“我见到指导员，一定替你说话。”我终于答应了他。

“谢谢你。”他说，吐了一口气。

下午他就把扯破的军服缝补好了。

第二天，我写完了关于青年战士的报导，交给陈主任看过以后发出去。不到傍晚我就同杨林动身再去八连，仍然坐师部的小吉普，车子开出的时间早一点，路上又比较顺利，不到深夜就到了下车的地点。杨林背着背包，还提着我的手提包给我引路。我们翻过一座长了不少马尾松的小山，在交通沟里走了一段路，遇到郝指导员派来接我们的人，他亲热地说声“回来了？”，就把手提包从杨林手里拿过去。我听见杨林高兴地小声叫：“王理明！”来的也是连部的小通讯员，上海人，年纪和杨林差不多，身材也差不远。我听见王理明说：“你家里来了信。”又听见杨林惊喜地问：“真的？”

我们打着手电筒经过黑暗的通道，走进了连部办公室。郝指导员坐在长条桌前面，桌上点着一盏油灯，昏暗的灯光照着那张亲切的长方脸。他站起来伸出一只长满了茧的大手欢迎我。我坐在桌前那个小凳上，我们就谈起来。我谈了几天的情况，谈了我写的那篇报导。我说我还想写一篇介绍普通的

青年战士的文章，这些入伍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并没有立过功、打过仗，但是他们一旦走上战场，都会成为英雄。我讲话的时候，他伸出五根手指摩自己的下巴，听着，可是不等我讲完，他就露出笑容打岔说："杨林怎样？他让你满意罢。"

我称赞了杨林几句，我也反映了杨林那个到班里去的要求。

郝指导员笑了。他说："这个小鬼真顽固，他一直没有放弃他那个愿望。"

"那么，你就满足他一次罢。"

郝指导员并不直接回答，他说："仗总是有得打的。我们总有一天要拔掉前面那个眼中钉。快了。美国鬼子不肯认真谈判，只有一拳一拳地揍他，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吃他，他才肯认输，坐下来规规矩矩地谈。"

我又重说了一遍，讲了这几天里杨林的一些事情。他听得很注意。他答复了："你放心，我们会考虑让他去锻炼一下。其实，打起仗来，通讯员也很需要。……我赞成你写那篇文章，这样的年轻人我的确见过很多，叫人从心底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他看见另一个通讯员王理明走进来，就顺口问道："王理明，杨林看了家信怎样？高兴吗？"

"报告指导员，他妈死了，"王理明答道。

"怎么会死，也没有听说生病！"郝指导员吃惊地说。我不做声，我心里想：怎么都集中在这一天！我同情这个小青年。指导员把军帽向上一掀，又说一句："你讲罢。"

"报告指导员，我刚刚回到我们住室，看见杨林呆呆地站

在那里。我喊他，他好像没听见。他望着贴在墙上的《江楼春晓》的图片，不理我。我忍不住拉着他的肩膀，问他：‘怎么啦？信里讲的啥事体？’他转过身捏紧我的手，流下眼泪来。我猜到信的内容了。我再问他：‘信里有啥消息？’他说：‘我妈死了。’我安慰他，劝他。他放开我的手，一边擦眼睛，一边说：‘信上说，我妈病了一个多月才死。她一直不让他们把她的事情告诉我。她临死前还特别嘱咐他们不要给我晓得她的死信，让我安心在朝鲜打仗。’我说：‘做母亲都是这样，你就应该听你妈的话。’他说：‘我怪我自家为啥不早给她多写两封信！现在我有一肚皮的话，她一句也不晓得！我心里不好过。’我挽住他的肩膀问他：‘你妈的后事都办好了罢？’他点点头说：‘我妈的后事都办好了。人民政府对我们家照顾很好。我再也没有牵挂了。’他叫我让他一个人再想一阵，我只好出来，他一个人望着壁上那张图，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有点担心。指导员，你是不是叫他来谈谈？”

指导员把右手的五根指头放在下巴上，用力把两边脸颊揉了两下，听完王理明的话，他短短地说：“不要紧，我去看看他。”

我知道指导员要去做思想工作，我放心了。我想起王理明提到的《江楼春晓》的图片，那是从一份画报上裁下来的，彩色图片上现出一丛碧绿的竹子和一条缓缓地向前流去的河，还有一座漂亮的楼房，那是成都有名的望江楼。杨林的家离望江楼不远。我听见杨林讲过，他的家就在锦江那一边。他妈送他参军，母子分别的时候，他妈对他说：“你要去，就高高兴

兴地去嘛。早点打垮美国鬼子，早点回家。"她带笑地对他挥手。哥哥嫂嫂来信说他妈回到家哭过一回，就只哭过一回，以后讲起他，她总是高高兴兴的。她得到他入朝后寄回家的第一封信，欢喜得不得了，逢人就讲儿子在朝鲜的事情。……我全记起来了。杨林对我讲这些话，他也为了这样一位母亲感到自豪。

指导员出去了。我和王理明还谈了一阵，王理明为杨林担心，我却觉得不要紧。我们谈得起劲，还不曾谈完，指导员回来了。他的脸色开朗，我知道他的思想工作做得顺利。他不等我问，就称赞说："真是一块好钢。我一说他就懂。他要求给他最艰巨的任务。"

这一晚我没有再看见杨林。第二天大清早他就进来了。他招呼我、讲话，和往常一样，只是眼皮有点肿，也没有露笑容。他和王理明到炊事班把饭打回来，我们吃过饭，我又找他谈了一阵，是在他们几个人住的洞子里谈的。《江楼春晓》的图片还贴在洞壁上，另外一张《北京初雪》的图片也在那里。洞壁冷冰冰，又潮湿。洞子里阴暗，我坐在炕上，很吃力地记下他的谈话。他回答我的问题，讲了些他家乡的情况和解放前后的变化。我提到他刚刚寄出的家信，他讲起他妈的好处。后来他说："李林同志，我生得晚，不过我想我也受得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考验。"他还有事情，我记录又太吃力，因此问得并不多，结束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未婚妻，本来决定今年春天结婚，他要参加抗美援朝，未婚妻支持他，就把婚事搁下来了。他说这里只有指导员知道，他没有对别人讲过。我想起来了，

就问："上次你说'有人'，就是指她吗？"他点点头。我问他为什么不对别人讲。他红了脸说："不好意思。"关于这个未婚妻，他只说她在村子里工作，和他同样年纪，别的他就不讲了。我也没有多问。心里想什么时候向指导员打听一下。

下午李连长从团部回来了。晚上郝指导员宣布让杨林到二班去锻炼一个月，杨林这时才笑了笑。他明天就下去。这样的宣布也使我高兴：杨林的愿望实现了。但是这个晚上我睡不好。我听见远处的炮声和机关枪声，有一次洞子震动了一下。指导员和连长先后起来查哨，我都知道。

早晨吃过早饭，杨林背着背包、挎着枪、戴着伪装帽高高兴兴出发的时候，上海人王理明和卫生员范阳（这个挂着有红十字的布袋的小胖子是杨林的同乡，相隔四十里路）送他在交通沟里走了十几步路，他们之间显得非常亲热；我也送他到那里，他向我敬礼，我握着他的手，说："过几天我到二班来看你。"去一趟并不难，而且我也想了解杨林在班里的情况。杨林带笑说："欢迎李林同志来。"……他转了弯。我起初还看见伪装帽上的树叶，一瞬眼什么也不见了。

我们三个人转身回去，范阳年纪比杨林稍微大一些，爱讲话，他和王理明还在谈杨林的事情，回到连部，我就向指导员表示三五天后我要去二班看看杨林锻炼的情况，他很赞成。这一天我就在考虑我到二班去谈些什么，我还需要了解些什么，以及我打算写的那篇报导怎样写法。

这一次我对杨林失了信。就在我准备去看他的前一天，

我得到通知要我回国去参加一个会议，陈主任又派了车来接我。我在师政治部休息半天，和陈主任匆匆见了一面就走了。他派郭卫把我一直送到安东，分别前他还嘱咐我早日回来，免得错过一次战斗。我问他是不是要拔掉八连那个眼中钉？我这样问，因为我离开八连的前一天新来了一位副指导员，我动身的时候，郝指导员和李连长都到团部开会去了，就由王副指导员看家，我猜想要执行什么任务了。

他笑笑，说："你还是早点回来罢。"

雪已经化尽，树枝添了新叶，风吹到脸上使人感到舒适，我们白天休息，黑夜行军。沿途不少炸坏的房屋，一排一排的照明弹高高挂在天空。但是到处有防空哨挥着旗、吹着哨子给汽车指路。车上我们都不讲话，白天休息的时候，郭卫经常和我谈起杨林，我把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到了安东，郭卫和司机老吴在留守处向我告别，这个山东小青年握着我的手一再说："你要再来啊！"我也感到留恋。我还声回答："我一定再来。"……

不到两个月，我又坐在陈主任的廊上了。陈主任两只眼睛发红，显然睡眠不足，但是他精神好，看见我，叫声"老李"，拿着我从祖国带给他的上海糖果，笑起来。郭卫也像欢迎亲人那样地招呼我。我发现那张长条桌上添了一个用炮弹筒做的花瓶，里面插了一枝金达莱花。这枝美丽的红花使廊子显得明亮多了。

"你来得正好，八连刚刚打了胜仗，把一七〇高地拿下来了。你休息几天，以后再下去看看。"陈主任说，喝着他喜欢的

云南沱茶，他叫郭卫也给我沏了一杯。他满意地说："喝这样的茶，我好像回到祖国了。"

"打了胜仗，好得很，让我早点下去祝贺他们。我很想看见那几个熟人，特别是郝平、杨林他们，"我兴奋地说。

陈主任皱起了他黑黑的浓眉，接连喝了两口茶，他的颧骨好像更突出了，嘴边一圈短短的胡子带着水发亮。他说："你要看郝平，不用下去，他就在疗养所。我叫郭卫陪你去。"

"他在疗养所？他挂花了，是不是？"我惊问道。

"不要紧，就要送回国去治疗。抓紧时间，我保证你明天早晨就见到他，"陈主任爽快地说。

我看见陈主任满脸倦容，就没有追问下去。可是不等我去疗养所，郭卫来照料我的时候，就把他知道的全对我讲了：杨林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直立不倒。他红着眼说："李林同志，你知道他，一定要把他的事迹写出来。"我说："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小青年说："他真好，我们一块儿从祖国来，路上我生病，他照顾我很周到。"他的泪水流到脸颊上了。他又说："他这次打仗很勇敢。我向首长打了报告要求到连队去，我也要打仗。李林同志，你也替我向首长讲讲话罢。"

我看见他脸上的恳切表情，不能不答应。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到了疗养所。疗养所在山脚，也是利用一个不小的山洞修建的，洞外是石片顶的平房，房前有一棵树叶繁茂的大树。郭卫去办了手续。所长把我带进病房。一个房间里六张病床，在右上角的病床上，我看见了那张熟悉的脸，我忍不住唤了一声："指导员！"声音并不大，所长连忙做

手势止住我。我站在床前，看这张黑黑的长方脸，下巴尖了，颧骨高了，胡子长了，眼睛没有神，嘴唇灰白。我听见一声："老李，"这张脸上浮起了笑容。我安慰他，向他祝贺胜利。他带笑说："我的伤不要紧。治好以后我就回来。……小鬼他救了我，……自己却牺牲了。……你还记得杨林吗？"

"记得，我一直记得。"

"就是他……我挂了花，他给我包扎好，把我背进防空洞……他说：'你从前也背过你的指导员，我背你也不会使你痛。'……他留一颗手榴弹给我……自己跑出去打敌人……子弹打完了，他退到洞口，用他的身体堵住洞子……小鬼他说：'你放心，我在，阵地就在。'……他说：'指导员，我绝不让敌人碰你一下！'最后的手榴弹也扔出去了……他满身都是子弹孔，拿着枪，站在洞口，一直不倒。……副指导员就上来了……"

我并不是让负伤的指导员一次谈许多话，这些话是断断续续地几次说出来的。病房里还有三个八连的伤员，他们也要给送回国去治疗，说是明天出发。我在郝指导员的病床旁边待了将近一天，没有听见他哼过一声。这中间他睡过几次，睡得还好，醒来又断断续续地讲几句话。他始终相信自己能够回到战场。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这点伤"。有一次他像说梦话似的叫着"小鬼"，眼睛里淌出了泪水，还说："想不到轮着你来背我……的确不痛啊……"我注意地看他，用手帕轻轻地揩去他的眼泪，他又醒了，对我微笑。

最后我向他告别的时候，劝他安心养伤，他请我替他谢谢陈主任，陈主任到疗养所来看过他，还说要是我再去八连，请

代他向同志们问好。总之，他的心还在他的战斗岗位上。可是所长告诉我指导员的左腿可能保不住。所长的话和指导员的话，郭卫在旁边都听见，所以我们上车以后，这个山东小通讯员就痛苦地问我："郝指导员没有了左腿怎么办？"我接连说："不会，不会。"

过一天我就到八连去了。我又坐上了老吴开的小吉普，还是和郭卫一起，离开了师部的山沟。敌机经常在夜空盘旋，炸弹在不远处爆炸，车子不开灯在公路上奔跑。我们终于到了下车的地点。有人在那里等候，他一开口，我就认出来小通讯员王理明。郭卫跑上去，拉着手同他讲了一阵话，就向我告辞坐原车回去了。

不久我听到一声枪响，这是防空哨的枪声，敌机又在上空盘旋了。王理明带着我翻山、摸黑在交通沟里走来走去，我感到吃力，也顾不得和王理明讲话，默默地跟着他到了连部。

"到了。李林同志，又见到你了，"王理明亲切地说，他打着手电筒把我送到了办公室。李连长还是那样结实，新来的王副指导员我上次匆匆见过一面，虽然瘦小，却显得精神饱满。王理明黑了些，瘦了些，胸膛却挺直了些。他望着我，好像有不少的话要对我说，我也想找他畅谈杨林的事情。但是李连长和王副指导员却主张让我休息，明天给我安排座谈。我同意了他们的决定。可是这一夜我怎么会睡得安稳？杨林的一对黑亮的眼珠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活动。

早晨我才发现坑道里有不少的洞子，整个山差不多都挖通了。我意外地看见了王协理员，他和一部分文工团员在这

里整理材料，帮忙搞总结，也演一些小节目慰问战士。他还是那样热情，那样容易接近，他拉着我的手高兴地说："我知道你会来，我盼了好久了。"我在这里遇见熟人感到特别亲热。他还说："我也在搜集杨林同志的材料，我也要宣传他。"

连长给我安排了一天的座谈，上半天他和副指导员介绍战斗的情况：他带着战士攻占了一七〇高地，指导员坚守阵地到最后负伤，副指导员带着增援部队赶上去消灭反扑的敌人，坚固了阵地。下半天立了功的战士介绍他们的英雄事迹，王理明也发了言，他就是在关键时刻炸掉了敌人的大母堡，跟着连长最先登上主峰的英雄，可是他把自己的事情讲得很简单，不像他讲他的朋友杨林的事情那样。

另一天我请他单独给我讲杨林的事情，他一口答应。晚上我就在他的洞子里听他谈，洞子里有两个炕，壁上挂着一盏用罐头盒子改做的油灯，用棉絮搓成的粗灯芯发出带黑烟的火光，我们就坐在杨林生前睡过的炕上。王理明谈了杨林在屯兵洞里和阵地上的表现，谈了杨林的一些英雄事迹，最后说："我参加副指导员带的增援部队上去，把敌人完全消灭了。副指导员担心指导员的安全。我们走到防空洞跟前，看见杨林瞪着双眼拿着枪守在洞口，洞子前面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敌人的尸首。我听见范阳远远地叫杨林，我一看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他不答应。我们走近一看，他的眼睛无光，嘴唇雪白，闭得紧紧的，衣服撕破了。我拉他一只膀子，刚说了三个字'小鬼，你……'手一松，他就倒下去了，我才注意到他满身枪洞，尽是血。我听见副指导员在后面问：'指导员呢？'

我连忙到洞子里面去看。指导员坐在地上，身子斜靠洞壁，右腿上放着一颗手榴弹。我唤了两声‘指导员’。他慢慢睁开眼睛，动一下头，说：‘你来了，杨林呢？’我说：‘我们来迟了。’我就跑出洞大声叫：‘指导员在此地！’我看见范阳弯下身子，用他的手把杨林睁开的眼睛闭上，心里一阵难过，眼泪流出来了。范阳也赶来了，我们两人把指导员抬出来。副指导员和几位同志在洞口迎接。副指导员弯下身子握着指导员的手说：‘指导员，我们来迟了，让你吃了苦。’指导员勉强笑笑，连声说‘不迟’。他躺在地上，范阳替他重新包扎腿上的伤。他问起杨林，没有人回答。杨林的尸首就在身边，指导员看见了，说：‘果然是他，让我好好看他一眼。’副指导员说：‘让指导员看看罢。’我扶起指导员的上半身，指导员注意地看他，我也在看那张浅黄色的圆脸，那双松松地闭上的眼睛，那两片有血迹的嘴唇……我心里想：你说一句话罢！我忍不下去了。我听见指导员说：‘把我抬下去罢。……老王，阵地交给你们了。’……”王理明的声音嘶哑了，他停了停。

“我带着担架员把指导员抬下去，”卫生员范阳接下去说，他是在我们谈话的中间进来的。他原先是一个胖小子，现在瘦多了，好像也高了些。他仍然穿着洗得干净的褪了色的军服，仍然挂着他那个有红十字的布袋。“指导员在担架上常常一个人在说话。他有热度，我想他是在说胡话。我听见这样一句：‘为什么不让小鬼多活几十年？’原来他还是在讲杨林。我们走着走着，天色暗了，落下雨点来。我把身上披的棉军衣取下来给他盖上。他手一动，说：‘我不要，你给杨林盖上罢。’

我惊讶地问：‘给杨林盖上？’他醒过来了，听见我的话，用力说了一句‘他没有死。’以后又睡着了。……”

范阳又回头讲杨林牺牲以前到三排长守的阵地来传达指导员的命令，三排长当时负了重伤不肯离开火线，范阳在给他包扎。范阳对杨林说：“你回去报告指导员，说范阳在这里照料三排长，一定坚守到底。”范阳揉了揉眼睛说：“他正要动身回去，我抓住他的膀子小声说：‘你将来回到成都一定要把我的事情告诉我家里。’我当时是准备永远不离开阵地了。他不加考虑立刻回答：‘我一定走四十里路传达这个口信。’这就是我同他最后的谈话。”

“那么你将来回国就应当走四十里路去讲他的事情，”王理明严肃地插了一句。

“不说四十里，就是走四百里我也情愿！”范阳激动地答道。

我的眼光停留在洞壁上贴的天安门广场上国庆节游行的彩色图片，这也是从画报上裁下来的，我一进来就注意到了，因为这个地方原来贴的是那幅《江楼春晓》。我以为是王理明把图片换过了。我还没有发问，王理明就说话了：

“这张图也是杨林贴的。他从二班锻炼回来，拿到这张图，就把旧的那张换了。他很喜欢这张图。有一天他忽然问我：‘王理明，你还记得国庆节吗？天安门多热闹啊！你想不想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说：‘当然想。’他马上接下去说：‘我只想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上站半天，我只想看在城楼上检阅队伍的毛主席他老人家。’又有一次他半夜里把我叫醒，拉着我的

膀子说：‘王理明，我看见毛主席了。他老人家问我想些啥子。我说：杨林永远听主席的话，为人民服务，杨林连心肝也肯挖出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听见哈哈大笑。’他兴奋得不得了。原来他刚刚做了梦。第二天早晨他偷偷对我说，他刚刚醒过来的时候，还以为真的见到了毛主席……”

后来我问起杨林有没有遗物留下来。范阳说：“我听见他自己讲过，他刚刚到师里的时候，分到了一个慰问袋，说是朝鲜老乡送来的慰问品，上面绣着一枝花，还有十几个朝鲜字，他不认得。他说：‘我没有用它，就收起来了。我打算将来带回祖国送给我妈做个纪念，让她常常记得朝鲜同志跟我们是心连心。’”

王理明接下去说：“这个慰问袋杨林给我看过。上面绣的是金达莱，绣得很好。他的东西都交到连部了。”……

我最后去找文工团的王协理员。

这个瘦小精干的广东人正在编写介绍杨林英雄事迹的说唱节目，他热情地给我帮助，把他知道的有关杨林的事情都讲了。这次战斗之前他和部分文工团员下来作鼓动工作，他同一些战士谈过心，也同杨林谈过几次话。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慎重地打开那块布，从一个笔记本里取出两张残缺的纸片，交给我，说：“你看。”我接过来，原来是一封无头无尾的信，纸上还有干了的血迹。信上写着：

……我一直守在妈身边。她临死前还不准我写信告诉你。她要你安心在朝鲜打仗，不要想家。妈一直到死，

没有说过想你回家的话，她只说当初不该逼你结婚。我知道她想你。她临死还喊你的小名，脸上还有笑容，好像并不难过。……

不管你怎样说，我还是想到朝鲜来。我知道志愿军里也有女的，我们村里也有人上省城听过女志愿军的报告。但是我要报名抗美援朝，他们总不收我。杨林哥，你替我想个办法罢，让我到朝鲜立个国际功。不光是你，我也想上北京见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也有好多话对他老人家讲啊……

“这是他未婚妻写的，我知道，”我说，小心地把纸片交还给王协理员。

“李秀兰同志的信是在杨林的身上找到的。他放在军服的口袋里面。战斗前我同他谈话，有一次他讲起他家里的事情，说他当初报名参军，他母亲不同意，而且逼他结婚，他不肯。他母亲生他的气，哥哥嫂嫂也没有办法，还是他未婚妻向他母亲做工作，他母亲才同意。他母亲和未婚妻一起高高兴兴地送他去参军。他说李秀兰是个好姑娘，在村里劳动生产，又在民校教妇女认字念书。”王协理员说到这里，又打开笔记本取出一张有些损坏的两寸照片递给我。照片上一位面貌和善的老大娘坐在当中，背后立着三个年轻人，一男二女，右边那个梳双辫的瓜子脸上带笑的年轻姑娘，不用说就是李秀兰了。

“主席像也是在他身上找到的。这个笔记本他留在家里。”

王协理员把笔记本递给我。这就是杨林上次给我看过的那个笔记本。我翻了一下，杨林把陈主任关于长征的谈话也简单地记下来了，还写上"千万不要忘记"。我注意到笔记本开头印着毛主席近照的那一页是裁下来以后又贴上去的，皱纹还没有压平。王协理员马上解释道："他出发前把主席像裁了下来，带在身上，放在贴身的衬衣口袋里面。他说，这样他什么也不怕了。他是团员，出发战斗前还打了申请入党的报告。后来在他身上找到这张主席像，没有损坏，我又贴在本子上了。连长说这些遗物将来寄回杨林的家里去。"

听了这个解释，我又一次望着毛主席的慈祥的面容，我记起来杨林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过：倘使他能够到北京见到毛主席，那将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我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惜他见不到毛主席了。"

"我揣想过他瞪着双眼挺着胸膛端着枪站在防空洞口的心情，我觉得他已经见到红太阳了。"王协理员接着说，眼里含着泪水，可是声音里充满信心。

我用不着再向别人打听杨林的事情了。我把笔记本交还给王协理员之前，还翻看了一下，无意间翻到一张纸片，原来是一个信封，已经毁掉了一半，我拿起来看，中间几个字还看得清楚："杨林同志。"不用说这是李秀兰的笔迹。我低声念着这四个字，我多么希望他就站在我的面前，我真想再看见他那对黑亮黑亮的眼珠。……

1977年8月27日写完。